

一、故园韶山 人文荟萃

毛泽东的故乡，位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要介绍韶山，可先从湖南说起。

在滔滔长江的南岸，镶嵌着我国最大的湖泊——洞庭湖。洞庭湖波澜壮阔，绵延无际，素有“八百里洞庭”之称。湖的南面，铺展着一块 21 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地，湖南省便是因此而得名。

1961 年，毛泽东在给他早年求学时的学友周世钊写的一首《七律·答友人》的诗中，对故乡湖南作了如下的描绘：

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九疑山下，斑竹之乡的湖南，是中国最秀丽、最富足的省份之一，与湖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等省接壤。境内风景宜人，高山耸立，水陆交通发达，流淌着湘、资、沅、澧四条河流，其中以湘江为最大，因此湖南省简称“湘”。

湖南古迹众多，蜿蜒的雪峰山、武陵山和著名的南岳衡山，均是旅游胜地。省内虽然山多，但四通八达，山间谷地，自古以来是与邻省交通的要道。其中醴陵——宜春夹道，沟通湘赣两省；著名的零陵——桂林谷地，即湘桂夹道，是自古以来通向广西的交通要道。京广、湘桂、湘黔、枝柳等铁路与公路干线纵横交错，形成比较均匀的水陆交通网，兼有从长沙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航空线，与地面交通结合，构成立体交通网络。

湖南盛产木芙蓉，故有“芙蓉国”的美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覆盖着茂密的树木、茶山；铺排着整齐的稻田、果园等，是我国盛产粮食的重要地区，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

湖南境内居住着汉、苗、土家、侗、瑶、回、壮、维吾尔等民族。在 20 世纪初已有 3000 多万人口，现在达到 6200 多万人。境内民风勤劳、朴

实、倔强，多爱吃辣椒，具有爱国、爱乡、勇于反抗的优良传统。

在湖南，早有“惟楚有材，于斯为刷”的说法。近代以来，确实人才辈出，功业鼎盛，举世无出其右。其中像思想家王船山、魏源，变法维新领袖谭嗣同、唐才常，辛亥革命先驱陈天华、秋瑾、宋教仁以及黄兴、蔡锷等，无不是一时人杰，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曾轰动过大半个中国。

湖南省会长沙，位于湘江下游，有岳麓书院、船山学社、爱晚亭、橘子洲头等名胜，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求学、会友、流连的地方。他常常约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学侣，在此畅谈救国大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有一首歌曾唱遍大江南北，至今仍妇孺皆知：

“浏阳河，弯过了九道湾，五十里的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出了个毛泽东，领导人民得解放。……”

歌中走的是水路，倘若要是从陆路走起来，从省城长沙往西南，转上湘黔铁路，也能很快就到达湘潭县。该县位于湘江与涟水的汇合处，有雨湖园、关圣寺、万寿宫等名胜。

湘潭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早在商周以前就有了古老文明，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近代以来，又有了“金湘潭”、“小南京”、“湖南巨镇”等美名。境内交通发达，土地肥沃，历来是楚南的粮仓，素有“天下第一壮县”之称。

鸦片战争之后，洋货打进了中国的各个角落，湘潭也不能幸免。在 19 世纪末叶，湘潭一度成为洋货深入中国内地的中转市场。那时，凡是外国运来的货物，到广东上岸后，就先运到湘潭，再由湘潭运到国内各地。英国太古公司、日本怡和公司等，专门制造一批浅水轮。驶往湘潭、长沙等地。中国的蚕丝、茶叶运出国外，也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往广东出口。当时湘潭和广州之间，商务活动繁忙，陆路肩货的工人不下 10 万人。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也刺激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农民趋于破产，而极少数人则走上富农经济的道路。

湘潭县西北 70 里的地方。有一条著名的山冲——韶山冲，那便是毛泽东的故乡。相传在远古时代，虞舜帝南下，曾到苍梧之野巡视。他由京城蒲坂出发，过黄河，跨长江，涉洞庭，经过湘中的山野，看到处处是苍松翠竹、山青水秀，心旷神怡，就在湘江流域的湘潭县一条山冲边不高的山上奏起“箫韶九成”，引来凤凰起舞，当地的许多地名便由此而得名。因为舜帝的音乐叫“韶乐”，因此他到过的山就叫“韶山”；山间潺潺的小溪叫“韶水”；山峦绵亘下的山冲叫“韶山冲”；山上陡峭的山尖叫“韶峰”。韶峰海拔 500 多米，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也是韶山八景之一。韶山八景亦有许多

动人的传说。相传在韶峰旁边住着三位俊秀的姑娘，她们日耕夜织，辛勤劳动。一天从彩云上飞来一只金色的凤凰，三个姑娘就骑着凤凰上天，成为仙女。她们留下了许多遗迹，就是现在的韶山八景：风仪亭址、胭脂古井、仙女茅庵、石屋清风、顿石成门、塔岭晴霞、石壁流泉、韶峰耸翠。

如今前去韶山毛泽东故居参观的人都可以看到，在滴水洞旁的山坡上，新建了一座韶山八景诗碑亭。那八首优美的诗词，将昔日美丽的韶山，描绘得栩栩如生。

一、风仪亭址

乐奏九成期，瑞应于斯，亭空凤去几多时？破瓦颓垣天爱惜，烟幕云帷。
远翥欲何之，琴瑟维持，高岗又长绿桐枝。圣德巍巍天地永，正好来仪。

二、胭脂古井

仙迹寄高岗，古井流香，胭脂笑问为谁妆？色即是空空即色，春雨斜阳。
一派玉琼浆，寒碧水茫，无纤尘染影岗光，参透神仙终好艳，红粉何妨？

三、仙女茅庵

山深别有天，草木皆仙，茅庵丹灶筑当年，道成女子今何在？一座金莲。
晨钟暮鼓边，惊醒尘缘，高僧无事抱云眠，何必普陀观自在，面壁依然。

四、石屋清风

砖瓦莫为功，栋宇凌空，神工鬼斧石琼宫，九转丹成仙去后，剩得清风。
云雾卷帘栊，彩挂晴虹，月明灯火彻宵红，金屋几多沉草径，笑倒山翁。

五、顿石成门

门户别开奇，两石为之。一关不许野云驰。春色满村关不住，摇曳生姿。
雨过碧玻璃，雾锁烟司，闹花野鸟各支持。若得当年由也宿，夫复何疑？

六、塔岭晴霞

峰峦泼翠鲜，岭断云连，横中一塔插空天，晴光暮色霞烘里，玉烛摇烟。
风雨自年年，破补苔钱，春风无主鹤高眠，好欲招来询甲子，沧海桑田。

七、石壁流泉

素练影空悬，瀑布飞泉，佛幡高挂五云边，半点红尘都不到，石上因缘；

撑起半边天，清洁澄鲜，水晶帘卷万家烟，说与王维难着笔，此景才仙。

八、韶峰耸翠

峭壁插霄间，扑压群山，箭韶流响白云关，绝顶才宽三五尺，秀挹天颜；
仙女去尘寰，石上苔斑，风梳雨沐绿云发，万古头颅新色相，月挂金环。

从八景诗碑亭上，人们不难读出韶山的风景如画，而正是这如画的风
景，引得昔日的文人墨客，竞相献诗献词。这里也不妨摘录两首：

其一 宋朝周行子《韶山》诗

潇湘云水梦中来，犹记蓬莱进酒杯。
歌罢远游人不见，玉箫吹月过东台。
昔年辛苦读丹经，梦里瑶台月自明。
玉洞桃花今寂寞，凤仪亭下竹风生。

其二 元朝陈邦光《韶山》诗

女郎遗迹寄山隈，灵凤亲传玉札催。
彩翮已随仙驭去，危亭今向绀园开。
天长望阔云踪远，林密阴清竹影筛。
坐览行吟难尽兴，日斜归去首频回。

诗词之外，尚有歌赋。乾隆年间的湘乡籍“布衣”周定宁曾写了一篇题为《韶山记》的骈赋，至今仍在韶山一带为人传诵：

韶山，楚南一名山也。祖西华，面南岳，《盘古舆图》按：轸宿在玉衡；天文昭曜，其辰在巳，星在荧惑，五行在丙，天市在西垣，次舍在鹑尾，细度在轸十六度也。

介三湘而远七泽，发岳麓而控东台。潏洄地涌，水飞雪浪之花；巖岌天开，山横玉枕之案。绵亘百余里，蜿蜒来八面之龙。

山苍莽，际无隆。狩幸致南巡之大舜；凤仪亭，丹凤含书；胭脂井，紫龙吐沫。

上麓天马凌空，岱上灵鱼不老。褒忠，贞女来朝，相随鹏山白

鹤；嵒护，石人抱子，引将东鹜凤凰。

乌台石岔，草衣崖畔，湘西狮子，石羊入山。

左湘潭，右湘乡。风云际会，前金后紫，龙王雨露同沾。登望而咫尺星沙，转盼而韶山罗列。

青草湾，金鸡观，秀丽花园；铁陂塘，枫梓山，恢宏乌石。平地斑竹，竹山青葱四季。南岸创石，石洞雄壮。

长天，黄田，白田，月城，山之保障；黑泥，花桥，桃树，山之前朝。

钓水洞，鲤鱼寨，鱼龙变化；青山寨，文林寨，虎豹风生。太乙观，中夜燃藜；白莲庵，四时玉藕。韶峰庵，仙女庵，列三女仙之金像；团山寺，清溪寺，绘诸菩萨之仪容。

九天韶乐，时来迭奏罗音；三邑叟童，日每瞻依圣境。

果然特地乾坤，信道崭新日月。不仙不道，眉山、盘谷风规；产乐产花，桃洞、天台景象。皓月是长明公不老，白云乃不速客频来。绘动风常清，山麓松垂露，轻洗妖氛。

惟阅此山，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石出；四时之景，恒周一道，同风永远，乃述题数语，聊缀七言：

绕岫岚光凝欲滴，长风轻袅云烟侧。

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拥千山万山碧。

如果说，周定宁的《韶山记》乃是历史上比较全面、细致、准确地描绘韶山风景的第一篇骈文的话，那么晚清时期湘潭籍经文学家王闿运的《湘潭韶山》，则显得更加脍炙人口。

西北山之首曰韶山。西界湘乡，东为书堂山。云湖水出焉，东南流七十里入于涟。其中多竹、兰、石炭。

旧云：韶氏三女山居学道，凤衔天书至而仙去。山上有凤仪亭，其阴有东台、桃花洞。

其下则书堂山，与长沙山同名。临湘欧阳信本所居疑此，亦率更别业也。

云湖水出山下，而东流，过连益桥。桥东山行可十里，为罗仙寨；东北则宁乡之地——宁乡，故益阳所分，“连”则连道，桥盖汉县之疆，取二县为名也。

云湖水又东，稍南流，经高桥，有小水出铁石坳，经矮桥而入

云湖水——“高”、“矮”相对而名矣。又东南得天子岭水，韶山因虞巡得名，故此名天子。

自岭东北，皆宁乡地，靳水东流而入于湘。岭南则云湖入涟。山水之间，山冈起伏，形家以为县脉所行也。

云湖水又东南，得梅湖水，又南得仙女山水，下为小韶山，与韶山相望。云献参差，翠微双秀，其地皆在湘乡。下四都别有仙女山，旧图谓之仙女峰，非此山也。

山水东流，百三十余里，至下云桥，得灵神寨水；北有上云桥，跨云湖水。或又皆为“营”字，云前代团练屯营之地。

灵神寨水东七八里，经清溪寺，又得一水，交流东注，至石坝桥南而入云湖水。

南流东折，经狮子山，上有石盆，夏旱不竭；洞多蛰燕，因谓之燕子洞。水屈东南，得球山水，山形正圆，西连狮子山，水出永义亭，经翟家山，为白玉泉。今县无翟姓，或改为“侧”。

又南得岩鹰坝水而届银田寺……

自此通舟，拨船转运，送租贩米，日夜往来。云湖船有三步（埠）：银田、灵宫及桥上也。舟载十斛，才用一人榜之，不须帆楫，惟持一篙，无阻风波，刻期而赴。或霜清春丽，命舫独游，亦临泛之别趣矣。

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早年也曾以散文的笔调，描述过自己的故乡。那是1916年6月下旬的一天，他在给友人肖子升的信中，描述了自己从湘潭赴往韶山时的日暮风光。

“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图画。”

以上摘录了许多描写韶山风光的诗词歌赋。然而在解放前，韶山冲里流传的更多是这样一些民间歌谣：

其 一

农民头上三把刀，
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
逃荒、讨米、坐监牢。

其 二

韶山冲，长又长，
砍柴做工度时光；
鸡鸣未晓车声叫，
隔夜难存半合粮。

其 三

韶山冲来冲又冲，
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
红薯柴棍度一生。

韶山冲来冲又冲，
丈夫砍柴做零工，
住在深山无人问，
茅屋小路无人行，
有女莫嫁韶山冲。

韶山冲来冲又冲，
丈夫砍柴做零工，
一天弄得升把米，
儿啼女哭难维生，
粗粮野草口里吞。

韶山冲来冲又冲，
丈夫砍柴做零工，
丈夫送柴银田寺，
想要扯布做衣裳，
车柴难买两尺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韶山同中国多数农村一样，长期和贫穷、落后相伴随。那时候，这里没有铁路、公路，也没有通船的河道。若去湘潭县城，就要从天亮走到天黑；若去省城长沙，就要走一天半路，或走一段路

再搭船。

那时，韶山冲里有稀稀落落的房屋，居住着毛、李、钟、周、邹、彭、庞等几姓人家，其中以毛姓最多。

韶山好像一座锦屏，起伏绵亘约 20 里长，它的落脉处是一座小山，草木茂密，称韶山嘴。在韶山嘴的对面，就是山环水抱的南岸。南岸上屋场有一栋半瓦半茅屋的房子，这便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毛泽东故居”。

从上屋场往西去 4 公里的韶山之中，有一个风景迷人的山谷，深幽清雅，三面翠峰挺立，仅有一径相通。这就是曾被人们视为神秘的地方——“滴水洞”。

滴水洞因山谷中的溪水冲击而成，四周翠竹挺拔，郁郁葱葱，环境清幽，风景秀丽。轻风徐来，林涛阵阵，烟雨过后，雾气蒙蒙，犹如人间仙境。洞的左边，有座龙头山，传说昔日曾有巨龙在此盘踞；洞的右边，有片“虎歇坪”，传说昔日曾有猛虎在此歇息。毛泽东的祖父当年就曾葬在此，用旧时风水先生的说法，实乃风水宝地。《毛氏族谱》对这座祖上坟山的动人景色曾作过如此描述：“一沟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灵秀聚钟人莫识，石砢如锁几重关。”

至今仍有人附会：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葬在滴水洞虎歇坪大石鼓，这里山高林深，虎踞龙盘，祖宗显灵，后人必有发达。这种阴阳家言，我们自不必去理会，但地灵人杰的说法却不能说没有道理。

二、毛氏家族 源远流长

关于毛泽东的家系，《韶山毛氏族谱》上有着明确的记载。《族谱》创修于清朝乾隆二年，即公元 1737 年；二修于光绪七年，即公元 1881 年；三修于宣统三年，即公元 1911 年；四修于民国三十年，即公元 1941 年。人们一修《族谱》大部分内容失传。二修《族谱》在残谱的基础上续接，并增订了家规、家训、家戒等。三修《族谱》又制定了“百字铭训”、“劝戒讼词”等。这些均在四修《族谱》中作了记载。

毛氏四修族谱共 15 卷，附首一卷，内容包括传赞、祠堂图记、契文、墓图、家训、家规、任事录、世系表等。卷七内封面镌有：“民国辛巳四修韶山毛氏族谱，西河堂家藏。”有民国三十年毛泽启序、陆军中将何海清序、毛泽钧和毛泽启跋。从内容上不难看出，这次四修族谱乃是由毛泽钧主修，毛泽启总纂。共印了 113 部，按《千字文》编号。

四修族谱记录了毛氏从元末明初始祖毛太华至民国间凡 20 代人的家族简史，其中一些有关毛泽东本人及其祖父、父母、兄弟、妻子和子女情况的记载，原来鲜为人知，对研究韶山毛氏家族的历史，考订有关毛泽东一家的史事，填补若干研究的空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里对其中的部分内容略加介绍，以飨读者。

关于韶山毛氏的远祖，族谱在《卷首·凡例》中说：“渊源遵照老谱派接西江，自宋工部尚书让公世居三衢，生子休公，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监祭酒兼殿中侍御史，出守吉州，迎尚书让公就养，占籍吉之吉水龙城家焉。至二十一世伯温公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其间簪笏蝉联，后先辉美，不可枚举。直削不录，存实信也。”

旧中国的族谱，凡列先祖，必先称三皇之后，周公之裔，其实并无多少信证。有鉴于此，《韶山毛氏族谱》仅“派接西江”又对宋朝以前“直削不录”，确实难能可贵，由可贵便又见其可信。

韶山四修族谱奉元朝毛太华为始祖。《族谱·卷一》中这样介绍：“太华，元至正年间，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迁云南之澜沧卫。娶王氏，生子八。明洪武十三年庚申（1380）以军功拨入楚省，惟长子清一、四子清四与之偕。解组，侨居湘乡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开种韶山铁陂、乌塘、东塘等处，共田

四百余亩，编为一甲民籍。”

由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始祖毛太华，原籍江西省吉州府龙城县（今江西省吉水县），后迁到云南。因立有军功，又从云南迁到湖南省湘乡县城北门外的绯紫桥居住。

数年后，毛太华的长子毛清一和四子毛清四又迁移到了湘潭七都七甲，这里便是后来天下闻名的韶山。不久，毛太华去世，毛氏家族便在这山青水秀的韶山繁衍下来。

《韶山毛氏族谱》还记载：毛清一生有二子：有恭、有信，其中有恭生子毛震、毛瓚等；有信生子毛瑞、毛鉴等。四子毛清四生有三子：有伦、有智、有诚。其中有伦生子毛翔，有智生子毛深，再加上石猗一支的毛全山，就构成了谱中所谓震、 \approx NB073))、鉴、深、全山（又称石猗）五大房祖。其中震房为长房，下属竹溪、彬溪、介溪三支。毛泽东即属竹溪支下。

毛氏家族自在湖南韶山扎根之后，以务农为生，世代相传，约有 500 年的历史。毛氏家族自毛太华第七代孙始修族谱，定下 20 代子孙名字族牒为：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到了清光绪七年即公元 1881 年二修族谱时，毛氏祖先惟恐原订派系不够用，影响子孙后代的繁衍，于是又进一步续订派系：

孝友传家本，忠良报国光；
启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人们就不难发现，毛氏家族的派系诗并不是随意编造的。诗中的字眼都极具讲究，实际上是从当时的儒学经典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如第一句中的“立显荣朝士”，其中的“立”，含有建功立业之意；“显”表示功名显赫，光宗耀祖；“荣”即荣华富贵，经久不衰；“朝”为庙堂登高，出将入相；“士”为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再如其中的孝、友、忠、良、敦、圣、风、雅，等等，都无不蕴含着很深的儒学意味，寄托了毛氏祖先对后人的一片殷切期望和拳拳眷顾之心。

根据四修族谱的序列，仔细推算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从元末明初的始祖毛太华，到共和国的创立者毛泽东，其间整整经历了二十代。这二十代的次序是：第一代：毛太华；第二代：毛清一；第三代：毛有恭；第四

代：毛震；第五代：毛从文；第六代：毛珊；第七代：毛立尧；第八代：毛显旸；第九代：毛荣项；第十代：毛朝巍；第十一代：毛士翱；第十二代：毛文邦；第十三代：毛方淳；第十四代：毛运选；第十五代：毛际耀；第十六代：毛祥焕；第十七代：毛祖人；第十八代：毛恩普；第十九代：毛贻昌；第二十代：毛泽东。

这里，如果从韶山毛氏始祖毛太华起，将历代先人的生平简历一一介绍，恐怕篇幅太长。为了侧重说明毛泽东一家的情况，我们从毛泽东一代往上追溯，从毛泽东的祖父和伯祖父共同的先人，即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起，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毛太华的第十七代孙毛祖人字四端，生于清朝道光三年，即公元 1823 年；死于清朝光绪十九年，即公元 1893 年。由于自幼家贫，他一生从未上过学，靠种田为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偶尔也外出砍柴、做零工，但足迹均不出韶山冲一带。其妻周氏为他生有二子，即长子毛恩农，次子毛恩普。由于一生勤劳、节俭，到两个儿子均要成家立业时，毛祖人已置有茅屋两处共 9 间半，水田 32 亩。后来大儿子毛恩农分得了东茅塘的房屋和田地 17 亩，二儿子毛恩普分得了上屋场的房屋和田地 15 亩。1893 年 10 月初三，操劳一生的毛祖人不幸去世，未能见上他那后来名动中国的曾孙子毛泽东一面。他的这位曾孙直到他逝世后的几十天才出世。

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字寅宾，号翼臣，是毛祖人的次子，生于清朝道光二十六年，即公元 1846 年。毛恩普一生同其父亲一样，为人忠厚老实，勤劳俭朴，以种田、打柴、做零工养家糊口。生有一子二女，子名贻昌，即毛泽东的父亲；长女嫁给张姓人家；次女嫁给贺姓人家。由于积劳成疾，毛恩普只活了 58 岁，于 1904 年 11 月 23 日病逝，葬于滴水洞大石鼓山（即今虎歇坪）上，并立有墓碑。这块墓碑，曾长期被掩埋在地下，直到他逝世 80 多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那是 1986 年 9 月，韶山辟为国家旅游区后，为使旅游者饱览滴水洞风光，修建了到滴水洞别墅的游山便道。当便道修至虎歇坪大石鼓时，在一个荆棘、杂草丛生的地方，发掘出一块高三尺，宽一尺，厚约三寸的墓碑。墓碑棱角分明，完好无损，质地为祁阳石，细腻滑润，类似汉白玉，碑文字迹清晰。此碑即系毛恩普的墓碑。碑文内容为：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夏月吉镌（右），显考毛翼臣老大人之墓（中），内辛山外戌山，男贻昌，孙泽东、泽铭、泽淋敬立（左）。

墓碑落款上的“贻昌”即毛泽东的父亲；“泽东”即毛泽东，那年他已经 18 岁了；“泽铭”即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烈士；“泽淋”应是毛泽东二弟

毛泽覃烈士。

围绕毛泽东祖父的墓碑，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大约在 1934 年前后，国民党曾派一个连的士兵穿着便衣，于一个夜晚悄悄进入韶山滴水洞，要挖毛泽东的祖坟。因天黑，挖了三处均没找到。次日清晨，放牛人发现有人挖坟后，立即告之毛氏族人。族人们在深夜悄悄地把毛翼臣的墓碑取下来，掩埋在附近的虎歇坪大石鼓地下，并且把坟墓一起填平，在上面栽种了花草；又在旁边修了几座假坟。这样，毛泽东祖父的坟墓和石碑总算被保护下来。最近，韶山管理局已经修复毛泽东祖父之墓，以供游人观瞻。

毛泽东的父亲即毛氏家族第十九代传人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行一。生于 1870 年 10 月 15 日，1920 年 1 月 23 日去世，葬于韶山南岸楠竹坵。妻文氏，生于 1867 年 2 月 12 日，1919 年 10 月 5 日病故，与夫同冢。文氏夫人生五子二女。长、次子早夭，三子泽东、四子泽铭、五子泽覃，二女早殇。

纵观四修族谱，可以发现毛氏家族几乎与科举绝缘，除了第三代出了个岁贡毛有伦外，其他的就连监生也寥若晨星。可以说，这是一个带有勤劳与勇敢传统的家族，子子孙孙，大都是在韶山一带的红土地上默默耕耘的农民，其中也不乏其人去从军打仗，间或便有一两个幸运者因军功而获得官职。据粗略统计，在毛氏一族中偶有功名者，军官占了绝大多数。而像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那样当过兵但未获得官职的人，则不计在内。

然而又有谁人能够想到，就在这样一个以勤劳和勇敢传家的氏族中，到了 20 世纪，竟出了一个文韬武略、功盖中华的杰出子孙——毛泽东，倘不是天纵其才的话，那就只能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解释——时势造英雄！

三、上屋场上 毛脉一支

韶山毛氏是一个大家族，历史悠久，派支众多。据四修《族谱》记载，韶山毛脉香火至第四派起分为五房：震、瑞、鉴、深、石猗。毛震的后代繁衍到“立”字辈，即第七派时，又分为竹溪、彬溪、介溪三支。以后，各支在发展延续中又生出分支。总的来说，竹溪支系人丁最旺，第十七派毛祖人就属于震房竹溪支。

毛祖人居韶山东茅塘，有上辈留下 4 间房子和一片田产，计水田 10 亩、旱地 1 亩、山林 2 块。两个儿子成家后，因人口增加，毛祖人借银两又在上屋场购置了房屋和田地 15 亩。在毛祖人苦心经营下，田产逐年增加，至 45 亩，其中东茅塘 15 亩，上屋场 30 亩。这时，毛祖人已经年老体衰，决定让两个儿子分家独立，自谋发展。两处田产，一处是祖居地，面积略小，一处是后置的，面积略大，为了公平起见，毛祖人采用抓阄的办法分配。结果是，长子毛恩农得到东茅塘地，次子毛恩普得到上屋场地。于是，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就住在上屋场安居下来。今天，人们看到的毛泽东故居，即源出于此。

上屋场的这一家，是毛祖人后代的一支。其子嗣延续情况为：毛恩普单传毛貽昌，毛貽昌有泽东、泽民、泽覃三子，后又过继来一个女儿泽建。因毛恩普的资料很少，故事不多，对毛泽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里就不单独列项，仅从上屋场毛家的第二代说起。同时，对毛泽东也不单独列项，因为社会上关于他的生平著述极多，且有传记担此重任，这里仅叙述和他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家人。

父亲毛貽昌

毛泽东的父亲毛貽昌生于 1870 年，字顺生，号良弼，独生子，在貽字辈的叔伯兄弟当中排行第一，人称“顺生大阿公”。除了短暂的当兵生涯以外，可以说他是终身务农经商，是个生财有道的中国农民。

1936 年，毛泽东在陕北的一座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介绍他的父亲：

“我父亲是个贫农，年轻时因负债累累，被迫去当兵。一当就是好多年。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这个小村子，靠做小买卖和其他营生，省吃俭用，攒了一些钱，赎回了他的地。”

“于是，我家有十五亩地，成了中农。每年可打六十担稻谷，全家五口人每年粮食共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剩余二十五担。我父亲用这些节余，又筹集了一些资金，又置买了七亩田，这样家境就达到了富农的地位。这时我们一年的收成总数上升到八十担。”

家境困窘 外出当兵

毛祖人理家时，虽然购置了田产，安顿了子女，但由于借债买田，家庭经济危机重重。毛祖人本想自己完债，不料债务愈背愈重，累还不清。毛恩普当家后，只得将一部分田产典当出去，一家人过着紧紧巴巴的日子。

毛顺生 10 岁时，由父母做主与湘乡县文芝仪之女文七妹订了婚，15 岁完婚。17 岁开始理家，那时家里仅有六七亩地，一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为温饱操劳。

毛顺生从父亲那里接过家庭生活的重担之后，便起早贪黑地拼命苦干，田里种稻，地里种麦，圈里养猪，栏里养牛。空闲时间还得上山砍柴，下河捞鱼，补贴生活。傍晚归来，则要就着昏黄晃动的油灯，算进账，打草鞋，其中的辛苦，虽成人都难以承受，何况是一个刚刚成家的毛头小伙子。更叫他气闷的是，尽管这样辛勤劳作，可是寒来暑往，年复一年，家境不但没有改善，欠账反而越来越多，最后不得不典当出好几亩祖传的田地。

正在无望之际，他看到不少同龄人外出当兵，间或也听到其中一两个人升了官，发了财；最不济事的，一月也能捞几块饷银，寄回来补贴家用。于是同老父亲商量来商量去，一狠心，抛妻别子，外出参加了湘军。

对于毛顺生当兵的具体日期和时间长短，至今已经无从查考。只是从毛泽东的回忆中，可以肯定他父亲外出当兵，一是因负债累累，被逼无奈；二是当兵的年头决不在短，至少也有三四年。否则也攒不了那么多的饷银来赎回他典当出去的田地。

几年的当兵生涯，颠沛流离，毛顺生终究没有成为幸运儿，混上一官半职，只好打定退伍回乡的主意。好在几年时间里东跑西颠，也算到过一些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开阔了眼界，灵活了脑筋，为他回家之后一边务农一边经商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农产丰富的湘潭，当时已经开始成为“洋货”深入中国内陆的中转市场，这一切都为毛顺生后来的发家致富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

善于经营 买卖兴隆

从湘军退伍之后，毛顺生用几年积攒的饷银偿还了债务，一边种田，一边做起了小买卖和其他营生，开始了半农半商的生活。

毛顺生读过几年私塾，人本来就不笨，肯劳动，会节俭，外出当兵又开阔了眼界，学会了经营，很快便成了韶山远近有名的好当家，他常说：“吃不穷，用不穷，人无计算一世穷。谁会盘算，谁就能过好日子；不会盘算的人，你给他金山银山，也是空的！”他把自家省吃节余下来的稻谷加工成白米，挑到银田寺的集市去卖；有时零售给附近的穷苦樵夫及手工业者；他还用碾碎的米糠喂架子猪出售等办法，逐渐地积攒了一笔钱，赎回父亲毛恩普典当出去的田产，共有 15 亩自耕地，年收 60 担谷。全家有父亲、妻子和泽东、泽民、泽覃三个儿子，连他共 6 口人，每年约需口粮 35 担谷，约有 25 担谷的节余，这在韶山冲一带就是相当宽裕的人家了。

尝到发家致富的甜头后，毛顺生带着一家人继续勤奋劳动，省吃俭用在他家里，没有吃闲饭的，儿子年纪小也要干些割猪草之类的轻活，大些，就要到地里干活。每年口粮之外的剩余谷子，用作押进田产，取利息钱。他还兼做贩运谷米和生猪的生意，开始是少量的小规模的运送，后来，得到妻子文七妹娘家的贷款帮助，就到湘乡大平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并逐步由肩挑改为土车运送。最后发展到从银田寺雇船装运白米，运往湘潭市易俗河出售。家里也开始雇工，起初是雇短工，后来雇一长工，在冬天碾谷的时候，还得雇一个短工。尽管如此，一家人还照常都要去干活。此外，毛顺生还贩卖耕牛。渐渐地，他积攒的钱更多了，便于 1903 年买进堂弟毛菊生的 7 亩水田，使田产增加到 22 亩，每年收稻谷约 80 担。此后他虽然继续聚积财富，但不再买进土地，而是典进别人的地，大致是由于典地要比买地便宜，又不用自己操心农田，对经营生意比较有利的缘故。一来二去，他的资本增加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大财东。他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并同“祥顺和”、“彭厚锡堂”等铺店经常有商务往来。为了流通方便，曾自家印了取号“义顺堂”的纸票周转，也使用过“吉春堂”的纸票。“吉春堂”是湘乡大平坳一家大商号，开有药材、肉食、杂货等几个店铺，老板姓赵，是文七妹之兄文玉瑞的丈人家，与毛顺生有远亲关系。

虽然经商生意做得一帆风顺，然而毛顺生并没有放弃田地里的庄稼，这是他比当时的一般农民和商人都要高明之处。一方面，他通过经商，懂得了无商不富的道理；另一方面，又懂得小本经营，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否则万

一做生意蚀了本，一家老小就只能喝西北风去。有鉴于此，农忙时节，生意再好，他也不放弃田地里的农活，实在忙不过来，就把妻儿带到地里去帮忙，或者雇请一两个零工，确保经商种地两不误。对于父亲的这种做派，毛泽东后来也有所回忆：

“我刚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每月十五对雇工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毛顺生的祖父毛祖人原住韶山冲东茅塘。清光绪初年，他买下了南岸上屋场毛正光家的五间半草房。两个儿子分家后，毛顺生的父亲分得了上屋场这栋房子，从此一直居住在这里。

毛顺生虽然每年收入不少，但住房还是父亲在 1878 年盖的泥墙草顶房子，直到他辞世前两年，才把茅草的屋顶改成瓦片屋顶，并先后建起了农具室、碓屋、牛栏、柴房以及几个儿子的卧室等 9 间瓦房，这就是人们后来参观韶山毛泽东故居时所能看到的原型，也是毛顺生一生勤劳节俭、经商务农的历史见证。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故地重游，回到了阔别 32 年的故乡。有人问他：“主席，您家的房子要不要另外起过？至少也要修缮一下吧？”毛泽东沉思良久，方才感慨地说：“不要起了，给我建房子做什么？给我起房子，还不如起个招待所好！上屋场我家的房子也不要修了，给人家去住，不要搞坏就行了，韶山人多田少嘛。”

热心公益 族谱留名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毛顺生是一个干活不惜力、办事好算计的人，不仅对邻里比较吝啬，就是对妻儿有时候也很苛刻。这也难怪，作为旧中国的农民，尤其是年轻时又是穷苦怕了的，有多少人能够把自己用血汗换来的钱财随意施舍呢。其实，在毛顺生的骨子里，也有急公好义，热心公益事业的一面。

到过韶山的人，都可以看到毛泽东故居前面有一条自西向东缓缓流淌的溪水，那便是现在的韶河。在韶河边上，有座长满树木的小山，乃是巍巍韶峰的落脉之地，故名“韶山嘴”。“韶山嘴”与上屋场隔河相望，中间有一座“韶麓桥”相连。细心的人如果仔细看看，便会发现这座桥乃是毛顺生热心公益事业的佐证。

“韶麓桥”建于 1919 年上半年，桥头立有石碑，石碑上刻有碑文，虽历

70 年之久，仍然清晰可辨。其中刻有一段顺口溜，全文如下：

韶山之麓一张桥，众志经营阔又高。
垒石成梁关口固，明堂聚气物华饶。
商车驷马行多便，题柱吟诗兴倍高。
地境阴阳资保障，同登彼岸乐逍遥。

除此之外，碑文中还记载了捐资修建此桥的 7 个集体和 8 位个人的名单，其中有毛顺生的名字。为建此桥，他一共捐资 4 块银洋，居个人捐款数的第 3 位。正好是整个建桥经费（104 块大洋）的 1/26。4 块大洋，对于当时的一个农民来说，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而对于一向勤俭节约的毛顺生来说，更显得殊为不易。

除了参加修桥补路一类的公益事业之外，毛顺生还是家族中的“修谱司事”之一，主管房修项目，并排名第三。这种家族地位的取得，与他家中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无疑是分不开的。到了晚年，随着家境的改善和三个儿子的日益出息，毛顺生在家族的地位也开始举足轻重了。他不仅直接参加修谱工作，而且还倡议捐谷立会。韶山毛氏三修族谱卷六中详细登载了他们于宣统三年冬月的倡议：

“自乾隆年倡捐八十祭会，祀期清明；逮同治倡捐通族祭会，祀期小阳之朔，乃始议齐族目规矩，森然创置，祀产恢宏，我等因春冬两祭之外，又倡立秋祭会，族众翕然同心，每名捐谷四斗整，合计八十二名。”捐名立后，毛顺生的名字排得十分靠前，足见他当时在家族中的地位已是不低。

官司败诉 送子读书

毛顺生非常勤劳、顽强，但脾气粗暴。他自己不停地劳动、干活，也严格要求孩子们，经常责备家里人闲着不干活或糟蹋了东西。长子毛泽东刚识了几个字后，毛顺生就要他学习珠算，给家里记账，不记账时就要到田地里帮助干农活。毛顺生从来不给孩子们一文零花钱，饭食也是最差的，没有蛋也没有肉，而农忙时前来帮工的农民，倒是有时能够吃到鸡蛋。毛泽东自小在这样的农民家庭中长大，当然最懂得农民的疾苦。由于环境的影响，他也很顽强，暴躁的脾气也极像父亲。父子之间常常发生“战争”，而母亲则是“和平天使”从中调解。

毛顺生个子不高，很壮实，但长期艰苦的劳动，使他身体衰弱得过早。儿子毛泽东，却长得高大，虽然只有七八岁，已跟 10 岁的孩子差不多，大

手大脚浑身都是劲。见儿子长大了，毛顺生便送他进私塾读书，这是他比一般山村农民高明的地方。他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岳家文氏多有读书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己读书不多，在一桩柴山公案中败诉，明明自己有理说不出，对方引经据典，被告变成了原告，眼睁睁看着柴山断给了人家。因此，他想培养儿子读书，也能引经据典，给自己争口气。

1902年春，刚过了元宵节，父亲就把毛泽东送到离家不到200米的南岸邹春培老师的私塾，受启蒙教育。

私塾设在邹家公祠的小阁楼上。邹老师50多岁，身着长衫，表情严肃。他把毛泽东引到东墙下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进来，都要对神龛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年小的毛泽东对神龛并不陌生，因为这和湘乡表哥他们学堂里的神龛一模一样，大红纸上都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之位”，于是就恭恭敬敬地对着神龛作揖行礼。邹春培老先生高兴地对毛顺生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毛顺生忙说：种田人家的子弟，不稀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

毛泽东在南岸私塾开始学的是《三字经》，接着是《论语》、《孟子》。1904年转入关公桥私塾，次年又转至桥头湾私塾。在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继续攻读四书五经，一方面开始致力于书法练习。1906年到井湾里私塾，拜堂兄毛宇居为师，攻读《春秋左传》。随后辍学两年多，在家务农，主要靠自学。1909年，他克服父亲的阻挠，再到乌龟井、东茅塘两处私塾，读了《史记》、《纲鉴类纂》和《日知录》等书籍。总括起来，少年毛泽东在韶山读了7处私塾，先后上了6年学，所读的主要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

在私塾，少年毛泽东读书是很刻苦用功的，并不像一些文学作品渲染的那样调皮捣乱。他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许多东西不仅能背，而且能够默写出来。据他当年的一些同学回忆，毛泽东上课时从不交头接耳、东走西逛。放了学，在回家的路上，也总是走在最后，默默地复习所学过的知识。回到家里，除了劳动，就是看书。夏天，晚上蚊子多，他就在床头放一条凳，凳上放一盏灯，然后头伸到帐子外面看书；冬天，则干脆不放帐子，躺在床上看。

对于这6年艰苦的私塾生涯，毛泽东后来概括为“6年孔夫子”。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6年孔夫子”的学习，为毛泽东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历史功底，

对于他后来的成长以及兴趣爱好也是有着极大的影响的。人说“读史知兴衰”、“读史以明鉴”对于毛泽东来说，事实正是如此。他通过对《史记》、《纲鉴类纂》这类书籍的学习，自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对《日知录》这类书籍的学习，较早地掌握了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态度；通过对《左传》这类书籍的学习，则熟悉了大量古代的战史战例。而所有的这些，在他后来世界观、历史观的形成以及战略战术思想的提出过程中，无疑都是发挥过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的。对此，周恩来曾经总结说：“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毛主席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可以说，我们后来之所以能够看到一个博古通今、以史为鉴的毛泽东形象，与他少年时代这“6年孔夫子”的艰苦学习是不无关系的。而进一步说，少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获得这“6年孔夫子”的珍贵学习机会，又与毛顺生当初送子读书的决定是分不开的。虽然他起初送子读书的原因是因为官司败诉希望儿子多读点书，将来也能引经据典，不受文化人的欺负，也好为自己争口气；虽然他至死并没有期望儿子有朝一日能够做成大学问，只要能算清账、能够当家理财就行，但是他毕竟给了儿子这样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为毛泽东的成才留下了契机。从这一点说，毛顺生的眼界是当时一般的农民所不可比拟的。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农民的狭隘心里，尽管他对儿子这般那般的苛刻，但他毕竟为儿子的成功之路铺下了第一块石头。如果仅此而言，他是问心无愧的。

当然，少年毛泽东后来之所以能够终成大器，主要还是依靠他自己的努力，这种努力首先就表现在前面介绍过的刻苦学习上，而与刻苦学习相联系的，则是勤于思考。

那时，毛泽东少年英俊，天资聪颖，平常的那几本四书五经，已很难引起他的兴趣，也实在满足不了他那旺盛的求知欲，于是他便想方设法寻找各种书籍来读。像当时在韶山冲所能搜集到的古典小说这一类“杂书”，几乎都被他读遍了。读这些“杂书”，他也极其用功，像上“正课”一样圈圈点点，写上批语，记下体会。他记忆力特强，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大都记得清楚，并能在讲故事和写文章时灵活运用。对此，毛泽东自己也有详细的回忆。他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许多故事我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博览群书之余，少年毛泽东便经常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书中的主人公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没有种田的农民呢？对于这个问题，他纳闷了很久，后来还是在辍学务农的劳动实践中，才终于体会出，种田的农民终年劳累，吃不饱，穿不暖，哪有条件去读书识字？即或认识几个字又如何能著书立说？由此可见，写书的人一定不是农民，而不是农民的人是一定不能写出农民的艰辛和疾苦来的。事实上，正是这种现象本身就反映了社会的不平等。如此思考的结果，使少年毛泽东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从此立志继续发奋读书，以求改变农民的命运。

勤于思考，与刻苦学习一样，只是少年毛泽东读书时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而恰恰是这个特点，使他自小就能够将书本与现实、自我与社会结合起来，并进而产生出一种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正是通过不断的思考，使他认清了许多社会现实问题和不平等现象，终于走上了向往知识、向往革命的道路。就此而言，我们说，勤于思考，正是少年毛泽东成长的又一大特点。

书本是一个世界，也是一个窗口，它使少年毛泽东的眼界不再局限于韶山，而开始投向当时的湖南、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是书本使他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不平等的事实，而现实又进一步印证了社会的不平等。在书本与现实的双重启发下，终于唤起了少年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使他下决心走出韶山冲，到更广阔的天地之间去探求知识，追寻真理。

1910年，长沙发生饥民暴动，其影响也波及到韶山冲。由于毛泽东抖落了族长毛鸿宾倒卖粮谷的行为，毛顺生怕儿子再惹出别的什么事来，就想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里当学徒，也可学些生意经。对于这件事，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也许是件有意义的事。”然而，毛泽东后来却并没有沿着父亲安排的这条路走下去，原因是他已经了解到外婆家那边的东山书院已改为新式的高等小学堂，他很想到那里去学习新的知识。对此，毛顺生一开始坚决不同意。毛泽东便动员两位舅舅文玉瑞、文玉钦和表兄文运昌、姨表兄王季范以及原来的老师毛宇居、毛麓钟、李漱清来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两位舅父表示可以在经济上予以接济，表兄文运昌表示在学习上予以照应，毛宇居等人则极力称赞毛泽东天资聪颖，不同凡俗，将来定能大有作为。此时母亲文七妹也站在儿子一边，同情和支持儿子的求学愿望。在大家的共同说情下，毛顺生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于是，毛泽东便随表兄文运昌来到东山小学堂，办好了入学注册手续。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50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16岁。”

儿子反抗老子

毛顺生对儿子勤奋读书不用操心。但是，对儿子很像自己的倔犟性格，却很伤脑筋。一天中午，天气炎热，先生又不在学堂，毛泽东就提议大家去游泳。老先生回来看见学生们赤身露体游泳，以为不雅，在课堂上，要惩戒他们。毛泽东却引用《论语》上的话说，孔夫子是赞成到河里去洗冷水澡的，并把《论语》打开，把孔夫子的原话念给先生听。老先生一听，想起确实有这样一段书，一时下不了台，就到上屋场，找毛顺生告状，火气很大地说：“你家润之了不得啦，他的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啦！”毛顺生历来家教很严，听说儿子带头闹学，同先生顶嘴，格外恼火，顺手在路上拣了一根楠竹丫子，向南岸私塾奔跑过来。看见儿子后，不问情由，便劈头盖脸地打来。儿子急忙躲避，回头就跑。父亲怎么也追赶不上他，急得跺脚骂着：“我看你跑到哪里去，你敢回来，我就要打死你这个没王法的东西！”毛泽东知道父亲的性子，这时候要回到家里，那准定要挨一顿死打，连母亲都劝解不住，就决定不回家，去县城。但是，他毕竟是个不足 10 岁的孩子，在山里转了 3 天，只离开家 8 里远，根本没有走出韶山冲。毛顺生托人四处寻找，最后由一个砍柴的老人遇到，送回家来。毛顺生找到儿子后，没有再打他，态度也缓和些。毛泽东认为这是他第一次反抗的胜利。30 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这段经历时风趣地称它为“胜利的罢工”。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毛泽东自小就很勤快。在地里锄草，别人锄一遍，他总要锄两三遍；他放牛时，常用铁篦子给牛梳篦，因此牛毛里从不藏虱子；他家养猪，猪圈也总是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特别是在 1907 年至 1909 年秋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辍学在家务农，白天像大人一样到田间劳动，学会了扶犁掌耙、播谷下种等农活，晚上回来还要帮父亲记账，经常一忙就是半夜。

勤劳之余，少年毛泽东在生活上也很俭朴。虽然家境不错，但他一直穿的是粗布衣衫，吃的是粗茶淡饭，并从小养成了珍惜粮食的好习惯，不管是什么场合下，都从来不肯随意浪费一点。这种良好的习惯，他一直保持到晚年。

过去，有一些传记作品把毛泽东的父亲片面地描写成一个自私而又粗暴的人，而忽略了他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以及为家业而孜孜不倦地奋斗的精神，忽略了他对毛泽东勤劳俭朴、刚毅顽强性格的影响。这是不全面的。其实，毛顺生那种对孩子严格得乃至苛刻的态度，在客观上对少年毛泽东的成长是有着积极的影响的。因为那时的毛家在韶山冲已是殷实人家，毛顺生刻

意让孩子们过勤劳俭朴的普通农家生活，更使他们能够深刻地体验到人生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可以说，正是在父亲的这种严格要求下，少年毛泽东才在艰苦的劳动和俭朴的生活中体验到了农民的疾苦，加深了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并磨炼出了勤劳俭朴的优良品质。事实上，包括毛泽东后来逐步形成的倔犟性格和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也多少是受父亲影响的。

对于父亲当初的这种严格要求，连毛泽东本人后来也予以了积极的肯定。他总结说：父亲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毛泽东辍学在家务农，白天像大人一样到田间劳动，晚上替父亲记账，并常常看书到深夜。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凡是能找到的一切书籍，读的全是旧小说和《盛世危言》之类的杂书。毛顺生是极聪明能干的人，他虽然只读过两年私塾，却打得一手好算盘，左右两只手都能打，因此毛泽东刚上学不久毛顺生就教他打算盘、记账。他希望儿子成为精打细算、兴家立业的人。不过儿子的兴趣不在这里。

此时，父亲按照古老的陋习，为长子娶了媳妇。毛泽东与这位比自己大几岁的姑娘并无感情，一直不承认这桩“婚姻”。父亲对他也无可奈何。

父子间因思想观点不同，产生许多冲突。毛顺生精明俭省，与儿子的勤奋好学、乐于助人之间，时常引起争端。晚上毛泽东记完账目，就躲进自己卧室，点起桐油灯，在灯下看书，常常看到半夜三更。毛顺生和妻子带着小儿子泽覃，住在隔壁房里，总是喊他：快早点睡！明天早起还要做工夫！母亲有时候也催他：快点睡吧，莫熬夜了，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每逢这时，毛泽东总是回答：好，就睡了，就睡了。可是，他没有吹灭那盏桐油灯，却用蓝布被单，遮住了窗户，不让灯光透露出去。父亲是十分精细的人，瞒不过他，起床看见儿子还在看书，便吼道：哪里这样的喊不赢哪！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下去还了得！说着，他又把那本线装书的封皮看了一下，原来是一本《西游记》，更生气了。

在此后辍学在家的两年时间里，毛泽东与长工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仅学到了扶犁掌耙、播谷撒种等许多农活，而且磨炼了不畏艰难的意志，加深了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他在跟家中的长工毛春成学做田地工夫时，总是抢重活干，推土车子甚至推得和师傅差不多。

通过劳动和生活实践，毛泽东不仅继承了贫苦农民的勤劳品德，而且也深切地体验了劳动人民的疾苦，萌发了强烈的反抗精神。而这种反抗精神表现在家庭生活中，就是反对父亲的专制和刻薄。对于父亲的责备，毛泽东常常以经书为武器，引经据典地反驳父亲。父亲说他“不孝”，他就说：“经书

上说的‘父慈子孝’，可见‘父慈’在先，‘子孝’在后，哪有父不慈，而子能孝的呢？”有一次，父亲当着客人的面责骂他“懒而无用”，毛泽东很生气地跑出家门，父亲随即追出来要打他，他便跑到门前两口水塘之间，威胁父亲说要是再往前走一步，他就“投塘”自尽，弄得父亲不知所措，只好作出让步。

家分“两党”

毛泽东受母亲慷慨、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影响极深，因此，对父亲的为人处事颇为不满，尤其反对父亲的吝啬。在受灾年景，穷人们饿肚子，父亲却囤积谷子，不肯平糶，毛泽东认为这是为富不仁。有一年旧历年关，父亲叫儿子去收一笔卖猪的账，他去了，账也收了。不过，在回家的路上，碰见几个衣衫褴褛的穷苦人，就把钱都分送给他们，结果惹来父亲一顿好骂。还有一回，一个老阿婆把自己的猪卖给毛顺生，已说好价交了定钱。没过几天，毛顺生叫儿子去把猪赶回来时，猪价又涨了几元，老阿婆后悔自己把猪卖早了，受了损失。毛泽东很同情她，没有把猪赶回家，只收了老阿婆退还的一元定钱。这件事使毛顺生很生气，骂他无用，不会办事。

两年来的劳动生活，使毛泽东目睹了乡亲们的贫困生活，也培养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心。有一次，正值秋收时节，韶山冲里家家户户都在割禾。天气突变，下起了瓢泼大雨。冲里的男女老少赶快跑到自己的晒谷坪上，抢收稻谷。毛顺生也赶紧召集全家紧张地抢收稻谷，惟独不见大儿子毛泽东。雨下得很大很急，有一些稻谷沿着水沟流走了，大家花了一番气力，终于用晒簟把稻谷盖好。不久，雨停了，毛泽东浑身水淋淋的跑回来了。原来他在帮邻居收谷子。毛顺生对此很生气，说：自己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他倒帮人家去收。说罢扬手就要打儿子。毛泽东却站着不动，理直气壮地说：人家是佃的田，要交租，冲去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田，又比人家的多些，冲走了一些也不太要紧。毛顺生听了更加冒火了，说：你说不要紧，你还吃饭不吃饭？毛泽东笑着说：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

韶山土地冲有一位老农民名叫李南华，家里很穷，在毛家做短工，还租种过毛家两亩地。对于李南华的家境，毛泽东十分同情。有一年收成不好，秋收后，毛顺生让儿子到李南华家收取谷租，毛泽东到李家后，一看人口多，粮食少，交了租便无米下锅，便转身回家了。父亲回来后，问他收到稻谷没有，他说已经收了，入了仓。毛顺生不太相信，打开谷仓一看，里面果然堆满了稻谷，便不再追问。原来是毛泽东有意把仓里的稻谷堆得高高的，哄过了父亲。这件事后，毛泽东又劝父亲把那两亩地转让给李南华耕种，不

再收取谷租。

有一年的夏天，毛顺生因做生意缺本钱，向湘乡章公桥的一个商人彭厚锡借了 100 块银洋，让毛泽东去取回来。毛泽东一大早赶到彭家，看到一位老婆婆正在向彭老板借米，说是家里断了顿，揭不开锅了。彭老板当着毛泽东的面拿出 100 块银洋，然后转身对老婆婆说：“你看这最后 100 块钱，全借给顺生公了，你另想办法吧！”

毛泽东知道彭老板是有米不借，看不过眼，便向老婆婆问道：“您家住哪里？有几个人吃饭呢？”一句话问得老太太泪水涟涟，她拉着毛泽东的手，一五一十地讲起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老太太家住附近，孤身一人，虽有几亩薄田，却无力耕种，一年的收入自然少得可怜。毛泽东听后十分同情，便从借到的 100 块钱中取出 3 块，放在老太太的手中。须知，那时候的 3 块银元能买一担多谷哩，老太太接过钱，自然是千恩万谢地去了。

回到家里，毛顺生接过儿子借来的钱，一数觉得不对头，便问儿子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包钱的纸烂了，因为不小心，在路上掉了 3 块到塘里去了。”他将事先浸湿了的裤腿放下来让父亲看，然后说：“我去塘里摸了半天，水好深，有摸到。”毛顺生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动手就要打儿子。毛泽东边跑边说：“有本事你自己去摸嘛。”后来毛顺生果然一个人跑到儿子指出的池塘里去摸过，其结果自然是空手而回，只好又把儿子骂一通了事。

1909 年的冬天，快到年关了，毛顺生让毛泽东带着弟弟毛泽民到与韶山交界的八亩田邹三老倌家去讨回 20 块银洋的欠账，并嘱咐他们说，这笔钱欠了已经有两年了，这次如果再不还钱，就牵他们家的猪回来抵账。

毛泽东兄弟二人来到邹家，只见床上躺着一位老太婆，嘴里还不停地呻吟。一打听，原来是邹三老倌的娘，已得病多日，饮食不进，儿子和儿媳妇带着三个孩子出去要饭，已是很久不回了，看来八成是在外面躲债。毛泽东和弟弟打量一下邹家的房子，发现家徒四壁，而且处处透风，厨房里冷冷清清，已是多日没有动火的样子，这屋里除了老太太躺着的一张破床之外，连把椅子都找不到。

看到这般情景，兄弟俩一使眼色，先后走了出来，提都没提讨债的事。在回家的路上，哥俩心情都十分沉重，边走边核计着回家怎么向父亲交代。最后还是毛泽民出了个主意，他说昨天柴米进了 12 块钱，因父亲昨天不在家，还没有交给他，他也不知道柴米的事，就拿这 12 元钱抵债算了。毛泽东听了，自然一百二十个同意。

回到家里，毛泽民把 12 块钱交给父亲。毛顺生接过来，点了点数，问怎

么只有 12 块？毛泽民一本正经地说：“邹三伯伯有得钱，我们就把他家的猪往回赶，走到滑泥潭，猪一窜，跌到山谷里摔死了。恰巧有两个过路的湘乡客说出 10 块钱买了。我们要 14 块钱，湘乡客硬是不想出。后来，哥哥说，快过年了，把死猪抬回去不吉利，你们肯定不喜欢，图个爽快，少卖几块算了，于是我们作主 12 块钱卖给了湘乡客。”毛顺生听完，感到儿子们做事还肯动脑筋，心里高兴极了，便说：“把邹三老馆的账圈掉。”后来，邹三老馆家境好了一些，来还这笔账时，毛泽东的母亲坚持不要，并把详细情况悄悄地告诉了邹三老馆。老人感激不尽，逢人便说：“毛家出了好心人。”

毛泽东的母亲，心地善良，愿意接济别人。但是，毛顺生是反对施舍的。每当父亲在场时，母亲不敢把饭送给前来讨饭的穷人。为此，毛家曾发生过多次争吵，逐渐“分裂”成两派。毛泽东后来在回忆中曾幽默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不过母亲只赞成用温和的办法来对付“执政党”。

毛泽东有位堂叔毛菊生，家境十分贫苦，毛泽东与母亲都很同情他。娘儿俩每到年关都要背着毛顺生给这位贫苦的本家送米、送腊肉。可是毛顺生却在堂弟最困难时，买下他家赖以生存的 7 亩水田，这件事母子俩都极力反对。但毛顺生认为没有什么不应该的，他说：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这件事给少年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解放后，毛泽东曾同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谈到这件事，说：“旧社会那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买二叔那 7 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手足之情，谁的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在与父亲的不断斗争中，逐渐焕发了毛泽东强烈的反抗意识，这种意识后来终于使他走出家庭，被他应用于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不断演变成为一种革命的斗争精神。

1909 年，湖南水旱灾害严重，粮食奇缺，灾民遍野，终于导致了次年的长沙饥民暴动。受此影响，韶山冲也出现了“吃大户”的风潮。本来，冲里的农民也同样缺吃，而族长却要把本族的积谷高价卖给米商。族人发觉后，要求开仓平糶，族长却依仗权势，将领头的人捆绑起来，要在宗族祠堂惩办。毛泽东当时正在私塾读书，闻讯赶来，当众揭露族长私卖积谷本身就已违反族规。在他的斗争下，族长自觉威风扫地，只得被迫放人。这次与封建宗族势力抗争的胜利，使少年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了敢于斗争的意义，激起了强烈的反抗精神。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始终忘不掉”；影响了我的一生”。确实，从那时候起，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一种隐隐约约的阶级对立和斗争意识便开始产生了。正如他自己所言，在这个时候，“这些事情的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父子情长

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前，曾写了一首诗赠给父亲。诗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据说这首诗是根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青年时的诗略加修改而成的。为适应自己的情况，毛泽东特地将原来诗中的“男儿”改成了“孩儿”；将“死不还”改为“誓不还”。诗中表达了毛泽东远大的抱负和志向，也表达了毛泽东与父亲感情上的交融。毛泽东把改写好的诗，夹在父亲的账簿里，因为账簿是父亲每天必看的。毛顺生看到这首诗后，告诉了文家，这件事就流传下来了。毛泽东父亲去世后，此诗一直由表兄文运昌珍藏着。在毛泽东动身启程这天，毛顺生带着一家人妻子文氏和泽民、泽覃、泽建，把儿子送到了门前池塘边的路上。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读书半年很有长进，写得一手好古文，看了一些进步书籍，抱负更大了。这年期考后，毛泽东成绩优异，深得老师们的赏识。为此，学校推荐他去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当时该校校长李元甫和国文教师贺岚岗应聘去湘乡驻省中学任教，也愿意带毛泽东一起去。但他的这一要求，仍然受到了父亲的阻挠。为了实现求学的愿望，毛泽东再次把舅父、表兄及以前的老师们请出来说情，终于使一向固执的父亲再次同意了他的上学要求。

1911年春，毛泽东到达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堂。后又入全省高等中学、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从此，毛泽东完全离开了父亲，离开了这个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闭塞的山冲，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抱负，走上漫长的革命之路。

在长沙读书的日子里，毛泽东仍经常与父亲和家里通信联系。此时毛顺生也看出儿子求学很有成绩，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对他的学习予以了支持。毛泽东工作后，也时常寄些钱和药物给父亲，表示孝敬老父。从此，原来一直很紧张的父子关系，得到了空前的缓解。

1919年冬，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夫人去世后，他便把父亲接到长沙居住，随同到长沙的还有他的伯父毛福生及弟弟毛泽覃，毛泽东还特地和父亲及伯

父、弟弟一起合影。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仍悬挂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及纪念馆陈列室等处。

1920年1月23日，毛顺生在其夫人文氏逝世不到半年后，因患急性伤寒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终年50岁。此时，毛泽东正组织湖南“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为成立“平民通信社”，揭露湖南军阀张敬尧的罪行而奔波，未能回家奔丧。他只得把对父亲的哀悼和丧父的悲痛深深埋在心间。

毛泽东给父亲定成份

1950年隆冬，韶山乡的土地改革已到了划分成份的阶段，应该给毛泽东家划什么成份呢？当时负责土改的农会主席兼乡长毛寅秋作了难。他也许并不知道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的那段谈话，因此心里想，按原有财产，应该划富农；但把富农的成份划在一个革命领袖家，于心不安。于是，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大意是：家乡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现已进入划分成份、分田的阶段了。您老是知道的，韶山是山多田少，初步推算，人平均九分三左右，不知您老家有几口人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

乡政府的郭秘书看信上这寥寥数语，问道：“那成份的事，还是没讲啰？”毛寅秋说：“主席一看就会晓得我们的意思。”

果然，信发出不久，毛泽东的二儿子毛岸青回到韶山，转达了毛泽东的嘱托：一、所有财产分给农民；二、划为富农，责无旁议，付来300元，作退押金；三、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

毛泽东为父母扫墓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国人民的领袖，第一次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当3辆小轿车进入银田寺境内时，车子放慢了速度。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回来了！”“毛主席回来了！”

6月26日清晨大约不到5点，毛泽东就起床了，洗漱完毕，便来到所住的松山寓所的小坪中散步。之后，他朝山下缓缓独行。过了松山，过了迎宾桥，他径直向故居走去。他回头对跟上来的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说：“今天我先到父母坟上看看。”

毛泽东父母的坟墓葬于土地冲楠竹坳。毛继生带路，向茅草封住了的山坡上走去。在离毛顺生夫妇坟墓约四五十米处，有好几处坟墓。毛泽东停下来问：“就在这个地方吗？”毛继生说：“还在前面一点。”毛泽东点点头，又向前走。

一座土山长满茅草，到了坟前，大家看了墓碑才知道是毛泽东父母的合葬墓。碑文上写着：“显考毛公顺生、显妣毛母文氏老大人之墓。男泽东、泽民、泽覃敬立。”毛泽东也好像记起来了，说了声：“是的。”坟墓系土堆土围，坐西北朝东南，周围长了一些柴草，墓中央塌了一个洞眼。

由于毛泽东事先没有告诉大家来看坟，工作人员事先都没有准备，便随手折了几根松枝，摘了几朵野花，用茅草扎成一束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站在坟前，深深地鞠了一躬。默哀片刻后，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毛继生问：“要不要修个简单的墓？”毛泽东说：“不要了，保持原貌，把洞眼填一下就行了。”

后来，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还得去看他们二位。”

看完父母的坟后不久，毛泽东便来到了阔别 32 年的故居——上屋场。

毛泽东故居和湖南的普通农舍一样，堂屋靠里端的板壁上供着神龛子。毛泽东进了堂屋，对神龛子作了揖，风趣地说：“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停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小时候，我信过佛，后来慢慢不信了。”

走到炉塘旁边，毛泽东说：“1920 年冬，我们兄弟姊妹就围在这炉子边烤火，我说服他们离开家乡，他们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说到这里，毛泽东仿佛陷入了沉思。

当年，双亲相继去世后，毛泽东和弟弟安葬了父母，便召集全家开了座谈会。然后又把乡亲们找来，当着他们的面把大家向他的父亲毛顺生所借的债据全部烧掉，并把父亲的欠债全部还清。他对乡亲们说：我父亲向你们借的钱，这次一概还清。你们欠我父亲的钱，也不要你们还了，因为你们已经付了息。少的几年，多的几十年，息已超过本钱，今后田还由你们做。这次谈话后，毛泽东便带着两个弟弟一起离开韶山，分别到长沙、衡阳等地参加革命。

走进横屋，毛泽东打量了楼上地下，对身边的人说：“这里过去是我们家的客厅和饭厅。那时客人来，总是我父亲作陪，母亲带我们兄弟到灶屋吃饭。我们平时很少吃荤菜，餐餐吃蔬菜。”停了一会，他又指着小阁楼说：“我小时候白天劳动，晚上回来就在那里看书或记账。”

穿过横堂屋，毛泽东又来到双亲的卧室。卧室左边的墙上挂着两位老人放大的照片。毛泽东在二老的遗像前伫立良久，然后对身边的人们说：“这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父亲得的伤寒病，我母亲颈上生了一个包，穿了一个

眼。只因为是那个时候，……如果在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他的话讲得虽然很轻，话语中却饱含着对父母深深的怀念。

母亲文七妹

在韶山毛泽东故居的墙上，有一幅毛泽东的母亲的玉照：轮廓柔和的脸庞，宽阔的前额，大眼睛，眼睛里光芒清纯而深邃，透出一种聪慧、端庄、慈样的气质。这是毛泽东带母亲在长沙照相馆照的。

在世上的亲人中，毛泽东的最爱，当属他的母亲。

他曾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的母亲属于最后一种人。

姓名和身世之谜

关于毛泽东母亲的情况，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之前，鲜为人知。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对毛泽东作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采访，获得了一些有关毛泽东生平事迹的珍贵资料。1937年，斯诺出书后，国内节译了其中的一部分，以《毛泽东自传》为题，在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的《文摘》月刊连载。但是，这个译本并没有出现毛泽东母亲的名字。

1938年，《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全译本出版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内记载了毛泽东的自述：“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自此，“文其美”这个名字在中国流传开来。

其实，毛泽东的母亲同旧中国许多农村妇女一样，只有姓氏而没有正式的名字。因她做姑娘时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被唤作“七妹”，所以毛泽东说他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七妹”。当时，斯诺不知中国国情，也没有细问，只是用英文按其音记录，而国内翻译界则首次见到这个名字，便按音译为“文其美”。长期以来，社会上一直称毛泽东的母亲为“文其美”概出于此。这是不确的。

关于毛泽东母亲的身世，是在她去世后60多年，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披露的。

毛泽东母亲文氏家族，同韶山毛氏家族有相似之处，即祖先都是从江西迁徙至湖南的。在宋徽宗赵佶大观元年（1107年），文氏家族一支，即文长德三子文伯琦迁居湖南湘乡县，此后繁衍绵延近千年，成为当地的旺族。从文伯琦至第十代文大贵时，文家修谱制订族系派名：“大明嘉应国，万年道

德绵。正士端期上，英才望拔先。诗书徵甲第，礼乐绍薪传。在昔重忠义，克绳仰象贤。”文伯琦的第十七代传人文德明（即派名歌中的第九“德”字辈），是文七妹的祖父，毛泽东的曾外祖父。

湘乡文氏为耕读世家，以务农为主。到文德明这一代时，家境贫寒，生活十分艰难。文德明，字作霖（1797—1824），娶贺氏，生有三男一女。据《湘乡高冲文氏三修房谱》载他们当时的生活“拮据艰虞，殆难言状”。文作霖因过度劳累，年仅27岁便撒手人寰，使原本穷苦的家庭更是雪上添霜。

文七妹的祖母贺氏（1794—1882），是一位品性坚强，极能吃苦的女性。文作霖去世后，她一人挑起抚养全家的重担。她每日早起晚睡，拼命劳作，含辛茹苦拉扯4个年幼的孩子。为了生计，她决定全家节衣缩食，禁食晚饭，这一禁令一直持续很长时间；待孩子陆续长大能劳动时，她让每人都各尽所能，或帮活，或给人做长工、短工。如此持家，克勤克俭，精打细算，一二十年过后，终于扭转困境，使家资开始有所节余。贺氏依然保持节俭的生活，将余资积攒起来，逐渐添置田产，修建瓦房，到19世纪中叶，文家已有水田140余亩，成为当地的殷实之家了。

贺氏节俭成习但绝不吝啬，每遇穷苦人总是尽量帮助。家境好转之后，有借债人无法偿还时“立焚其券，不复追”；遇年荒谷贵“举家食粥，节其余以治人”。贺氏的这种品德，深深影响了其子孙后代，形成了文家的家风。

文七妹的父亲文绵薰，字芝仪（1821—1888），是文作霖与贺氏的第二个儿子。贺氏在去世前两年，将田产房屋平分，命儿子们各立门户。文芝仪分得水田50亩，居唐家坵东头。文芝仪娶妻也叫贺氏（1826—1905），他们共有二子三女，文七妹（1867—1919）是最小的女儿。

韶山毛氏与唐家坵文氏联姻，属封建包办，但包办的原因却十分奇特。1824年文作霖去世后，文家选中10里以外的韶山冲龙眼塘下葬。因每年清明要扫墓，文家想在当地结一门亲戚，以便届时好有个歇脚的地方。于是，便将文七妹嫁给了韶山冲的毛顺生（1870—1920）。1880年，13岁的文七妹与10岁的毛顺生订婚，18岁时，文七妹正式嫁给毛顺生，成为毛家媳妇。

为儿拜石头为“干娘”

文七妹嫁到毛家后，生下的头胎、二胎，均为男孩。文七妹辛勤喂养，日夜操劳。然而不幸的是，两个儿子均在襁褓中夭折。作为年轻的母亲，她伤心至极。1893年12月26日，她生下了第三胎，又是一个男孩，即毛泽东。为了保全这个孩子，她想尽了一切办法。

孩子出生后，她加倍小心地喂养，日夜观察，一丝异样都不放过。待到天气渐暖，她便向公、婆建议，要带孩子回娘家抚养，因娘家人多，好照顾，得到同意。到了娘家，她一连为孩子拜了两位“干娘”。

在文家，毛泽东有两个亲舅舅，即文七妹的大哥文正兴和二哥文正莹，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七和第八，所以毛泽东称他们为七舅和八舅。文家亲戚中，要数七舅妈身体最好，健康结实，充满活力，且儿女多。文七妹便让毛泽东拜她为干娘，意在托福保平安。

文七妹为孩子拜的另一位“干娘”，竟是一块巨大的石头。

在韶山滴水洞通往唐家坵的路上，有一处地名叫龙潭坵，坵口兀然矗立一尊巨石，高 10 多米，由大小两块相连，作搂抱状。巨石后面，是一座山，有泉水从山洞流出，四季不竭。据当地民间传说，在很久以前，此处曾出过妖怪，危害百姓。有一位神仙路经此地，见状移来巨石，将妖怪镇在石下。从此一方平安。后来，人们对这尊巨石顶礼膜拜，称为“石观音”，并在石上建了一座“雨神庙”。文七妹听母亲贺氏说，“石观音”有灵，便抱着儿子前去烧香叩拜，拜“石观音”为儿子的“干娘”，并称儿子乳名为“石头”，取容易抚养的意思。因毛泽东排行第三，家人乡邻便称他“石三”，或“石三伢子”。

以石为神、石崇拜等，是一种迷信思想，在国内外曾广泛流传。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由人们对石头的形状、颜色、功能以及与石头相关的某些自然现象不能解释，例如千奇百怪、形态各异的山石，能够磨擦起火的燧石，从天而降的陨石等等，产生出神秘感和恐惧感，而顶礼膜拜，其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不发达的产物。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夫人的做法，显然是一种迷信活动，不应褒扬和效仿。但是，这件事发生在闭塞落后、缺医少药的乡村，发生在旧中国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身上，是绝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苛求的。这里，记述这么一件事，是要今人透过现象，或在摒弃迷信的同时，看到文氏夫人对儿女的一片苦心和爱心，对幼小生命的精心呵护中，所展示出来的母性的光芒。

小时候，毛泽东受母亲的影响，也崇奉“石观音”，但他自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便彻底地摒弃了包括石神观念在内的封建迷信思想。作为一名革命者，毛泽东仍然对石头有一种偏爱，但这已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了。它大约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作为隐蔽斗争的一种方式。1923 年 7 月 1 日，在广州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省宪下之湖南》一文，署名“石三”。同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在给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的林伯渠和

部长彭素民的信中说：“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二是喜欢石头具有的坚硬的属性，它象征着毛泽东意志和性格。1927年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决定转兵罗霄山脉。他对起义部队作动员时说：我们现在的力量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1951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风趣地说：“你的名字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两个都是石头。”彭德怀说：“主席是块宝石，我彭德怀不过是块顽石罢了。”毛泽东笑了起来，又说：“我也是一块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起扔向杜鲁门，一起扔向麦克阿瑟！”三是与母亲慈祥的形象相连。毛泽东多次对亲友说起他母亲为了保他平安，叫他拜石头为“干娘”的故事。1959年6月26日，他在韶山招待所宴请乡亲时，诙谐地说：“今天，各位都到齐了，只有我的石头干娘还未来，是不是还等一等……”一席话引出一片笑声，而毛泽东则在众人的欢快中寄托了他对母亲的深深怀念。

为儿平安 笃信佛教

为了孩子，文七妹不仅拜了“观音石”，祈求神灵保佑，还开始烧香拜佛，吃“观音斋”（即素食）。儿子逐渐成长起来，且十分健康，她便更加相信佛教。到毛泽东约3岁半时，1896年4月3日，文七妹又生下一个儿子，即毛泽民。她丝毫不敢怠慢，继续吃斋念佛。毛泽民也长得十分健壮，这使她感到欣慰。其实，孩子们的成活是由许多物质因素决定的，同佛无关。尽管文七妹坚持信佛，在毛泽民之后，仍有两个女孩生下不久便夭折。直到1905年9月25日，文七妹又生下一个男孩，才健康地活下来。但是，她并不因此怀疑佛，而是怀疑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是否有对佛失敬的时候。这是她的思想局限。

文七妹虔心向佛，也影响了幼年时的毛泽东。那时毛泽东曾以为，求神拜佛就像人要吃饭睡觉一样，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韶山，每到朔日（即新月，在夏历每月初一），各家都要烧香奉神；逢年过节，则要早晚供奉神佛和列祖列宗，时间达10天至半个月。而最热闹的要数除夕之夜，家家户户都忙着蒸斋粿、泡香茶、点香烛，虔诚敬奉“司命府君”。各家神龛上，赫然摆着“九天真厨司命太岁府君之神位”。毛泽东曾好奇地问母亲：“为什么家家都要在这一天敬奉‘司命府君’呢？”

文七妹告诉他：“今天是‘司命府君’上天的日子，所以人人敬奉，以求平安、吉祥。”

毛泽东还是弄不明白：“‘司命府君’上天去做什么呢？”

文七妹非常耐心地向他解释：“‘司命府君’上天是向玉帝呈奏人间的善恶，玉帝根据他的报告帮助好人，惩治坏人。”接着，她还对儿子不厌其烦地讲了许多扬善惩恶的神鬼故事。

在母亲的熏陶下，毛泽东逐渐接受了佛教迷信。一度，他还同母亲一起对不信神佛的父亲做过工作。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起这件事：“我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历来只信自己勤俭致富的人生哲学，对夫人劝其信佛，或虚与委蛇，或嗤之以鼻。直到有一次历险，才有所改变。那次他外出收账，返回时天色已晚，在山中碰到一只老虎，老虎两眼直瞪着他，令他毛骨悚然，心惊胆战，吓出了一身冷汗。正当他不敢走又不能留、彷徨无措之际，老虎却摇摇尾巴，大摇大摆地走开了。这件事让他一想起来就很后怕，以为之所以幸免于难，可能冥冥之中有神灵保佑，才慢慢开始相信神佛。相反，倒是毛泽东上了几年私塾，看了不少书，智慧渐开，明白些许科学道理，对迷信活动开始怀疑起来。

有一年正月初一，毛泽东遵照母亲的吩咐，一大早来到堂屋的神龛前，准备撒下前一天敬奉“司命府君”的香茶、斋粿、供果。望着神龛里每天依旧的佛像和桌上原封不动的满满三杯香茶，他忽然涌出一些奇怪的想法：如果神佛有灵，为什么他们从不赏脸喝一口呢？如果真有神佛在上，桌上摆的那么多供品，为什么他们从没动一下呢？为什么乡亲们都敬神佛，像隔壁阿婆家也同母亲一样供奉神佛，却年复一年依旧贫困？而父亲从不相信这套，却也无病无灾，生意越做越兴隆，这又是谁在保佑他呢？

毛泽东思索开来，疑问不断增多。蓦然，他灵机一动，将三杯茶朝“司命府君”神像和神位纸泼去，心想如果神佛有灵，就应该接受他敬上的这三杯茶，如果神佛怒其不恭，那么他甘心情愿受惩。结果，神佛毫无表情，茶水自然顺着神佛、神位纸流到地上。

毛泽东没有受到神佛的惩戒，过了一会儿却受到母亲的责备：“石三，你怎么这样！这么放肆，会遭报应的！”文七妹脸上布满惶恐，真生气了。不料，机敏的儿子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娘，您天天供奉这些神佛，是不是您礼未周到，他们才都不喝您的香茶不吃您的供果呢？我帮您补补礼，一个一个请他们喝，这些菩萨老爷却不开口，仍是不赏脸。”文七妹一听，又好气又好笑，只好转而向“司命府君”神像作揖，求神恕罪。

从此，毛泽东对神佛的兴趣骤减，直至后来同封建迷信彻底决裂。

相夫教子 以柔克刚

文七妹同丈夫毛顺生一样，都是勤劳、节俭而又聪慧的农民。在毛家，可以说，文七妹的辛劳决不亚于毛顺生。她既要抚育孩子，洗衣做饭，操持家务，又要养鸡喂猪，锄园种菜，样样活都干；她把琐碎的家事安排得有条有理，使毛顺生非常省心，得以专心侍弄庄稼，从事贩运。文七妹的治家勤俭在当地是有名的。毛顺生发家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她这位贤内助。

不过，文七妹同丈夫在待人接物方面截然不同。受文家家风的影响，她自小养成了既勤劳节俭又善良宽厚的品质。她性格温和，待人慷慨，极富同情心，愿意帮助和接济别人，而丈夫性情粗暴，待人理性冷峻，比较自私。在家中，孩子们都站在母亲的一边，或明或暗地支持母亲的一些做法。对此，毛泽东曾风趣地对斯诺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在旧式家庭中，夫权和父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毛顺生沿袭旧的道德伦理传统，认为内人、子女必须完全服从他的意志，不允许有不同意见，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对家里的事很专制，说一不二，尤其是对子女较苛刻，动辄打骂，有时甚至不近人情。从母亲的为人、历史典故和劳动实践中汲取大量营养的毛泽东，较早就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对父亲的专制、苛刻极为不满，经常与父亲发生冲撞。遇到这种情况，文七妹总是通达地说理，努力以她的温和、慈祥来消弭家庭“战争”。

毛泽东喜爱读书，晚上帮父亲记完账目，就躲进自己的卧室，点上桐油灯看书，常常看到半夜三更。毛顺生认为这样浪费油钱，要他早早灭灯睡觉。为了不让父亲发现，毛泽东往往在父亲睡下后，用蓝布被单遮严窗户，防止灯光泄漏。后来，他的秘密被父亲觉察，父亲朝他吼道：哪里这样喊不赢的！一夜熬掉多少桐油，一个月就是几百文油钱，这样下去还了得！文七妹见此赶紧起来，话语充满慈爱：快点睡吧，莫熬夜了，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听到母亲的劝告，毛泽东才顺从地熄灯睡下。

在日常生活中，毛顺生对于这位具有反抗精神、敢于顶撞老子的大儿子非常恼火，经常训斥其为“不孝”，急恼了便动手教训。这时，毛泽东便引经据典来对抗，说：“经书上说的‘父慈子孝’，可见‘父慈’在先，‘子孝’在后，哪有父不慈，而子能孝的呢？”

有一次，毛顺生请了一些生意场上的人来作客，谈生意。他让文七妹准

备了酒菜，殷勤款待。席间，他想让客人见见自己的长子，同时也想让儿子接触一下生意场面，结识生意中人，往后好接自己的班，便大声喊道：“石三，快来给客人斟酒！”不料儿子正在看书不动身子，嘴里还不耐烦地嘟囔着：“我讨厌那些财迷心窍的买卖人，要斟，你自己去斟！”

毛顺生见儿子不听他的吩咐，让自己大丢面子，顿时火冒三丈，放下筷子就要动手。忙活于厨房和客堂的文七妹急忙过来，一把拉住毛顺生说：“我给你讲过多少次了，石三已经长大了，做事情他有他的主意，不要硬是要他去做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嘛。”说完，又连忙笑着向客人赔不是，并亲自向客人一一斟酒。本来，一场干戈经文七妹的调解已化为玉帛，但毛顺生仍怒气冲冲，当众骂儿子：“懒而无用！”这下激怒了毛泽东，与父亲论起理来。毛顺生骂他“不孝”，他则回敬父亲：“为父不慈，哪来子孝？”之后，一气跑出家门。毛顺生追出来要打他，他便跑到一个池塘边上，警告父亲如果再走近一步，他就要跳下去。文七妹急坏了，紧追着丈夫赶过来，叫丈夫不要前去，同时竭力劝儿子回来。在这种情况下，父子两人僵持着，毛顺生不敢再朝前迈一步，但要儿子磕头认错；毛泽东表示如果父亲答应不打他，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因为另一条腿属于母亲。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一场“战争”就这样结束了。事后，毛泽东总结道：“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对于家庭内部发生的这一类冲突，文七妹明辨事理，认为主要责任在丈夫毛顺生身上。但她从不当着孩子的面流露出对丈夫的不满，只是在适当的场合劝告丈夫，要他对孩子多讲理，不要总是打骂。与此同时，她也不同意儿子采取公开顶撞的方式。她以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来和儿子交心。她说毛顺生的脾气暴躁，是“不慈”，但也不是所有方面都“不慈”，他对孩子们的将来还是很关心的；作为晚辈，应该多体谅长辈的辛苦，如果对长辈的话不同意，不要顶撞，可以采取慢慢解释的办法。文七妹还叮嘱儿子：“即使是你爹‘不慈’，你也不应该‘不孝’嘛。其实他常常当面骂你，背后又在夸你。你去跟他顶撞，我做妈的心里不高兴，连那个佛爷菩萨也会不喜欢的。”

以后，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公开反对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从过了 20 多年毛泽东仍清晰地记得她母亲的训导来看，可以说明两点：一是毛泽东同他母亲的做法明显不同；二是当时他也许不完全赞成母亲的意见，但母亲的话肯定对他产生了震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至于留下如此生动鲜活的记忆。

这一年夏秋，毛顺生要送毛泽东去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而毛泽东想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家里再次发生矛盾。这次，毛泽东没有采取以往的方式，而是将一些对父亲有影响力的亲戚动员出来，例如他的堂伯父毛麓钟、堂兄毛宇居，他们都当过毛泽东的私塾先生，是家乡有名的文化人，还有姨表兄“九哥”王季范，他当时正在长沙优级师范读书，让他们来说服父亲。他们先后来到上屋场，极力赞成毛泽东外出上学，夸毛泽东天资过人，不同凡响，将来必成大器。结果，毛顺生被这些亲戚说动了，改变了初衷，表示同意儿子自己的选择。这次，毛泽东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与父亲的意见分歧，也许是受了母亲的启发。而这一外出读书，对毛泽东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这是毛泽东在母亲去世后所写《祭母文》中的一句，是他对母亲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和一生的善行所作的高度概括。

文七妹的品德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能够为利于他人而克己、损己。平时她处处节约，省吃俭用，但逢农时青黄不接或荒年旱月，总是背着丈夫悄悄送一些米粮给穷苦乡亲；遇有上门讨饭者，宁可自己少吃一口、少吃一顿，也要让他们吃饱。文七妹的这种美德，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子女，他们从小就养成了同情、关心和尽力帮助穷苦人的情操。

在韶山一带，至今流传着许多文七妹母子乐于助人的故事。下面仅举几例。

韶山冲的毛乾吉老人曾经这样回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我小时候家境贫寒，穷得揭不开锅，常与嫂嫂、弟弟在外讨米。有一年夏荒时节，我和弟、嫂清早来到上屋场讨米。当时，毛泽东正在坪里劳动——糊泥巴粉墙。他见到我们衣衫破烂，便问我们为什么讨米。我说家里穷，劳力少，没有饭吃。毛泽东叫我到阶基上坐一坐。这时，毛家正准备吃早饭，堂屋里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我一见这饭菜，就馋得口水直吞，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便哭了起来。毛泽东闻声走过来，问我为什么哭脸。我嫂嫂解释说我是肚子饿了。毛泽东便朝屋里招呼母亲立即端来一碗饭，送给我，又夹了一些菜。我接过香喷喷的白米饭，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便狼吞虎咽起来，忽然想起弟弟也没吃早饭，便把一半饭分给他吃。毛泽东见这点饭还不够我们吃，又叫母亲端来一碗饭，直到我们吃饱离开上屋场，他才回到堂屋里吃饭。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鸡犬之声相闻的山村里，每逢陌生人出现，都会引起乡邻的注目。有

一回，两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要饭人——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女，在冲里挨家挨户地乞讨，三三两两的小孩跟着围观。许多人家看到她们过来，纷纷将门关上。这一老一小要饭要到上屋场时，已经有气无力了。老婆婆见到正在门外空地忙活的文七妹，拉着小孙女双双跪下，嘴里哀求道：“大慈大悲的主人家，我家有好几天没揭锅盖了，可怜可怜我这个孙女，给点米回去做顿饭吃吧。”文七妹见状立即扶起两人，并用手理了理那个细妹子的头发，声音有点哽咽，说：“好妹子，我这就给你装饭去。”说着，便转身迈进厨房，站在一旁的毛泽东也跟着进了厨房。母亲往碗里盛饭，他便帮着夹菜。不一会儿，两碗饭菜送到了祖孙二人的手上。“你们快趁热吃吧！把袋子给我，再给你们装点米来。”文七妹母子又一前一后进屋，母亲撑着米袋口子，儿子则一勺一勺地往里装米。其情其景，令屋外所有人都感动不已。

毛泽东读私塾时，虽然离家不远，也和许多同学一样常自带午饭。一天，当他看到一个名叫黑皮伢子的同学，因家贫没有带午饭时，就把自己带的饭分给这位同学吃，而且自己尽量少吃一些，让黑皮伢子吃饱。

从这以后，毛泽东天天和黑皮伢子一起吃午饭。每天放学到家，他放下书包就到厨房去弄饭吃。母亲以为儿子午饭带得太少，第二天便换个大碗给他带饭。可是，儿子放学后还是到厨房狼吞虎咽地弄饭吃。母亲很奇怪，就问毛泽东：你去上学读书，为什么反倒吃得下那么多饭？儿子这时才把事情原委告诉母亲。文七妹慈爱地说：你这样做是对的，只是不该瞒着我，应该早些对我讲清楚，我好用大一点的篮子，每天带两份中饭，省得你们两人都吃不饱。从这天起，她天天中午给儿子带双份饭，一直持续到黑皮伢子后来离开这所私塾为止。

毛泽东的二堂叔叫毛菊生，家境十分贫困，文七妹和少年时期的毛泽东非常同情他，娘儿俩每到年关就瞒着毛顺生给这位贫苦的叔叔送米、送腊肉。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大约在 1910 年春的一天，文七妹给儿子装好两箩筐白米，这是让他送到私塾当口粮的。16 岁的毛泽东，挑着一担箩筐走出家门，时间不长，就空着箩筐回来了。文七妹问儿子怎么回来得这么快，毛泽东就把路上遇到本家毛承七夫妇吵架的事向母亲说了一遍。原来毛承七一家已断粮，毛氏宗祠里百把担积谷又被族长死死卡住，不肯平糶，七嫂无奈，只好带着女儿到外村的大财主家里去讨米，毛承七嫌她给自己丢了脸面，十分生气，夫妻就大吵了一场。毛泽东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就把自己那担箩筐挑进屋，把白米倒进了毛承七家的米缸。母亲听了儿子的解释后，赞同儿子的做法，随即又亲手量了两斗米，叫儿子莫让父亲看见，赶快挑到学堂里去。

有一年冬天，天气格外寒冷，难得有雪的江南韶山竟也下起了鹅毛大雪。清早，毛泽东在上学的路上遇着一位衣着单薄而又破烂的年轻人，浑身冻得直打哆嗦。当了解到他的家境和遭遇之后，毛泽东立即从自己身上脱下一件衣服给他穿上。直到第二年春天，母亲翻晒冬衣时，发现儿子少了件夹袄，一盘问，儿子便把真情告诉了母亲，母亲点点头，对儿子丝毫没有责备。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句话用来形容他母亲的为人，也是十分恰当的。文七妹几十年来一贯做好事，她做的好事数不清。

文七妹的高尚品德，对毛泽东一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母亲的言传身教，使他从小就具有了同情穷苦人的朴素的感情，这是他以后从事革命斗争的原动力之一。如果没有母亲当年对他的这种影响，如果他从小受到的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利己的教育，那么就没有以后的毛泽东。由于有这样的感情基础，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就能顺利地将这种朴素的感情升华到为天下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的高度，形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和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

病母在庐 游子牵挂

1910年秋，毛泽东挑着母亲为他打点的行李，告别了韶山冲，先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后又到省城长沙学习。从此，毛泽东不再由母亲照料，开始了独立生活。然而，母亲16年的养育之恩，他始终刻骨铭心；母亲的品德风范和殷殷教诲，他将一生受用不尽。他无以报答母亲，惟有刻苦学习。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时常惦念着母亲，尤其是得知母亲抱病的音讯后。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在给同窗好友萧子升的信中，流露了他对病母的深深忧思：

“话别之后，滞于雨，不得归；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五六日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重以校中放假，同学相携归去，余子碌碌，无可与语。早起晚宿，三饭相叠。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明日开霁，决行返舍。”

当时，学校已开始放暑假，毛泽东想回家探母，却逢长沙连日下雨，而在湘各军又正在交战（信中所说“萑苻”，指春秋时郑国泽名。据记载，那

里常有盗贼聚集出没。这是取自《左传》中的一则典故。毛泽东用此典指驻湘各军发生的战事），被滞留学校，心中十分焦急。当他在写这封信时，得知第二天放晴，便决定不顾沿途风险，也要动身。

6月26日，毛泽东在途中又给萧子升写了一信，表达了快到家乡的心情和沿途所见军阀部队横行招摇的情况（信中提到的“银田市”为“银田寺”离韶山冲约30里）：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主人与予有故，颇安适焉。四肢之怨虽深，而灵台之乐殊甚。洗尘振衣，捉管为书，回想昨宵今早，情景宛在，感念奚如！中途寡所见闻，然略可得而述。近城之处，驻有桂军，招摇道涂，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证以校内所见，信乎两粤赌风之重也。七里铺、姜车一带，有所谓护国军二股：一苏鸣鹄所部，约千二百人；一赵某所部，数略同。”

6月27日上午，毛泽东顺利地到达韶山冲。

儿子的归来，无疑是对久病中的文七妹最大的安慰，病情也因此减轻了许多。这次回家，毛泽东为母亲端饭喂药，陪母亲说话、拉家常，在浓浓的亲情中度过了半个多月的时光。直到7月12日，毛泽东才动身返校。

1918年，文七妹因身体一直未见好转，回到娘家，在她的兄嫂们照料下继续养病。同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因忙于新民学会的革命活动，未能回家。8月上旬，毛泽东准备赴北京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离省远行。临行前，他特地抽时间回一趟家乡，并赶到文家探望母亲，了解病情。然后又匆匆返回长沙。几天后，毛泽东给两位舅父写信，并附上一剂为母亲治病的药方。信中说：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莲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为了不让舅父和母亲担惊受怕，毛泽东在信中只说他这次赴京是“游历”没有透露其真正目的——欢送留学青年和在京研究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8月15日，毛泽东一行20多人启程赴京。

1919年，文七妹病情加重，被接回毛家。当时，她患的病主要是淋巴腺炎。毛泽东接到消息后，从北京动身返回。途中绕道上海，在那里欢送了两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回到长沙时，母亲已由毛泽民护送来这里治病。毛泽东兄弟携母亲一起住在好友李富春、蔡畅夫妇家。4月28日，毛泽东致信舅父舅母，报告母亲的病情和治疗结果，并向他们请安、致谢。信中说：

甥自去夏拜别，匆忽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履瞩多亨，为颂为慰。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勾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

在长沙，毛泽东整日围在母亲的身边，“亲侍汤药，未尝废离”，竭尽做儿的孝心。他还和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一起搀扶着老母到照相馆照相，这是文七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儿子们合影。从照片上看，文七妹脸庞下部明显肿胀，为淋巴腺炎所致。淋巴腺炎，即腮腺炎，这在今天是一种很容易治愈的普通病症，而在当年却无良方可施。文七妹因此备受折磨，痛苦不堪。

永不泯灭的回忆

这年10月初，正当毛泽东在长沙忙于驱张（即军阀张敬尧）运动的时候，得到了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信，像是晴天霹雳，马上带着小弟泽覃，奔回韶山。可是，当他们赶到上屋场的时候，母亲已经入棺两天了。二弟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的时候，还在呼喊着他兄弟的名字。毛泽东听到这些，心如刀绞。那几天，他内心承受着极大的悲痛，一直默默守在灵前。10月8日，他席地而坐，面对青灯，写出了一篇情意深切的《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
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
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
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
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
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
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
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
五德萃萃，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
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
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
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
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思，或多劳瘁。
大小亲疏，均待报贲。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
必秉惆怅，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
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
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
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
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
惟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
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同时作泣母灵联两副，记述了母亲对他的养育之恩和他对母亲的孝敬之情。这两副灵联分别是：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祭母文》和两副灵联写好后，毛泽东将其交给族兄毛宇居保存。毛宇居收藏保管达 30 多年，直至解放后上交人民政府。1978 年 12 月，当地政府将毛泽东父母的合葬墓修缮一新，并将灵联和《祭母文》刊于墓地右侧，供人们瞻仰、凭吊。

过了“头七”之后，毛泽东才忍着悲哀，咽着泪水，和二弟泽民分别，带着小弟泽覃，离开韶山，回到了长沙。

1921 年春，毛泽东风尘仆仆地回到韶山。在一个黑夜茫茫的晚上，他与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王淑兰围火而坐，家常声声，话语不断。毛泽东操着乡音动情地说：“今天是正月初八日，是母亲的誕生日，我们要多打一下讲呀！”接着又面朝毛泽民、王淑兰说：“父母双亲大人的后事全是你们料理的，特别是父亲死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后来才知道，他老人家是患伤风病死的，棺木还是从唐家坵借来的，你们操心费力了，而我却没有尽到孝敬之心啊！”

1925 年春夏和 1927 年初，毛泽东回到韶山探亲，开展革命工作时，总要到父母的墓前凭吊一番。

1936 年，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深情地赞扬他母亲的高尚品德，

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解放后，身居高位的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幼年时在母亲的教育下养成的乐于助人的习惯，经常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尤其是生活比较困难的烈士遗属、过去的师长朋友寄钱寄物，邀请他们到北京叙旧，送给他们许多衣物，而自己则节衣缩食，生活相当俭朴。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在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32年的韶山故乡。在故居里，他在父母的照片前凝望着，伫立了好一阵，然后对随行的同志说：“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意思是父母得的都不是难治的病症，却都过早地去世了。毛泽东在自己当年的卧室里，看到了他与两个弟弟和母亲的合影，心情顿时激动起来。他用地道的家乡土话问道：“咯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这张照片是从哪里找出来的？）原来这张惟一的母子合影，一直保存在外婆家。如今，照片上的老母早已作古，大弟泽民1943年牺牲在新疆，二弟泽覃1935年牺牲在江西战场上，只剩下了他自己，能不感慨万端！

1959年6月26日拂晓，晨雾淡淡，空气清新湿润。毛泽东默默地爬上故居对面一座叫楠竹坵的小山岗。随行的罗瑞卿等并不知道他的意图，一直到了毛泽东父母的坟墓时，才知道他是来悼念父母的。随行人员赶紧采来一束松柏交给毛泽东献上，毛泽东向合葬墓致了深深的鞠躬礼，随后又伫立良久，并说，下次再回来，还要来看两位老人。

毛泽东这次返乡，适逢他母亲40周年祭。40年来，他始终不忘母亲的养育和教诲，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殷切期望。一掬慈容何处寻？天上耶？地下耶？都不是。一掬慈容在心中，已铸入他的灵魂。那是一种永不泯灭的精神，是一种永恒。

妻 子 罗 氏

关于毛泽东的结发妻子，其生平材料罕为人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外界甚至连她的姓氏都搞不清楚。毛泽东本人也从未与人谈起过她的生平和姓氏。1936年，他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也只是简单地说到：“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几乎没有想到她。”

为此，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便在他的《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中猜测说：“毛不肯和那位姑娘有任何联系，这使新娘一家备受闲话与羞辱，直到今天，韶山人还不肯说出新娘姓什么。我们仅知道她比他大

四五岁，‘容貌秀丽’”。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四修《韶山毛氏族谱》向外界公开，人们才解开了心中的这一疑问。族谱上记载，毛泽东的原配夫人姓罗，但没有名字。这是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歧视，也是旧中国妇女的悲哀。

其实，罗氏真名叫做罗一姑，生于光绪十五年（即公元 1889 年）九月二十六日。她依中国旧式封建婚姻，由父母包办，于 1908 年嫁到韶山冲，成为毛家的大儿媳。当时韶山尚兴早婚，而且妻子往往比丈夫大几岁（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就比她的丈夫毛顺生大 3 岁多），罗氏比毛泽东大 4 岁。他们结婚时，毛泽东不到 15 周岁（因他的生日在年底），罗氏 19 岁。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回忆罗氏当年为 20 岁，是以虚岁计。

罗一姑与毛泽东这桩婚姻的形成，是传统的封建婚姻意识的产物。罗一姑的祖母和毛泽东的祖父是亲兄妹。那时候，农村提倡亲上加亲。他们婚事首先就得到双方的长辈的赞同。罗一姑长得清秀而丰满，是操持家务的能手。毛泽东的母亲文氏，身体一直不好。那时，毛家又没有女儿，急需一个能干的女人来操持家务。毛泽东的父亲为人精明，罗一姑这样的女子，是他理想中的儿媳的最佳人选。这门婚事就这么订下来了。

罗氏嫁到毛家时，正值毛家人丁兴旺、家业发展顺利之时。罗氏在毛家克尽儿媳之责，帮助婆母文氏夫人干些针线女红之类的活计，颇为相得。

罗氏嫁到韶山后，身体一直不大好，有时便回娘家小住。1910 年 2 月 11 日，不幸病逝，葬于韶山南岸土地冲。有人说，毛泽东曾与罗氏厮守 10 年，纯属无稽之谈。

毛泽东虽然不满意这门婚姻，但对罗一姑毫无怨言。因为她更是这门不幸婚姻的受害者。正是有了这一亲身经历，毛泽东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深恶痛绝。1919 年“五四运动”期间，长沙发生了一起“赵女士抗婚事件”，引起了社会轰动。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名叫赵五贞的女学生，被父母一手包办，许配给长沙柑子园巷内的富商品古斋少老板吴凤林为继室。赵五贞对此强烈不满，在迎亲的路上，用剃刀自杀于花轿内。该消息披露后，毛泽东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 9 篇文章，猛烈抨击包办婚姻制度。毛泽东用极其尖锐的语言写道：包办婚姻，是“中国的父母”“间接强奸自己的子女”，这种制度“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毛泽东高度赞颂赵五贞的人格：“呜呼，呜呼！不自由，无宁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了怪红的鲜血。柑子园尘秽街中被血洒满，顿化成了庄严的天衢。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毛泽东还在报上疾呼，改革婚制，反抗黑暗的封建社会。毛

泽东如此的战斗精神和激扬的文字，一方面是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思想得到升华所致，另一方面也同他那次不幸的婚姻经历有关。

妻子杨开慧

1901年11月6日，湖南长沙县板仓杨家，一个女孩呱呱坠地。“板仓杨”的主人杨昌济先生给女儿取名开慧，号霞，字云绵，期望女儿的一生宛如晴空中灿烂的云霞，美丽火红。后来，杨开慧的人生道路果然没有辜负这一美好的期望。在她牺牲多年之后，毛泽东在那首著名的《蝶恋花》词中，将她称为“骄杨”，赞她“轻飏直上重霄九”；“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同杨昌济先生当年给女儿取名的意境很有异曲同工之妙。

缠绵多梦的少女时代

3年后，杨昌济先生带着忧国伤时的情绪，出走东洋，求取功名。小开慧跟母亲向振熙在乡下度过了童年时代。

杨开慧家住的板仓，房屋由土砖砌成，三面环山，青松翠竹，交相辉映，屋坪前是两口明净的水塘，再前面是一片宽敞的稻田，银练般的板仓河，在田野中逶迤流过，风光十分秀丽。小开慧就在这明山静水的田园风光中度过自己的童年生活。板仓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印下了她的倩影。儿时的生活虽然清贫，却也充满了盎然生机，常常令她回味无穷。

开慧长到7岁，父亲从国外来信，要她上学读书。她家斜对门的杨公庙，办有长沙县第四十初级小学。山冲里从来不让女孩子读书，学校破例为开慧等7个女孩子单开了一个班。

那时候的乡村，孩子们一般入学的年龄都在10岁左右，而开慧7岁入学，在班上自然年龄是最小的。但由于她学习刻苦，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

杨开慧在杨公庙小学只读了三个学期，便转到离板仓5里多路的隐储学校去了。这个学校比杨公庙小学大，图书也多，强烈地刺激了小开慧的求知欲。

有趣的是，父亲杨昌济这时候又从国外来信，要开慧的妈妈也进学校读书。其时，她妈妈已年过40岁。听从这一建议，开慧随妈妈一起转到离家20余里的衡粹实业学校读书。母亲读实业班，女儿读附设小学班。母女同校读书，一时传为美谈。

辛亥革命发生不久，开慧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

杨开慧上学期间，父亲每两年从国外回来一次，给她讲述一些国外见闻和简单的道理，教她博览群书，把读书当作吸取新知识、新思想的一项重要途径。在父亲的鼓励下，杨开慧刻苦自学，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功底，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她从小爱读《木兰辞》，向往那种少女的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活，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到疆场上去一展身手。

少女年华的杨开慧，不仅有花木兰那样不让须眉的爱国壮志，在她的感情世界里，也有着大家闺秀的缠绵悱恻。对客居海外的慈父的思念，对家境日蹙的感伤，对学海无涯的焦虑，这一切都使得自小体弱多病的杨开慧，不时泛起难以自己的孤寂和伤感，陷入每个青年人都曾有过的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烦恼之中。她非常渴望得到知心朋友的理解，向她们诉说内心的苦闷，以便获取继续前进的力量。在杨开慧为数不多的遗墨中，曾有这样一封信，信中说：

我最爱之姐姐鉴：

许久未晤，甚以为念。近维起居多祜，学业日增为颂！妹现发头昏，且生痲子，请医诊治，总难见效。校中的课堆积，偶一思及，颇为之焦灼也。妹与吾姊至好，素承规劝，有暇望赐教行，以慰系念。天气将寒，惟珍重不一。此间大安

愚妹杨开慧书上

这封信写于 年深秋，那时杨开慧年仅 岁。此后，开慧虽然年龄在增长，但这种缠绵的情感分毫未减。后来，更平添了一种对爱的渴望。这或许是杨开慧以后选定身体强健、意志坚强的毛泽东为终身伴侣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心仪学子毛泽东

年春，杨昌济从欧洲留学回来后，杨开慧便随全家一起迁到长沙。同年，毛泽东也来到一师求学，拜杨昌济为师。他和蔡和森、陈昌等人经常到“板仓杨”寓来就教，自然认识了老师的千金杨开慧，相互之间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一开始，当父亲和学生们交谈的时候，杨开慧常伫立一旁，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听着。后来，她便逐渐加入其中的讨论。杨昌济对这个聪明的女儿很是看重，对她的介入也极为赞许，并不时地向毛泽东等学生推荐女儿的

学问。因此，时间一长，杨开慧自然成了这批学生中的一员。他们一起议论时事，抨击时政，并互相传阅读书笔记，交流心得体会，彼此间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那时，杨开慧经常参加毛泽东等与父亲的讨论会，也经常随同毛泽东及他的学友到郊外游岳麓山、橘子洲头，漫步湘江岸边。杨开慧对毛泽东的伟大抱负和远见卓识非常佩服，毛泽东对杨开慧也非常关怀，常常深入浅出地解答她提出的疑难问题，启发她认真思考，鼓励她发表自己的见解，使杨开慧开阔了眼界，受到深刻的教育，开始懂得了要拯救中国劳苦大众，必须起来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毛泽东经常把自己写的读书笔记和日记给杨开慧看，杨开慧也把自己写的笔记和日记送给毛泽东，非常诚恳地请他批改指点。他们之间的了解，逐步加深。杨开慧经常端着小板凳，坐在墙角“旁听”毛泽东同他的学友们畅谈救国救民的真理，个人的理想和宏伟的抱负。毛泽东刻苦好学的精神，朴实、诚恳、谦虚的态度，顽强斗争的毅力，都成了她学习的榜样。当谈了一天，傍晚送走客人后，开慧立即打开笔记本，记下一天的心得。其中特别追记了毛泽东这样一段话：“一个人要坚强，要进步，定要学树木与风雪作斗争，生根结实；不要学花草向风雪屈服，摇摆易凋。”杨开慧受毛泽东等人的影响，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天昏地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要从层层罗网的包围中展开双翅；妇女决不能只做贤妻良母，应该成就一番事业，为救国救民作出自己的贡献。

毛泽东在一本读书笔记中，强调了要改造中国与世界，有志青年必须首先具备一种为人类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理想与气节，正确处理“大我”与“小我”之间的关系，这对杨开慧影响很深。直到杨开慧被捕入狱、就义前夕，仍以“牺牲小我，成功大我”的哲言，激励同狱难友。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来源，最早出于毛泽东对她的教育和影响。

毛泽东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磨炼革命意志，顽强地锻炼身体，长年坚持“冷水浴”是出了名的，每天清晨在学校井口边，只穿短裤，20多个人聚在一起，一声令下，各人从井里提一桶冷水，从头上浇淋全身，自己淋或互相对着淋，然后用毛巾擦干全身，直至擦得皮肤通红。毛泽东还经常进行“日光浴”、“风浴”、“雨浴”，冬天有时也露宿室外。这些都强烈地影响了杨开慧，她也学着毛泽东的样子，长年坚持冷水浴，寒冬腊月也照洗不误。她曾在作文中这样写道：“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所阐述的中心思想。

思想的沟通，使得彼此的感情交流逐渐升华，日趋成熟。严肃的杨先生终于发现了女儿的钟情所在。但他没有阻止她。他珍爱女儿，也喜欢毛泽东

这位激进、睿智、不修边幅而又抱负非凡的学生。不过，他未提婚嫁之事，毕竟女儿还年小。

但是，杨先生非常愿意女儿与毛泽东日渐接近。有时他与学生讨论问题，女儿悄悄进来，默默地坐在一旁倾听，对此杨先生从不反对。

与毛泽东相恋，两地书昵称“润”和“霞”

1917年11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突然来到长沙“板仓杨寓”。杨开慧放下正在细看的毛泽东的读书笔记，立即迎上前去，只见毛泽东高举一张报纸，兴高采烈地走进来，告诉杨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好消息，全家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杨开慧忍不住拍着手说：“俄国这一回改天换地了！”这天，开慧兴奋得一夜未能成眠，思绪如潮，她深深地被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所鼓舞。十月革命的火炬，照亮了杨开慧的心田，在她的眼前展开了一条宽广的大道。

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杨开慧随全家北上，住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9号。8月份，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为方便从事革命活动，学习、探讨救国救民的理论，杨昌济推荐他到北大图书馆当了助理员。

在京期间，毛泽东利用北京大学的有利条件，经常去旁听他喜爱的课程，参加哲学和新闻学研究会，广泛同革命人物接触，吸收各种新思想，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他仍像在长沙一样，经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蔡和森、邓中夏等，去探望正在病中的杨昌济先生。杨家小小的客房里，又充满了热烈的议论和欢乐的气氛。杨昌济先生对这些年轻人的到来，十分欣慰，常和女儿一起同大家开怀畅谈，议论时事，纵谈天下大事，研究国内外各种新思潮、新学说，探讨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有时，毛泽东就住在杨昌济家里。热情好学的杨开慧，又得到了毛泽东的关心帮助，更显得容光焕发，朝气蓬勃。

这时的杨开慧，已是17岁的少女，身处异地，得遇同乡知己，自然情愫暗增。毛泽东要赴上海时，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相约分别后互通信息。次年4月，毛泽东转道上海回到湖南。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已是一个字：润。毛泽东回信，称呼也是一个字：霞。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时的北京，已经历了“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随着“五四”运动浪潮的继续前进，杨开慧的思想觉悟也不断提高，她在父亲杨昌济及毛泽东的指导下，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对各种社会问题，也有了新

的认识。她读着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大联合》等文章，认识到要进行伟大的革命运动，就必须实行民众大联合，这是根本的问题。她非常佩服毛泽东气壮山河的革命气概和扭转乾坤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她反复读着毛泽东的文章：“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倒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当时，杨开慧已经抛弃封建旧文体，坚持用白话文写文章，抨击当时弊政，勇于同封建势力决裂。一位前来探望杨昌济的朋友，曾称赞她说：“志向尤大，举止温婉，中文亦好，殊属难得。”

这时的杨开慧憧憬着民众大联合的革命风暴立刻到来，她向往着不久的一天，要投身到民众大联合的行列中去，置身于工农群众之中，与毛泽东一起去搏击长空、击风斗雨，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地战斗。由于杨开慧与毛泽东来往密切，志同道合，感情日深，在父亲的支持下，她与毛泽东相爱了，产生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情怀。后来她回忆这段情形时说：“听到他（指毛泽东）许多的事，看了他许多的文章和日记，我就爱了他。”

追随毛泽东，在共同的战斗中结为夫妻

1920年初，杨昌济去世后，杨开慧扶柩南下，将父亲归葬长沙板仓，不久，她便从板仓来到长沙城，在李淑一的父亲帮助下，进了福湘女中。

福湘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为了推行奴化教育，学校规定每周都要做“礼拜”。出于一种心理上的抵触，杨开慧常以生病为理由逃避，令学校颇伤脑筋。

在校期间，杨开慧在《湖南通信日报》和福湘学校的校刊上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莱进伯的一封信》等白话文章，抨击封建道德和礼教，提出男校开放女禁的主张，并率先与5名女同学一起进入原为男校的岳云中学读书。当时，她还剪了颇为学校禁忌的短发，因此，很快被校方视为“过激党”的代表。

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斗争进入高潮。这场斗争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扩大和继续，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杨开慧勇敢地投入了这一革命运动，积极组织福湘女中的学生参加游行示威。

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革命浪潮迅猛发展，曾被张敬尧无理封闭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又恢复了公开活动。

1920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从北京返回湖南。他身穿薄薄的旧长衫，腋下夹着一大卷宣传学习材料，来到福湘女中，在选修班的教室旁边，找到了杨开慧。回湖南后两人久别重逢，显得格外高兴。杨开慧接过那一大卷宣传学习材料，讲起自己的学生生活，介绍了福湘女中的学生运动情况。毛泽东也讲了他的北京、上海之行，称赞了福湘女中的学生运动。他提醒杨开慧要防止目前社会上、学生中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这时候，不少同学都围拢来，听毛泽东分析湖南形势。毛泽东勉励大家说，我们要做革命派，不能做改良派。杨开慧送他走出校门时，毛泽东才说出这次来找她的目的：省学联要做其他群众团体的工作，那里人手少，希望杨开慧到省学联帮助工作，杨开慧一口答应。

杨开慧一边在福湘女中读书，一边在毛泽东组织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中担任宣传工作。她朝气蓬勃，废寝忘食，不要报酬，不讲条件，奔走于各学校之间，组织学生宣传队，深入工农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宣传鼓动工作。

1920年初冬，当毛泽东在湖南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时，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杨开慧，光荣地成为团组织最早的一批女青年团员。从此，杨开慧更是意气风发地组织带领青年学生，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

这一年，毛泽东为了有一个立脚点，有一个社会职业作掩护，受聘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主事（即校长）。他考虑到要开展工人运动，必须提高工人的觉悟，认为开办工人夜校是一种好形式，因此，在附小的初小部开办了民众夜校，杨开慧也担任了教学工作，她还联络一批进步同学在长沙城里办起了平民识字班，她们自己编讲义、刻蜡版、印教材。平民识字班很快由一个发展到三个，后又发展到九个，学生从十多人发展到数百人。

这期间，杨开慧又积极参加了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和青年图书馆的工作。

1920年7月，毛泽东经上海回到湖南，全力开展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个以宣传马列主义为宗旨的文化书社，但因缺少活动经费，筹备工作遇到了困难。杨开慧为此也很着急，她还在读书，没有一点收入，父亲去世后，家境也不宽裕。她忽然想到父亲去世时，北京的一些朋友给妈妈寄来一笔奠仪费还未用完。可又一想自己和哥哥杨开智都还在读书，家里再没有挣钱的人了，今后生活怎么办？压在妈妈身上的生活重担，使她难于开口。可是，压在毛泽东身上的革命重担，自己不为他分担，让谁为他分担？因此，她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终于动员妈妈拿出了这笔钱，全部

交给了毛泽东。

文化书社很快办起来了，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杨开慧既是热心的读者，又是义务工作人员。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与外地革命同志的来往信件，也都由文化书社收转，杨开慧成了接送这些文件的交通员。许多革命同志也常在这里集会，书社实际上成了毛泽东建党活动的一个重要联络点。杨开慧对此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

毛泽东在长沙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活动，杨开慧都满腔热情地参加，全力支持，她为自己能协助毛泽东做点具体工作感到无上光荣。毛泽东也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忠实的战友、亲密助手而自豪。1920年冬天，他们结婚，寒假相约到板仓过春节，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不作俗人之举”。

婚后，杨开慧继续在校学习。每逢假日，便从学校出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

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机要员

1921年6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与何叔衡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杨开慧手提小衣箱，亲自到湘江码头送行。从上海回湘后，毛泽东一面宣传“一大”方针，发展党的组织，一面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为发展革命事业培养骨干。

湖南自修大学是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于1921年8月创办的，是党的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和党的第一所干部学校。毛泽东为它制定的方针是“发现真理，造就人才”，“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责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业等责任，学员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选修文学或哲学，可以自由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可以广泛阅读进步书刊，还可以边学习边参加社会活动。

杨开慧积极地参加了自修大学的筹建工作。创办初期，经费不足，杨开慧利用自己担任学联干事的身份，在一次学联会上提出：我们学联要救亡图存，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必须首先着重培养青年骨干，自修大学正是培养青年骨干最好的学校。因此，“五四”时期各界捐给学联的钱，我们应该拿出一部分来支援自修大学。经过讨论，大家同意了杨开慧的意见，给这所革命的新型大学以有力的支持。省学联搬到船山学社办公后，湖南等地的一些失学青年也进了自修大学。

1921年秋，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杨开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掩护毛泽东的活动，她接来母亲，一起住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所在地

——清水塘，自己则担任湘区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她经常出入城东小吴门，到文化书社、船山学社、望麓园织布厂等党的秘密联络点，传达党的指示和文件，收集社会动态和秘密情报。外地来访人员先由杨开慧通过联络点摸清底细，才确定是否接见或在何地接见。每当召开党的会议，她就到院里流动放哨，她还在客堂后壁上挂了一面大镜子，从中可以看到大门外的动静。晚上，她常起来到屋外巡查，观察有无可疑之人。

1922年，毛泽东又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主持馆内一切事务。当时图书馆内还设有秘密阅览室，藏有《新青年》、《先驱》、《赤光》等进步书刊，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杨开慧还兼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干事，积极开展学生运动，组织被反动军阀张敬尧开除的学生进行复学斗争。杨开慧在领导学生运动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并介绍其中的优秀分子入党。

杨开慧除了担负机关的繁重工作以外，对毛泽东的起居饮食更是无微不至地给予照顾。毛泽东的公开职业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和一师附小的主事，他除了东奔西走领导工人运动外，还要到一师附小去处理日常工作，到一师师范部去教课，每天工作到深夜。杨开慧常在天寒时，翻身下床给彻夜工作的毛泽东披上件棉衣，留点饭菜暖在锅里，半夜里再拿给毛泽东。毛泽东起草的党委文件和向中央的报告、传单、工人夜校的课本、自修大学的讲义，都由杨开慧帮助认真地抄写。

湘区党委订了许多种报刊，杨开慧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每天坚持看报，剪下有用的材料，为毛泽东分析问题提供有用的资料。

1922年10月，杨开慧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取名毛岸英。

岁月风雨为磐，革命矢志不移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毛泽东被迫离开长沙赴上海，后又到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工作。婚后的第一次别离，平添了毛泽东的许多离愁别绪，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贺新郎》词：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

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在这首词里，毛泽东截取了他和杨开慧爱情生活中的一个断面——临别道情，将写景和抒情相结合，情真意切，扣人心弦。词分上下两阕。词的下半阕最后三句，使人得见一对年轻的夫妻从此就要天南地北地分离，他们的心被痛苦所煎熬的真情。但又表达了不管现在的离别带来多少愁和恨，为了事业的需要，必须忍痛割舍，等待将来重聚时，再像比翼齐飞的鸟儿一样，高飞云霄。把“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这种自然界的巨大力量用来比拟告别的决心，更加重了割断个人“愁思恨缕”，献身人类解放事业的豪情壮志，表现出非凡的气势。

1924年夏，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毛岸英和刚刚出生不久的毛岸青，来到上海。毛泽东到码头上亲自等候，结束了梦牵魂绕的两地生活，得以“重比翼，和云翥”。

1924年年底，毛泽东因与当时的“总司令”陈独秀意见相左，加之身体不好，回韶山养病。杨开慧也第一次来到韶山冲，协助毛泽东办农民夜校，搞调查，并创建了中共韶山支部。

不久，赵恒惕再次通缉捉拿毛泽东。脱险后，全家先后到了广州，住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杨开慧继续担任联络工作，与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人过往甚密。

北伐开始后，杨开慧回到长沙，住在望麓园，协助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后来毛泽东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也凝结了杨开慧的心血。

1927年2月，毛泽东一家先后到达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这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由于陈独秀严重的右倾错误，致使革命遭到重大的挫折。4月27日至5月6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陈独秀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并被剥夺了在大会上的表决权。毛泽东忧心如焚，偕同杨开慧登上黄鹤楼，看万里长江，烟波浩渺，心潮起伏，写下了不朽的词篇《菩萨蛮·黄鹤楼》，表达了他俩此时此刻的共同心声：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对于这首词，毛泽东曾加注解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8月7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躲避乡下，从事地下活动

“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改选的方式撤换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通过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决定迅速调派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到各主要省区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决定今后各人的去向，毛泽东将在武汉的两个弟弟毛泽民与毛泽覃叫到都府堤41号住处，讨论决定：兄弟三人根据党的安排，各自奔赴战斗岗位；刚生过孩子的杨开慧和即将临产的毛泽覃妻子周文楠，返回湖南家乡，领导长沙、平江、浏阳、湘阴等县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杨开慧与老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从武昌回到长沙板仓，保姆陈玉英也一同回乡，以便帮助照顾孩子。

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主持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他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强调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会上决定在湘东一带举行秋收起义，决定了暴动日期，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毛泽东全力投入领导秋收起义的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他于8月下旬的一天，亲自送杨开慧回板仓，坚持地下斗争。从长沙搭火车到白水车站，下车后步行30多里，一路上他们很少讲话，两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相处7年多的革命伴侣马上就要分开了，在这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各自走上战斗岗位，怎能不让人担心呢！杨开慧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当时他们的三个孩子，大的只有5岁，小的才几个月，如果与毛泽东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去领导秋收起义，的确是很不方便的。毛泽东经过再三

考虑，觉得还是分开活动为好。不料这次分手竟成了夫妻二人的永诀。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把队伍拉到了井冈山。他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这封信经过不少周折，直到 1928 年初，才辗转到了杨开慧手中。她翻箱倒柜，找出一本地图，终于找到了井冈山所在的方向，也更增加了牵肠挂肚的思念。她连夜给毛泽东写回信，讲述了离别后的无限情思，也汇报了板仓地区的斗争形势，一直写到天明。她把盐巴、药品放进几个竹筒里，并把要送去的文件和这封信，一并交给了地下交通员。

在板仓坚持地下活动的日子是艰苦的，再加上关山远隔，音讯不通，杨开慧的心情日益惆怅不安。1928 年 10 月，她写下了《偶感》词一首。

天阴起朔 [朔] 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 [谁] 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 [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 怅无已时。

这首词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她对远方亲人的深切关心和思念。

关于杨开慧留在板仓坚持地下工作的这一段斗争岁月，她的保姆陈玉英后来作过具体的回忆。她说：杨开慧“留在板仓坚持地下工作，她十分重视学习，每天都要挤时间看书。她经常深入农民家里，进行调查访问，宣传革命道理。……她的穿着同农村妇女一样，和群众很合得来，附近的人都亲切地喊她‘霞姑’、‘霞姐’。在板仓期间，开慧同志还带着我们先后到平江县石洞砖屋里的向五舅家和田边屋里钟姨妈家里去住。她在这里住几个月，那里住几个月，名义上是走亲戚，实际上是从事各方面的革命活动。”

“在板仓的生活很艰苦，如果有几条小游鱼吃的话，也只是放到火灰里煨熟后拌点盐，从不放油的。但当一些革命同志、回乡的穷苦农民来到家里的时候，开慧同志总是要设法接待，留他们吃饭，长时间同他们谈话，帮他们解答问题，鼓励他们继续战斗。邻居中有人生了孩子没衣穿， she 就把岸英他们穿过的衣服送去；没米下锅的，她总是想方设法接济。她常常对家里人讲：‘穷人受苦，也就是我们的苦，我们要互相关心，谁有困难，就帮助解决，不能只顾自己，处处要为大家着想。’”

“死不足惜 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1930年8月，形势日趋紧张，反动派到处搜捕杨开慧，在板仓加紧了侦察和监视，何键派出侦缉队员坐镇福临乡。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力劝杨开慧暂时离开板仓，到井冈山毛委员那里去，但她却说：“没有见到毛委员的亲笔指示 我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她仍然以大无畏的精神奔走在板仓方圆数十里的地方，行踪隐蔽，出没无常，敌人几次围捕，都由于革命群众掩护和报信而脱险。

每次遇到紧急情况，杨开慧总是设法通知其他同志安全转移，先处理好党的文件，而自己则与敌周旋。解放后，从杨开慧住地旁边的菜地里挖出一个瓷坛，里面密封着党的文件。这是杨开慧当年在紧急情况下埋在这里的。

1930年10月中旬，杨开慧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姆陈玉英和毛泽东8岁的儿子毛岸英。在狱中，杨开慧经受了各种形式的威逼利诱，甚至说只要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就马上可以获得自由，但都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死不足惜 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又嘱咐说：“我死后 不要作俗人之举。”有一次 她对岸英说：“你长大后 要记住这帮坏人对我们的迫害，把这些情况告诉爸爸。”毛岸英于1931年见到叔叔毛泽民时，悲愤地讲了妈妈牺牲的情景，并且表示长大了要为妈妈报仇。他成年后也常常对妻子刘松林讲起敌人给母亲用刑和母亲英勇斗争的情况 并自豪地称她是“伟大的母亲”；她配得上是一位女英雄”。

1930年11月4日，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枪杀，时年29岁。

杨开慧死后，遗体被亲友连夜运回板仓收敛，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毛泽东从报上得到噩耗后，当即寄信给杨开慧的亲属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上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等字。全国解放后，他在接见杨开慧的堂妹时 曾说过：“你霞姐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 很难得！”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在接见他们当年的保姆陈玉英时，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杨开慧被捕经过和狱中情况，并说：“开慧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6个 有的全家都牺牲了。”

毛泽东“泪飞顿作倾盆雨”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词赠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此词已广为人知：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有一次，毛岸青与邵华请父亲毛泽东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以作永久的纪念。毛泽东坐在桌前，凝神思索，铺开宣纸，悬起手腕，提笔写下了“我失杨花”四字。岸青夫妇以为笔下有误，忍不住问道：“爸爸，不是‘骄杨’吗？”并赶紧递过一张空白宣纸以便重写。但毛泽东却说：“称‘杨花’也很贴切”。他一气呵成写完了这首词，双手拿起郑重地交给岸青夫妇。是的，称“骄杨”，表达了毛泽东对杨开慧的赞美；称“杨花”，则表达了毛泽东对杨开慧的亲情。

1962年，当友人章士钊请教该词中“骄杨”作何解释时，毛泽东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骄杨”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礼赞和怀念。

说起《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的问世，中间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那是1957年春节，报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的18首诗词。李淑一读后给毛泽东去信祝贺新年，谈到自己的感想，并提出要毛泽东把过去写给杨开慧的一首诗抄给她。随信附去她于1933年夏天因怀念柳直荀而和泪填写的《菩萨蛮·惊梦》这首词：

兰闺索寞翻身早，
夜来触动愁多少。
底事太难堪，
惊依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
六载无消息。
醒忆别伊时，

满衫清泪滋。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回信给李淑一，信中说：

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

信中还说：

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为国珍摄！

李淑一收到毛泽东的词和信以后，顿时轰动全校。这首词后来经请示毛泽东同意后，发表在1958年1月1日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上，以后，《人民日报》、《文汇报》、《诗刊》及各地报刊相继刊出。

这首词以答问的形式缅怀先烈，并对李淑一作了回答和开导。李词中有“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一句，毛泽东则答以“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杨柳”既是二位烈士的姓，又是杨花柳絮，一语双关，把烈士的忠魂与洁白的杨花柳絮融为一体，形象地表述了烈士视死如归、壮志凌云、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高尚品质。李词中还有“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一句，毛泽东则答以“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充分表达了对两位烈士的深切怀念和崇高品质的赞扬。

1990年11月14日，是杨开慧英勇就义60周年纪念日。在板仓烈士陵园，湖南各界群众及杨开慧烈士的亲属300多人，隆重举行纪念大会暨杨开慧塑像揭幕典礼。烈士的汉白玉全身塑像，耸立在红花岗岩贴面的墓座上，身高3.8米，表现了杨开慧文静、刚毅的个性和不畏困苦、不畏艰难、誓死追寻革命真理的英雄气概。

妻子贺子珍

1909年农历八月十五，正值秋月爽朗、桂花飘香的时节，在井冈山东

在学校的几年时间里，学到不少知识。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举国哀悼。贺子珍同一些进步同学也积极筹备追悼会。但教会学校坚决反对，传教士让贺子珍等18人到教堂罚跪，向上帝请罪。贺子珍拦住同学，坚决不跪，然后昂首挺胸地去参加追悼会。1926年春，贺子珍从福音学校毕业，受聘在秀水小学任国文教师。

走上井冈山

贺子珍的老家就在井冈山脚下。险峻的井冈山，多少年来一直是起义农民、绿林好汉出没的地方。贺子珍从小就听到过许多关于井冈山的英雄好汉打抱不平、周济穷人的故事。她家有很多的书，而她最喜爱的要算是剑侠小说了，常常为此废寝忘食。那时在她的脑海里，萦绕着的常常是一些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思想观念。

自从共产主义的学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也有了共产党等等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进永新县后，贺子珍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她置“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古训于不顾，主动交结那些到省城读书的青年学生，传阅新书新报，并于1926年同妹妹贺怡加入了青年团。后任共青团永新支部第一任书记。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大革命进入高潮。贺子珍就是在这个革命高潮中，于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的。

很快，北伐军从湖南茶陵经江西莲花来到永新，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贺子珍又加入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她是县党部的委员，担任妇女部部长，是永新县第一任的妇女部长。从此，贺子珍离开学校，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涯。那一年，她才16岁。1927年4月，永新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临时县委，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在永新县一时传为美谈，人们称他们是“永新三贺”。

不久，永新县的右派夺了权，贺敏学等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当时贺子珍已调到吉安，任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永新县逃出来的一些共产党员，陆续来到吉安。他们一方面派人去南昌向省里汇报永新右派夺权抓人的经过；同时，另组织人员分头前往宁冈、安福、莲花联络这三县的农民自卫军，合攻永新。贺子珍因哥哥贺敏学与宁冈农民自卫军首领袁文才曾是禾川中学读书时的同窗好友，自己也早和袁文才熟识，便自告奋勇去宁冈，联络了袁文才、王佐等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发动了永新暴动，攻破县城，救出了监狱里的贺敏学等人。

暴动成功不久，永新即遭到了湖南及江西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守永新县城南门，击退了敌军一个特务营的进攻，缴获了100多支枪。战斗结束后，贺子珍在战斗中两枪撂倒两个敌人的事迹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有人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还有人说她是“双枪女将”。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永新还有不少关于她的种种传说。但贺子珍本人听到这些传说时，总是笑着解释说：我的枪法并不好，打单枪都很勉强，怎么会打双枪呢？不过，贺子珍在永新暴动的战斗中端枪上阵，在枪法生疏的情况下凭勇敢杀敌，确实堪称巾帼英雄。

这次战斗结束后不久，永新又遭到了敌军更猛烈的反扑，暴动队伍不得不撤出县城，向井冈山进发。贺子珍是永新县向井冈山撤退的许多共产党员中惟一的一个妇女，也是向井冈山撤退的队伍中的第一个女兵。袁文才因贺子珍有文化，且胆识兼具，提出要贺子珍任自卫军的宣传队长。她白天带人刷写标语，编宣传材料，有时也和队员一起参加练兵。晚上，她给自卫军战士讲革命道理。她的宣传给袁、王这支“劫富济贫”的绿林军以深刻的影响，为以后毛泽东改造这支队伍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塘边结伴侣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也来到了井冈山下。经过谈判，袁文才等决定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当时贺子珍疟疾还没有完全好，也一早就去迎接毛泽东。当毛泽东来到贺子珍面前时，他感到有些惊讶。因为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更没料到，这次会见将会成为沟通他们未来生活的引线。贺子珍则早就知道毛泽东，读过他主编的《湘江评论》、《政治周报》等报刊，以及不少文章，并且听说他领导了湖南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因而对他十分敬仰。

为了尽快地创造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建立巩固的红色区域，毛泽东在宁冈茅坪象山庵主持召开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贺子珍作为永新县的代表之一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讲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问题。贺子珍聆听他那带着湖南口音却清晰流畅的话语，内心十分激动，思想受到深刻的启迪，对革命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在会上，贺子珍也作了发言，介绍了永新县妇女和团的工作，并对发展党、团组织，建立革命武装提出了不少建议。她的发言很有条理，也很有见地，这加深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印象。

毛泽东上山后不久，住到茅坪的八角楼，房子是贺敏学腾出来的。八角

楼离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出出进进，晚上到茅坪河边散步，或者坐在枫树旁边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体虚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见到了，都要走过来，同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态度非常和蔼亲切。有时候，毛泽东不忙，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聊天。

那时，毛泽东初到井冈山，急于知道井冈山一带的政治、经济状况，因此他经常找贺子珍和袁文才、谢梅娇（一说谢梅香）夫妇调查，很快了解了边界各县的历史、地理及农民斗争、党团活动、风土人情等。贺子珍也经常向毛泽东求教马列主义和有关革命理论的问题。毛泽东广博的知识，深邃的历史眼光，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真知灼见以及坚强的意志和超凡的智谋，使贺子珍内心的敬爱与日俱增。

1928年5月，毛泽东带红四军三十一团团部到永新县小江山麓的塘边搞调查，贺子珍也随同到塘边。他们深入群众，访问调查，召集群众召开小型座谈会，了解各村的人口、户数、阶级状况、土地占有等情况，一般是毛泽东提问，贺子珍负责记录整理。毛泽东的《永新调查》就是在这次调查基础上写成的。在塘边，贺子珍还随同毛泽东组织群众商议土地分配的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制定了以原耕为基础，不分男女老幼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使塘边分田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不仅推动了永新全县土地革命的开展，还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分配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天，外县的一支地主保安队向塘边村袭来，扬言要捉拿毛泽东，到蒋介石面前领取重赏。这时，正在堂屋里同毛泽东一起分析调查材料的贺子珍，听到枪声后大吃一惊。驻在这里的红军连队和毛泽东的警卫班都到各个庄子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办？在她毫无主意的时刻，抬头看了看毛泽东，他却非常冷静，仍然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实际上毛泽东头脑冷静，思绪清晰，他认为在不知敌人底细的情况下，冒险之仗不能打，于是立即决定：“通知群众，马上撤离！”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知道这里的老百姓有了准备，在村子里抢掠了一阵子便走了。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同许多的战役相比，这乃是小事一桩，但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一次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危急的时刻，是那样沉着果断，具有一个革命家、军事家的伟大气魄。如果说见面初期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同志关系，那么这时候他们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年轻姑娘的心事是从来不肯轻易吐露的。虽说贺子珍是反封建的斗士，但一想到自己在悄悄爱恋着一个人，胸口就怦怦直跳，平时那种落落大方的神态变了，有时见到毛泽东还怪不好意思的。

有一次贺子珍外出工作回来，像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准备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她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写着什么，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槛上，深情地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自己的脚尖上，极不自然地抚摸着自已的上衣纽扣。就在这一瞬间，双方都意识到了那层意思。还是毛泽东成熟老练，急忙招呼贺子珍坐下，用他那满口湘音的韶山话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和身世。他已经 34 岁了，结过婚，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地说，我同家人已经久不通信了，远隔千山，杳无音讯，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湖南的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他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的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知是真是假。那天，他们谈了很久，很投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世，在他们的心灵上引起了共鸣，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贺子珍看到毛泽东工作繁重，生活得不到合理的照料，自己便默默地承担了这一工作。自从那次地主保安队袭击后，他们又在塘边村工作了一个时期，两人终于结合在一起。

不久，毛泽东要带一个营的兵力去接应到湖南征战的大部队。临行前，他满怀信心地对贺子珍说：“等我把大部队接回来，就给你写信，你再回井冈山来。”

很快，毛泽东迎接红军大队回到井冈山，他惦记贺子珍，第二天写了一封信，要贺子珍马上上井冈山来。谁知这封信送到永新县委，当时的县委书记刘珍想让贺子珍在永新多工作些时候，就把信扣下了，见到贺子珍，也只字没提信的事。

贺子珍早已听到毛泽东和大部队胜利归来的消息，心里非常高兴，很想早日回井冈山看看他们。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毛泽东的信，她感到奇怪，又不好意思问，更不能擅自行动，只得耐心等待着。再说毛泽东把信发出一个多星期，却不见人来，而且连回信也没有，不禁起了疑心：是不是出了事了？他连忙给刘珍写了封信，询问贺子珍情况。刘珍一看，再也拖不下去了，只得把毛泽东的信交给贺子珍，说明事情的经过。

不久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小别重逢，加上得胜归来，毛泽东虽然鞍马劳顿，有些憔悴，却满面笑容。他详细询问了贺子珍在他走后做了些什么工作。贺子珍把主要的事一一讲述了一遍。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你进步了，独立工作的能力比过去强了。刘珍同我开个玩笑，扣住了我的平安家书，害我虚惊一场，还以为再见不到你了。以后你不要到永新工作了，你到那里，他们又不放你回来了。”

前委秘书

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婚后，不仅成了毛泽东生活上的亲密伴侣，更是毛泽东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这时她担任了红四军前委秘书。她的任务是：阅读和整理报纸，提供各种资料，保管文件，担任记录，誊写文稿等。工作琐碎而繁重，但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贺子珍一直勤奋而细致地工作着。

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保卫和巩固根据地，毛泽东日夜操劳，工作非常劳累。有时深夜了，毛泽东还在微弱的灯光下，伏案疾书，起草报告、文件。贺子珍经常陪伴毛泽东工作到深夜，为毛泽东誊写稿子。有时两人一直工作到东方露出曙光。指明中国革命道路的光辉著作《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当时他们住在茅坪的八角楼里。楼前有条小河，对面则是一片枫林，毛泽东常在工作之余或晚饭之后，到河边来散步，有时也在枫树下看书、休息。

不过，贺子珍很少同毛泽东一起散步，一起出门。这倒不是他们俩不想这样做，而是考虑影响，不便这样做。

有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他柔声地提出了一个请求：“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贺子珍答应了。马夫牵着马在前面走，他们两人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一面走，一面谈话。僻静的山路上没有行人。走了一段以后，毛泽东忽然说：“我先走一步，在前面等你。”他马上走了。贺子珍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得按他的意思，继续往前走去。没走出多远，迎面遇到一个拄拐棍的伤病员，贺子珍又往前走，看见毛泽东果然在前边等着她。毛泽东迎上来解释说：“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了一步。”贺子珍理解地点点头。

贺子珍参加革命后，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个性很强，现在工作性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成天待在屋子里，保管、整理文件，她感到别扭极了。开始的时候，她很生气，甚至觉得自己挺倒霉，要不是同毛泽东结婚，也不会当秘书。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她之所以那么坚决要求到苏联去学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学习提高，独立地担负起更多的工作来摆脱这种生活。这当然是以后的事情了，但这种思想，从她开始当毛泽东的秘书时起，就存在了。那时她心里不高兴，甚至同毛泽东闹起了别扭。

毛泽东耐心地说：“你好不懂事。你知道这个工作有多重要吗？我们同中央的联系，中央对我们的指示，上传下达，都要通过你。你把秘书工作做好了，不光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也是对特委、前委工作的支持啊！”他注视着妻子略带愠色的脸，停了停，轻声说：“再说，我也离不开你啊！”

真挚的话语，使贺子珍的心动了。尽管仍带着一些情绪，但她还是默默地“上任”了。

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起她和毛泽东初期的这段生活时，说：“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记得在 1930 年，红军一举攻下吉安后，我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在吉安，我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和妹妹相逢了。我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他就同意了。可是，我在妈妈那里刚呆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妈妈一看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我们回去了。出门后，我问他：‘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你怎么来了？’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

井冈山是处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的一块红色区域，到处是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加上敌人封锁，外面的消息很难听到。这对党制订方针政策、部队行军作战是不利的。毛泽东非常重视各方面的消息来源，尤其是报上披露的新闻。但在井冈山，要看到报纸很不容易，贺子珍担任秘书工作后，就把搜集报纸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能够搞到尽量多的报纸供毛泽东阅读，她煞费苦心。

毛泽东看报看得很仔细。对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他常常在上面打个记号。贺子珍等别人都传阅了，再按照毛泽东作的记号，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起来，以备随时翻阅。

有时候，毛泽东特别忙，或者有事外出了，没有看报，贺子珍就把新到的报纸仔细看一遍，把那些她认为重要的圈出来，在重要的句子下面打上红杠，供毛泽东阅读时参考。1928 年 5 月中旬，毛泽东派三十一团一营袭击湖南茶陵的高陇镇，专门夺取几大捆报纸。贺子珍夜以继日地进行分类整理，重要的还剪下来，提供给毛泽东及前委、军委其他领导看。

除了搜集、整理报纸，贺子珍经常还是毛泽东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听众和抄写者。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伏案读写到深夜，甚至到天明。这时，贺子珍就坐在一旁，陪伴他，或抄写、或看书、或讨论。贺子珍对井冈山一带情况比较熟悉，因此她经常还是毛泽东作调查的第一个对象。毛泽东写文章时，觉得有什么地方还不够清楚，就抬起头来，问贺子珍一两个问题，或核实有关情况。

在井冈山，有文化的妇女干部很少，因此，贺子珍在担任秘书工作的同时，还以普通战士身份和红军中的其他女同志伍若兰、曾志、吴仲廉等一道参加宣传。她们自编自演的一些文艺节目，很受战士和群众的欢迎。龙源口

大捷后，她们在群众中演唱的《打垮江西两只羊》在井冈山地区广为流传，影响至今。

井冈山的生活是艰苦的。贺子珍和毛泽东同所有战士一样，分一点伙食尾子，吃一样的饭。毛泽东酷爱吃辣椒，贺子珍有时为他从老乡那里买到一点，就是奢侈品了。那时由于蔬菜吃得太少，毛泽东大便干燥秘结，拉不下来，腹胀难受。贺子珍步行 40 多里，向医生借了个大便通气管，把肥皂放在温水盆里，像磨墨一样在脸盆四周磨擦着，直到把它全溶解了，然后用管子插入肛门，把肥皂水灌进去。用这种办法，缓解了毛泽东的便秘。

毛泽东白天爬山察看地形，晚上听取汇报，深夜还要写文件，一天只睡几小时，饮食又太差，头发长，颧骨突出了。贺子珍把警卫员和勤务员召集来，要大家想办法，出主意，改善毛泽东的生活。随后又身体力行，不是摸田螺，就是抓鱼虾，使毛泽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能尝到点荤腥。

从 1929 年初起，毛泽东一直率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等地转战。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一度离开红四军前委的主要领导岗位，加上鞍马劳顿，就住在龙岩的苏家坡，一边休息，一边指导地方工作。贺子珍虽然自己产后身体也很弱，但还是全力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她目睹山区群众生活困苦、文化落后的状况，就尽自己所能地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她还自告奋勇地筹办起苏家坡小学，在那里授课。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战斗频繁，你不用跟着我转来转去了。现在有了一点条件，你去学习一下吧。”贺子珍高兴极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她进了福建上杭的师范学校。

在这里读了一年左右，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她回到总前委，跟随着毛泽东进行反“围剿”的战斗。

1930 年 9 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回师江西，一举占领吉安市。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从兴国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妹妹贺怡、父亲贺焕文、母亲温土秀等从吉安陂头步行 40 余里也赶到了吉安城。为了庆贺全家的团圆和打吉安的胜利，贺子珍亲手炒了几个菜，吃团圆饭。贺子珍向父母介绍了革命形势，动员父母参加革命。贺子珍的想法，得到担任赣西特委委员的妹妹贺怡的同意，也深得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建议贺焕文不必跟部队上前线，可在后方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贺焕文夫妇听从女儿和毛泽东的意见，毅然决定参加革命。贺子珍找赣西特委负责人刘士奇商定，让他父亲担任赣西特委后方办事处主任的职务。温土秀则协助丈夫管理仓库、钱物。事后，她回到总前委，跟随着毛泽东进行反“围剿”的战斗。

第三次反“围剿”的一次战斗，在兴国县的高兴圩进行。一颗炸弹在贺子珍及古柏的夫人曾碧漪身边爆炸，两人当时都失去了知觉。等她们苏醒过

来赶上队伍，已是第二天黎明了。毛泽东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诙谐地说：“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弹炸死了。我还打算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你们这是人回来呢，还是鬼回来了？”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贺子珍说：“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平安回来了。”事后，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还以为这回连你的尸首都找不回来了。敌人要是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领赏呀！”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贺子珍随之调任中央临时政府机要科任科长。她既要协助毛泽东抄写文章、整理材料、剪贴报纸、管理文件，又要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工作非常繁忙。贺子珍严格要求自己，很注意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她坚持上下班制度，当日的工作当日处理完，从不拖拉马虎，个人的事情尽量利用业余时间去做。她规定了给小孩喂奶的时间，平时不准保姆抱小孩进办公室。工作之余，贺子珍很关心警卫战士的成长，教他们学文化，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曾深情地回忆：“我从文盲到能识字、到能写书信，到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完全是贺大姐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出来的，没有贺大姐，我陈昌奉就没有这么快的进步！”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盲动主义者的排斥和打击，被解除了在军队的领导职务，心事重重地离开了前线。他到瑞金稍稍休息后，来到长汀红军医院治病，和先期到长汀的贺子珍母子相聚。此时，毛泽东尽管病魔缠身，仍孜孜不倦地坚持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数种好不容易才搞到的马列经典著作。那时，他们的生活很艰苦，连买青菜、豆腐的钱也没有。贺子珍就带着警卫员下田抓泥鳅、拾田螺、挖竹笋、找野菜，想方设法为毛泽东增加营养，恢复身体。闲暇时，贺子珍抱着儿子毛毛和毛泽东一同在野外漫步、聊天，替毛泽东分忧解难，使毛泽东很快恢复了健康。

1933年3月，由于敌机轰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从叶坪搬到沙洲坝。沙洲坝是个严重缺水的地方。毛泽东和贺子珍刚住下，贺子珍就和警卫员吴吉清到村子四周调查群众用水情况，随即开始寻找水源。后终于在离村子四五里路远的鹅公嶺山腰上，找到了一股山泉水。贺子珍同总务厅的同志一起努力，用打通的毛竹做水管，一根一根把泉水引到村里。但是，这股山泉水很小，全村群众加上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人很多，还是不能满足用水需要。毛泽东与贺子珍就找村干部商量，决定在村口打一眼水井。翌日，毛泽东和干部、战士及沙洲坝的群众一道挖井。经过

10天奋战，终于建成一口深两丈的水井，沙洲坝群众从此喝到了清洁甜美的井水。

长征女战士

贺子珍是 1934 年 10 月 18 日得到要长征的通知的。她立刻做紧张的准备工作，一方面清理文件、书籍和文稿，准备干粮，帮助老同志和伤病员做好行军准备；另一方面做好亲属的安顿工作。当时，毛泽东在都指导工作，不在瑞金。贺子珍找到年迈的父母商量，为了轻装转移，减轻毛泽东的负担，决定把父母和小毛托给毛泽覃、贺怡夫妇照管。一切准备就绪后，贺子珍痛别了亲人，随休养连的队伍，踏上了艰难的征程。

长征开始时，贺子珍怀着身孕，身体瘦弱，脸色苍白，行走艰难。组织上为了照顾她，没有让她当政治战士，有一段时间还分配给她一匹骡子。但是，她很少骑，经常把牲口让给伤病员，自己却咬着牙跟着队伍行走。当时缺粮少药，贺子珍不搞特殊，严格要求自己，对休养连的老同志董必武、徐特立等处处予以关照和尊重，弄到什么吃的总是先给老同志多分一点。部队到达毛儿盖时断了粮，吃野菜充饥。前面部队打到一头牦牛，送给中央纵队的领导同志。毛泽东指示把牛皮剥下来煮野菜吃，把牛肉送给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和伤病员。干部休养连为照顾怀孕的贺子珍，多分了 2 斤给她。她知道后，心里很难过，认为老同志应该多分一点，自己年轻应该少吃一点，她把多分的 2 斤牦牛肉退回给了司务长。

长征途中，她经常牵挂着毛泽东。毛泽东指挥部队走在前面，她跟着休养连走在后面，见面机会不多。队伍一宿营，她常常抽空来到毛泽东的驻地，帮他抄写电报、整理文件。农村的住房十分简陋，每次队伍停下来，为毛泽东准备办公的地方，都很费周折，有时连门板都借不到，只好把两个铁皮文件箱擦起来，铺上条红毛毯，就权当办公桌了。贺子珍帮助毛泽东抄写东西，再要找个桌子，就更困难了。她经常坐在石头上或小板凳上，用膝盖当桌子来工作。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身系全军的安危，任务更加繁重。当时，贺子珍已经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了，但为了照顾毛泽东，保证他集中精力指挥红军，她总是默默地去她能做的一切工作。

在贵州盘县，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休养连遭到敌机袭击，为掩护一位在攻打遵义城时受伤的师政委，贺子珍头部、背部 14 处受伤。

长征路上没有条件动手术，嵌入她头骨里和肌肉里的弹片无法取出，医生只能把嵌在表面的弹片夹出，洗干净伤口，敷上白药，包扎起来。可是伤

口仍然不断血。过了一会儿，连鼻子、嘴里也淌出鲜血，呼吸越来越微弱，脉搏也摸不到了。毛泽民和钱希钧夫妇闻讯立即赶来看望她。贺子珍却艰难地嘱咐他俩：不要把她负伤的情况告诉毛泽东。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散他的精力。你们要向领导反映，为了使部队轻装前进，把我留下。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报告了贺子珍受伤的消息和连里的处理意见。

当时正值红军抢渡赤水河，与围截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迂回周旋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一刻都不敢离开指挥岗位，无法分身去看贺子珍。他马上回了电话，说：“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药可医，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死也要把她抬着走。”他立即派傅连璋医生到休养连来，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抢救。同时，他又把自己的担架调了来，帮助抬贺子珍。

战事稍歇，毛泽东立即飞马来到休养连探望。他快步走到担架前，弯着腰，细细察看贺子珍的伤势。他看到，贺子珍的头部、脖子上和身上，缠满了雪白的绷带，使她的脸色更加苍白了。毛泽东拉着贺子珍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

贺子珍说：“我不能工作，还要让别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我跟连里说了，不要抬我了，把我放到老乡家，等伤养好了，我会找你们的。”

毛泽东替贺子珍拉好被子，劝慰她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会治好的。决不会把你留下，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你安心休息吧！”

后来，贺子珍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到老乡的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候毛泽东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了，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我自己苏醒过来后，怕增加同志们的负担，也曾经多次向连里提出把我留下的意见，他们都没有同意。我这才活过来了。”

弟弟被错杀

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从没有因毛泽东的地位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总是把自己看做是红军中普通的一员。贺子珍有个弟弟，叫贺敏仁。大革命失败后，父母逃离永新的时候，贺敏仁很小，寄养在舅母家里。后来他长大了，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由于秉承了母亲的基因，他像姐姐贺子珍一样，长得十分标致，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长征

的时候，他年纪小，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命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拿去了1000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他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10个铜板。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子珍，反映这个情况，救他一命。但这封信没来得及写。当时那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报告这件事，等批复后再执行。那时候发份电报很麻烦，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报，有时候充电不足还发不出去。总之，发这份电报，延误了些时间。师部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结果，等中央的电报回来，指示要缓期执行时，人已经被枪毙了。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子珍和毛泽东。贺子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但她控制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做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1000多块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有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拿的是铜板，100个铜板也就值1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后来重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贺子珍态度很平静。她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先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时期，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生活起波折

红军长征达到陕北后，中国的政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贺子珍也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她不愿意当家属，也不满足于在毛泽东身边做点秘书工作。她有她自己的考虑。她同毛泽东结婚多年，一直担任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支持毛泽东的工作，照顾他的生活上了。如今，

形势发展了，需要有更多的干部独立担当起更重的担子。有着强烈事业心的贺子珍，希望能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做更多的工作。

组织上了解她的心情，在她随毛泽东东征回到瓦窑堡后，把她分配在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担任科长。发行科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印制在根据地通行的苏维埃纸币。

1936年冬，贺子珍在保安生了一个女孩，即娇娇（李敏）。1937年初，她们随毛泽东离开保安迁居到延安凤凰山北边的一孔窑洞居住。毛泽东对这个小生命十分喜爱，贺子珍却满面愁容，引不起一点兴趣。此时她想的，不是享受做母亲的欢乐，而是工作。她觉得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妨碍了她的愿望的实现。因此娇娇生下刚4个月，她就把孩子送到了老乡家，自己进抗大学习。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要学习马列，学政治，学军事，每天清晨还要出操。贺子珍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抗大的学员集体住宿。这时，贺子珍的家已经搬到凤凰山下一家老乡的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坚持过集体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家庭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夫妻间原来非常融洽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和中心，它像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吸引着大批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给延安带来了生气。毛泽东是个博学的人，对许多问题都有兴趣，他很喜欢同这些知识分子交往。他在这种交往中得到启示，获得知识，也感受到很大的快乐，而与妻子贺子珍的情感和思想交流，却自觉不自觉地减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贺子珍产生了孤独的感觉。她的文化程度比毛泽东低，这样的精神生活，这样的思想交流，过去在她和毛泽东之间，虽然不是很多，但总是有的。而现在，同别人相比，就显得过于少了。这种状况的发生使贺子珍很苦恼。

本来，夫妻间产生一些误会，只要双方冷静下来，把事情解释清楚，误会就可以冰释。可是贺子珍却不，她的性格十分要强，她把这些痛苦埋在心底，在思想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在那些日子里，她想得很多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要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那些该死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多么想动手术，把这些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可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转赴上海取出弹片。就

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这更坚定了她要走的决心。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她。他知道，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就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说这番话时，充满了感情。接着，他又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然而贺子珍毕竟是贺子珍，她虽然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长期的战争生活，也锻炼了她坚强的性格。当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曾与她大吵过一顿，事后还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如今贺子珍又拿出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孩子托付给奶母，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时间是1937年底。

贺子珍到了西安，抗战的形势已发生变化，上海沦陷了，她便住在西安。毛泽东托人捎口信，请贺子珍回延安去。毛泽东还给她捎来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来了他想互相谅解的希望。贺子珍投桃报李，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床新被，送给毛泽东，人却继续留在西安。

贺子珍在西安一住几个月，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得到了启示：上海去不成，可以去苏联。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以后又到了新疆，住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市）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了口信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来。贺子珍没有理会这个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好机会，可是贺子珍没有动。她在新疆住了几个月，终于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走了。

当时，贺子珍一心一意想的是要治病，似乎没有估计到这次行动以后会有什么不幸恶果。后来她追悔道：当时真该听主席的话。到苏联后，主席还给我写了信，拍了电报，要我回来，可我没有回来。

在苏联的不幸遭遇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时，已经是1938年春了。她进入苏联的东方大学学

习，一边学习一边治病。她怀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信中没提及他们间的别扭。

她旅途的困顿还未消除，就匆忙地跑到医院，要求动手术取出身上和头上的所有弹片。医生仔细作了检查，发现深嵌在她头部、背部和肺部的弹片，已经被头骨、肌肉和肺叶包住，长在一起，不可能也不必取出。这就是说，它已经成为贺子珍身体的一部分，她必须长期忍受弹片留在身上所带来的痛苦。这些弹片，直到贺子珍去世，始终留在她的头上和身上。

贺子珍到达苏联不久，就生了一个男孩。满月以后，她把婴儿送进婴儿室，自己仍回到东方大学，开始了紧张而新鲜的学习生活。

她到苏联不久，毛泽东发来一份电报，仍然是请贺子珍回延安来。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请她回去。这时，贺子珍同毛泽东怄气的情绪早没有了。她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自己既然已经来了，学习也已经开始了，怎能有头无尾半途而废呢？怎么也要把这期课程学完了才能回去。于是她提笔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上说，在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不可半途而废，要等两年后学成再回来。这封信的语调是和解的、诚恳的。

这封信发出后， she 就把这件事丢在一边，专心学习起来。

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头上。

她在莫斯科生的那个男孩，在 10 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婴儿室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来得及送医院抢救，就夭折了。

贺子珍感到万分的悲痛。她觉得，孩子的死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那几天，孩子已经不大好了，她怕影响学习，舍不得请假，仍然把他送到婴儿室去了，没想到竟耽误了治疗……她流着擦不干的眼泪，把孩子送到莫斯科郊区的一座公墓，埋葬了。

她正沉浸在丧子的哀痛中，国内又传来了消息：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这真是个晴天霹雳，把她从迷蒙中震醒。直到这时候，她才明白，自己一时的轻率行动，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她将永远失去毛泽东。

为了安慰贺子珍，经毛泽东同意，1940 年，4 岁的娇娇从延安来到莫斯科。

两年的学习生活很快要结束了。她的同学高高兴兴打点行李，准备回国。贺子珍万分地犹豫。按说，她出来学习，不正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去，更好地工作吗？但是，她已经没有家了，她将何所归呢？再说，她能够坦然地面对毛泽东另有爱人的现实吗？

贺子珍终于决定留下来。她在苏联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教在那里读

书的孩子学习中文。不久苏德战争爆发了，留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都疏散到苏联东部的伊万诺夫城，国际儿童院也搬到那里。贺子珍、毛岸英、毛岸青，还有刚刚送到苏联来的娇娇，都转到这里来了。

为了抵御侵略，苏联一切转入了战争的轨道。苏联共产党要求，所有旅居苏联的外国同志都要支援前线。东方大学已经停办，生活费也停发了，每个人都必须用劳动所得去购买分配的食物。贺子珍接受的任务是替红军打毛衣、织袜子。冬天，在零下 30℃ 的严寒日子里，没有暖气，没有烧炉子的劈柴，甚至连火柴都很紧张，每天只发几块黑面包。在这种情况下，她和娇娇相依为命，不仅顽强地活下来，而且还用节省下来的食物尽量照顾在苏联读书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贺子珍每天织几双袜筒子送到厂里去换卢布，一点点积蓄起来给毛岸英买书，给毛岸青买铅笔、纸张和笔记本。贺子珍把岸英、岸青兄弟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为了填饱肚子，贺子珍不得不在劳动之余，开荒种菜。她种了苋菜、菠菜、胡萝卜、土豆、黄豆等。

后来，由于娇娇生病，贺子珍便把孩子从儿童院接回家来自己护理。孩子刚能下地，国际儿童院女院长就要贺子珍去工作，并把娇娇送回儿童院去。贺子珍看到女儿的身体还不好，没有同意，两人为此大吵起来。院长一怒之下，把一张贺子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报告，送了上去。不久，一辆漆着红十字的汽车，强行把她拉进了伊万诺夫市的精神病院。这家医院把她作为精神病人来治疗，每天强迫她服用各种药物。开始，贺子珍对孩子们还牵肠挂肚地想念，情绪平静不下来。服用了大量药物后，她这种对儿女思念之情，变得淡漠了。她觉得自己的神经被一种什么东西抑制住了，麻木了。她的脑子也变得空虚起来，过去的一切喜怒哀乐都变成那么模糊，那么遥远，那么不值得为它动情。她成了一架只会吃饭、睡觉和没有思想的机器，而这一切，正是精神病院所要求病人的。

贺子珍在疯人院住了好几年，直到 1946 年王稼祥和其夫人朱仲丽到莫斯科治病，无意中获悉了她的情况，几经努力才把她救了出来。关于这件事朱仲丽回忆说：“从留学生的谈话中，我们得到了贺子珍同志的下落。……后来被关在伊万诺夫城的疯人院，身边还带着一个 7 岁的女儿——娇娇。她与亲人断绝来往，独处异国……我们听到她被关在伊万诺夫城的疯人院这个消息，心头像受到雷击一样难过。罗荣桓同志和王稼祥同志更是关心贺子珍同志的遭遇。由于王稼祥曾一度担任过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与苏共上层人物很熟，并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在他的努力下，苏联政府才同意贺子珍从伊万诺夫疯人院回到莫斯科。”

在疯人院的几年，贺子珍已彻底绝望了。她恐怕想也没有想到还有重获自由之日。朱仲丽对贺子珍从疯人院出来后的情况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们第一次见到贺子珍同志是在共产国际大厦旅馆。那天，贺子珍同志身穿一套灰黑色花格子西装，戴着一顶深蓝色的法兰西帽。我们发现她讲话有些迟钝。她见到王稼祥同志时，脸上露出极其兴奋激动的神情。她好像有满腹的话要说，但是刚刚恢复自由，又有许多疑虑，我们问什么，她才回答什么。我们告诉她，以后就在莫斯科检查身体、治病，不再回伊万诺夫城了，她这才显得十分愉快的样子。后来苏联政府给她分配了新的住房，她的身体逐渐恢复了健康，神经也正常了，情绪比以前好多了。女儿娇娇也变得挺活泼，有说有笑了。贺子珍同志像一只关在笼中的小鸟，这时被放出来，自由飞翔。大家对她们母女的得救非常高兴。”

王稼祥把贺子珍接出来之后，便打电报给毛泽东，把贺子珍母女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可以带她们回国。

毛泽东很快回了一份电报：“同意回国。”

重返祖国

1947年夏天，贺子珍带着女儿，在阔别祖国9年以后，踏上了归程。列车到达哈尔滨，李富春等人前来接站。他们把她安排到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又把她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工作。

回国以后，贺子珍十分惦念自己的哥哥和妹妹，还有年迈的父母，不知他们的景况如何。恰在这时，她哥哥贺敏学的妻子李立英，带着5岁的女儿贺小平，前来哈尔滨看望贺子珍。

李立英是一位长得文静秀气的新四军干部，为人爽直、热情。贺子珍一下子就向她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在那些日子里，她们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常常是联床夜话，一谈就是一个通宵。

从嫂嫂处，贺子珍知道了不少父母及兄妹分手后的情况。

听到哥哥、妹妹为革命出生入死的悲壮经历，贺子珍落泪了。她为自己兄妹的英雄行为而自豪，也被他们刚强的革命意志所感动。

不知为什么，此时贺子珍产生了给毛泽东写信的念头。她摊开信纸，思绪翻滚，从何写起呢？一别9年，两个人都饱经沧桑，她有多少话要说啊！她在信中写道：主席，我已经回到祖国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9年，对国内现在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联的日子，比在长征时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我正在学习做工会工作。最后她写道，我很感谢你对我母

亲和妹妹的照顾，代我尽了做女儿和姐姐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贺子珍的信写好后，娇娇也用俄文给爸爸写了一封信。贺子珍把两封信装在一个信封里发出去了。

毛泽东没有回信，却打了一个电报给娇娇。电报是这样写的：

娇娇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好女孩。爸爸很好。

大约过了一个月，毛泽东派人把娇娇接到北平香山，让她在自己身边生活、读书。

孩子一走，贺子珍感到自己身边是那样的冷落。在苏联的那段生活，使她害怕孤寂，她喜欢人多，喜欢热闹。于是，她提笔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信里写道：娇娇、岸青到你那里去了，我一个人感到很寂寞。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他们教育好的，这不用我说。我的工作很好，身体好一点，请你多注意身体。

毛泽东没有回信。但贺子珍很快收到娇娇的来信。娇娇写道：

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爸爸这里很好。你想念我吗？我也想念你。爸爸问你好，希望你保重身体。

从延安时候起，许多干部就有周末跳交谊舞的风气，哈尔滨也有此风，贺子珍偶尔也去光顾，婆娑起舞，风姿不减当年。

贺子珍家庭发生变故后，在苏联的同学中，有人对她表示过倾慕之情。这次回国后，仍有人希望能获得她的爱情。但是贺子珍都婉言拒绝了。

1949年，毛泽东从西柏坡迁居石家庄。他在这里见到了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两个人谈到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贺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到哈尔滨去接姐姐。她们乘坐的火车，到了山海关，上来两个人，自称是组织上派来的。他们说：“你们不能进北平，只能南下，到你哥哥那里去，这是组织决定。”贺子珍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有人从中阻挠她和毛泽东的重逢。她沉默着，没有说话，贺怡为姐姐力争，但这个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她们只好来到上海，住到哥哥贺敏学家里。后来贺子珍到杭州接受谭震林的安排，担任市妇联主任的职务。

1950年，贺子珍同兄嫂联名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谈了他们三人

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很快回了一封信，写道：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在信中表达的意思，贺子珍完全领会了。她要回到毛泽东身边的愿望不能实现了。

隐居上海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正在上海哥哥家里休息。收音机里播送着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录音，贺子珍听得发呆。毛泽东的声音给她的刺激太大了！她原来已经愈合的心灵的创伤，又重新裂开，在不断流血，终于病倒了。

贺子珍生病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他知道贺子珍为什么生病后，流下了眼泪。他提笔写了第二封信，叮嘱贺子珍要好好吃药，不要抽烟，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不久毛泽东又派娇娇到上海来，代他探望贺子珍。临行前，毛泽东对娇娇说：你告诉上海的组织，妈妈病了，请他们多照顾，带她去治病。但不要说，她是因为什么生病的。

贺子珍看了信后，病情竟慢慢好起来。她也肯吃药，也肯看病了，还把烟戒了。

那时候，每当放寒假，毛泽东都打发李敏到上海去看望妈妈，同妈妈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女儿一年一次的来往，很自然地成为爸爸和妈妈之间情感交流的桥梁。毛泽东从李敏的嘴里，知道贺子珍病了，不肯就医服药，就写信去劝慰贺子珍一定要听医生的话，按时服药，还为贺子珍在北京寻找治病的良药。每次李敏返回北京，贺子珍也总要让李敏给他们一家人带点东西。

李敏发现，她每次来到妈妈的身边，妈妈除了打听她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外，就是详细询问爸爸的身体及起居情况。当她知道毛泽东身体很健康，工作很忙，还常常抽出时间同李敏谈话，过问她的功课，亲自书写字帖让她练毛笔字，欣慰地笑了。妈妈了解爸爸的情况，真是不厌其烦，也从不嫌啰唆，问过的事情，她会再问一遍；李敏讲过多次的话，她听起来仍津津有味。但她很少同李敏讲过去她同毛泽东一起生活的情形，更不讲对毛泽东的思念。她这样做，可能是怕李敏的情绪因此受影响，给毛泽东家庭生活的和谐带来阴影。毛泽东则不同了，当他同李敏单独相处的时候，喜欢同李敏谈她的妈妈，毫不掩饰对贺子珍的怀念。

有江青在身边，毛泽东同李敏不能随便谈论贺子珍，这竟使父女俩发展了一个共同的爱好：爱玫瑰。玫瑰的瑰字，同贺子珍的原名桂圆的桂字是同音。在谈到玫瑰的时候，他们都心领神会。李敏在自己住房的前面种了许多

玫瑰花。毛泽东有空，就同李敏一起侍弄这些玫瑰。毛泽东送给李敏两个碟子，碟子上画着两朵盛开的黄玫瑰。李敏把它们珍藏起来，舍不得使用。

每次，毛泽东从李敏那里听到贺子珍生病的消息，都非常难过。他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为贺子珍寻医找药，还亲自写信给她，劝她听医生的话，积极治疗，按时服药。说也怪，对生活感到绝望、对自己身体毫不爱惜的贺子珍，每次收到毛泽东的信，都会改变态度，药也肯吃了，情绪也好起来了。毛泽东在李敏面前，毫不隐讳他同贺子珍之间这种斩不断、扯不开的情谊。他对李敏说过：

“我知道，你妈妈生病都是为了我，都是因我而起，只有我才能治好她的病。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李讷已经 18 岁了。”

贺子珍怀着一种良好的愿望，满心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幸福、快乐。只要江青能体贴、关怀毛泽东，她就感到无限欢喜，她甚至用宽容和大度对待江青对她的诋毁和中伤。贺子珍还嘱咐女儿，要她同江青和睦相处，不要让爸爸为难和心烦。

但是，当她听到江青同毛泽东分居的消息后，对江青的态度就完全变了。她开始觉得江青冷酷无情。她忘记了自己的哀愁，却为毛泽东生活的孤寂而忧愁了。她常常对李敏说：“你的爸爸也是很孤苦、很寂寞的，你要多体贴他。”

毛泽东也不时地给贺子珍捎点东西，有吃的，有用的。他知道贺子珍烧坏了一台收音机，就买了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送给她。有一次，毛泽东还捎来 1000 元钱。毛泽东劝贺子珍戒烟，可是有一回，外宾送给他一条国外的名牌香烟，他打开了一包，抽了一半，突然想起贺子珍爱吸烟，就把 9 包没开封的烟，连同抽过的那半包，一起包好，托人送给贺子珍。贺子珍收到这些烟后，原来已经戒了烟，又抽了起来。

看到毛泽东捎来的东西，贺子珍情不自禁给毛泽东写了第四封信，信里写到自己对他的思念，又叮嘱他要防止像王明那样的人害他。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给贺子珍写了第三封信。信上说，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那样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贺子珍也常常通过李敏，给毛泽东捎东西。毛泽东是湖南人，爱吃南方的青菜，贺子珍就让李敏把南方鲜嫩的青菜捎给他。有一次，贺子珍还给毛泽东捎了一个很精致的骨雕耳挖子。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这个习惯，贺子珍记住了。

生命的终结

1959年，贺子珍正闲居南昌。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请她上庐山。她还以为是让她去那里休养呢，就随着派来接她的汽车走了。汽车开到九江，立即上山，到达宾馆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

她被领到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竟是毛泽东。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看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

毛泽东看了，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他问道：“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了？”

接着，毛泽东详细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一一都说了。毛泽东听了以后，轻轻地吸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凄然。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第二天早上，贺子珍在自己的房中，等待和毛泽东的第二次会面，忽然有个工作人员进来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了，请你也马上下山。”

为什么分手如此突然？连告别的话、互相叮咛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诉说一句？

原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见贺子珍的时候，江青正在杭州。那天夜里，她突然来了个长途电话，说她第二天要来庐山。毛泽东怕发生什么意外，连忙让贺子珍下山了。

见面突然，分离更突然。20多年所盼望的相逢就这样结束了。大喜变成了大悲，她经受不住感情上的这种起落，又一次病倒了。

在1976年3月6日和7日的台历纸上，贺子珍用毛笔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这就是她长期以来悲怆心情的真实写照。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女儿娇娇和女婿孔令华怕老人经受不住这个打击，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守候在她的身边。可是贺子珍却表现得异常的镇静。饱经忧患的她，已经变得更刚强了。她没有流泪，只是哀痛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没有照顾好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

她派侄女贺小平、外甥女儿贺海峰，代表她到北京奔丧，在毛泽东灵前献上心香一瓣。

江青倒台后，贺子珍满怀希望向往着未来。1977年，她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政治舞台上露面，引起国内各界人士和海外的极大关注。正当她准备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发挥余热时，突然在生活上又遇到了新的挫折。1978年的一次中风后，她得了偏瘫症，从此缠绵病榻，卧床不起。

1979年9月6日，毛泽东逝世3周年前夕，党中央用专机把贺子珍从上海接到北京，使她在全国解放30多年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第一次踏上首都的土地，第一次用自己的双眼，而不是通过电影或电视屏幕，看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巍峨的人民大会堂。9月18日，她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她在毛泽东的坐像前，献上了一个1.5米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她是无愧于毛泽东战友的称号的。

1984年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4月19日逝世的消息。当天，北京各家报刊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这则电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

从这则消息上看到，贺子珍的遗体告别仪式是简朴的，也是隆重的，规格很高，党中央的许多负责人都送了花圈。

在贺子珍遗体火化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往北京。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到北京，把它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终于走完了她那一生坎坷不平的路。当家人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一张1951年发给她的“三等甲级”革命军人残废证。按照规定，她每年可以领取330元的残废金。但在残废证领取款项签名栏内没有一个字迹。从1951年至1984年的34年间，她应当领取残废金11220元，但她却分文未取。

贺子珍去了，带着满身的创伤和疤痕，她留给后人的只有那么一张记载

着她一生荣誉和清白的革命军人残废证。

妻 子 江 青

江青，1914年生，又名李淑蒙、李云鹤、蓝苹、李进。1938年秋在延安和毛泽东结婚。生有一女，取名李讷。

江青原籍山东诸城县，其父李德文是当地的一个小业主，其母是李德文的妾。江青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

频 繁 婚 变

1928年，14岁的江青（当时名李云鹤）就离开了老家山东诸城，独自一人跑到了济南谋求生活。在济南，她进了由赵太侔、王泊生等主办的山东省实验艺术专科学校，学演京剧、话剧等。

1930年下半年，地方行政当局砍掉了山东省实验艺术专科学校的预算。刚刚受过一年半训练的学生们，不得不面对朝不保夕的残酷现实。有少数学生被北平的戏班聘去，另外一些学生在比较现代的上海电影界找到了差事，多数学生则放弃了艺术，另谋高就了。

王泊生带着李云鹤和其他几位学生去了北平，成立了一个“歌咏团”，帮各位学生到剧院、剧团里找了一些小角色。尽管角色很不起眼，但由于地方口音、地方剧做派一时改不过来，李云鹤的扮演很不成功，观众不认可。于是她又回到了济南。

1930年底，她第一次结婚。丈夫姓费，是济南一位商人的儿子。婚后因家庭关系不和，不久她离开了费家。

1932年，李云鹤来到青岛大学，她一面听课，一面工作，在图书馆当管理员。在这期间，她和青岛大学的学生、中共党员俞启威结合了。

俞启威是青岛大学共产主义小组中的宣传部长，经他介绍，李云鹤进入了“共产主义文化阵线”的圈子。“九一八”事变，她参加了“反帝联盟”，以戏剧为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李云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7月，俞启威被捕了。国民党没有捉到李云鹤。之后，组织安排李云鹤去上海找田汉、周起应（周扬）。

1933年7月，李云鹤改名叫张淑贞，第一次来到上海，但她没有找到田汉、周起应。她在上海陶行知办的一所学校里谋到了一个教师的职位，很快地又成了“左翼教联”的一员。在参加演出活动中，导演给她取了个艺

名：蓝苹。

业余剧团的演员演技平平。顾而已和赵丹看了演出，发现那位带有山东口音的女演员不一般，对白、动作处处显出受过专门训练。一打听，女演员叫蓝苹。国民党警察也同样注意到这位不一般的女演员。经查，蓝苹就是张淑贞，张淑贞就是李云鹤。

于是，她被捕了，两个月后方由上海女青年会负责人保释出狱。

1935年4月，蓝苹进入了电通影片公司，参加了《自由神》、《都市风光》的演出。在《都市风光》里，蓝苹扮演一位知识青年的女友，唐纳则扮演那位知识青年。1935年冬天，电通影片公司歇业，翌年（1936年）蓝苹转到联华影片公司。靠山东实验艺专的同学魏鹤龄引荐，她如愿以偿地担任了话剧《娜拉》的主角。接着，蓝苹又在《大雷雨》中担任了主角。

她获得成功，赢得了掌声喝彩声，头像和芳名出现在大报小报上。其中捧场最卖力的，要算唐纳了。

唐纳本名马骥良，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能著能译能评能编还能演。不久她和唐纳相恋了。1936年两人结婚。此后，江青掀起几次情海风波，闹得唐纳死去活来，几度自杀，一时成为30年代文艺界的奇闻。最后，两人终于分道扬镳了。

接近毛泽东

1937年8月下旬，江青从上海到武汉，然后从武汉到西安。江青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

1938年1月，刚刚抵达延安的上海救亡演剧队和已在延安的戏剧工作者合作，联合演出了《血祭上海》，该剧本是由沙可夫、任白戈、左明三人创作的，演员有孙平、孙维世和蓝苹等人，蓝苹只是第二女主角，饰演二姨太。演出完毕，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了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蓝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酒席间，毛泽东提议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成。

蓝苹顺利地进入了“鲁艺”。在“鲁艺”她既当教师，又当演员。毛泽东和其他一些党的重要领导人经常去“鲁艺”讲课，这样蓝苹终于接近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文艺工作非常重视，认为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在战争年代，革命的文艺作品能够起到宣传、教育群众，团结、鼓舞广大人民同敌人进行斗争的伟大作用，因而他经常去“鲁艺”给学员们讲讲课。有一天，毛泽东又到“鲁艺”讲课来了。蓝苹故意地坐在前排，她一会儿点头微笑，一会儿

又凝神沉思。毛泽东讲课结束后，她提了几个很幼稚的问题，而且跑到前面跟毛泽东讲了几句。

以后，她又几次到毛泽东办公室窑洞请教问题，逐渐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此时贺子珍远走已有半年多了，毛泽东几次劝不回来，于是便同江青（由蓝苹改称）结为夫妻。

1938年8月，蓝苹接到调令，从“鲁艺”转到毛泽东办公室附近，任军委档案秘书。他们还搬了家，由凤凰山迁到杨家岭的三间新窑洞里。窑洞在山脚下，砌上了石头，刷上白灰。前面是木结构，窗上糊纸，可以透进少量阳光。门外有一小块碾过的地，摆着简单的桌子、石凳。三间房分别为会客室、毛泽东书房兼卧室、江青卧室。地上铺砖，桌椅是木料的，甚至没有油漆。房内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江青开始随毛泽东过上简朴的生活。

四次赴苏

很长一段时间，江青的工作主要是照料毛泽东的饮食起居。根据曾在延安会见过毛泽东的外国朋友贝兰特、卡尔逊、福尔曼、汉兹·希伯、谢伟思、包瑞德、符拉基米洛夫等的回忆，他们不记得在毛泽东会见他们时，江青有什么插言，连礼节性的应酬都很少有。特别是1940年李讷出生后，江青连露面都很少了。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党中央机关从农村迁到城市。进城后，江青不愿继续过艰苦奋斗的生活，重新恢复她过去羡慕、追求的上海十里洋场的生活方式。她不仅讲究吃穿，还经常小病大养，借机游山玩水。本来，她患的都是常见病，国内完全能治，而且对她的医疗保健已经是国内最好的，但她仍不满意，大惊小怪地非要到苏联去治疗。

江青初去苏联是1949年4月。经医生检查她只是官能性神经过敏，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况，不必住院，只需疗养一个时期就可以了。她到海滨索契等名胜疗养地度夏之后，于当年秋天回国。

二次去苏联是1952年8月。因为上半年参加武训历史调查下乡两次，她认为是工作太累引发了慢性胆囊炎。这次去做胆汁引流，又去黑海做矿泉理疗，还割了扁桃腺，过了第二年的春天才返回北京。

1955年7月，江青第三次到苏联。之前的体检发现她有妇科病。她得知后，不顾盛夏，急忙飞赴苏联，苏联医生作了检查，表示尚需观察等待一段时间。这时，她又返回国内，召集不少名医会诊。然后，先由妇科大夫将她的病历和病理切片送往苏联，自己则半月后再动身。这次是她四去苏联了。住到1956年春天，直到妇科病完全治愈及慢性胆囊炎彻底消失，方才

归来。

江青前后四次去苏联，除了医院和疗养所之外，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别墅。随从有医务人员、警卫员、厨师、司机等。她的私人秘书和翻译，原有一中一苏两人，她尚嫌不够，后来又分配来一名留学生。她在所谓的休养日子里，大半时间是看欧美影片，由译员在旁边专为她翻译解说。此外就是玩照相机，或叫人陪着打牌、跳舞。她吃腻了俄国菜，竟要从中国国内将蔬菜、水果用专机运来。然而她还不称心，认为长久以来没有得到苏联高级领导官员的接见，是对她的很不尊敬。

1953年春天，中国有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团员中有“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这引起了江青的兴趣，叫秘书通知大使馆要程砚秋来别墅做客，但再三关照不能让外界知道。

程到达后，江青独自在客厅接见。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艺术自创一派，我和主席都很欣赏，我懂一点京剧，常向主席介绍你唱功的独到之处。程砚秋表示感谢，并说希望今后多多帮助他提高政治思想。江青又说梅派保守，程派革新。这使程砚秋十分不安，回答说梅兰芳是我的老师，无论唱做都在我之上，是不好比的。江青又说她最爱听程的《荒山泪》，机会难得，请程表演一段。

程砚秋碍于情面，不得不清唱起来，江青听得出神，竟忘乎所以地跟着和唱。别墅里的苏联人听到中国戏，尤其是一个高大汉子唱着少女柔软的歌声，极为新鲜。警卫员便站在门外不再走开，管家主妇装着拿点什么送点什么的，一再进来偷眼瞟看他们。

程砚秋唱完当即告辞，江青送至门口。程砚秋登上汽车离去，江青返回房就责怪秘书为什么不把房门关紧。

江青在苏联期间，曾参与过一些外交活动。1949年刘少奇访苏，当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苏方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也请江青参加了这次会见，不过主要是斯大林同刘少奇对话。后来大家鼓动江青给斯大林敬酒。斯大林看江青很年轻，怕她应付不了这个场面，便离座在厅中走动。其实江青并不怯场，她站起来，举起酒杯，不慌不忙地说：“我举杯，向斯大林敬酒，希望斯大林健康长寿！斯大林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斯大林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们的幸福！”

1956年初春，江青接到4位苏联领导人夫人的宴会请帖，她们是赫鲁晓娃、莫洛托娃、马林柯娃、卡冈洛娃。宴会设在克里姆林宫一间中型客厅，江青由刘晓大使的夫人陪同赴宴。

先是一般礼节性的交谈，主人问过江青的健康情况之后，话题就扯

开了。

马林柯娃对江青说：“听说你拍过电影，很能演戏，我们欢迎您到这里的电影学院继续深造。”

江青冷冷地回答：“谢谢，只怕我的身体不再允许我当学生。”

马林柯娃又问：“您多大年纪了？”

“我吗，不大不小，40岁了！”江青更加不愉快了。

宴会后，江青一回到别墅，便沉下脸嘟囔起来：“太轻视我了，我的身份地位明明摆在这里，怎么还要我去当一名普通留学生。西方的礼节是不能当面随便问年龄的，真粗鲁！”

刘晓夫人说她们不是也称赞你文化高，有修养，风度好吗？江青转怒为喜，笑道：“他们当领导夫人的没有这点眼光还行？”

江青回国后，继续过着休息疗养的日子，她常喊头疼或肚子不舒服，出门坐汽车要用枕头垫着腰背，走路由两个人搀扶，还怕路不平。但尽管如此，晚上仍旧看戏看电影，逢有舞会必定参加。

她常离开北京，大致是春天到杭州，夏天到北戴河或青岛，秋天到上海，冬天到广州。她说必须这样安排才能适应她的身体条件。

政治摄影

在“赋闲”期间，江青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有风光照，也有人物照。每到自然、人文风景点，或是毛泽东出席会议的驻地，工作人员都会看到江青端着相机拍照，一副不问政治、野鹤闲云的样子。其实，从她发表的作品来看，她的摄影大有政治意图在其中。

江青搞摄影是从1949年夏在苏联养病时开始的。她逢人喜欢炫耀自己摄影技术高明过硬，说她有一次为了要拍彩霞竟耐心花了20天的工夫。

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了《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首七绝，即：“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她为毛泽东拍摄了许多幅相当精彩的照片。最著名的是毛泽东坐在藤椅上的那幅，题为“冷眼向洋望世界”。

“仙人洞”这幅风景照也是江青的得意之作。1963年这首诗公开发表，被江青当作了粉墨登场的政治资本。

事实上，江青拍照之前，已经了解到毛泽东的诗意，她专门召集了几位摄影家一起研究照片的构思，然后由摄影家们去选定了实拍的地点，还安装了电话专线，一俟景物和气氛符合拍照的设想时，立即请江青前来拍摄。江青到现场，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她瞧瞧取景框，表示满意，便按动快门，拍

几张彩色的，又拍几张黑白的，拍毕扬长而去，由摄影家们收拾冲洗，印放了许多张之后，再请她去选定她认为最标准的一张。

从这张照片的产生过程来看，江青为了得到毛泽东的题诗，的确煞费苦心。但江青最初的用意，主要还不是为了“要扬名”，而是出于极端自私的妒忌心理。因为4年前（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写了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诗，对他早已牺牲的夫人杨开慧烈士表达了高度的赞美和真挚的怀念，江青为此一直耿耿于怀，总是想方设法有朝一日要在毛泽东的诗词里留下自己的名字，决不让杨开慧专美于前。

江青登上“文革”政治舞台后，为林彪拍过不少肉麻吹捧的照片。1971年1月和8月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同时登出她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为总题的13张摄影作品，署名峻岭。每张都是占了全页版面的彩色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林彪正在聚精会神地读红宝书。江青本意是“大树特树”林彪“接班人”形象，不料当广大读者看到林彪“孜孜不倦”的“玉照”时，林彪本人却已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此片反倒成了江青勾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个罪证了。

冰山浮出水面

新中国成立后的10多年里，江青大多在治病疗养、观光拍照，比较清闲。但是，她绝不甘心这种生活。从青少年时代起，她就是一个喜欢出头露面的人，不过那时她的目标是在舞台、银幕上。成为领袖夫人后，她把兴趣逐渐转移到政治舞台上，并且不断为自己寻找机会。

1950年7月11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委员会委员有周扬、陆定一、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文艺界名流。江青也当了个委员。当然她并不想当个徒有虚名的委员，于是试着管点“闲事”。据她自己后来回忆，她曾“力排众议”，不怕“光荣地孤立”，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批判《清宫秘史》”，结果谁也不予理睬，简直气坏了。

1951年5月，毛泽东领导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之后《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组长袁水拍，组员有李进、冯毅之等12人。江青也参加了，并做了一些工作。江青随调查组到堂邑、临清、馆陶等地，搞了20多天调查，起草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初稿。毛泽东对这个稿子作了较多修改。7月11日，毛泽东批示：“胡乔木同志，此件请打印十份，连原稿交江青”。可见毛泽东对江青在调查组里的作用很重视。7月13日，《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

次批判运动，江青虽然没有露名，但她已经摸到日后政治发展的门道。

1954年9月中旬，在治病疗养中的江青突然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谈话，透露了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消息：毛泽东十分赞赏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的两个“小人物”即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这两个“小人物”的文章。

周扬等人听后并不相信，应付了一番，送走了江青。江青天天翻《人民日报》，一个月过去，居然毫无动静。

10月16日，事态发生重大转折：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支持了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信中提及：“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这里所说的“有人”，正是指江青。

10月23日，《人民日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刊登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通过这件事，江青再一次明确了自己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她离政治舞台又近了一步。

随后，她病了。一病就是7年，从1955年至1962年。病中，她只是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样两个空头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

1962年7月6日，江青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觉得大有文章可做，便萌发了再一次爬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野心。

同年9月，她约见中宣部、文化部的4位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跟前两次一样，部长们并没有听进她发出的“警告”。如她所形容的，叫做“充耳不闻”。

正在这时候，她听到柯庆施在上海发出“大写十三年”的崭新口号，与她谋而合，于是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把柯庆施找来，而柯庆施则带来了张春桥。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 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 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 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准则。”柯庆施也接着互相吹捧。

于是 1963 年 5 月 6 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壁辉”。这是江青和柯庆施一起组织，张春桥参与密谋，在上海打响的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

如今，人们一提及“文革”，便会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却鲜为人知。其实真正的前奏曲 是这篇《“有鬼无害”论》。正是《“有鬼无害”论》的成功发表，使江青把她的“争取批评的权利”的希望寄托于上海，这才有了第二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的出笼。

1965 年初，江青和柯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她久想批判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

在柯庆施去世后，以江青为师，以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瞞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瞞上海市委、华东局。直至 1965 年 11 月 10 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雄文”。

关于此文的写作经过，1967 年 4 月 12 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得最为详尽。她以洋洋得意的口气，透露了其中的秘密。

“1962 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 4 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 没有给主席看。”

“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一次北京，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

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江青在讲话中大言不惭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其实，这是她玩弄的政治手腕。她从前两回的批判——批电影《武训传》和批“红学”家俞平伯中，已经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借助于毛泽东的崇高声望，她才能打胜仗。这回批《海瑞罢官》，她又一次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号。

其实，1969年2月3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谈得非常清楚：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突然出现在上海《文汇报》上，陡然在全国卷起一阵狂澜，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引爆点。江青也由此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扶持“样板戏”

这个时期江青的另一项“功绩”，就是所谓抓“样板戏”。

1963年3月22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218号的红都剧场，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感到满意。她从13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

关于这个过程，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为《红灯记》我花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我很多时间。其他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就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他有的剧本，对人物简直有了很大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1963年秋，江青又看中了沪剧《芦荡火种》，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去改编成京剧《沙家浜》。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北京京剧一团排演好《沙家浜》，江青还把演出《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去！

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2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形容，这次观摩演出是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江青同志关怀下”举行的。

在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中，江青走到哪里，张春桥跟到哪里。他把江青请到了上海京剧院，“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这么一来，《智取威虎山》打上了“江记”印戳，成为上海第一出由“江青同志亲手培养的样板戏”。张春桥乐了，上海也终于有了“样板”。

紧接着，1964年冬，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青对张春桥说：“《海港的早晨》也可以改编成京剧嘛！”于是世人又看到了京剧《海港》。

江青抓“样板戏”常常是主意多变，朝三暮四，搞得剧组人员无所适从。经过许多人的努力，“样板戏”总算树立起来了。而她的名声由此大噪。

红 极 一 时

1966年5月4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并决定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布“中央文革”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8月2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这样，江青作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正式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随着运动的深入，1967年1月，陶铸、王任重被打倒了，刘志坚被揪出来了，“中央文革”的阵营改变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到了1967年8月，王、关被捕；1968年，戚又入狱。陈伯达则常称“生病”。于是，“中央文革”几乎成了江、张、姚的天下。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信。信中说：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1966年3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引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

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这封信是写给江青的，正因为这一点，江青得以在 1969 年“九大”上平步青云，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 年夏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篡权阴谋暴露。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同林彪、陈伯达进行斗争。林彪集团被粉碎后，在中共“十大”上，江青再次进入政治局。

毛泽东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是不满的。十届一中全会有人提议让江青当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结果“中央文革”小组的组员张春桥当上常委，而任第一副组长的江青却仍是政治局委员。

“她并不代表我”

1973 年，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让他分担病重的周恩来的工作。

邓小平的复出，对江青的政治野心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意味着她的政治道路从此受阻。江青对毛泽东极为不满，但她不敢、也没有能力直接反对毛泽东，便处处与邓小平作对。

1974 年 3 月，政治局开会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让邓小平去。江青坚决反对。

毛泽东得知这次开会的情况后，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1973 年底以来，毛泽东已多次批评江青，对江青的不满日甚。

1974 年，有一次，江青要见毛泽东。通报之后，工作人员给她送来一封信。内容是：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大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七四 . 三 . 二十

毛泽东已经与江青分居多年。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几年，两人见面不多。江青知道，不能失去毛泽东这杆大旗。凡有事或江青认为应该见见毛泽东的时候，她都要事先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提出申请，得到毛泽东许可方能见面。

这次求见未获批准。毛泽东不愿多见她。

有些事是让毛泽东很伤心的。比如一年前毛泽东允许江青来见他，谁知她来是为了要钱。毛泽东给了她 3 万元。“她看我身体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要夺我的遗产稿费了。”江青走后，毛泽东流了泪。

这个时期，江青对毛泽东一点也不关心，甚至不知道毛泽东的病情。据张玉凤回忆：

“开始，江青与很多当地的领导干部一样，并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的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还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按理说，江青身为毛泽东夫人，又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对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辛苦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谁知江青不仅没有给予鼓励与感激，反扣上这个可以置人死地的帽子。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听了江青的这番话真让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事后，中办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有一天，周总理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一起来的还有汪东兴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

说这些人（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

江青显得很不自在，尽管表现出一副矜持的样子，但她那高傲和主角的气派不见了。毛泽东在当面批评她，“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讲，你也不知道。”毛泽东又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说。看得出，江青说这话是极不情愿的，而且还包含着不满，不仅对毛，而且对邓。邓小平这个人，表面上话不多，但硬得很，在她面前很少退让。难怪毛泽东说他“内部是钢铁公司”。“既然毛泽东这样称赞他，那就把它送给邓小平吧。”

“当众说的！”毛泽东紧跟一句道。

“说了算！”江青也紧跟着回答。

“孔老二讲，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说到这里，对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说：“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不大好的就改！”

“你也是难改呢。”

“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不开就好。”

钢铁工厂不开了，至于帽子店，江青说：“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楚是谁搞的。”

其实，江青完全知道拍这部电影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是周恩来批准来华的。江青的真正用意不是批那个外国人，而是要打击周恩来。现在她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很明显一是向毛泽东告状，二是说给在座的周恩来听。

“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江青又接着说了一句。

其他人都不说话。

最后，毛泽东对大家说：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毛泽东说的“上海帮”即由此而来。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委员们从毛泽东的住处走出来。有几个人的气色不

好，他们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海帮”——毛泽东第一次给这几个人使用了这样一个概念。

“女皇梦”的破灭

70年代中期，在“四人帮”垮台前的二三年间，江青的野心越来越大，已经不满足于“旗手”之称，妄图登上“女皇”的宝座了。

当“批林批孔”进展到“贬儒尊法”，江青的野心已暴露无遗。她刻意褒扬吕后和武则天两位女皇：一个按汉高祖死后的既定方针执政，平定叛乱，扭转乾坤；一个在权变的斗争中，大踏步登上政治舞台，继承发扬唐太宗的法治路线。

江青指令给“御用”的南北写作班子（如梁效、江天、罗思鼎等），要按她手订的调子为吕、武的政绩大造舆论，这样也就为她自己的黄袍登场，吹吹打打，鸣锣喝道起来了。

1974年6月，江青看到《人民日报》介绍历代法家人物的文章中，只将吕后附在刘邦一条之后，便大发雷霆，立即批评报社，提出一定要将吕后专列一条，突出在头版地位。当时有个马屁文人得知此事，赶紧胡诌了一首七绝，其中两句是“众说高祖功业大，赖有吕后智谋多”。

武则天早年为唐太宗才人（小妃子）的时候，太宗有一匹名叫“狮子骝”的马，性情异常暴烈。一天，他问臣下如何才能驾驭，武才人回答，赐我三件武器，我就能制服它。先用铁鞭打马的屁股，再用铁挝（锤）击马的头，再不然就用匕首刺马的咽喉。

江青对武则天这种勇敢的举动赞不绝口，于是江的“御用”文人便炮制了“铁鞭治国论”，借此吹捧江青在“文革”中大嚷“乱吧，乱吧，乱了敌人，乱得好”以及“文功武卫就是好”之类的“无畏”精神。

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时期，报上忽然看不到关于江青的报道，而且写吕后或武则天的文章也沉寂下来。后来才知道，她受到了内部批评。大约她想当“红都女皇”想迷了心窍，搞得太不像样子了吧。可是过了两三个季度。有一天报上又登出江青在大寨田野上头顶草帽手持锄头的照片，原来她在装腔作势地下乡劳动，打发她那避风躲雨的一段日子。照片的登载，大家明白她就要“出山”了，果然随即报上又常常出现她活动的消息。关于吕、武的文章又多起来了。

到了1976年初春，江青在一次有若干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讲话，竟明目张胆地表示：“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

1968年9月，陕西渭县河北河原上的韩家湾公社郎家沟出土玉玺一件，四方形，螭虎（似龙的兽像）纽，四侧刻云纹，高2厘米，宽2.8厘米，重33克，白玉晶莹，制作精工，印面阳刻篆文“皇后之玺”四字。

由于发现玉玺时正值“文革”开始两年，一片混乱声中，并未引起注意，何况当时的许多报刊都停止出版。所以一直到5年后出版的《文物》才有报道，次年（1974年）因吕后成了热门人物，8月6日的《光明日报》副刊《文物与考古》又发表了介绍文章。当日江青便在全国法家著作会议上一再问大家看到这篇文章没有？她说这件稀世之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意义特别重大。特别重大在哪里呢？说穿了，就是更加触动了江青要做女皇的美梦。女皇的玉玺居然适逢其时地出土，江青为此佳兆深深地陶醉了。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总理人选做安排。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形势的发展对江青已经很不利了。四届人大是一次重要的机会，是实现“女皇梦”的一步台阶，必须抢到组阁的权利，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四人帮”的活动频繁了。

根据江青等的旨意，10月18日王洪文乘坐专机到长沙告状。当晚，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王洪文期待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

同一天，北京的钓鱼台10号楼内，江青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是江青把她俩叫来的，请她们在毛泽东面前再奏周恩来、邓小平一本。江青向王、唐二人讲了如下意思：

毛泽东很快就要在外地会见外宾，有个重要情况请你们在陪同外宾去的时候，向主席汇报。在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讨论“风庆轮”的问题上，小平和我发生争吵，然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的会议开不下去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并表示了对江青几人的不满。王、唐二人是陪同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到达长沙的。

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作了如下指示：

周恩来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发起的攻势遭受到严重挫折。

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给他的一封来信上做了如下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江青曾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方案：让谢静宜当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8天以后，毛泽东又给江青写了一封短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

此嘱。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江青曾屡次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九大以后基本是个闲人”，希望毛泽东给她工作，即给她可以发号施令的实权。毛泽东的这封信实际上否定了她的这种要求。

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思想政治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到会的有邓小平、华国锋等。江青也来到大寨。

邓小平强调整顿。江青则大讲评《水浒》，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评《水浒》要联系实践，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政府！”

江青要求在会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答复：“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可江青在公共场合，总打着“我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了”，“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之类的招牌。特别是毛泽东逝世后，她在用葵花、麦穗、玉米、文冠果花制成的花圈上，还居然写下“您的学生、战友”“敬献”字样。

197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最后一次过生日。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家里，也显得比平常热闹些，平时总是静悄悄的深宅大院，这天，也能听到些欢声笑语。

这天，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来了，她们平时很少来看望父亲，但每次过生日，那是一定要来的，她们都带来了对爸爸的祝福。

这天中午时分，江青也来了。她亲手为毛泽东做了两个菜：一个是用胖头鱼做的鱼汤，一个是肉丝炒辣子。她还带来了白菜、大葱、核桃、红枣。另外还特意化装了一番。

当江青走进大厅的时候，正好碰上要往外走的工作人员。

“江青同志 您好。”工作人员上前问候。

“你好啊，你辛苦了，主席今天过生日，我来看看他，他最近吃饭怎么样？还得加强营养啊，我今天还给他带来了山东的大葱、白菜。别小看这普通菜，那是很有营养的，山珍海味不能代替。”江青今天对工作人员显得格外热情。

“主席今天精神不错，您进去吧。”工作人员简单回答着。

“主席的生活、身体，全靠你们关心了，我得感谢你们。”江青说完，就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迈着小小的步子，几乎是蹑手蹑脚地向主席的卧室里走去。

江青悄悄地走进毛泽东的卧室。此时，毛泽东正躺在床上，眼睛微闭，江青进门便说：“主席呀！我给你祝寿来了。”江青说话的声音虽然又轻又细，但毛泽东还是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毛泽东睁开眼，把头稍稍移动了一下，望了望江青，什么话也没有说，几秒钟的沉默。当毛泽东睁开眼之后，江青满以为他会说句什么，她满脸堆起笑容，恭恭敬敬地听候着，但很快她就失望了，因毛泽东很快又把双眼闭上了。

毛泽东对江青不愿理睬，这已是长时间以来的做法了。

特别令毛泽东恼火的，是所谓“红都女皇”事件。

那是 1975 年 7 月 23 日，朱老总派秘书给毛泽东送来一封亲笔信。一张信纸，毛笔行书，寥寥数语，开头仍然是称“润之兄”。

毛泽东读着这封不寻常的来信，他的脸一下子布满了阴云，他把看完的信往桌子上一放，沉思了片刻，然后顺手拿起了铅笔，在朱老总的信上写了几句对江青的评语：

“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在这几句话的后面重重地写了“毛泽东”三个字。

原来，朱老总的这封信，就是向毛泽东反映有关“红都女皇”的事，并提及了江青与美国记者路易斯的谈话。

毛泽东已多次听到有关江青胡作非为的事情。他越来越看到了她的肤浅、无知、骄横，她绝不满足于“夫人”的位置，她太喜欢炫耀自己，炫耀到了吹牛撒谎的地步。她想入非非，以至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她多次拨弄是非，大发淫威。尽管毛泽东听到的仅仅是她飞扬跋扈，寻隙闹事的很少一部分，但就这些，已是够使他无法容忍的了。

秦城监狱的最后生涯

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治上正义与邪恶两种力量的决战已经不可避免。1976 年 10 月 6 日晚上，中共中央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隔离审查。不久，江青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1980 年 11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始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 10 名首犯。

特别法庭依无可辩驳的证据判决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将她的刑期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服刑期间，李讷作为她的惟一直系亲属，获准每两周赴京郊秦城监狱探视一次。女儿的到来，是她精神上的最大慰藉，但即使这样的关系，江青有时也对她发脾气。有一次，江青看到来探视的女儿，衣着陈旧，便拿出 300 元让女儿买件大衣。下一次探视时，她见女儿还穿着那件旧衣，又嚷着要李讷把钱还她。江青还经常吵闹，要上诉、要出去。见无人理睬，便垂头丧气地沉默不语，颇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1991 年 5 月 14 日凌晨，在监外就医的江青，自杀身亡，终年 77 岁。

大弟毛泽民

毛泽民，字润莲，毛泽东的大弟，1896年4月3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追随兄长毁家兴邦

由于毛泽东很早便离家外出求学，毛泽民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在家务农，帮助父亲持家理财。在精明能干的父亲身边，他10多岁就学会了多种农活，而且能写会算。1919年10月和1920年1月父母相继去世后，他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学会了勤俭持家的本领。

1921年正月初七，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将泽民、泽建、王淑兰等召在一起，一边烤火，一边叙家常。毛泽东对毛泽民、王淑兰夫妇说：“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到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们两口子撑着。母亲死了，父亲死了，都是你们安葬的，我没有尽孝，你们费了不少心。”泽民说：“费心倒莫讲，我们在屋里当然要尽力。只是这些年日子不好过。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开始生病；民国七年，败兵几次来屋里出谷要钱，强盗还来抢了一次；民国八年娘死，不久爹死；民国九年安葬父母，还有给泽覃订婚。这几年钱用得太多，20亩田的谷只能糊口。”

“是不是欠人家的钱啊？”毛泽东问。

“别人欠我们的有几头牛；我们欠人家的，就是义顺堂的几张票子。牛，别人家在喂；可欠人家的票子，总得还钱呀！”毛泽民回答。

“能抵消的有么东西？”毛泽东又问。

毛泽民说：“能抵消的是家里还有两头肉猪和仓里两担谷。”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说：“你讲的都是实际情况。但是，败兵抢东西，日子不好过，不是我们一家的事，国乱民不安生嘛！”毛泽东建议弟弟把家里收拾一下，到长沙去学习。毛泽东说：“我的意思是把屋里收拾一下，田也不要作了，这些田你们两口子也作不了，还要请人。我在学校里找了个安生的地方，润莲小时候在家里搞劳动，没读多少书。现在跟我出去学习一下，边做些事，将来再参加一些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

毛泽民对哥哥的这个安排感到很突然。他对这所房子、这个家、种过的田、喂过的牛有着依依的深情。他舍不得这个家。毛泽东看出了弟弟的心思，开导说：“你不要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为了建立美好的家，让千千万万百姓都有一个好家，我们就得离开这个家，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嘛！”

哥哥的话，打动了毛泽民的心。他也感到：世道不改变，个人再苦撑苦干也是空的。但一下子怎么处理家产呢？毛泽民问哥哥：“我们都走了，那田怎么办？房子怎么办？账目又怎么办？”

“好办，好办得很！”毛泽东笑着说：“家里发出的票子，就在外面贴一张告示，凡有义顺堂票子的限几天来兑钱。你把栏里的猪卖了，准备好钱，让人家来兑。牛，就让别人去喂，你如果向别人要钱，除非他把牛卖了才能给你，现在快要春耕了，不能逼人家卖牛啊！别人欠我们的账，就莫要了。仓里剩下的谷子就不要动了，到春荒时卖给那些最没有饭吃的人。还有，穿过的衣服又用不着的，送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出去并不要带蛮多东西，带多了倒是个负担。至于房子嘛，就给没有房子的人住。”

毛泽民按照哥哥的吩咐，妥善地处理了家产，和妻子王淑兰一起到了长沙。

合作社经理

毛泽民到长沙后，首先在毛泽东任主事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搞校务，负责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在这里，他的理财特长初显身手。毛泽民为改善师生生活，不畏劳苦，经常到外地采购廉价的肉食、蔬菜，还发动大家种菜、养猪，以增加收入，减少开支。学生的膳杂费，学校原规定每学期一次交清，许多穷学生往往因此辍学。毛泽民和哥哥商量后，改为分期缴纳，减轻了学生负担，受到师生赞扬。

毛泽东十分关心弟弟的成长进步。有一次，他收到由毛泽民执笔，与弟弟泽覃、同学许志行署名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毛泽东先生启，南门家寄”。毛泽东见明信片上行文有误：“启”是打开的意思，封起来的信要“启”，明信片怎么“启”法？再说“家寄”就是毛寄的意思，但信是三个人署名的，许志行姓许而不姓毛，不能写作“家寄”。于是，兄长给弟弟细细讲解写信的规则。对这件事，毛泽民久久不能忘怀，一直把它作为激励自己学好文化的动力。

1921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培养党团骨干的湖南自修大学，第二年毛泽民转到该校任庶务，同时还兼任省学联的庶务。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是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每月400元社务经费来办自修大学的。毛泽民处处精打细算，节省开支，把为数不多的经费使用得很得当。

1922年10月，长沙笔业工会成立，毛泽民担任该会秘书。他和其他工会骨干一起，领导笔业工人积极开展斗争。10月中旬的一天，300多名笔业工人在毛泽民等人的带领下，手持小旗，高呼口号，前往省议会和长沙县署

请愿，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但遭到省、县当局和资方蛮横无理的拒绝。工会乃决定罢工。毛泽民根据中共湘区区委的指示，发动工人互济互助，妥善地解决了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吃饭问题。这次罢工斗争，前后坚持了40天，终于取得了胜利。

1922年冬天，毛泽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受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指派，到江西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

毛泽民在矿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这个群众组织来开展活动。毛泽民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到对工人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有的群众一度对加入俱乐部并不十分热心。当时工人不仅受德、日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的重重压迫与剥削，而且还受奸商的中间盘剥，生活十分困苦，工人每月的生活费，常常连米都买不回，油盐酱菜更无力购买。根据工人群众的要求，毛泽民建议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方便工人群众生活，抵制奸商剥削，他曾亲自担任合作社的经理。起初，经费不足，他通过工人俱乐部，动员群众在自愿的原则下，每人出1元或5角做股本，很快筹齐了开办合作社的经费。货源不足，他派人或亲自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成批进货。合作社出售的物品比私商便宜1/3到1/2，工人们从合作社买到廉价的生活必需品，非常高兴，合作社受到工人们的欢迎，他们认识到合作社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纷纷要求加入，并主动向合作社捐款，踊跃到合作社购货。毛泽民在《消费合作社报告》中说：“规模虽不甚大，而合作社的意义与利益，却已深深地印在工友们的脑筋中了，成为最受群众拥护的事业。”以后，毛泽民又扩大经营，合并分店，发展为总社，任总经理。合作社还代售一些革命书刊，宣传马列主义。毛泽民在出售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的广告上写道：“处在军阀和外力压迫下的中国人民，谁能引导他们向解放的路上走呢？只有马克思派陈独秀们所办的向导周报。”工人消费合作社不仅方便了群众，也为革命筹集了一批活动经费，并培养了一批先进分子，如后来为革命牺牲的青年矿工杨士杰就是经毛泽民培养和介绍入党的。

由于毛泽民出色的组织领导，消费合作社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效，在社会上影响很大。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曾说过：他们“大战了一场资本家，打破了一切工头制，建设了一个坚强的大营寨”。

7月，合作社大整顿，毛泽民专任营业部主任。成立总社时，毛泽民出任总经理。在毛泽民等人的领导下，合作社搞得生气勃勃，工作很出色。它不仅打击了投机商和封建把头，维护了工人的利益，而且还为党筹集了一笔活动经费，积累了开展工人运动和开办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经验。

1924年深秋，毛泽民因患阑尾炎离开安源到长沙住院。翌年2月，随

大哥大嫂毛泽东、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阔别 4 年的故乡——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他协助兄嫂发动群众，调查研究，访贫问苦，建立农民夜校。

主持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

1925 年 4 月，毛泽民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广州参加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班，该所全称是“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它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分派到全国各地，每届负责人都是由共产党人担任，第五届负责人是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毛泽民在该所结业后，于 1925 年冬被派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主持上海书店的工作。

上海书店是中共中央总发行机关，统一领导全国发行党的刊物和内部读物工作，印刷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和内部文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海书店的规模也逐步发展扩大，在广州、潮州、汉口、长沙、湘潭、南昌、宁波、青岛、重庆、太原、安庆、香港、海参崴和法国巴黎等地都设立了分店或代办处，书的来源都由我党的上海书店供给。上海书店设立了几个秘密印刷厂，专印马列著作、我党的内部文件和刊物。如：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向导》、团中央的《中国青年》等，都是在这里印刷发行的。

毛泽民接手中央出版发行部之初，发行部仅发行《向导》一种刊物，接受到资金仅有 76.3 元。那时党中央每月只拨给《向导》广告费 60 元，其余一概自理。而《向导》每月在《申报》、《新闻报》、《民国时报》上登广告所需费用就达 72 元。这样，发行部的一切费用，基本上靠本身的收入开支。经毛泽民和大伙的努力，很快使《向导》在全国销量达 8 万份，其中由中央出版发行部直接印发的就有 4 万份。《共产主义 ABC》一书，半年之内销数达 3 万余本。书报供不应求，曾有过书尚未印，就收到 1800 多元预订费的好局面。毛泽民还在全国奔波，建立发行网。在广州、长沙、香港、海参崴和法国巴黎等地设有分店和代售处。

随着书刊的销售量猛增，印刷、发行任务更加繁重。党中央遂决定增开一个印刷厂和秘密发行所，由毛泽民负责。他于 1926 年在上海新闻路培德里找到了几间房子，化名周泰安、杨杰，公开身份是印刷厂老板。为了完成任务，他派人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到上海，充当秘密印刷厂的工人。1926 年，毛泽民与青年女工、共产党员钱希钧结婚。

毛泽民为了加强对上海书店的领导，在内部进行了调整，分门别类地建立了发行系统。不到半年，书的印刷、销量增长一倍多。随着北伐战争的节

节胜利，书的销售量猛增，印刷任务更紧。毛泽民为了完成任务，成天奔波，废寝忘食。由于秘密印刷厂缺乏装订设备，毛泽民利用资本家爱财如命的特点，找了一家小厂子代为装订，派人监督。当时革命正值高涨，那个资本家只要定价从优就遵守合同。但当 1927 年春，上海反革命政变风声越来越紧时，那家伙就妄图出卖毛泽民，从反动派那里捞一笔巨款。有一天，毛泽民到那个小厂检查装订工作，老板满脸堆笑，把他请进自己的卧室，东拉西扯稳住毛泽民，然后就借故出去，毛泽民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见老板神色不对，决定赶快离开，但拉门时才知已被反锁在屋里，他立即爬上窗口跳楼而走，从后门奔出时，只听得无数脚步上楼的咚咚声，接着是流氓对老板的叫骂声。又有一次，毛泽民去书店，4 个暗探坐在对面的茶馆里，书店营业员连忙向他作了个暗号，他立即机智地从后门走脱。

由于上海形势紧张，上海书店已经暴露，毛泽民向党中央建议，在革命形势较好的汉口，建立长江书店，作为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经党中央批准后，1927 年 3 月长江书店正式营业，属中共湖北省委领导。毛泽民巧妙地通过长江轮船的水手、茶房，将上海书店所剩书刊全部运到了汉口，保存了大批“火种”。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毛泽民到了汉口，担任《汉口国民日报》总经理。该报社长是董必武，总主笔是沈雁冰。

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毛泽民根据党的指示，回湖南准备秋收暴动。他化名周方，深入到湘潭、湘乡一带活动。当他 9 月中旬返回长沙，得悉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经发动时，便带领一批同志化装成商人，奔赴平江、浏阳。途中为反动军队所阻，返回长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今年年底，毛泽民接到中央来信，要他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工作，于是他又来到上海。印刷厂虽已停工，但没有被敌人破坏，他便利用原厂继续开业。

当时，上海特务横行，军警密布，毛泽民冒着巨大的风险，使秘密印刷厂的机器又转动起来。先印一般书籍，没过几天，一群流氓打手冲上门来。幸好这时党内刊物都已转移和烧毁，只剩下几册马列书籍。特务们发现后，要将毛泽民带走。毛泽民机智地予以应付，神态自若地说：“诸位，我是印刷厂的老板，只管做生意，分不清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如果这样不明不白把我带走，造成厂子关门，工人们生活无着，可不好办呀！”印刷厂的工人们听后，也立即奋起相助，流氓们见势不妙，头一歪说：“老子不能白跑一趟，跟我走！”管账的同志听后，忙拐了个弯笑道：“这个好说，好说！”立即给了一笔款子将他们打发走了，毛泽民才得以脱险。但从此以后，敌人的

盯梢更紧了。

1929年初，地下印刷厂被敌人发现。毛泽民根据中央指示，迅速妥善地将机器运往天津，在英租界广东道（今唐山道）47号办起了华新印刷厂，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毛泽民任该厂经理。华新印刷厂对外公开承印发票、请柬、表格之类，对内印刷党的内部刊物、文件、传单以及顺直省委办的《北方红旗》、《铁路工人》等，有时还翻印些马列主义书籍。

当时的天津，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为防止敌人破坏，毛泽民在小白楼先农里租了一套住房，作为机关。凡是要印制的刊物、文件、传单等，先送到这里，然后再由钱希钧送到印刷厂去排版印刷。外人到印刷厂联系印刷事宜，必须先在柜房接洽，如发现来人形迹可疑，就掀动办公桌下通往排印车间的暗铃，车间工人便迅速将党的文件收藏好，马上改印《马太福音》之类的东西。由于组织严密，一直未被敌人发觉，直到1931年毛泽民奉命调离天津，印刷厂的任务才告结束。

毛泽民在天津期间，还担任中共中央的“交通”，并兼管顺直省委的财务。

1931年初，毛泽民遵照中央的指示，再次返回上海，以开“酒栈”作掩护，继续领导党的地下发行工作。这时的上海，大部分党的组织遭到了破坏，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毛泽民在敌人鼻尖下，英勇机智地为恢复党的秘密组织和重建印刷厂而日夜奔忙。

这时，毛泽民得知大嫂杨开慧已于前一年11月被国民党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万分悲痛。杨开慧英勇就义以后，保姆陈玉英和毛岸英经乡亲们保释出狱，回到板仓与杨开慧的母亲及毛岸青、毛岸龙一起生活。当时长沙地区白色恐怖相当严重，毛岸英兄弟三人的安全受到威胁。毛泽民请示党组织同意，通过地下交通员带信到长沙板仓，请开慧的母亲和嫂嫂设法摆脱敌特监视，将毛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

1931年春节前，毛岸英兄弟三人在其舅母李崇德及外祖母的护送下，按指定的路线到达上海，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按约定的地点到天生祥酒店会面。毛泽民一见到三个侄儿，止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他坚定地对孩子的舅母说：“请你不要过分伤心，搞革命，流血牺牲是常事。蒋介石的屠刀吓不倒我们，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毛泽民将他们的食宿安排好，并报告党组织，同时决定将毛岸英兄弟三人安排到我地下党主办的大同幼稚园抚育。这所幼稚园的保育人员多为我党干部的家属，其中有李立三、李求实的爱人，收养的孩子也主要是在白区工作的我党干部和被反动派逮捕的同志及与我党有关系的同志的子女，如彭湃，恽代英、李立三、杨殷等的孩子都曾在该

抚养，经费由党组织供给。毛泽民夫妇给三个侄儿做了新衣服。并时常去幼稚园看望他们。不久，岸英上了学，能识字写信了。岸青、岸龙也在党的关怀下成长很快，毛泽民感到无限的欣慰。

4月，在党中央负责保卫、交通和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使得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和上海党的组织处境十分危险，部分机关遭到破坏。中央考虑到顾顺章不但认识毛泽民，且熟悉他的联络暗号和地点，所以，让毛泽民等人离开上海，到香港去开辟工作。毛泽民和钱希钧离开上海前，专门又去大同幼稚园看望岸英哥仨，告诉他们叔叔、婶婶要出远门了，很长时间不能来看你们了，要岸英多照顾弟弟们。岸英突然拿出一封信，要他们转给爸爸。后来，毛泽民到苏区，终于把这封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民夫妇始终惦记着上海的三个侄儿，长征到保安后，又是他们托潘汉年找到孩子（只找到两个），送他们去苏联的。毛泽民等人到香港不久，由于顾顺章也窜到香港，党中央令他们立即离港，去中央根据地。

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

1931年7月，毛泽民到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供给部部长。不久，他被调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随后，又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委派，筹建国家银行。1932年3月，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毛泽民担任第一任行长。新成立的国家银行全部人员只有5名，即行长、记账员、出纳员、总务和会计。

当时，中央苏区的财政十分困难。国民党反动派对红色根据地不但不断地进行军事“围剿”，而且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红白两区贸易往来几乎完全断绝。苏区的钨砂、木材、樟脑、纸张、茶叶、粮食等运不出去，需要的食盐，布匹、医药等运不进来。面对这一系列严重困难，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的名义，向各级财政部门发出了“统一财政，筹款支援前线”的指示。为贯彻这一指示，毛泽民领导国家银行与吴黎平为部长的经济部，邓子恢、林伯渠为部长的财政部密切合作，向困难开战。

国家银行成立后，毛泽民就把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他决定把接受金库作为银行工作的开端，将国家银行分设总行、分行和支行；国家金库也分设总金库、分金库和支金库，由国家银行分级接收和管理。为健全银行和金库的管理制度，他经过几个月的摸索、研究，制定了金库条例和会计、预算、决算、审计等制度；还举办了多期银行、金库、财会人员训练班。

统一财政还必须统一货币。1932年7月7日，毛泽民领导国家银行开始印制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这种纸币票面有一元、五

角、二角、一角、五分五种； 99 元纸币可换 100 银元。年底又利用两年前红军打长沙时缴获的制币机建立造币厂，铸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元和铜币，供根据地人民使用。也造了一些可到白区流通的银元，以利与白区进行贸易。

统一财政，还必须把战争中的战利品都由银行统管。毛泽民常以中央财政特派员的身份，深入前方，帮部队建立财政系统。他领导国家银行在各部队设立派出机构，重要地方还派了工作组。每次打完仗，就把缴获的东西收上来，由银行开给收据。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至 1932 年底，苏区的财政货币得到统一。这是毛泽民的一大功劳。

毛泽民在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功劳，是发展苏区生产。

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苏区军民严重缺盐的问题，毛泽民让一些人化装成乞丐到白区去要饭，买了盐装在讨来的袋子里带回来；又发动大家把粪桶做成双层，利用到白区挑粪的机会，将盐放在底层挑回来；还有把棺材改做双层，下层放盐，上层放一些臭猪肠，让一些人装作送葬，从白区把盐运回来。毛泽民特别注意利用苏区的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开展对外贸易。在中央苏区赣南的安远、宁都、会昌三县附近，蕴藏着丰富的钨砂。 1932 年春，中央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钨矿公司，由毛泽民兼任公司总经理。起初，公司下辖只有盘古山和铁山垅两个矿场。 1933 年 4 月，毛泽民从这两处调集二三百人，又开发了小垅矿场。三处矿场年产钨砂约 1800 吨，其中盘古山矿场从 1931 年秋至 1934 年秋，产值达 200 多万银元。钨砂大量出口，使苏区获得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换进了苏区急需的食盐、布匹和药品，对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革命战争，起了很大作用。

毛泽民还领导国家银行开展了储蓄运动，从群众中筹集资金发展生产。

毛泽民为国理财，一贯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决不搞特殊化。因他气管炎发作，一个本地战士从家里给他送来几个鸡蛋，他婉言谢绝，这个战士又偷偷塞到他的抽屉里，毛泽民发现后将鸡蛋拿到厨房，做成鸡蛋汤，与大家一起吃。闽赣省委开会常到深夜，省委书记邵式平总爱开玩笑地说：“泽民同志，开开恩搞点东西吃吧！”毛泽民也总是笑着回答：“不行啊，邵大哥！财务上没有这笔开支，你就让肚子唱唱空城计吧！”

毛泽民在公事之余，常与人拉家常。他说，以前自己在家是管家的，现在到了苏维埃政府这个革命大家庭里，还是管家的。无论是持家，还是为国理财，都要勤俭办一切事业。

国民经济部部长

长征开始时，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全体人员编入第十五大队，毛泽民任大队长。遵义会议后，十五大队整编合并到先遣工作团，毛泽民任副团长兼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林伯渠兼任）。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成立了总供给部，毛泽民任副部长。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他一直担任着管理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红军给养的艰巨任务。

长征一开始，“左”倾错误指挥者来了个大搬家，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部队出发前既不作深入的政治动员，又不认真地进行战略转移的组织准备，拉起队伍就走，以消极的防御作战来掩护整个部队和庞大机关的转移，坛坛罐罐、大炮、印刷机一律人扛肩挑，处处被动挨打。

长征中，毛泽民率十五大队，携带黄金、白银和苏区钞票一共 160 多担，并负责接收沿途抄收的土豪财物，因而行军的负担很重，一路上吃尽千辛万苦。

长征行军途中，毛泽民总是在宿营前跑到前面，找好营地，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政治情况，部队进入营地以前，他要向部队介绍情况，要求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讲评前一宿营地纪律好坏情况。当队伍开拔时，他又走在最后，到处检查群众纪律执行的情况，如院子是否打扫干净，有无损坏群众的东西等等。当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由于敌人的欺骗宣传和强迫，群众把粮食都藏了起来，使红军吃饭遇到了严重困难，虽然弄到一些稻谷，但找不到脱谷壳的工具，毛泽民就发动与带领大家用手来搓，干部们不仅搓够自己吃的和第二天带的，还要给炊事员搓出一份，有的同志手磨破了，鲜血染红了金黄色稻谷，仍坚持干，毛泽民更总是超额完成任务。

长征路上，经常遭到敌人或明或暗的破坏，不仅前堵后追，而且派特务假充向导、挑夫进行破坏。在路过广西山区时，宿营地经常发生火灾，毛泽民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纵火。一天，部队住地附近的房子又燃起熊熊大火，毛泽民及时发现，叫醒大家抢救，避免了遭受重大的损失，后经保卫部门侦察，确系敌人派来的特务干的，自从这次清除了特务之后，就再没发生过火灾。

由于敌人的破坏、宣传，沿路上的群众都要现洋，不要苏区国家银行的钞票，毛泽民为了提高苏区钞票的威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一，打土豪没收的东西，除分发给贫苦群众外，留一部分拍卖，先要苏区发行的钞票；其二，规定兑换比值，一元苏维埃钞票可兑换一元二角现洋，可换两元国民

党的票子。组织人员向群众宣传并真正兑现。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苏维埃钞票的威信，对解决当时红军的经费开支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民不仅是一位为国理财的好手，而且是关心部下的好管家。在长征路上，他身体不好，工作又忙，但总是以普通红军一员的身份，处处以身作则。如帮助运输员挑担子，轮流到炊事班顶班做饭，同志们劝他不要去顶班，他说：“你们能做，我怎么就不能做？难道我就不吃饭？”由于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他所在部队的全体炊事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全部胜利到达了陕北。

毛泽民配有一匹马，但他经常让给病弱的同志骑，或给收容队用，他自己很少骑。在长征中四渡赤水后，一次敌机轰炸，他发现一棵大树下有三个战士熟睡，便不顾个人安危，冲到大树下，有两个战士已被炸死，他将另一个战士从厚土掩埋中拉出来，救出了险区。过草地时他冒着危险将一位陷进泥沼里的战士拉上来，把自己的干衣服给他换上，并做了一副简易担架，抬着他继续行军。

红军长征，经历了千辛万苦，毛泽民、钱希钧夫妇随同大哥毛泽东、大嫂贺子珍于 1935 年 10 月一同到达陕北。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1936 年初，毛泽民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下辖农牧、工矿、财物等科和一个运输队，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前线。

在当时的陕北，红军物质生活十分艰苦。时值寒冬，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毛泽民提出派人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到白区去采购布匹和棉花，以解决战士们的冬衣问题。他亲自组织采购人员，打通各种关系，在附近的中小城市里购得 2.8 万匹布和大量的棉花，陆续运回党中央的所在地瓦窑堡。接着，又通过根据地的妇女组织，发动妇女为红军纺纱织布，赶做棉衣。不久，红军都穿上了新棉衣。

毛泽民注意发展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在他的倡导下，兴办了一些作坊和合作社、收购店；发动男女老少纺纱、烧木炭、打铁、做木工；开展植树造林，试种水稻，大搞养猪、牛、羊等生产活动。他还亲自带领 30 多人到长城脚下的定边、安边、靖边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大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批物资。

1937 年初，国际工人阶级为支援中国的革命，筹集了一大笔款子，由法国汇到上海。中央决定派毛泽民负责去取钱。这年 4 月，他与钱之光等 4 人化装去上海。通过上海地下党，将这笔外汇分别兑换成法币，藏在特制的皮箱的夹层里，再由几个人装扮成大商人，辗转数千里，将款运到西安。然

后，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和叶剑英等的亲自接送、掩护下终于使这笔巨款安全地运到延安。

整顿新疆财政

■年冬，毛泽民的支气管炎日益严重。党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休养。年初，毛泽民起程去苏联，行至新疆时，恰遇新疆与苏联交界处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他便留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暂住。

当时，新疆地大、人少、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名义上与中央政府保持着统辖关系，实际上一一直由地方军阀割据。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标榜进步，竭力表示忠于苏联，自称是马列主义信徒，自封“新疆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名于马、恩、列、斯之后，他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表示愿与中共合作抗日，多次要求我党从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工作。我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利用盛世才与蒋介石之间狗咬狗的矛盾，促进新疆革命运动的发展，保证西北国际交通畅通，决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关系。从年起，陆续派遣了一百六七十名干部到新疆工作。盛世才特别要求我党派一名财经能手到新疆整理财经。党中央鉴于毛泽民已抵新疆，遂决定将其留在新疆工作，与党代表邓发（1937年7月以后陈潭秋接任）等人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毛泽民化名周彬，担任新疆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职务，以后又担任民政厅长。

那时的新疆，财政制度混乱，各级官吏贪污成风，市场上纸币充塞，加之货币不统一，除省有银票外，喀什地区又印发了喀票，市场上还有清朝铜板和洪宪银洋。盛世才不仅靠印发钞票来应付财政支出，而且还借了2000余万元的外债。毛泽民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大刀阔斧地整顿财政金融，在整顿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进行建设。

毛泽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整顿财政机构，培训财政干部。1938年4月18日，他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新疆财经情况和我工作情况与计划的报告》，请求中央“设法给我十个党的干部（赖祖烈、高登榜、郑亦胜三人必须调来）”。党中央同意了他的工作计划，并满足了他提出的请求。

为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改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毛泽民说服盛世才，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废除以两为单位的旧银票，改为以元为单位的新币。

毛泽民对新币的发行量控制极严，以保证新币币值的稳定和信誉。当有些人主张多印些票子时，毛泽民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滥发纸币，就会造成通货膨胀，也就等于饮鸩止渴。”

为了增加银行的黄金储备，充实新币基金，保证新币的稳定和经济建设，毛泽民在迪化成立了金矿局，在伊犁、阿山成立了金矿分局。

毛泽民对财经制度极为重视，认为它是搞好财经工作的保证。他参照陕甘宁边区政府有关财经方面的规章制度，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财政、银行、金库等方面切实可行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公务人员奖惩条例，从而堵塞了漏洞，一改过去混乱的局面，使新疆财经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防止以盛世才为首的新疆军阀、官僚、地主们继续横征暴敛、贪污浪费，争取尽快达到财政收支平衡，有计划地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毛泽民领导财政厅编制了收支总预算，制定了三年建设计划和财经制度条例。为了平衡预算，控制预算外开支，还成立了财经委员会，由他担任主任。

在整顿财政中，毛泽民还提出并实现了税制改革。在改革税制中，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特别表现在税收上。在农牧业税方面，毛泽民提出要按羊的多寡来计税，大牧主的羊越多，交税就应越多，改变过去按房计税的不合理状况。在商业税方面，毛泽民主张对行商和坐商都要征税，而且按资金和利润多少分等征收。盛世才不肯这样做，在召集各族头人开会时，竭力煽动他们反对。经过艰苦的斗争和细致的工作，毛泽民的办法终于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

在整理财政金融的同时，毛泽民还大力支持了新疆工、农、牧、文教、卫生、交通、市政等项事业的建设。他为了发展农牧业，规定省银行和各地分行每年都要给贫苦农牧民发放贷款、贷种子、贷耕马等。

为了筹集建设资金，毛泽民将新疆省立银行改组成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以吸收商股和社会游资，扩大银行资本，使银行在扶助农牧工商业的发展、调剂金融、稳定物价、反对高利贷剥削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疆商业银行于 1939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毛泽民任该行理事会理事长。

毛泽民坚持财政制度的措施，严重地触犯了军阀盛世才等人的利益，被盛世才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想把他“拔除”。1941 年 7 月 30 日，盛以周彬（即毛泽民）有病，不宜担任繁重工作为借口，把毛泽民调到民政厅任厅长。毛泽民的行动受到更为严密的监视。

毛泽民调任民政厅长后，继续为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制订了区、村、街基层政权选举法，民主选举基层政权的领导人，废除了压迫剥削

人民的“乡约”、“农官”制度。改善了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创办了医药学校，各地开设医院、诊所、药房。开办了 16 所救济院，收容了无家可归的 3000 多名鳏寡孤独，他们称赞“周厅长亚克西”。

毛泽民在新疆工作期间，尽量为新疆人民多做工作，不畏艰险，夜以继日。1942 年夏天，恶性鼠疫、斑疹伤寒在西部流行，毛泽民不顾个人有病，组织医疗队奔赴疫区，在几个县内来回奔波，指导和检查防治工作，因操劳过度，引起血压上升，心脏病、支气管炎一齐复发。

毛泽民生活一贯节俭，每月的薪金绝大部分交了党费，对他身边的同志却体贴入微，尽力帮助，助人为乐。

毛泽民等一批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工作，严重地触犯了封建军阀盛世才等人的利益，千方百计想把他们“拔除”。邓发移交工作给陈潭秋时说：“盛世才就本质来说是封建军阀、野心家，就其行为来说，是一个狼种猪，又蠢又狠，我们要提高警惕。”

1941 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德国法西斯又进攻了苏联，形势逆转，盛世才撕下“亲苏拥共”的假招牌。1942 年，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帮初来新疆与盛世才谈判，达成了反共协议。党中央批准了陈潭秋关于撤退在新疆的我党人员的计划，决定分期分批撤退。但由于国民党封锁了去延安的道路，盛世才又卡住了去苏联的交通，撤退计划未能实现。毛泽民与陈潭秋一起，组织 117 名准备撤退的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开展革命气节教育，以应付突然事变。

1942 年 9 月 17 日下午 1 时，盛世才端出蓄谋已久的所谓“共产党阴谋暴动案”，蓄意陷害，对共产党人下了毒手。他派全副武装的军警特务，先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住处包围，将陈潭秋、毛泽民等 5 人软禁在“刘公馆”。接着，又将我党在新疆的全部人员逮捕软禁。面对敌人的阴谋，毛泽民满腔怒火，当众将盛世才手下的特务头子、警务处处长李英奇痛骂了一顿。李英奇被迫打电话向盛世才请求，毛泽民抢过话筒，大声斥责盛世才：“你背信弃义，竟敢把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人关押起来。你必须无条件的立即释放我们，把我们送回延安去，否则你是没有好下场的！”盛世才支支吾吾，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毛泽民知道这家伙已无可救药，愤怒地把电话机砸烂。

1943 年 2 月 7 日，盛世才把软禁的共产党人投入监狱。4 月 10 日起，敌人对毛泽民进行审讯，动用了“抽皮鞭”、“坐飞机”、“坐老虎凳”等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

1943 年 9 月 27 日深夜，敌警务处处长李英奇与敌审判委员会主任富宝

廉，拿着盖有“盛世才”印章的秘密处决手令，来到第二监狱。他们指挥 9 名刽子手，手拿棍棒、绳索，把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从牢房里唤出，先用大头棒将他们击昏，然后用绳子勒死，装进麻袋埋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过了 3 天，盛世才又下令把他们的尸体挖出来，一个一个进行拍照。然后把照片送给宋美龄，向蒋介石报功领赏。

毛泽民与陈潭秋、林基路等被杀害的消息传到新疆迪化第二监狱时，狱中的同志们万分悲痛。在狱中地下党的领导下，为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并集体创作了一首《追悼歌》，歌词是：

我们的兄弟，
在前方为国把命拼；
我们全部的力量，
正在消灭民族敌人。
我们光荣的同志，
谁想得到在抗战辽远的大后方
还有丧心病狂的败类，
含血喷人，
暗害了你们宝贵的生命！
你们临死不屈的意志，
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中！
瞑目吧，
光荣的同志！
你们的血迹，
揭露了民族败类的无耻！
你们的牺牲，
更显示了八路军伟大的精神！
你们的英名，
将永垂不朽！
它鼓励着后继者的我们，
向黑暗作英勇的斗争！
瞑目吧，
徐杰（陈潭秋的化名）同志！
周彬（毛泽民的化名）同志！
林基路同志！

弟媳王淑兰

王淑兰是毛泽民的结发妻，毛泽东的大弟媳。1896年2月5日生于湖南湘乡县白田区重石乡安乐村刘家湾。1965年6月去世。

贤惠的毛家媳妇

王淑兰出身贫苦家庭，父亲一辈子务农，同当时旧中国许多贫穷的庄稼汉一样，为了养家糊口，在贫瘠的土地上超负荷地劳作，致使身体早衰，疾病缠身。他40多岁时，因染肺病，过早去世。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生有一儿一女。父母在世时，按照封建习俗，为女儿包办婚姻，把王淑兰嫁到了毗邻家乡的湘潭县韶山冲，当了毛顺生二儿子毛泽民的媳妇。

王淑兰来到毛家时，毛家长子毛泽东已去长沙读书，嫂子罗氏也已去世，毛泽民正全力协助父亲治理田产、经营买卖，料理家事的担子自然落到了她的肩上。每天，雄鸡报晓，她第一个起床，生火做饭、洒扫庭院、缝补浆洗、喂养家禽、服侍公婆，还参加一些田间农活，一直忙到月上树梢。她为毛家共生了三男二女，只有女儿毛远志长大成人，其余有的活到7岁，有的活到3岁，均早年夭折。王淑兰为哺育儿女，也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对于如此繁重的家务，王淑兰不仅没有怨言，而且以她心灵手巧、干活麻利的特长，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受到了毛家父子的称赞。可以说，毛家经济的兴旺，也有王淑兰的一份功劳。

王淑兰的婆婆文七妹，是一个心地善良、贤淑敦厚的妇女，王淑兰和她亲如母女，婆媳相处多年，从未红过脸。婆婆身体不好，王淑兰一有空就陪着她，为她端茶送饭，洗衣擦身。每当有事，先找婆婆商量；有心里话，主动和婆婆交谈。婆婆善待穷人，经常以钱物帮助他们，王淑兰受婆婆影响，也尽自己的能力，帮助穷人渡过难关。婆媳二人的善举，为邻人赞誉，传为美谈。

率女众闯公祠

王淑兰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受了毛泽东的启发和引导。1917年冬，学校放寒假，毛泽东回到韶山，曾用浅显生动的语言向家人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王淑兰听了觉得很新鲜，思想上受到触动。1921年2月，毛泽东在家同弟妹们作了后来闻名于世的“炉边谈话”，阐述了“舍小家为大家”的道理。之后，弟妹们全部外出，参加革命。

王淑兰是随毛泽民一起离开韶山的。来到长沙，刚开始，她主要是帮助毛泽民搞些家务，同时做点辅助性的工作，以后逐渐独立开展工作。在长沙期间，她和毛泽民朝夕相处，并肩战斗，度过了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毛泽东和杨开慧常来看望她，帮助、指点她进行工作，使她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在政治上进步很快。

后来，因为生孩子，王淑兰又返回韶山。从此，她和毛泽民天各一方。毛泽民在外到处奔波，无暇回老家；王淑兰由于工作需要，留在韶山，同时因抚养孩子，也难以出来。

1925年春夏，毛泽东利用回韶山养病的机会，领导建立起韶山第一个党支部，开展农民运动。当时，王淑兰非常活跃，她不畏强暴，敢于出头露面，在妇女中带头参加了“雪耻会”和农会。1926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韶山特别区妇女界联合会执行委员。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她组织妇女游行，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妇女要解放的口号。她还勇敢地率领韶山妇女冲进毛震公祠，和男子平起平坐，一起吃祭祠酒，冲破妇女不能进祠堂的封建宗法观念，在韶山冲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一举动，曾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苦苦寻找组织

1927年“马日事变”后，湖南革命形势急剧逆转，敌人疯狂地镇压革命人士，毛泽东的故居也遭查封。王淑兰不得已离开韶山，转入地下活动。

1929年，因叛徒出卖，王淑兰被逮捕，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同室女囚中，共有6名中共党员，王淑兰被选为党小组长，带领难友们同敌人进行斗争。敌人多次审讯她，她坚强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狱中，她和共产党员罗醒约定，今后不论谁牺牲，活着的人就是烈士遗孤的母亲。1930年7月，彭德怀率部攻克长沙，王淑兰和难友们被解救出狱。罗醒出狱后追赶队伍，不久便壮烈牺牲。王淑兰果然把她的儿子王华初收为养子，并改姓为毛。此举颇为感人，它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无畏的品格和美好的心灵。

王淑兰出狱后，因小脚走不快，无法追赶部队，就在长沙附近寻找党的组织。1930年8月，接上关系，王淑兰带着女儿毛远志和养子毛华初来到长沙东乡梨梨，由于敌人到处搜捕，梨梨一带很不安全，他们转移地点，应付意外情况发生。那时，常常是在深更半夜，敌人突然闯进村子，王淑兰拉起正在熟睡的孩子飞速往外面跑。毛远志就是因为多次受惊吓，后来落下了遇事心悸紧张的毛病。有一次夜里，王淑兰和两个孩子从牛肚子底下钻出

去，摆脱了敌人。还有一次也是夜里，敌人包围了村庄，他们悄悄地藏入水塘里，水已淹到毛远志的喉咙，敌人没有发现他们。

1931年冬，王淑兰带着两个孩子，风尘仆仆来到上海，寻找毛泽民，不料扑空，党中央已从上海撤离，毛泽民去了江西革命根据地。母子三人只得返回湖南。到长沙后，有一位地下交通员曾临时把他们掩护在湖南第一纱厂附近。不久，王淑兰一家离开此地。

为了便于活动，也为了孩子们的安全，王淑兰忍痛把毛远志和毛华初寄放在农村一个较富裕的人家里当小工，自己只身一人去联系组织。王淑兰变换各种身份，四处打听情况。她学过裁剪，经常以裁缝的名义走街串巷，有时也扮成讨饭的穷人，挨家挨户察访。失去了组织关系的王淑兰，虽然心中万般焦急，但毫不气馁，一直苦苦地寻找，同时还通过串门，开展一些宣传工作。这期间，她历尽了千辛万苦，饱尝了人间种种风霜艰险。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共产党取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王淑兰才终于接上了组织关系。1938年，她通过八路军长沙办事处，把两个孩子送往延安。她自己仍然留在湖南从事地下工作。40年代，她在桂阳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组建游击队，积极开展反抗日寇、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直到新中国成立。

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王淑兰始终敬重毛泽民，并深深地爱着他。早在1931年去上海时，虽未见毛泽民，但已知他又同别人结婚了。她能够理解包办婚姻的原故和在战争年代联系中断的情况下，毛泽民再次结婚的道理。但她不知道毛泽民已于1943年牺牲。刚解放不久，她在湖南参加一次会议，当主持人告知大家，毛泽民烈士的亲属王淑兰正坐在主席台上时，她大为震惊，当场昏厥过去。

1950年春，王淑兰从湖南到江西南昌，看望因病住院的女儿，并从那里，给毛泽东寄去一信。不久，毛泽东回信，要毛远志和曹全夫陪母亲来北京。进京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就接见了王淑兰，同这位弟媳谈了很久。王淑兰送给毛泽东一只无盖的杯子，毛泽东看见这朴实无华的礼品，很高兴地收下了。

王淑兰在北京住了几年，曾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工作。后又返回湖南湘潭，同毛华初一起生活。其间，王淑兰还到韶山住过一个时期，在毛泽东旧居担任接待工作。在湖南，王淑兰的组织关系挂在湘潭县委招待所，每月领取生活费60元，后提为80元，直到1965年去世。

王淑兰是1926年的党员，又是烈属，在战争年代吃尽了苦，始终坚持

斗争，对革命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但是解放后，她并没得到相应的照顾和待遇，被安排做一些很普通的工作，并且只领取较少的生活费。对此，王淑兰毫不计较，她始终保持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热情积极地工作着。平时，生活简朴，一身农村妇女的打扮。离开工作岗位后，她不忘党的工作，关心国家建设，尤其操心妇女权益。她经常向妇女群众宣传党的关于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方针政策，对她们进行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思想教育，鼓励她们关心政治，参加生产，做到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

1965年王淑兰去世。过了22年后，即1987年，有关部门为她定为行政13级。这迟到的待遇意味着，组织上过去对她的不公，做了改正。

弟媳钱希钧

钱希钧1905年生于浙江诸暨牌头镇。1926年同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结婚。1943年改嫁周小鼎。1992年去世。

满月婴儿童养媳

在旧中国，无数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苦人家，为了生存，不得不将亲生的幼女送给别人当童养媳，以求得一口饭吃。这种残忍、悲惨的事情到处发生过，钱希钧的身世便是其中的一例。

1905年的一天，钱希钧呱呱落地。她整天无忧无虑地放声啼哭，不知父母正满腔愁云。家里早已揭不开锅了，如今又添一张嘴，日子怎么熬。贫穷的父母权衡再三，最后只得忍痛将刚刚满月的婴儿送到邻近的水下张村张乃荣家，给他第三个儿子张秋人当童养媳。

张家也不是富裕人家，同样是靠终日耕织方能勉强度日的农民家庭。因此，钱希钧自幼便开始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上山放牛、割草打柴、抽丝纺线、缝补浆洗，她的童年时代就是在不停地干活中度过的。

然而，不幸之中出现了意外，张秋人长大后接受了革命的思想，成为一名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坚决反对不人道的包办婚姻，始终把钱希钧当作自己的亲妹妹看待。生活中无数因包办婚姻造成的悲剧性恶果并没有在钱希钧身上出现，这是值得庆幸的。

剪掉长辫子

张秋人很早就离开家庭，外出参加革命。他具有杰出的组织、领导能

力，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的党员和有名的政治活动家。1922年初春，他写信要钱希钧去上海读书。从此，钱希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那时，钱希钧刚刚17岁，她勇敢地摆脱了旧式婚姻的羁绊，离开张家，来到上海。经张秋人介绍，进入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校”学习。

钱希钧进校后，碰到的第一件大事是剪辫子。剪辫子，对于当时的女学生来说，一方面表示与封建思想的决裂，另一方面也为了朴素大方，简便实用。钱希钧初来乍到时，却不大愿意剪掉她那从小蓄起来的又长又黑的辫子。但她想到张秋人在家乡时也曾宣传过剪辫子的好处，又看到同学们一个个齐耳短发，活泼精神，她便下决心剪去了辫子。

平民女校是一所革命学校，钱希钧在那里不仅读书、做工，还学习做革命工作。她和同学一起走上街头，宣传革命道理，声援工人罢工。她们胸前挂着挖了小口的竹筒，沿街为工人运动募捐；她们还为前来平民女校开会的领导同志，如陈独秀、张太雷、李达、恽代英、张秋人、刘少奇等站岗放哨，保证安全。

钱希钧已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加入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经理”闯入了她的生活

1926年，大革命形势空前高涨，钱希钧走出学校，投身轰轰烈烈的运动。她在上海杨浦怡和纱厂搞工会工作，同时也在“上海大学”读夜校。

有一天，中央组织部的伊宽找她谈话，要她到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她愉快地接受了。进入发行部的机关，“杨经理”上下打量着她。钱希钧被看得不好意思，连忙将中组部的介绍信交给他。“杨经理”看完信后，热情地向她介绍情况，他说：“我们机关是党的宣传部门的喉舌，你的工作，除了搞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要经常去中央机关和一些领导同志的家里。做这方面的工作，一定要灵活，同时还要注意保密，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别人来往……”钱希钧边听边点着头，第一次见面，她对这位年轻的经理精明能干的作风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后来，钱希钧才知道他的真名叫毛泽民，是党中央发行部的部长（总经理），对外则化名杨杰，身份是老板和经理。

钱希钧到出版发行部时，工作人员只十来个人，而发行部不仅要负责上海地区的印刷发行，而且还要管全党的印刷发行。毛泽民是党务、行政一身担。钱希钧主要是做发行、交通工作，寄送报刊、文件。她默默奋力地工作

着，尽量多为毛泽民的工作分忧。毛泽民也经常帮助她提高业务知识，传授经验。艰苦的地下工作生活，使两颗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相互之间逐渐产生了感情。1926年年底，毛泽民和钱希钧结为伴侣。

钱希钧很体贴毛泽民工作的艰辛，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外，还在生活上处处照顾他。每当他回到家中，钱希钧早已做好了饭菜等候。毛泽民是湖南人，爱吃辣椒。但他有胃病，同时他在安源搞工运时曾经动过盲肠手术，当时医疗差，刀口愈合不好，留下了隐患，时时疼痛，医生叮嘱不让他吃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特别是辣椒。当时，他们每月只有15元的津贴，穿衣、吃饭和日常开支都包括在内，生活非常拮据。不能吃辣椒，毛泽民饭吃得很少。钱希钧只能想方设法买一些他喜欢吃的空心菜。空心菜的营养价值虽然不高，但还便宜，也可以使毛泽民多吃点饭，这使她心里得到一丝慰藉。

安排三个侄子来上海

1927年3月，周恩来从武汉来到上海，秘密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决定在闸北庆云里秘密召集上海各厂代表开会，讨论组织工人纠察队，配合北伐军，里应外合，夺取上海。印刷厂奉命印好了一批传单，准备提前送到庆云里会场，让各厂代表带回去，以便第二天起义时在市中心各闹区散发。晚上，红红绿绿有光纸的传单印好了，又适逢有人送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大印，是起义时盖各种传单、布告和文件用的。毛泽民说：“希钧，这就得由你跑一趟了。要化装，坐着黄包车过去，这么多的宣传品还有大印……”希钧爽快地说：“好吧！”旁边的一位交通员说：“你一个人送，太集中了，有危险！我送一部分！”毛泽民随即说：“现在离起义只有十多个小时了，要分批送。希钧，你仍雇一辆黄包车到庆云里去。”又对交通员说：“你马上化装把这包送到商务印书馆去！”

毛泽民让钱希钧穿得讲究一点，钱希钧身着墨绿花呢旗袍，绣花鞋，又穿上淡绿色大桂花针织毛背心，俨然是一个派头十足的老板娘。

毛泽民说：“这大印是党的命根子，是号令，你把它放到手提包里，把布告、文件放到箱子里，这样不容易被发现。”钱希钧将大印用手绢包好放进手提包里。

从培德里到庆云里，须通过反动军阀孙传芳的封锁线，敌人的大刀队把守着各条路口，对行人盘查很严。

钱希钧坐在黄包车上，路过繁华的西藏路口泥城桥时遇到警察搜查，钱希钧心里忐忑不安，但表情十分沉着、冷静，毫不在意似的让警察翻箱，警察翻着箱子里的布告、文件问：“这是啥东西？”钱希钧从容地回答：“是我

们公司明天的大减价广告。”警察仔细观察钱希钧的脸色，见她镇定自若，穿着讲究，派头十足，便说：“喔，老板娘，快点回去吧！”

钱希钧把大印送到庆云里，周恩来、王若飞等正在那里等待那枚大印。周恩来迎上来高兴地说：“你可安全送到了，路上一定很辛苦，也免不了遇到一些麻烦吧？”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1928年四五月间，一伙巡捕和包打听突然闯进印刷厂，发现了正在印刷中的共产党的宣传品，印刷厂被查封，毛泽民被抓，后交纳赎金被释放。

1929年初，毛泽民根据中央指示，转移到天津，在英租界广东道（今唐山道）47号办起了华新印刷厂，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毛泽民任经理，钱希钧随同前往。印刷厂对外公开承印发票、请柬、表格之类，对内印刷党内刊物、文件、传单等。毛泽民在小白楼先农里租了一套住房作为机关，凡是要印刷的刊物、文件、传单等先送到这里，再由钱希钧送到印刷厂去排版印刷。

1930年底，毛泽民奉党中央指示，再次返回上海，以开酒栈为掩护，继续领导党的地下发行工作，钱希钧也随之前往。

这时，他们得知嫂子杨开慧被反动派所杀，心中无比悲愤；同时又担心凶残的敌人将毛岸英三兄弟杀害，就建议党中央把三个孩子接到上海，放在大同幼稚园寄养。党中央同意了他们的建议，三个孩子就由他们的舅妈李崇德和外婆护送，辗转来到上海。毛岸英见到叔叔、婶婶，一头扑进他的怀里，放声痛哭，看到这情景，钱希钧禁不住流下了热泪。她将还不太懂事的岸青、岸龙紧紧搂在怀里，脸颊贴在孩子的额头上，轻轻地抚慰他们。毛泽民和钱希钧对三兄弟说：在上海要好好学习，不要打架，长大成人后，领他们去打反动派。

1931年4月，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毛泽民和钱希钧不得不离开上海。他们约定在公园和岸英兄弟告别，见面后再三嘱咐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和周围的小朋友搞好团结，并嘱托岸英照顾好两个年小的弟弟。岸英望着叔叔、婶婶问道：你们要走很远吗？多久再来看我们？你们能见到爸爸吗？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封信，要叔叔婶婶交给爸爸。毛泽民一口答应，后来他们到江西将信交给了毛泽东。

参加长征

1931年7月，钱希钧和毛泽民途经香港，到达闽粤赣根据地，稍作停留后，于秋天来到瑞金。毛泽民任苏维埃临时共和国银行的第一任行长，钱

希钧则担任了中央政府的党支部书记。在上海时，钱希钧在毛泽民的帮助下，学会了收支及往来账目的计算工作，因此来到江西还担任了银行的会计，成了毛泽民的得力助手。他们拼命工作，为改善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力地支持了反“围剿”的战斗。这期间，钱希钧还担任过《红色中华》的发行科长，出色地发行了数以万计的报纸。

1934年10月，钱希钧随中央红军撤离瑞金，开始进行长征。她与大嫂贺子珍一起编在干部休养连，这个连队分为休养员、工作组成员和政治战士。钱希钧她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土豪，向群众作宣传，雇请民夫，筹集粮款，了解民情和敌情。有时还要帮助担架员抬担架，鼓舞士气，帮助运送伤员，跟上队伍前进。

休养连是由伤病员和年老体弱的领导同志组成，本来没有直接的战斗任务。但是，由于环境险恶，她们也经常打一些遭遇战。钱希钧从不畏惧，每次战斗，都和其他女红军一起，为保卫伤病员和首长的安全坚持到援兵的到来。

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以后，继续北上，国民党蒋介石派出重兵前堵后追，飞机在天空侦察轰炸。当大嫂贺子珍负伤后。钱希钧与连里的负责同志一直守候在她身旁，注视着她的病情。

有一天，刚过完草地的一条河，走在后面的钱希钧，远远看到哥哥钱之光拄着一根棍子，摇摇晃晃地走过来，骨瘦如柴，步履蹒跚，身上什么行李物品都没有了。钱希钧马上迎上去问：“怎么回事？”哥哥叹息了一声。然后对她说，行李放在马背上，过河的时候，由于河水流得急，马被冲走了，只剩下一根棍子和一件毛衣。这件毛衣还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钱希钧买了毛线给他织成的。钱希钧接过毛衣一看，针眼里已经藏满了一堆堆虱子。

有一次，钱希钧她们来到四川凉山地区的一个村庄，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老乡都躲起来了，不见一个人影。钱希钧和同志们四处搜寻，终于在一个土司家里，找到了一位满面染黑的妇女，但无论怎么问，她都不开口。钱希钧耐心地用亲切温和的口气向她讲红军的政策，宣传党的方针，她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替穷人办事的，来帮助穷人打那些欺压他们的地主、土豪、恶霸的。我们不伤害穷人，我们路过这里没有吃的，是想向你们买些吃的……”最后终于使这位妇女消除了惊恐与疑虑，流露出信任的表情。她洗掉脸上的黑灰，拿来粮食，在屋子中间架起铁锅，为红军烙大饼吃。她还向钱希钧等诉说了自己不幸的遭遇，要求跟红军走。正是由于钱希钧和同志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用红军的实际行动使人民群众真正了解了红军，感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因而真心实意地支持红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钱希钧等一批勇敢的女红军，历尽艰难困苦，终于走出了敌人的重围，挺进到了抗日前线。

密送巨款到西安

红军到达陕北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时，毛泽民出任国民经济部部长，来抓这一棘手的问题。钱希钧也随同毛泽民在国民经济部工作。担任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长。为了使边区尽快摆脱严重经济困难，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重返上海十里洋场，执行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

那是1937年初，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国际工人阶级募集了一笔数字可观的美钞，从法国巴黎秘密寄到了上海。但是，这笔巨款在敌占区，而且只有换成通用的法币，才能为我所用。党中央把取款、换币并秘密运送到西安红军联络处的任务交给了毛泽民、钱之光、任楚轩、危拱之和钱希钧等人。

1937年初春，他们先后抵达上海。为了作掩护，开了一爿纸行，毛泽民当“老板”、钱希钧当“老板娘”。一切安排就绪，毛泽民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手中接过了那笔巨款，藏在自己的住处。他装扮成阔佬，每天出入各种交易所，分期分批地兑币。钱希钧等人负责运送。这项工作极其秘密，随时都有危险。为了不使捐款落入敌人之手，他们活动时都要乔装打扮。钱希钧有时扮成国民党的军官夫人，有时扮成到西安城里进香拜佛的阔太太，来回奔波在上海和西安之间。每当她看到自己一身华贵的衣服，扮成阔太太大摇大摆的模样，内心都会感到十分好笑，但一种保护人民财产、缓解根据地经费紧张的责任感，促使她认真去做。由于大家机智勇敢，协心齐力，到“八一三”日本攻占上海之前，终于全部完成了兑换、运送任务。

重新组建家庭

1938年初春，由于过度劳累，毛泽民身患重病，为了使他得到休息，中央安排他去苏联养病学习，钱希钧随行同往。这年冬天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由于中苏边界正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他们只好留在那里。1939年，钱希钧离开毛泽民，返回延安。

在延安，钱希钧先后进马列学院学习，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合作社工作，并担任了妇女主任，还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了两年。在这一时期，钱希钧和周小鼎相识相爱，重新建立了家庭。1946年初，两人一起去上海工作，钱希钧担任了沪西区委的组织部长。1948年，和周小鼎、黄河等人领导了著名的申新纺织第九厂“二二”大罢工。此后，钱希钧一直在上

海领导工人运动。解放前夕，她组织了工人进行护厂斗争，做出突出的成绩。

解放后，她先后担任了食品局副局长、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是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在江西逝世。

弟媳朱丹华

朱丹华，又名朱旦华，江西人。1940年与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结婚。

1937年，共产党员朱丹华受命去新疆做统战工作。她活泼、机灵，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作非常出色，打进地方实力派的内圈，同军阀盛世才的老婆接触甚密。

1938年，毛泽民赴苏联治病，途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因路途鼠疫盛行，同时受到盛世才的邀留，暂顿新疆。毛泽民当时化名“周彬”，出任新疆财政厅副厅长，其夫人钱希钧也留在新疆工作。1939年，钱希钧离开毛泽民返回延安，毛泽民当时在新疆的处境十分艰难，孤身一人、又患重病，周围的服务人员都是特务，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有一个小司机见“周厅长”是个好人，整天勤勤恳恳地工作，便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派来监视你的。”毛泽民看到这个青年心地较纯，就教他一些应付上司的策略。

朱丹华就是在毛泽民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他身边的。有一次，毛泽民出席研究新疆财政的会议，在会上提出改革税制，按资本和利润的多寡决定税率的高低，以及限制军阀随意派款、堵塞贪污漏洞等意见，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争论。朱丹华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她认为“周厅长”言之有理，表示支持。当时，她并不知道此人是共产党员，更不知他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

朱丹华的态度引起了毛泽民的注意和好感。以后，两人接触渐多，互生爱慕之情。1940年，毛泽民去苏联动手术，回来后即同朱丹华结婚。1941年2月，朱丹华生子毛远新。

1942年9月，盛世才破坏与中共达成的统战协定，将包括毛泽民一家在内的150多人拘禁起来，直到1946年7月，经党中央多次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营救，以及张治中的援助，朱丹华等人才得以返回延安。

受拘禁期间，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等壮烈牺牲，还有的同志被敌人迫害病死在狱中。在生死考验面前，有的人却当了可耻的叛徒。朱丹华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她们20多个女囚身边带着20多个5岁以下的小孩子，被关押在一起。关在西河坝时，朱丹华和大家

一起不顾看守的阻挠，开展各种集体活动，她们提出“变监狱为学校”的口号，组织学习，轮流看孩子。1944年秋冬，朱丹华等人被关进第四监狱。这里的条件更恶劣了，阴森森的不见阳光的牢房，吃的是两顿发霉带沙子的粗馒头，没有菜。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体弱多病。朱丹华等人常常托看守卖掉一些衣服被单，再买回一些食品，给孩子们增加一点营养。她们集体向看守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送孩子去医院看病。在她们的不懈斗争下，看守最后不得不同意了她们的要求。朱丹华在狱中还参加了支援男牢房的绝食斗争。身陷囹圄4年，朱丹华没有屈服，始终同大家一起，坚持斗争，患难与共，克服了种种折磨，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回到延安后，朱丹华同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结婚。1950年，方志纯和朱丹华偕正在读书的毛远新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喜欢毛远新，其中有怀念弟弟的原故，提出接毛远新到自己身边抚养。经过商量，朱丹华同意了，但是要求儿子每逢假期一定要去南方看望母亲。儿子的成长，朱丹华一直非常关注。本来盼子成才，为国为民多做贡献，不曾料到，儿子在“文革”中步入误区，陷得极深，对人民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行，被判刑17年，关入秦城监狱。作为母亲，朱丹华心情不胜悲凉，时常仰望天空，喟然长叹：儿子落到这等地步，如何向故人毛泽民交代？

建国后，朱丹华曾任江西省人大委员、省妇联主任、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小弟毛泽覃

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字咏菊，又名润菊、泽淋，1905年9月25日出生。六七岁发蒙，曾在清溪寺、瓦子坪等处求学。毛泽东很喜爱这个活泼、天真的小弟弟。

在毛泽东身边成长

1918年，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受聘为一师附小主事，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他将毛泽覃从韶山带到长沙，入第一师范附小学习。

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毛泽覃被分配在第14班学习。在当时革命新思潮的影响下，同时在大哥毛泽东的教育影响下，他那幼小的心灵里，就有红色的种子在萌芽。他经常和许文亮、易礼耕等接受革命思想影响较快的同学一起，议论中国和世界的大事，批评国家和社会的腐败，遇到一些不平等、不合理的事情，就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有一次过中秋节，学校

的庶务熊某办了一些好菜，但只给老师吃，不给工友吃，毛泽覃很气愤，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当时任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工友们都称赞他是一个关心工人生活的好孩子。

毛泽覃从附小毕业后，转入一个中学就读。

毛泽覃从进一师附小到离开长沙，前后整整 5 年，一直生活在大哥毛泽东身边。那时，他的年纪虽然不大，但是，现实生活中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压迫下遭受的种种苦难和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建立中共湘区党委等一系列活动，为了挽救祖国危亡和人民的痛苦，组织和领导人民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实践，使毛泽覃较早地接触到马列主义和接受了革命风暴的洗礼，迅速成长起来。1921 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 年秋，毛泽覃进入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时，亲自创办的一所培养斗争骨干的学校。自修大学还附设了一个补习学校。补习学校于 1922 年 9 月开办，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由何叔衡主持，夏明翰、毛泽民、罗学瓚等任教职员。毛泽覃在自修大学学习期间，身体力行，一有机会，就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和参加斗争实践。他曾到长沙码头创办过工人夜校，深受工人的好评。还曾到远离长沙的一个矿山去参加罢工斗争，历时一个多月。

1922 年 5 月，毛泽东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时，和杨开慧住在湘区党委机关所在地——清水塘。毛泽覃和另外几个补习学校的学员，也曾住在这里。有一次，他们看到毛泽东和杨开慧有一个小箱子，当作宝贝一样，放在枕头底下，不知里面装着什么，就把这个小箱子藏了起来。这个小箱子是放党内文件的，杨开慧发现丢了以后，非常着急，和母亲向老太太到处寻找。后来发现是他们干的好事后，毛泽东狠狠地把毛泽覃克了一顿。

接受新的考验

1922 年 11 月，水口山的铅锌矿工人成立俱乐部。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湘区党委和毛泽东决定派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去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

1923 年 3 月底，毛泽覃等几个青年，乘坐去衡阳的小火轮离开长沙。毛泽东到码头送行，再三嘱咐弟弟，到水口山以后，要好好锻炼和改造自己，要到敲砂棚去敲砂，要到矿井里去劳动。泽覃含着晶莹的泪花，向哥哥挥手告别。

毛泽覃和朱舜华到水口山后，担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兼任工人学校教员，并以此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毛泽覃分工负责团的工作，具体联系机械科的工人和团员。他遵照大哥毛泽东的教导，经常到敲砂棚、机器间、矿井里去劳动，每个星期天，总要下到矿井里去，和工人一道采掘矿砂，体验工人生活。

1923年10月，毛泽覃在水口山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这年年底，湖南军阀赵恒惕派他的亲信率领反动武装，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包围工人俱乐部，逮捕和屠杀工人，在蒋先云领导下，毛泽覃临危不惧，迅速处理和转移文件，并率领广大工人与反动军警进行英勇的斗争。后来他们被宋乔生、陈梅生等许多工人巧妙地保护起来，继续坚持工作和斗争。不久，毛泽覃调往长沙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处书记。他按照党的指示，经常深入工厂、码头、学校，向青年工人及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他善于根据青年特点开展工作，积极引导他们走共产党指明的道路。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成为坚强的战士。

1925年春，毛泽东及杨开慧由上海回韶山，一面养病，一面从事农民运动。这时，毛泽民、毛泽覃也随兄嫂回韶山从事农运工作。毛泽覃曾到银田镇的白庙开办农民夜校，他白天给小学生上课，晚上仍在小学教室给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上课，以讲故事的形式吸引大家，如《水浒传》中李逵的故事，《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故事等等，讲得非常生动，大家都听得聚精会神。讲完故事后，把话题一转，揭露帝国主义及土豪劣绅，耐心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

1925年秋天，军阀赵恒惕通缉毛泽东。毛泽覃按照大哥的意见，先行去广州，接洽有关工作。此后，跟随毛泽东在广州黄埔军校和广东区委从事革命活动。这期间，同周文楠结婚。

毛泽覃在广州工作期间，正值我党领导各个革命阶级和阶层同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各种反动势力激烈斗争的时期，也是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尖锐斗争的时期。毛泽覃在这个时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与资产阶级新老右派和党内右倾错误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在黄埔军校时，毛泽覃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与党派到军校学习和工作的蒋先云等一道，对蒋介石一伙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目睹蒋介石策划的“中山舰事件”和他抛出的“整理党务案”，又看到陈独秀节节退让、妥协投降的情况，毛泽覃极为气愤和不满，他曾经对一位党内同志毫不含糊地

说，我大哥和老头子（指陈独秀）的意见不同，老头子的一些观点和搞法很不对头。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覃奉党的指示，偕周文楠乘船经上海转移到武汉。在船上碰见了二哥毛泽民。到武汉以后，他们很快就到武昌都府堤找到了大哥毛泽东。根据毛泽覃的要求，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授上尉军衔。这时，汪精卫正在与蒋介石暗中勾结，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

一天，毛泽东把两个弟弟叫到都府堤住处，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方桌旁边，以打麻将为掩护，分析形势，决定今后各人的去向。毛泽东说，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着别人屠戮，要尽快地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毛泽覃表示要随部队到江西去。不久，他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兄弟三人各自奔赴自己的岗位，即将生产的周文楠同刚生过孩子的杨开慧返回湖南。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夕，毛泽覃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到达九江。叶剑英参谋长得悉汪精卫要“清党”，准备逮捕第四军政治部中的共产党员，便立即布置我党党员迅速转移。毛泽覃化装离开九江，赶往南昌，参加起义。由于途中受敌人所阻，未能及时赶到。他到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撤离南下。他在城门口遭到反动军警的盘查，但见他身穿长衫，藏有第四军军部上尉书记官的符号，不知真假，卫兵带他去见上司。他说自己是奉军部命令到此，负重要任务，谁敢扣留，将来定要严加惩处。敌人见他神色镇定，恐怕抓错，就客气地放了他。毛泽覃机智地脱险后，立即南下追赶起义大军。脚走烂了，钱用光了，只好卖掉了长衫做路费。快到临川时，又被起义军哨兵当成敌人的奸细扣留，将他押解到临川，好在周恩来等几位领导都认识他，总算赶上了队伍，并被安排到叶挺当军长的十一军政治部工作。部队转战潮、汕地区，终因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而失败。毛泽覃又随一部分部队转移至饶平，然后与朱德、陈毅率领的从三河坝撤下来的部队会合。随后转战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大庾、汝城、韶关一带山区。在得知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走上井冈山的消息后，朱德立即派毛泽覃去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

毛泽覃化名覃泽，身穿一套国民党正规军军官的军服，带着国民党第十六军副官的证件，顺利地通过一道道关卡，来到井冈山茶陵坑口。坑口处于茶陵与宁冈交界处，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后，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

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为了保证我军前线和后方的交通联络，掩护与接送伤病员，通过袁文才同当地某些人的关系，我军派出了一个没有暴露工农革命军身份的连队，以“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驻扎在坑口，连长叫陈伯钧。

毛泽覃首先找到地方上的一些当权人物打交道。当时，住在坑口的伪团长罗克少，闻报有一位国民党正规军的长官来到这里，立即率领一班土豪劣绅出来迎接。他看了毛泽覃的证件以后，又听他讲话的口气很硬，不敢怠慢，立即命令摆酒接风，设宴招待，晚上还陪着打了几圈麻将。毛泽覃机警地与敌人周旋之后，打听到有井冈山的一个连队驻扎在这里，便找到了该连的驻地，连长陈伯钧得知这位“特殊身份”的人物与毛泽东的关系和他所负的使命以后，立即派人送他上井冈山。毛泽覃终于找到了大哥毛泽东，汇报了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留下的部分队伍艰苦转战到湘南的情况。随后毛泽覃就留在了井冈山。

不久，毛泽东派毛泽覃到乔林开展工作，从事建党活动。毛泽覃率领两个部队干部，离开茅坪，毛泽东去送行，叮嘱他们，要在广大农村迅速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培养先进的工农分子入党。在乔林，泽覃深入贫苦农民家庭，调查乔林乡的阶级状况，并以夜校为阵地，用本村本乡的典型事例，启发农民的觉悟。后发动上千农民打土豪，又在斗争中培养骨干，于1928年2月，建立起乔林乡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

1928年初，毛泽东率部向遂川进军，打垮了肖家壁和罗普权的靖卫团，攻占遂川县城。毛泽覃参加了这次战斗。战斗结束后，随部队留在遂川，担任团政治部代理主任，并任遂川县委委员和县游击大队党代表。

这年2月，毛泽覃又在大哥毛泽东的指挥下，机智勇敢地参加了攻打新城的战斗，身先士卒，攻入城内，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活捉了伪县长。在宁冈砦市召开万人公审大会上，毛泽覃亲自将伪县长处决，人心大快。会上宣布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毛泽覃兼任宣传部长。

新城战斗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与扩大。此时，毛泽覃又接受新的任务，毛泽东命他率领一个特务连去与朱德、陈毅联系，迎接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队伍和湖南年关暴动的农军上井冈山。

毛泽覃本来就是奉朱德、陈毅之命到井冈山与毛委员取得联系的，后留在井冈山工作，现又奉命下山去与朱德、陈毅联系，迎接他们上井冈山，毛泽覃当然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使命，立即率部队出发。他穿一身灰布军装，脚上打着绑腿，背着短枪，英姿勃发地同战士一起穿行在万山丛中，日

夜兼程，赶往湘南耒阳县，在耒阳城郊找到了朱德、陈毅，向他们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根据目前形势，湘南起义部队要在湘南站住脚是不可能的。部队必须向井冈山靠拢，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毛泽覃完成了一次特殊使命，促成了朱德、毛泽东两支部队的会合。

1928年4月，朱德、陈毅根据他们早已下定的决心：到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同志。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坚持不懈的斗争，排除“左”倾错误的干扰，朱、陈毅然率领部队走上井冈山，于月底在宁冈的砦市与毛泽东的队伍胜利会师。5月4日，在砦市召开会师大会，宣告中国红军第四军成立，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毛泽覃任该军三十一团一个营的党代表。从此，井冈山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从南昌起义到两军会师，毛泽覃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中国革命惟一正确的道路。以后他经常向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宣传“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理，批判那种“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错误思想，不断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和胜利信心。他在宁冈砦市向红军传达毛委员的指示时，斩钉截铁地说：“红旗是能够永远打下去的，一定要打到底！”他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宣传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是穷人的亲人，红军保护人民，人民帮助红军，红军和人民是一家人。红军武器少，又能打胜仗，就是靠人民群众的支援，群众是共产党和红军的“城墙”。国民党反动派的城墙在南昌、吉安，是土做的，一打就倒。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城墙”是打不倒的。

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毛泽覃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联系群众，遵守纪律，办事机智又有魄力，性格开朗，具有高度的革命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跟随在毛委员和朱军长的身边，生龙活虎地战斗在井冈山根据地，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睡的是稻草铺，既做群众工作，又带兵打仗，为巩固与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8年5月，毛泽覃率领部队参加了五斗江和草市坳的战斗。草市坳战斗后，毛泽覃率三十一团一部由永新县转战到吉安县敖城一带，进行游击活动。他们在当地张贴标语，深入群众，发动农民起来暴动，成立了100多人的赤卫大队。毛泽覃代表红四军发给他们四条枪，并在赤卫大队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农民世代受豪绅的压迫，痛苦不堪，现在大家要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我代表红四军把这四条枪送给你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去干，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扩大革命武装。”临别前夕，毛泽覃还用红布做了一面锦旗，题写“工农先锋”四个大字，送给当地党组织，鼓励

他们积极革命。不久，这个赤卫大队很快扩大成为拥有 500 多人枪的地方游击队。

不久，毛泽覃率部队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龙源口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毛泽覃指挥他的部队打得勇猛而又机智。在夺取一个已被敌人占领的山头时，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扫射，他认为强攻对我不利，果敢地派出一部分部队抄小路打上去，出其不意地夺取敌人的阵地。在两个烧炭的老乡引导下，部分战士从敌人的背后冲上山头。当山头上一打响，毛泽覃立即率领部队勇猛地冲杀上山，夺取敌人的机枪阵地。战士们抓住敌人丢下的四挺机枪，掉转枪口，向朝着山下逃命的敌军猛扫。随后，毛泽覃大喊：“冲啊！”战士们如离弦的箭，向山下冲去，杀得敌军鬼哭狼嚎，尸横遍野。

1928 年底，毛泽覃在大庾战斗中负伤，被留在地方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一边养伤，一边工作。

毛泽覃任东固区委书记以后，深入群众，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地方武装。这年夏天，毛泽覃打听到离东固不远的水南，盘踞着两个属于地方军阀的反动部队，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不仅群众愤恨，也引起他们自己士兵的不满，有投奔红军的念头。于是，毛泽覃戴一副眼镜，身穿长衫，化装成一个算命先生，前往水南，探究虚实。毛泽覃单身闯虎穴，说服当地一个老乡，把他带到水南镇一个酒店里，与有意“倒戈投红”的士兵进行秘密会谈，终于策动 400 多人枪向红军投诚，使我地方武装得到发展。

1930 年初，黄公略任红三军军长，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代行政委职权，和军长黄公略一道，率领该军在赣水两岸开展游击战争。1930 年 10 月，毛泽覃被任命为中共吉安县委书记、赣西南后方办事处主任。

在第一、二次反“围剿”期间，毛泽覃主持赣西南后方办事处，负责筹集钱粮物资，领导军工生产。办事处下面设有兵站、兵工厂、被服厂、特务连，共计 300 多人。反“围剿”中缴获的武器，凡损坏的都送到这里来修理，凭着极其简陋的设备，全靠两只手，千方百计地尽快修好，源源送往前方，有力地支援了反“围剿”的斗争。还有打土豪得来的或用别的方法筹集的大批金银、粮油等物资，均由毛泽覃负责设法运往部队，许多重要物资，都是由他亲自率领特务连的战士护送，跋山涉水，披星戴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0 年冬，毛泽东在去永丰县君埠的路上，碰见两个红军战士正押着一个青年往君田村走去，背后一位老太婆跌跌撞撞地哭着，毛泽东急忙上前扶住老太婆，喝住两个红军战士。当毛泽东听说是毛泽覃所部在搞“扩红”

时，怒不可遏。当晚，毛泽覃办公室里灯光通宵达旦，屋里隐隐约约传出激烈的争吵声。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次争吵时讲，他当时急了，挥拳要揍泽覃。泽覃大声说：这是革命队伍，不是毛氏祠堂。次日，毛泽覃找到这位青年赔礼道歉，并把他送回家去。老太婆见儿子回来，急忙追出门外，毛泽覃连忙向她作了检讨。

经过这件事情的教训之后，毛泽覃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既大刀阔斧，又细致谨慎，特别注意贯彻党的政策，改进工作作风。当时，国民党反动军队不断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永、吉、太一带的许多地方遭到严重破坏。毛泽覃根据党的指示，千方百计救济群众，恢复生产，曾先后数次亲自带着大批粮食、耕牛、衣服、救济款和医疗队到遭受白匪残害的东固等地慰问，把党和红军的温暖带给广大的苏区人民。当了解到一个姓张的贫苦农民家里极为贫困，连条被子也没有时，毛泽覃便把红军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组织上分配给他的一条被子送给了这位农民。一次，东固区将一笔救济款未发给群众，而用来修了一栋楼房，毛泽覃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区苏维埃政府负责同志，指出：这笔钱是用来救济群众和恢复生产的，拿来给区机关盖楼房是错误的。

第二次反“围剿”以后，1931年6月，成立永（丰）、吉（安）、太（和）特委（后又改为中心县委），毛泽覃任书记，兼独立师政委。第三次反“围剿”期间，他和师长肖克一道，根据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的作战命令，率领该师在富田一带牵制陈诚、罗卓英的增援部队，到处袭击敌人，阻止他们前进，配合主力红军在各处完成歼敌任务。老营盘、方石岭战斗以后，红三军在转移中，黄公略军长不幸中弹牺牲。临终前，他叮嘱在身边的毛泽覃，要他在前委和总部未任命新的军长以前，代为指挥全军的工作。黄公略牺牲后，中华苏维埃为纪念黄公略，决定将吉安县改为公略县，由毛泽覃任公略县委书记。萧克调去湘鄂赣根据地工作以后，又由毛泽覃兼任独立师师长。

这期间，毛泽覃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结成夫妻。贺怡也在公略县委工作，任县委妇女部部长。贺家姐妹俩又成了毛家妯娌俩。

与王明“左”倾路线抗争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接着就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央苏区，他们又无理地给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扣上“‘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人”的帽子，开展反对邓、毛、谢、古的

所谓“反党派别”的斗争。

当时，邓小平任会昌、寻部、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唯俊先后担任江西省军区参谋长、长安中心县委书记，古柏任总前委秘书长，都是江西省委的主要成员。他们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针对“左”倾错误的“城市中心论”，邓、毛、谢、古等人明确提出“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敌人的统治力量强大，应该向着广大农村发展，也就是“左”倾错误领导所说的“高山深沟”、“穷乡僻壤”，只有那里“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因此，他们反对攻打敌人设防坚固的赣州，主张在苏区内肃清地主阶级的“土围子”，巩固农村根据地，积蓄力量，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而“左”倾错误领导则说这是对红军的“悲观失望”和“放弃苏维埃根据地”，是对抗“党的主张”，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对于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他们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较好的苏区来消灭，反对“左”倾领导把红军拉到白区去硬拼，把敌人挡在根据地的大门以外作战。“左”倾错误领导攻击他们这种主张是“退却逃跑”，是“根本不相信红军有力量在白区消灭敌人”。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毛泽覃在永、公、泰地区，认为红军攻坚困难，应在苏区作战，也被“左”倾错误领导攻击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永、公、泰的单纯防御路线”。

对于扩大革命武装的问题，他们对“左”倾错误领导提出的“武装一切工农群众”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不断发展，并应注意质量，反对用削弱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反对不顾质量地要求“武装一切工农群众”、单从数量上扩大地方武装的做法。“左”倾错误领导则污蔑这些意见是“实行对扩大红军总工”，提出要“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并将群众的地方武装成建制地抽走，编入正规红军，又不求质量地“号召所有一切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且不合时宜地鼓吹要“准备从自愿军役制变到义务军役制”。

对于苏区财政来源的政策问题，他们不同意“左”倾错误领导不顾民力，大量发行公债的做法，认为苏区地瘠民穷，加上连年作战，“群众负担过重”，红军应着重“打土豪筹款子”。而“左”倾错误领导则认为他们的这些意见是对抗党的“决议”，是“对党的路线总工”。

对于土地问题，他们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反对王明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

误主张。毛泽覃在永、公、泰，谢维俊在乐安，都因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了这一原则，而遭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被扣上“富农路线”的帽子，攻击“在他们工作过的地方，是土地问题最没有彻底解决的地方”，说他们的做法“是与党的进攻路线绝对相反的”。

正因为他们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政策，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攻击为执行了一条“反国际反中央”的路线，结成了“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不断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毛泽覃面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攻击，不畏缩，不动摇，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他说：你们这些“洋房子先生”，在大城市执行的是“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执行的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又针对他们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把手伸进各个革命根据地企图打倒一大批红军和地方负责同志的行为，说：你们这些“洋房子先生”到苏区来四处“找岔子”，只不过表明你们是“一派的领袖”，并不代表党，而只代表“派别的首领”。谢唯俊和古柏支持毛泽覃，也发表过与他相同的意见。为此，“左”倾错误领导指责他们“进行反中央局的活动”，“形成一种秘密的结合”。当“左”倾教条主义者点了他们的名，责令他们做出“申明”和“检查”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看法，将一些污蔑和攻击的不实之词顶了回去。

1933年5月上旬，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在宁都召开的“江西省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认为临时中央迁入苏区以后，江西党三个月的工作是落在革命战争需要之后的，没有完成“紧急动员”、“扩大红军”等任务，原因在于江西党内有一个“怪物”障碍了工作的进行。这个“怪物”就是所谓“单纯防御”的“罗明路线”，而邓、毛、谢、古“就是这个怪物的代表”，“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勒令他们“立即解散”；“否则立即开除出党”。会议还决定给他们以处分，全部或部分地撤销了他们在红军、地方和党的机关的重要职务，并在会上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到基层去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做出新的检查，“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毛泽覃的妻子贺怡，当时也受到谴责，并要她揭发毛泽覃。她想不通，就跑到姐姐贺子珍家诉说。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

邓、毛、谢、古在总结会议后一段时间，被先后派遣到宁都、兴国等县农村劳动。随后又被安排在红军宣传部门、中央派往基层协助工作的“工作

团”、政府业务部门和中央苏区北线的偏远地区等处工作。

毛泽覃在基层，结合自己负责的实际工作，撰写文章，坚持批评“左”倾错误领导，他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空谈马列词句，脱离革命实际，大搞过火斗争，实行惩办主义等种种不良作风，指出：讲解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一定要联系到实际工作”，否则，“如果空谈一顿，随你讲得起花也还是老样子”。又说：不管有无错误或错误大小，凡是对上面的意见和做法，有不同看法或贯彻不力的，一律给予“惩办”，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倾向”，是没有将机会主义分子与有个别错误观点的同志分别开来，甚至“有些将个别的错误认为是路线上的错误”，“没有将错误的轻重、根本的或个别的、能够改正错误的和不能改正错误的分别开来”，一下子就做出撤销职务的“结论”，“形成一种惩办的形式”，“这种倾向是非常有害的”。针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扩大红军、粮食征集等工作中，“动员很多方面的干部集中力量突击”，而对其他工作一概“放松”，取消党、团和各个部门的正常工作的错误做法，毛泽覃尖锐地指出：企图取消各个组织的工作，把干部力量一概集中在一个部门之下、一项工作之中，形成立三路线时代的行动委员会的方式，这种搞法是机会主义的，是非常错误的。毛泽覃响亮地提出要“开展反对官僚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斗争”，坚决“扫除这种障碍”。毛泽覃的这些意见，是针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勇敢回击。

当时，毛泽东亦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排斥和打击。职务减少了，空闲增加了。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经常深入基层，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毛泽覃有时也跟随毛泽东去搞农村调查。

在长冈乡搞调查中，有的干部向毛泽覃提出，该乡已有80%的青壮年参军，劳力不足，应该想个办法。女共产党员李玉英立即站起来建议，把妇女组织起来学犁田，并且表示，自己愿意带头。在李玉英的带动下，20多天，全乡四个村有130多位妇女学会了犁耙。毛泽覃返回瑞金后，向毛泽东汇报了长冈乡妇女学犁耙的情况。毛泽东很赞赏，在瑞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名义，奖给了长冈乡两头耕牛，奖给了李玉英一条蓝色围裙。这条蓝围裙上端镶着红色的条边，贴胸处有一颗红五星，上面绣着镰刀和斧头的图案。

坚持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毛泽覃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的爱人贺怡因为身怀有孕，由一个同志护送转移到她在白区的老家，隐蔽起

来。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毛泽覃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在闽赣边界、武夷山区。1934年冬天，毛泽覃指挥部队在谢坊伏击敌人，取得了击毙敌团长一人，缴枪100多支，俘敌数十名的战果。

1935年1月，毛泽覃根据中央分局的统一安排，率领独立师的一部前往福建长汀的四都，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军区司令龙腾云率领的队伍会合整编，成立新的闽赣边界军区领导机构，毛泽覃是军区司令部的领导成员。4月上旬，部队在腊口西分水坳被敌人包围，伤亡惨重。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率领游击队穿山越岭，越涧涉溪，来到瑞金县黄膳口附近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之中，26日凌晨敌人在叛徒的带领下，包围了休息地。毛泽覃听到枪声，立即冲到门口担任掩护，部分战士得以突围，毛泽覃则被一颗子弹击中前胸，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毛泽覃牺牲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浸沾着血迹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还有党证，才知道他就是毛泽东的亲弟弟。解放后，人们在毛泽覃牺牲地搜寻遗骨无着，但却找到一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3年颁发的红星奖章，证号是第26号。

弟媳赵先桂

赵先桂是赵蕊香之女，1905年9月5日生于湖南湘乡县凤音乡（今韶山区大坪乡湘韶村）。1924年夏与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结婚。后离婚改嫁裴光。1932年牺牲。

赵先桂出身于一个殷实富裕之家，父亲赵蕊香亦农亦商，在乡镇开了“吉春堂”大商号，有药材、肉食、杂货等几个铺面，生意红火，买卖兴隆。赵蕊香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素有生意来往。毛顺生在做贩运谷米、生猪和耕牛的买卖时，自家纸票周转不开，便借用“吉春堂”的纸票。两人可谓生意场上的朋友，关系甚好。

赵家和毛家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赵蕊香的姐姐嫁给了毛顺生的妻兄文玉瑞，是毛顺生的妻嫂。文玉瑞（排行第七）和文赵氏（赵蕊香的姐姐）是毛泽东的七舅父、七舅母，毛泽东自幼认他们为干爹、干妈。因此，毛赵两家感情深厚，交往较多。赵先桂和毛泽覃是同年同月（即1905年9月）出生，毛泽覃是25日，比赵先桂晚20天。在他俩出生前，已被“指腹为婚”，这是完全彻底由父母包办的典型的封建婚姻。不过，因他们两家有亲戚关系，自小青梅竹马，感情甚好。毛泽覃在1918年由哥哥带到长沙读书。之后，毛泽东又带赵先桂到长沙求学。同时在长沙的还有杨开慧、毛泽民、王淑兰等，时常聚食一处。毛泽东在给干妈七舅母的信中还说：“甥今年住

家读书，没有在外边做事，幸喜身体还好，每天也还快活。泽民、泽覃、淑兰、先桂、泽建、开慧都好，不劳挂念。”毛泽覃与赵先桂在寒暑假回家。也结伴同行。毛泽覃在母亲去世后，回韶山常住在亲戚赵家。赵先桂于1923年在长沙古稻田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暑期，赵先桂同毛泽覃在韶山东茅塘正式成亲。婚礼仪式非常简单，由胞兄赵储琳送亲，表兄文润泉当介绍人，毛泽覃堂伯父毛麓钟做主婚人。

婚后，他们同居时间不长，因工作需要，分赴南北异处。1925年10月，赵先桂受党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与山东省委宣传部长裴光结婚。1932年夏牺牲于山东济南。毛泽覃亦于1925年秋赴广州工作，1926年夏同周文楠结婚，1927年去江西，1935年牺牲。

弟媳周文楠

周文楠，是周模彬和周陈轩之女。湖南长沙人，生于1910年11月。又名周润芳、周荀年。1926年同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结婚。毛泽覃牺牲后，改嫁王英樵。

两次被捕 险中遇奇

周文楠出身官宦人家，父亲周模彬在清朝时任过知县、知州，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名望。从一张过去的照片上看，很难想象周文楠出身这样的家庭，她个头较小，1.5米左右，身材孱弱，额头、颧骨稍高，细长眼睛，脑后梳着发髻，倒像江南水乡农村妇女的模样。可是，实际接触，方知她性格刚毅、举止利落，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灵气，颇有其父气质。

早年，周文楠背叛了封建家庭，参加革命，其母亦和她志同道合。1925年，母女俩在长沙小吴门松桂园1号的家里，协助党组织收藏、保管和传递党的机密文件，掩护党的地下工作。湖南早期革命活动家郭亮、夏明瀚、萧三及毛氏三兄弟都来过周家，在那里开会，研究工作，从事革命活动。

1927年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面对反革命的血腥屠刀，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惶恐动摇，声明脱党，有的甚至变节反共，投入敌人的怀抱。但周文楠毫不畏惧，这年9月8日，她在长沙生下儿子毛楚雄。产后不久，便拖着虚弱的身子，毅然投入长沙的地下工作，继续同反动派作斗争。

1928年春，周文楠不幸被捕。在狱中，任敌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她始终坚贞不屈。她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然而幸运的是，1930年彭德怀率领红军打开长沙城，她被解救出狱。

出狱后，周文楠回家作了短暂的停留，便加入了彭德怀的部队。不久，她随部队辗转到了江西苏区。在那里，她被安排进红三军团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毕业后分到十六军政治部做宣传工作。

1934年10月，红军撤离江西，举行长征。由于工作需要，周文楠留在江西，在罗霄山脉中段打游击。1935年春，在莲花县一次游击行动中，她与部队失去联系，在寻找部队时，被地方反动武装所俘。落到了这帮匪兵地头蛇手里，本来是难以生还，注定一死的。可是不曾料到，她又一次脱险了，而且方式极为奇特。一天，县里突然把她从区署调去，然后来了一乘轻轿，不容分说，便把她载上，悄悄地送出，她就这样被释放了。事过17年，即1952年，在审干中的一封来信，才解开了周文楠心中多年的疑团。信写道：

文楠姑婆：

日前奉到手示，敬悉您的身体违和，甚为系念！敬祈妥为调养，早复健康，是为至要。我过去在旧司法界工作，多年为反动统治者服务，对人民是有罪恶的。去年得你介绍，得省党及政府的宽大，使我还能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真是衷心感激，没齿不忘。来示嘱将你在莲花县被俘得我营救情况函复，并另抄材料一份，以兹证明。兹将详情告知，乞赐明鉴。

我在莲花县任承审员时是1935年三四月间。你在莲花县境内被地方团队俘虏，当时我不知道，后接令兄（周自娱）由长沙来信，我即电话询问该区区长，有无俘虏你的情事，伊答确有其人。我说她是我姑母，请你准予自新，并请明日雇轿送来我处，我会拿钱（恐怕他们轻视你侮辱你）……翌日，我等了好久，才见你来，我真快活得很……当时区署送你来时没有办什么公文，也没有什么口供，你到县后，也没有办过什么自新手续，更没有什么档案，所以当时电话该区区长准予自新者，意思就是要他们不要危害你，要他们送你来我处，以便送你回家。一切经过情形，我没有告诉你。你离莲花县时，我雇轿送你到界化陇，一则尊敬你，一则鼓励你。后来换了一个杨县长，说我亲释了两个重要共党（另一位是与文楠同时被俘的参谋长——编者注），暗里派人捉拿未获，报请高院将我派差，派了余某（湖南人）接替，公文到达后，适新任朱县

长到达，闻各界都说我公正廉明，又电请高院收回成命。此是你被俘后的经过详细也，余不多赘。专此敬祝身体健康，并叩侍祖母、祖姑夫健康！

侄孙周邦杰敬叩

1952.11.2

两次婚姻 爱存芳心

周文楠同毛泽覃是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相识相爱的。1925年秋天，毛泽覃赴广州工作。第二年7月，周文楠和母亲一起也到了广州，在母亲的操办下，她和毛泽覃完婚。当时，广州大革命的形势十分高涨，两人肩并肩地投入战斗，心情极其愉快、兴奋；同时朝夕相处，生活上互相照顾，小日子也过得非常和谐美满。这是两人相爱以来最美好的一段时光。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广州的形势急转直下，反动派到处捕人杀人，毛泽覃一家只得被迫转移。周文楠的母亲返回长沙，毛泽覃夫妇则转道上海，赴武汉。同年“八一五”汪精卫已实行反共，武汉又落入反革命之手。这里也无法立足了。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毛泽覃受党指派，赶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后随部队上了井冈山；周文楠因近临产，与毛泽覃分手，回到老家长沙。此后相当一段时间，两人中断了音讯。

1931年，周文楠在江西苏区听到了毛泽覃已和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结婚的消息，心里非常痛苦。但她明白，那是战争环境造成的，她没有怨恨，真心地祝愿他们生活幸福。

1936年冬，周文楠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从江西回到长沙。自从1928年春和家人分别，至今已有8年多了。她何尝不时时惦念着年幼的儿子和年近的母亲呵！当她推门进家时，泪水止不住地哗哗流淌。尤其是看见9岁的儿子向她投来陌生的眼神时，她的心都碎了，哽咽着喊道：“我是你的妈妈呀！”又见母亲苍苍白发，道道皱纹，深知其生活之艰辛，内心更是酸楚不堪。但她很快抑制住自己的伤感，想到这一切都是革命的代价。之后，她在长沙隐居下来。

1937年冬，党组织找到了她的下落，安排她在湖南省工委工作，并把她母亲和儿子转到韶山居住。不久，在延安的毛泽东获悉后，写信给一个亲戚，请他转交周文楠，要她去延安学习，并捎去公家出资的20块光洋作路费。1938年初，周文楠收到此信，立即去找帅孟奇。因为工作忙，人手少，帅孟奇暂时没同意她离开，直到1940年才成行。她又一次告别了母亲和儿子，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随同周恩来一起到延安。

在延安，她被安排到中央保育院任教员。这期间，和一同工作的王英樵渐渐相爱了。王英樵是河南人，1939年春到保育院小学任教导主任，1941年下半年任校长，1942年春调到边区政府教育厅任督学。1942年春，周文楠也调到边区政府工作，任干休所党支部书记。经过几年的接触、了解，周文楠对王英樵人品、性格、能力各方面都比较满意。两人商议结婚，并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婚姻自由嘛，这是1931年在江西苏区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就规定了的原则。你再婚，我不干预的。记住润菊是为革命牺牲的，他的精神不朽，值得我们活着的人思念。”周文楠听了，表情深沉地点了点头。这年，周文楠和王英樵结合了。

接母北迁 颐养天年

1943年，周文楠调往绥德分区实验小学继续做教育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和丈夫一起奔赴东北工作。到全国解放初期，她先后任辽宁省委党校支部书记，康平县、依安县公安局秘书，依安县法院院长，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庭长，沈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

周文楠是一位革命的母亲，为了让千千万万个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成长，使下一代过着幸福的生活，她忍受着母子分离的痛苦，两次把楚雄托付给母亲周陈轩照料，自己全身心地投入革命。1946年，毛楚雄在中原突围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周文楠事后获得这个噩耗，心情万分悲痛。她为楚雄没有得到更多的母爱而感到深深内疚，同时，也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好儿子而感到骄傲。

同时，周文楠又是一位人民的好儿女，为了使千千万万个母亲和儿女相聚，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她几次弃家别母，战斗在他乡异地。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初，周文楠在沈阳收到母亲的一封信，信中谈到：第四野战军南下路过韶山，许多人纷纷到毛泽东旧居参观，她趁此机会打听毛楚雄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没有消息，也不回家看望。信中还说，她一个人在韶山感到很孤单，生活无人照顾。周文楠接到此信，心里非常难过，她含着泪水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要求回湖南接母亲到东北和自己一起生活，路费问题请湖南省委按烈属规定予以解决。并把母亲的来信作为“附件”一同寄上。不久，毛泽东回复一信：

文楠同志：

来信收到，甚慰。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

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招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妥当，请你考虑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附件还你。江青她们都好。祝你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周文楠接到此信后，立即动身去湖南。途经北京，她特地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关心周陈轩老人的身体、生活等情况。为防止楚雄牺牲的消息给老人以意外打击，精神上承受不住，毛泽东对周文楠说：“你告诉外婆，就说我说了，楚雄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是韶山人民的好儿子，送他到国外很远的地方学习了，也不能通信，免得老人家受刺激。时间长了，慢慢也就好了，楚雄年龄不大，为国捐躯，虽死犹荣。”他还叮嘱道：“以后要好好照顾外婆，经常安慰她老人家，让她安度晚年。”

之后，周文楠来到韶山，见到母亲，瞒住了楚雄牺牲的消息，老人高高兴兴地和她一起回到东北定居，颐养天年。北迁之事如此顺利。周文楠心中一直对毛泽东充满感激之情。事隔几十年，她对此事记忆犹新。她说：“1950年春，我将老人寄给我的信转寄毛主席。毛主席接到信后很高兴。毛主席亲自写信给我，而且想得那么周到。”

建国初期，周文楠工作几经调动。1950年抗美援朝时，沈阳疏散人口，周文楠被调到泰安任县法院院长。1952年春又调到齐齐哈尔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1954年调到哈尔滨仍任原职。80年代初离休。

弟媳贺怡

在贺家几个孩子中，贺怡排在正中间，上有哥哥贺敏学和姐姐贺子珍。

贺怡（小名银圆）在家里的遭遇和姐姐贺子珍一样，不受重视。父亲为哥哥请来了教书先生，她们却没有权利趴上书桌，只好躲在门后偷偷听讲，倒也认识了不少字。

后来基督教渗入永新县，外国人开办了一所福音堂小学，分设男、女部，招收中国学生。父母看到女孩子入学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也就同意贺怡跟着姐姐贺子珍一起，插班进了福音堂小学的女部。哥哥贺敏学也进了永新的一所官办学校。不久因为哥哥贺敏学不“安安分分”读书，闹学潮，搞斗

争，被学校开除学籍，父母一怒之下，把兄妹3人反锁在楼上，不许出去。贺怡学着哥哥、姐姐的样，又从屋顶的天窗上爬了出来。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大革命进入高潮。已经加入了团组织的贺怡，每天像影子一样跟着姐姐贺子珍，前前后后地忙碌，办政治夜校。天天早出晚归，姐姐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姐姐做什么工作，她总是最得力的帮手。后来姐姐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妇女部第一任妇女部长后，她也担任了妇女部的副部长。她们与担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国民党县党部商民部部长的哥哥贺敏学商量，联名向国民党县党部提出对县城的地主豪绅分别采取“募捐打粮”和“武装打粮”的办法。“募捐打粮”就是用说服动员的方法，让他们自己拿出钱粮来支援革命。“武装打粮”就是对那些态度恶劣，坚决不肯出钱的，动用工农赤卫队的武力强行解决。他们还初步提供了分别用这两种办法打粮的名单。

“武装打粮”的任务由县党部组织工农赤卫队去执行。“募捐打粮”的典型，县党部让她们姐妹去创造，她们两人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她们说服一个在县里颇有影响的本家，让他带头拿出一部分钱、粮和其他物资来，起到了典型作用。她们的父母也把自己存的一部分粮食和银元、首饰捐献出来，支持了女儿们的行动。

永新县大革命的运动发展到最高峰，党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全县从只有一个党小组发展为四个支部，1927年4月，永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临时县委，贺怡和哥哥、姐姐一起当选为县委委员。

不久，永新县的右派夺了权，哥哥被捕，姐姐远在吉安。贺怡偕同父母，在右派搜城捉人的时候，逃到邻居家的柴房里，躲了起来。当晚，他们在亲友的帮助下，摸到城墙上，用几匹白布接在一起，绑在腰上，坠墙出城。他们有一个亲戚在吉安的清源山当和尚，3个人就投奔这个亲戚去了。后来她的父母当了斋工，贺怡则利用他们的掩护在附近进行地下工作和游击活动。

1930年，红军一举攻下吉安后，贺怡和父母才与贺子珍会合。后来，她的父母仍住在清源山，而贺怡则参加了当时特委的工作。不久，便认识了当时担任赣西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的毛泽覃。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相爱了，很快便结了婚，并把贺怡的父母接到了东固，在区委做勤杂工。

1933年初，王明等人在根据地内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诬蔑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对他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残酷斗争。当时，贺怡是瑞金县委组织部的副部长。王明路线的执行人，为了搜集、整理毛泽覃的“反党”材料，一次次找她谈

话，要她同毛泽覃划清界限，揭发毛泽覃的“反党”罪行。生性豪爽的贺怡，一口回绝了，她斩钉截铁地说：“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不是什么反党派别和小组的领袖，我也没有看到他同其他人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线要划清。”

年轻气盛的贺怡，对抗中央的要人，惹恼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撤了她的职务，把她送进了党校。

这时，中央党校也开始了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批判，贺怡参加高级班的学习，自然是重点斗争对象。她进党校时，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日以继夜的追查，使她心力交瘁。王明路线不仅在她分娩前不肯放过她，而且在她分娩后也不让她休息，逼迫她揭发毛泽覃，使贺怡在产后得了一身的病。

那时候，他们夫妻已不能随便见面了。贺怡知道，做爸爸的是多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啊！有一天，她避过耳目，偷偷把孩子抱了出来，给毛泽覃看。夫妻俩相对无言，热泪盈眶。

中央党校的校长博古执行王明路线，要开除贺怡的党籍。这时正好副校长董必武从外地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出面力保贺怡，这才保住了她的党籍，但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还把她下放到瑞金一个区做群众工作，以观后效。

受到这样打击，贺怡当然想不通。她有时跑到姐姐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落下泪来。贺子珍在一旁听得难过，也陪着掉眼泪。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因为当时她又怀孕，中央决定贺怡同毛泽覃一起留下，坚持游击活动。毛泽覃被任命为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东、贺子珍把儿子小毛托付给他们。他们商定，先把贺怡的父母和小毛安置在小毛的奶妈家，然后再做进一步打算。红军北上后，瑞金和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小毛奶妈的家乡也被敌人占领了。贺怡和毛泽覃怕走漏消息，小毛会遭毒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以后警卫员不幸牺牲，小毛从此下落不明。

贺怡和毛泽覃留在江西开展游击斗争不久，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这时，贺怡临近分娩，组织上为了她的安全，让她同她的父母一起，到当时还是根据地的于都一个红军战士的家里暂避。然而，贺怡领着两位老人来到于都时，敌人已经占领于都，原来的县委书记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贺怡挺身而出，在一片白色恐怖，而且是同上级党组织断绝联系的情况下，整顿党的组织，坚持地下工作。西安事变以后，赣南游击队的代表同国民党在赣州谈判。贺怡闻讯，立即赶到赣州，同上级党组织重新联系上了。以后，她来往于南昌、吉安、广州、韶关等地，活跃在抗日救亡战线上。国共

第二次合作时，她担任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副主任兼统战部副部长，1939年调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1940年6月30日，假抗日真反共的国民党特务，在韶关逮捕了她，并对她施以酷刑。她为了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曾吞下金戒指自杀。可是她没死了，在不医不治的情况下，竟然活了下来。以后周恩来同顾祝同谈判，用俘虏的国民党将领把她换了回来。贺怡到了延安，住进医院。医生说，必须尽快动手术把金戒指取出。按照规定，手术前必须由她亲属在手术单上签字。当时，贺怡身边没有亲人。毛泽东说，“为了贺怡同志能够多工作几年，这个字我来签吧！”手术后，她的胃只剩下1/3，人瘦得只有80多斤，但她仍然不倦地工作。

在全国即将解放前夕，贺怡一方面同情姐姐贺子珍，另一方面也深知毛泽东很喜欢她在江西瑞金时生的毛毛，她不辞劳苦，替毛泽东千里寻亲人。那次，她因公事出差去广东，当时海南岛尚未解放，贺怡到广东后顺便把寄放在广东的女儿贺海峰和儿子贺春峰一起找回来，同时还接来烈士古柏的遗孤——古一明。贺怡在广东接到江西吉安地委的电话，要任吉安地委组织部长的贺怡迅速赶回吉安，说是可能已打听到毛毛的下落。她们一行从广东赶到泰和时天已大黑，按说理当在泰和借住一宿，第二天再赶路。当时这一带土匪活动还很猖獗，他们扬言要杀掉贺怡。这个消息贺怡早在赣州时就已听到过。所以，警卫员和贺海峰兄妹的养父都劝贺怡在泰和住下，待天明时再赶路。可是为了早点找到毛毛，贺怡把个人安危放在脑后，毅然决定连夜驱车。吉普车疾驰在颠簸不平的泰和至吉安的公路上，当车子沿着下坡路俯冲的时候，对面的一个小山丘上出现了火把。贺怡机警地省悟道：“有土匪！”警卫员马上命令司机刹车，在这危急的关头，驾驶员不但不刹车，反而加速，车子直冲向大桥。原来这个驾驶员是个国民党特务，他在赣州时已受国民党特务上司的指示，要暗害共产党的功臣、毛泽东的姨妹。在车子即将翻下河的千钧一发之际，贺怡当机立断，把儿子贺春峰推出车外，因而贺春峰没有一点伤害。贺海峰在警卫员的保护下，压在车下，直到第二天的早上被附近村庄的一位老婆婆发现，才将她拖了出来，而贺怡和两个警卫员都牺牲了。

江青对贺怡一直是既恨得要命，又怕得要死。因为毛泽东很信任贺怡，而且贺怡一解放就来找毛泽东，替她姐姐贺子珍说情，这还不算，又去找小毛。

有一回，贺怡带来一个小男孩，说是小毛。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而这消息一传到江青的耳朵里，听得她脸色发白、心发跳，她怕小毛的到来影响她的地位。后来一查，不像是小毛，这下江青得意忘形了，见人便说：“你

知道吗？贺怡找回来个 15 岁模样的男孩，硬说是主席的儿子，最后看出是冒充的，你看可恶不可恶！你找，我不嫉妒，但我不信真有这么事，毛主席承认也不算数。我已经和主席表了态，将来带来第二个野孩子，我们不承认。谁有那么笨！野孩子天天能找到！我把小豆子（毛远新）带好，就是最大的无私。真是，找到一个假的还不甘心，还要死乞白赖地再去找！”

贺怡一死，江青更是幸灾乐祸，笑得睁不开眼：“阿弥陀佛！天老爷公道呀！”她活灵活现地说：“事情说是这个样，她的动机是多么的高尚呀！不久前，贺怡拍来电报，说毛主席的儿子找着了，惟妙惟肖，有根有据。那时，我心中很不好过，毛主席却高兴地笑了。昨天拍来了电报，翻车死了，怪吧！这，我要感谢上帝，怀不善之心，必有恶报，显灵了，应了我……”

在毛泽东因贺怡死而心情很沉重时，江青却哼着歌曲，得意地说：“你看，我劝她别找，她不信，其实哪有这回事，这倒好，阳间找不着到阴间里去找了。”毛泽东瞪着双眼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贺怡生性泼辣、刚强、敢作敢为。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她找到哈尔滨，与姐姐彻夜长谈。当她了解了贺子珍的情况后，她的倔犟脾气发作了，二话不说，带上娇娇就去找毛泽东。见到毛泽东后，她说：“主席，我一是来送外甥女的，二是来给子珍姐找地位的。”

毛泽东收敛起笑容，眉头渐渐地蹙紧了。他转身走向书桌，颤着手，提笔在一张通天十行笺上匆匆写下几行字。

这是一封给贺子珍的信。信的大意是：自珍：向您问好！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您要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当毛泽东写完最后一句时，禁不住淌下了几滴泪水，这泪水打湿了信笺。

1949 年的一天，毛泽东又约见了贺怡，两个人谈到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毛泽东没有说，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具体怎么办。

贺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到哈尔滨去接姐姐。她们乘坐的火车到了山海关站，上来两个人，自称是组织上派来的。他们说：“你们不能进石家庄，只能南下，到你哥哥那里去，这是组织决定。”贺子珍一听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有人从中阻挠她和毛泽东的重逢。她沉默着，没有说话。

贺怡据理力争，她作为毛泽东的弟媳，决心要把事情弄清楚、弄到底。她要找机会再去面见毛泽东，询问、了解这件事情。因为只有她，才能挺身为姐姐说话。只可惜她再也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就先她那多灾多难的姐姐

而去了。

妹妹毛泽建

毛泽建是毛慰生和毛陈氏之女，毛泽东的堂妹，1905年10月出生在韶山冲东茅塘。乳名菊妹子，又名毛达湘。1912年过继到毛顺生家。1925年和陈芬结婚。1928年8月20日被敌人杀害。

菊妹子，苦妹子

菊妹子的亲生父亲毛慰生，是一个十分贫困的佃农，由于过度劳累，39岁时就去世了。菊妹子的母亲陈氏，是一个勤劳俭朴的农家妇女。丈夫去世后，她带着菊妹子的三个弟弟，辛勤劳动，沿街乞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菊妹子为了帮助母亲养活全家，她从小就参加劳动，除了上山拣柴，下地挖野菜外，在寒冬季节，还经常跟着母亲沿户乞讨，养活弟妹。

菊妹子与毛泽东共曾祖父，在菊妹子7岁时，韶山出现了大灾荒，她家中生活更加困难。这时毛泽东的父亲母亲就把菊妹子从东茅塘接到上屋场，作为过继的女儿收养。

1919年，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因病去世，第二年年初，父亲毛顺生也因病去世。这时毛泽东在北京领导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不能回到韶山。在这种情况下，14岁的菊妹子只好从上屋场回到东茅塘自己的家中。

但是，家中生活仍然十分困难，弟妹都很幼小，母亲双目几乎失明。不久，菊妹子就被她的姑母接走。后由姑妈做媒，被许配给20里外的杨林乡一肖姓人家做童养媳。肖家也是一个贫穷人家，仅父子二人相依为命，但还可以吃上饭。母亲在菊妹子离家前，千叮咛万嘱咐：“你到肖家后要听话，要勤快，做个好媳妇。”

菊妹子嫁人的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他十分震惊。回到韶山，便立即到东茅塘拜见婶婶。婶婶说：“她一直盼望你回来，说你回来就有办法了。”

毛泽东跟弟弟泽民商量：“菊妹子要接回来，我带她到长沙去读点书。你去杨林跑一趟怎么样？”泽民早就想接菊妹子回家，听哥哥这么一说，爽快地答应了。

泽民来到杨林肖家，跟肖家父子说：我哥从长沙回来了，想接菊妹子回家住几天。肖家表示同意。菊妹子回到上屋场，见到毛泽东便倾诉苦衷。毛泽东安慰着堂妹，并说：“我给你取了个名字，叫毛泽建，到长沙读书时你就用这个名。”菊妹子高兴极了。

第二天，毛泽东叫来堂妹的丈夫，对他说：“我要带我妹妹去长沙读书，你去不去？”年轻人说：“我两岁死娘，是父亲把我拉扯大，我要在家里照顾他。”毛泽东沉吟片刻，说：“我妹妹还是要去，你不反对吧？”年轻人心里虽不乐意，但还是说：“好罢，只要以后她还回来。”

1920年下半年，菊妹子——毛泽建便跟随毛泽东到了长沙。

毛泽建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她心里总拂不去童养媳的阴影，她想彻底了结这桩婚事。毛泽东知道她的心事后，便说：“你安心读书，这件事我替你解决。”

毛泽东写信给毛泽民，要他去杨林将事情了结。同时，又写信给肖家，指出这个婚姻的不合理性，希望肖家取消婚约。

毛泽民接信后立即去杨林肖家商谈。肖氏父子说：“我们送了礼钱，还是用轿子接进门的，现在她说走就走么？”死活不答应退婚。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请毛氏家族的长老出面帮助退掉这桩婚事。

本来就十分同情泽建遭遇的毛家长老，接到毛泽东的信后便前往杨林肖家交涉。经双方协商，以毛家退赔礼金、误工钱为条件，解除了这桩婚约。

学运女先锋

1921年春，毛泽东帮助毛泽建解除了同肖家的封建婚约后，便把她送进了长沙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在文化书社里借宿。毛泽东还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了“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八个字，以鼓励她克服困难，发奋读书。由于毛泽建刻苦攻读，进步很快，开始跟不上班，后来名列前茅，尤其是刺绣的成绩更加突出。她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到平民夜校听毛泽东等讲课。她还到文化书社推销各种进步书刊，替秘密开会的同志站岗放哨。

1921年6月，毛泽东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来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领导湖南工人运动，并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建跟随毛泽东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1921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上半年经何叔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秋天，为加强湘南的革命力量，毛泽建受夏明瀚委派前往衡阳，考入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并改名为毛达湘。她在这里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同年10月毛泽东在受到军阀赵恒惕通缉后，离开长沙前往广州。在赴粤途中，路过衡阳时，到三女师看望毛泽建，鼓励她努力学习，团结同学，发展进步力量，打击顽固派。

毛泽建向哥哥详细汇报了半年来衡阳的学生运动情况。毛泽东用赞许的眼光看着妹妹，说：“你小小年纪，就做了这么多大事，了不起啊！”那年，

泽建刚满 18 岁。她听了哥哥的称赞，谦虚地说：“这里还有好多事等着我们去做，我真担心做不好。”毛泽东勉励她：“只要你能团结同志，依靠群众，什么事都可以做成。”泽建将毛泽东的话深深记在心底。

毛泽东听了衡阳党组织的情况汇报，参加了三女师的党团员会议。他向大家介绍全国各地的革命形势，指出湘南的工作要团结多数，深入工农。

当时，毛泽建是三女师学生党支部书记、湘南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她在三女师的日子里，经常阅读《向导》周刊、《新青年》和鲁迅的《呐喊》等进步书刊。还利用假日组织同学步行到衡阳县东乡、北乡以及附近的工厂、矿山，去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

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毛泽建积极组织同学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支援上海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斗争。当时衡阳县商会会长是一个诬蔑国民革命，一贯崇洋媚外的反动分子，他还大卖日货。毛泽建根据党的指示，发动和组织了一批爱国的同学，冲进了反动商会会长的公馆，对他进行了说理斗争，并当众烧毁了他家堆积如山的日货。

在学运中，毛泽建结识了衡阳县立第三中学的学生、共产党员、湘南学联负责人陈芬。1925 年，他俩结了婚。婚后，陈芬前往郴县领导农民运动。毛泽建继续在三女师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她担任了湘南学联女生部长。

1926 年初，衡阳县伪县长陈其祥，为了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借故逮捕了湘南学联的一个代表。消息传出后，衡阳的学生非常愤慨。毛泽建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湘南学联，发动和组织衡阳县的广大师生举行示威游行，营救被无理逮捕的学联代表。她带领三女师的同学在一路游行中高呼：“立即放出学联代表”等口号，并率先冲进县衙门县长的屋里，陈其祥被吓跑了。事后陈其祥被迫接受了学生提出的条件，释放了被关押的学联代表。

毛泽建在领导三女师和湘南学联的斗争中，英勇机智，表现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出色的组织才能，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和信任。由于毛泽建在每次的斗争中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此同学们称她为“女先锋”。

农运女领袖

1926 年夏，北伐军开进衡阳后，毛泽建遵照中共湘南特委的指示，离开了女三师，来到衡阳县从事农民运动，担任中共衡阳县委妇女运动委员。她经常深入衡阳县神皇山、园山、蹬子岭等地，发动和领导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发动妇女成立女界联合会，教育妇女放脚、闹祠堂；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协助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并亲自讲课。

毛泽建经常工作的地方神皇山，在她的领导下，建立了党支部。这里的

农协的工作成绩卓著，曾经获得省、县上级机关颁发的奖状，衡阳县农协还赠送给神皇山农民协会一块题有“模范农协”四个金字的匾。送匾那天，毛泽建在神皇山召开了群众大会，为了打击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鼓舞农协会员的斗志，当场把神皇山地区最反动的几个土豪劣绅抓起来，戴上高帽子游乡。毛泽建在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树立了。

1927年2月，毛泽建作为衡阳县的代表，到长沙参加省妇联召开的妇女工作代表大会。在会上，她了解到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和开展农民运动的指示精神。返回衡阳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到衡阳县集兵滩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1927年三四月，毛泽建学习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在衡阳县集兵滩的观音堂举办了两期农民运动骨干训练班。毛泽建亲自给学员讲课，还带领学员上操，学军事常识，既学文，又学武。两期农训班共培训了400多名学员，其中还发展了20多名党员，为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女游击队长

1927年5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湖南各地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衡阳也在白色恐怖中。这年夏天，神皇山的大地主罗清溪、罗老八等人，勾结反动军队，前往神皇山地区进攻革命势力。毛泽建迅即在钟家花园、罗家坪、白露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了几千农民自卫军，伏击前来的一连反动军队，使他们不能立脚，仓皇撤回到衡阳县城。

紧接着，毛泽建在神皇山召开党员会议，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部署了新的战斗。她深入到妙溪、麻町和集兵滩一带，组织了几千人的农民自卫军，成立了衡北游击师，使用大刀、梭镖、鸟铳、土炮，不断打击当地的反动武装挨户团。她率领游击师到处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武装斗争的道路，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并处决了周德翠、周凤鸣等一批反革命分子，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鼓舞了农民自卫军的斗志。

1927年10月底，毛泽建和陈芬按照中共湘南特委的指示，到衡阳县城郊主持召开全县临时党的代表会议，改组和重建中共衡山县委。由陈芬任县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毛泽建任县委妇运委员。改组后的衡山县委，组织了衡山工农军游击队，在衡山、湘潭、醴陵三县交界地区进行游击活动和建立政权。毛泽建除领导妇女运动外，还兼管县委通讯联络等机要工作。她还多次指挥游击队到县城、南岳、白果等地贴布告、撒传单，破坏敌人的电讯设备，用土炸弹炸县政府，使敌人惶惶不安。1928年3月，毛泽建积极参加领导了在南岳举行的一次武装暴动。她率领衡阳、湘潭、衡山交界地区的游

击队，穿过崇山峡谷，向南岳镇进军。部队抵达南岳镇后，迅速摧毁了南岳团防局的反动武装。午后，衡山县团防局派了百余人的反动军队，向游击队反扑过来。游击队在毛泽建的部署和指挥下，做好了迎敌的战斗准备。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她带领游击战士扑向敌人，三面包围，打得敌军晕头转向，四散奔逃。游击队击溃敌人之后，毛泽建迅速率领部队往南岳大庙后山崎岖小路撤退，隐入群山密林之中。第二天，敌人搜山“围剿”时，游击队早已安全转移。

南岳战斗后不久，中共湘南特委遭到敌人的破坏，衡山县委因此同上级党失去联系，加上彭瓚投敌叛变，又使衡山县委处于十分困难、危险的境地。毛泽建和陈芬等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耒阳县，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湖南暴动的队伍。在一次攻打耒阳城的战斗中，毛泽建带领一支数十人的农军，使用大刀、长矛，杀得耒阳团防局的敌兵狼狈逃窜。在这次战斗中，农军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装备了自己。随后，毛泽建积极参加了耒阳县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深入到石准、新市、东湖、夏塘、遥田一带，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建立区乡红色政权，扩大革命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除劣绅，分田地。

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后，毛泽建根据斗争需要仍留在耒阳工作。她和陈芬一起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亲自担任游击队长。她领导的游击队，白天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侦察敌情，晚上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曾先后捕捉和惩处了耒阳民团的一部分反动头目，使得敌人闻风丧胆。毛泽建领导的游击队还掩护了一部分红军伤员和农民自卫军家属安全撤退到山区，积蓄和保存了革命力量，支援了井冈山的斗争。

两次被俘，壮烈牺牲

1928年初夏，毛泽建和陈芬领导的游击队在耒阳县夏塘铺的一次战斗中，陷入敌人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两人都身负重伤，先后被捕。不久，年仅25岁的陈芬在耒阳敖山庙惯武桥上英勇就义。灭绝人性的敌人还把陈芬的头割下来装在木笼子里，挂在耒阳城头“示众”。毛泽建被捕后被反动武装押往夏塘挨户团关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知这一消息后，派来部队袭击了耒阳县团防局和夏塘挨户团，把毛泽建和陈芬的姐姐陈淑元营救出狱。耒阳县敌人随即组织兵力反扑追击。当时毛泽建身负重伤又身怀有孕，主动要求留下隐藏在夏塘一个孤老太婆家里。没有多久，毛泽建生下了一个男孩。她给孩子取名叫艰生。

敌人在搜山时，听到婴儿哭声，挨户团很快就找上门，毛泽建和陈淑元又一次被捕。刚出生的艰生也一道关进了牢房。不久，陈淑元被保释出狱，她把艰生带出。由于没有奶吃，孩子几个月后，不幸夭亡。

敌人再次抓到毛泽建，如获至宝。6月，夏塘挨户团为向上司请功受赏，把毛泽建押解到耒阳县城。8月，国民党衡山政府又以毛泽建“系毛泽东之妹，马日前后，在衡山县负该党重要职责”为理由，把她从耒阳押解到衡山县监狱。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毛泽建坚贞不屈，信念不变，时刻做好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她对探监的夫姐说：“我可能活不多久了。我不怕死。共产党是杀不尽的。只可惜我不能看到润之哥哥胜利的那一天。”夫姐离开监狱时，泽建将一封书信交给她，说：“我死后，你将这封信交给我润之哥。”1928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决定杀害毛泽建。敌人罗列了泽建几大“罪状”：

- 一、毛达湘乃共党总头子毛泽东之妹；
- 二、乃衡阳共党首犯陈芬之妻；
- 三、本人是顽固的共党分子。

1928年8月20日，毛泽建被枪杀于衡山县城关马王庙坪，时年24岁。毛泽建就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张贴布告，限令3天不准收尸。但是，就在当天晚上，几个码头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把烈士的遗体抢运出来，悄悄地葬在湘江岸畔的西溪桥头。半年后，为使墓地不遭洪水淹袭，又将烈士墓迁移到金紫峰麓的雷打石山上，并刻有石碑，上面写着：“民国十八年刊，毛达湘女士墓，原籍湘潭人氏。”为防止敌人破坏而又方便后人寻找，将石碑掩埋大半截，让“毛”字露在野草丛中为记。

1950年5月，毛泽建丈夫陈芬的外甥女见到毛泽东，谈到她舅母坟墓的事，希望毛泽东跟地方政府讲一声，请他们拨一笔款，把墓找到，并修一下。毛泽东说：现在刚解放，在过去牺牲的烈士很多，数以万计。政府搞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哪有那么多钱修墓呀！

但是衡山县委仍多次派人寻找毛泽建烈士墓，1966年11月，终于在金紫峰麓发现“毛”字露出地面的石头，然后从掩盖的泥土里掘出整块碑，碑下的木棺已半朽。1969年8月，移葬新落成的“毛泽建烈士陵园”。

四、祖家亲属

“祖家亲属”，是指毛泽东本家或直系亲属之外的、与毛泽东同祖关系的亲属。其中，按血缘关系，有近亲和远亲，或堂室和远房之分。最近的是堂亲系统。中国人历来对亲属关系分的很细，称谓清晰。“堂”，古谓之从，六朝谓之同堂，唐代始称堂。然“堂”从何计之？有从上三代算起，也有称五服之内的，还有按祖上某派（代）出现分支的情况划分，界定规则不太统一。这里，按通常的习惯，以上五代，即高祖（曾祖父的父亲）兄弟及后代为堂亲关系，之外的为族亲或远房关系。下面主要介绍一些毛泽东与之交往比较密切的堂亲和族亲。

族叔祖父毛福轩

20世纪80年代，由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特殊身份的警官》在全国上演。该片描写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金山县警察局，与敌进行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斗争，最后光荣牺牲的故事。这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创作的，其主人公原型就是毛泽东的亲属、中共韶山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毛福轩。

毛福轩，派名恩梅，生于1897年4月29日，他比毛泽东小近4岁而辈分却高两辈，是毛泽东的族叔祖父。

在韶山，毛福轩属社会最贫穷的阶层，家里无田无地，一贫如洗。父亲靠给地主当雇工，维持不了一家生活。小时候，毛福轩只上了1年学堂，因家里交不出学费，被迫辍学。10多岁时，毛福轩和妹妹随父母离乡背井，外出谋生，沿途靠乞讨度日。流落至江苏江阴，父亲被人诓骗，上炮台充当了清军的炮兵。毫无兵戎经验的他，在一次激战中耳、目均遭毁坏，又聋又瞎，而且饷银、伤残抚恤金分文未取到，就被恶兵一脚踢了出去。真可谓“屋漏偏遇连夜雨，”毛福轩一家到了穷途潦倒、贫困之极的地步。外出谋生无望，全家只好往回返。路上，毛福轩扶老携幼，步履维艰。

回到家乡，少年毛福轩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他在春播秋收农忙季节给人当雇工，冬季农闲时上山砍柴卖钱，一年到头拼命干活，仍不能养家糊

口。时光飞逝，毛福轩由少年变成了青年，全家还是上无片瓦，下无寸田，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穷苦生活。每当看到穷人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全部进了地主老财的粮仓，有钱人的子弟到学堂念书而穷人的子弟因交不起学费被拒之门外，他愤愤不平，但又说不清为什么。为此，他请教过乡里一些有学问的人，但都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他听说韶山冲里毛润之（毛泽东）学问很大，在外面写过穷人闹革命的文章，便等毛泽东回家时登门拜访。毛泽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他讲解，地主是怎样剥削农民的，是农民养活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农民，封建社会的政权是维护地主利益的，穷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推翻封建制度等道理，使毛福轩顿开茅塞。

作为农村无产阶级，毛福轩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在毛泽东的引导下，他很快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秋天，他来到长沙，毛泽东介绍他到中共湘区委员会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在那里，学校安排他先补习文化，同时兼职勤杂工。他工作勤奋，学习刻苦。几个月下来，不仅文化提高很快，还懂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年冬，受毛泽东派遣，他来到安源煤矿，在毛泽民的领导下，担任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营业员。不久，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底，毛福轩受党组织派遣，回韶山开展工作。1925年2月，毛泽东从长沙来到韶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毛福轩因得到毛泽东的直接帮助、指导，工作方向明确，干劲十足，同时工作经验不断提高，政治上进一步成熟。3月，毛泽东以毛福轩、毛新枚、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为骨干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并指示他们发展会员，建立基层农协。不久，韶山一带出现了20多个秘密农协，毛福轩在老家韶山团龙豹湾组织的农协是最早的一个。五卅惨案发生后，毛泽东根据各县成立群众性组织“雪耻会”的经验，指示毛福轩等以秘密农协为核心，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广泛发动群众，在韶山一带成立“雪耻会”，开展公开合法的斗争。毛福轩等迅速成立了20多个，以后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6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上屋场家中楼上秘密举行新党员入党仪式，吸收毛新枚、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委派毛福轩为党支部书记。党支部的成立，是韶山地区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这里的革命人民有了领导核心，一切斗争都有组织地开展起来。

同年7月，韶山党支部以“雪耻会”名义组织了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毛福轩亲自率队，走在前列。游行队伍沿路高喊反帝爱国口号，表演讲，散发传单和小册子，群众斗争如此有组织有声势，这在韶山是破天

荒的。8月，为了反对地主土豪在大旱之年屯粮抬价，牟取暴利，残酷剥削农民的恶行，党支部领导发动了平粜阻禁斗争。毛福轩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坚决而有策略地组织实施。党支部把斗争的目标集中在当地大土豪、上七都城防局长成胥生上，一面派钟志申、庞叔侃前往交涉，一面派村民监视其动静。果然，成胥生表面敷衍，暗中连夜出仓偷运。毛福轩得讯后，与毛新枚率领数百农民，点起火把，扛着锄头扁担，前往阻拦。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只好被迫平价出售。“擒贼先擒王”，由于对成胥生平粜阻禁获得成功，其他囤积居奇的土豪劣绅不敢反抗，纷纷平粜。这场斗争最终取得了完全胜利。

8月下旬，毛泽东得知，国民党湖南省长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快兵前来抓他，当即离开韶山。毛福轩按照毛泽东的思想、方法领导各项工作，使韶山地区的革命斗争继续蓬勃发展。至年底，上七都党员已发展到 110 多人，成立了中共韶山总支委员会，毛福轩任总支书记。1926 年 3 月，毛福轩升任湖南区委特派员和农运特派员，负责湘潭、湘乡、宁乡三县边区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

1927 年 1 月 4 日至 2 月 5 日，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 5 县农民运动，毛福轩参加陪同走了湘潭、湘乡两县，协助毛泽东联系访问对象，组织座谈会，收集有关资料。事后，据一些当事人回忆，说“陪同考察的还有一个提皮箱的毛福轩”。3 月，毛福轩被湘潭县区、乡自治筹备委员会任命为第三区特派员，前往株洲马家河一带开展工作。

“马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右派、地主还乡团进行反攻倒算，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毛福轩毫不畏惧，领导农民与之坚决斗争，果断处决了回乡大土豪黄亮臣。按照上级指示，他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准备参加进攻长沙的战斗。后因党内右倾投降主义一味妥协退让，计划未果。

在大革命失败的日子里，腥风血雨笼罩着南半个中国。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或叛党或声明脱党，也有一些人消极悲观，过着隐居生活。毛福轩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当此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刻，他不顾生命危险，潜入长沙城，寻找毛泽东。他要接受新的战斗任务。经他努力，终于在长沙同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8 月，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后受中央委派回湖南，改组湖南省委，毛福轩当选为新省委委员。

1928 年春，由于省委出现叛徒，组织遭到破坏。毛福轩转移到上海，找到了秘密主持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的毛泽民，重新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29 年，党组织派他打入国民党金山县警察局，当时他化名毛恩灏。毛福轩机智灵活，勇猛果敢，同时具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逐步赢得了“上

司”的信任，从一名警察递升至第三分局局长。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他想方设法为党搜集、递送情报，救护革命同志，提供枪支弹药，期间多次身临险境，全靠他一身胆略，机智冷静地处置，才化险为夷。一次，中共金山县委丁书记被敌发现，在来不及通知的紧急情况下，他主动要求带人搜捕。到了丁的住处，他故意大喝一声：“丁某在家吗？”丁书记开门探望，毛福轩则故意露出坏人极不耐烦神态，训斥他开门太慢，并对他使眼色。丁书记立刻明白了，装作惶恐的样子点头说：“在里面。”毛福轩挥手带3名巡警进屋搜查，丁书记趁机脱险离去。

1933年初，毛福轩被叛徒出卖。2月，国民党派出中统特务，会同上海警察局督察处抓捕了毛福轩等人。在狱中，面对敌人严刑拷打，毛福轩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他在遗书中写道：“余为革命奋斗牺牲，对于己身毫无挂虑。”同年5月18日，毛福轩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若干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得知毛福轩壮烈牺牲的消息，他感慨地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努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言语之中，对党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对自己失去了一位战友和亲人，深感痛惜。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毛福轩的弟弟毛春轩致信毛泽东，告知家乡的情况，信中还提出，希望毛泽东为他的儿子毛浪秋、侄儿毛迪秋（毛福轩的儿子）介绍工作。当时毛泽东正赴苏联访问。回国后，他抽时间写了回信。

春轩叔祖大鉴：

去年十二月来信业已收到，甚为感谢。浪秋、迪秋诸位均宜在家工作，不要来北京，以免浪费时间。此复顺祝

春安

毛泽东
五月八日

信中对毛春轩一家及毛福轩亲属平安表示高兴，但对介绍工作一事没有答应。毛泽东对亲人政治上要求很严，即使是烈士的亲属也一样。收到毛泽东的回信，毛春轩起初感到失望，转而仔细琢磨才明白，作为毛泽东的亲戚和烈属，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影响，不该提出特殊要求，心里很是愧疚。他将毛泽东的意见告诉儿子和侄儿，要求他们在家乡安心工作，努力奋斗，做出成绩。后来，毛迪秋当上了中共韶山大队党支部书记、韶山区委常

委等职。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接见了毛福轩的亲属，他对烈士夫人贺菊英说：“毛福轩同志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

堂伯父毛麓钟

毛麓钟是毛泽东的堂伯父，当过毛泽东的私塾先生，对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有过重要的影响。

毛麓钟名贻训，字麓钟，号云阁，生于1866年。其祖父毛兰芳（派名祖基），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是堂兄弟，共祖父毛际耀（毛氏家族第十五派）。毛麓钟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为第十九派，属五服内的兄弟，家庭来往比较密切。

毛麓钟的祖父毛兰芳是毛氏家族历史上学问最深的人，他博学多才，尤擅诗文词赋，韶山八景诗便出自他的手笔。在他的训诲下，毛麓钟自幼爱好诗书，才学出众。1892年，毛麓钟年方26岁，考取了秀才，这在韶山毛氏家族还是第一例，全族引为荣耀。

学有所成的毛麓钟也曾有高远志向，想为国家、民族干一番大业。他应聘在江南提督府下出任一些文职事务等，后因对清政府腐败不满，回乡隐居，号称“韶山小隐人”。

1909年，毛麓钟在家乡东茅塘面山楼自办私塾，接收本乡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入学。毛顺生出于对这位本家兄弟的信任，便同意儿子毛泽东到毛麓钟的私塾继续读书。毛麓钟也很喜爱这个资质俊秀、禀赋超群的堂侄，经常给他“开小灶”，向他介绍外面的世界，教育他热爱名山大川，胸怀广阔，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曾对弟子们说：“美雨欧风向我神州冲击，惟有迎头赶上，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这些给毛泽东的一生都留下了极深的影响。

看到毛泽东知识面广，领悟力强，毛麓钟便特地给他点读《史记》、《纲鉴类纂》和《日知录》以及各朝著名诗词辞赋。这些书籍不仅使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深入细致的了解，而且使他逐步地接受了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产生了较大的作用。

辛亥革命后，毛麓钟离家参加了蔡锷领导的云南讨袁起义军，转战云南、四川两个省，备受征战之苦，不久引疾回乡。1921年病逝于东茅塘。

族叔父毛继生

毛继生生于 1922 年，家住韶山冲。他又名毛贻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同属贻字辈，是毛泽东的族叔父。

毛继生早年就曾参加地下党组织，建国初期担任了湘潭县第四区供销合作社主任。1954 年，他当选为湘潭地区出席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一届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与湘潭地区的邹祖培、庞菊中等代表一起随湖南省供销合作社代表团赴京出席代表大会。就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候补执行委员，两年后，又当选为执行委员。

与毛继生一起到北京开会的邹祖培、庞菊中也是地下党员。其中邹祖培是湘乡人，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中共韶山区委书记；庞菊中是宁乡人，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中共潭湘宁边区县委书记。特别是邹祖培，1925 年曾参加过毛泽东在家乡组织的“雪耻会”，与毛泽东有过较密切的交往。到北京后，他们都有见见毛泽东的愿望，便相约由毛继生向毛泽东写信，表达了这一心愿。

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开会，接到他们的来信后，便派自己的秘书带他们坐火车来到了北戴河。在北戴河住处门口，毛泽东面带笑容地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热烈的欢迎。

会见是在一间华丽宽敞的客厅里进行的。一开始，毛继生等人显得有些拘谨。他像一个刚上学的学生，很不自在。只见他满脸绯红，坐在一张藤椅上，两腿并得铁紧，两手紧紧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坐在他们 3 人对面的毛泽东亲热地跟客人们打听，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互助组……可是，客厅里的局面是，毛泽东问一句，答一句，气氛很不活跃。

“乡里人进了城，难怪咧！”毛泽东这样想，他努力想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

“有得用！讲见毛主席，劲头那样大，如今真的见到了，有话讲不出。”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抱怨自己。

毛泽东观察着大家的神情，然后目光注视着毛继生，用十分地道的家乡话亲热地问他：“冲里那两棵大枞树还在啵？”

毛继生知道，他说的枞树，就是那两棵长在韶山毛泽东旧居附近的大松树。

“一棵早两年死了，一棵还在，如今长到咯样大了。”毛继生回答说，两手做了个合抱的姿势。

手还没有放下，他感到奇怪，情绪也顿时好多了，于是反问毛泽东：“主席，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记得这两棵大枫树？”

面对他的疑惑，毛泽东嘴边挂着一种神秘的微笑，风趣地说：“讲起那两棵树呀，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还有不记得的。”毛泽东笑了，给他们讲了一个自己儿时的故事。

在南岸私塾后边，住着一户人家，女主人是一位名叫周世泰的婆婆。同韶山的普通家庭一样，周婆婆一家也是在贫困的伴随中，勤奋耕耘，节俭度日。

在宅基地旁，周婆婆种有不少枇杷树、梅子树、桃子树。每年到了果子成熟时，南岸私塾里的那群伢子，就被树上的果子钩住了，天天围着果树转，一个个恨不得变成枝头啄食的黄莺和八哥，自由自在，一口一个。

女主人周阿婆可不是一个好惹的，她爱树如命，守得极严。她手里常常拿着一根青长竹竿，谁要是“轻举妄动”，就要受到一顿“教训”，弄得你的皮肉青一块，紫一块。更可恨的是，她还要向孩子们的爹娘告状，回家之后，少不了又是一顿皮肉之苦。

所以，她家的果树基本上是安全的。私塾里的伢子们都恨她，背地里骂她是“小气鬼”、“背时婆”。他们公推自己的小首领毛润之出面来惩治这位“恶婆婆”。

这一天，下课的铜铃声刚刚响过。毛泽东领着几个伙伴窥视一阵之后，确信周婆婆不在，便猴子似的一拥而上。冷不防“妈呀”一声而起，周婆婆从树下拱了出来：“哼，看你们这些‘小泥鳅’往哪里钻。”她嚷着，挥动着一根长长的、软软的青皮竹竿。大伙都知道，这种竹竿打人，虽然伤不着筋骨，可扫到身上，却是又痒又疼。

毛泽东指挥大伙快逃，周婆婆一下盯住了他，他长得比别人高，竹竿向他舞来。

“好呀，石三伢子，你充头领，我先逮住你！”

石三份子，是毛泽东的乳名。他纵身跳进一条土沟里，接着，后面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周婆婆跌跌撞撞，紧追不舍。石三伢子翻出沟外，飞向那两棵枫树，待到周婆婆追到，他早已高踞树杈，冲周婆婆扮鬼脸……

毛泽东的一席话，逗得大伙哈哈大笑。原来的拘谨在笑声中一扫而空。

谈笑之中，毛泽东突然问毛继生：“你是什么派？”

“我是貽字派。”毛继生一边回答，一边随口念出了韶山《毛氏族谱》中的派序歌：“祖恩貽泽远，世代永承昌。”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这么说，你还是我的族叔啰！”

“哪里哪里！”毛继生涨红了脸，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虽然比毛泽东派长一辈，但年龄却比毛泽东小了近 30 岁。

吃午饭了。桌子上摆着四盘菜，一碗汤，其中一盘鸡块显然是为客人特意加的，做得特别考究。而其余的几样菜则是毛继生他们这次带来的家乡风味腊肉、火焙鱼和豆豉辣椒。

毛泽东招呼大家一一就座，并且给每人斟了一杯酒。大家高兴地喝，又拉着家常。席间，毛泽东说起 20 多年前，他和邹祖培一起在韶山搞农民运动，曾和邹两人一起喝过酒，那时就知道邹很有酒量，因此今天特地请人买了白酒，希望邹祖培多喝一点。

看着毛泽东津津有味地吃着家乡小菜、谈笑风生的样子，毛继生忽然想起去年家乡几位乡亲到北京来看望毛泽东的事来，那时，毛泽东还住在中南海里。几个老头子临上北京前，高兴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见毛主席，送点什么东西呢？”他们想来想去，左盘算右盘算，埋怨韶山是个苦地方，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手。临走了，一个老倌子随手从他老婆的坛子里抓了一把腌豆角，用纸包了，带到了身上。

来到北京，这位老倌子难为情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没有好东西送给您，献丑。”一边说，一边递上了那个纸包。

“难为你们了。”毛泽东不知是什么东西，顺手接下，当场打开一看，高兴得咧开了嘴，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一边吃，一边还说：“蛮有味，蛮有味，多年没有吃过家乡的小菜了。”

毛泽东正嚼得津津有味，客人也看得出神的时候，警卫员来了，他从毛泽东手中接下那包菜，头也不回地走了。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满是疑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毛泽东力图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平和地说：“你们有你们的王法，我也有我的纪律呢？”

一会儿，毛泽东把他的孩子们叫了出来。一一介绍吃饭的客人。介绍到毛继生时，毛泽东指着他对孩子们说：“快叫叔公。”

按照韶山《毛氏族谱》的排列顺序，毛泽东确实比毛继生小一辈。可是，这是什么场合！毛继生怪不好意思，涨红了脸，一面摆手，一面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满座笑语喧哗，满桌热烈气氛。毛泽东似乎还没有表达其意，接着又说：“敬老尊贤还是要的，受了，受了。”

“叔公！”

“叔公！”

孩子们的一声一声呼唤，抑扬顿挫，亲亲切切。古老的乡俗，古老的民风，在这里表现得真真切切。

吃完饭，毛继生等三位客人被安排在西边一间房里休息。不一会儿，毛泽东走进了他们的房间，跟在他后面的工作人员带着三个红绿相间的救生圈。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初次来这里，去的地方不多，下午我们到渤海湾去游泳，看看海边风光吧。”

毛泽东邀请他们到海里去游泳，三位客人当然感到新鲜，便随他一起来到了海边，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已到海边的刘少奇委员长和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把他们三人向刘少奇、朱德两位首长作了介绍后，大家便一起下海游泳。

以前毛继生他们从来没有下过海，一开始感到很新鲜。可下水不久，年纪稍长的邹祖培、庞菊中就感到受不住了，浑身颤抖起来。毛继生也叫起苦来：“好冷呀 这水又苦又涩 真不好受。”

毛泽东应声来到他们面前，知道他们不适应，一一牵着他们上了岸，嘱咐他们赶紧穿上衣服。

游泳完毕后，毛继生等人又乘车回到北戴河毛泽东的住处，当晚便歇宿在此处。

6月的北方夜晚，是最清新、最美好的时刻。圆圆的月亮挂在窗前，疏疏落落的星星闪闪泛亮。树静了，大海静了，而这三个乡里人却辗转反侧，难以成眠。

第二天天刚亮，毛泽东又一次走进了他们的房间，亲切地询问他们休息得怎样？之后，又告诉他们：“乡里人，难得有机会往城里跑一路，要看个名胜古迹更不容易。今天，就请秘书陪你们一路，到山海关过个瘾。”

这一天，他们依然是开心。但在开心之余，心里总有点不踏实，一个个嘀咕起来。

“主席忙，再不要耽误主席的时间了，我们回吧！”三人商量好了。晚上，他们见到毛泽东就提出，明天就回南方去。毛泽东挽留说：“乡里人难得出门，到北方来更不容易，还是多住几天吧！”

“我们每人都是代表县供销社来开会的，还要赶紧回去，传达会议精神呢！”

毛泽东听了这话，沉思了一阵，点了点头：“如果从工作上考虑，你们要走我也不能强留，反正权在你们手上，你们自己定。”

第三天清晨，当三位客人准备启程时，毛泽东带领身边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他们的身旁。他给每人半条“大前门”香烟，又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三篓桃子，分送给他们。然后又给邹祖培、庞菊中各送了一个箱子、一根手杖、

一双皮鞋。

“没有好东西，送你们几件衣裳吧！”毛泽东客气地对邹祖培、庞菊中说。

接着他转过身来，面对年轻的毛继生，笑了笑，亲切地问道：“过去一个长工好多谷一年？”

毛继生想了想，回答说：“精壮劳力 12 担谷。”

“乡里好多钱一担谷？”毛泽东继续问道。

“6元多钱一担。”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啊，你现在一个月就相当于过去一个长工一年的工资咧。”

毛继生若有所思：主席一定是怕我少了一口箱子有意见咧。年轻人毕竟脑子灵泛，而且，出自内心地说，这次能够见到主席，心里早就高兴饱了呢！哪里还有什么意见？何况，他们两位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过去提着脑袋干革命，真正对党对人民有贡献，主席送点东西给他们，这一番心意，我一样领受了的。想着这些，他便对主席说道，“我是年轻人，家里又有得负担，政府每月给我的钱，我都用不完哩！”

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语重心长地嘱咐道：“要好好为群众办事。”

临行前，三个人激动地一一同毛泽东握手，说，“主席已经有二十六七年没有回去了，现在家乡人民生活好了，都念着您，欢迎您回去看看呢！”

毛泽东听后，陷入了沉思。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抱负，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走出韶山冲。大革命时期，他怀着对家乡人民和革命事业的关心，曾两次回到韶山，发动邹祖培等基本群众，办农民夜校，成立“雪耻会”等，亲自点燃了家乡革命的火种。记得在 1927 年元月，他回到韶山考察农民运动时，在宗族公祠召开群众大会上，曾慷慨激昂地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他充满激情地对父老乡亲们说：“我为人民谋解放。30 年革命不成，我毛泽东决不回来见你们。”是啊，30 年弹指一挥间。如今，革命成功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真应该回故乡韶山去看看。那里有一大批同志为革命牺牲了，应该去看看他们的家属，应该去看看翻身后的乡亲。但新中国刚成立几年，由于战争的创伤，百废待兴，作为新中国的主席，有许多的事情需要他去做。因此他只好对毛继生他们说：“难为家乡人的好意啊！我现在大不大，细不细，是个主席，回去一趟不容易呀！”话语里，蕴含着对家乡的深情，对故园心驰神往。

5 年之后的 1959 年 6 月，毛泽东赶在江西庐山开会的前夕，终于抽时间回了一趟已经阔别 32 年的故乡韶山。

当时，已是韶山公社党委书记的毛继生，以家乡父母官的身份热情接待了毛泽东。见面第一句话他就说：“主席，您终于回来啦！”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仔细打量着，感觉很面熟，可一时又叫不出他的名字，便问道：“你是……”

毛继生激动的情绪尚未平息，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这里的公社书记，叫毛继生。主席，您怕不认得我了吧。1954年夏天，我到过您那里，跟您在北戴河住了3天。”

听毛继生一介绍，毛泽东马上就想起来了。他哈哈大笑着说：“你看你看，我的眼睛瞎起，连叔老子都不认得了啦。”

毛继生不好意思地说：“那年在北戴河，就希望您回乡看看。这一次回来了，希望您多住一些日子，对冲里的工作，多作指示。”

毛泽东爽朗一笑后，便认真地说：“你这么说，就把我当外客啦。我这次回来，是来看看家乡，会会乡亲。同来的有罗瑞卿同志，公安部长；王任重同志，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他们是我邀来的客人，都要在这里住两三天。同时，也要请你帮忙办一件事情。”

毛继生一听说有事情要自己去办，马上来了精神：“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摆摆手说：“不是指示。这是我的私事。我想请几桌客。”

“请客？”毛继生不解地问。

“是呀，会会老朋友嘛！”毛泽东正色地答道。

在韶山，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一般地，只要是远方的游子归来，乡亲们都要聚在一起，请他吃顿饭，这叫接风，也叫接客。毛泽东离开家乡几十年，今天回到乡里，怎么能让他请客呢？想到这里，毛继生马上说道：

“主席，您不要费心了，由我们来请客！”

毛泽东又一次摆摆手说：“不，我离家几十年了，欠了太多的人情债。明天晚上请大家来吃一顿便饭，叙一叙，团聚一番。事，要请你去办。钱，归我出！”

接着，毛泽东点了一大串客人的名单。其中既有他的本家族长、兄弟子侄，也有他外婆家的各位亲戚，还有村里的烈士家属、当年的老农协会会员，以及他童年的同学朋友，一共40多人。毛继生将名单一一做了记录。

这次酒席，后来办得非常风光，毛泽东很满意，韶山的众乡亲以及毛家的亲戚朋友也很满意。

毛泽东这次回乡期间，毛继生还陪同他参观了故居，祭奠了祖坟，了却了毛泽东的一段心愿，尽到了一个家乡父母官的职责。

堂兄毛宇居

毛宇居，派名毛泽启，又叫毛蕊珠、毛禹珠、毛禹居，字先申，别号守一子，生于清光绪七年辛巳六月三十日，是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读私塾时的老师。1926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马日事变”后脱党。毛宇居的古典文学功底较深，善于写作，1940年毛氏宗旅四修族谱就是以他为主，由他和毛国翘负责编修的。解放前一直在乡村教书，解放后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馆馆员，后闲居在家。1964年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去世。

“韶山一枝笔”

毛宇居世居韶山冲东茅塘，后迁蔡家塘。他与毛泽东共太高祖。据韶山《毛氏族谱》记载：“运选子二。长际耀，字光前，行一，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二月二十九酉时生，道光二十九年巳酉三十七戌时歿……”“配庞氏，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十二月初七午时生，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五月初九戌时歿。”这里讲的毛际耀，便是毛宇居和毛泽东的太高祖父，庞氏即他们的太高祖母。

毛际耀一生有四个儿子，其中长子毛祥焕，字其有，行一，即是毛泽东的高祖父；四子毛祥珣，字玉成，号仙浦，行四，即是毛宇居的高祖父。他们在世的时候，孩子们仍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

毛宇居的父亲毛福生系前清国子监，与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不出五服的叔伯兄弟，青年时同住在东茅塘，过从甚密。毛顺生与文七妹结婚时，毛福生曾帮助操办婚事。1919年，毛泽东曾将父亲毛顺生和伯父毛福生接到长沙休养，并和弟弟毛泽覃与二老一起合影留念。

毛宇居自小熟读诗书，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他的诗文和书法都很有名气，被当地的人们称为“韶山一枝笔”。谁家要有什么大的喜庆活动，都来请他代笔，或写对联，或写贺词。毛宇居由此深感文化知识对乡亲们的重要，干脆便开办了一个私塾学堂，招收一些本族子弟入学。

1906年秋，毛泽东从桥头湾私塾结业后，便来到距韶山冲上屋场约5里的井湾里，在毛宇居的私塾里进一步读书。

出题难不倒学生

毛泽东天资聪慧，英才早发。读私塾时，很受毛宇居的赏识。他读书勤奋、博闻强记，对一些老师也讲解不清的经书，都能按照严格的规定信口背

诵。但这些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为了满足求知的渴望，他大量诵读时人认为是旁门邪道的杂书——中国旧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他的记忆力很强，那些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大都记得清清楚楚，平时写文章或给别人讲故事，总是信手拈来，讲得活灵活现。

在毛宇居的学生中，毛泽东可算是最“淘气”和难教的一个。别的学生都很怕老师，惟独毛泽东仗着天资聪慧，博闻强记，经常与老师“作对”。有时毛宇居在上面讲课，毛泽东便在下面看旧小说，毛宇居知道后，故意多加点《左传》之类的经书课文让他背诵，毛泽东记忆力、领悟力特强，均能应付裕如，毛宇居也拿他没办法。

毛宇居儒士作风，说话和颜悦色，温文尔雅。但他对学生要求很严，甚至近乎苛刻。那时衡量私塾先生的教学水平，就看他的学生能背多少书。愈是深奥的古文，学生背得越多，先生的本领就越大。而在先生看来，读书的目的，是通过课文了解历史兴衰更迭的典故，学会为人处世的方法。对于这个年龄层次的孩子，一时不可能懂得这些课文的全部含义，现在只要求把它读熟了，随着年龄增长，慢慢就会有所领悟并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一方面是家长和先生都寄予厚望，另一方面是学生对所学的东西索然无味。两者之间惟一能使之平衡的杠杆便是体罚。对于淘气而不用心的学生，先生就打他的手板，罚站，罚跪，留堂关学。

对于过去的私塾生活，毛泽东后来曾有过一段回忆，他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 尽管老师严加防范 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许多故事 我们几乎背得出 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

毛泽东对私塾古板、陈旧的教学方式最是反感。有一天，毛宇居要外出，临行前规定学生要在屋里背书，不准出去。先生刚走了，毛泽东就背着书包爬到房后山，边背书边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书包。回到私塾课堂，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也孝敬先生一份。毛宇居却不领情，责问道：“谁叫你到处乱跑？”“闷在屋里头头昏脑涨，死背硬读也是空的。”“放肆！”毛宇居脸涨得通红。毛泽东说：“那你叫我背书好了。”毛宇居知道背书难不倒这个学生，只好作罢。

尽管毛泽东不满意毛宇居的教学方式，但是他在堂兄的门下却仍然学到了许多难得的知识。特别是毛宇居专门给他点读的《左传》，大大地拓宽了他的历史知识和视野。《左传》是一部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活动，总结各国兴亡更迭的经验教训的编年史，在毛宇居的督促

下，毛泽东对《左传》能背诵如流，并能融会贯通。这使他对中国的历史开始有了一定的兴趣。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实际斗争的需要，这种兴趣促使他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与此同时，通过对中国史书的广泛涉猎，毛泽东也熟悉了不少历史典故和战例，运用起来，得心应手。

由于父亲的要求，毛泽东于 1907 年夏离开了井湾里私塾，告别了堂兄兼塾师毛宇居。他在毛宇居门下前后读了 10 个月书，虽然让这位先生费尽了心力，却也使先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奇才。因此后来当毛泽东不再满足于在家务农，而要去湘乡东山小学堂去读书时，毛宇居曾专门来到上屋场，说服堂叔毛顺生一定要继续送子念书。他向毛顺生极力称赞堂弟的天资过人，不同凡响，将来定成大器。正是在他和其他一些老师以及湘乡外婆家的说服下，毛顺生终于同意了儿子的要求，使毛泽东得以走出闭塞的韶山冲，最终成为震撼中国和世界的伟人。

协助料理家乡事

毛泽东自 1910 年入东山学堂学习后，长期在外求学和参加革命，家乡的许多事都托付给毛宇居来办。毛宇居不仅有文化、有能力，而且人品正派，可靠可信。早在解放之前，毛泽东就和毛宇居保持着书信联系。1919 年 10 月，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不幸病逝，毛泽东回乡料理丧事，悲痛之中写了两副楹联和一篇《祭母文》，交给毛宇居保存。毛宇居将这些墨迹保存了 30 多年，直到解放后上交人民政府。此后，1921 年春和 1925 年上半年，毛泽东两次回到韶山，均亲自到东茅塘去拜访过毛宇居，与他商量过国民革命和农民协会等问题。

1927 年 1 月，毛泽东因到湖南各地考察农民运动，再次回到韶山，毛宇居率家乡父老在毛氏宗祠召开了热烈的欢迎会。在会上，他热情洋溢地祝词：“毛君泽东，年少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到此，大家欢迎。”在欢迎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热情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并高呼：“农民运动万岁！”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革命群众，湖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毛宇居也与党组织、与毛泽东失去了联系。从此以后，他继续以教书为生，在内心里，仍然惦记着毛泽东这位堂弟兼学生的安危。

那是“马日事变”之后不久，反动军队来韶山清乡，冲里一片血雨腥风。他被抓到团防局，言不由衷地写了一份违心的《悔过书》。从团防局出来，夜来的凉风使他清醒过来，一根无形的钢鞭在猛烈抽打他。这种精神上

的煎熬，使他几天之内就形同枯槁。从此，他闭门谢客，在自己的书房里，挂上一个条幅：“世事沧桑从变化 只愁书味不留香。”表明他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专做个林下雅士。

然而，毛泽东在神州大地叱咤风云，韶山实际上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晴雨表。围绕毛泽东家发生过许多事。1930年，何键、许克祥派人来韶山挖掘毛泽东的祖墓，毛宇居和掘墓者斗智斗勇，巧妙地保护了祖坟。1937年，毛楚雄和外婆周陈轩来韶山居住，地主反动势力常常来为难他们，毛宇居总是出面保护。在当时，这是要冒风险的。毛宇居却想，就为一念之差，他在组织上和毛泽东已再不是同志，但他们是同一祖宗的子孙，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友谊。对于毛泽东在乡间的一切，他都有责任去帮助照管。毛泽东似乎也没有因为这样事过多地责怪他，还委托他办一些事。

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始重新合作，毛宇居又与毛泽东接上了联系。1938年5月10日，他给毛泽东写信，告诉他老家的一些情况：毛泽覃的妻子周文楠、儿子毛楚雄以及毛楚雄舅父周祖余、外婆周陈轩等均住在韶山家里，生活困难；亲戚谭季余想来延安寻找工作。信中还询问了毛宇居自己的侄子毛远耀等人在延安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毛泽东很快就复信给毛宇居。

宇居兄左右：

五月十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尔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留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此复。即颂

时绥！

弟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六日

远耀等在此甚好。

1941年，毛宇居与毛国翘等人一起在家乡主持编修《民国辛巳四修韶山毛氏族谱》。该族谱从韶山毛氏始祖毛太华编起，一直到当时的泽、远、世诸辈子孙，记录了上下数百年毛氏家族上千人的生养死葬情况。族谱除序言外，还有传记，诗赋则多出于毛宇居之手。他在这些诗词中，伐恶扬善，文采斐然。尤其是对毛泽东本人及毛泽东一家都予以了极高的评价。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他这样做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其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刚一解放，毛泽东让从家乡前来看望他的堂弟毛泽连等人给毛宇居捎信，请他代问阖族各前辈、后辈人们的安好，贵宅各兄弟与他们的家人健

康。以后还请他来京，游览参观，叙旧话今。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韶山的亲朋故旧，纷纷投书毛泽东，请他解决各种问题。对此，毛泽东有的自己直接处理，有的则通过他的这位老师来协助解决。1950年，他听毛宇居来信反映，他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邹普勋家境困难，便给毛宇居回了一信：

宇居兄：

迭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邹普勋（享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另纸请交邹普勋为禱。

即颂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五日

毛宇居收到信后，立即拿出自己的钱垫上，先解了邹普勋的燃眉之急。

由于毛宇居与毛泽东的关系密切，对毛泽东少年时代的学习经历和成长过程都十分了解，因此建国后，他曾以满腔热情搜集和整理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竭尽全力地向前往韶山参观的中外友人介绍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各种事迹和趣闻轶事。1951年3月，他曾将自己整理的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轶事一文寄给毛泽东，请求发表。由于毛泽东对这类宣传一向比较谨慎，没有准其发表，便给他回了一封信。

宇居兄：

历次各信及最近长函均收，甚谢。诸承关怀，具见盛意。惟轶事有些内容不适合，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复颂兴居佳盛！乡友便此致候。

毛泽东

四月五日

1951年9月，毛泽东捎信到韶山，请毛宇居和表兄文梅清以及少年时的朋友张有成一起到北京叙旧。他们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一家的热情接待。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将他们向孩子们一一作了介绍，让孩子们称他们为“伯父”。席间，大家举杯畅饮，共叙旧情。这次在京期间，毛宇居等人游览了

京华名胜，大开眼界。毛泽东还在中南海含和堂前，与他们合影留念。离京前，又送给他们皮箱、衣服、鞋帽和照片等礼物，令毛宇居等人深为感动。

这次到北京，还有一件事情令毛宇居终身难忘，那就是毛泽东请他看了一场有趣的电影。

那是一天晚上，毛泽东设宴款待他。饭后，毛泽东笑着说：“今晚，我跟你回韶山去！”

毛宇居一愣：前几天毛泽东说过，什么时候有空了，要回韶山看看。难道今晚就动身么？毛泽东诡谲地笑笑，说：

“是呀 我们今晚一起回韶山 去看看你自己！”

毛宇居更不知底里了。

一会儿，他们一同来到大厅里，刚刚坐下，电影银幕上就出现了几个大字：解放了的中国。

这是一部与苏联合拍的彩色电影纪录片，其中有不少韶山的镜头。这部影片毛泽东早已看过，为了让毛宇居高高兴兴，于是陪他再看一遍。

毛宇居年轻的时候就留须，是一位美髯公。如今白发银须，笑容可掬，自然是摄影师捕捉的对象，既有他的中近镜头，又有他的大特写。毛泽东笑道：

“宇居大哥，我们不是回了韶山么？还看见了你自己嘛！”

乡下老先生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那高兴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回到招待所，他立即挥就了一首《七绝》：

银幕一开画来传，
老夫笑貌及苏联。
从今四海为家日，
几度观光及壮然。

1952年毛泽东又几次给毛宇居写信，请他帮助处理了很多事。其中7月份的一封信这样写道：

宇居兄：

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一信，请代转交。接毛泽连的信，六婶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形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请查明见告。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粮缺猪贱，不知现在好

些否？风便望将乡情赐否（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请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不久，毛泽东又给毛宇居写信，请他转告李、邹二人，如果来京，首先要打破“出远门难免有风险”的顾虑。信的全文如下：

宇居兄：

来信收到，李漱清老先生及邹普勋兄前曾表示，希望来京一游，我认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乡间情况。但请你向他们二位说清楚：（一）须他们自己下决心，出远门难免有风险；（二）到京住一至两个月即还家乡。如他们同意这两点，则可于阳历九月动身北京。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刘道衡部长处接洽，领取来京路费，办理乘车事宜。介绍信一件，请予转致李、邹二位。其余要来京者，今年不便招待。

顺候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八月廿一日

9月份，李漱清、邹普勋二位动身赴京，毛宇居托他们给毛泽东捎了一点家乡的礼品，并附上了一封信。毛泽东于10月初给他回信，并请他将另一封信及一些钱款转交堂弟毛泽连、毛泽嵘。信中所指的钱是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1万元相当新币的1元。毛泽东写道：

宇居兄：

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讯，甚为感谢。

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

另寄二百万元给泽嵘（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

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以上均请费神转致为荷！顺问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

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1952年11月，毛宇居再次去北京看望毛泽东。临回乡前，毛泽东得知一些亲友生活比较困难，吩咐秘书支取自己的稿费，还买了一些布匹，请毛宇居带回去分赠给家乡亲友。他怕毛宇居记不住，便在毛宇居的记事本上，写下一张便条：

谭熙春贰佰万元（旧币，下同，引者注），邹普勋壹佰万元，蔚生六婢壹佰万元，毛月秋衣料四丈，邹香庭衣料四丈，张四维衣料四丈，毛纯珠衣料四丈。

毛泽东赠

毛宇居一腔热情，从韶山到北京，千里迢迢，频传信笺，为毛泽东处理了许多家乡亲戚故旧的琐碎事务，使毛泽东少分散精力，更多地为国事操劳。对这样一位堂兄和老师，毛泽东是感激不尽的。

两次荣获真迹

1952年冬，原韶山乡第三学校已改名韶山小学。毛宇居受乡政府的委托，第二次到北京，请毛泽东为学校题写校名。这次，毛宇居又是与毛泽东的表兄文梅清同行。他们二人于11月9日到达北京。第二天，毛泽东即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

寒暄之后，毛宇居便对毛泽东说：“乡政府对教育很重视，特地委托我来向您汇报。”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问：“学校建在哪里？”

毛宇居汇报说：“学校建在张家山，规模比原来大，新校舍将建得更加美观、大方。”

毛泽东听了之后十分高兴，他点点头说：“那里很好，学校规模还可以扩大。”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说：“国家搞建设，需要各方面人才。人才从哪里来？靠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不过，办好教

育，需要人出力，需要一批教育工作者。你是教书出身的，有经验，要多出力 还要教育人家多出力！”

看到毛泽东的兴致很高，毛宇居当即提出请毛泽东为学校题写校名。

毛泽东问他：“学校的名字怎么取的？”

毛宇居回答道：“还未最后定好。”

“那题什么名好呢？”毛泽东看着他 陷入了沉思。

“就题‘湘潭县韶山小学’吧。”毛宇居想起来北京前乡政府的嘱托 他们原本是想让毛泽东题上“韶山小学”几个字。

毛泽东想了想，然后说：“不，还是题‘韶山学校’吧。现在办小学，以后学校还要发展，还可以办中学、大学，反正都是学校，这一次不就全写好了吗？”

毛宇居听后喜出望外 连连说：“好好 主席想的真周到。”

校名定下来之后，毛泽东便拿出纸笔，认真地写起来。他写了几纸“韶山学校”，供毛宇居选择。毛宇居将几张题字都小心地收藏起来。想起临行前乡政府的委托和现在终于不辱使命的情况，他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

这次上北京，毛宇居一共住了近 3 个月，于次年的 2 月 2 日动身返回韶山。回乡后，他把主席的题字拿出来，乡政府的干部们也喜出望外。 5 月份，韶山学校便新建竣工，并被列为湖南省省属重点学校。 1959 年故乡之行，毛泽东曾特地到这所学校视察，并与全校师生合影留念。

毛宇居回乡以后，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韶山学校的修建情况以及家乡的其他情况。毛泽东于 1953 年 8 月给他回信说：

宇居兄：

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

尊恙已愈，甚慰。尚祈注意珍摄。

乡间生产、贸易、公粮等项情形，暇时望告一二。

顺祝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堂弟毛纯珠。临别时，他得知毛纯珠不久要回乡，便让他给堂兄毛宇居捎去一封短信：

宇居兄：

迭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今借纯珠兄之便，敬致问候之意。即祝

兴居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日

1958年，湘潭县委决定创办湘潭大学，想请毛宇居老人再次上北京去请毛泽东题写校牌。当时，老人已经77岁高龄，为了家乡人民的期望，他欣然从命，于9月份专程赴京。

毛泽东在寓所再次接见了毛宇居，一开始，他并不知道需要题写校牌的事。闲语之中，毛宇居谈起了湘潭大学的筹备情况。毛泽东马上关切地问：“大学办在哪里？”

“办在杨家桥原湘江煤矿旧址。”毛宇居答道。

“那是一个山冲里。”毛泽东似乎知道这个地方，他点点头，然后又问：“哪来的学生呢？”

毛宇居说：“如今不同了，那里交通比较方便，学生都是从全县高中、初中中选送来的。”

谈到教师的情况，毛宇居说：“教师主要是从县内中学抽调出来的优秀教师，还聘请了一部分工农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员，只是没有教授。”

对于这种办学方式，毛泽东是比较赞成的，因此他点头肯定说：“教授也是可以培养锻炼的。”

至于办学经费，毛宇居也作了如下解释：“在全县财政经费内统筹解决，学生半工半读，还能自己解决一部分。”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也点头表示赞同。

毛宇居看到时机已经成熟，马上说明了来意：“主席，你的翰墨写得好，家乡人民都很喜爱。我这次来，是受湘潭县委的委托，特意来请你为湘潭大学题写校牌的，请主席一定答应我这个要求。”

毛泽东听后微微一笑，谦虚地说：“近年来许多人找我写字，我都未写，我的字写得并不好。我小时候读书的那个东山学校，几次来信要我写校牌，我也未写。假如我给你们写了，那他们不会有意见？”

毛宇居一听，赶紧接着说：“这个问题好办，你写两张，一张由我带给湘潭大学，另一张给湘乡东山学校，我替你送去。这样两县人民不就都满意了吗？”

毛泽东笑着点点头，答应就这么办。

几天后，毛泽东派秘书到毛宇居当时下榻的和平宾馆，送来一封便函。毛宇居接过来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湘潭大学”、“东山学校”校牌，此外还有一纸便信，上面写道：

禹居兄：

遵嘱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二纸，请转致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一纸，亦请转致。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

毛宇居从北京回来后，人们敲锣打鼓地把他接到杨家桥煤矿原大学校址，并请他专门作了上京请主席题写校牌的报告。后来，为了纪念毛泽东为学校题写校牌，湘潭大学便把毛泽东给毛宇居写信的这一天——九月十日，作为校庆纪念日，而“湘潭大学”的校牌，除了中间停办的那几年外，也一直沿用至今。

1959年6月25日，得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的消息后。毛宇居不顾近30岁的高龄，立即从所住的蔡家堂赶到韶山招待所——松山一号寓所。毛泽东听说毛宇居老人来了，赶忙起身相迎。二人相见，分外亲切。当晚，毛泽东即留他在韶山招待所休息。第二天下午，毛宇居陪同毛泽东到韶山冲视察生产情况，一路上，谈笑风生。回到寓所，毛泽东同毛宇居等老人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起身敬酒，毛宇居连忙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紧接着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这段师生之谊，一时传为佳话。

1964年9月29日，毛泽东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在韶山逝世，享年83岁。

堂兄毛智珠

毛智珠，谱名毛泽先，是毛泽东的堂伯父毛福生的第二个儿子，生于1888年6月7日，长毛泽东5岁。毛智珠有亲兄弟3人，毛宇居居长，他居次，毛碧珠居末。

受诗书世家的熏陶，毛智珠同兄长毛宇居一样，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旧学功底深厚，为韶山一带饱学人士。他以教书种地为生，日子过

得相当清贫。作为一名乡村塾师，他历来欣赏、偏爱刻苦读书的农家子弟。堂弟毛泽东在毛宇居门下读书时，他常听兄长称赞毛泽东，深感此人不同凡响，与毛泽东的交往自然十分密切。

毛智珠生于晚清时代，目睹了旧中国统治者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社会殖民地化不断加深，以及仁人志士发动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相继失败，内心交织着痛楚、忧虑和失望。中国向何处去？这是当时萦绕在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毛智珠这样的乡村文人心头的疑问。

自从毛泽东在外闹革命的风声传到乡下，尤其是他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后，毛智珠的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从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被发动和组织起来所产生的伟大力量，看到了希望。当时，他家庭负担很重，人口多，孩子都还年幼，且在乡间课读农家子弟，无法外出参加工作，但他敬佩和赞成毛泽东从事的革命事业，支持农民运动。毛泽东回韶山的半年期间，他多次听毛泽东讲革命道理，深受教育和鼓舞。他曾托请毛泽东将他 13 岁的长子毛远耀带走，培养他参加革命。毛泽东考虑孩子太小，没有答应。

时光不断流逝，在他含辛茹苦地抚养下，孩子们陆续长大成人。1931 年春，他支持毛远耀到上海毛泽民主持的秘密印刷厂工作。不久，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破坏，转移到中央苏区，毛远耀离开印厂后则留在上海学习。后来返回家乡。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智珠将两个儿子毛远耀和毛远翥送走，支持他们到延安参加工作。不久，他的第三个儿子毛远翔在家乡也参加了革命，抗战胜利后从事地下工作。湖南解放后，他的第四个儿子毛远义也出来参加革命工作。这时，他已是 60 多岁的老人了。在他的教育和支持下，他的儿子全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当上了干部，他的家庭成了干部之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为革命作出的贡献。

毛泽东对毛智珠这位堂兄非常尊重，十分关心。1950 年 5 月 12 日，他在给堂侄毛远翔的信中就曾提到：“你父母照片收到，请你代我问候他们。”

1951 年，毛智珠前往北京，住在长子毛远耀处。毛泽东听说他到了北京，便把他接到中南海，留他住了月余。毛泽东叫秘书安排飞机，让毛智珠游览了长城、秦皇岛等地。临别时，又送给他手杖、夹衣等礼物，使毛智珠十分感激。

1956 年 12 月，毛泽东在接见毛智珠的两个儿子毛远耀、毛远翔以及毛远翔的妻子胡觉民时说：“你们的父亲，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 1951 年我接他来北京住过一段时期。”

毛智珠晚年主要是住在武汉长子毛远耀处，生活过得十分愉快。

1962年10月30日，毛智珠病逝于湖北医学院，终年74岁，归葬于韶山故土。

堂弟毛碧珠

毛碧珠，又名毛笔珠，谱名毛泽田，今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是毛泽东的堂伯父毛福生的第三个儿子，生于1895年，小毛泽东两岁。毛碧珠亲兄弟3人，长兄毛宇居、二哥毛智珠。

毛碧珠年纪跟毛泽东差不多，二人自小一起玩耍，并一起在他的大哥毛宇居门下念过私塾。

1925年春，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毛碧珠曾经参加过农会。是年9月，毛泽东到广州，10月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碧珠随后也来到这里，在毛泽东身边从事书报管理工作。不久又返回乡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农会被迫解散，毛碧珠便在家乡务农谋生。由于他为人精明，经营有方，很快便买了几亩田，家中生活比较富裕。

到了解放初期，毛碧珠家境已经衰败，老伴和儿子毛远翱过世了，家里缺少劳动力和帮手。正在这时，乡间开展土地改革，毛碧珠被划为富农，他的8亩田也被划给了穷人。他与儿媳及孙子、孙女一起生活，老、弱、小三代相依，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1952年10月，他的胞兄毛宇居进京。毛泽东问起毛碧珠的情况，毛宇居叹了口气说：“莫问到他还好点呵，如今划了个富农成份，蛮造孽呢！”

毛泽东听后，半天没做声，他知道农村土改，划分阶级是有一定标准的，但根据毛碧珠的现状，划分富农比较勉强。他不能干预地方工作，只能对毛碧珠生活困难表示同情。毛泽东考虑再三，不便给钱帮助，就请毛宇居捎了一匹布料（4丈）带给毛碧珠，给大人小孩做几件衣服。

农业合作化以后，年近六旬的毛碧珠也加入了合作社，以劳动养家糊口。1956年10月，毛碧珠的堂弟毛纯珠去北京。毛泽东再次问起毛碧珠的生活情况，得知他已加入农业合作社，十分高兴，当即给他写了一封短信，托毛纯珠捎回去。

笔珠兄：

纯珠兄来说你已加入了合作社，甚为高兴。望你努力工作。顺祝

安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月四日

此信话虽不多，余意不尽。毛碧珠看后感激涕零。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拟请客招待父老乡亲。

当地干部早就调查好了哪些人是毛泽东的亲属，哪些人是毛泽东的旧友。在斟酌到毛碧珠这一人选时，考虑到他的富农成份，没有邀请他见毛泽东，更没有安排他赴宴。

6月26日，毛泽东从韶山水库游泳回来以后，便邀乡亲们准备就餐了。这时他发现亲属中没有他记挂着的毛碧珠。

“碧珠怎么没有来？”

旁边的当地干部没有回答，也不好回答。

“毛碧珠怎么没有请来？”毛泽东盯着问。

还是没有人正面回答。

“我让你们请我的亲戚朋友，为什么毛碧珠没有人去请他？！”毛泽东第三次发问。

“碧珠划了富农。”旁边的乡干部终于开口了。

“富农又怎么样？”毛泽东有点生气了：“他是我的堂弟，他还能害我吗？你们一定要去把他找来。”

这天，众乡亲陆续聚集在松山一号招待所，毛碧珠也到了。当他步履蹒跚地走过来，毛泽东一时竟未能认出他是谁。

“主席，三哥，我是老五碧珠呵！”

“你是五弟？！”毛泽东看着毛碧珠，眼里充满了深情。他走上一步，拉着他的手说：“你也老了呵，瘦多了呀！”

毛碧珠与毛泽东是族戚，他按毛泽东曾祖父毛祖人第四代传人的排列，称毛泽东为“三哥”，而毛泽东则按毛碧珠他们家这一脉的排列，称其为“五弟”。

毛泽东拉毛碧珠坐在身边的椅子上，详细询问了大革命失败后他的经历，又问及他的妻子儿女情况，嘘寒问暖，十分关切。

“当地对你怎么样？”毛泽东很关心这一点。

毛碧珠很有分寸地说：“他们没有把我当富农看。”

毛泽东望着这位堂弟一会儿，摇了摇头，说：“我看你这个富农可划可不划。”停了会儿又说：“现在已经划了，你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

毛泽东把手伸过去，拉着毛碧珠的手深情地说：“你也老了，身体也不大好，不要再去劳动了。告诉你的后人，听党的话，噢。”

一滴泪水从毛碧珠的眼眶里滚了下来。这是多么充满温情的一句话呵！毛泽东眼眶也湿润了。

不久，晚餐时间到了，毛泽东同毛碧珠及众乡亲一起进餐。饭后，毛泽东还同大家合影留念。

在那个“地、富、反、坏、右”列为专政对象的年代里，人们谈“黑”色变。“亲不亲，阶级分”，成为人们处理社会关系时情感的界限和行为的模式。因此，当毛泽东提出与富农亲戚见面时，韶山乡干部吃惊不小。其实，这是“左”的观念在社会上作怪的缘故。本来，阶级亲和血缘亲是两种不同的情感，不能混为一谈，不能用政治关系的阶级亲否认、取代亲属关系的血缘亲。对此，毛泽东不仅看得清楚，处理也非常恰当。在政治上，毛泽东非常谨慎，尽管他对堂弟毛碧珠划为富农有看法，但他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为他说话，而是尊重乡里土改的定论，并鼓励毛碧珠上进；在血缘关系上，他依然亲近毛碧珠，和其他亲属一样对待。毛泽东执意要求宴请名单上增加毛碧珠一事，体现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一种浓郁的亲情和人情味将永远飘逸在人间。

堂弟毛泽嵘

毛泽东与毛泽嵘是同一曾祖父毛祖人的第四代传人。毛泽嵘是毛泽东堂叔毛貽富（毛梅生）的儿子，生于1897年，韶山杨林乡人；字冬青。毛泽东在这一辈堂兄弟中排行第三，毛泽嵘排第五，故小名叫“宋五”，又称“逊五”“胜五”。

毛泽嵘年少时因家境贫困，不能长期供养他读书，辍学后一直在家务农。1925年毛泽东回家乡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农民运动时，曾动员毛泽嵘参加革命。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引导下，毛泽嵘积极参加农民协会，并担任通讯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躲避反动势力的血腥屠杀，毛泽嵘不得不流落他乡，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才回到韶山。因原东茅塘住房早已变卖，便寄居外祖父家，生活十分艰难。

1949年夏，湘中广大地区获得解放，韶山人民欣喜万分。在家种田的毛泽嵘耳闻目睹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继续南下，气势不可阻挡，对领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三哥”毛泽东极为敬佩，为毛家出了一位伟人感到骄傲。新中国成立后，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述说与堂兄离别20多年

来的思念之情，并反映自己在韶山生活的情况。收到家乡的音讯，获悉历经战火和磨难后亲人依然健在，毛泽东心情自然十分高兴。这一期间，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由姑表兄李轲陪同正在北京治病，毛泽东从他们述说中得知，毛泽嵘生活很困难，便托他们回去时捎上给毛泽嵘的生活用品。毛泽东还给毛泽嵘写了回信。

宋五弟：

接到你的信，极为高兴。

我这里的情形，可问李祝华、毛泽连二位便知。

托毛、李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

顺致健康！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此后，毛泽东经常扣取自己的工资或稿费给毛泽嵘寄生活补助费，为他解决了生活困难。但是，毛泽嵘还有一个愿望迟迟没有得到解决。他多次去信，要求来北京看望毛泽东。1953年春，为表达自己对三哥的感激之情，他不仅寄去家乡的茶叶、腊鱼等土特产，同时再次写信，要求进京面谢。不料，毛泽东的一封回信使他大失所望，心里有点不痛快。信写道：

泽嵘贤弟：

四月九日给我的信及惠赠食品，均已收到，谢谢你。

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罢，似乎不必来京看我。

你有困难，可以相告，替你设法解决。

此复。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

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3年半了，毛泽嵘眼看韶山的亲友不少都去过北京，有的已有两三次，而自己一次还未去过；乡亲们也曾不解地问他：泽嵘，你是主席的亲堂弟，为何一直不见你去北京呢？每当及此，他总是觉得脸上无光，闷闷不乐。

然而，毛泽嵘哪里知道，毛泽东工作很忙，日理万机，而要求来京的亲友又多，他只能根据工作的间隙和事情的轻重缓急来安排，同时老人上京，

一应照料都得考虑周全，并非易事。毛泽东心里一直装着这件事，他在寻找适当的机会。同年秋天，表侄文九明给毛泽东去信，反映“乡间的意见”毛泽东要他来京面谈。这时，文九明年方 40，毛泽东立即想到让他偕毛泽嵘同行，路上可以帮助照料。10 月 25 日，毛泽东在给文九明的信中说：“毛泽嵘，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门前，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委统战部则不找，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当文九明将这一消息告诉毛泽嵘时，毛泽嵘感到意外惊喜，心里对三哥的那点埋怨立即烟消云散。11 月中旬，他们顺利抵达北京。

毛泽东、毛泽嵘兄弟俩分别 20 多年，一朝相见，分外亲切。两人带着浓郁的乡音一口一声“主席三哥”、“宋五老弟”。毛泽东向五弟详细了解了家乡的生产情况及他个人的生活情况，毛泽嵘一一作了回答。临回韶山前，毛泽东送给毛泽嵘不少礼物，其中包括一件青蓝色呢子大衣、一套蚊帐和一口皮箱，另外还有 300 元人民币。

本来，这次去北京前，毛泽嵘以为，中南海里一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和富贵，三哥的衣食住行一定是常人不可想象的。到了中南海，才知三哥的生活很俭朴。屋里四处都是书，除了有几把乡下少见的沙发外，别无豪华陈设。三哥的穿着极普通，裤子洗得褪了色，衬衣上有补丁。饭桌上，是炒苦瓜、苋菜，还有豆豉辣椒，跟农家的菜谱一样。桌上惟一的一样荤菜，是一碟子红烧肉。三哥从小就爱吃红烧肉，现在还是这样。毛泽嵘简直不相信这是共和国主席的日常生活！他说：“三哥，您当了主席，管的事情多，身体很重要，生活要搞得好一点！”毛泽东莞尔一笑，说：“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生活也算不错，够得了中上水平了！”毛泽嵘说：“听说当年慈禧太后的一顿饭要吃去 800 两银子，那当然要不得。不过，你也不要太刻薄了自己！”

对于五弟的好意，毛泽东表示心领了。自投身革命以来，毛泽东生活一直非常简朴。进城后，他仍然过着这种生活，同时十分警惕党的干部中逐渐滋长的脱离群众、追求享乐的倾向。他多次在党内号召，要保持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对毛泽嵘说：“现在和将来，我们都摆不起阔气。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两句诗警醒世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你想想，我们能不养成一种勤俭节约的风气吗？全党、全国各级机关，各级干部，都要厉行增产节约，国家才能建设好！”听了这一番话，毛泽嵘对三哥更加敬佩。

回到韶山，毛泽嵘经常往北京飞传鸿书，向三哥汇报家乡的情况，关心

三哥及家人的情况，好让三哥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享受到亲情的慰藉。因在京期间，江青生病住院，毛泽东带他去看望过，尽管这位嫂子对乡下的小叔子态度冷淡，毛泽东回家后仍惦记在心，他在给三哥的各信中都礼貌地予以问候。毛泽东对他如此重兄弟情谊深为感激，并在回信中代江青致谢。信写道：

胜五弟：

你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江青病况略有进步，她对你的关怀，甚为感谢。孩子们都好。你们都好吗？

祝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这年，毛泽东的儿子毛绘华从部队复员，要找一份工作。复员军人通常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可在韶山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岗位。而毛泽东常年蛰居乡间，消息闭塞，也不知道什么地方需要人。这位老人闹起了肚皮官司：国家建设飞速发展，到处需要人。三哥位高权重，为自己的侄儿安排个工作，哪会有什么问题呢？这么想着，他就带着儿子去了北京。

第一次见到这位侄子，毛泽东很是高兴。他立即叫秘书拿来 300 元钱，赠给侄儿，叫他去添置一些必需品，然后又请他们父子俩吃饭。毛泽东心中充满希望。毛泽东送这么多钱给侄儿，说明他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伯伯喜欢了，安排工作不是十拿九稳了吗？

吃过饭，毛泽东邀五弟及侄子在院子里散步，他们在中南海的林阴道上，边走边拉着家常。一会儿，毛泽东叫着毛泽东的小名说：“逊五，你叫我为你儿子安排工作，这件事不太好办。我是国家主席，不能随便给人介绍工作，更不能只考虑自家的亲朋故旧的利益。你是我的兄弟，我必须严格要求。至于你儿子的工作问题，要靠他自己努力，有所表现，由当地政府量才录用！”接着，他又勉励侄儿，“你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多做贡献。千万不要依靠父母、长辈。那样，你才会有出息！”

毛泽东的开导，使毛泽东父子俩深受教育。后来毛绘华返回家乡，通过自己的努力参加了工作。

冬季来临时，毛泽东又想念三哥，写信要求在来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再次与三哥相聚北京。毛泽东也想再见五弟，即复一信：

胜五弟：

你的信收到了。

你要求明年四月再来北京一次，我认为可以。还有毛仙梅想来，你可和他一道来。在京住一个月回家。

寄上人民币贰百万元，以助日用。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信中提到的毛仙梅，是毛新梅烈士的弟弟、毛泽东的族兄，大革命时期，在毛泽东的引导下，曾参加过韶山农民运动。其兄毛新梅，则是更早受毛泽东的影响出来参加革命的。毛新梅，1923年受毛泽东委派参加了安源工人运动；1925年回韶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展农民运动，并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最早的五名成员之一；同年10月赴广州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年底回韶山继续开展农运，历任韶山总支委员、湘潭县农会委员兼庶务部长；1927年7月被反动派杀害。毛泽东一直深深怀念毛新梅烈士，这次让毛泽嵘偕他弟弟上京叙旧。信中资助毛泽嵘的钱，是旧币，等值新币200元。

1955年4月，两位老人按期动身。到京后，多次见到了毛泽东，还参观游览了名胜古迹，心情十分高兴。一次，毛泽东约他们吃饭，毛泽嵘见毛泽东爱吃红烧肉，便对他说：“三哥回韶山，我们餐餐搞红烧肉给你吃。”毛泽东高兴地说：“那好那好！”接着问：“你们能经常吃到红烧肉吗？”毛泽嵘放下筷子，脸色顿时凝重起来：“莫说吃肉，好多人家饭都没得吃！”毛泽东一听问题如此严重，忙问何故。毛泽嵘告诉三哥，去年秋，中央来了文件，粮食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后，留给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1斤。对庄稼汉来说，1天1斤哪里够吃？吃一餐都勉强。眼下春季青黄不接，借贷无门，韶山有40%的人没有饭吃。

毛泽东沉默了许久，然后歉意地说道：我了解的情况没那么严重，看来我没有十足的官僚主义，也有五成呢？只有你才肯讲真话。他当即要秘书把在家的中央领导都请到他家来。不一会儿，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彭真等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泽嵘说：“你们领导闹革命，我举双手赞成，就是粮食要充足点。”接着，他一口气汇报了乡间缺粮的情况。周总理对他解释说，现在国家搞建设，有些困难，要注意节约，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星期天只吃两顿。毛泽嵘道：“乡里没有多少油吃，城里还有副食卖，当然够了。”

毛泽东见谈得差不多了，就打断堂弟的话说：好！好！泽嵘暂时莫讲了，我们开会研究。

两天之后，刘少奇向毛泽嵘了解乡里统购统销的具体做法和农户的困难。不久，毛泽东和刘少奇外出视察工作，其中也到了湖南。据中央调查核实的结果，1954年全国粮食统购多购了70亿斤，农民的确有些意见。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随着新制度的建立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全面开始，毛泽东的工作极为繁忙，他一方面要着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制订党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要研究解决大量出现的新问题，因此外出调查巡视多，出席会议多。这一时期，他几乎无暇接待亲友上京。1956年春，当毛泽嵘提出这一要求时，毛泽东只能婉拒。他的回信说：

泽嵘贤弟：

多次来信，均收到了。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吧。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收到这封信，起初毛泽嵘并不清楚为什么。但通过看报、听广播等，才逐渐了解三哥确实忙得不可开交，心里感到释然。可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三哥都没有安排他上京，而“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等政治运动接踵而至，铺天盖地，造成国家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毛泽嵘对此不理解有之，不满更有之。他感到胸中郁闷，有好多话要对三哥讲。然而，一次近在眼前的机会竟让他错过。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回故乡韶山探望。他请了许多亲戚、干部吃饭座谈。然而在餐桌前落座时，他发现没有这位五弟，就问工作人员，请帖是否送到了？工作人员说，毛泽嵘住在山那面的云源村，去请他的时候，他家门上一把锁，问邻居，说五阿公走亲戚去了，工作人员便将请帖请邻居转交。也不知是毛泽嵘走亲戚还没回家，还是邻居忘记转交请帖，总之毛泽嵘没有来参加这次聚会。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急急赶来韶山冲。其时，毛泽东已经离开韶山到长沙去了。这一对堂兄弟在家乡失之交臂，毛泽东深感遗憾，匆匆赶来的毛泽嵘更是唏嘘不已！

到了1960年，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往日鱼米之乡的韶山地区也

受到波及。毛泽嵘是一个性情耿直、敢说真话的人，他看到问题如此严重，再也坐不住了。这次他自主决定，进京向主席三哥“告状”。9月，他到北京时，正是国庆前夕，毛泽东很忙，等了数日未能见到。他索性来到中南海警卫局，请人打电话求见，几日后才见到毛泽东。一见面，他像开机关枪一样，讲到社队干部虚报产量，又不科学种田；为多插一季稻，强令社员正月下种，结果烂了禾种，便砍社员口粮；还盲目下令密植，造成减产；谁提意见就给谁扣上“反党反红旗”的大帽子。还讲到队里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家畜家禽被一把没收。最后他毫不客气地说，“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哩！”毛泽东认真听着汇报，中间没有插话。他知道毛泽嵘不会撒谎，说的是实情。等毛泽嵘一口气说完后，他仔细询问：“现在口粮怎么分？”小孩子三两，大人一斤”毛泽嵘心急上火地答道。

这一次“告状”，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个月后，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示要坚决纠正“共产风”，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

经历了林彪事件后，1972年毛泽东一度病倒了。毛泽嵘得知这一消息，第五次来京看望三哥。他发现三哥苍老多了，走路都要人搀扶，心里一阵酸楚。当时，毛泽东思维仍然清晰，给他讲了一些国内外形势。这次，毛泽嵘不忍心多打搅三哥，停留很短时间就告别离去。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关心五弟，在卧病期间曾对前来探望的孩子说：“家乡还有两个叔叔，连饭都吃不饱，你们要经常回去看看。”这两个叔叔，指毛泽嵘和毛泽连。

1977年9月，是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祭日。这天，在毛主席纪念堂里，有一位80岁的老人，伫立水晶棺前，老泪纵横，久久不愿离去，他就是毛泽嵘。这是他一生中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上京。

1986年2月9日，毛泽嵘在家乡病逝，终年89岁。

堂弟毛泽连

毛泽连，字润发，毛泽东的堂叔毛蔚生的儿子，生于1913年9月26日，在毛祖人的第四代传人中，他排行第九。

毛泽连的父亲毛慰生有四儿一女，大儿子出世不久就夭折了。二儿子在大革命时参加了农民协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事农运工作。1931年护送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及女儿毛远志、养子毛华初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后来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不幸在一次作战中牺牲。三儿子是毛泽连。四儿子

毛泽青，1937 年离开韶山参加革命。女儿毛泽建，幼年过继给毛泽东的父母做女儿，1921 年离开韶山，尔后参加革命工作，1928 年被反动派杀害。

由于家中没有田产，且人口多，负担重，毛泽连的父亲一年到头仅靠帮工为生，生活十分贫困，加之过度劳累，年轻时就得了肺病，经常咳血，后来年寿不高就去世了。毛泽连的母亲是个勤劳俭朴的家庭妇女。丈夫去世后，一家的重担全压在她的身上，是她含辛茹苦带大了几个孩子。

毛泽连比堂兄毛泽东小整整 20 岁。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年仅 12 岁的毛泽连便在堂兄的教育下参加了儿童团，配合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与农会干部召开秘密会议时，经常让他在外面站岗放哨，传递消息。

1928 年姐姐毛泽建牺牲后不久，湘潭县警察局派出一队枪兵来毛泽连家抄斩。幸亏乡亲们及时通风报信，毛泽连一家才免遭敌人的毒手。那时，毛泽连已经 16 岁了。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追捕，只好流落他村，为地主家打短工。从此，他经常过着大地当席、青天为房、稻草作被的露宿生活。老天下雨，便只有寻一岩洞栖身。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加之蚊叮虫咬，不久就患上了“热眼病”。因维持生存尚且困难，更无从求医问药，久而久之，毛泽连的眼病越来越严重，后来又由左眼波及右眼。如此年复一年，双目渐渐雾蒙蒙的，看不清东西了。

自从毛泽东于 1927 年离开韶山后，毛泽连与他分别已经有 20 多年了。1949 年 8 月 5 日，湖南省会长沙和平解放。8 月 9 日和 10 日，湘潭、湘乡相继解放。四野第四十六军第一三八师师长任昌辉想到韶山就是毛泽东的家乡，即派人打听毛泽东亲属的下落。

部队的同志很快来到了韶山，在上屋场找到了当时住在那里的毛泽覃烈士的岳母周陈轩老人。通过他，又找到了住在东茅塘的毛泽连。

就这样，毛泽连成为韶山第一批去北京的客人。

10 月 4 日，当秘书叶子龙将这一消息告诉正在批阅文件的毛泽东时，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虽然心中有疑，毛泽东还是忍不住喜上眉梢。几十年了，他一直没有回过韶山，心中十分想念家乡和那里的亲人。

叶子龙回答说：“昨天到的北京。”

“是哪两个客人？”毛泽东仍是急急地问。

“据电话里说，一个是您的堂弟，叫毛泽连，一个是您的堂表弟，姓李，叫什么我记不太清了。”

“呵，是九弟润发来了！太好了！”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他随即

起身，在屋内高兴地来回走着，似乎几天来的疲倦一扫而光。

陪同毛泽连一起上京的叫李柯，是他的姑表兄，也是毛泽东的亲戚，毛泽东的曾祖父是他的外曾祖父。第二天上午，两人由叶子龙带领来到中南海。走进菊香书屋，毛泽连凭借一丝微弱的眼光，对着眼前高大的身影激动地喊了一声：“主席三哥！”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是泽连——润发九弟吧。”毛泽连泪如泉涌：“我是润发呀！”毛泽东又握住李柯的手，关切地问：“你父亲叫李星明吧，还在不在？”家父去世多年了。”李柯应道：“那姑妈呢？”“还在。”毛泽东对两位客人说：“几十年没见面，都有些认不出了。我很想念你们，很想念家乡。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李柯说：“主席，这次我们来，一是代表家乡人民问候您，二是向您反映家乡的情况。”

“谢谢你们”，毛泽东边说边招呼客人坐下叙谈。谈话间，毛泽东发现毛泽连看东西很吃力，一打听才知他的眼疾已十分严重，深表惋惜。安顿住处后，毛泽东请他们吃饭，并关心地提出派毛岸英等陪同毛泽连上医院看眼科。吃完饭，在毛岸英等人陪护下，毛泽连动身去协和医院。临行前，毛泽东叮嘱道：“润发呀，去诊病就是诊病，要听医生的话，按医生的安排进行治疗，不要霸死蛮。”医院检查的结果很快出来了：毛泽连的左眼已完全失明，右眼还有点光。医生对毛岸英说：“这位病人的左眼已经完全不行了，只有挖掉左眼，才能诊治右眼，否则，连右眼也危险。”毛岸英征求叔叔的意见。毛泽连先是不同意，但想到三哥的嘱咐，也就同意了。

出院后，毛泽连和三哥商量上假眼球的事，毛泽东说：“你自己可以拿主意。不过依我看，视力恢复了，上假眼球就没有什么大的必要了，那只是一个模样，没有什么作用，还要花很多的钱哩。”毛泽连点了点头说：“我听三哥的，不上了吧。”

到了11月份，北方的天气已经很冷了，毛泽连二人打算回湖南老家。行前，毛泽东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毛泽东站在中间，毛泽连、李柯分站两边。毛泽东还送了他们一些礼物，主要是皮箱、衣服和钱。临上车时，毛泽东又喊住毛泽连叮嘱着：“九弟，回去以后，如有困难，不要去麻烦政府，你的困难我知道，我今后如能帮你接济点就接济一点。你是我的亲戚，凡事要带个好头，可不能大事小事都去找政府解决呵！”

毛泽连从北京回来以后，记住了三哥的话，并没有去找政府。然而中共湘潭县委得知了毛泽连母亲的病情后，根据照顾烈属的规定，主动将她送到湘潭医院治疗。

由于积病多年和身体衰弱，短时间难以治好。毛泽连经组织同意，将母亲从湘潭医院转到长沙湘雅医院治疗，可是仍然没有明显疗效。1951年，

毛泽连与远房侄子毛远悌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表达了想上北京治病的愿望。考虑到地方政府已经尽了很大的力量及影响问题，毛泽东于 12 月 21 日回信没有同意。信写道：

泽连、远悌：

来信收到。

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再在长沙住得太久。

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

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

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

祝你们都好！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不久，毛泽东又从稿费中拿出 200 元钱给毛泽连寄去，主动承担继续治疗的费用。此后，毛泽连母亲的病情逐渐有所好转。当她知道这治病的钱是毛泽东寄来的时候，感动得热泪盈眶。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毛泽连庆幸母亲健康恢复有望时，不料他自己一次垦荒，从山坎上跌了下来，将腿摔成重伤。

当时，毛泽连有一对儿女，老大是男孩，叫岸平，老二是女孩，叫小青。小青刚出世，还不懂事。岸平望着父亲伤重的腿，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最忧虑忡忡的是毛泽连的母亲，她整天长吁短叹，掩面饮泣，由于忧思百结，已有好转的病情又复发了。一天，母亲摸索着走到儿子和媳妇的跟前，嘱咐他们：一定要写信告诉润之，让他叫政府接你们去北京诊治。“孩子啊，我已是快入土的人了，今天死了明天死了，你们挖一个坑，把我埋了。可是，这个家要你支撑呀，如果你万一残废了，你终身受苦不说，我的两个孙子可怎么办呵。到时，我死了也不会闭眼的。”说罢，眼泪像小河一样流淌不息。

由于心急，内火相攻，毛泽连仅存的一只右眼又发红了，开始看不清东西了。这一变化，令他十分害怕，如果万一腿残眼又瞎，这个家也就彻底完了。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1952 年 5 月 8 日，毛泽连给三哥写了一封信，诉

说自己的处境，并提出进京诊病的要求。

一个多月后，他接到了毛泽东 6 月 23 日写的回信，信中建议他到长沙治病。

润发贤弟：

五月八日的信收到。

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病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此复。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三日

然而祸不单行。就在这年 6 月份，毛泽连的母亲又病逝。由于常年治病，家中开销较大，生活时时陷于困窘，如今又要安葬母亲，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毛泽连悲从心来，愁上加愁。无奈，毛泽连只好写信向三哥诉苦。7 月 11 日，毛泽东在给堂兄毛宇居的信中关切地问到：接毛泽连的信，六婶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形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时请查明见告。

10 月 2 日，毛泽东又在给毛宇居的信中，提到毛泽连的困难情况，信中说：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这里所说的人民币，指旧币，1 万元等于新币 1 元）毛泽东还在信中嘱咐，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此后，毛泽东每年都要给毛泽连家寄款 200 元，作为生活补贴。到了 1962 年，湘潭县民政局把毛泽连作为烈属对待，每月发给 20 元抚恤费，到 80 年代又稍稍增加了一些。

1959 年 6 月，毛泽东在家乡宴请乡亲们，他就特别关照工作人员说：“我的那位九老弟，眼睛看不见，请你们用车子去接一下！”

毛泽连进门的时候，毛泽东忙上前去搀扶他。毛泽连听出是三哥叫他，抱着毛泽东的胳膊，抚摸着，好半天没有说话。毛泽东上上下下打量着他。前次跌伤了脚，似乎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只是他的视力似乎越来越差了。毛泽东脸上掠过不安的表情，问：“九弟，你还看见我么？”毛泽连说：“三哥，我听见您讲话！”毛泽东担忧地说：“怎么，你一点也看不见了？听说你还去种田，田边山坡，高高低低，再摔了可怎么办呀！”毛泽连告知，门前的路他已走熟了，请三哥放心。在韶山期间，毛泽东还把毛泽连一家接来叙谈，并合影留念。

1977年是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毛泽连一家赴京瞻仰毛泽东遗容。站在水晶棺前，毛泽连和家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们一齐深深地向毛泽东鞠躬，以表达心中无限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堂弟毛泽青

毛泽青，号咏才、运才，又名万才，今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生于1916年6月22日，是毛泽东的堂叔毛蔚生的第三个儿子，在毛祖人的第四代传人中排行第十。

1949年，毛泽东致信毛泽青：

运才弟：

来信收到，甚慰。

望努力工作。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写给他仅有的一封信。

毛泽青无论如何没有料到，过了几年，他精心保存的这封信被人发现后，竟使他澄清了一桩事实，免去了一次政治厄运。

毛泽青幼时家贫，自小失学。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运，比毛泽东小23岁的毛泽青也积极投入。当时他只有9岁，即参加儿童团，替农会站岗放哨。1937年他与韶山族亲毛远耀、毛远翥、毛泽全一起奔赴延安，在四哥毛泽民身边工作。他的算盘就是毛泽民教会的。

来到延安，毛泽东与他第一次见面，就送了他一支手枪。开头，毛泽青还不敢拿。毛泽东说：“不要因为不会打枪就不敢拿枪。不会打可以学会。干革命从来就是边学边干的！”在延安，毛泽青先被分配去陕北公学学习。短期训练后，被派往延安解放印刷厂工作。1939年，日寇对我大举进攻，边区经济十分困难。一天，毛泽东把他叫去，说：“泽青，你去做生意好么？”泽青和许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一样，满脑子革命思想，以为只有上前线才叫革命，叫他去做生意，心里就不乐意。毛泽东说：“现在边区很困难，敌人又封锁我们。中央决定，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听说你算盘打得不错，也懂一些生意经，就为革命去做生意吧！”

毛泽青就这样当了“老板”，化名毛万才，去西安城里经商。他穿着蓝

长衫，出没于古城的大街小巷，奔波于陕北的崎岖山道，把棉纱、布匹、药品、食盐、纸张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延安来，为解放区的物资供应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时他才认识到，革命好比一部大机器，缺一个螺丝钉都不行。他甘愿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

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收到一封寄自西安的来信，打开一看，是十叔毛泽青写来的，信中说他是部队的一名普通财会人员，现在西安。接着便介绍了一些他的生活情况，并表达了思念家乡的心情。毛泽东得到堂弟的音讯，非常高兴，当即写了上述那封短信。

不久，毛泽青告假回韶山探亲。这次回乡，毛泽青还意外地了结了自己的婚事。原来，毛泽青去延安之前，由于家里穷，一直没有娶媳，母亲陈氏很着急，经人介绍，将一个6岁的女孩子说给他做童养媳。女孩姓庞，庞家和毛家一样穷。那时，毛泽青正准备去延安找三哥，没把这件事当真，权当母亲领养了一个小妹妹。及至12年后回乡，当年的童养媳长成了18岁的大姑娘。而在长年的战争环境中，毛泽青也没有机会考虑个人问题。于是，这场封建包办婚姻，却获得了一个喜剧性的结果。

庞氏自小在毛家侍奉婆母，没有文化，婚后随毛泽青到西安，没有参加工作，一直在家里做家庭主妇，料理家务，生儿育女。全家仅靠毛泽青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日子过得比较艰苦。

毛泽东了解十弟一家的生活情况后，十分关心他们，经常给他们寄一点零用钱，接济他们的生活。毛泽青虽然对三哥的帮助十分感激，但他从不在外炫耀。

毛泽青从西安调到东北工作后，由于他当时的名字叫毛万才，他本人又十分的谨慎，因此单位里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堂弟。

1953年他又接到毛泽东寄来的300元人民币。300元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毛泽青不仅还清了家里多年的欠账，还买了一件狐皮大衣、一床毛毯，戴起了手表。同事们议论纷纷：“这家伙，怎么一夜之间就发了财呢？”

毛泽青并没有在意同事们的议论，也不愿意向别人解释。通过多次工作调动，同事们只知道他叫毛万才，不知道他又叫毛泽青，更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十弟。平常，毛泽东来信、寄钱，他也瞒得紧。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不想炫耀。他穿上狐皮大衣没几天，机关里“五反”运动就开始了。打虎办公室找他谈话：你收入不多，爱人又没有工作，哪里来这么多钱摆阔气？一定是利用财会工作之便，贪污了公款！

毛泽青一时有口说不清。他终于被打成了“老虎”，挂上了“利用会计工作之便，贪污公款”的罪名。家被抄了，人被隔离审查，上厕所都得

请假！

幸亏这次抄家，把毛泽东的亲笔信抄出来了。300元钱的来历，也不言自明。毛泽青终于获得解脱。这时，同事们又埋怨他：“你是毛主席的堂老弟，主席给你寄了钱，你怎么不早说呢？”毛泽青说：“主席多次说过，亲者严，疏者宽。他要求我们这些亲属严以律己，决不许我们打他的牌子去沾光！”

后来，许多人感叹地说：“要不是这次打‘老虎’，我们还不知道毛万才是毛主席的堂老弟呢！”

毛泽青与毛泽东的亲属关系公开后，他比以前更加谨慎了，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不向毛泽东和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他有着1937年参加革命的资历和辉煌的亲属背景，却几十年来一直在东北基层工作。依靠自己的努力，他先后担任了中共辽宁抚顺市市政工程处预制件厂支部书记、抚顺市政协委员等职。80年代光荣离休。

堂弟毛泽全

毛泽全，是毛泽东的远房堂叔毛喜生的次子，生于1909年4月，小毛泽东16岁。毛泽全亲兄弟3人，哥哥叫毛纯珠，弟弟叫毛润珠，他排行老二。由于父亲早逝，他们兄弟3人自小由母亲带大。

毛泽全自幼家贫，读书不多，曾当过长工。后来因本家堂叔毛岱钟在南京任监察院调查专员，他便投奔这位堂叔，在他手下当了一名收发员。1936年毛岱钟病逝，毛泽全便返回家乡韶山。第二年，即1937年，毛泽全又跋山涉水，来到延安，投奔堂兄毛泽东干革命。

对于故乡亲人的到来，毛泽东十分高兴，但他也有一个顾虑。就在不久前，他写信给唐家圪的表兄文运昌：“……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现在，毛泽全千里迢迢来到延安，毛泽东一一问了乡间亲友的近况，然后对他说：“你到延安来，这里生活是很艰苦的呀！”

毛泽全说：“我不怕吃苦！”

看样子，毛泽全也是吃得苦的人。于是问他：“那么，你想干点什么工作呢？”

“我听从三哥安排！”

“听党的安排！”毛泽东纠正他，“到延安来，是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为

劳苦大众谋利益，不是单为自己找出路。如果要发财，就不要到延安来。你是我的堂弟，是家乡第一批来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的亲友，要带好头，要提高思想觉悟，为革命多出力！”

毛泽东为毛泽全上了参加革命的第一课。接着，又安排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又转入中央党校学习。

1938年，毛泽全从中央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皖南岩寺兵站工作。不久改名王勋，调到繁昌兵站任指导员。此后，他历任马兴兵站站长兼指导员、张家渡兵站站长、新四军一师二旅供给部副部长、新四军三纵队供给部部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后勤部长等职，一直战斗在我军后勤工作岗位上。在皖南繁昌战役、南陵战役，苏中裕华战役、李堡战役，河南豫东战役，山东孟良崮战役以及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他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部队的后勤任务。

1942年春，毛泽全与青年学生徐寄萍结婚。婚后生有3个女儿，分别叫毛远慧、毛远玲、毛远平。徐寄萍是1940年在上海参加学生协会，次年随一批同学到苏北新四军一师，参军后认识毛泽全，两人由相识到结婚，仅仅一年时间。

新中国成立后，他恢复了原来的名字，担任了华东军区后勤部生产部部长。

1950年夏，毛泽全去北京开会，抽空去看望三哥。他们兄弟从延安一别，已有12年没有见面。这次重逢，显得格外高兴。毛泽东问他：“泽全，延安分别后，你到哪里去了，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呀？”

毛泽全告诉他：“后来改名王勋，到苏北新四军搞后勤去了。”

毛泽东说：“好嘛，你连姓也改了。姓王也好，笔画端端正正，不像‘毛’字底下还有个尾巴！”

毛泽东总是那样幽默风趣。

那会儿，陈毅也在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向陈毅介绍毛泽全。陈毅笑着说：“我是华东军区司令员，泽全同志是华东军区的干部，还用得着主席来介绍吗？”

毛泽东也笑了，说：“原来你们早就是一家人啦！”接着，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毛泽全的工作情况。毛泽全谦虚地说：“水平低，许多事没有做好！”陈毅忙说：“这不实事求是嘛。皖南事变时，环境那么恶劣，泽全同志带领他那个兵站，突出重围，这就很了不起嘛！”

毛泽东很高兴，笑着说：“你们工作有成绩，我心里就高兴。居功不骄傲，这更好！”

1952年，毛泽全调任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生产管理处处长，爱人徐寄萍也被调到总后工作，于是便举家迁到北京。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便于这年的中秋节派车把他们全家接到中南海，共度中秋佳节。

毛泽全的母亲邹氏，是毛泽东的堂婶，其丈夫毛喜生早逝，她含辛茹苦，把3个儿子苦苦拉扯大。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回乡开展农民运动，她也是积极分子。抗日战争时期，她又把儿子毛泽全送到延安参加革命。毛泽东对这位婶母十分敬重。

毛泽东来到菊香书屋前的草坪上迎候邹氏。只听南屋走廊里传来一阵笑语，秘书叶子龙领着毛泽全夫妇和母亲邹氏及三个女儿穿过长廊走了进来。

“ 婶婶！”毛泽东迎了上去，双手搀扶她。

老太太颤颤地移动着小脚，端详着毛泽东，激动地喊道：“ 润之！”

“ 婶婶身体还好吗？”毛泽东拉着邹氏的手问道。

“ 好 好。”老太太爽朗地说。

当时，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过去的老师李漱清、少年时的伙伴邹普勋均在座。毛泽全的母亲邹氏是邹普勋的亲姐姐，因此邹普勋是毛泽全的亲舅舅，一家人在这里相见，分外高兴。

吃饭时，四菜一汤，虽然都是些苦瓜、茄子、辣椒之类，但大家都吃得非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不亦乐乎。饭后大家围坐在一起，抽烟、说话、吃水果，颇有些中秋团圆的气氛。

1954 年秋，毛泽全的母亲邹氏又来北京，毛泽全便和妻子一起带着她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听说邹氏来北京很久了，便埋怨堂弟：“ 婶母到北京这么久了，怎么不早告诉我？”

毛泽全说：“ 我怕打扰您的工作。”

“ 没关系。”毛泽东摇摇头。他走上前去亲自扶着邹氏，小心翼翼地走上台阶，进了会客厅。

邹氏当时已年近八旬，又是小脚，走路不便，看到毛泽东来搀扶她，激动得老泪纵横。

中午，毛泽东在家设便宴招待邹氏及毛泽全一家。席间，他指着邹氏对堂弟说：“ 泽全，你母亲是个好人，你父亲死得早，她带着你们受了很多苦，现在你们要好好照顾她过一段好日子呐。”毛泽东还回忆说：“ 大革命时期，我有一次到韶山调查，婶母见到我脚上布鞋破了，连夜就赶了一双新布鞋给我穿。那双鞋，后来我一直穿到广州！”说完，毛泽东沉浸在对往昔的追忆之中。毛泽全听了，心里一热，说：“ 几十年前的一桩小事，主席还记得那么清楚…… ”

1956年4月，哥哥毛纯珠到北京，毛泽全又领着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也予以热情接待。后来，毛泽东处要是来了家乡客人，也经常叫毛泽全去作陪。两家的来往，十分密切。

堂弟毛泽普

毛泽普是毛泽东的堂弟，比毛泽东小26岁，在东茅塘毛氏兄弟中排行十五，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其父是当过毛泽东私塾先生的毛麓钟。

毛泽普长大以后，堂兄毛泽东早已离开家乡干革命。是母亲常常提起这位曾经在他家读过书的毛润之，使他打心眼里佩服这位堂兄。

1937年冬，毛泽普18岁，从湘潭中学毕业后回到韶山。当时，他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和书刊，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充满了向往。于是冒昧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去延安。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回信要他去，并嘱咐先去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找徐特立。毛泽普与韶山另外两名地下党员一起赶到长沙，乘火车到西安，再坐汽车到达延安。

第二天，毛泽普等三个从韶山来的青年人迫不及待地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他们很高兴，问路上走了好久？韶山的形势怎么样？当得知湖南还有许多青年想到延安来时，他风趣地说：无湘不成军嘛！接着，又严肃地说：干革命要过两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些人经不起考验离开了革命。到延安来，一要吃小米，二要住窑洞，三要背柴背米，四不发饷（他边说边掰指头数着）。要做好思想准备啰！

毛泽普刚入延安后，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由于抗大新来的同学都希望听到毛泽东作报告，学校便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一要求，他很愉快地答应了。

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对新来的同学们表示欢迎，表扬了他们不辞劳苦、跋山涉水来到延安的革命精神，接着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号召大家树立长期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他的讲话获得抗大同学们的阵阵掌声。毛泽普坐在下面，心情也特别激动，跟着同学们一起不断鼓掌。

1939年，毛泽普和抗大部分同学转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先编在3班，后编入5班。由于内容多，底子差，学了两个月，仍感到很吃力。一次，他去请教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读书要发狠，肯钻，要抓重点，先学好联共党史和政治经济学。他强调，学习的目的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不要读死书，要联系实际。眼光要放远一点，战争以后就要搞社会主义建设，要学会搞经济。毛泽东还说，读书要由浅入深，啃不动马列主义原著时，可先读些

通俗读本。说着，他起身在自己书柜里找出两本书递给他，一本是《经济学入门》，一本是《唯物史观》。

当时，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延安军民掀起大生产的热潮。1940年7月的一天下午，收工途中，暴雨倾盆，同学们飞快地往家里跑去。毛泽普背着锄头在后面走着，心想跑什么，反正已经是“落汤鸡”了。当他从毛泽东住的窑洞前经过时，正巧被毛泽东看见了。毛泽东亲切地招呼堂弟进屋躲雨。

进了屋，毛泽东找来干净衣服让他换上，留他吃晚饭。饭后，毛泽东说：刚下暴雨，延河涨水，不好过。今晚就住在这里吧，很方便，行军床一架就行了。当天晚上，哥俩谈起开展劳动竞赛和步行百余里到山里背柴的情况。毛泽东问这么干累不累。毛泽普回答：有点累，可是受得住。毛泽东说：敌人卡我们，我们不能坐等饿死。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要用双手制服它。现在多打一斤粮食，就等于多消灭一个鬼子。

1941年春，毛泽普报名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征粮工作队。在陇东等地的征粮途中，他们做了大量的调查、宣传工作，顺利地完成了征粮任务。征粮回来后，毛泽普向毛泽东汇报了各地群众拥护共产党，节衣缩食上交公粮的情况。毛泽东听后感动地说：“中国的农民真好，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才能解放农民。”他表示：“公粮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了，取之于民众不能太多，我们要发展生产，减轻群众负担，藏粮于民。”

从马列学院毕业后，毛泽普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第一秘书处，担任警卫人员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经常找他谈心，指出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帮助他制定改进措施，使毛泽普的工作进步很快。

1944年冬，毛泽普得知王震将率三五九旅南下湘粤沦陷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消息后，向堂兄谈了自己的要求。毛泽东当即赞同他到更艰苦的地方去锻炼。11月上旬的一天，南下支队1万余人在延安飞机坪接受毛泽东、朱德的检阅。毛泽普告别了堂兄，随大部队一起离开延安。

毛泽普南下到湖南后，易名戈楷。解放后，他一直在湖南工作。

1958年，身为省计委副主任的戈楷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顺便去看毛泽东。毛泽东看到他后十分高兴，问他：“你搞计划工作几年了？”

“三四年了。”毛泽普答道。

“你给韶山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没有？”毛泽东又问。

“我们准备搞些水利建设，准备建一个武强溪电站。”毛泽普如实回答。

毛泽东对水利问题历来十分重视，他肯定了毛泽普的想法，指出：“水利大大小小都要搞，要长藤结瓜。”他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关系

到国计民生的问题。”随后，他又建议毛泽普去看看北京密云水库。

这次谈话结束时，毛泽东悄悄地表露出想要回家乡韶山看看的心愿，让毛泽普转告当时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希望在韶山建一处简便的房子，并一再叮嘱：“房子建一层，平房，不要太复杂，要简便一点，有个卫生设施就行。”同年冬，在韶山故居西南对面风景秀丽的松山上，便建起了一座小平房，取名韶山招待所一号房，现为韶山宾馆一号楼。1959年6月毛泽东回故乡时，便住在这里。

1967年，毛泽东在长沙接见湖南省委负责人黎原、华国锋等人，曾问到了戈楷的情况。黎原说：“戈楷在省科委任副主任。”他问及戈楷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主席的侄子还是弟弟？”毛泽东笑着说：“不是侄子，是堂弟。他原来叫毛泽普，比我小20多岁，但论辈分我们是同一辈的，他的父亲叫毛麓钟。过去我们韶山只有一个秀才，就是戈楷的父亲，这个秀才是我小时候的塾师。”言论之中，流露出对毛麓钟老人一家的亲情。

堂侄毛远耀

毛远耀，字卓夫，毛智珠（毛泽东堂兄，谱名毛泽先）的长子，毛泽东的堂侄，1912年10月18日生于韶山冲萃嘉塘。毛泽东的下一代亲属中有许多人受毛泽东的引导或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而毛远耀则是其中最早的一个。

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回韶山养病期间，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年纪不到13岁、正在家乡念小学的毛远耀热血沸腾，积极追随毛泽东，投身到广大农民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浪潮中。这年上半年，毛远耀由韶山早期的共产党员毛福轩介绍，加入了共青团。他非常崇拜堂叔毛泽东，想随毛泽东外出，学知识，长见识，将来也干一番事业。在他一再要求下，他的父亲毛智珠出面，请毛泽东带他出去读书或找点事做。毛泽东当时对堂兄说，远耀年纪太小，还是先留在家里。毛泽东虽然没有同意，但对这位年少志高的堂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6年下半年，毛远耀转学湘乡县读高小，继续参加农民运动，并担任湘乡共青团第十三支部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毛远耀辍学在家。这时，他同比他大4岁的湘乡人胡觉民结婚。婚后，他起初一边务农，一边随伯父毛宇居读古书，不久在本乡小学教书，算是安家立业了。但是，他的心仍不安分，仍向往革命，向往毛泽东开创的革命道路。1929年秋，毛泽民派人从上海送来一封给毛福生（毛远耀的祖父、毛泽民的堂伯父）和毛智珠的密信，说他在上海的工作需要

人，请堂伯父和堂兄同意让远耀出来，同行的还有毛新梅（即毛新枚）的儿子毛特夫。毛泽民指名要他们两人来上海，是因为毛远耀早就想出来，而毛特夫是烈士的后代，其父毛新梅已在 1927 年 7 月牺牲。得到这一消息，毛远耀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当即表示要到四叔（即毛泽民）那里去。毛智珠早就愿意儿子出去闯一闯，因此不成问题。只有他的祖父毛福生舍不得孙子离开，不同意。毛远耀外出的决心铁定，毫不犹豫。他把学校和家里的事向妻子胡觉民作了交代，即悄悄出门，同毛特夫一起来到上海。这时，他年仅 17 岁。

毛泽民夫妇在上海见到毛远耀和毛特夫后，为两人准备好冬装，即带他们一起乘船北上到天津，安排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秘密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不久，毛远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 年下半年，毛泽民夫妇赴上海，在那里创办党中央的秘密印刷厂。1931 年初，又把毛远耀调到该厂工作。党中央的印刷厂因保密要求极高，人手很少，而任务却非常繁重，毛远耀和大家一起拼命干，也很难及时完成全部工作。同年春末，毛泽民指示毛远耀回家乡再找几个可靠的人来，并且把胡觉民也接来。毛远耀很快完成任务，连同胡觉民，一共带出 3 人。

就在这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出了叛徒顾顺章，毛泽民夫妇紧急撤离，前往香港工作，以后又转移到中央根据地。毛远耀等人在极其危险、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隐蔽工作。1933 年，该厂被国民党察觉，毛远耀等人及时撤离、疏散。此后，毛远耀夫妇留在上海从事秘密活动，其间曾 3 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6 年秋，毛远耀夫妇返回韶山。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毛远耀再次同毛泽民取得了联系。经毛泽民安排，毛远耀将弟弟毛远翥和堂叔毛泽全、毛泽青一同带出，先后经南京、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于同年 10 月到达延安。这是除了毛泽东本家外，第一批从韶山来延安参加革命的毛泽东亲属。

毛泽民夫妇在延安接待了毛远耀一行。稍事休息，恢复疲劳后，于第二天带他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突然见到这么多韶山亲人，真是喜出望外。他详细询问了老家的情况，特别提到韶山第一届党支部的成员毛福轩、毛新梅、庞叔侃、钟志申等烈士，并问道：“庞叔侃是如何牺牲的？在哪里被杀的？”毛远耀回答：“1927 年 10 月，被杀害于湘潭十七总的柳林巷，是敌人用梭镖捅死的。”接着，毛泽东要求大家做好吃苦的准备，努力抗战。并按照他们的不同情况，当即安排毛远耀、毛泽全去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毛远翥、毛泽青到中央印刷厂当学徒，边工作边学习。就这样，几天以后，毛远耀开始了抗大的学习生活

毛远耀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抗大学习期间成绩突出，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秘书处工作，任干事，即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这是他多年以来的夙愿，能够直接受到三叔的教育帮助，使他感到非常荣幸。毛泽东关心他的成长，经常带他参加理论研究会和形势报告会。还派他和秘书处的同志到陕北农村搞调查，并亲自审阅修改他的调查报告。他努力工作，每次毛泽东作报告，他都认真作记录。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连续在延安抗日研究会作长篇演讲，毛远耀都参加了。每次记录稿，毛泽东都要修改，然后再由毛远耀等干事誊清。就这样，毛泽东在记录稿、誊写稿上不断修改，最后形成长达5万字的《论持久战》一文。对于毛远耀的工作，毛泽东是满意的。这年5月26日，毛泽东在给毛宇居的信中附言，“远耀等在此甚好”，即是对毛远耀工作和进步很快的高度评价。

过了半年多，八路军总政治部要办印刷所，了解到毛远耀是最合适的人选，便请示毛泽东能否调人。毛泽东同意，并鼓励毛远耀在新的岗位上作出更好的成绩。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毛远耀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很快就创办起总政印刷所，担任所长兼党支部书记。此后，他历任八路军总后勤部军事工业科科长、军事工业局第一兵工厂厂长等职。

1945年春，毛远耀随八路军第359旅南下，临行前毛泽东对他说：“你这次随军南下湖南，到那里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如果有机会回到韶山故乡，见到家乡父老，代我向他们问好。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们的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一定会成功的，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团结起来，大家都要有这个信心。”但是部队南下到河南，日本已宣布投降了。抗战胜利后，毛远耀被调到东北，历任旅大公安总局总务科长、处长、督察处长，大连公安局长、市委委员等职。

1949年春，毛远耀奉命从旅大率领一个干部大队进关，途经天津时，他利用休整的机会，同妻子胡觉民一起搭便车到北平香山看望毛泽东。久别重逢，毛泽东十分高兴，详细询问了他们延安一别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当毛远耀请示今后开展工作的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全国形势很好，整个南方都快要解放，你们随军南下，要去接收广大的新解放区。那些地方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有我们的同志，他们了解当地情况，他们与当地群众有联系。你们初到那些地方，情况不了解，一定要与地下党的同志取得联系，团结起来一同工作。那些地方还有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要和他们团结一道工作，取得他们的帮助。总之，要依靠当地的地下党同志，依靠当地的民主人士，依靠群众，才能做好我们的工作。要知道南方地区广大，我们派去接收的干部是很少的。只有依靠当地的干部和群众，才能做好我们的工作。”

1949年10月8日，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46军解放了湖南衡阳，毛远耀率干部大队立即开进接管，被任命为衡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10月15日，衡阳市人民政府成立，任市长。10月24日，中共衡阳市委员会成立，又担任了市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他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在当地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依靠各方面的力量，使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取得很大的成就。不久，他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以后，他的工作调动多次，曾任湖南省工业厅厅长、国务院轻工业部所属青岛橡胶二厂厂长兼中共青岛市委委员、化学工业部党组成员兼部办公厅主任、武汉测绘学院党委第一书记等职。1988年离休。

从1956年调到北京工作后，毛远耀到中南海探望毛泽东的机会多了。有时家乡来人，毛泽东便请他一家前来作陪。1956年12月5日，毛远耀携妻胡觉民、儿毛世美陪来北京参加全国公私合营工商代表大会的弟弟毛远翔一起看望毛泽东。他们在晚上8点多进中南海，9点钟毛泽东送走陈叔通后与他们会见，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3点。

这次见面，毛泽东兴致极高，滔滔不绝，谈话涉及公私合营、中国革命历史、国际形势、党群关系、经济建设以及哲学问题等，使毛远耀等人深受教益。

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韶山广场竖立起一尊毛泽东铜像。毛远耀赋诗赞道：

金身恺甲返韶山，箪食壶浆夹道欢。
车过井冈犹信步，途经老屋且留香。
台兀跃上千钧定，炯目雄视万叶帆。
冬喜杜鹃开遍野，同辉日月照人寰。

堂侄毛远翥

毛远翥，字任夫，号自财，毛智珠（毛泽东堂兄，谱名毛泽先）次子，1918年旧历十二月初五生于韶山冲萃嘉塘。

1937年10月随兄毛远耀来到延安，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到中央印刷厂工作。当时，毛泽东对他和毛泽青说：“你们两人去印刷厂，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将来还有专门学习的机会。”

毛远翥在印刷厂一连干了3年。期间，他多次去毛泽东住处探望。印刷

厂坐落在延河北岸的清凉山麓，毛泽东的住处起初在延河南岸的凤凰山麓，两处只隔着一条河，距离并不远。后来，因凤凰山麓遭日寇飞机轰炸，党中央驻地于 1938 年 11 月 20 日迁至北岸城西的杨家岭，毛远翥去探望就更方便了。毛远翥从老家千里跋涉来到延安，是想学习或参军，当印刷工人不是他的初衷。毛泽东理解年轻人的想法，在会面时开导他，为他讲解革命道理，使他懂得了革命的目的、革命思想同一切旧思想的根本界限。几十年之后，他仍不忘毛泽东说过的话：“共产党人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做官发财，而是为了替穷人闹翻身，求解放，为人民服务。”“如果要做官发财，就不要干革命，就不要到延安来！”

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毛远翥踏踏实实地做好组织上安排的每一项工作，对技术精益求精，很快就成了一名熟练工。以后被调到安塞八路军印刷所、八路军兵工厂工作。1944 年春进中央党校第五部学习。同年冬随八路军第 359 旅南下支队出征。

一晃，来延安已 7 年了。出发前一天，毛泽东特地在枣园住处为毛远翥饯行。吃饭时，毛泽东深有感情地问：“是不是想家了？”

毛远翥点点头。

“去吧，到家乡去看看父母，看看乡亲们，顺便也代我问问他们好。”毛泽东说。

其实，毛泽东何尝不想回家乡看看，他离开家乡已经 17 年了，只是为了革命，他一刻也脱不了身。此刻的一闪念，毛远翥似乎也体会到了毛泽东的心绪。

“一定去。”毛远翥迅速答应了毛泽东的嘱托。

“你们这次去南方，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南方大片地区还未解放，敌伪顽固势力还很猖獗，各种各样的困难都可能出现。因此，要充分依靠白区的党组织，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壮大我们的力量。”毛泽东提醒毛远翥对即将面临的困难要有清醒的认识。接下来，毛泽东又对他讲了一番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话：

“千万不要脱离群众。回去要像松树一样，经受风雨的考验，百折不挠；像柳树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生长。”

多么深刻的临别赠言！毛远翥感到，这一席话将使他终生受益。

第二天，即 1944 年 11 月 1 日，毛远翥怀着沉甸甸的“礼物”，告别延安，告别毛泽东，向南方开进。

堂侄毛远翔

毛远翔，字玄夫，是毛智珠（毛泽东堂兄，谱名毛泽先）的第三个儿子，毛泽东的堂侄，1924年6月生于韶山冲萃嘉塘。

追随共产党、毛泽东，依次参加革命，是毛远翔兄弟们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从小读书，在乡村算是知识分子。自从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闹革命，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9年，17岁的兄长毛远耀赴上海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19岁的二哥毛远翥跟着大哥奔赴延安。几年以后，毛远翔长大了，也参加了革命。等到老四毛远义长成青年，新中国刚成立，他也出来参加了革命工作。

1942年，16岁的毛远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家乡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从事地下斗争，曾任中共湘潭县银田区委书记、湘乡县凤音乡武工队政委等职。1949年8月，韶山获得解放。毛远翔曾代表毛泽东家乡的父老乡亲慰问人民解放军。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培养工作干部，党组织把他送进中国人民革命大学湖南分校学习。这时，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家乡的情况。不久，毛泽东就回信：

远翔贤侄：

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很高兴。

毛泽东

十一月十四日

信虽很短，但它表明同毛泽东已经取得了联系，家乡人得知后都兴高采烈。

“革大”学习，是一种短期培训班，毛远翔从那里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省交际处工作。当时，他想到北京工作，便写信给毛泽东，随信还寄去了父母的照片。1950年3月毛泽东访苏回到北京后不久，即给他复信。因不知他此时是否还在“革大”学习，信寄到毛远悌处转给他。

远翔贤侄：

两次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应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你的文字已通顺，用力学习，当

会有更大进益。

此复，即问

近佳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你父母相片收到，请你替我问候他们。

收到此信，毛远翔打消了去北京的念头，安下心来，边工作边学习。

1956年，毛远翔在长沙市协和裕织布厂任公方代表，参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11月，到北京参加全国公私合营代表会议。

12月5日晚，他和毛远耀一家一起去中南海探望毛泽东。

探望归来，毛远翔写了一篇追记。下面摘录几段：

在“颐年堂”大厅里，我们幸福地见到了日夜思念着的毛主席，……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并自我介绍说：我是远翔。

“啊！你是远翔，我看过你的照片和信，好好！”主席面带笑容地说。

主席谈到了家乡，东茅塘，萃嘉塘……这些地方，他老人家都还记得，甚至一条小山路都记得一清二楚。鼎臣、翼臣、福生、禄生……这些长辈也都没有遗忘，真是惊人的记忆。

他还记得我的父亲，因1951年他老人家接我父亲在北京住过一个时期，他说：你母亲是什么样子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后来接到你寄来的照片，才记起她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

主席又问我：你们去没去过乡下？那里情况到底如何？合作化要不要搞？猪和鸡是分散喂还是集中喂好？

深夜11时了，主席请我们吃饭。……席间，我孩子气地说：主席，你老人家说话，还是一口老韶山腔。他老人家非常幽默地说：我是个老顽固分子，保守党人。引得我们哈哈大笑，就像父母带着孩子一样乐开了心。

他老人家高兴地说：如今，城里搞了公私合营，资本家翻不起来了；农村里搞了土改，搞了合作化，地富也翻不起来了。这些做法的结果，就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使大家富裕起来。

主席在谈到经济建设时说：经济问题要全面分析。有人提出：我们是上马还是下马？我说：走路总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绝无两脚

一并前进 是有进有退的 但主要的是前进 波浪式的。上马多 ,下马少。……

主席在谈到哲学时说：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成绩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不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会使人骄傲。缺点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总结了教训，能使人进步；不好的一面是弄坏了事情。

主席说 缺乏帮助人的思想 是不正派的人 别人犯了错误 你去幸灾乐祸，是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的尾巴翘的太高了。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 ;整得过分 往往整到了自己头上。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犯错误的人，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敌视还是帮助？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标志。

最后，主席鼓励我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人在世上要多做点有益的事情，有益于社会和人民，要懂得，每个人天天都在写着自己的历史，这历史的好坏，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

这次谈话给毛远翔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一些论述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思想，成为他以后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指南。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远翔调任中共长沙市南区宣传部长。

在‘文革’中 他受到冲击。1996 年病逝。

堂侄毛远悌

在长沙市北区的一条小街里，居住着毛泽东堂侄毛远悌一家。当你走进房屋时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雪白的墙壁上 ,一个长方形的大镜框里 镶嵌着两封苍劲豪放、潇洒隽秀的书信手迹。这是毛泽东写给毛远悌的亲笔信。

毛远悌 是毛泽东的六代堂弟毛泽癸的儿子 生于 1924 年 8 月。其父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民协会，后在外失踪。毛远悌兄弟 3 人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 艰难度日。1940 年他到耒阳《力报》社印刷厂做工。1945 年该报社迁回长沙，他也随之来到长沙，仍在印刷厂工作。1946 年，毛远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积极从事地下工作 直到湖南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 毛远悌在湖南省总工会印刷厂担任经理 因小时候家境贫穷 不能读书 参加革命后 感到没有文化 工作很吃力 十分渴望有个读书的机会。1950 年初，毛远悌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工作、生活和学习情

况，以及家乡的变化，同时提出自己到北京读书的想法。

不久，毛远悌收到毛泽东的亲笔复信。信的全文这样写道：

远悌贤侄：

再次来信收到了，很高兴，你做印厂工作很好，应将此项工作做好，不要来北京。学习事将来有机会再说。远翔是否尚在革大学习，有信请转交。远翔略历我忘记了，务请告我。

此祝

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亲戚朋友纷纷找毛泽东介绍工作、联系学校，毛泽东都婉拒了，即使对毛远悌这样出身贫穷的农家子弟也不例外。这是因为共产党的干部与国民党的官僚不同，不能以权谋私，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更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毛远悌是党的基层干部，当他读了毛泽东的信后，立即领悟了毛泽东这样做的原因。此后，他安下心来，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利用业余时间补习文化，争取尽快提高知识水平，以适应工作需要。

来信中所说的“远翔”，即毛远悌的堂弟毛远翔，也是毛泽东的堂侄，当时正在中国人民革命大学湖南分校学习。毛远悌遵嘱将毛泽东给毛远翔的信转交给他，并复信向毛泽东介绍了他的简历。

1950年夏天，毛岸英到湖南看望外婆以及乡亲们，顺便到长沙看了毛远悌。毛泽东让岸英带口信给毛远悌，嘱咐他要好好学习，安心工作，好好为人民服务。

1951年，毛泽东的六婶由儿子毛泽连陪同自韶山到长沙治病，住在毛远悌家，毛远悌和毛泽连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想送老人到北京治病，并看望他。信中还谈到毛泽连家境困难的情况。12月11日，毛泽东复信毛泽连和毛远悌，建议他们不要来北京；按照精简节约的原则，六婶应在长沙治病，回韶山休养。信中还特地提到毛远悌的学习问题：“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学习途径和方法，它不仅仅是针对毛远悌的实际情况，也适用于许多在职干部，具有普遍意义。毛远悌牢记这句话，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坚持不懈，受益不浅。

五、外家亲属

文氏家族

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县唐家坵（又名棠佳阁），与韶山仅一山之隔，约 10 多里。1969 年，唐家坵划归韶山区管理。

毛泽东的外婆家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毛泽东的曾外祖父文作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苦农民，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劳动艰辛，刚过 27 岁就去世了。曾外祖母贺氏，含辛茹苦，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当时长子文绵芳才 10 岁，次子文绵薰刚 3 岁（毛泽东的外祖父），三子文绵姜才 10 个月。她受尽了各种苦难和折磨，终于把孩子带大成人，以后依靠孩子做长工、月工，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贺氏勤俭持家，节衣缩食，如从来不吃夜饭等，慢慢地家里略有节余，后来居然购些田土，并买下了唐家坵房屋一栋，到 19 世纪初，已发展到 20 多口人，拥有 140 亩田地的大家庭了。

毛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名绵薰，生于 1821 年，是一个毕生耕种，勤俭持家，品行端洁的农民。毛泽东的外祖母贺氏，生于 1826 年，一生孝敬淑慎，生育三子玉瑞、玉钦、玉材（早夭），三女（长女适钟，次女适王，三女适毛）。

毛泽东的大舅文玉瑞生于 1853 年。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七，故毛泽东称他为七舅父。毛泽东自幼拜他为干父，深得他的关怀和器重。他将毛泽东兄弟与他的子侄排行并列，其中毛泽东为二十三，毛泽民为二十四，毛泽覃为二十六。平时，文玉瑞经常与毛泽东食同桌，寝同床，对毛泽东要求严谨，视若亲生。

毛泽东的二舅父文玉钦，生于 1859 年，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故毛泽东称他八舅父。文玉钦性情温和，品行端庄，对毛泽东的成长极为关注，经常励其上进。1929 年 2 月 22 日，军阀许克祥部下一个班，来到唐家坵，将文玉钦捆绑押至株木塘，后关入颜家湾。经多方营救，保释脱险，此后遭疾，于同年 5 月 21 日去世，时年 70 岁。

毛泽东的母亲在同辈姐妹中排行第七，家里人都叫她“七妹”。因毛泽

东的曾外祖父逝世后埋葬在韶山冲龙眼塘（今韶山学校下面），要扫墓、拜坟，因此文家想在当地结一门亲戚作为落脚点，便把七妹嫁到这里。文七妹定亲时只有 13 岁，正式结婚时是 18 岁。

七妹生毛泽东之前，生了两个男孩，都没有长大就夭折了。生了毛泽东两个月之后，就把他带回了娘家。外祖母和母亲把毛泽东看得特别贵重，硬要放在自己身边抚养。湘乡这带地方有种迷信风俗，要把命根子带大成人，往往用家畜取小名，因为家畜贱，越贱就越容易养。于是有的叫狗仔子，有的叫猪妹子。外祖母不喜欢这类小名，她看中了本地冲里山脚下那块平地拔起的大石头。这石头高一两丈，底下有一股清泉，不管怎么干旱，终年流水不断。传说这地方出过妖怪，经常兴风作浪。有人为民除害，把妖怪镇压到石头下去了。从此，人们便把这石头当作大神朝拜。外祖母和母亲把毛泽东带到石头前，烧香叩头，拜石头为“干娘”，又因毛泽东排行第三，便取乳名叫“石三伢子”。

毛泽东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经常到唐家坳来，帮助舅父喂猪、放牛、担水、种菜，样样都做，又很内行。

毛泽东的两个舅舅对他少年时代的生活给予很多照顾。特别是在毛泽东上学问题上，他们不仅出面说服毛顺生同意他的求学要求，而且经常接济他学费，把他接到湘乡的东山学堂里读书。

毛泽东在外婆家共有 5 位表兄，其中文润泉、文梅清为七舅父所生，文泮香、文运昌、文南松为八舅父所生。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读书期间，常去外婆家度假日。每次去外婆家，他总要用节省下来的伙食钱，买点时新食品送给诸表兄。平时，他与文泮香、文润泉、文运昌、文梅清、文南松诸表兄关系融洽，情同手足，经常同桌共餐，同床共寝，在一起劳动放牛，也在一起读书识字，共同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

离开东山小学堂到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后，毛泽东去外婆家的次数少了，但是他对外婆家的山山水水仍十分眷恋，经常写信给舅父舅母，向他们问候请安。

1918 年 8 月，毛泽东送新民学会同学旅欧勤工俭学，由长沙赴北京前，写信向舅舅告别。并对自己的母亲久居舅舅家，承蒙照料疾病，表示晚辈的感激之情。

1920 年 9 月 5 日，毛泽东的七舅病逝。毛泽东专程回乡送终。

1922 年 11 月，毛泽东在长沙主持中共湘区委员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沙分部的工作，十分繁忙。恰好有朋友回乡，他又特地致书其八舅父文玉钦及舅母文赵氏，请安道好。信中写道：

舅父母大人尊前：

久不通信，疏忽得很！二位大人谅都安好，合宅谅都安吉！甥在省身体尚好，惟学问无进，甚是抱愧！刘先生回乡之便，托带片纸，借当问候。有便望二位大人临赐教诲为禱！敬颂
德安！

甥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一日

1925年，毛泽东回故乡养病，同时创建韶山党支部。这期间他曾多次到唐家坨拜望其舅父舅母。

1927年元月的一天，毛泽东到韶山开完了农会会议，当天下午又到湘乡团田瓦子坪组织农会，开调查会，当晚到唐家坨舅父家安歇。当时敌情复杂，处境危险，毛泽东不顾这些，把表兄表弟、表嫂表侄都叫到一起，讲建农会的好处，他说：“惟有合群奋斗，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才有出路。”此后，他一直未能重回唐家坨。

毛泽东十分眷恋着唐家坨的山和水，更惦念着外婆家的亲人。1937年11月，他在给表兄文运昌的信中，对其八舅父、舅母的逝世，“至深痛惜”。他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信中表达了对外婆家及家乡人民的无限眷恋和热爱，体现了他为解放全中国人民奋斗不息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身为国家主席，日理万机，十分繁忙。但对湘乡外婆家的亲人，仍然念念不忘。50年代初，他曾10多次给文家诸位亲友写信，对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向他们了解乡间生活情形，鼓励他们在家乡安心工作，做出成绩。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多次请文家各位亲友上北京叙旧，与他们亲切交谈，合影留念，安排他们游览首都的风光名胜。返乡时，又向他们赠送一些礼物和钱。毛泽东曾饱含深情地对人们说：“他们（指文家诸亲友）过去因我受过连累，吃过很多苦，现在解放了，要让他们过过好日子，享受享受一下。”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享受”实际上指的是让外婆家的亲友能和新中国人民一样，过上幸福的日子。

建国初期，毛泽东还派自己的长子毛岸英回家乡看望父老乡亲。毛岸英受父亲之托，专程来到唐家坨，看望外祖家的亲人，并捎来了父亲对他们的

亲切问候。

毛泽东对文家的亲友给以多方面的关怀和爱护，而且也经常给他们以教育和帮助，让他们在家乡勤耕守法，不谋私利，不搞特殊。

1950年初，毛泽东的几位表兄又给他写信，反映乡下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等情况，毛泽东不知他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便给当时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写了一封信，让他派人下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之。毛泽东的信中这样说：

亚南同志：

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坪坳文氏兄弟四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此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正是在毛泽东这样细心的关怀和耐心的教育下，文家的亲友们长期以来，在乡下都能做到勤耕守法，努力向上。他们中有许多人因为工作出色，还被当地政府推荐、录取为国家工作人员。一些没有出去工作的人，也都遵照毛泽东的嘱咐，在家乡自力更生，不向政府提出要求，为乡亲们做出了好的榜样。

表兄文泮香

文泮香是毛泽东八舅父的长子，在五个表兄弟中，他的年龄最大。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十，因此毛泽东通常称他为“十哥”。

文泮香生于1880年，毕生在家务农，忠诚老实，勤劳俭朴。1927年，他曾参加过农民运动。1949年逝世，享年69岁。

由于文泮香在几个表兄中年龄最大，小时候生活上对毛泽东照顾也较多，因此毛泽东对这位大表兄十分尊敬和怀念。由于长时间音讯不通，建国

初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位表兄已经过世，曾多次搭信向他表示问候。其中1950年5月7日，他在给表兄文润泉的信中问道：“唐家圪现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还健在否，便时请你告我。”同月12日，他在给表兄文南松的信中又问道：“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对文泮香的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后来文泮香的家人给毛泽东写信，告知文泮香建国前夕去世的消息，毛泽东知道后十分惋惜，便给表嫂黄氏及其子女寄去衣物和人民币若干，以示慰问。

1957年2月，毛泽东还邀请文泮香的妻子黄氏领着儿媳刘媛英、女婿王先槐和孙子文泽湘赴京叙旧，让人陪伴他们游览了首都的名胜风光。毛泽东接见他们时，还一起合影留念。

文泮香的长子文赐生，生于1904年10月，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农民运动，后在长沙衡粹女校、长郡中学当工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曾送表妹毛远志、章森洪等去延安参加革命，当时，毛泽东曾从延安亲自给他写过一封信。1948年，文赐生因病逝世，年仅44岁。

文泮香的次子文九明，生于1913年7月，大革命时期也曾参加过农会活动，当过儿童团长，解放后参加过地方工作，担任过农业初级社社长。

文九明是一个性格开朗，又极富幽默感的耕田人。1951年来京看望毛泽东时，他反映了乡间许多情况，使毛泽东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觉得这位表侄对基层情况很熟悉，就和他相约，请他以后常来，把乡间情况告诉他。毛泽东想起乡下人走亲戚要想方设法送点礼物，怕他为此发愁，就和他开玩笑，说：“你来时不要送礼。若是怕不好意思进我这张门，你带一包火焙鱼就足够了！”

过了一年，文九明来信说，他有情况要报告，毛泽东当即回信说：

文九明同志：

十月二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嵘，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门前，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委统战部则不找，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

能于十一月上旬到京为好。

1953年11月，文九明与堂叔文东仙、毛泽嵘以及韶山革命老人毛月松一起来到北京，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在北京，文九明再次向表叔毛泽东反映了乡间的许多情况。他心情激动地说：“土改结束了，区里，乡里，干部们没有好多事做了，说要发展生产，这样，从县到区，由区到乡，再到村，发下来许多表格。表格内容无所不包。比如，种了多少菜，萝卜多少，白菜多少。养了多少猪，肥猪多少，架子猪多少。积了多少肥，土肥多少，人粪畜粪多少，到来年春插还能积多少……区干部催乡干部，乡干部催村干部，村干部捧着表格，一户一户追着填。我说，这么多表格要填，我每天就守着尿桶茅厕所，还有猪屁股牛屁股，什么也别想干啦！这话传到区干部的耳朵里，他们就找上门来批评我，说我讲怪话，是骄傲自大！”

听了表侄文九明的反映情况，毛泽东的情绪也有些激动起来。早在年初，他就不断听到类似的反映。他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于3月19日专门为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解决“五多”问题。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在文件中，毛泽东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之服务的。凡是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这份党内指示，当日即用电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可是，过去整整半年之后，乡间的情况仍然没有改观，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生气。他对文九明说：

“不是你骄傲，是他们骄傲，连中央的指示都不听，不是骄傲是什么！”

说完，他又叫来秘书，说：“你要中央办公厅查一下，在对待中央文件上，看哪些人当了耳边风！”

文九明告辞离京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次你给我送来两份厚礼。一是唐家坵的火焙鱼很香，我感谢你。二是你那条好意见，更是金不换。这样的意见我如今难得听到，你要常来！”

此后，文九明几次去北京，还经常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基层的情况，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使毛泽东能及时听到群众的呼声。

表兄文润泉

文润泉是毛泽东的七舅父文玉瑞的长子，生于1881年9月26日。因毛泽东拜文润泉的父亲为干父，因此文润泉既是毛泽东的表兄，又是毛泽东的干兄，两人关系自小就十分密切。文润泉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十一，毛泽东

常称他为“十一哥”。

文润泉幼时家贫，未读过几年书，长期在家务农。1927年初，毛泽东到湘乡考察农民运动时，文润泉深受教育，曾参加过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继续在家务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是远近闻名的种田能手。

建国初期，文润泉给毛泽东写信，请他为自己的好友文凯介绍工作。毛泽东在1950年5月7日的回信中说：

润泉表兄大鉴：

一月十六日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唐家坨现尚在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还健在否，便时请你告我。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白蚌口，不知他接到否？南松兄第二次来信已收到，感谢他的好意。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50年代初，文润泉曾多次到北京看望毛泽东，游览了首都的风光名胜。每次去，毛泽东都热情接待，并合影留念。但文润泉上北京的要求也有被谢绝的时候，1953年就有过一次。这次文润泉给毛泽东写信，再次表明想去北京一游，顺便请毛泽东介绍他的一位姓赵的亲戚到北京上学。9月8日，毛泽东回信拒绝了他的要求。信中说：

润泉兄：

惠书收到。

承告乡情甚谢。

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办法。

此复，顺祝

康吉，并祝各戚友安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文润泉每次到北京，都是毛泽东从稿费中支付他的路费，未花国家一分钱。有一次，文润泉看到毛泽东给许多来京的亲友添置衣服，并提出想要添

置一件长袍，毛泽东听后便把自己的一件旧长袍送给了他。

文润泉每次到北京，都要向毛泽东反映乡间生产、生活情形，这是毛泽东欢迎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大跃进”期间，许多地方不恰当地宣传密植，他的家乡也刮起了这股风。文润泉认为这样做不合适，便于1959年初来北京，向毛泽东反映这一情况。

见到毛泽东后，他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毛泽东问他什么问题，他便直率地说：“我认为，政府的政策不行，种田不能搞密植，要合理密植。我做了一辈子的田了，还没有看到如今这么个‘密法’。政府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我说，人虽然老了，但还可以看水。这么密植会减产的。我要在北京住下来，等政府改变了态度，等我的孙子写信来，我才回去。”

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一直忙于纠“左”，无条件的密植也在纠正之列。毛泽东知道表兄有种田的经验，对他的话当然很重视，当即表示要注意这个问题，并劝表兄熄熄火，在北京住几天再回去。文润泉听毛泽东重视他的意见，便心平气和地回到家乡，继续种田。

不久，毛泽东向全国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关于密植问题。毛泽东说：

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竟说越密越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怀疑。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达这种死命令！……

在信中，毛泽东又说：

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此外，毛泽东还讲了包产问题、食堂问题……文润泉在北京讲的许多事，几乎都包括进去了。文润泉很激动。以毛泽东的位置，还能这么认真地

听取他的意见，自己在乡间所受的一些委屈也就不再往心里去了。

1961年，全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正在进一步采取措施，纠正前一时期的“左”倾错误。这年的7月6日，文润泉又和毛泽覃的前妻赵先桂的继子赵迎一起来到北京，向毛泽东反映家乡的情况。

毛泽东当时正密切关注着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见他们俩来得正是时候，便表示热情的欢迎，向他们了解农村的各种情况，文润泉、赵迎二人一一作了汇报。

毛泽东诚恳地说：“现在农民生活很苦，苏联又天天逼债，国家暂时有困难，过几年会好一点的。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患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到你们公社（指当时的湘乡沙田公社）了解一下。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

这次会见之中，二人还向毛泽东反映了农村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说：“我对农村教育工作确实考虑得少了一点。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教训不能忘。要在农村普及文化。现在办学有困难，可以发动群众办，分散办，办农校、夜校。我在韶山办过夜校，把夜校办好，群众晚上上学。等条件好了，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点好事才行。”

1962年，文润泉已80有余，第七次到北京看望毛泽东，再次受到表弟的热情接待。此后因年事已高，未能再出远门。1967年1月29日，他在家乡逝世，享年86岁，可谓寿终正寝。

文润泉曾于1901年3月生有一子，取名文端人。此子先在湖南高等工业学校肄业，后毕业于湖南全省地方自治训练所测量专科学校。1932年7月不幸病逝，年仅31岁。

表兄文运昌

文运昌是毛泽东的八舅父文玉钦的次子，生于1884年，长毛泽东9岁。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十六，毛泽东称他为“十六哥”。

毛泽东早年寄住在外婆家的时候，与“十六哥”很是相投，感情深厚。毛泽东辍学在家务农的时候，文运昌正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他向表弟介绍了这所“非常新式的学堂”的情况，极力劝说毛泽东去那里读书。毛泽东听了表兄的介绍，心里便跃跃欲试，可惜父亲毛顺生不同意。文运昌便又运动父亲、伯父以及姨表兄弟王季范等人去说服自己的姑父，终于使固执的毛顺生点头同意让儿子继续求学。文运昌高高兴兴地领着表弟来到自己的

学校，为他办好人校注册手续，并做他的入学担保人。文运昌的妻子还将毛泽东从家里带去的一顶青色蚊帐换成白色蚊帐，生活上也对他极为照顾。

毛泽东后来回顾他的这次入学经历时说：“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招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了 1400 个铜元，作为 5 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 50 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 16 岁。”

由于毛泽东当时的家境还不是十分富裕，因此在学校里，他的衣着仍然是比较破旧的，加上他说话是外地口音，因此个别老师及一些同学经常取笑他，事事与他为难。幸亏校长李元甫、国文教师谭咏春、贺岚岗等人对他十分器重，才使他在学校站稳了脚跟。加上表兄文运昌以及他新结识的同学萧三兄弟的各方面照顾，使他逐渐地适应了新学校的生活。

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的求知欲十分强烈，他广泛涉猎各种新式书籍和报刊。文运昌很为表弟的这种求学精神所感动，便想尽办法寻找新书报，推荐给表弟学习。在他推荐的书刊中，有两种是毛泽东最爱读的，其中一种是清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种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这两种书刊，极大地拓宽了少年毛泽东的视野，对他的思想转变和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文运昌推荐的进步书刊，毛泽东大都爱不释手，反复诵读。由于读的时间长、遍数多，有的书籍不慎有了破损，他只好写信向表兄表示道歉。1915 年 2 月 24 日，他给文运昌写了这样一张便条：

咏昌先生：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页〕。抱歉之至 尚希原谅。

又“国文教科”二本、信一封。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毛泽东 1936 年在陕北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他的这段读书生活时说：“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至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1911年春，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读书半年后，被学校推荐到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此后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在长沙求学和参加革命活动，而文运昌已毕业于湘乡县立师范学校，在乡下务农，两人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在一个学校里同进同出，但逢年过节，总能相聚，书信往还，也是常有的事。

大革命时期，文运昌在表弟毛泽东的影响和教育下，在湘乡县凤音乡开展过农民运动，并担任了秘书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出走广东。两年后返回乡里，勤耕度日。1930年，他随姨表兄弟王季范到长沙，在衡粹女子学校任职，后到长郡中学任庶务。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文运昌多方设法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他便介绍莫立本等进步青年去延安，并捎信介绍了家中的详细情况。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给他回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运昌吾兄：

莫立本到，接获手书，本日又接十一月十六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毛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坨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

谨祝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七日

本来，1927年后，毛泽东就与家乡中断了通信联系，那是因为环境不允许，他本人又行踪不定之故。1937年终于有了通信的机会，他就立即和文运昌联系。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真挚！

而文运昌对于毛泽东，除了表兄弟和同学的关系外，还多了一份敬重。1921年毛泽东毁家兴邦，把家里东西送人了。文运昌什么东西都没拿，唯独毛泽东读过的书籍、作文本，以及毛泽东本人写的祭母文……这些当时看起来并不十分重要的东西，他全都拿回家去了，并且一一整理好。后来毛泽东投身革命，风声闹得很大，文运昌又冒着风险，把这些文稿、书籍，全都转移隐藏起来。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多次用刑审讯，他也没有为图一时的苟且，把这些东西交出去。解放后，这可就是珍贵的革命文物了，他全部上交给国家。就连1915年毛泽东写给他的那张还书的短柬，也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后来悬挂在韶山陈列馆里。

这个短笺，写在一张薄薄的白纸上，毛笔行草。这可能是毛泽东留下来的最早的墨迹。而文运昌保存下来的毛泽东三兄弟与母亲的合影，则是他们兄弟与母亲留下的惟一的照片。人们从这些手迹、照片中，可以揣摩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生活历程。文运昌不仅对表弟毛泽东富有深情，同时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财富。

1938年，日军进犯湖南。文运昌携儿、媳逃离长沙，流落滨湖，在华容佃耕度日。直至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他才返回原籍。

建国之初，文运昌曾连续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家中的生活情况和家乡的各种问题。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给他回信说：

运昌仁兄如晤：

接到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予纠正。如有所见，

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顺颂安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信寄走后，毛泽东担心他收不到。5月7日致信表兄文润泉：“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白蚌口，不知他接到否？”5月12日致表兄文南松信中又询问：“运昌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直到文运昌复信给他，才放下心来。

以后，毛泽东邀请文运昌去北京见面，兄弟俩叙谈儿时趣事，别后遭遇，互诉重逢的喜悦。文运昌在北京住了数月，尽兴而归。

尽管毛泽东与文运昌的感情是如此深厚，但是他对文运昌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

有一次，文运昌开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外祖母家的亲属。文运昌将这个名单寄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要求转请毛泽东为这些人安排工作，或者保送上学。毛泽东看过之后，在名单上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建国初期，文运昌因刚从华容返回湘乡不久，尚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在他的内心里，是很希望有一个工作岗位来把自己过去学得的知识奉献给新中国的。他的胞弟文南松了解了他的这一心愿后，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请毛泽东来给文运昌推荐一份工作。毛泽东后来回信拒绝了这一要求。信是这样写的：

南松表兄：

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他有信来，我已回了一信，不知他收到否？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

此复，即问

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文运昌按毛泽东的意思，在家乡安心工作，很快便做出成绩，当选为湘

乡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1年1月，他担任了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3年起改任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文运昌担任县人大代表后，继续保持与毛泽东的通信联系，随时向他反映乡间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他曾先后6次到北京与毛泽东会晤，每次都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1961年逝世，享年76岁。

文运昌生有二子，长子文砥澜生于1911年3月，长期在家务农。1979年10月曾赴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1982年12月病故，终年72岁。次子文凤良，生于1922年7月，解放前曾在韶山等地任小学教师。194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湘中纠察队，任第二大队六中队政治指导员。1949年10月，湘中纠察队被改编时，文凤良转到地方工作，参加了土地改革和组织农会等工作。1951年9月入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后分到中南矿冶学院工作。曾两次赴京看望毛泽东，并合影留念。1962年调到湘乡县人民医院工作，1978年任湘乡县图书馆馆长。现已离休，身体尚健。

表兄文梅清

文梅清是毛泽东的七舅父文玉瑞的次子，生于1887年1月22日，既是毛泽东的表兄，又是毛泽东的干兄，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十七，因此毛泽东常称他“十七哥”。

文梅清读书不多，自幼在家务农，老实敦厚。大革命时期曾在家乡参加过农民运动。

毛泽东对“十七哥”十分关心，多次搭信向他问候，并邀请赴北京叙旧。1951年9月，文梅清和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少年时的朋友张有成一起前往北京。他们于9月18日从韶山招待所出发，先到长沙，由湖南省委统战部派人护送，于9月23日到达北京，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毛泽东在家中设宴款待表兄一行，并把自己的儿女叫出来与他们一一相见。席间宾主频频举杯，盛意空前。

文梅清一行在北京安住了一段时间，畅游了首都名胜。在中南海含和堂前，毛泽东还特地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3人离京时，毛泽东又送给他们皮箱和一些衣服、鞋帽之类的礼物，使他们满载而归。

文梅清这次上北京，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家乡的情况，也汇报了一些文家亲友的生活情形。毛泽东对这些情况都很重视。他后来在给表侄文炳璋的信中，还谈到了这一情况。信中说：

炳璋同志：

七月五日来信收到，谢谢你。乡里来说，你家生活情况有一些改善。你可安心在军队工作。此复。

顺祝

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

信中所说的“乡里来人”就是指文梅清他们3人。

此后，文梅清又曾5次上北京看望毛泽东，每次都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其中1956年，他与胞兄文润泉、堂兄文运昌及堂侄文凤良一起去北京时，前后共住了一月有余，中间两次进入中南海，与毛泽东会面并合影留念。1957年，他的长女文凯元进京，也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1961年，文梅清病逝于家乡唐家坵，享年73岁。

文梅清还生有一子，名叫文端灵，可惜生卒年月及生平均不甚详。

表兄文南松

文南松是毛泽东的八舅父文玉钦的三子，是文泮香、文运昌的胞弟。生于1890年10月10日，长毛泽东3岁。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二十，因此毛泽东常称他“廿哥”。

文南松早年读书不多，长期在家务农。1925年至1927年，在湘乡参加过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家乡坚持斗争，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毛泽东及其父母兄弟的照片。这些照片后来放大后挂在毛泽东的故居——上屋场。1959年6月。毛泽东回故乡时，看到双亲卧室挂着父母二人的大照片，感到十分亲切，便指着母亲的照片问道：“这个照片怎么还保存下来了？”旁边知情的人赶紧回答：“是唐家坵保存的。”

毛泽东听后十分感慨，他回忆说：“这是1919年春母亲到长沙养病住在蔡和森家里照的。当时我母亲患的是淋巴结核，这样的病并不难治，只是那时医术不发达，经济也有困难，才没有治好。”

一张照片引出毛泽东这么多的感叹，恐怕连当初保存照片的文南松也没有想到吧！

湖南和平解放前夕，文南松心里十分激动。他一方面积极迎接解放，一方面又鼓励次子文炳璋参加党的地下武装——湘中纠察队。

建国初期，文南松曾给毛泽东写信，希望他为胞兄文运昌介绍一份工作，毛泽东于 1950 年 5 月 12 日给他亲笔回信，委婉地回绝了他的要求。信中提到：“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还要求他下次来信，详细告之“乡里缺粮”以及政府是否采取了解决办法等情况。

文南松由于身体不好，体弱多病，于 1952 年 2 月在家乡病逝，时年 61 岁。他去世后，其妻刘氏曾受毛泽东的邀请，于 1953 年前去北京，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并合影留念。刘氏一行在北京各处游览，饱览了首都风光。离京前，毛泽东还向她们赠送了礼品。

文南松一生生有二子。长子文孝根，生于 1911 年 2 月，一辈子在家务农，是个老实巴交、不善张扬的农民。其妻毛枚秀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祖毛德青的女儿。1959 年 6 月毛泽东回韶山时，曾邀请毛枚秀到松山寓所赴宴并合影留念。席间，毛泽东问她的父亲是谁，她说是毛德青，毛泽东马上接着说：“你是德青大阿公的女儿，那我要叫你姑姆啰！”毛枚秀连忙说：“不敢，不敢！”她说她现在是唐家坵“文二十阿公”的大媳妇。毛泽东一听，又笑了，说：“那你要叫我表叔啰”；“那么我们都不称呼了，平了平了好吗？”这段故事，当时在韶山广为传诵。

文南松的次子名叫文炳璋，生于 1919 年 12 月 25 日。1949 年 6 月参加党的地下武装——湘中纠察队，收编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 年转业，担任湘乡县石城乡武装部长。

解放初期，毛泽东外婆家的许多亲戚朋友经常到北京看望毛泽东，其中个别人回到家乡，便不大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为此，文炳璋于 1954 年初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这些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提起注意。毛泽东对他的这封来信十分重视，不久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了一封信，指出：“我的亲戚唐家坵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毛泽东强调：“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在这封信的最后，毛泽东还把文炳璋的来信附寄给石城乡党支部及乡政府，他说：“现有文炳璋同志的一封信，

附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封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圪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 并会进步的。”

文炳璋转业到石城乡武装部工作以后，经常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当地的生产情况和文家各亲友的生活情况。他在 1955 年 2 月 15 日的来信中，还表达了去北京看望毛泽东的愿望。这年 5 月 1 日，毛泽东写信答应了他的要求。信中说：

炳璋同志：

二月十五日的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泽嵘（逊五）、毛仙梅二人，和他们一道来京一行，即持信为证。其他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文梅清、文东仙二同志，他们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来的，除泽嵘、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问你母亲及各位朋友的好！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一个月后，文炳璋与毛泽嵘、毛仙梅应邀来到北京，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文炳璋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农村的生产以及当时农民、教师、转业军人等的生活情况，受到毛泽东的热情赞扬。

六、姑 姨 表 亲

表兄弟贺晓秋

贺晓秋是毛泽东的二姑姑的儿子，与毛泽东是嫡亲表兄弟。

贺晓秋小的时候经常住在韶山外婆家，自小与毛泽东一起长大，并一同在一所私塾里读过书，二人同练一种字体，同在一起玩乐，十分相得。后来他们便相约一起去长沙读书，可惜贺晓秋的母亲也就是毛泽东的二姑不同意，她说现在的形势是三天风四天雨，不能把文章放进锅里煮了当饭吃。这样毛泽东便只好一个人去了长沙。

后来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贺晓秋给予了积极的支持。由于反动派到处追捕毛泽东，时局十分紧张，贺晓秋便与文润泉二人化装成轿夫，冒着生命危险把毛泽东送出了韶山。后来，反动派又开始追捕贺晓秋，他只得背井离乡，逃到了洞庭湖区。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带着女儿毛远志和养子毛华初逃到南县丁字堤，找到了在这里隐居的贺晓秋，贺晓秋设法安置了她们母子 3 人，使之得以逃脱了反动派的迫害。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又一次遇险。贺晓秋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表哥脱险，并拿出身边仅有的几块现洋给毛泽东作路费。从此，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新中国成立后，贺晓秋很快跟毛泽东建立了联系。他写信给毛泽东，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反映了自己在华容乡下的情况。信中说，乡下分了田，生活有了保障，农民大多可以凭本事自食其力，但有些工作还要完善，有些缺点要迅速改正，要顺乎民意，体察民情，要给农民以看得见的权益等。毛泽东回信说：

晓秋贤弟如见：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接到晓明一信，我分不清谁是兄，谁是弟，请你来信说明。

此问安好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晓明，即贺晓明，与贺晓秋同为毛泽东的姑母所生，与毛泽东均是表兄弟关系。

贺晓秋虽是毛泽东的嫡亲表弟，解放前又数次帮助毛泽东脱险，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建国后一直在家乡耕读为生。1960年10月8日在岳阳大儿子贺林生家中去世。

表侄贺凤生

贺凤生是毛泽东的表侄，是贺晓秋的二儿子。

1960年，全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由于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各地浮夸风、共产风都很厉害，湖南的情况也不例外。当时，贺凤生正在乡下担任生产队长，对此意见很大，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并要求到北京直接见毛泽东。毛泽东对他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便派人把他接到了北京。

贺凤生到北京时是1960年的11月份，当时毛泽东刚从杭州回京不久，便在中南海家中接见了贺凤生。

见面之后，毛泽东微笑着说：“我昨天才从杭州回来，听秘书说有这么一位亲戚要见我，我就告诉办公厅，请你今晚来谈谈。接来的客人嘛，岂有不见之理，何况你贺凤生还有50根头发跟我姓毛呢，你也是毛家的根蒂哟。”毛泽东风趣地说完，爽朗地笑了。

“今天请你来，主要想听听你们那里的情况，听听你家里的情况，好的坏的都可以告诉我。1927年与你的父亲贺晓秋分手后就一直没有见到他了。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提供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情况和意见，非常感谢你的父亲锋芒不减当年。”毛泽东微笑着问贺凤生：“你父亲还健在吗，我还欠了他的光洋呢。”

贺凤生告诉毛泽东，他父亲今年10月8日在岳阳贺林生哥哥家里去世了，那时贺凤生还在长沙治病。

“应该给我拍个电报嘛，起码我可以发个唁电或送个花圈”，毛泽东责怪贺凤生说：“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没有他们这些人舍身相救，我毛泽东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回首往昔，毛泽东感慨万千，他站起来说：“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万万个贺晓秋这样的好同志，巩固革命成果则要靠你贺凤生这一代和下代的共同努力。”

“寄给你治病的钱收到了吗？”毛泽东接着又问。

1960年下半年，贺凤生曾有一段时间在长沙治病，用了不少钱，经济上十分困难。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曾两次给他寄钱。

“收到了。一次300元，一次100元。那些钱是您私人的还是公家的？”贺凤生一边回答，还一边提问。

“当然是我自己的喽！”毛泽东说：“我不需要更多的钱，有工资有稿费，又不需要存钱。更何况你们有困难应该帮助，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

“今天只我们俩人谈心，你不是说要向我反映下面的情况吗，给你一小时，不！两小时可以吧？”毛泽东说完，向警卫人员作了个手势，警卫人员退了下去，会客厅里只剩下毛泽东和贺凤生了。

贺凤生也不客气，他一边喝着茶水，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农村的实际情况，从公共食堂吃不饱饭讲到农村灾荒饿死人，从农民砸锅卖铁讲到各种小农具乃至生活用品都要缴公，从下面各级层层虚报浮夸讲到许多干部的恶劣作风。他越说火气越大，便向毛泽东移近一步问道：“您不是说党和人民是血肉关系吧？现在皮是皮，肉是肉，是中央要咯么搞？还是下面一些干部在腰河里发水？”

毛泽东说道：“不是腰河里发水。当时估计形势高了一点，责任在中央。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只有一年多时间全国就化开了，步子快了。有些真正具备了条件，有些只是为了跟形势，还有些没有具备条件是一阵风刮起来的。下面有些情况，中央也不一定都清楚。”

“三面红旗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有些问题虽然出在下面，中央确有责任，真是愧对人民，愧对为革命工作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人民。”毛泽东说到这里，沉默了好一阵，他语气沉重地告诉贺凤生：“中央正准备近期开个三级干部会，大约七千人，华容县领导也要来，请他们来，要好好讲讲这个问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刹一刹这股风。”

“还有一个问题要向主席汇报。”贺凤生想了想，不知该不该说。他犹豫了一下，说：“我们那里不少地方现在把人家的祖坟都挖掉了，说是为大跃进改造吨粮田，也不事先出个安民告示，有些坟挖出来了没人管，尸骨乱丢，不讲人道。我娘的坟就被人给挖开了，到现在也找不到尸骨。”

毛泽东听到这里，十分气愤，他站起来，大声地说：“共产党也讲人道嘛！也是爹娘养的嘛！国民党挖我的祖坟我也气愤呢！这个问题要处理好。”

谈话进行到最后，毛泽东感慨地说，“我给你两个权利：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有什么情况也要随时告诉我。真的，社会上像你贺凤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毛泽东接着说道：“中央领导下去，下面尽讲好听的，带着你看好看的，很难得到真实情况。他们怕说拐了场掉乌纱帽。农村有句俗话，叫‘三十吃年饭，尽赶好的搬’。不像你贺凤生无所求也就无所虑。要提倡各级干部都讲真话。”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留贺凤生在家里跟他一起吃晚饭。菜端上来了，贺凤生一看，是普通的四菜一汤，最好的菜是一份鸡块。厨师告诉他，这还是主席特意吩咐为你加的呢。

吃过晚饭，在北京化工实验厂工作的文炳璋来了，他是毛泽东的表侄，是毛泽东通知他来接贺凤生的。

临走前，毛泽东送了贺凤生一盒大中华香烟，一块上海牌手表，一条上海产羊毛围巾，一顶东北狐皮帽子，一支大号金星钢笔，一个带有毛泽东、朱德头像的笔记本，此外还有 25 斤粮票和 50 元人民币。

最后，毛泽东拉着贺凤生的手说：“我送你出新华门。”

“嚟。”闪光灯亮了，眼明手快的记者抢拍下了这难忘的镜头，一个党中央主席和一位普普通通农民在一起的珍贵历史镜头。

1966 年，贺凤生已担任了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这年 10 月 7 日，他再次去北京，毛泽东又接见了。贺凤生气鼓鼓地，头一句话就问：“主席，听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您亲自点燃的？”

“怎么啦？”毛泽东惊奇地问。

“下面又在骂娘呢。过去是土豪劣绅戴高帽子，如今我这个叫化子出身的贫雇农也搞了顶高帽子戴到脑壳上了。”

贺凤生一口气说完，端起茶杯，一仰脖喝了个精光。

“你贺凤生还是那样可爱。”毛泽东笑了，说道。

“如今硬是乱了套，县委书记看芦苇，吊儿郎当的当司令，你晓得不？”他心情激动，不能自制，恨不得把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告诉毛泽东……

当听到农村到处都在背语录、做宝书台、买石膏像以及大批基层干部被打倒，大量文物古迹被破坏，整个农业生产陷入停顿状态时，毛泽东的脸色越来越沉重，他缓缓地对贺凤生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央会议通过的，原来只是想冲一下少数干部的官气，想不到影响这么大，中央是要采取措施的，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可能在工作中犯错误，中央也一样，也可能犯错误，党犯了错误也应该改正。你们那里动不动戴高帽子肯定是不妥的。

毛泽东说着，叹了口气，感慨地说：“这些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

我和周总理下去，不碰上你贺凤生，怕没有人敢向我提供这么真实的情况。你贺凤生比 60 年那次来又进步多了。你要多学习，要多读书，多为党的事业担重担。”

“我的确要多学习，多读毛主席的书。”贺凤生问毛泽东：“我回去以后还干什么呢？”

“你也学会了拍马屁。不是读我的书，要多读马列的书。”毛泽东风趣地说：“我看你还要当几年支部书记。”

姨表兄刘霖生

刘霖生，湘乡县南薰乡祝赞桥（解放后划归韶山区）人，生于 1865 年。他的母亲与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姐妹关系，因此他同毛泽东以及王季范都是姨表兄弟。

刘霖生是位前清秀才，对中国的旧学很有根底，擅长诗词、对联，曾任清朝长沙府学生员。他为人正直刚毅，思想求新不迂腐。当孙中山为首的反清活动四处兴起时，他非常兴奋，极力推崇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并对以后出版的《中山全集》手不释卷。辛亥革命后，他当过湘乡团岸樵运局统计科科长、湘乡县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湘乡县参议会议员、临时参议会议长。

刘霖生和毛泽东虽然是同辈，却比毛泽东大 28 岁。毛、刘两家相隔不远，平素来往较多，毛泽东对这位年长的姨表兄非常敬重。在轰轰烈烈的北伐时期，刘霖生深受民众运动的鼓舞，对中国共产党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他曾说：“孟夫子讲要耕者有其田，中山先生也是这样主张，但是只有共产党才有决心这样做。”他积极鼓励自己的子侄刘朝佑等参加农运。“马日事变”时，他曾在湘乡县城发出通电，声讨许克祥。大革命失败后，他一直隐居乡村。

刘霖生与毛泽东一家既是亲戚关系，平时来往便十分密切。1920 年，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去世后，刘霖生曾帮助治理丧事。1937 年，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的母亲，也就是毛泽东的八舅母文赵氏去世。当时，由于毛泽东、毛泽民均在外面从事革命活动，毛泽覃业已牺牲，因此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便委托刘霖生代写一副挽联，以作为韶山毛家的祭奠。刘霖生当即命笔，一挥而就：

诲教我夫婿觅封，忘身救国，举世反以为非，慧眼独垂青，颖脱囊中，望成宅相；

谁唤起自由勃发，亚雨欧风，新潮日见其涨，独澜资力挽，机存阍内，冀嗣徽音。

字里行间，不仅表达了对逝者的怀念，而且表现出对毛泽东所从事事业的欣赏和赞颂。

与此同时，他还以毛泽东的名义献了挽联，联中有“问到旧栽桃李，已成大树将军”之句，意即今日之毛泽东已成国家栋梁，未曾辜负舅父母当年的栽培。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敢写这样的诗句称赞毛泽东，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1937年，文运昌在长沙一个中学任庶务，该校学生莫立本（又名方克）赴延安，文运昌将自己父母去世的消息以及刘霖生的情况写在信上，托莫立本转交毛泽东。同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给文运昌的回信中写道：“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短短两句，却流露出毛泽东对刘霖生的关切和感激之情。

1949年9月，刘霖生在家乡去世，未能亲眼目睹亿万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这恐怕是刘霖生最大的憾事。

毛泽东对这位颇有文才而又为人正直、不事权贵的姨表兄，内心里是极其钦佩和怀念的。解放后，他曾多次与另一位姨表兄王季范一起谈到刘霖生，对他的逝世表示深深的惋惜。

姨表兄王季范

毛泽东的姨妈嫁给了王文生，生有二子，王星臣和王季范。

王季范又名王邦模，出生于1884年，长毛泽东9岁。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九，后辈人均称他为“九阿公”，毛泽东则一直叫他“九哥”。

王季范的母亲王文氏是毛泽东的二姨妈，文芝仪的次女，在同辈姐妹中排行第六，是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的亲姐姐。

王季范从小熟读经书，有较好的古典文学基础，20世纪初考入长沙优级师范（湖南大学前身），毕业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毛泽东小时候经常住在湘乡棠家阁（唐家坵）的外婆家。当时姨表兄王季范也经常来这里探亲，两人很快就熟悉起来。毛泽东尊敬这位在省城上学的大表哥，经常向他请教一些学习上的问题；王季范也很喜欢这个好学好问的小表弟，每次总是耐心讲解，不厌其烦。毛泽东要到东山学堂继续求学，

也是王季范力劝姨父毛顺生才得以促成。

1911年春，毛泽东从湘乡东山小学堂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当时王季范正在长沙一师担任教员。其间，毛泽东得到王季范的不少帮助和指点。

1914年，毛泽东考入第一师范读书后，他们既是表兄弟又是师生，感情自然更深了。王季范对毛泽东不仅在经济上予以帮助，学业上认真教诲，对他的政治活动也尽力支持。这时的毛泽东，接触了进步思想，积极组织和领导革命活动，因此，也常惹出一些“祸”来，常是王季范出面才转“危”为安。

1915年，为了反对学校增收学生学费和延长半年学制，毛泽东等人发起了驱赶校长张干的运动。毛泽东起草了一份《驱张宣言》，历数校长办学无方，贻误青年。他连夜赶印宣言，在校内散发。校长张干得知此事，心下大怒，要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闹事”学生。

当时在一师担任学监和数学教员的王季范闻知此事，心下十分焦急，于是找到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校内有声望的教师商量对策，由他们出面，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对张干施加压力，才使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以后毛泽东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几次被反动军警追捕，都是王季范救援掩护方得渡过难关。1927年“马日事变”前，毛泽东与王季范分手，直到1950年才在北京会面。20多年间彼此分离，但常多方设法捎信问候，互相鼓励。王季范一直在长沙、湘乡等地从事清苦的教育工作，他同情和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多方赞助进步学生、教师进行革命活动。这期间，王季范于1928年2月至1936年7月，担任过长沙长郡联立中学校长；1937年春，任河南省教育厅秘书长，3个月后返乡，任广益中学校长及育才学校代理校长。随后，又致力于创办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

1949年6月，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王季范以湖南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身份，参加了长沙地下党领导的迎解放活动。他从湘潭向毛泽东发电报，报告“湖南和平起义可望促成”的胜利消息，并建议迅速派人南下，做好接管湖南政权的准备工作。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王季范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对他领导的革命胜利表示祝贺，还提出了“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三个治国重点，供毛泽东参考。

新中国刚一成立，毛泽东即派表侄女章淼洪从汉口到长沙接王季范进京。从此，王季范便成了毛泽东家中的座上客，经常陪同毛泽东接见来自湖南家乡的父老乡亲 and 各界知名人士。

记得第一次到北京时，毛泽东特意把王季范安排在当时最好的北京饭店住下，并亲自上饭店问候。王季范十分不安地对毛泽东说：“润之呀，像我们这种对革命没有贡献的人，住这样高级的招待所，实在感到愧疚和不安啊！”

毛泽东正色地说：“哪里话，你们过去搞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就是有益的贡献嘛！”

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到了王季范的心坎里，使他感到无比的快慰。事实上，王季范前半生也确实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在一师支持毛泽东的进步活动姑且不说，“马日事变”之后，他也一直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想方设法帮助进步师生进行革命活动。他曾把自己惟一的儿子王德恒送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后来，王德恒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回到湖南桃源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幸被特务杀害。事后，王季范又把自己的孙儿孙女送去参加了革命工作。

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以后，王季范便提出要到华北去看看当时正开展的土地改革等情况，这正对毛泽东的心意，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并向他建议说：“你们可以从张家口、大同、太原、石家庄、保定回到北京。这样兜一个圈子，多看一些地方。”

这次外出参观，使王季范受到了很好的思想教育，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回到北京之后，他向毛泽东谈了参观的感想，令毛泽东感到十分高兴，认为到各地去参观，是加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大力推广。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邀请原湖南第一师范的师生王季范、徐特立、周世钊等人吃饭。席间，谈起原一师校长张干，大家都感慨系之。毛泽东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30多岁就当了一师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爬到反动统治队伍里做高官，结果没有。”周世钊等人接着把张干6口之家的生活窘况向毛泽东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不假思索地说：“张干是有向上爬的本钱的，如果他下决心向上爬，一定爬得上去。经过几十年还没有爬上去，可见他没有向上爬的决心，这就算有一定的操守。对张干应该照顾，应该照顾！”谈起往事，毛泽东不无自责地说：“现在看来，当时赶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每个学生多交10元学杂费，也不能归罪于他，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

王季范在一旁听后解释说：“依我看，当年《驱张宣言》主要是触犯了张干的尊严，他的自尊心很强。说他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这倒并不见得。”毛泽东点点头说：“九哥说得有道理。”

这次谈话后不久，毛泽东即给当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王首道写信，要求给张干以生活上的补助。于是，1200斤救济米和15万元人民币（旧币）送到了张干家中。

1952年春，毛泽东在丰泽园住所设宴招待来自湖南家乡的客人，王季范照例在场。这次，毛泽东将江青、毛岸青、李敏、李讷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叫了出来，指着王季范向他们介绍说：“这是我的九哥，是我的姨表兄。他家住在湘乡十四都。”介绍完之后他又补充一句话：“没有他就没有我。”

王季范满怀热情地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历任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政务院参事，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11月，他率部分人大代表到湖南视察，前往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故居，并合影留念。

晚年，王季范因病住院，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请他的孙女王海容转致慰问。1972年7月，王季范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在王季范追悼会上，毛泽东献了花圈。花圈的飘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姨表、姻兄赵浦珠

赵浦珠生于1886年，比毛泽东大7岁。他是毛泽东的大舅母的侄儿，他的堂妹赵先桂又与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指腹为婚，因此，毛泽东又称他为姻兄。辛亥革命后，赵浦珠曾与毛泽东在湖南新军辋重营一同当兵。亲戚加战友，关系自然非同一般。后来赵浦珠先后在湘乡县立东皋中学、东山中学、乙种农业学校、第一女子职业学校、女子师范学校、湘乡中学、永丰中学等校担任文史教员和校长等职，抗战前还担任过一届湘乡县四区区长。

解放后，赵浦珠多次给毛泽东写信。1950年，赵浦珠因乡政府在减租土改工作中涉及个人利益，并对给他定成地主成份有意见，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出面帮助解决。毛泽东于1950年5月7日给赵浦珠回信说：

浦珠先生姻兄左右：

惠书及大作收到敬悉，甚为感谢。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熟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风便尚祈时示周行。唐家圯诸亲友并致问候之意。

此复，顺颂

健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但是，当赵浦珠生活真正有困难时，毛泽东并不因为他是地主成份而嫌弃他。1963年1月18日，毛泽东在接到赵浦珠反映生活困难的信后，就曾给他寄过300元人民币。

1975年，赵浦珠在家乡逝世，终年79岁。临终前，他留下了一本《廉园拾遗》。

表侄孙女王海容

王季范有一个儿子叫王德恒。抗战时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回湖南桃源搞地下工作，被杀害。王德恒有一子、一女，一女就是王海容。排辈分她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

王海容生于1938年。少年时常随其祖父王季范一起进出中南海，多次见到毛泽东。每次见面，她都称毛泽东为“主席公公”，深得毛泽东的喜爱。

1957年，王海容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她想当一名化学工程师的愿望受到挫折，当时的心情非常苦恼，只好和一些同学组成一个自学小组，在家里自学。

1958年，受到当时“大跃进”的情绪影响，王海容决定放弃当工程师的愿望，到社会上去参加工作。她把这个想法告诉家人后，遭到家里的拒绝，目的是希望她继续考大学。于是，王海容便瞒着家人，满市奔跑找工作，后来终于到了北京化工厂当徒工。当她把入厂手续都办好之后，才告诉家里。家人对她也是无可奈何，只好点头同意了。

在北京化工厂，王海容工作了整整两年，自觉思想上取得了不少的收获。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社了解到她的经历之后，便约她写一篇经验体会文章。王海容有感而发，写出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长文。文章说，1958年大跃进，我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到北京化工厂当徒工。在我们徒工中，有人认为读了12年书当徒工是屈才，我觉得，今天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知识是党和人民给的，我们应当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只有用书本知识和生产知识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提高生产水平。事实证明，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师傅的帮助，在短短几个月中，已掌握了较复杂的操作技术。老工人有丰富的技术经验，这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我们应虚心学习他们高尚的品质和生产经验。我也懂得，今天的劳动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为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这是无上光荣的。劳动对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改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培养我们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这不是屈才不屈才的问题。我们要做又红又专的工农化的知识分子。任何知识只有在实践

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有用的。厂党委还为徒工制订了“六三”工作制，即每天6小时工作，3小时学习。所有徒工都在厂办化工学院学习，我们技术提高得很快，这说明党对我们徒工是何等信任和重视。我们想想，旧社会的徒工有这样幸福的生活吗？工厂还给我们保健食品，国家还给我们各种福利，党和国家对工人的关怀，我们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这是值得自豪的。

文章写好之后，王海容心中无底，很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她提笔给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写了一封信。时间是1960年8月1日。信中说：

叶伯伯，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我去当通讯员。早几天，他们编辑部的同志对我说，现在他们需要一些关于徒工生活的稿子。因为社里经常接到一些工厂徒工的来信，他们大多不安心当徒工，其中许多人认为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去当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的。我是当过徒工的，对徒工生活也有一些体会和感受。为了帮助广大青年徒工早日改变上述不正确的态度，安心自己的工作，《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我写一写关于自己对徒工的体会和认识。稿子我现在已经写好了，但感觉许多地方重点不突出，内容也欠佳。我想请主席公公在百忙中抽出一点点时间帮我修改一下。

本来，王海容只是想请毛泽东过过目，对文章提一些修改意见，当然最好是能够亲自改一改，这样更能提高文章的价值。不过，她也知道，毛泽东是大忙人，操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对她这样一个中学毕业生的文章，究竟有没有时间去改，实在是不敢抱太大希望的事。因此，她在给叶子龙的信中也明确表示，如果主席公公没时间代她修改，就请早日将文章寄回来。

文章寄出之后，一晃就是两个月的时间了，王海容一直没有接到退回的文章，心里有些惶惶不安。不想10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毛主席要亲自见她。这使她不安的心中又多了几分期待。

10月17日下午3时，王海容准时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见毛泽东手中正拿着厚厚的一沓稿子，有近20页之多。仔细一看，正是她早先寄给叶子龙的稿子。在稿子的第一页上，毛泽东写了两行大字，第一行是“我的经验”，第二行是“徒工王波”。原来毛泽东不仅为她的文章起了标题，而且还为她本人起了一个笔名——“王波”。

一阵寒暄之后，毛泽东将手中的稿子递给王海容，然后顺手拿起了香

烟。王海容为主席公公点着火后，便一页一页地翻起稿子来，发现中间有许多页被做了大量的修改。其中有几段几乎完全是毛泽东重新改写的。于是王海容便迫不及待地读起来：

“我们要牢牢记住，真正的知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任何书本知识只有在书本的作者们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书本上的道理便只是无用的假道理，决不是能够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

“虽然我对过去工人的那种艰苦生活没有亲身的体会，因为我在 1949 年全国解放时才是一个十一岁的‘黄毛丫头’，什么事也不懂；但是在北京化学工厂从许多老工人的谈话中使我体会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与解放前的生活和工作对比起来，实在太幸福了。

“在上面，我讲的全是些好事情，这是真的。难道没有一点坏事情，或者叫做错误缺点的吗？当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对待呢？以我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姿态，把所有错误缺点，一件一件克服掉。”

明眼人也许一下子就可以读出来，这些老练的文字，辩证的观点，决非刚刚中学毕业的女孩子所能写出来的。因此这篇文章后来在《中国青年》杂志 1960 年第 23 期上发表的时候，编者专门写了一个“编者按”，将毛泽东修改的上述几段话引出来，作为整篇文章的画龙点睛之笔。

毛泽东在修改这篇文章中，用“黄毛丫头”一词来形容王海容，这固然是表现了他对这个表侄孙女的喜爱；但另一方面，他花这么大的精力来修改这篇文章，同时也是表现了他对新中国千千万万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因为他从王海容的这篇文章中，看到了教育知识青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这天下午从 3 点到 5 点，毛泽东与王海容谈了整整两个小时。内容从工厂到学校，从劳动锻炼到思想改造，涉及的面非常之广。北京的 10 月，天已黑得很早，当 5 点多钟从毛泽东处告辞出来的时候，大街上已是华灯初上，王海容的心情显得格外的清朗和舒畅。

在北京化学工厂当了两年学徒之后，王海容后来又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1968 年毕业，随即入北京外语学院学了 8 个月的俄语，就被调往外交部工作。

王海容在外交部工作时间不长，即被提为礼宾司司长，后进一步提升为

外交部副部长。于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每逢外事活动，便出现在当时几大报纸各版的新闻照片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为仅次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重要角色。

王海容总是穿一身朴素的服装，方口布鞋，留齐耳短发，戴眼镜，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她不仅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担任翻译，而且是这位党中央主席家中的常客。在毛泽东晚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家里的客人是不多的。毛泽东非常信任王海容，经常要她参加政治局会议，然后直接听取她关于政治局内部各种情况的汇报及国内各方面情况的反映。报送政治局委员传阅的有些文件要列上她的名字。毛泽东知道政治局内部是分为两个阵线的，他需要他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王海容便充当了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人之间的一座特殊的桥梁。

王海容在“文革”中的表现，人们评说不一。现在，她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七、岳家亲属

杨林罗家

毛泽东的原配罗一姑，是韶山杨林村炉门前人。其父罗合楼（毛泽东曾称罗鹤楼），名远雄，号德甫，是乡村知识分子，主要以务农为生。其母毛氏，为毛泽东家的远亲。毛氏父亲派名毛祖植，据族谱“祖恩贻泽远”辈分排列，同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是一辈。因此，罗合楼的夫人毛氏，实际上是毛泽东的远房姑祖母。罗合楼夫妇有三个女儿，长女嫁毛泽东。

毛泽东父母为儿子包办的婚姻，引起毛泽东的极为不满，也使家庭中蕴藏着一场尖锐的冲突。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在毛泽东长大成人、独立生活之前，罗氏已因病而歿。这一偶然变故，对毛泽东来说，抗婚已无必要，而岳家的存在也已既成事实。因此，这种亲属关系便自然保持了下来。

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休养，并在家乡领导开展农民运动。期间，他多次去杨林村访贫问苦，发动群众，而罗家（毛氏夫人已于1912年去世，二女儿和三女儿均出嫁，只剩罗合楼老人）既是他探望、休息的地方，也是他的工作对象。他曾召集罗家亲戚罗合楼、罗立芳（罗合楼的堂弟）、罗石泉（罗合楼的侄子）、黄可忠（罗立芳的妹夫）等人座谈，宣传革命道理。在毛泽东的影响下，54岁的罗合楼表示积极支持农民运动，罗立芳和罗石泉参加了雪耻会和农民协会，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湖南。反动势力把韶山作为反攻的重点，疯狂镇压农民运动。罗合楼率侄子等亲戚被迫逃往华容县乡下避难，杨林老家即被反动派抄封。在外乡，罗石泉因开展地下斗争被捕，后托人保释出来。1943年返回老家。

新中国成立不久，一封从北京邮来、封面上书写着“罗合楼老先生启”的信件，送到了韶山杨林村罗家。这正是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向罗府全家表示问候，并说如罗老先生身体尚健，欢迎他去北京走走。遗憾的是，罗合楼老先生已于1943年12月去世了。关山阻隔，毛泽东不知这个情况，才有这封迟到的信件。

当时，罗石泉住在本家，是家乡小学的教员。因他曾在毛泽东引导下参加革命，与毛泽东接触较多，同时也是家族中的知识分子，便由他代表罗家给毛泽东复信。毛泽东获悉罗家的音讯后，非常高兴，又回了一封短笺：

来信收悉，十分想念你们。承蒙关注，极表谢意。

1950年5月，毛岸英受父命回乡，专门约请罗石泉到他住处毛氏公祠见面叙谈。毛岸英亲切地称他“舅舅”，转达父亲对他的问候，将父亲托带的鹿茸、茶叶及人民币20万元（旧币）送给他，还详细询问了他的家庭生活和身体状况。

罗石泉当年已62岁，年老多病，家口众多。他任教的小学是族立学校，薪水没有保证，生活十分困难。岸英回京后，向父亲谈了罗家的情况，毛泽东当即请人为他汇来300万元（旧币），以解燃眉之急。

建国初期，许多亲友纷纷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帮助找工作或推荐到北京工作。对这类要求，毛泽东均婉拒。罗石泉也向毛泽东表达过这样的愿望。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复信：

石泉兄：

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在地方上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较为适宜，不必来京。此复，顺问

康吉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

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罗石泉安下心来，继续教书育人。1951年，罗石泉在家乡逝世。此后，弟媳王淑兰从北京回韶山负责招待所的工作后，毛泽东又嘱咐她：要常去罗家看看，他们都是受苦人。王淑兰记着大哥的嘱托，曾多次和九弟毛泽连去罗家看望他们，并送去大米、黄豆和豆腐干等物。

从以上的事实不难看出，毛泽东当年不满意的只是那桩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而对罗一姑和罗氏家族，却没有丝毫的嫌弃之情。相反地，正是因为这桩婚姻的不幸，他对罗氏一家更加充满了关心和同情。

板 仓 杨 家

岳父杨昌济

1936年，当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到自己青年时代的生活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确实，自从杨昌济从国外留学归来，1913年任教于湖南省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以后，他与毛泽东之间就开始建立亲密的师生情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谊与日俱增。杨昌济不仅以他的哲学世界观、伦理学思想熏陶了毛泽东这个农家出身的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由衷的敬佩。

放弃科举 热心教书

杨昌济，字华生，1871年6月8日生于湖南长沙县隐储山下的板仓冲。

板仓杨家，原籍长沙金井蒲塘，世代以农为业，没有出过什么知名的读书人。大约在18世纪末，祖辈迁到长沙清泰乡板仓，开始培养子弟读书，后来果然人才辈出。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在杨昌济出生前10年去世。父亲杨书祥捐过一个“例贡生”，但没有做过什么官，一直在家乡附近以授徒为业。

杨书祥，字书樵。他有四个子女：长子昌运，字荣生；第二个是女儿，嫁金井郑姓；杨昌济是老三；老四杨昌恺，字瑞生。杨书祥还有一个弟弟叫杨小吾，因无子，便将杨昌恺过继来做儿子，所以杨昌济有时称杨昌恺为“堂弟”。

杨昌济的母亲向氏是平江县石洞人。向家乃诗书世家，与杨家世代联姻，对杨家子弟影响甚深。

杨昌济7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耐心教育下，他发愤读书，几年之内便熟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书，涉猎了中国历史上有关哲学、政治、伦理等方面的典籍，特别是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著作。为了应付

科举考试，他还学会了写八股文。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思想上曾经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不幸的是，从 8 岁到 14 岁，他的母亲、父亲相继去世，这给他早年的生活留下了不少阴影。

1888 年，杨昌济 17 岁时，与舅父前妻所生的第二个女儿向振熙结婚。

次年参加长沙县学试，一举考上“邑庠生”。1890 年应试“举人”不第，便出门授徒，积累了一些教学方面的经验。1893 年再次“乡试”，又不第，心情苦闷，日渐消沉。1894 年冬，他愤而写了“孤愤遭穷厄，牢骚损岁年”的词句，当时的压抑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1895 年至 1898 年这几年中，杨昌济有时在长沙居住，大部分时间则在乡里授徒。在板仓附近的巷子山陈家当过塾师。在这期间，他继续自学。长期的教学生活，冲淡了他对科举考试的热衷和由此而发的伤感，逐渐焕发出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因此，他不久写下了《杂感》一诗：“松桂一庭绿，雨声凄正繁。诗书从意读，景物未全残。幸有生徒乐，初无风雪寒。胡为常郁郁，天地尚平安。”

1898 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为“通讯会友”，借此机会向谭嗣同等请教、交流。当时他按“南学会”部署撰写的《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农工之学》的论文，在“通讯会友”的课卷中被评为第三名，由学会推荐发表在《湘报》上。后来，他在谈到教育问题时，曾多次提及到“南学会”对他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绝意仕进。这期间，他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898 年生了儿子杨开智，1901 年生了女儿杨开慧。他的哥哥杨昌运虽在戊戌年也考上了“秀才”，但鸦片烟瘾不断，长卧家中。杨昌济岁岁课徒，用自己的薪俸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帮助哥哥解决生活困难。他的经济负担是越来越重了。

出国留学 改名“怀中”

正当杨昌济隐居乡间，感到彷徨无主、前途无适的时候，1900 年 8 月，又传来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的消息。对于唐才常这位对湖南变法运动起过推动作用的人物，杨昌济是十分熟悉的，也是非常尊敬的。唐才常的壮烈牺牲，自立军烈士们的鲜血，进一步擦亮了杨昌济的眼睛。这时，杨昌济的密友杨毓麟思想更为激进，已经暗中鼓吹和串联进行革命，并于 1902 年东渡日本求学。在时代思潮的感召下，在杨毓麟和其他亲友的鼓励

支持下，杨昌济也离乡背井，东渡日本。临行前，他改名怀中，表示自己虽身在异都，却心怀中华。

1903年农历二月初，杨昌济告别生活了近32个春秋的家乡，离开亲爱的妻子和儿女，从长沙乘船赴日本。同行的湖南留学生有30多人，其中包括陈天华、刘揆一、李锐等。这群人中，以杨怀中年龄最大，学识也最渊博，大家对他十分尊敬，称他为“怀翁”。

杨昌济到达日本后，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开始读的是速成师范科，不久便转入普通科，潜心研读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课程。他学习十分刻苦，生活非常简朴，但是特别喜欢旅行。他相信古人“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的说法，每当假日，便去游览日本的名山大川，丰富阅历，陶冶情趣。这一点对后来的毛泽东有极深的影响。

杨昌济在弘文学院的学习成绩优良，深得院长的赏识。1906年，他在弘文学院结业后，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修业期限为4年。

不久，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在杨毓麟、章士钊的极力推荐下，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1909年春，杨昌济进入苏格兰的滌北淀大学哲学系，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当时章士钊亦在该校学习。

杨昌济在留英期间，学习极其勤奋，生活却十分简朴。据1910年《湖南教育杂志》第二期报道，杨昌济当时在英国“所修伦理学科，曾得分数至90分以上，足称优胜”。

1912年夏天，杨昌济结束了在滌北淀大学3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他又往德国进行了9个月的考察。在这期间，他还去瑞士游览了一番。在德国，杨昌济重点考察教育制度，但是对政治、法律等各项制度也无不留意。在考察时，他十分细心，从学校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学校纪律到学生的奖惩制度，从学校领导管理体制、师资培养到经费的来源、开支等，都一一加以了解。作了详细记录。他对英、德两国的社会道德、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等等，都注意观察，联系国内情况进行比较，以便回国后进行介绍和宣传，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

这次考察完毕后，他便启程返回阔别10年的祖国。

杨昌济回国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已被袁世凯所篡夺，湖南的政权也被立宪派政客谭延闿所窃据。谭延闿企图多方网罗人才，他见杨昌济学问渊博，在教育界曾有一定威望，便想罗致他当湖南省的教育司长。杨昌济托辞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缺乏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谭延

闾的邀请。他决心以教书为己任，便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的聘请，在长沙当了 5 年教员。在此期间，他除了以主要精力从事教学以外，还密切注视政治形势的发展，积极参与一些进步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活动。

1915 年 9 月，《新青年》问世，受到杨昌济的热烈欢迎。他除了自己认真阅读外，还积极向朋友和学生推荐。他是《新青年》在湖南的最早的读者和宣传者，还自己出钱买了一批，分赠给他的一些得意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当时都在受赠者之列。杨昌济在《新青年》先后发表了《治生篇》、《结婚论》等论著和译文，并推荐毛泽东写的《体育之研究》在该刊发表。

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授课时，与该校一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教员，如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王季范、易白沙等人共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一师的学生一般家境贫寒，深知读书机会难得，学习刻苦用功。杨昌济感到这些好学向上的青年十分可爱，便竭尽心力，加以培养。他除了讲授“修身”、“教育学”两门课程外，还动手自编教材，先后编写了《论语类抄》、《儿童侦探》、《教育学讲义》及《附录》等同时还翻译了一部《西洋伦理学史》。

杨昌济的口才并不很好，但人品高尚，学识渊博，又比较注重实际，所以授课仍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和尊重。许多学生不仅上课专心听讲，课后还成群结队地去“板仓杨”寓向他请教。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陈章甫、罗学瓚、张昆弟等人，都是他家的常客。杨昌济很高兴和这些青年交往。他从毛泽东、蔡和森这批朝气蓬勃的青年身上，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人民的希望，感到无限欣慰。曾挥笔写下了著名的两句诗：“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

杨昌济除了在第一师范授课以外，还兼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育学教授。高师虽是当时湖南的最高学府，但是却没有系统地讲授过伦理学和教育学。杨昌济在该校第一次开设这样的课程，不仅对于培养师范人才，而且对以后湖南的教育事业，都有良好的影响。

此外，他还先后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教课，并任过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兼授伦理学和国际商法。

对于湖南大学的创办，杨昌济也作过很大的努力。辛亥革命前，他和章士钊就曾酝酿过创办湖南大学。归国后不久，在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余归国后对教育之所感》中，他又提出了创办湖南大学的设想，认为可以

仿效英国的做法，把几个高等专科学校合并成一个大学。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了“湖南大学筹办处”，由杨昌济主持其事。由于军阀连年混战，筹备工作艰难。1926年湖南大学成立时，杨昌济逝世已经整整6年了。

杨昌济住在长沙时，寓所门上挂着一块1尺来长、3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在5年多的时间里，这块铜牌随着他从河东到河西，又从河西到河东，先后换了四五个地方。不管这块铜牌挂在哪儿，都有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寻迹而来，登门求教。

早在1913年，当杨昌济刚从国外归来，居住在长沙落星田时，后来成为著名革命烈士的柳直荀就寄居在他家里。柳家和杨家曾有“交情三世久，春色两家分”的美誉。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也曾留学日本，对体育很有研究。柳直荀当时在广益中学读书，他除了白天在学校上课外，晚上还可得到杨昌济的指导。

杨昌济与毛泽东相识最早是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时杨昌济在省立第四师范教课，毛泽东也刚好考入该校。不久四师与一师合并，杨昌济便到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随之也转入该校。杨昌济看到毛泽东这个农家出身的学生，好学深思，成绩优异，十分赞赏；毛泽东看到杨昌济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也非常敬佩。

杨昌济在浏正街李氏芋园时还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黎锦熙、毛泽东、蔡和森、萧三等人。从1914年冬至1915年9月，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这些人都要到怀中先生家中来讨论有关读书、哲学问题。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大家每次碰到一起，就把自己一个星期看的书的心得自由地进行讨论，有时也随手拿起旁边一个人的日记看看。1915年暑假，毛泽东、陈昌、熊光楚等人都没有回家，就居住在李氏芋园，由杨昌济、黎锦熙等人指导进行自学。

杨昌济通过和这些学生接触，对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品德学问都十分了解。例如他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有这样一篇记载：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杨昌济在这个时候写下这样一篇日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毛泽东在一师学生刚刚掀起的一场驱逐校长张干的斗争中开始崭露头角。校长张干下令将毛泽东等 17 名带头“闹事”的学生开除。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教员对学生的正义行动十分同情，要求张干收回成命。接着，杨昌济辞去了一师的教职，整整一年没有在一师上课。

但是，他和毛泽东等一师学生的亲密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这年 7 月 5 日，杨昌济举家迁往河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学习和讨论，他还家里专门辟了一间客房。每当这些学生来后，亲密的谈话一拉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坐下来一大桌，去留都十分随便，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经过杨昌济和其他进步老师长期的教育和熏陶，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陈昌等进步学生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渐趋成熟。他们经过反复讨论，深感要使个人和社会向上，不仅要有统一的思想，还必须结成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团体。于是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便导致了 1918 年 4 月新民学会的成立。

新民学会的成立，固然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的根源，但与杨昌济的巨大影响也是分不开的。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毛泽东谈到创立新民学会的缘起时，在指出其他方面的两个原因之后，接着说：“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新民学会从酝酿到成立，即从 1915 年至 1918 年，杨昌济不仅热情地向这群青年介绍和传播西方各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哲学思想和伦理观点，而且传授了大量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和历史知识。同时，还和他们一道严肃地讨论当前的时事政治，热情地向他们推荐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正在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学风，练就一副强健的体魄。

新民学会成立时的 21 个“基本会员”，除了罗章龙是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以外，其余 20 人都是一师的学生，都曾或长或短地“与闻”过杨昌济的“绪论”。罗章龙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与毛泽东确立密切联系以后，也经常去“板仓杨”寓聆教。

新民学会章程中确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和“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纪律，正

是和杨昌济一贯的主张相吻合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这个学会是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当时，新民学会基本成员的重要主张和观点，都与杨昌济的进步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许多年后，李维汉曾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说：“杨怀中先生来北大教书前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高等师范的伦理学教员，思想开朗、进步，为人刚正、真诚。新民学会的成立以及我们思想上的‘向上’都同他对我们的影响有关。”另一名新民学会早期会员萧三也曾回忆说：“杨昌济（号怀中）先生对毛泽东同志和许多同志影响很大。……杨先生并不善于辞令，也不装腔作势，但他能得听者很大的注意与尊敬，大家都佩服他的道德学问。他的讲学精神，使得在他的周围，形成了认真思想、认真求学的学生一群——毛泽东同志、蔡和森同志、陈昌同志等。每逢星期日，他们相牵到杨先生家里去讲学问道。杨先生是诲人不倦的，也很器重毛、蔡、陈等几个学生。”

北大教授

1917年，杨昌济在英国滬北淀大学的同学章士钊，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兼逻辑学高级讲师。章士钊向学校校长蔡元培推荐杨昌济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

杨昌济当时对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施早已不满，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风气，当接到蔡元培的邀请后，便欣然应聘，并于1918年6月初举家迁往北京。

到北京以后，杨昌济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并立即出任北大文科伦理学教授。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上半年，他负责讲授两门学科，一门是“伦理学”，这是本科的必修课；一门是“伦理学史”，这是选修课。

他讲授伦理学用的教材是德国人利勃斯写的《伦理学之根本问题》。这本书是杨昌济自己从日文翻译过来，并且由北京大学出版部正式出版的。他讲的《伦理学史》，则主要是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吉田静致的《西洋伦理学史讲义》。在长沙期间，他把这本讲义译成中文，当作高师学生的教材，但是没有翻译完。1919年北大出版时稍有添补。1920年他逝世以后，又曾经再版。胡适在再版的《跋》中，对该书作了很高的评价：“杨先生不幸于本年病歿。他是一个勤苦的学者，他临死之前不多时还有信托我向杜威博士要欧美最近出版的伦理学书籍，可见他至死不懈的精神。……此书初版很少，早已卖光了，现由北京大学出版部用五号字重印，一来可供一般学者的参考，二来也可以作杨先生身后的一种纪念。只可惜杨先生说的‘他日有暇尚当补足之’的话，现在不能实践了！”

1919年1月，杨昌济和马叙伦、梁漱溟、陈公博、陶履恭等12人联名

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通过一些讲演和报告来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活跃了北大的学术气氛。

1918年夏天，当杨昌济赴北大任教时，新民学会许多会员也从一师等学校毕业了。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希望继续升学，但是又苦于缺钱，即使是自学也要有栖身之所和生活费。正在他们苦恼之际，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这一下子解开了他们心里的疙瘩，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欢迎和响应。

1918年6月，新民学会集会专门讨论赴法勤工俭学问题，确定由肖子升、蔡和森负责进行联系。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北京，通过杨昌济的介绍，很快就找到了蔡元培和李石曾，并拜会了李大钊、章士钊等人，然后写信给毛泽东，传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希望他到北京来，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

8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湖南青年20多人到达北京。但是由于赴法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这些青年便分别进入北京附近的几个留法预备班学习。杨昌济把肖子升介绍给李石曾做秘书，又推荐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为了帮助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筹措旅费，杨昌济还协助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将掌握在湖南旅京人士熊希龄、范源濂手中的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湖南粮、盐两税超额余款的利息，提了出来，从而使他们得以顺利赴法。杨昌济对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情赞助，使广大留学青年十分感激，也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

毛泽东在北京工作期间，继续和杨昌济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后来他自己曾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在杨昌济的赞许下，他和杨开慧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和恋爱关系。两人经常漫步在北海桥头，欣赏着古都风光，体验着初恋的甜蜜。

蔡元培送挽：学不厌，教不倦，本校失此良师

1919年，杨昌济生病，住在西山疗养。12月初，病情转重，便由西山转入北京德国医院治疗。

不久毛泽东等人为驱逐军阀张敬尧来到北京多次到医院看望杨昌济。

1920年1月17日晨5时，病魔终于夺去了杨昌济这位勤奋学者的宝贵生命。他临终前还在与友人谈话，说：“吾意正畅。”说罢，便溘然长逝。时年虚岁50。

杨昌济逝世后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毛泽东等20人，在《北京大学日刊》联名发表《启事》，“伏冀诸君子知交慨加赉助”。

杨昌济一生埋头教育事业，无意富贵利达，家境是十分清寒的。他在西山养病时，由于不能去学校讲课，按惯例没有工资，蔡元培特别加以照顾，按月给他发生活费用。一些同乡好友如章士钊、杨度、李锐、方表等人，则集资供给医药费用。

25日，杨昌济在京的友人杨树达、黎锦熙、方叔章、朱剑凡、陈夙芳等数十人在法源寺设祭追悼，许多人送了挽联。蔡元培送的挽联中有这样的话：“学不厌，教不倦，本校失此良师”。字虽不多，却概括了杨昌济勤奋的一生。

为了解决杨昌济善后家属的生活困难，蔡元培、胡适、马寅初、陶履恭4人还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启事，号召北大教职员及同学为之募集赙金。2月4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决定：“杨昌济教授及刘师培教授身后恤金，应根据田北湖、朱蓬仙教授先例，各赠送两月俸金。”

2月中旬，杨昌济的灵柩便在他的家属杨夫人、杨开智、杨开慧和学生毛泽东、陈绍林等人的护送下，从北京启运，返归长沙板仓故里。

杨昌济在北京逝世，也引起了长沙教育界和新闻界的震动。他逝世的第二天，即1月18日，湖南《大公报》刊载了《杨怀中先生昌济于北京逝世》的消息，同时发表了李肖聃写的关于杨昌济生平的详细介绍。

杨昌济虽然逝世了，但他精心培养的一大批学生，其中特别是参加新民学会的许多学生，却像早春的蓓蕾，含苞待放。杨昌济生前，特别寄希望于毛泽东、蔡和森。在他逝世前不久写给章士钊的信中，曾经恳切地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李肖聃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文章中也说：杨昌济“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

以后的中国历史已经表明，杨昌济确是慧眼识人。作为人师，他有蔡和森这样的学生；作为人父，他有毛泽东这样的女婿，死有何憾！

岳母向振熙

向老太太尊鉴：

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并祈笑纳为幸。

敬颂康吉！

毛泽东

江青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

向振熙是杨开慧的母亲、毛泽东的岳母，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毛泽东给她写信，署上了江青的名字，而且在毛泽东的 100 多封家信中，是仅有一次，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里有一段故事……

向振熙是湖南平江人，生于 1870 年，因诗书世家熏陶，自幼识文断字，会做一手女红，长大有大家闺秀风范。1888 年与杨昌济结婚，生有儿子杨开智、大女儿杨琼（夭折）、小女儿杨开慧。

1903 年，杨昌济出国求学，一别 10 年，向振熙在家抚养儿女，艰辛度日。1913 年杨昌济回国，先后在湖南省立第四、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成为毛泽东的老师，而向振熙便成为师母。毛泽东是一个勤奋刻苦、品学兼优且胸怀大志的学生，他对杨昌济学贯中西古今，思想激进、民主、开放和主张人生进取不息的境界极为推崇、敬佩，除了在校内认真听课外，还经常到老师家里请教、探讨。杨昌济很看重这位学生，视为得意门生。向振熙也非常喜欢他，每次在家时都热情招待，还经常做些美味可口的拿手菜，留他一起吃饭。有一次，正是寒冬季节，毛泽东来登门求教，向振熙看到毛泽东依然穿着一件退了色的土布长衫，心中顿生怜惜之情，便亲手给他织了一件毛衣，色彩是当时流行的玫瑰红。这件毛衣，毛泽东穿了约 20 年，经过了秋收暴动，上井冈山，爬雪山，过草地，实在不能穿了，也舍不得丢弃，玫瑰红因而也成了他最喜欢的颜色。

杨昌济逝世时，留下的家资不丰，向振熙是一家庭妇女，没有出来工作，只能靠精打细算，来维持一家的生计，并供一双儿女上学。可是，不久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资金短缺，杨开慧请求家里帮助，向振熙竟慷慨地捐出杨昌济亲朋好友赠送的一笔奠仪费来支持毛泽东。

杨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后，向振熙曾与他们一起住在清水塘，掩护他们做地下工作，后来又为他们照看孩子。1930 年杨开慧牺牲，向振熙带着 3 个外孙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一起生活。1931 年，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61 岁的外婆向振熙和舅妈李崇德装扮成走亲串门的模样，护送岸英、岸青、岸龙到上海。返回湖南后，向振熙与 3 个外孙联系中断，不知他们的生死下落，与毛泽东也音讯不通，在焦虑忧愁中度日如年。

向振熙为毛泽东个人、家庭和事业付出了心血，历尽了种种磨难，作为晚辈的毛泽东是永远忘不了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之恩”，远不是“滴水”。

1949 年 8 月，长沙解放。向振熙的儿子杨开智立即去信毛泽东，告知老太太尚健在的消息。收到此信，毛泽东喜出望外，回电表示：“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9 月，当他得知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要回湖南省亲时，委托

她到长沙给向振熙老太太捎去礼物和亲笔信。许多年以后，朱仲丽在《灿灿红叶》一书中详细回忆了她为毛泽东当“特使”的经过：

住进中南海不久，已是秋高气爽的季节，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来找我。

“听说你要回长沙省亲？”

“是的，有事情吗？”我回答。

“毛主席叫你顺便代表他探望杨开慧的母亲，可以吗？”他说话的声音很小。

我一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点了点头说：“有什么不可以呢？快把地址告诉我，一定当好这个特使。”

叶子龙同志走到我身边又说：“毛主席叫你带上一封信，买点东西送给杨老太太和杨开智夫妇。”

“好的，好的，请告诉主席，一定办到。”

“好，等会儿我把主席的信给你送来。”

我想，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使命，有机会拜访杨开慧烈士的妈妈，正是我多年向往的事啊！

火车把我送到了一别 10 多年的长沙。南方的秋天，绿树红花，到处一片旺盛的景象，我的心情格外愉快。

我回到家里见过老母之后，就立即去办毛主席托付的事。我很顺利地找到了杨老太太，并以极其尊敬的心情，把毛主席的礼物和亲笔写的信送到了杨老太太的手里。她老人家高兴极了，激动得有点颤抖的手把信细心地打开，杨开智和夫人李崇德也高兴地围了上来，他们亲切地读着。

杨老太太和儿子、媳妇看完了信，深深地感到毛主席对他们的关怀，欣喜得流下了热泪，默默地凝视着信纸上雄劲的毛笔字。

“我要回家去了。”我站起来向杨老太太告辞，恋恋不舍地握着她的手。

“请转告毛主席，我们谢谢他的关心。请他保重身体。”杨老太太抓住我的手，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但又没有说出来。我懂得杨老太太想念毛主席的心情，大概是想问问毛主席的家庭生活情况，却又不愿随便提问。我心里想，如果开慧同志还活着的话，杨老太太早就会向我问及这方面的情况了。

我从长沙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见毛主席。是叶龙同志陪我去的，当时江青没有在场。

“毛主席，你叫我办的事，已经办到了。我见到了杨老太太一家人，信和礼物是我亲自送去的。”我兴奋地向毛主席报告：“他们问您好！”

“你坐。”毛主席刚起床，头发还没有梳，口中含着烟，坐在沙发上，沉思着，什么话也没有说，显然是往事又涌现在他的心头。沉默了一会，他才勉强地笑了一笑，说：“多谢你帮我做了一桩好事！”……

朱仲丽向毛泽东交差时，还谈及老太太想询问毛泽东的家事而又未能启口的情况，毛泽东点了点头，惦记在心。因杨开慧早已牺牲，他的婚事曲折颇多，不便详谈，如何让昔日的师母、岳母杨老太太放心，毛泽东着实费了一番斟酌。第二年，适逢老太太 80 大寿，毛泽东去信祝贺，便署上了江青的名字，以表示对老人慈母般关怀的一种委婉的回告，同时也折射出毛泽东体恤长辈的一缕良苦用心。

这年 5 月下旬，毛岸英带着父亲的重托看望外婆，为外婆祝寿。当杨老太太得知礼物中两棵人参原是别人送给毛泽东进补身体的，非常激动地对岸英说：“这如何要得，你父亲的身体比我重要呀！”

毛岸英笑着说：“我父亲说，您比他更需要进补，吃了人参，祝您老活 100 岁！”

毛岸英的到来，使杨老太太十分高兴。她对岸英说：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赤子之心哩。过去我常给他做好吃的，现在不能做给他吃了。

1951 年毛泽东又派二儿子毛岸青回湖南探望外祖母，以慰藉老人家的思念之心。

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毛泽东每月都给向振熙寄生活费，有时秘书忘寄了，毛泽东还特别叮嘱补寄，一直到老人去世为止。

1960 年是杨老太太 90 岁高寿，毛泽东听说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将回老家祝寿，便给她写了一封信：

开英同志：

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接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

劳神为谢！顺致

问候！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1962 年春天，在大连结婚的毛岸青和邵华回到北京，毛泽东见到他们风趣地说：“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于是夫妇俩一同来到长沙，这可乐煞了 92 岁高龄的外婆，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出了欣喜的笑容，眼睛里闪烁着慈祥的亮光。老太太一手拉着岸青，一手拉着

邵华，端详来端详去，总是舍不得松手。岸青夫妇向外婆和舅父母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全家都沉浸在欢乐幸福的气氛中。

当这年冬季来临时，杨老太太安详仙逝。毛泽东获悉后，心情十分哀痛，立即给杨开智发去唁电：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大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电文虽短，字里行间，情真意切。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向振熙老人幸福地度过了晚年。

妻兄杨开智、妻嫂李崇德

杨开智、李崇德夫妇是杨开慧的兄嫂，烈士杨展的父母。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是他们委托族兄杨秀生出面，办理棺木，掩埋了烈士的遗体。

1931年，杨开智夫妇辗转接到毛泽民的手书，要求把毛岸英兄弟3人送到上海。李崇德和婆母向振熙，冒着风险，扮成走亲戚的样子，领着3个孩子上路，几经周折，将他们送到了毛泽民、钱希钧夫妇的身边。

1938年，杨开智夫妇又将爱女杨展送到延安，让孩子继承她姑妈的遗志，完成她未竟的事业。不幸的是，杨展在1941年的反扫荡中牺牲，而她的父母直到长沙解放时才从毛泽东的电报中知道这个消息。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杨开智立即给毛泽东写信，告诉他自己的母亲向振熙老人尚且健在，并询问了外甥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及自己的女儿杨展的情况。毛泽东当即予以回信：

杨开智先生：

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

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此复。

敬颂大安

毛泽东
八月十日

此后，杨开智夫妇经常与毛泽东互通信息，毛泽东非常关心岳母杨老太太的生活，多次寄钱寄衣物给老人，并请杨开智夫妇代他在老人面前尽一份孝心。

建国初，杨开智在湖南某农场工作，干得不错，但他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能在长沙谋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被毛泽东婉拒。毛泽东坚持原则，不为亲友谋私。他用严肃但又有分寸的语气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的王首道和妻兄杨开智各写一信：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可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九日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十月九日

得知舅父的思想动态后，毛岸英也主动给杨开智写信，耐心细致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他在这封长达 3000 余字的信中写道：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

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还在于此；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的、极不合理的。

杨开智原想，杨家是英烈之家，对革命胜利作出过贡献，本人又有文化，毛遂自荐不算为过。看了毛泽东和毛岸英的信，才知道自己错了。他明白依靠位高权重的亲戚谋职，是一种旧社会的习惯，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也有辱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们，内心非常愧疚。杨开智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安心在农场工作，听候组织分配，争取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新中国多作贡献。

杨开智是 1925 年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建国之初，正是用人之际。湖南省委经过考察，根据他的专业对口，安排他到省政府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得知后，非常高兴。1950 年 5 月毛岸英回湘省亲，毛泽东趁此机会捎信给杨开智夫妇，予以鼓励。信写道：

子珍 同志：
崇德

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
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

此问近佳！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

杨开智在新的岗位上勤奋工作，表现出色，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先后担任过湖南省农业厅技师兼研究室主任、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省茶叶经营管理处副处长等职，并当选过湖南省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五届省政协副主席。

1950年杨开智出差去北京，夫人李崇德带孩子随同去参观游览。1952年杨开智又因公上京。毛泽东得到消息，都热情邀请他及家人到中南海作客。对这两次会面，杨开智夫妇曾共同撰文回忆：

1950年底，开智到北京开会，崇德和瑛儿同行去京。毛主席知道了，派秘书到我们的住处来找我们，把我们接到中南海。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毛主席已经在他住屋的门外等候着了。久别重逢，毛主席兴奋地谈了许多往事，谈到了开慧的牺牲，问我们开慧的墓修得怎么样？毛主席还询问了过去一些熟悉的人的情况。他对过去同情、支持过革命，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事的人都有清晰的记忆，说他们是好人，做了好事。

1952年冬，开智又一次去北京开全国茶叶工作会议，再次去中南海看望毛主席。主席详细询问了我们单位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指示我要积极投入运动，并告诫我应注意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不要犯官僚主义。主席还详细询问了我国茶叶的特点、产量、制作、销售等情况，甚至问到了茶叶的化学分析，直至茶叶中单宁酸的分子构造式。我一一作了回答。临走时，主席对我说，你下次来时帮我搞点茶叶资料来。过了几天，我在大会秘书处的帮助下，整理了一份有关茶叶以及茶叶工作情况的资料，亲自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很高兴。

毛泽东不仅请杨开智处理家事，也委托他办理朋友故旧之间的事。1954年4月，毛泽东叫秘书田家英给杨开智家里寄去600元，并代写一信，告诉他：柳直荀烈士的妻子李淑一女士，现在长沙教书，生活困难，曾有人提出希望推荐她进文史馆任馆员，但因文史馆资格颇严，不好介绍。毛主席想从自己的稿费里送她若干，作为帮助，请杨开智从侧面打听一下，征得她的同意。杨开智收到信后，立即去做这件事，然后回信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据此给李淑一汇钱，帮助开慧的好友、烈士的亲属渡过难关。

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了杨开智夫妇和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并请他们一起吃饭。

毛泽东一直惦记着杨开智全家人的健康平安，经常去信问候，除了给他母亲杨老太太直接书信外，还几次写给杨开智，字里行间溢出浓浓的亲情。杨开智的字号为“子珍”，毛泽东也常以此称呼他。1956年毛泽东致信杨开智：

子珍兄：

历次惠书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及阖家安吉。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1958年，杨开智年已60岁，因疾病增多，体力和精力都不如从前了，组织上决定安排他退休。毛泽东获息后，去信问候：

子珍同志：

几次来信，均已收到。听说贵体有些毛病，望好好养思。两位老太太高寿健康，甚为高兴，敬致问候之意。

并问尊夫人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两位老太太”指杨老太太和她的姐姐。

杨开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生活并不富裕，有时遇到个急事或看病抓药即显拮据。毛泽东每当获知，二话不说，立即伸出援手。有一次，杨开智的族兄杨秀生致信毛泽东，谈及杨家生活困难的情况，毛泽东马上请秘书田家英给杨开智寄去600元钱。北京常有人去长沙探望杨家，毛泽东每次都要捎去礼物。50年代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毛泽东每月给杨老太太寄生活费，一直赡养到老人去世，这大大减轻了杨开智的家庭负担。1962年冬杨老太太去世时，毛泽东给杨开智写信，提出：“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并寄去500元作为安葬费。此时，杨开智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份厚礼，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极大慰藉。所有这些，使杨开智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对亲戚的爱是有原则的，是济亲不私亲，念情不纵情，一句话，他的亲情是纯洁的、高尚的、真诚的。

1976年夏，杨开智夫妇还给毛泽东写信并寄照片。这时，毛泽东已经病重。身边工作人员将信和照片递给他，已是卧床不起的毛泽东竟一眼认出了杨开智，当即要请杨开智来。医护人员认为毛泽东的病状不宜见客，没有答应，他们把杨开智的信放在一级待办柜内，准备病情好转后再安排会见事宜。可是此后毛泽东的病情并没有转机，再见杨开智的愿望终未实现。

毛泽东逝世后，杨开智和李崇德在《缅怀毛主席 永向红太阳》一文中，深情地回忆了毛泽东的革命事迹，歌颂毛泽东的高风亮节，以表达他们不尽的思念。

妻妹 杨开英

杨开英，杨昌济之弟杨昌恺的女儿，烈士杨开明的胞妹，烈士杨开慧的

堂妹，1915年生于长沙板仓。

在诗书世家的影响下，杨开英从小刻苦读书，励志进取，学习成绩一直优良，在新中国成立前已读完大学，是杨家的一代文化传人。她以伯父杨昌济为楷模，立志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她一直在教学岗位上工作，勤勤恳恳，呕心沥血，是人民教育战线上一位称职的“园丁”。

作为杨开慧的堂妹，毛泽东对她有着烈属和亲属的双重感情。在毛泽东的情感世界里，杨开慧不仅是他的爱妻，更是他曾经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革命战友。因此，他给了杨开英一个特殊的称呼：友妹。

1949年冬，杨开英赴大连工学院任教。由于她幼时患过肺结核病，家里无钱医治，加上缺少营养，留下了病灶。来到大连后，因不适应北方冬天的寒冷气候，以及在课上受粉笔灰末的刺激，病症复发，气喘、咳嗽不停，只得暂时休课治疗。1950年春，病情已缓解。这时，她利用病假时间，到北京探望堂姐夫毛泽东，顺便也游览一下祖国的首都，观赏古城风貌。

在中南海丰泽园里，毛泽东和杨开英会面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板仓杨家人，自然悲喜交集，感慨万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其中就有他的爱人杨开慧，还有妻堂兄杨开明、外甥女杨展和杨家的亲戚向钧等，而杨家幸存的人也为革命担了不少风险，作出了贡献。毛泽东见到了杨开英，格外兴奋，他详细询问了杨开英的近况、杨老太太（杨昌济的夫人向振熙）和杨家亲戚在解放前的经历及目前生活状况等。当谈到杨开慧时，毛泽东的眼眶湿润了。他说：

“你霞姐是有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啊！”

杨开慧字云锦，号“霞”。这里，毛泽东使用了杨家人对开慧的称呼。杨开英听了非常亲切。

“霞姐是很坚强的，她为革命而牺牲，死得其所！”杨开英说时，脸上充满了敬意。

接着，两人陷入了沉思。

“友妹，你的病怎样啊？是不是好些了？”还是毛泽东先转开了话题。

“正在治疗，打针吃药，病已好多了”，杨开英答道。

“有病就治，该休息就休息，该住院就住院。大连不方便，你就来北京治疗吧。”毛泽东关切地说：“友妹，你要多保重身体啊！”

杨开英感激地点了点头，说：“主席，您也要保重啊！”

这次来京，在毛泽东的安排下，杨开英留在中南海里，一边治病，一边

休养。稍有空隙，毛泽东便去看她，询问她的病况和生活上的需要，对她的关怀无微不至。可是江青心胸褊狭，嫉妒毛泽东对杨家人的关照，言行之中表现出对杨开英的冷淡。杨开英不愿因她给毛泽东带来难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即要求返回大连。毛泽东挽留她，要她多住些时间，等病彻底治好再走。杨开英说，她离开学校的这段时间，非常想念自己的教学岗位，现在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可以工作了。毛泽东见她执意要走，只好同意，嘱咐她多注意身体，有困难随时来信告知。

返回大连，组织上根据她的身体状况，安排她到大连育英中学教务处任副主任。新的岗位，主要是研究、制订教学计划，组织、协调课程安排，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以及增添和改进校舍、教室、教具等，虽然工作头绪较多，但大大减少了她接触粉笔灰尘的机会，她非常感激组织上的关心，更加努力地工作，同时继续同疾病作斗争。这一时期，因工作太忙，身体不好，她的个人问题也耽搁下来，没有解决。

刚回大连，杨开英给毛泽东写了一信，向他报个平安。之后，她很长时间没有再去信，也没有将调动工作后的新地址告诉毛泽东。她这样做，一方面是不想让毛泽东为她的小事操心，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毛泽东家庭情况的考虑，不想让他为难、烦心。然而，毛泽东长时间得不到她的音讯，反而更牵挂着她。

1956年11月，在长沙市协和裕织布厂任公方代表的毛远翔来北京开会，期间他同在北京工作的兄长毛远耀相约，一起去探望堂叔毛泽东。在毛泽东安排下，12月5日晚8时，毛远耀携夫人胡觉民、儿子毛世美和毛远翔来到中南海。在这次亲人聚会中，大家拉起家常，毛泽东才得知杨开英的情况。12月16日，毛泽东抽空写了一封信：

开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仍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尚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及杨子珍夫妇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收到这封来信，杨开英极为感动。当时，她正处在贫病交加的困境中，毛泽东向她伸出援手，不仅在经济上帮她渡过了难关，而且使她在精神上受到了莫大的慰藉。之后，她仍继续坚持工作，同时积极治病，不久身体渐渐好转起来。

1958年2月，年已43岁的杨开英与化工部橡胶工艺设计院工程师李辉结婚，并调到北京第69中学工作，担任教务主任。来到北京，她立即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的两个好消息。毛泽东很快复信祝贺：

友妹：

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好像是在一九五六年，听了胡觉民同志说你又穷又病，曾付一信，并寄了一点钱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江青有一点病。谢谢你的问候。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并问李同志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日

信中“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问李同志好！”可以说，是毛泽东补送的对杨开英和李辉的新婚祝辞。

杨家的老太太向振熙生于1870年，1960年是她90大寿。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始终记得她的生日，在寿辰来临前，他给杨开英写信，托她置办寿礼。

开英同志：

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

顺致

问候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看到这封信，杨开英再次感受到毛泽东对杨家绵绵不绝的亲情。她高兴兴地为毛泽东办妥了寿礼。

以后，毛泽东还数次写信给杨开英，询问她的情况，尤其关心她的健康问题，每次杨开英回信都说很好，以便让毛泽东放心。

1973年，杨开英因病医治无效，默默离开了她一生钟情的教育岗位，

享年仅 58 岁。

内侄女杨展

杨展是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女儿，1920 年 10 月 26 日生于长沙。从小寄居在长沙西园北里外祖父家。6 岁时在长沙周南女中附小读书，毕业后升入这所中学，任学生会学习部长。

1937 年，杨展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 17 岁。1938 年周南女中建立党支部时，她担任第一任支部书记。办过妇女识字班和夜校。在此期间，她曾与毛泽东直接通信联系。《论持久战》中写到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妥协问题时，提到“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反映情况，这个学生就是杨展。杨展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做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是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好在他们还不去宣传，不然真糟。农民对他们的信仰当然要大些啊！”

上高中时，中共中央在延安号召青年奔赴前线，拯救民族危亡。此时毛泽东也来信，鼓励内侄女杨展去延安。于是她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找徐特立，很快成行。

1938 年底，到延安后，杨展被分配到陕北公学柞邑分校学习。一年后，她在该校高级班结业。1939 年秋，日军企图强渡黄河，从山西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号召延安青年学生“到敌人后方去”，决定陕北公学、工人学校、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由罗瑞卿、成仿吾两位校长率领，组成 8000 多人的队伍向敌后挺进。当时组织上曾要杨展留在学院继续学习，但她却坚持要求上前线。部队渡过黄河后，在晋绥边区进行休整、演习，接着急行军通过封锁线——同蒲路，于 1939 年 9 月到达晋察冀边区阜平县。

联大到达根据地后，杨展在“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研究组”编写教材。学校由阜平迁到河北平山县时，她在政治部组织科和教育科工作，并担任直属队党总支组织委员。1941 年，她被选为华北联大第二届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1941 年秋，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大扫荡。在一次紧急转移中，杨展失足坠崖，身负重伤，因无法抢救，不幸牺牲。

1949 年 8 月 4 日，长沙解放。不久，毛泽东致电杨开智，告之内侄女杨展牺牲的消息。电报说：“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

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

永新贺家

岳父母贺焕文、温图秀

也许是确有其事，也许是在民间茶馆、街头巷尾侃出来的奇闻，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了。大约在 20 年代初，一家名叫“海天春”的茶馆，不火不淡地营生着。“海天春”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小馆，很不起眼：房屋低矮，屋檐下有两根顶梁柱，撑着一个突出街面的骑楼。有一天，外面来了一位身穿长袍、其貌不扬的风水先生，不进门，不喝茶，只是神情专注地围着屋子前后左右绕三圈，然后一言不语地走了。令人费解的是，第二天，这位风水先生又来了，像鬼使神差似的，屋里屋外仔仔细细地踏看了一遍，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别人问他，他还是一声不吭。这下可急坏了店主，经不住店主诚恳地一再询问，风水先生才慢吞吞地道来：“屋舍虽破，两根支柱；不进钱财，就出人才，”店主闻此，如释重负。这位店主，就是贺焕文。

至今，当地的老百姓还能指出贺家茶馆的旧址，至于“风水先生”之说，就众口不一了。但贺家的确出了声名远扬的人才，为当地人民所骄傲。也正因为贺家的英雄儿女中有一位英姿飒爽、敢作敢为的女革命家，与毛泽东有一段姻缘，贺焕文夫妇才成为毛泽东的岳家。

贺焕文祖籍江西省永新县，这是井冈山脚下的一个大县。在县内万源山区的黄竹岭，贺家族是居住这里几代不衰的旺族，拥有很多的田山和房屋。贺焕文出生在富裕的家庭里，从小读书，勤奋学习，成人后被捐为举人，还当过安福县县长。成家时，产业殷实。妻子温图秀，广东梅县人，早年读过四书五经，是个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嫁到贺家后，她勤俭持家，抚养、教育儿女，堪称贤内助。她一共生了一儿三女：长子贺敏学、大女儿贺子珍、二女儿贺怡和小女儿贺先圆。

贺焕文与温图秀的家境曾有过如日中天的气象，但好景不长。贺焕文立志清廉，爱说老实话，办事公道，不会官场溜须拍马，趋炎附势那一套，很快就被撤掉安福县县长职务。回到永新县后，贺焕文在县衙里当了个刑门师爷，专门为打官司的人写状子，得罪了不少有钱有势的人。贺子珍 4 岁那年，他因一场官司受牵连，被县衙门借机关押大牢。温图秀为赎他出来，把家产差不多都变卖光了，从此家道中落。为维持一家生计，夫妻俩把仅有的钱财拼凑起来，在县城南门租了个铺面，开了这家“海天春”茶馆，兼营饭

菜，还有几间房子可以住客，全家则住在茶馆后面。

茶馆属小本经营，在动乱的岁月里，兵匪流氓来往滋扰，不仅生财无望，维持生计都异常艰难。贺焕文夫妇是有文化的人，自然不想让孩子守着茶馆过日子。他们希望长子走文人之路，学有所成，不辱贺家的书香门第。贺焕文先是把私塾先生请到家里，让贺敏学专攻经书，继而又将他送到县城学校读书。大女儿和二女儿到学龄后，也嚷着要读书，贺焕文又将她们送入县城福音堂小学。不料，孩子们并不愿意按照父母期望的路去走，而是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闹学潮，办夜校，当父母的终日里提心吊胆，为孩子们的生命担忧。

开始，贺焕文夫妇并不理解儿女所为，曾动用家法，将他们关“禁闭”，不准他们在乱哄哄的时候外出。两代人的矛盾日益加深。其实，儿女们每当看到父母忧郁的目光，心里也不好受。有一天，贺子珍拉着妹妹贺怡坐到父母身边，细细地同他们讲起国民革命的重要性来。土豪军阀欺压百姓，还用得着女儿多说？他们见到的、听到的比女儿了解的多得多，自己也曾身受其害。从这点上讲，他们也是赞成革命、同情革命的。因此后来当贺敏学兄妹三人开展“募捐打粮”的工作时，他们也自动把茶馆里所存的一部分粮食和银元、首饰捐献出来，算是对儿女们事业的支持。

1927年，贺敏学、贺子珍、贺怡兄妹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永新县成立党的临时县委，这兄妹三人都当选为县委委员，在永新县一时传为美谈，人们称他们是“永新三贺”。

正当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之际，国民党背叛了革命，举起了血腥的屠刀。在永新县，国民党右派夺权后，立即实行大搜捕，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贺家人四处隐蔽。贺焕文与妻子温图秀携女儿贺怡一起逃到邻居家的柴房里，躲了起来。后来逃到吉安清源山一个当和尚的亲戚那里，当起了斋工，掩护女儿贺怡在吉安附近进行地下工作和打游击。永新家中的茶馆被敌人占领，成了军营。贺敏学、贺子珍等为反抗国民党，组织了武装暴动。在他们撤离永新县后，小妹贺先圆被敌人抓获杀害。贺焕文、温图秀听到了这一消息，老泪纵横，悲痛欲绝。

贺怡和毛泽覃结婚后，贺焕文夫妇随女儿到了东固，在女婿毛泽覃领导下的东固区委做勤杂工，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什么都干。后来“左”倾路线的执行人嫌他们成份不好，连这些工作都不让他们干，老两口只得去教书养活自己。

毛泽覃牺牲后，贺焕文夫妇随女儿贺怡来到于都一个红军战士的家中避难，后来又一起来到赣州，贺焕文在江西后方办事处当主任。1938年元月，

贺焕文病逝于赣州河西岗边排的三宝经堂。当时子女一个也没有在身边。项英和杨尚奎拿出 130 元，办了丧事。贺焕文的追悼会在三宝经堂举行，其遗体安葬在岗边排。贺焕文故去以后，温图秀孑然一身，很觉凄苦。组织上把她送到延安，想让她跟着贺子珍过日子。不料，她抵延安时，贺子珍已经去了苏联，是毛泽东照顾她的生活。后来，她病逝在延安，又是毛泽东把她安葬的，还为她立了一块石碑。胡宗南占领延安时，把她的坟挖了。收复延安后，毛泽东出 10 块银元，请老乡重新把她安葬了。

东北解放后贺子珍从苏联回国，了解到父母的不幸，禁不住失声痛哭。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感谢毛泽东对她母亲所做的一切。

妻兄贺敏学

贺敏学出生在书香门第，却丝毫没有沾染文弱书生的习气。倒是江西永新地处山区，莽莽群山，剽悍的民风，熏陶和造就了他山一般的性格：敢作敢当，风雨无畏。他从小喜武不喜文，天不怕地不怕。在兄弟姐妹中，他排行老大。饱读经书、捐为举人的父亲贺焕文，原希望他的长子能子承父业，成为学富五车的读书人。因此，即使家境正处衰落、生计维艰之时，也想设法挤出一笔不小的开支，聘请私塾先生到家授课。不料，儿子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经常逃学罢课，私塾先生只能面对空壁唉声叹气，父亲以为，换个环境，也许儿子会安下心来。继而又把他送进县城官办的学校，但他仍不安分，带头闹起学潮来，竟被学校开除。父亲一气之下，将他连同两个也在上学的妹妹——贺子珍、贺怡一起关了禁闭。

学生时代，贺敏学曾偷偷拜师学武，师傅不让他坐在一条板凳上吃饭，惹得他怒火冲天，一气把饭碗给摔了。一天，几个军阀部队的兵痞来他家开的“海天春”茶馆闹事，他手疾眼快，拿起茶炉上烧得通红的火钳子，就朝兵痞的屁股上捅去，烫得他们抱头鼠窜。

贺敏学在永新禾川中学读书时，是学生领袖，与后来在井冈山“落草”的袁文才是同学。两人曾一起趁着天黑，摸到一个土豪的家里，隔着被子把这个家伙痛打一顿。井冈山时期，两人关系甚笃。

北伐战争开始时，贺敏学入团，1927 年加入了共产党，与两个妹妹一起参加了永新县第一次党员大会。永新县国民党县党部成立后，他担任了商民部部长的职务。1927 年 4 月，永新县成立中共临时县委时，他与两个妹妹同为县委委员。

1927 年 6 月，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夺了权。贺敏学在大逮捕前逃离了

县城，隐藏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准备重新组织武装力量围攻县城。可是消息被走露，他在乡下被捕了。在永新监狱里，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贺敏学任支部书记。他们继续谋划武装暴动并打算联络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一起干。贺敏学把这些意图写在一张薄薄的小纸条上，塞进扇子竹把的空洞里，买通了一个看守，把扇子送了出去。

与此同时，贺子珍也通过小妹贺先圆将准备暴动的口信转到狱里。小先圆不辱使命，完成了送信的任务。但是，在永新县暴动以后，反动派又卷土重来，他们抓不到贺敏学、贺子珍，把一腔怒火发泄到这个不到 10 岁的小姑娘身上，残酷地把贺先圆杀害了。

暴动成功后，以狱中支部为基础，恢复了永新县委，贺敏学任书记。并成立了永新、宁冈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了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贺敏学任总指挥部党委书记，王新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总指挥部决定队伍兵分三路，全部秘密撤出县城，开往井冈山。贺敏学和妹妹贺子珍默默地走在队伍中，与故乡告别。

井冈山地理偏僻，交通不便，消息非常闭塞。贺敏学等 20 多个永新的党员，对外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工作局面开展缓慢，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全靠自己摸索，每个月聚会一两次，交流些听到的山下情况，研究队伍今后的去向。在这段日子，他们心急火燎，如煎如熬。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着队伍来到井冈山，贺敏学赶紧把自己住的八角楼的房子让给毛泽东，并经常去那里与他交换意见，共谋对策。

不久，贺敏学等人在打开宁冈的新城后，接受毛泽东赠给的 7 支枪，回永新重新组织工农赤卫队。他们把先前埋在地下的枪支挖出来，上了九陇山。曾遣散回去的自卫军战士和隐藏起来的共产党员又联络起来，恢复了党组织的活动。贺敏学的队伍，通过这些人，不断吸收新的战士，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武装。从此，九陇山成为永新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很快，永新县委迁到九陇山，毛泽东和贺子珍也来到这里。

1929 年红军大部队曾一度冒进湖南，江西的敌军乘此机会，拼凑兵力，进攻永新，井冈山根据地告急。贺敏学带领自己的赤卫队，跟随毛泽东，动员了几万人投入战斗。他们采取毛泽东倡导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策略，与敌周旋，在附近的宁冈、莲花等几个县全部落入敌手的情况下，保住了永新这块根据地。红四军撤离井冈山后，贺敏学还带领游击纵队配合彭德怀的红五军守山。井冈山失守，他又带领游击队在这一带坚持斗争。后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贺敏学领导的这支队伍改编为第三军的第九师。以后，他担任了红二十四师的代理

长。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时，王明路线的执行人说，贺敏学在军分区当参谋长时，支持过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四首脑”邓、毛、谢、古，以此为理由免去他的职务，把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不让他继续带兵，而把他留在学校当个普通教员。再往后，连让他当教员都不放心，索性什么工作都不让他干了。

红军长征开始后，贺敏学跟着陈毅在赣南打游击。在南雄的一次战斗中，队伍被打散，贺敏学负伤被捕。他设法逃了出来，在一个老乡家里养好伤后，就四出寻找部队的下落。他装扮成补鞋匠，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探听消息。他像一团火，遍地燃烧。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忘不了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他在给地主家看鱼塘时，领导渔民斗倒了地主恶霸。这期间，他先后任中央军委司令部科长、独立第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参谋长、湘粤赣边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等职。国共合作抗日以后，他属陈毅的部下，历任新四军赣南办事处主任、皖南教导大队大队长兼党委书记、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队参谋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参谋处处长兼苏北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联抗司令部参谋长，新四军第一师特务团团团长等职。1945年，贺敏学任苏浙军区参谋长、第三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11月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参谋长。在江西、安徽、江苏一带，同敌军作战。在炮声隆隆的岁月里他与长得文静秀气的新四军女干部李立英结婚，生下女儿贺小平。

贺子珍从苏联回国时，贺敏学正在山东，同重点进攻胶东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师师长。是他的妻子李立英和5岁的女儿贺小平，代表他到哈尔滨去看望贺子珍。李立英为人爽直热情，与贺子珍很谈得来。两人带着孩子朝夕相处，同睡在一张床上，通宵夜话，给贺子珍痛苦的心灵带来了不少的宽慰。

毛泽东接李敏回到自己身边后，贺子珍只身从北方投奔上海，寄宿在哥哥贺敏学（时任华东军区防空军司令员兼政委）家中。1950年，贺敏学与李立英商量，由李立英执笔，以贺子珍和他们二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贺子珍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后来也写信给贺敏学，请他代为照顾贺子珍。贺子珍身体一直不好，虽然上海给她安排单独的住处，但哥嫂俩经常把她接到自己的家中休养，以尽兄嫂之情。后来又常派自己的女儿贺小平到贺子珍身边，让她陪伴照顾这位晚年孤苦凄清的姑妈。

贺敏学调到福州后，担任过福建省副省长的职务。又经常把贺子珍接到福州去住一段。江青得志时，贺敏学曾被一伙歹徒绑架，无理关押了80多天，家也被抄了。放出来后，又被罢了“官”。贺敏学是凭着自己的生死奋

斗，凭着自己的赫赫战功当上领导干部的。在妹妹和妹夫得志时，他没有沾过什么光；妹妹失意时，他却跟着受了不少的罪，甚至影响了自己的“仕”途。对此，他毫无怨言，对贺子珍这个妹妹，始终是一往情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关心和保护她。

粉碎“四人帮”后，贺敏学复出，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4年4月中旬，远在福建的贺敏学接到女儿贺小平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得知贺子珍病情严重，马上偕夫人李立英一起赶到上海，亲自参与护理照料。贺子珍逝世后，他又率李敏夫妇及其子女，坐专机把骨灰亲自送到北京，安放在八宝山公墓，为命运多舛的妹妹尽了兄长的最后一份爱心。

1988年4月26日，贺敏学也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因病在福州逝世。家乡人民把他的骨灰迎放在井冈山上的骨灰堂。

八、毛家二代

长子毛岸英

毛岸英为杨开慧所生，是毛泽东的长子。1922年10月24日生于湖南长沙。谱名毛远仁，曾用名杨永福。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吃百家饭，走万里路

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时，正值建党时期。建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对中国的命运、前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此，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极其紧张地进行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领导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当时的繁忙是难以想象的，毛泽东连结婚之日都未停止外出和工作。这些，都得到了杨开慧的理解和支持。婚后，两人并肩战斗，生活非常美满充实。

1922年初，杨开慧有了身孕。毛泽东闻知后喜上眉梢，工作之余，他常和妻子一起，为下一代编织美好的理想，要让他们看到革命的成功。这年10月，夫妇俩住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到了中旬，杨开慧怀孕已经足月，却迟迟不分娩。毛泽东正忙于领导长沙泥木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他通过泥木工会的先进分子，把6000泥木工人组织起来，同县府、省府的反动统治者进行说理斗争，每天回家很晚。有一天，他见杨开慧愁眉苦脸，就建议她别成天坐在屋里，不妨出去到岳麓山一带转转，或许可以生得快一些。第二天，杨开慧按照这个建议，出去走了一趟。果然第三天，即10月24日，阵痛来临，杨开慧又兴奋又痛苦地来到长沙湘雅医院，在那里生下一个男孩。毛泽东闻讯赶到医院，抱着这个又白又胖的头生子，高兴极了。正巧，那天又是泥木工人大罢工取得实质性胜利的日子，真是双喜临门。“就叫他岸英吧！”毛泽东给孩子起了个卓尔不凡、英武响亮的名字。

毛岸英孕育、诞生于革命的年代，从小过着动荡的生活。早在1922年5月，杨开慧还怀着他的时候，就微腆着肚子，同毛泽东、李立三从长沙途经醴陵，去安源检查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毛岸英出生后，从1岁到5岁，不

停地随父母南来北往，四处奔波，他那幼小的足迹几乎遍及半个中国。

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当时形势十分险恶，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以“过激派”的罪名通缉毛泽东，悬赏几万元，通缉令在大街上四处张贴。毛泽东走后毛岸英也随母亲躲避板仓杨家。11月23日弟弟毛岸青在那里出生。

毛泽东于1923年4月到上海，6月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9月返回长沙。在与家人相聚短暂几个月后，于12月底到上海，1924年1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会后，于2月中旬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此后，毛泽东的行踪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同年6月初，岸英、岸青由母亲和外祖母向振熙带领从长沙到上海，同毛泽东相聚，全家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的石库门房屋7号楼下厢房里。这年冬天，毛泽东因在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繁忙工作中患神经衰弱症，经组织批准，从上海回湖南休养和工作。全家一同前往。

1925年1月中旬，举家由长沙回板仓过春节。2月6日，又一起回到韶山。

毛泽东这次回家乡，本来是养病兼搞一些社会调查的，但他闲不下来，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领导韶山一带党的工作，开展农民运动。这年8月，赵恒惕得到毛泽东组织农民进行“平粜阻禁”斗争密报后，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快兵会同韶山大地主成胥生去逮捕毛泽东。此事被同情和支持革命、当时在县政府担任议员和负责收发的郭麓宾发觉，火速派其侄儿、共产党员郭仕逵送信。毛泽东获悉后，安排好工作和家属，只身乘轿经宁乡道林到九江，再乘船去长沙。岸英、岸青又不得不随母亲到李南村躲避。

9月上旬，毛泽东从长沙动身到广州。到广州后，因身体过度劳累，极其虚弱，住东山医院，进行短期疗养。这年冬天，岸英、岸青也随母亲和外祖母来到广州，全家住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

1926年11月上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到上海，毛岸英又随家人回湖南。

12月，毛泽东由汉口到长沙，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准备系统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全家再次团聚。

1927年的斗争形势更加紧张，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作出“分共”决定，无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惨遭屠杀。这年，毛泽东一家曾在武汉停留，住武昌都府堤41号。直到在汉口开完“八七”紧急会议，毛泽东才秘密把妻子、保姆和岸英、岸青、岸龙（才生不久）安排送到板仓。对于这种动荡不定的家庭生活，毛泽东曾十分感慨地说过：“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

和妈妈一起坐牢

1930年10月的一天凌晨，刚刚8岁的毛岸英在睡梦中被枪托猛烈地撞门声和杂乱地吆喝声惊醒。他睁开眼爬起来，看见妈妈正被提枪的国民党兵从隔壁的一间小屋里推了出来，押着朝外走去。毛岸英急了，冲过去站在妈妈前面，愤怒地大声喊着：“不去不去，我妈妈是好人，哪里也不去！”为首的敌人一把将他拖开，凶狠地说：“好，把你这个小共产党也一起带走！”保姆陈玉英赶紧过去阻挡，也被一起抓走。

在狱中，杨开慧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岸英学妈妈的样，也表现得非常勇敢。

国民党派长沙特务小报《晚晚报》的记者做杨开慧的“工作”。此人假惺惺地对杨开慧的出身、学识赞赏一番并对目前的处境深表同情，自称只要杨开慧“悔过自新”，他可以向何主席（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讲情。杨开慧尖锐地揭露了他的诡计，历数何键在湖南犯下的种种罪行，并严正声明自己为共产党的事业献身、虽死犹生的坚定信念。依在妈妈身旁的毛岸英早就对这人表示出反感、厌恶，在谈话中经常打断他的询问，和妈妈说话，不理他，或者插话骂何键是个大坏蛋。当妈妈偏过脸去，不愿再回答问题时，毛岸英立即把他推到门口，叫他“滚蛋”。特务记者非常尴尬，说了句“毛泽东、杨开慧的儿子从小就这么厉害”，便溜走了。

劝降失败，继之酷刑。有一次，杨开慧被打得皮开肉绽，青布衣上全是鲜血。岸英扶着妈妈躺下，一边流泪一边说：“妈妈，哪里疼？等我长大了，替你报仇！把他们抓起来，打一百下屁股。”听了这番话，杨开慧心里感到极大的安慰。等到伤口疼痛稍许好些，她就给岸英讲故事，教他识字。

在狱中关押了20天后，11月14日上午，杨开慧被反动派杀害，年幼的岸英哭喊着妈妈，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流浪上海

杨开慧英勇就义后，经熟人出面说情、作保，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被释放。国民党反动派为诱捕毛泽东，对板仓杨宅实行了严密监视。鉴于这种危险境况，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民，经请示党组织同意，通过秘密交通，给板仓送去一信，让家人把岸英三兄弟按信上要求送到上海。

1931年初，板仓杨家收到了毛泽民的信，立即作了周密的策划：确定岸英兄弟的舅妈李崇德、外婆向振熙为护送人：为孩子改名换姓，毛岸英改为杨永福，毛岸青改为杨永寿；叫孩子改称舅妈为妈妈，外婆为奶奶；向亲

友筹集路费，弄清去上海的路线，等等。准备妥当后，祖孙三代扮成走亲戚的样子，趁春节前夕特务监视放松时匆匆起程。当时，毛岸英 8 岁，毛岸青 7 岁，毛岸龙才 3 岁多，由板仓农民缪佩秋用手推车推着，送到粤汉线的白水火车站，乘火车去汉口，再改乘船去上海。

这年春节他们是在路上度过的。一家人小心翼翼，不事声张，悄悄赶路。春节后，他们风尘仆仆，疲惫不堪地到达上海。按照毛泽民信中说的接头地点、方法和暗号，找到了我党地下联络点——辣斐德路（现名复兴中路）天生祥酒店。晚上，毛泽民和夫人钱希钧到酒店同他们会面。

毛岸英一见到叔叔，便一头扑进他的怀里，放声痛哭：“妈妈牺牲了，叔叔，你带我去找爸爸！”毛泽民这条硬汉子，这时也忍不住鼻子发酸。他用大手在岸英的头上摸了摸，又去抱抱正在抽泣的岸青和岸龙，泪水忍不住簌簌落下。

不久，毛泽民夫妇亲自把三个孩子安排到上海大同幼稚园，这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互济会主办的。1931 年 4 月，党中央机关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毛泽民不得不离开上海。他按约定在“法国公园”和岸英兄弟告别，再三嘱咐他们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和周围的小朋友搞好团结，并嘱咐岸英照顾好两个弟弟。岸英问叔叔：你们要走很远吗？什么时候再来看我们？你们能见到爸爸吗？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封信，要叔叔交给爸爸。毛泽民一口答应，后来他到江西，将信交给了毛泽东。

不料，年幼的岸龙突患急病，抢救无效而亡。之后，环境不断恶化，1932 年 3 月左右，大同幼稚园被解散，岸英兄弟暂寄养在董健吾家。董健吾是一位以牧师职务为掩护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当时，他和夫人郑兰芳住在我地下党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号（在淮海中路普安里附近）。毛岸英兄弟在他们家时，生活费由党组织按月拨给。大约住了半年，因此处距嵩山路法国捕房较近，不安全，毛岸英兄弟又被送到凤阳路修德里 541 弄 12 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的住处。1932 年下半年，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敌人疯狂地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当黄慧光知道了送来的是毛泽东的孩子，对他们和自己全家的安全非常担心，时刻提心吊胆。曾先后变换过三个住地，从修德里搬到三多里，又从三多里迁到牯岭路斯盛里。

毛岸英兄弟到黄慧光家生活的初期，党组织仍按月提供生活费，董健吾在生活上也给黄慧光一些帮助。后来，董健吾辞去牧师职务，无固定经济来源，已无力再帮助。1933 年初，党中央机关转移到江西瑞金，上海地下党组织又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因此中断了对毛岸英兄弟的生活供给。黄慧光

是一无职业的家庭妇女，身边已有 4 个孩子，加上岸英兄弟，生活极其艰难。只靠她的长子一人的微薄收入难以维持生活，家里的其他人只好给人家洗衣服、扎纸花，得点收入弥补开销。岸英兄弟也帮助扎纸花和干些家务活，减轻家中的困难。这段时间，他们过的是饥寒交迫的生活，吃的不好，穿的是破旧衣服，盖的是破棉絮。

由于生活无着落，岸英兄弟便经常流落街头。岸英、岸青曾在烧饼铺当学徒，挨打挨骂，受尽折磨。逃出店铺后，两人靠卖报纸、拾破烂、拣烟头、帮助推人力车来维持生活。岸英想买一本小学生字典学文化，兄弟俩便下决心勒紧裤带，三个月不吃早饭，才得以买成。这本小字典岸英一直珍藏在自己身边。解放后，有一次看《三毛流浪记》电影时，毛岸英激动地说：“那时我和岸青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和三毛相比，除了偷、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其他几乎都经历过。”

北上苏联

1936 年，上海地下党找到了岸英和岸青。两个流浪儿见到亲人，倾诉着一肚子委屈，伤心地哭了。党组织想尽办法，通过在白区的统战关系，由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将领介绍，趁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带岸英兄弟和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琪一同出国。这年 6 月底，李杜将军一行从上海动身，乘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地中海，于 7 月底到达法国马赛港，然后改乘火车到巴黎，在那里停留了半年，才进入苏联。

1937 年初，岸英、岸青来到莫斯科，开始了新的生活，先后在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和伊万诺夫城的第一国际儿童院等地学习。这时，毛泽东已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38 年，有人从苏联带来了岸英、岸青的照片。毛泽东主席喜出望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禁不住热泪盈眶。不久，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赶紧书写一信：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的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

健康，愉快，进步！

毛泽东
三月四日

事隔一个月，毛泽东又托人捎信，并随带自己的照片。信的一开头就问：早一月给你们信收到没有？收到了，写点回信给我……一种盼儿心切，急不可待之情跃然纸上。

1939年8月26日，毛泽东又有一信：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能满足，不如你们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的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

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此信洋溢着毛泽东获悉儿子进步后的欢快心情，同时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所有留苏小同志们的关怀。

1939年1月21日是列宁逝世纪念日，儿童院在这一天建立了少先队。毛岸英由于在各方面表现出色，被大家选为大队长。也许是小时候坎坷的经历，毛岸英懂事很早，思想、性格相对比较成熟，他不仅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孩子中间威信很高，还善于表达，是个小演说家。当时儿童院每有社会活动或外出演讲，几乎都派他去参加。1940年元旦，周恩来到儿童院看望中国孩子，了解到毛岸英的这一特长，鼓励他把在苏联生活、学习的情况和种种见闻写下来。按照这一要求，毛岸英写了一封长信，周恩来回国后推荐给《新中华报》该报于1940年4月12日作了全文发表，题为《中国儿童在苏联》。信文如下：

我用极大的热情写这封信给你们，述说一下我们在苏联的生活情形及苏联人民对于我们的待遇及对中国人民的热烈的同情。

我于1937年初来到苏联后，真好比到了天堂一般。当我在中国时，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幸福的生活，苏联的人民看待我们比看待自己的儿童还要好，把我们当做上等的贵宾看待，想尽一切

方法使我们的生活能够圆满和快乐。

我和其他的中国儿童住在一起，我们所住的房子真可说是头等的楼房。里面陈设得美丽精致，又宽敞，又清洁。有图书馆、有打球室、有游艺厅、有图画室、有运动厅、有自修室、有电影、有演剧及表演台等；外面则更是雄壮：有足球场、有篮球场、有对球场（排球场）、有网球场，有专门的运动场，有专门的避风雨、避太阳的亭子，有我们自己所种的菜园子，有天然供给我们的游泳、钓鱼、划船的河流等。真是说不尽讲不完。

我们每天三顿大餐和一顿茶点，早饭后有苹果或橘子吃；下午有糖果或饼干等吃。每六、日至少有一次电影看。电影都是有声电影，有关国内战争的，有关于伟大领袖列宁的，有关于破案侦探的，有关于苏联儿童的幸福生活的，有关于苏联国际军事力量的，还有关于中国的 例如：《中国给以反抗》、《英勇的中国》、《中国在斗争中》等等。除此以外，我们还常到戏院里去看戏。

时常有人请我们去作客，而每次则总有我参加（我是二十个中国儿童团员的主席），同时，总是要我去用中国话演讲（致词）。

我记得第一次我用中语致词时，有点讲不出来（发慌），但第二次就好多了，第三次、第四次则更不慌不忙的了。

有一次，内务部的俱乐部在过新年时，请我们去，同时还请西班牙的儿童，西班牙的儿童用西班牙语发了言（另一个则用俄语翻译），当我发言时，差不多每一段话都引起了热烈的鼓掌，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发慌。特别是当我讲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时，说到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得到胜利的时候，更是掌声雷动。

苏联的人民是多么同情我们中国的抗战啊！还有一次，我记得是白俄罗斯果麦儿城（省城）开全城儿童代表大会，（由红色救济会组织）也请我们去。当时只派了我和另外一个中国女孩妮妮去。我们坐在飞快的火车上，不到一天就到了。当我们下了车，一出车站时，只见广场上挤满了人群，儿童团员们排着队迎接我们，还有人送我们鲜花，他们打着旗，吹奏音乐，真好像迎接一位什么大领袖一般。因为人越挤越多，简直走不出去，就是民警帮忙也挤不出去，后来没有办法，只得坐在汽车上冲出去。后面的人群跟着我们的汽车跑。但汽车到底比他们跑得快，他们很快地就追赶不上了。我用手向他们摇动，表示对他们的抱歉与感谢。不一会，我们到了一个大旅馆门口，推门进去，就上楼。此时，市党部书记、市青年

团书记、果麦尔城红色救济会主席、儿童团总队长等都来了，他们询问了我们一些情况问题，我都圆满的答复了。

我们休息在一间很阔气的房间里，特别使我们高兴的，就是听说这房间曾是苏联国防委员长，著名的伏罗希洛夫大元帅及著名的苏联骑兵总司令布将纳（布琼尼）元帅所住过的房间。

晚上 6 点钟时，大会应该开幕了，我们当然也要去。在路上，我们遇见了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政府委员）及果麦儿省教育厅长鲁多妮可娃女士，她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不一会，我们就到了开会的地方，它是果麦儿城的儿童宫，从前是一个地主和王侯伯斯容维奇的住所，现在改为果麦儿城的儿童宫。里面宽大得很，有各种各样的设备，组织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如：航空组、海军组、摄制组、音乐组等。很多儿童在功课完后就到这里来，多么幸福！我们一进会场时，忽然掌声大作，大会的代表们都向我们中国儿童的代表敬礼，热烈的欢迎我们。

掌声静后，就开始选举主席团。第一名就是“贵宾”的我，第二名就是与我同来的妮妮小姐。再就是市党部书记、青年团书记、最高苏维埃代表及教育厅长普鲁多妮可娃女士，以及其他等等。先由果麦儿城红色救济会主席报告。然后就是我用中国语致词（妮妮作翻译），当我们起坐走到讲台时，一阵热烈的掌声真是如雷贯耳。

我说：“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他面对侵略者日寇的斗争中，是要胜利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尤其是伟大的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帮助，使中国人民更有多倍的力量和勇气，更能很快的战胜日寇。苏联是中国人民最忠实、最好的朋友！”当我讲完后，一阵热烈的大鼓掌，真有可能把屋顶震破。掌声稍静后，红色救济会主席忽用粗高的声音喊道：“与日寇斗争的伟大中国人民万岁！”恰巧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也在那里高呼口号：“英勇的中国人民万岁！”两个一起喊，使着劲，弄得很是有趣。“我们亲爱的斯大林同志万岁！”下面又有人在那里喊。“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又是一个有力而雄壮的呼唤。

次日，我又被请到马克思学校、斯大林学校及铁道工人子弟学校去演讲。每一次都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中国人民万岁”、“伟大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万岁”、“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的！”等等雄壮的口号，每次都使我感到无限的兴奋和说不出的感觉。我想不仅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就是全中国人民（除汉奸、托洛茨基匪

徒们），全中国的儿童看到苏联的人民、苏联的儿童，这么热忱的欢迎中国儿童，这么衷心的同情中国的抗战，也一定感到非常兴奋和欢喜的。

在苏联，每份报纸上，每天都有一大篇关于中国的消息。战情和游击队的活动消息，每天都有。常有关于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所表示的英勇战绩的登载，常有苏联记者的通讯，有关于中国的各种论文。除此以外，还常登载中国抗战的各种照片。中国军队若得到了什么新胜利，苏联的报纸总是用注目的大字标题登载。同时，蒋委员长的演讲、李宗仁、陈诚等名人的谈话等，也总是用大字标题写着。

总之，苏联的报纸在精神上，对于中国的抗战是具有极大的同情和帮助。对于日寇则恰恰相反，不是登着“日军的进攻遭受完全破产”，就是写着“日寇后防的不安”、“日本的经济崩溃和物价的高涨”、“日军受了大损失”等等。在最后一个时期，除了日军的每天损失外，在每半个月内，差不多都有一个日军的损失统计，两万，三万，三万五千，四万……死的真是不少。

除了报纸，苏联的各种杂志周刊上也常有关于英勇的中国人民斗争的速写文章，同时，还有许多在精神上帮助中国抗战的标语图画。例如，有一张标语图画上，画着一个中国士兵用刺刀刺着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爬不动的日寇，并用红字写着：“与日寇作斗争的中国人民万岁！”除此以外，苏联的无线电每天总要播四次最后新闻，早上七点钟及晚上十一点半，差不多总是有中国战情的广播报告。其他的中国消息，则大都在十二点、六点钟专报。我差不多每天早上七点钟都去听的。

若在过什么大节时，例如十月革命和“五一”节，苏联的无线电更是在精神上同情中国的抗战，有时还要请中国人去广播演讲，或是从重庆接电话过来，再广播全国。总之，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具有极大的同情的；同时，我想中国人民对于苏联人民也一定是这样的。

我现在俄国学校里学习。我要百倍、千倍地完成我的学习。我很注重于政治和军事，想成为一个很好的宣传家，并且愿意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家，以便将来为伟大的新中国的事业而奋斗。我坚决的相信，在抗战胜利以后，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中国一定会被建设成一个先进的、自由的、幸福的强国。在那个时候，中国将享受自由与平等的生活，中国的儿童将得到免费学习的权利，将不再过那种

贫苦的生活，那时啊，中国是伟大的、强大的、民主的中国了！

亲爱的祖国同胞，信已经写得很长了，不可再往下写了，再会吧！若有机会，将来还可以写信给你们，但我也希望你们写封信给我及全体的我们。我以极大的热情等待着你们的信。最后，向坚决领导全中国抗战的民族英雄蒋委员长、英明的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领导者——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以及全中国的英勇抗战的将士致以最热烈的敬礼！同时，也向全中国的儿童——未来新中国的主人翁致最亲切的兄弟的敬礼。

在这封信里，毛岸英除了赞美他们在苏联的幸福生活外，还以火一样的激情讴歌中国的抗日战争，表达了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向往，这对一个置身安宁、开心的环境中的少年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毛泽东看了这封信，深受感动，为儿子的出息而骄傲。同时，尽管信的语言表达还带有不少稚气，但总的来说比较流畅，这毕竟是一个失学多年、脱离苦难不久的孩子写出来的，作为父亲，他不能不为岸英的进步之快感到惊讶和高兴。

进步之时力戒骄傲，毛泽东对孩子们的成长看得很远很深。1941年1月31日，他给岸英、岸青写了一封较长的信，对他们的学习和发展方向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说：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不起你们，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青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

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为了让这些革命后代学到更多的知识，毛泽东几次托人买书，在戎马倥偬、炮火纷飞的境况下送往苏联。1939年，他寄了一批书，遗憾的是中途遗失了。这次他又亲自挑选了21种书共60本，既有哲、经、史书，又有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他随信附了一张书单：“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传奇1、峨嵋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并注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

这些书具有知识性、趣味性等特点，符合青少年的口味，岸英等收到后争相传看，爱不释手。

参加苏军大反攻

自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悍然向苏联发动闪电战以来，毛岸英十分关心战争的发展。每天，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广播，然后回到房间里，在世界地图上作出红白标记。这时，毛岸英担任国际儿童院共青团支部书记和伊万诺夫市列宁区团区委委员，为配合战争这个中心任务而开展工作。

这年冬末，联共（布）中央提出建议，希望16岁以上的外国公民加入苏联国籍。毛岸英那年已是个19周岁的小伙子了。学校的老师建议他加入苏联国籍。毛岸英不愿意，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们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国去，如果加入苏联国籍就不方便了。”但这并不表明他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愿意为苏联人民的独立和自由而献身。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他用流利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最高统帅部

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

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领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致

革命敬礼！

谢廖沙

一九四二年五月于伊万诺夫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信发出 10 天后无音讯，他又写了第二、第三封信，都石沉大海。正当他万般焦急之时，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曼努意尔斯基将军来了。毛岸英因同他有过一面之交，就主动缠住他，最后将军同意他进学校学军事。毛岸英先后来到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校学习，并于 1943 年 1 月加入联共（布）党（1946 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军校毕业后，毛岸英获得中尉军衔，被任命为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了苏军大反攻，他头戴坦克手的帽子，胸前挂着报话机，半身探出坦克之外，千里长驱，英勇作战，穿越了波兰等好几个东欧国家。在枪林弹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他冲锋陷阵，九死一生。德国法西斯投降后，他披着硝烟，胜利凯旋而归。为了永远的纪念，在毛岸英回国前夕，斯大林接见了 他，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他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最高奖。

上“劳动大学”

1946 年 1 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回到日夜思念的父亲身边。自从离开父亲，已近 19 年了。1927 年 8 月，父亲告别妻儿，去领导秋收起义时，岸英只有 5 岁。而今，他已是一个生气勃勃、伟岸英俊的青年人了。

在延安清凉山麓的王家坪，毛泽东仔细地询问岸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又问他读过哪些中国的书。然后，抬头遥望延河那边的凤凰山上正在开荒的人群，意味深长地对岸英说：

“岸英，你在苏联长大，国内的生活不熟悉，你在苏联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

听到这里，岸英已经领会了父亲的意思，便接着说：

“是的，我离开中国这么久，在苏联大多过的是学校生活，中国农村我不知道，也不会种田，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毛泽东接着给儿子讲了孔夫子的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会种田

吗？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学生又问：会种菜吗？孔子说：我不如老圃。

“你在莫斯科睡得那么好，一人一个床，到了延安，就是炕上摊床褥子，底下烧火，不要怕；老百姓有虱子呀，不要怕，有水就多洗一洗，没水，就用手多捉几个。”讲到这里毛泽东也笑了，又说：

“过些时候，我替你找个校长，住劳动大学去。”

一天，毛泽东给岸英介绍一位劳动模范，指着他对毛岸英说：

“这就是校长，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哩！”又指着岸英对劳模说：“我现在给你送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

劳模有些惶恐地说：“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

毛泽东谦虚地说：

“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你知道的我还不知道。他还是娃娃，我就拜托给你，你要教他嘛，告诉他，庄稼怎么种出来的，怎么多打粮食。”

劳模信心十足地说：“那我行。”

“好吧，就这样说定了，过几天就来。”

吴家枣园在延安城南 15 里，出发那天一早，岸英就起床收拾行装。

这时，毛泽东走过来，把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衣披在岸英身上。岸英脱去大皮鞋，换上爸爸送他的旧皮鞋，背包里捆了一斗小米和几斤菜子、瓜子，从窑洞里走了出来。

毛泽东送了他一程，语重心长地说：

“岸英，你要和老乡们一同吃、一同住、一同劳动，从开荒一直到收割后再回来，等你劳动大学毕业了，再上‘延安大学’好不好？”

“好。”岸英爽朗地回答。

50 多天后，因胡宗南要进犯延安，形势紧张，村长便把毛岸英送回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仔细地打量：岸英头上用白羊肚毛巾扎着英雄结，穿着灰土布汗褂子，两条又粗又黑的胳膊很有力量，脸上黝黑黝黑，跟陕北青年农民一个样。

毛泽东风趣地说：“好呀，白胖子成了黑胖子！”

村长赞不绝口地说：“岸英是个好后生，他学会了驮粪、刨地、犁地、播种这些庄稼活儿，还利用业余时间组织村里的青年人学文化、学政治。上山劳动回来，还总要捎回一捆柴，送给军烈属。岸英在劳动大学毕业啦。”

毛泽东摸了摸儿子的双手，一层厚厚的茧子。

“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毛泽东满意地说。

学习要有决心与恒心

在“劳动大学”里，毛岸英初步了解了中国农村的现状、农民的感情和生活方式，懂得了土地、劳动、收获对于生命的意义，他忽然明白了回国后补上这一课的重要性，明白了父亲的一片苦心。

从劳动大学回来，毛岸英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为尽快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以适应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毛岸英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准备系统地学习哲学、马列著作、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他下定决心，要完成这个计划。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

.....不仅有了决心，而且要有恒心。决心与恒心一旦结合在一起，会生出惊人的力量。我自己过去就有这个经验：光有决心是不够的，没有恒心作为后盾的决心实际上成为最要不得的‘五分钟热度’，但在没有决心之前，是谈不到什么恒心的。决心是第一步，是事情的开始，恒心是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是事情的发展，一直得到结果为止。

毛岸英这样说，也这样做。他每天坚持读书做笔记，有问题虚心向别人请教。一到夜晚便钻进窑洞里，请中宣部的同志给他讲解历史和疑难问题。1946年11月，毛岸英随中宣部从延安撤退到瓦窑堡一带后，就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和学习心得写信告诉父亲。12月26日是毛泽东53岁生日，父亲从延安回了一信。

岸英儿：

来信两封收到。第二封信写得很好，这表示较之你初回国时不但文字有进步，思想品质也有进步。你的那些工作是好的。坚持读文章计划，很有必要，再读一年也是好的。我身体比你走时更好些了，江青、李讷都如常。

祝你进步！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947年毛岸英在参加土改期间，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并随时向父亲汇报思想。这年9月12日，毛泽东回信说：

岸英儿：

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10月8日，毛泽东又写一信：

岸英：

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的，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毛泽东对岸英的教育培养是有针对性的，一是要他多了解中国国情，不脱离实际；二是侧重思想品格的锻炼和提高，而不干涉他的兴趣爱好。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阐述了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品格的重要性，毛岸英一直铭记在心。1984年，刘松林（思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此，岸英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学习中，一直遵循着父亲对他的这一宝贵教导。岸英非常珍惜它，在他牺牲后，我在他的日记和几本笔记的扉页上都看见过他对这一段话的摘录。这一教导已经成了他的座右铭。1949年5月，北平和平解放不久，父亲住在北京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就在绿树成荫，和风煦煦，水波荡漾的

双清池畔，岸英和我再一次聆听了父亲这一教导。当时的情景现仍历历在目：父亲笑容可掬，语重心长，意深情切；岸英双眼熠熠闪光，聚精会神地聆听指教。我还记得，小鸟就在旁边的绿树丛中婉转啾鸣，池中红色的小鲤鱼也游上了水面，在我们的脚畔悠然地漂浮着，轻轻地摆着小尾巴，仿佛也在那里侧耳细听。后来岸英对我说：“爸爸的这一教导，应该成为我们这一辈子的座右铭。”

1948年5月，毛泽东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岸英在土改工作团完成任务后，也回到西柏坡，回到父亲身边，在中宣部担任编辑助理。

毛岸英在刻苦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理论修养的同时，还利用自己留苏10年掌握的流利娴熟的俄语，和著名马列主义翻译家曹靖华一起，翻译了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以及《苏联国民经济领导研究提纲》，协助曹靖华翻译了列宁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积极介绍、宣传马列主义。同时，他还做了一些国内外大事记的摘抄，供中央负责同志参考。

他不分日夜地读书学习，埋头苦干，做了很多工作，然而，他是个永不满足的人。

后来，他在给外婆和舅舅的信中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更有一层使自己万分痛苦的，就是这几年来大不长进了。今后当努力奋发，不辜负生者，对得起死者才好！”

参 加 土 改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3月26日，党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工作。中央工委的任务之一，是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毛岸英是学军事的，在苏联受过正规军事院校的严格训练，他很想留在陕北，参加军事作战。但是，毛泽东为了让他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中得到锻炼，更加深入地接触农村，要他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

虽然心里不太愿意，毛岸英还是服从了父亲也是组织上的决定。这年4月，他告别父亲，东渡黄河，来到山西临县郝家坡。

在那里，他耳闻目睹了大量的残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封建地主、乡绅恶霸和土匪团丁勾结起来，占有大量土地，利用地租、高利贷等手段，残酷剥削农民，农民普遍缺穿少吃。毛岸英曾到过过一个长工家里，见其家徒四壁，锅碗瓢空，孤身一人患着重病，躺在炕上，奄奄一息。但是，农民如果起来反抗，封建阶级便残酷镇压。郝家坡村的大地主就有血债，曾杀死4条

人命。

工作队进村后，许多农民顾虑重重，不敢揭发地主。第一次斗争会开得冷冷清清。毛岸英和工作队的同志们做了大量工作，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宣传党的土改方针政策，终于把群众发动起来，斗倒了地主。广大农民通过这场斗争，翻了身，分到了土地，过上了新的生活。

随着土改工作经验的积累，毛岸英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思想更加成熟了。这年6月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我在郝家坡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中，学得了如下东西：（一）最重要的一点，认清了自己所站的无产阶级立场。（二）群众路线就是阶级路线加上民主作风。（三）不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掀起到最高程度，是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四）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干部便必然变坏，必然会站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哪怕这干部在未当干部时成份是很好的，人也是很好的。

此时，毛岸英对父亲叫他参加土改工作的事已想通了，他不仅由被动转为主动，而且还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掌握了开展土改工作的基本方法。他由衷地感谢父亲给了他一次这样宝贵的学习机会。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我来到郝家坡才两个月，已深刻感觉到自己长大了不少，土地改革中学习两个月所得的东西，要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

1947年8月，毛岸英离开土改工作团，去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工作会议。

会议于1947年7月至9月举行。9月13日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毛岸英到达西柏坡时，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已开过一半，他到会列席旁听。会上正在交流各地土改试点的经验。在分组讨论时，他也介绍了郝家坡土改的经验教训。

会下，毛岸英根据自己的独特感受，在笔记本上写了一首题为《鞋下一层土》的顺口溜：

斯大林把那人民比如土

离土必死近土生。
这句话早已响如鼓，
却只到今天才搞清！
郝家坡土改两个月，
人问我最贵何所得？
是不是金，是不是银，
是不是地位和美名？
我说一样也不是，
却是那鞋下一层土！
回想以前真可怜，
不上不下半空间，
指手画脚满自足，
拉屎拉尿要人牵！
如今巴上了真正的土，
脚踏实地把步数，
快死的人重新生，
恩人就是那土一层！
这一层土要宝贵，
只能有加决无减，
加了，我的寿加倍，
减了，生命就危险！
希腊的安泰可为例，
脚一离地气便息！
因为人少把夫拉，
我也当了编辑部的差，
要我找人多拉扯，
根据拉扯的把材料写！
这样一来我深感到，
没有土底子可不得了，
用不上谈，更说不上写，
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
幸亏郝家坡的那一层土，
从万难之中把我救出，
但困难仍是许许多多，

那土层子还是太稀薄，
今后的方针很明白，
下乡去搞土地改革，
永不离群众，永不离土，
埋头苦干把力努！
但望我那鞋下之土层层加，
但望群众真正变成我亲妈妈，
步步登高据此而来，
幸福的大门由此而开！！

毛岸英写好这首诗，重看一遍。觉得最后第 5 行的“毛子之名方不可辜负！”这一句不妥，有点沽名钓誉的味道，便一笔将它涂掉，换上“埋头苦干把力努！”

这首朴实无华的诗，叙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否则有死无生。这恐怕是毛岸英参加土改工作的最大收获了！

开完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毛岸英参加了冀中土改工作团，来到河北阜平。几天后又改变行程，去山东渤海地区，在阳信县搞土改。

1948 年 4 月 22 日，我西北解放军收复延安。毛岸英听到此讯后心情异常激动，他多么想去看看父亲，与父亲分享这胜利的快乐呵！正当他翘首西望时，毛泽东已离开陕北，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同他靠近了。在乘胜进军中给他写了信：

岸英儿：

我们到了石家庄。岸青有信给你，是俄文，原文临行掉了，兹将译文附上。

祝你工作顺利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年 5 月，毛泽东到了西柏坡。随后，毛岸英完成了土改工作团的任务，也赶到那里，和父亲相聚了。

与刘松林结婚

毛岸英在苏联留学期间，曾有过一段恋爱史。恋人是同班同学，巴西共

产党总书记的侄女，俄国名字叫叶琳娜。叶琳娜是一个天生丽质、热情奔放的姑娘，毛岸英则比较含蓄深沉。由于两人性格差异较大，文化背景不同，再加上都愿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战斗，最后不得不忍痛分手。

1946年1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快到24岁了，在当时也算大龄青年。江青见毛泽东非常喜爱这个长子，也想同他搞好关系。但是，她虽然比毛岸英大一辈，年龄却只比他大8岁，而且以前从未见面，相互之间很生疏。为了主动接近他，江青想到了毛岸英的婚事，开始为他搜寻目标。不久，她发现“抗大”有位北平来的女学生，姓傅，长得美丽出众，心中暗自高兴。她决定当回“红娘”，引线搭桥。一个星期天，江青把毛岸英和傅小姐都约到她那里，吃饭聊天，高高兴兴玩了一天。

傅小姐走后，江青问岸英：“你都二十三四了，该找对象了。你看傅姑娘怎么样？”

毛岸英脸红了。延安不比大城市，像傅小姐这么漂亮的确不容易见到。片刻，毛岸英喃喃着问：“我爸有这个意思吗？”

“只要你同意，他那里我说一声准行。”江青信心十足，兴冲冲地去向毛泽东说。不料，毛泽东却摇头：“见一面就定终身，也太轻率了吧？孩子年轻沉不住气，你也沉不住气？你叫岸英来。”

江青并不甘心，给毛岸英鼓气：“你爸叫你呢，现在可就看你的态度了。”

毛岸英来见父亲，红着脸表态：“我觉得人还挺不错……”

毛泽东笑了，不失幽默地说：“不漂亮不聪明你也不会动心，这一条我理解。可是，见了漂亮的就都动心，这一条我就不敢理解你了。”

毛岸英低头不语。

毛泽东换上严肃的口吻：“除了漂亮，你还了解她什么？理想、品德、性格，你了解吗？她刚从北平来，我们都不了解。婚姻对你来讲，既是婚姻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一定要慎重，不能轻率从事。”

果然应了毛泽东说的，江青只是一头热，傅小姐根本看不上前程未卜的毛泽东一家，也受不了延安的艰苦生活，跑回北平，并且在报纸上写文章辱骂延安。

毛泽东说：“看来漂亮靠不住，还得靠理想哟。”

江青“桥”没搭成，却挨了毛泽东的一通批评。其实，毛泽东也在悄悄地关心儿子的婚事。他十分慎重，留意合适人选，并设法为孩子提供接触的机会。刘松林从新疆回到延安，毛泽东见了她，觉得她各方面的条件都不

错，经常叫她来家里玩。结果，毛岸英一见她，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8年，毛岸英和刘松林在西柏坡确定了关系，打算结婚。毛泽东非常高兴，但考虑到刘松林年龄稍小，正在学习，建议婚事后拖。毛岸英不太愿意，经父亲批评后也同意了。

1949年9月，是喜气洋洋的日子，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新中国即将成立。这时，毛岸英和刘松林也在筹备自己的喜事。毛岸英去征求父亲的意见。

“我同意 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呀？”毛泽东心情特别高兴。

毛岸英说：“我们商量了，越简单越好。我们都有随身的衣服，也有现成的被褥，不用花钱买东西。”

毛泽东更高兴了。“这是喜上加喜 应该艰苦朴素。”他接着又说：“你们的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呀，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你跟思齐（即刘松林）的妈妈说说，现在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她想请谁来都可以 来吃顿饭。”

毛岸英回去和刘松林商量，写了一份请客名单，毛泽东看过，又作了一些补充。

1949年10月15日，婚礼在中南海举行。毛岸英穿的是在外事场合当翻译的工作服。刘松林身着灯芯绒布新上衣，脚穿新买的方口布鞋，裤子是半新的。晚上七八点钟，周恩来，邓颖超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陆续来到菊香书房的西房里，并带来了一些小小的纪念品。蔡畅和康克清送的是一对枕头套。大家欢聚在一起，非常高兴，都夸岸英和思齐是一对好夫妻，祝他俩婚姻美满，白头到老。又说毛泽东有一个好儿媳，并向毛泽东祝贺。

毛泽东举杯走到刘松林母亲张文秋的面前，说：“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我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为你的健康干杯。”

张文秋说：“谢谢主席在百忙之中为孩子们婚事操心。思齐和岸英结婚，这是他们的幸福，也是我的幸福。思齐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批评指教。”

席间 毛泽东一边把湖南风味的腊肉、腊鱼、辣椒往徐特立、谢觉哉等老人碗里夹，一边说：“孩子的婚事没有要我操心，也没买这买那。吃了饭，请你们到他们的新屋里去看看。”

饭后，毛岸英和刘松林临行前，毛泽东拿出一件黑色夹大衣，这是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穿的。他风趣地笑着说：“我没有什么贵重礼品送给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上，你们俩都有份。”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大家来到新房里，那是机关宿舍的一个普通房间，门上贴着大红囍字，房里主要的用品就是一张木板床，上面有两条被子，其中一条是刘松林作为嫁妆带过来的。

这就是毛泽东长子的婚礼：比一般百姓更为简单、朴素。

向死神挑战

1949年，是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我军势如破竹，乘胜追击，捷报频传。当共和国的旗帜将要升起时刻，毛岸英却在同死神打交道。

这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天，毛岸英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要他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首批进入北平，迅速排除市内残留的地雷、炸药、手榴弹，以保证水电通畅、变压器安全、房屋和桥梁坚固完好。毛岸英立即执行，冒着生命危险，和官兵们一起日以继夜紧张地工作着，顺利地排除了多处险情。3月24日，正准备吃晚饭的毛岸英接到电话，得知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进城，第一站是到颐和园休息，并在景福阁宴请各民主党派人士。电话命令他们火速赶到颐和园，消除各种危险因素。毛岸英和大伙没有休息，又投入了这场紧张的战斗，他们干了整整一夜，到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才刚刚把室内检查完毕。室外光顺着围墙走一圈就有18公里，加上围墙外还有遗留的地堡、火力点等，而时间却只剩下大半天了！一位老刘同志向毛岸英建议说：“这样吧，我们分成5人一组，胳膊挽着胳膊，划分方向，顺着大大小小的道路走一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毛岸英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个建议，他也和4名战士手挽手，向死神冲去……

当他们踏完所有的路，在颐和园大门口汇合时，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一行的车队已经开来。毛岸英疲惫的脸上绽开笑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同年4月23日，毛岸英又和扫雷专家一起，跟着陈毅、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进入南京。5月27日，又进入上海。

毛岸英在连续寻找险情，接近险情的肉搏战中，无数次地驱走了死神，而没被死神吞噬。他神奇般地活着走了出来。上海任务完成后，他被调回北平，在中央机关担任秘书工作。

坚持原则 不徇私情

革命成功以后，毛泽东的许多亲朋故旧纷纷来信、上访，要求为他们介绍来京，参加工作，获取美差。对于这类事，凡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党的原则、政策和纪律的，毛泽东一概拒绝，并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帮助，绝不徇私情。

毛岸英以父亲为榜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党纪，不为他人开方便之门。如果说，在毛泽东那里行不通的事，走他的门子，也同样行不通。

建国之初，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希望毛泽东发话，为他在长沙谋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毛泽东回信予以拒绝。

与此同时，毛岸英也得到了类似的“托情”，他也拒绝了。在给舅父杨开智的信中，他首先阐释了共产党人对待亲属的态度：

反动派常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引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然后，明确反对舅父的旧思想，回绝他的要求。他这样写道：

新的时代，这种进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决不能也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

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在毛泽东父子的批评帮助下，杨开智放弃了不正当的要求，安心听从湖南省委的分配，愉快地接受适合于自己专长的农业工作，并且在以后的工作中取得了成就。

对于亲友合理的要求，毛岸英是乐于帮助的。但他坚持通过正当的途径，不超出原则的范围。1950年，曾经照料过毛泽东一家的生活、并随杨开慧和毛岸英蹲过监狱的保姆孙嫂（陈玉英），向毛岸英反映自己家庭的生活困难，要求照顾。毛岸英如实地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她的历史和现状，请组织适当予以解决。事成之后，孙嫂去信，感谢岸英。这年8月19日，岸英复她一信，写道：

孙嫂：

你的信我前天才看到，这是因为我自你们那里返回北京后，马上又被公家派到别处去了，前天才回来。

你在信中感谢我照顾你，这我决不敢当，我对你并没有丝毫特殊，组织上对你照顾是把你当作对革命有一定功劳的人看待的。这是你二十几年前在敌人威吓面前，在敌人监狱中挨骂挨打，坚定不屈的应有代价，这是你的光荣，但你千万不要以此而自高自大，这也要那也要，若如此，那就会把你自己的光荣历史污辱了。我想你不会这样的，你将仍是一个老实的，朴素的，对众人好的，为众人做事的，因而为众人所尊敬的孙嫂……

这里，人们可以看出，毛岸英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对于被照顾的孙嫂也很严，要她摆正关系。他还提醒孙嫂，要约束自己，注意影响，保持进步。信接着写道：

你的身体千万也要注意，同时又要好好在自己岗位上工作，不要使人觉得解放后，你似乎有了“后台”就不听话了，不好好工作了，这是不对的。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以此而光荣，但因此我们永远应当是世界上最忠实、最纯洁、最勤劳、最朴素、最刚强而又善良的人们，望你永远不失这种伟大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保持这种伟大的优良品质。

落款之后，毛岸英又补上一句：

岸青问你好 我父亲也问候你 并望你决不退步 跟着大众前进！

这封信，写得有原则有感情，充分反映了毛岸英的心灵是纯洁、无私和高尚的。

投身工业建设

近百年来，由于封建统治者腐败挥霍、外国列强鲸吞蚕食、反动军阀混战争雄，古老的中国已经江山破碎，满目疮痍，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华夏子孙被看做是贫穷、软弱、不文明的象征。

近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都对此痛心疾首，奋力抗争，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国富民强的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近百年来的梦想开始变成了现实。开国之初，党就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场亿万人民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彻底摆脱贫困、建设一个文明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战斗打响了。对于这场新的进军，毛岸英心情异常激动。为了能直接参加建设工作，他向组织和父亲提出下基层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他来到了北京机器总厂，任党委副书记。毛岸英做过学生，当过兵，务过农，就是没有学过工。于是，他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大干一场。这个计划，在他给好友蔡博（蔡和森之子）的信中这样记载：

.....我现在任北京机器总厂党的副书记，工作的内容要比过去机关工作不知丰富多少倍，缺点是我不懂技术。但我已下决心并开始学习技术.....从工具机，动力机，《技工理化》，《工艺数学》，《机械制图》学起。

工厂的人数比起鞍钢来是少得可怜，但它的前途是无限的，如果党不调动我的话，我准备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随着它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搞出一套完整的工厂中党的工作经验来.....

在这封信中，他还计划利用业余时间，广收全国各地老百姓的俗语、成语、格言等，将来编一本华俄或俄华俗语、成语、格言对照辞典，请蔡博帮

他收集。

遗憾的是，这些计划没来得及实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成功，10月初已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为了支援朝鲜人民，打败侵略者，同时为国内建设创造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他放下了手中的计划，毅然报名参军，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忠骨葬邻邦

朝鲜桧仓烈士陵园。

一阵清风掠过，松涛声起，沙沙作响。之后，一切又恢复静谧肃穆。毛岸英在这里永久地安息、长眠。

墓前鲜花束束，朝鲜人民常来这里扫墓。少先队员面对墓碑，向烈士宣誓……洁白的衬衫上飘动着鲜艳的红领巾，天真稚气的脸庞就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谁能说他们不是烈士的鲜血浇灌而成？年轻的姑娘，身穿白色的长裙，胸前系着粉色的飘带，纯洁温柔的目光抚摸着坚硬的石碑，安慰着一颗颗在天之灵。鬓发斑白的老人，或者蹒跚于树下，或者无言地肃立在墓旁，回首那硝烟弥漫的往事。一位阿妈妮，抱着毛岸英的墓碑，老泪纵横，喃喃自语：多好的孩子啊！这轻声絮语，清晰可辨，缕缕丝丝，不绝于耳。霎时，传遍了整个陵园。人们不由地聚集过来，抽泣声汇成一片。悲痛震动了空气，于是松涛又起，久久不息……

1950年10月15日，毛岸英随志愿军总部从鸭绿江北岸隐蔽渡江，进入朝鲜，开始了他人生路上的最后一程。

出国前，许多同志得知他报名，出于好心，不同意他去，但他决心已定，泰山难移。“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毛岸英耳边时常响起父亲的话。当然，他明白，他将面临的是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敌人气焰嚣张，武器精良，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空前，随时都有捐身沙场的可能。他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志愿军总部，毛岸英担任俄语翻译兼作战室机要秘书，分管收发电报和整理会议记录。他拼命工作，争分夺秒，为保证总部指挥的快节奏运行尽了自己的力量。

1950年11月5日，我志愿军在彭总的指挥下，胜利地结束了第一战役。这期间，毛岸英和作战室的战友一起，极其紧张地工作着，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时隔20天，即11月25日，第二战役打响了。这天上午11点左右，4架美军轰炸机嗡嗡震响着，掠过志愿军总部的上空，向北飞去。作战室的军

人对敌机的频繁来去早已习惯，仍旧不停地工作。为防万一，他们只是把彭总拉进防空洞里。可是一眨眼，敌机突然又从北边飞回来，迅疾到达作战室的上空，狂猛地倾泻了上百颗凝固汽油弹。这时，毛岸英已忙了一上午，刚登记、发完有三个 A 字的加急电报，炸弹就落下来了。一时间，大地震动，屋顶掀开，气浪横冲直撞，熊熊烈焰奔腾涌起，毛岸英和另一位参谋高瑞欣被陷于一片火海，壮烈牺牲。

志愿军总部沉浸在一片肃穆中，彭总抓起笔杆，悲痛万分地写着：今天，志愿军司令部遭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他把电报递给值班参谋：“马上发，报告毛主席。”

电报传到北京，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拿在手里，感到重如千斤。他不敢直陈毛泽东，先向周恩来和江青报告。经研究，他们决定先不告诉毛泽东。但此事又不能久瞒他。

一天，毛泽东去新六所一号楼休息，叶子龙和江青向他作了报告。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先是一怔，看着叶子龙和江青，沉默不语。良久，才点燃一支烟，使劲抽起来。抽完一支又接一支，叹息了一句：“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说完又燃一支烟。

不久，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顺便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他心情沉重地说：“主席，我没有保护好岸英，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毛泽东点燃了香烟，抽着，听着，默默无语，有时还闭上了眼睛，然后抬起头来，缓慢顿挫地说道：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听了这番话，彭德怀为毛泽东的豁达、气魄所深深感动。

1954 年 12 月，志愿军总部发电军委总干部部，询问如何安置毛岸英的尸骨问题。总干部部起草了复电，要求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送交彭德怀审批。彭德怀此时在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委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觉得这样做不妥。24 日，他写信给周恩来，提出：“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刊牌，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理一处（两人同时牺牲于大榆洞），似此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

周恩来接到此信后，征得毛泽东的同意，第二天就在信上批示道：“同意

彭的意见，请告总干部部另拟复电。”同时，将彭德怀的信转送刘少奇、邓小平阅。

于是，在朝鲜平安道桧仓郡的志愿军烈士陵园里，增修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三尺高的花岗岩石碑，背面刻着：

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一九五〇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的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碑的正面刻着七个大字：

毛岸英同志之墓

儿媳 刘松林

刘松林是刘谦初和张文秋的女儿，1930年3月2日生于上海。原名刘思齐。1949年10月15日与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毛岸英牺牲12年后，1962年2月与杨茂之结婚。

酸甜苦辣的幼年

微风吹过，细雨落地，柏油马路两旁的梧桐树一夜之间换上了新装。当金色的阳光透过枝叶，把地面画得斑驳陆离的时候，在上海红十字医院里，随着一声嘹亮的啼哭，一个女孩出生了。她，就是刘松林。

刘松林还没来到人世间就有了自己的名字“思齐”。这是他父亲刘谦初预先起好的。然而，当她能够用明亮的眼睛开始观察周围时，却找不到父亲的身影。她的父亲此时正在另一个地方，国民党济南警备司令部所设一间阴暗恶浊的牢房里。

到了咿呀学语的年龄，她叫喊着“爸爸”，可她哪里知道，在她1岁多一点的时候，即1931年4月5日，刘谦初被国民党残杀。她还未见过面的父亲，此生再也见不到了。

刘谦初是一位性格坚强、感情丰富的父亲，事隔多少年，刘松林从母亲张文秋的回忆里得知，父亲获悉女儿出生后，就着铁窗的亮光写下的第一封

信，通篇洋溢着对女儿的思念和描写。信中说，他猜想女儿一定很漂亮。圆圆的小脸蛋上，总有一抹朝霞般的嫣红。白里透红的皮肤，像出水芙蓉那样水灵可爱。睡着了还不时翕动着嘴角，可能她正在做梦，在梦中回味着母亲乳汁的滋味。嘟起小嘴是她不怎么高兴。舒展着眉毛才是她最开心的时候！那么，她哭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咕哇，咕哇”叫个不停，皱着眉绷着脸咧着嘴巴像个小老头……？！父亲的爱心如此炽热，想象如此传神，刘松林听着，心里既快乐，又有撕心裂肺的痛苦。失去一位这样的父亲，不能不是她人生中的一大不幸。

刘松林小时候，模样极可爱，白净的脸盘，黑黑的大眼睛，走起路来张开滚圆的小胳膊，摇摇晃晃，谁见了都忍不住将她抱一抱，逗一会儿。

一天，张文秋回家，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正抱着小思齐逗乐。张文秋伸手要去接过来，小思齐玩得正高兴，没让她抱。这下史沫特莱可得意了，说：“瞧，小宝贝认我作妈妈啦！”张文秋随口应道：“好啊，让她认个洋妈妈！”

史沫特莱是一名美国进步记者，从年轻时到现在，一直在世界各地转，快 40 岁了，还没有孩子，也错过生孩子的最佳年龄。听了张文秋的话，当起真来，兴奋地表示要把小思齐带到美国去。这下轮到张文秋着急认真了，她一把接过孩子，对她说：“哪怕是去要饭，妈也要带着你，任何人都不给！”史沫特莱见此仍不放弃，她软磨硬泡，以张文秋处境危险为由，认为让她把孩子带到美国去比较安全，并表示等孩子长大了，再交还。张文秋执意不干。两人都在较真，场面有些尴尬。直到旁人出来劝说史沫特莱，记者无法带孩子，美国也不安全，她才作罢。带不走孩子，可她还要当洋妈妈，以后她每次见到张文秋，都要问：“我们的女儿呢，她好吗？”

也许让史沫特莱说中了，张文秋在从事秘密工作中还真遇到了一次关于孩子的凶情。

在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工作时，上级曾派她去北平传达指示和收集情报资料，并捎给北平小组 3000 元经费。临出发前，她给保姆拿工钱，无意中露出 3000 元汇票。张文秋抱着孩子，扮作走亲戚的模样，先到车站附近的旅馆住下。不料，就在她洗澡的一会工夫，孩子不见了。桌上留了一张纸条，约了时间、地点，让她拿 3000 元领回孩子，否则就撕票。

思齐被绑票了！她吓呆了，冷汗嗖嗖地直冒。怎么办？无处寻找，又不敢报警，她只能求助于组织。四局领导为了确保孩子的安全，决定牺牲钱财。

第二天傍晚，，她一路心惊肉跳，到达绑匪指定的地点，又绕到一片

家，在小树林里交钱赎回了孩子。回来的路上，她紧搂着孩子，拼命地猛跑。“扑咚！”她一脚踩空，扑倒在地上。思齐被摔疼叫了一声，她也顾不上了，爬起来抱着孩子又跑。跑了几步，忽然想起孩提时代妈妈讲过的一个故事：有个叫王二嫂的女人，夜半时接到亲娘病危的消息，她抱着孩子就急奔娘家。经过一块冬瓜地，让冬瓜绊了一跤。她慌不择路，爬起来抱起孩子又跑。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娘家，发现怀里抱的不是自己的孩子，却是一只大冬瓜！她哇地一声哭了，又踉踉跄跄循原路去找。来到那片冬瓜地里，孩子枕着冬瓜睡得正香甜……想着，张文秋吓出了一身冷汗。停下步来，上上下下摸着怀中的思齐。思齐被摸烦了，说：“妈，你摸什么呀？”张文秋笑了，接着又哭了。说：“孩子，是你就好。如若不是你，妈今晚活不成了！”这时，她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是四局派来接应的。她一下子感到浑身软绵绵的，再也跑不动了。

一条小命终于捡回来了。这不是编造的恐怖故事，而是刘松林在幼年真实地经历过的。

1937年秋，刘松林随母亲一同奔赴延安。路经西安，她们结识了一位老红军陈振亚。然后同乘一辆卡车，继续赶路。陈振亚因左腿在战斗中被打断，安排到驾驶室内。他担心外面风大，会吹坏孩子，主动把思齐抱到里面，坐在他的一条好腿上。一路上，思齐感受到了一种父亲般温暖，心中充满快乐。到了延安不久，母亲和陈振亚结为夫妻。一个完整的家庭组成了，思齐于是有了父亲，圆了她幼年时代的一个梦！

认毛泽东“干爸爸”

1938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在延安的中央党校礼堂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领导坐在群众中间，一起观看话剧《弃儿》。该剧由中央党校教职员工自编自演，主角是一位搞地下工作的母亲和她的小女孩，母亲由刚来延安的江青扮演。

戏开始了，观众被带进风雨如磐的岁月。

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有锅台、桌椅。妈妈在小方桌上抄文件，抬头看了看天色，忙起身在锅里添了一把米。然后又坐回方桌抄文件。饭后，她把抄好的文件送到某秘密地点去。

女儿缠着妈妈，要跟着上街。

妈妈烦透了，恼了女儿一句，女儿很委屈的样子。于是妈妈便找出一个布娃娃，亲热地哄着她。女儿高兴地笑了，抱着布娃娃，坐在小凳子上唱儿歌。妈妈微微一笑，兜好文件，快步出门……

妈妈返回途中，被特务盯梢。
妈妈机警地躲了过去，回到家里。

尖厉的警车声掠过街巷。
四下里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妈妈在窗前谛听了一会，当机立断把几份文件塞入灶膛。
军警破门而入。对妈妈拳脚相加，戴上镣铐。
妈妈嘴角流着血，横眉怒对着军警。

接着，军警抄家。把正在睡觉的女儿弄醒了。女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光着脚丫子跳下床。她看见军警把妈妈押出门。她哭着向妈妈奔去，妈妈挣扎着转过身来，大声嘱咐女儿：“快穿上鞋袜，小心冻着了，我的孩子啊

女儿嚎啕大哭，追出了门，“妈妈！妈妈，妈妈——”
警车远去了。

女儿光着脚，追到巷口。追上大街。其时，北风呼啸，电线杆上发出呜呜的响声。死一般寂静的街上，只有这个光着脚丫子的小姑娘在奔跑，在发出凄怆的呼喊：

“妈妈——”

大幕徐徐落下，剧场里却没有一点声音。突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对着台上喊道：

“把后面的那一幕再演一遍！”

此刻，毛泽东的眼窝湿润了。他触景生情，想起了妻子杨开慧被反动派抓走、枪杀，幼小的儿子流落街头，呼喊妈妈的场面，心情十分激动。

会场用热烈的掌声响应毛泽东的提议。于是，最后两幕又破例重演，大幕再一次落下，观众用雷鸣般的掌声，祝贺演出成功！

其实，此剧情节很简单，但由于来自大家熟悉，甚至不少人亲身经历的战生活，因而能获得强烈的共鸣。尤其是那个小女孩的扮演者，表演得出色传神，感情真挚，催人泪下。戏散了，人们陆续离场。毛泽东没有走开，他派人把小演员叫到身边，抚摸着她的头，亲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刘思齐”。小女孩说到这里，她的眼光便在人群中寻来寻去，终于高兴地顺手一指：“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毛泽东顺着她的小手望去，陈振亚和张文秋赶紧走了过来。

“这是你的孩子吗？”毛泽东问陈振亚。

“这是刘谦初烈士和张一平（张文秋化名）的孩子，我是她的继父。”陈振亚回答。

提到刘谦初，毛泽东的神情非常严肃，他指着小思齐，叮嘱陈振亚、张文秋说：“这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好好教育抚养她。”然后他弯下腰，笑着问思齐：“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不好啊？”

思齐向爸爸妈妈投去征询的目光，陈振亚、张文秋都笑着点了点头。思齐羞羞答答地向毛泽东喊了声“爸爸”。

毛泽东爽朗地放声大笑起来，兴致勃勃地说：“既然是女儿了，你就跟我一道，到我家去玩玩，好不好？”考虑到天色已黑，毛泽东夜里还要工作，陈振亚和张文秋答应改日再去。然而此后，思齐就成了毛泽东家的常客。

翌年，思齐随继父陈振亚、母亲张文秋去苏联，途经迪化（今乌鲁木齐）被军阀盛世才扣留，直到1946年夏才返回延安。到延安的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去中央党校看望了从新疆归来的全体同志。他和每个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一一握手，连连说：“同志们，辛苦了！”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张文秋，停住脚步说：“你回来了，好不容易呀！思齐呢？怎么没有见到她？”张文秋把站在身后的思齐拉到毛泽东跟前，要她问好。毛泽东拉着思齐的手高兴地说：“七八年不见面，长大成人了，我都认不出来啦！你还是我的干女儿呢，记得吗？”思齐点点头：“记得，记得。我们常想起你呢。”

两天后，毛泽东派人把思齐接到家中去玩。

两次见到毛泽东，都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事隔几十年，刘松林撰文写道：

我在延安第一次见到了主席，但可惜的是那时我的年龄太小了，只是朦胧的记忆中留下一个和蔼可亲的伯伯的形象，他轻言细语，笑容可掬。

在我的记忆中又是如此地清晰。在我的心灵深处，这次看望是与阳光、自由、欢乐融合在一起的。四年的狱中生活，使我生疏了阳光，隔绝了自由，不懂得欢乐。那天，在我那稚嫩的心中，主席是阳光、自由和欢乐的化身。我像久旱的沙漠突然遇见了甘甜的雨露，贪婪地吸吮着。我忘情地享受着这久别的阳光，难得的自由，和对我来说是梦幻般的欢乐。

渴望读书

脱离图圈，返回光明的世界延安，刘松林已经 16 岁了。16 年来，她一直跟随母亲，经历了许多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日子。新的生活开始后，她的最大愿望是读书。以往在各种处境下学到的一些文化知识，远远不能使她满足。她很快提出就学申请，不久，经组织安排，她高高兴兴地上延安中学读书。同年 10 月她参加了陕甘宁边区联防军，兼文化教员。可是好景不长，敌人不让她安心学习。1947 年 3 月，胡宗南率 20 万国民党军大举进犯延安，学校被迫迁移，刘松林中断学业，随部队撤离延安，渡黄河赴山西。刘松林的妹妹邵华，来延安寄托在保育院。撤退时，张文秋接她出来一起走。在熙熙攘攘的渡河人群中，刘松林意外地见到了她们，母女三人相聚了。她们非常高兴，一起从陕北的军渡过河到山西的黎石才分手。张文秋带着邵华随李先念的部队一起开拔。不久，刘松林也转到该部。队伍长途跋涉来到潞城后，刘松林进入在那里的北方大学文学院，读了半年文科。

1948 年学校放暑假时，刘松林正发疟疾。因当地缺医少药，病治不好，被转到河北平山县。医生给她用了一种新药，打针后反应很大，全身发冷，哆嗦成一团。病好后，因她在平山县看病处离西柏坡很近，就绕道那里，想看看一位同学的两个孩子，同时也想顺便去看望毛泽东。不曾料到，在毛泽东住处正巧碰见毛岸英。那时，毛岸英在平山县农村参加土改已约有一年，工作得很出色。刘松林听他谈了解放区正在进行的这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伟大斗争和他自己思想上的深刻体会，不由地对他产生了一种敬意。不久，她也被分去和毛岸英一同参加土改，并且在工作中渐渐产生了感情。经邓颖超和康克清的说和，他们建立了恋爱关系。毛泽东早就喜欢刘松林这个小女孩，再加上邓大姐和康大姐介绍，很快便同意了。毛岸英非常高兴，随后向父亲提出立即结婚的要求，毛泽东没有赞成。他认为，刘松林年龄小，应该抓紧时间多学点知识。刘松林也感到自己的学业断断续续，基础知识掌握得很不系统，她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暂搁婚事，找了一所比较正规的学校——“联中”继续读书。1949 年 3 月，她随学校进入北平，不久又转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就读。1949 年 10 月 15 日，毛岸英和刘松林举行了婚礼。婚后，刘松林没有中断学业。她深知，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真正的和平环境已经来临，这是来之不易的。她十分珍惜这美好的时光，以加倍的努力学习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力争学有所成，为新中国的建设尽一份力。同时，也为了报答毛泽东对她的一片厚望。

丈夫神秘地告别

195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抗美援朝命令后，毛岸英立即响应，申请很快批下来了。

出国作战前夕，毛岸英去了一趟东北，进行有关准备出发事宜。然后随彭德怀回北京，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情况。会议结束，已是下午6时，毛岸英骑上自行车，飞快地赶到北京机器总厂，向领导和同事悄悄告别。紧接着，又奔往北京医院，看望因割阑尾手术住院的爱人刘松林。来到医院，夜幕已经降临了。

小两口新婚刚好一年。在这一年时间里，毛岸英大多住在工厂，还要出差，平时难得和刘松林见上一面。刘松林突然见毛岸英这么晚来看她，有点惊愕。“这么晚了，你还来干啥？”难得相逢，却又分别在即，毛岸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出国作战是军事秘密，毛岸英不好随便透露，却又不能不告诉她。

毛岸英坐在病床前的凳子上，掏出手绢来，不断地擦着脸上的汗水说：“我明天将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所以急急忙忙赶来告诉你。我走了，通信不方便，如果你没有接到来信，可别着急呀！”

“那是个什么地方？”

“嗯，这你就别问了……你知不知道有个朝鲜半岛？美国侵略者在那里打得很厉害。”

“怎么，你……”刘松林仿佛已经猜到了一些什么。

毛岸英连忙岔开话头：“啊，不不，我这是考考你的政治呢！”他流露出稚气的笑，像一个大孩子在哄一个小孩子。该走了，他依依不舍地站起来，说：“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中南海看望爸爸，不要因为我不在你就不去。希望你好好照顾岸青。能答应吗？”

“嗯……”刘松林点了点头，咬住了嘴唇。

毛岸英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叮嘱刘松林：“江青她只顾自个，根本不照料岸青，她不爱我爸爸。我曾经骂过她，说既然你不爱我爸爸，滚开就是了，何必赖在这里？你也得小心，她这个人是很记仇的。……”

这句话，刘松林铭心刻骨。

离开医院，已是深夜11点，毛岸英又骑车来到岳母张文秋家辞行。

“妈妈，我要出国，来向您告辞。”他对岳母是无话不说的。

“多保重，早些回来。”

“是。弟弟岸青一直是我照顾。我走了，托付给您了。”

“你放心 我会照顾他。”

毛岸英向岳母鞠了一躬，“您没有儿子，我和岸青没有妈妈。我兄弟就是您的儿子。”

临别时，毛岸英忽然说：“妈妈，我那块手表不顶用了。您那块自动表，借给我用吧 将来回国再还给您。”

张文秋这块表，是朋友送的。她舍不得用，一直珍藏着。这时取了出来，深情地说：“那我就送给你吧。哪有女婿借丈母娘的表要还之理。这就算我这个妈妈送给你的纪念物。”毛岸英接过手表，脸上露出了稚气的笑容。然后，头也不回地迈出了大门。

毛岸英匆匆忙忙地走了。不曾料到，这一走，竟然和刘松林成了诀别。

迟到的噩耗

出国作战只一个月，毛岸英就不幸牺牲了。消息传来，极其沉重地震撼了毛泽东的心灵。毛泽东已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也是一位感情极丰富的父亲，更是一位历经风雨沧桑、意志无比坚强的革命家。当彭德怀内疚地对他谈起没有照顾好岸英时，他久久地沉默着，一支又一支抽着烟。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独自承受着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将这不幸的消息瞒住刘松林，以便让她安心学习。然而，儿媳每周必到的看望对他是一场感情上的无尽灾难。刘松林每次来，都要问爸爸收到岸英的信没有？岸英为何还不来信？毛泽东总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慰她。所以，对于丈夫的牺牲，刘松林开始一无所知。她依旧在中学读书，忙于自己的功课。脑子里只记住毛岸英临别时对她说的话：我明天将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所以急急忙忙赶来告诉你。我走了，通信不方便，如果你没有接到来信，可别着急呀！她信任毛岸英，料想他在远处正忙于自己的工作，不便给她写信。不过，她已经知道毛岸英是去朝鲜作战，在志愿军总部搞翻译工作，但不知有什么特殊使命，或许保密性极强，她也不多问。她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父母都做过地下工作，不该知道的就别问，这一点她懂。

然而，她有时也暗暗奇怪，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老首长、战斗英雄，见了她以后都特别客气、又相当谨慎。比如有一次开英模代表大会，她遇见了一些战斗英雄，这些英雄像是怕她似的，谈了几句话，就赶快躲开了。

人有情，岁月无情。眨眼之间，几年过去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不可能再瞒着刘松林了，毛泽东也无法一直扮演世上最难堪的角色。到 1953 年，他终于向刘松林诉说了。为了使她能承受住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毛泽东颇费苦心。他先谈到为革命牺牲了的亲人：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

建、毛楚雄，还有韶山党支部的毛福轩……毛泽东越说，语气越沉重，刘松林越听越不对劲。她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对了，朝鲜停战协定都签字了，为何岸英没有寄片言只语，难道他……她不敢想下去了，反而安慰起年迈的公公。这天，她离开中南海时心慌意乱。

刘松林又一次去中南海，这次周恩来也在场。毛泽东亲自告诉了她岸英牺牲的消息。她痛不欲生，哭呀，哭呀。毛泽东木然地坐着，脸色苍白，心潮翻滚。周恩来与刘松林耳语：“松林，你要节哀，你爸爸的手都冰凉啦！”刘松林一愣，重又哭着去安慰毛泽东……

毛岸英的牺牲对刘松林刺激太大了。她寝食难安，神经衰弱，为了不引起毛泽东的悲痛，她只好躲在屋里饮泣。可是在饭桌上，她那双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却被毛泽东看见了。毛泽东提筷沉思，长叹一声，放下筷子，水米未进，起身慢慢地离开了饭厅。从此，刘松林把悲伤硬是压在心头，把眼泪咽到肚子里。然而，毛泽东深知她的心情，看着她日渐消瘦憔悴，常常劝慰她说：“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而牺牲。”自从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公开后，毛泽东对她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从那时起，毛泽东格外疼爱她，时常亲自过问她的衣食住行。在每次通信中，总是称她为“娃”、“亲爱的思齐儿”。

而过去嫉恨岸英的江青，此时却趁机排斥刘松林，落井下石。刘松林刚20岁出头，经受不了这致命的打击，给爸爸写信了。毛泽东复信说：

谣言不足信，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不胜其烦。你的心要清闲些，把身子养好要紧。

听到爸爸的声音，刘松林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安慰。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毛岸英牺牲后，刘松林曾请求将岸英的遗体迁回国内，毛泽东却摇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1959年，在刘松林的请求下，毛泽东自己出路费，安排邵华陪同刘松林到朝鲜为岸英扫墓，以尽夫妻之情。为了不惊动朝鲜政府，刘松林、邵华作为普通的工作人员赴朝，住在大使馆中，往返只用了几天时间。

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坐落在山丘之中，陵园四周环绕着参天的苍松翠柏，山间清溪缓流，显得分外庄严肃穆。134名中华儿女安息在这里。毛岸英的墓在最前排的正中间。

朝鲜人民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为了他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他们通常每年两次到这里扫墓。亲眼目睹毛岸英和所有志愿军烈士的墓被朝鲜人民精心保护着，刘松林和邵华都感到由衷的欣慰。她俩在烈士陵园拍了照片，回国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1985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3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秋高气爽，碧空万里。刘松林和邵华随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又一次来到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为毛岸英扫墓。

上午10时30分，在悲壮的乐曲声中，金日成和朝鲜党政代表团等献的花圈，摆放在高高耸立的志愿军铜像和毛岸英烈士墓前。据说，这次是金日成第17次在桧仓烈士陵园献花圈了。刘松林和邵华两人亲手敬献的花圈，并排摆在毛岸英烈士的半身胸像前。望着亲人毛岸英身着志愿军军服的胸像，两人眼里的热泪滚滚而下。刘松林在墓旁对记者追溯了岸英的生命历程，对朝鲜人民一直纪念他，给予很高的评价，表示十分感激。邵华说，她来这里，一是代表岸青向金日成和朝鲜人民表示亲切的问候，祝中朝友谊世代相传；二是受岸青的委托，给他哥哥扫墓、献花圈，尽到他们兄弟的情谊。在场的同志都为她们的真挚感情而感动。

在纪念日的前一天，金日成在锦绣山议事堂亲切接见了以杨成武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等四个中国代表团，并设午宴款待他们。席间，金日成首先起身，用流畅的汉语说道，为了表示对英勇牺牲的志愿军烈士和毛岸英同志的敬意，请大家干杯！金日成接着对杨成武等讲起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他说，毛岸英牺牲后，我曾向毛主席提议，把岸英的遗体送回中国安葬，但是毛主席没有同意。毛主席说，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牺牲在朝鲜，埋在朝鲜，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这样可以使中国人民永远不忘记朝鲜。金日成满怀深情的回忆，使在座的中国同志都为之动情。

学习要争一口气

新婚一年的爱人永远离开了人间，这个打击对刘松林来说，不啻是山崩地裂。很长时间，她一直心情不好。为了换换环境，毛泽东同意她去苏联留学。1954年，刘松林读了一年俄语预科。出国前夕，刘松林正患重感冒，毛泽东写信要她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并说最要紧的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还把刘松林要的《列宁选集》多卷，随信寄去。

1955年9月至1957年9月，刘松林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学习。在这期间，虽然远隔千里，但毛泽东对她各方面的成长仍然十分关注，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亲爱的思齐儿：

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祝好！

得胜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

“得胜”即李得胜，是毛泽东 1947 年在西北战场使用的名字。由于心境欠佳，在异国独处，刘松林重病频生，同时因原来一直学文，突然改成学理工，而且还要跟上俄语授课，刘松林感到异常困难。1957 年放暑假，刘松林回国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情况，要求转学国内。8月4日，毛泽东回信说：

思齐儿：

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

转学事是好的，自己作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改学文科，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作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祝你进步

父亲

八月四日

这封信，毛泽东写得有原则有感情，既提出自己的意见，又鼓励孩子处事独立自主，充分体现了一位父辈真正的爱。

事隔5天，毛泽东又写一信，帮助刘松林克服犹豫不定，促其坚决转学。他在信中写道：

思齐儿：

信收到。我在此间有事，又病，不要来。你应当遵照医生、党支部、大使馆的意见，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

服务。

此嘱

父亲

八月九日

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刘松林就在这个暑假办理了转学手续。然后返回苏联，补办其他手续，于 10 月回国后进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

毛泽东对刘松林像自己的亲女儿一样，经常询问她的情况。1959 年，刘松林生了一场大病，毛泽东知道后，在庐山开会期间，千里迢迢，寄来一信安慰她：

娃：

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爸爸

八月六日

1960 年，毛泽东又以十分关切的语气写道：

思齐儿：

不知道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口气。我好，只是念你。

祝你

平安

父字

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支持刘松林出国留学、转学国内，更希望她把大学上完，学有所成。但江青却背道而驰，经常对松林冷嘲热讽，恶语中伤。为此，毛泽东要刘松林尽快恢复健康，早日投入学习，为死去的生父和丈夫，为毛泽东本人，也针对轻视、仇视她的江青“争一口气”。在毛泽东的关怀和鼓励下，

刘松林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衰弱多病的身体，终于完成了学业。1961年秋天，她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的科研部从事翻译工作。

毛泽东劝她重建家庭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反对封建的道德观念，反对封建的所谓“贞女”“烈女”“从一而终”。儿子牺牲后，他竭力主张儿媳再嫁，寻找爱情和幸福，建立新的家庭。可是刘松林很长时间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绝口不提改嫁之事。毛泽东理解和尊重她的情感，几年内都未直接向她谈及，只是偶尔试探一下。一次，毛泽东趁几个孩子同刘松林在一起的时候，有意把话题引到婚姻问题上，他说：“你们可以考虑找对象啰！”几个孩子便嚷嚷：“上哪儿找啊？”“我们找不着哇！”毛泽东风趣地说：“那你们闭着眼睛上街抓一个呗！”刘松林也开玩笑说：“那抓个麻子怎么办？”毛泽东见她话里没有找对象的意思，就没再作声。就这样，在刘松林的婚姻问题上沉默了相当一段时间，直到1957年刘松林从苏联转学回国，毛泽东才正式和她谈了这件事。

那时，刘松林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仍无意重新成家。毛泽东亲自为她介绍了两个人，她都借故推托，寻找理由，不去接触。毛泽东设身处地替她着想，又托了一些人，他们陆续向毛泽东提及许多人选，毛泽东听了都不中意。1961年他在给刘松林的一封信中写道：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问好。

父亲

六月十三日

见到这封信，刘松林深深地体会到毛泽东对她的一片爱心。她终于答应再找对象了。

时隔不久，有一天，空军副司令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对毛泽东说：“我们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有位教员，叫杨茂之，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这个人老实正派，我觉得可以，主席是不是……”毛泽东答应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事后，立即请人去办理。

经过了解，杨茂之的人品和刘震介绍的完全一样。于是毛泽东再推荐给刘松林，安排她与杨茂之来往一段时间，以便相互了解。

在苏联，刘松林见过杨茂之。那时他在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指挥，比刘松林早出国一年。由于刘松林心情不太好，无意与人交往，因此在集会时相互见过面，但没有说过话，更想不到这个人后来会成为她新的伴侣。

杨茂之已过而立之年，1.8米的身材，魁伟堂堂。出身渔民，性情纯朴，忠厚老实。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刘松林对他比较满意。

1962年2月，他们结婚了。婚礼是在刘松林的四合院里举行的。毛泽东此时刚创作了《咏梅》词，特地给他们抄录了一幅，作为贺礼。还送了300元钱，叫刘松林自己买些礼品。毛泽东说：“我从不买东西，所以我不知买什么给你们好，你们用这钱自己买点礼物吧。”杨茂之的父母远在海边，没能赶来，来的都是刘松林的亲朋好友，还有一些老同志，有谢觉哉、伍修权、刘震以及刘松林父亲的朋友，如董秋斯、孟用潜等人，空军学院杨茂之的朋友也来了。前前后后足有上百人，把小院的房子全挤满了。当时毛岸青在大连养病，没能前来，他的夫人、刘松林的妹妹邵华赶来参加了姐姐的婚礼。

飞来横祸

江青的喜怒无常、凶悍泼辣是有名的，她什么人都敢惹，惟独不敢惹毛泽东和毛岸英父子，尤其是毛岸英。有些毛泽东不便说出的话，毛岸英不仅能说而且敢说。他仅比江青小8岁，革命资历却不比江青差多少。他是毛泽东的长子，深受毛泽东的信任和喜爱。他世面见得多，文化程度高，政治上比较成熟。江青对付不了他，只有退避三舍。因此毛岸英牺牲后，江青把对他的恨倾泻到刘松林的头上，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刘松林有思想准备。她始终记得毛岸英告别她时说的话：“江青她这个人是很记仇的。”所以，她从来不敢去招惹江青，怀着又讨厌又害怕的心情，远远地避着她。

早在1957年，刘松林回国后，江青很快派人把她出入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没收了，还气势汹汹地说：“刘思齐不是我们家的人！”刘松林不能去看毛泽东了，内心十分痛苦。他们之间通常只能书信往来了。

刘松林结婚时没有告诉江青，江青也没有来参加。婚后一个月，刘松林和杨茂之一起去中南海看望毛泽东，也未见到江青。为此，她感到庆幸。

“文革”一开始，江青青云直上，红得发紫。她利用权力，排除异己，疯狂迫害刘松林母亲一家，诬蔑张文秋是叛徒。刘松林为防江青向她寻衅，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匆匆南下，奔赴杨茂之所在空四军某部驻

地江苏盐城 寻求安全的避风港。

谁知 此时已是天下大乱 冤狱遍及中华 刘松林也在劫难逃。

一天 空军学院来人 带了几只广柑 说是北京的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亲自送给部队的。空四军某些人受宠若惊 把那几只广柑视若“圣物”。宣传科长特意叫刘松林把广柑送到门诊部，用药水泡起来，外面扎上红丝带。

刘松林早就在心里将林彪的儿子 被捧为“超天才”的林立果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作了比较，觉得这个林副部长实在太狂，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送几个广柑 买人心 仅此而已。她虽然不敢将这想法说出来 行动上已有了简慢之意。她对一位司机说：“司机同志 你把广柑送到门诊部去 我就不去了！”

这件事很快成了她的一个“罪证”某领导在党委会上不点名地批她对林副部长不忠。杨茂之闻知后 感到他们夫妇的处境很危险 他已听说 岳母所谓的“叛徒”材料也转给了部队。从此 他处事格外小心谨慎。

“文革”之乱愈演愈烈。江青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 已成为“司马昭之心，路人尽知”。杨茂之早就知道毛泽东对江青不满 曾严厉批过她。因此 在公开场合 对江青的所作所为保持沉默。有些人多次找他做“工作”要他“认清形势”。他听得不耐烦了 忍不住把刘松林告诉他的话回敬过去：“不会的 她不会接班 主席说过她不行！”

话音虽不高 却似一声闷雷凌空炸响 闻者无不振聋发聩 大惊失色。那时 讲这样的话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不久 杨茂之和刘松林同时被送到上海，关进监狱。他们不知那是个什么监狱 只听人说 前一段这里关过电影演员赵丹和秦怡。

刘松林和杨茂之被分别关押。在她的囚室里，有两个专门看管她的女人，连站起身来 都必须经过她们的批准。窗户全部用报纸糊住 不分昼夜 都点着 100 瓦的大灯泡。不让带手表 睡觉时被子不许全盖上 只准盖到腋下 怕她自杀。她感到十分恐惧，尤其听到看守的士兵穿着硬底大皮鞋来回走动的声音 每一步都像踩在她的心上。她经常被提审 有时王洪文还亲自出马 对她拍着桌子大骂：“你敢诬蔑江青 就是诬蔑毛主席 你就是十足的反革命！”

刚生下第四个孩子的她 身体非常虚弱 精神又受到严重的摧残 每天吃不好 睡不着 人很快消瘦了一圈。她现在的两手风湿 就是那时得的 没有坐足满月就不得不用凉水洗衣服 使所有指关节全部红肿 落下了病根。

她提出要给母亲写信，获得批准。可当她铺开信纸时，眼泪成串地落下来 将信纸全打湿了。

——杨开慧带着毛岸英蹲监狱，我母亲又怀着 我蹲监狱。现在我又蹲监

狱 为什么历史转了几个圈子 又返回原地呢？

她把这种想法如实倾诉在信纸上。然而这封信未能送到母亲手中，却遭到提审人的一顿大骂：“他妈的 你竟敢把我们和国民党相提并论！”

4个月过去了 她实在受不了 又看不到希望 于是想起了该给毛泽东写信 并指名要王洪文转 王洪文没有胆量扣押给毛泽东的信 这样 这封来自监狱的信终于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她被放出来了。但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 仍在王洪文“监护”之下 只不过从监狱进了“批林学习班”不提审了 却要她没完没了地写揭发材料。她愤怒了 质问学习班的组长：“你去问一问 我到底有什么问题？”组长说了老实话：“我也不知道 关于你的材料一个字也没有。”

母亲给她来信 说你如果身体不好 可以申请到北京来看病 保外就医也行 许多老同志都是这样干的。

这是暗示 母亲在教给她解脱方法。她立即写报告 说自己身体不好 要求去北京就医。在叶剑英的关怀下 她很快获得了批准 于是收拾包袱 逃离了那个可怕的地方。

在北京看了半年病 休养了半年 她提出不回空四军的要求 经叶剑英努力，她被分配到军事科学院。以后，又调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

杨茂之是 1973年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他先去“五七干校”劳动了一段时间 后来被安置在蚌埠某师帮助工作 以后又调到涿县某航校任副校长 直到 1983年才重回空四军任研究部副部长。

他们是患难夫妻。刘松林现已离休，正忙于写回忆录。丈夫历经磨难后，满面红光 身强力壮不减当年。4个孩子（二儿二女）都已长大成人。她的小院里 草木葱绿 鲜花怒放，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次子毛岸青

毛岸青为杨开慧所生，是毛泽东的次子。1923年11月23日出生于湖南长沙板仓。谱名毛远义，曾用名杨永寿。

珍贵的回忆

孩提时代，毛岸青与父亲毛泽东相离时多，相聚时少。毛泽东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 冒着生命危险 四处奔波 奋力工作 往往难以顾及自己的小家。值得庆幸的是，岸青出生时，毛泽东刚好在长沙，因为中央派他来这里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精神，帮助改组国民党。其间，他得以抽空回板仓

看望儿子。时间不长，儿子刚满月，他接到中央之命，离长沙去上海，尔后又转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岸青在4岁以前，母亲和外婆几次携他和岸英来到毛泽东身边，几乎都因工作的原故，相聚不久即分离。

由于这时岸青年幼且见面时少，父亲留给他的印象不深。其实，毛泽东非常关心小岸青，每次相聚都和他亲昵逗乐，并在他稍稍懂事时就开始对他进行教育。1977年毛岸青回韶山故园，熟悉的景物使他回忆起小时候打碎过一个瓷杯，父亲耐心地向他从杯子讲到瓷器的生产，泥土变成精细的瓷器，要经过多少工序，工人要流多少汗，他保持至今的爱惜每一件器皿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这件小事，只是毛泽东当时爱子之心的一缕折射。

对于母亲杨开慧，岸青的印象就深多了。从襁褓婴孩，到学走路，学说话，都是母亲一步步拉扯他成长。父亲不在的时候，母亲教他识字，讲革命的道理、做人的常识。因此，他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几十年之后，他来到板仓旧居，为表达心中对母亲的怀念，在签名簿上写了“杨岸青”三个大字。

往事不堪回首。毛岸青7岁那年，也就是1930年，母亲被反动派杀害。毛岸青生活中依偎的支柱倒下了，一时间仿佛天昏地暗，寒风四起，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脑震荡的阴影

据说，毛岸青爱唱歌，却从不唱一首《卖报歌》，因为它会勾起一段辛酸的往事……

母亲杨开慧英勇就义后，国民党特务企图以她的三个孩子为诱饵，来捕获毛泽东。1930年冬，党组织安排他们转移。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弟弟毛岸龙，由外祖母向振熙、舅妈李崇德带领秘密转移上海。不久，由于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兄弟三人无依靠，生活上陷于困境，经历了一段流浪生活。他们挣扎在社会底层，吃尽了苦头，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尤其是毛岸青。

旧上海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糜烂腐败。大饭店、跑马场、舞厅、酒吧的门口，洋人、商贾、流氓、妓女在闪烁的霓虹灯下熙攘川流，令人头晕目眩。

一天，毛岸青在街上卖报，淅淅沥沥的雨点不停地飘落，到傍晚他全身都被淋湿了。他夹着一包没卖掉的报纸，心里很气恼。

一个高鼻子洋人，搂着身着旗袍、涂抹得性感妖冶的妓女从他面前晃过，还甩下一串淫荡刺耳的笑声。呸！毛岸青顿时感到一阵恶心。

忽然，不远处有一报童边跑边喊：“看报呀，看报呀，‘赣南残匪’已完全肃

清 伪师长毛泽覃已被击毙 第八师在会昌俘匪千余’。快看重要新闻呀。”经他这一喧嚷，过路的人一下围拢来买他的报纸。

毛岸青大吃一惊，他不敢相信，挤过去仔细一看，报上的确详细登载着叔叔毛泽覃遇难的消息。上面写着：

军息：伪中央区所属之伪师长毛泽覃（系毛泽东胞弟）前因我军积极搜剿，乃率领残部，鼠匿瑞金东之黄陂口东北大山中，本月二十六日，经我毛秉文部二十四师汤团，在该处搜获，该匪顽抗拒捕，遂为我击毙……

看着看着，毛岸青泪眼模糊，年轻的小叔叔那亲切的笑容，顿时浮现在眼前。国民党报纸上讲“顽抗拒捕”，可见小叔叔死得多么英勇。毛岸青脑海里翻腾着：妈妈牺牲了，小叔叔也牺牲了，心爱的弟弟岸龙不见了，街上有那么多的人在挨饿挨冻，这是谁的罪过呀？我要报仇！

毛岸青愤怒极了。可是这个仇怎么报呢？妈妈在世时曾教过他写字：打倒帝国主义。这时，他猛地想起口袋里有半支粉笔。对，就用它作武器。毛岸青迅速掏出来，用颤抖的手，激动地在涂着黑漆的电线杆上写下六个大字：

“打倒帝国主义”。

写完字，他微笑着欣赏自己的战斗。突然，巡捕飞跑过来，对着他的肩背就是一脚，把他踢倒在地上。路边，一个以开纸烟店为掩护的特务分子也蹦出来，对着他的头拳打脚踢。可怜的毛岸青，本来就很瘦弱，加上还没吃饭，饥肠辘辘，怎经得起这样的毒打呵！

毛岸青躺在湿淋淋的水泥地上，也不求饶，嘴里仍旧骂着：“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就是要打！”

“好呀，你还嘴巴硬，老子打死你活该！”

“打死这个小共匪，不犯法！”

正在危急关头，毛岸英从远处跑来，腋下还挟着一些没有卖完的报纸。弟弟躺在地上，已经昏死过去，鼻孔、嘴角流着鲜血。

毛岸英一下子扑到他身上，把他紧紧抱起。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黄包车工人主动拉上这个浑身是伤的孩子，由毛岸英带路，送到一座破庙。

不久，毛岸青隐约听见哥哥的呼唤，终于醒过来了。可是，对哥哥和周围人关切的询问，他都摇摇头，说不出话。他已被打成脑震荡，耳膜也被打

坏，听不清声音了！

“弟弟，弟弟，你怎么不说话呀？”毛岸英急哭了。从此以后，毛岸青的头部经常隐隐作痛，像一块驱不散的阴影一样，笼罩着他的一生。

父亲的思念

毛岸青的生活经历，犹如一叶扁舟，时而跌入黑暗险恶的浪谷，时而又被推到阳光明媚的浪尖。

1937年年初，经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毛岸青同哥哥毛岸英一起，被送到苏联学习、生活。同上海的流浪生活相比，这里就像天堂一般。

弟兄俩最初住在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共产国际第二儿童院，后来该院合并到伊万诺夫市的共产国际第一儿童院。这些儿童院都有宽敞整洁的宿舍、食堂，有图书馆、自修室、图画室，有游艺厅、运动厅、电影厅，每周至少放一次电影。院内还有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田径场。还有供孩子们劳动的菜园子，游泳、钓鱼、划船的河流。冬天，这里冰封雪冻、银装素裹，孩子们或者坐在壁炉旁烤火，听故事，或者去外面滑雪，尽情地追逐嬉闹。院里的苏联同志和其他儿童，都知道岸英、岸青是毛泽东的孩子，对他们格外的亲热和尊敬。他们沉浸在无比的幸福和快乐之中。

但是，岸青和哥哥并不贪玩。他俩吃过苦，懂得新生活的来之不易和时光的宝贵，更懂得祖国人民还没有解放，父辈的事业还在等待着他们去奋斗，因此对学习抓得很紧，毫不懈怠。

自从杨开慧牺牲以后，毛泽东一直在打听自己孩子的下落。父亲惦记儿子，儿子也想念父亲。还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岸英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共首毛泽东大股窜到陕北。他立即高兴地对弟弟说：“国民党天天吹牛，天天造谣，胡说捉住了爸爸，红军被消灭了……鬼话！你看，这回他们又打自己的嘴巴了。爸爸胜利到陕北啦！”“陕北在哪里？我们去找爸爸，好吗？”岸青急忙问。是啊，陕北在哪里？兄弟俩都不知道，也无法去找。

来到苏联以后，父子之间中断多年的音讯又联系上了。岸英、岸青不断给父亲写信，表达自己的思念，并汇报离别后的情况；毛泽东每次收到来信，心情都非常激动。他喜欢这两个儿子，对于他们受苦的经历深感内疚，尤其是对岸青。解放初期，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很同情岸青，他很小就和岸英流落在上海街头，受尽了苦难，几次被警察打过，对他的刺激很大。”因此在当时，他尽可能抽空给儿子写信，安慰、教育和鼓励他们。

由于岸英和岸青发愤图强，刻苦学习，多次取得优异成绩，在十年制学校里，都连跳了几级。毕业后，岸青考取了东方大学，继续深造。1946年

初，岸英先期回国，把弟弟的情况带给了父亲。毛泽东因长期劳累，于1945年11月开始患植物神经失调症。1946年1月上旬虽有好转，还不能工作，仍在疗养。当时他见到岸英回国，又获岸青消息，精神倍爽，病除大半，当即挥毫舞墨，给岸青写了一信：

岸青，我的亲爱的儿：

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讷）问候你，她现已五岁半。她的剪纸，寄你两张。

祝你进步，愉快，成长！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

岸英回国后，毛泽东格外关心远在异国他乡的岸青，思念之情越来越强烈。那时，他正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日理万机，工作极其繁忙紧张。但是，每当收到岸青的来信，他都不忘抽出空隙复信。1947年9月12日，毛泽东在给岸英的信中特别提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同年10月18日，毛泽东又以欣喜的心情写信给岸英：“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短短几行字，字字饱蘸着父亲的爱。

江青无端生事

建国之初，毛岸青在中宣部马列主义著作编译所从事翻译工作，曾参加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五六本书的翻译。他有相当水平的俄文翻译能力，在事业上起步比较顺利。

可是在爱情方面，他很长时期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早在苏联学习期间，一些热情洋溢、感情奔放的俄罗斯姑娘追求过他，但他不想同外国人成婚。刚回国到哈尔滨时，热情的东北姑娘中也有一些人主动和他接近，他也没发现情投意合的。来北京后，毛泽东听说他在搞对象上还没有如愿，有一次对他说：“你谈恋爱找对象，就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嘛！你就说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是很好嘛。我劝你找一个工人或农民出身的人，这对你可能还有些帮助。你要求条件高了，人家的能力强，看不起你，那就不好了，整

天不愉快生闷气，那还有什么意思呀。”父亲的开导，道理实在，岸青很受启发。

那年头，机关兴搞舞会。每逢周末、开会或节假日，礼堂、公园、操场便放起欢快的舞曲。毛岸青是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见过世面的人，喜欢跳舞，而且驾轻就熟，舞姿翩翩。每次他一出场，都很引人注目，自然成为舞会的中心人物。

本来，这是极平常的交际娱乐活动，无可非议。谁知，也许由于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再加上还没有对象，有些人便议论、揣度起来。这些话东传西传，传到江青耳里，她竟借机生事，想整整毛岸青。

江青是一个心气狭隘的女人，在她的心灵深处，一直想压过毛泽东的“骄杨”，对她的两个儿子都有敌意。当时她怒气冲冲，电话打到中宣部宿舍。毛岸青接到通知，连忙骑自行车赶到中南海江青的住房。在院子门口，碰见妹妹李讷。李讷悄悄地对他说：

“岸青哥 你见着妈妈可得要小心。”

“怎么？妈妈病了吗？”毛岸青一愣，原先并不知来此有何事。

“我妈生气了。”李讷告诉他。

“生谁的气？”

“不知道。”

说着，他匆匆朝里走去。

江青一见毛岸青来了，脸上阴云密布。

“岸青 你近来搞什么事？”

“翻译。”

“翻译 怎么和同志闹起来啦？”

“无中生有！”毛岸青有点生气，自然一口否认。

“你知道嘛，如今你已变成了什么人？”江青见他不服，话里带刺，冷嘲热讽。

“我是翻译人员。”毛岸青倔劲上来，语气越来越生硬。

“你已是一朝王子了！……”江青勃然大怒，把对杨开慧烈士的一腔嫉妒全向毛岸青泼来。随后，她大吵大闹，恶言恶语，话走极端，已完全失态。

毛岸青从未遇到这种场面，也从未受到过这样的辱骂，毫无精神准备，心里发闷，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突然，他感到眼前发黑，便昏倒在地。

医生来了。毛泽东听了秘书的报告，也赶来了。待医生送毛岸青去医院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江青。

此后，毛岸青再也不愿意见到江青。

父子在外地相会

哥哥突然牺牲，后母在家生事辱骂，毛岸青在接二连三的刺激下，病情不断加重，住进北京医院治疗，也未见明显好转。毛泽东非常关心儿子的健康，有人向他建议，也许换一个环境，把岸青送到苏联治疗更好，而且那里有世界第一流的医生。毛泽东同意了。

这是毛岸青第二次到苏联，语言没有障碍，医疗、生活条件都很优越，但他却高兴不起来。同第一次赴苏相比，这次没有哥哥岸英相伴，熟悉的俄罗斯风物，只能使他屡屡触景伤怀。几年时间，他一直郁郁寡欢，病情也未好转。1955年，刘松林到苏联学习，曾去医院看望岸青，岸青谈了他在苏联的情况，提出回国的念头，并请她带信给父亲。毛泽东看了来信，沉默片刻，对周恩来说：“既然如此，那就让他回国吧！”周恩来亲自安排，打电报给驻苏大使刘晓，把岸青送回国来。

时值春夏交际，万物生机蓬蓬，毛泽东在北京见到了脸色苍白、神情郁闷的儿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了让他静心养病，毛泽东通过了解，决定安排他去一个北方海滨城市治疗。

不久，毛泽东去那里开会。一天，卫士长李银桥轻轻推开了毛岸青的房门。“我爸爸来了！”毛岸青欣喜地跳下床，紧紧握住李银桥的手。“你爸爸叫你过去。”李银桥说。

车子在市委交际处停下。

穿过幽深静谧的小径，来到一栋雅致的别墅，毛泽东正埋头在文件堆里。

“爸爸！”岸青一声问好，毛泽东掉过头来，抬起手，示意儿子坐下。停下手里的工作，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岸青的身体和生活，岸青一一作了回答。

谈话间，岸青忽然想起了他做的一个梦，便对父亲说：“爸爸，你说怪不怪，几十年没有见到妈妈，昨夜她来了，笑咪咪地说：‘孩子，我不能给你爸爸抄文章了，你要练好字给他抄啊！’”

说着，岸青眼眶湿润、声音哽咽了。

毛泽东坐在椅子上，眼神凄然。房间一片静谧，父子俩的心脏急遽地跳动，似乎都可听到。

“你看看，这是不久前我写的一首词。”不知什么时候，毛泽东手上多了一份墨迹。

岸青接过轻轻地念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他颤抖了，眼睛模糊起来，泪水夺眶而出。朦胧之中，他感到父亲的眼眶也似乎有白花花的东西在闪烁。

他念的声音更轻了，几乎变成只可意会的心声：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妈妈！”岸青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毛泽东脸孔痉挛，强忍着不让泪珠涌出，他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着，默默无言。待到岸青平静下来，毛泽东叙说了这首诗的由来。

烈士柳直荀的妻子李淑一是杨开慧生前的好友，今年5月寄来一封信和一首诗后，毛泽东即写了这首怀念杨开慧的诗，以答和李淑一。岸青默默地听着，沉浸在对妈妈的回忆之中。

“爸爸，我已有30多岁了，想找个女朋友。”岸青好不容易才提出这个问题。

毛泽东问：“有合适的吗？”

岸青告诉他，医院里有个女护士待他不错，但他还拿不定主意。毛泽东只是“嗯”了一声，没有表态。

谈话之后，毛泽东请警卫处派人去医院了解这个女护士的情况，顺便看看岸青生活、医疗的环境条件。警卫处的徐永福去医院后，写了一份汇报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面请身边卫士田云玉向徐永福转达谢意，一面找来岸青劝告他：“这个姑娘别谈了，再找个适合的吧！”

为了使毛岸青静心养病，不久组织上安排他去大连。

“邵华是个好孩子”

在儿女婚恋问题上，毛泽东是一位思想开明、责任心很强的父亲。他看到岸青谈朋友不顺利，精神郁郁不乐，病体久未康复，心里非常牵挂。有一次，毛泽东曾以试探的口气问岸青：

“你嫂嫂的妹妹怎么样？”

真是知子莫如父！毛泽东的一句话，点到了岸青的心灵深处。毛岸青是一个感情深沉、性格内向的人，心里想的不会轻易说出来。对于这位熟悉的姑娘，他一直抱有强烈的好感。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中南海丰泽园里。那时，她还是一个 10 多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一副活泼伶俐的模样。因常来找姐姐，已是这里的常客。这一天，毛岸青回家碰到她，以为是哪位首长的孩子，便问：

“你是谁？”

“我是姐姐的妹妹。”小女孩噘着嘴，答得很顽皮。

“你姐姐是哪个？”

“刘思齐”。她惊奇地瞧着岸青，似乎是说，连我姐姐你也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少华，少年的少，中华的华。”小女孩挺神气的。

初识，便给岸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见面多了，稔熟起来，在亲戚一层上又建立了友谊，可谓亲上加亲。有一回，岸青对哥哥岸英说：“如果我找对象，就找嫂嫂的妹妹少华！”当然，这是指将来而言。

在岸青的心里，也许还珍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哥哥预先为他提亲的事。

1950 年秋，毛岸英准备赴朝鲜参战。临行前，他去向岳母张文秋告别，说：

“妈妈，我们兄弟的情况您都知道。我走了，岸青就孤单了。回到家里，除了爸爸，他得不到别的温暖。我这一去，弟弟岸青就要受苦喽！妈妈，我们两个都是您的儿子。将来让我们来给您养老送终！”

毛岸英情真意切，张文秋当然很感动，说：“岸英，别说傻话了。你爸爸是很爱你们的，至于岸青，我希望他常来，我会照顾他，思齐也会关心他，你放心好了！”

毛岸英说：“很感谢妈妈。不过，我还想跟您谈一件事。我希望岸青将来有幸福的生活。我觉得岸青和少华妹妹很合得来，我希望他们能够做朋友，同时希望妈妈能够同意。”

张文秋开始没有同意，因为女儿年纪还小，提亲太早了。后来经不住毛岸英再三恳求，只得说：“我看这样吧！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将来如果他们

愿意做朋友 我不会反对。”

毛岸英听到这样的答复，才放心地走了。哥哥为岸青做这件事，是事先征求过岸青意见的。

时光飞逝，转眼七八年就过去了。毛岸青因长期在外养病，不好意思，也不便开口提及此事。这次，在父亲的询问下，他终于敞开了心扉。

父子俩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交谈着。中间，卫士田云玉进去添茶，见到他们谈兴甚浓，加满水，便悄悄地退出了。

以后，毛岸青主动给邵华（即张少华）写信，表露心迹，同时对治病的态度也积极起来。洁白的信笺不断飞来，上面载着一位男子滚烫的情感和真挚的追求，邵华不禁被深深地打动，于是不尽的问候，缠绵的关切，便从她的笔端涌出……

以前，毛岸青对自己的身体迟迟不能康复，致使在国外读书多年而不能学以致用，不能参加当时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心中一直很痛苦，情绪波动难平。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更渴望出院，心情有些着急。他自己提出新的治疗方案，以求尽快恢复健康。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极为关心，他多次去信询问，安慰儿子，劝其耐心治疗，别着急，不要自己改变治疗方案。1960年，毛泽东得知岸青的身体大有好转，非常高兴，然而更令他欣喜的是，岸青已和邵华交上了朋友。

这年暑假，毛泽东让刘松林带邵华一起去大连看望毛岸青，并捎去一信。信中除了关切他的身体以外 还特地嘱他“邵华是个好孩子”希望这次他们的好事能够成功。信的全文如下：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全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少华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她们。听说你同少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少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市委同志，医疗组织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是很关心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愉快！

父亲

读了这封信，毛岸青为父亲的一片爱心深深感动。同年，在毛泽东的关怀和鼓励下，他终于解决了自己的婚姻大事，与邵华在大连结婚。婚后，他俩互敬互爱，互助互谅，生活非常幸福。1962年，毛岸青和邵华一同回北京，又一同去湖南老家探望。1970年，俩人喜得儿子，在动乱的年代里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快慰。几十年过去了，毛岸青和邵华始终甘苦与共、风雨同舟。如今，他们的孩子也已长大成人，从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班毕业，走上了社会。

快乐和睦之家

毛岸青的家在北京西郊，远离闹市，无烟尘噪音之扰，是一处修身养性的好去处。小院独门独户，里面花草满地，引来蜂蝶飞舞；柳槐茂密，叶隙中蝉鸣鸟啼不息。深处，有一排平房，秦砖汉瓦，外表朴实。屋里宽敞明亮，冬暖夏凉。多年来，在组织的关心和照顾下，毛岸青一直生活在这个优雅静谧的小天地里。

毛岸青喜读书，爱学习，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平时性格比较内向，好静不好动。他每天按时起居，生活颇有规律。他最喜欢读俄文，说俄语，床头、手头总离不开俄文书籍。在苏联整整学习了11年，他至今不仅保留了俄罗斯人的一些生活习惯，连语言习惯也难改过来，有时说普通话找不到合适的汉语词汇，就用俄语来表达。

电视他每天必看，除文艺节目外，还爱看电大课程讲座。有一次，一位同志学英语遇到疑难处，毛岸青从发音到语法，耐心对他讲解和纠正。邵华见此情景，夸他说：“你的第二外国语攻得还不错哩！”毛岸青笑了，指着电视说：“你没看到，有它教我嘛。”

音乐也是他的爱好。在苏联，他经常弹曼陀铃。现在爱弹钢琴，有时自弹自唱。每当兴致高涨时，还要邵华和他一起用俄语唱《祖国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

毛岸青更爱下棋。他的国际象棋，可称家中权威，邵华不是他的对手。有时邵华和家里的工作人员、来访的老朋友联合起来对付他，每次也都以他们失败告终。可是一下中国象棋，他就不是常胜将军了。

毛岸青一家3口，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在看电视上常有冲突，异趣盎然。毛岸青爱看文艺节目和英语讲座；邵华喜欢文体活动，爱看球赛、“体育之窗”，儿子毛新宇爱看京戏。毛新宇上中学时，在校住读，每周只回来一次。有一个周末，正遇上中国女排比赛，邵华特想看，可是毛岸青笑着说：“算了，儿子难得回来一次，我们俩都不要争，就让他看京戏好了！”

在思想方面，毛岸青和邵华对孩子教育很严，经常对他进行革命传统教育。1977年春，他们一家3口，共同将一棵青松栽种在“毛主席纪念堂”前。以后每年逢毛泽东诞辰纪念日，他们都带着儿子去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怀念他老人家。

儿媳邵华

邵华是陈振亚和张文秋的女儿。1938年秋生于陕北延安，原名张少华。1960年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结婚。

上学不易

1938年金秋，在革命圣地延安，张文秋又生下一个千金。喜讯从门缝透出，在外守候多时的陈振亚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抹去额头的汗水，喜笑颜开。看着大人和小孩双双平安，他触景生情，给女儿取了个乳名：安安。

“咱们改改传统，让安安随母姓，怎么样？”百般疼爱女儿的张文秋后来曾委婉地问道。

“姓名不过是个符号。安安姓陈，或姓张，都是我的女儿。”陈振亚很痛快，毫不偏执宗族门户之见。他接着说：“就姓张吧，取名少华。”

1939年邵华随父母赴苏联，途经迪化（今乌鲁木齐）被新疆督办盛世才扣留，年仅1岁的邵华便成了一名小囚徒。5岁那年，即1943年，陈振亚遇害身亡，邵华从此失去了心爱的父亲。

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童年，军阀夺走了她的亲人，夺走了她本该拥有的自由空气和阳光下嬉戏的那份欢快。在黑暗中，生存和斗争成了她和许多小囚徒们生活的主要内容。

有一天，不知是谁托看守买来十几只小鸡，养在监狱的院子里，和孩子们做伴。大人还编了一首儿歌，教他们唱。每天，邵华加入一堆孩子中，一边喂鸡一边唱：

公鸡公鸡你为什么叫？
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
监狱里面黑暗受不了，
我要叫，我要叫，光明就来到！
母鸡母鸡你为什么叫？

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
监狱里面吃得不太好，
我要下蛋，我要下蛋，给你们吃个饱。

稚嫩的歌喉齐声诅咒黑暗，向往光明。歌唱变成了呐喊，孩子们心中的郁闷和愤怒得到了某种宣泄。地狱般的环境使他们懂得了反抗。有一次，一名狱卒欺负邵华，还无故打她。她上去抓住那狱卒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痛得那狱卒嗷嗷直叫。

岁月在铁窗里不断流失，和母亲一起坐牢的 25 个孩子在渐渐长大，他们大多已进入或早已进入学龄时代。邵华和其他孩子一样，非常渴望读书。看着一双双充满期盼的眼睛，再移目沉重的铁门，母亲们的心都碎了。时光无涯，生命有限，孩子们可耽误不起。1945 年的一天，孩子们的母亲相商，决定办一所监狱小学。大家把身边一点值钱的东西，托一位看守拿到外面卖掉，换钱买来纸笔课本。老师就由她们中间文化基础较好的人来担任。

“开学了！”这是邵华在新疆的日子里最高兴的一件事。每天她和小同学们围着老师念书识字。老师把生字写在地上，他们学着在地上一遍遍地练，直到练好了，才写到练习本上。今天的人们想象不到，当年那些孩子念的第一篇课文是：延安，我们要回延安！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终于把牢底坐穿了。1946 年 6 月，在党中央的营救下，邵华随母亲和许多幸存的人们被释放。7 月返回延安。这时她已经 8 岁了。

走进阳光高照、充满自由的土地，邵华第一个愿望就是立即背上书包去学堂。经组织安排，很快她就进入育才小学，开始了正规的学习。可是，这安定的学习时光还不到一年，就被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起的重点进攻破坏了。1947 年 3 月，中央机关及其各部门全部撤离延安，邵华只得带着读书的梦想，不断地随着大人们转移、流动。其间，1948 年她在石家庄上过一段学，不久又中断了。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了，邵华欣喜万分，她终于又有机会上学了。一次，邵华随姐姐刘松林和姐夫毛岸英去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起毛岸英和刘松林的学习情况，两人先后都作了详细的汇报。依在一旁的邵华听着听着，突然对毛泽东说：“毛伯伯，我也要上学。”毛泽东转过身来，深情地望着这个 10 多岁的小女孩说：“好嘛！你愿意上学，我来帮你。”

几天以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交给邵华一封介绍信。持此信，她走进中央直属机关办的育英小学大门，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959 年秋，考进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

喜 爱 读 书

邵华喜爱读书，尤其喜爱读文学方面的书。在她家里，一排排高大的书橱里装满了各种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几十年来，她一直坚持读书，这种爱好，除了源于本身的内在兴趣和所学专业外，也同毛泽东对她的熏陶有关。

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从少年到老年，孜孜不倦，始终不怠，是名副其实的“读书破万卷”。他不仅自己喜欢读书，也非常关心儿女们的读书情况，经常过问，督促他们，并和他们一起交流漫谈。毛岸青是在苏联上的中学和大学，所以毛泽东常常嘱咐他要多看一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多了解一些中国国情。由于刘松林、邵华是学文学专业的，毛泽东与她们谈文学比较多。

毛泽东读书很快。一天，邵华在毛泽东面前谈起世界文学名著《简爱》，对书中的主人公大加赞赏。毛泽东微笑着听邵华大发议论。几天之后，邵华在毛泽东书房的案头上发现一本翻扣着的《简爱》，其所剩页数已不多了。她对毛泽东在百忙中抽空读书的速度大为惊讶，又为他的认真态度、求知欲望深深感动。

毛泽东主张，读书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同刘松林、邵华谈论《西游记》时，十分赞赏孙悟空敢作敢为、勇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观点，信奉“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谈起《聊斋志异》，他认为其中的《小谢》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他还说，“聊斋”中那些善良的做好事的“狐仙”要多些就好了。

学习要讲究科学的方法，这也是毛泽东对邵华的教谕。一天，邵华的中国通史考试取得好成绩后，兴致冲冲地跑来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说：“那我来考考你，你谈谈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吧。”邵华按照所记得的教科书中的内容回答了一遍，毛泽东听后笑着说，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没有很好地理解。他还进一步指明，学历史要多读史料，多思考，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才算学好了。毛泽东的这一席话，使邵华受益不浅。

邵华最爱听毛泽东谈古诗。有一次，她随着姐姐来看毛泽东，顺眼瞟着毛泽东床头有陆游的《剑南诗集》，便说：“毛伯伯，你也喜欢《剑南诗集》？”

毛泽东点了点头，微笑着说：“看来你是一个放翁诗词的读者。”

“不仅是读过 而且特别喜爱。”邵华性格直爽 快人快语。她在毛泽东的面前，毫无拘束，一股脑地把自己的感受端出来。她说：“如果只读他的《沈园二首》 低吟浅咏那‘伤心桥下春波绿 曾是惊鸿照影来’ 会得出放翁是个多情感伤的才子，要是迎风行吟那‘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就会被他那磅礴的大气 爱国的豪情所激励。《示儿》 虽是诗人垂危时的绝笔，可悲中有壮烈，垂危中仍对胜利充满着磐石般的信念……”

毛泽东见她这么喜爱放翁的作品，便问为什么。她说陆游的诗词，充满热血沸腾的爱国主义激情，具有雄浑豪放的战斗风格，常常表现出“一身报国 有万死” 的牺牲精神。毛泽东又问她最喜欢哪几首，她列举了《关山月》、《书愤》、《示儿》、《夜游宫》等几首 还当场背诵了《夜游宫》这首词。

毛泽东很有兴致地听完，夸奖她背得很流畅，只是个别字读音上有点问题。这时，她突然生发出一个愿望，说：“毛伯伯，您能不能送我一件礼物呀？”当毛泽东得知她想要自己书写一幅《夜游宫》的字后 笑着说：“看不出你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抓差！”接着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桌前，铺开宣纸，饱蘸墨汁，挥笔给邵华写下《夜游宫》这首词。邵华如获至宝。十年动乱期间，她虽然东躲西藏，始终把它带在身边，保存了下来。

又一次，毛泽东问邵华喜欢曹操父子中谁的诗，她说喜欢曹植的诗，毛泽东则说他喜欢曹操的诗。他认为曹操的文章诗词，直抒胸臆，豁达通脱 应当学习。他喜欢曹操的《龟虽寿》、《短歌行》、《观沧海》等篇章 还把其中一些词句写出来，加以解释。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赞扬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 有脱俗之风。《将进酒》是一篇好诗，《蜀道难》也有些意思。他评论白居易的《琵琶行》不但文采好，描写得逼真细腻，难得的是作家对琵琶演奏者的态度是平等的，白诗的高明处在于此而不在于彼。他还谈到王昌龄、陆游、辛弃疾的一些边塞诗，并把王昌龄的《从军行》等亲笔书写给在座的儿女们。

最令邵华感到兴奋不已的是一次在中南海听毛泽东谈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毛泽东神采飞扬，高度评价王勃年轻有为，才高学博，为文光昌流丽，20多岁的人就写了16卷诗文作品，可惜死得太早了。他说他喜欢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对其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很欣赏。在谈话中，他发现孩子们也十分喜欢《滕王阁序》，非常高兴，边背诵其中佳句，边作评论。谈到兴头时，他伏案作书，笔走龙蛇，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千古名句。邵华双手接过来，高兴得几乎跳起来！看到过这一墨迹的书法家评论说：这14字分三行，互相呼应，一气呵成，气势磅礴，不同凡响。就全篇整体来看，结构和谐，画面很美；细看

每个字，又是谨严而有法度，笔笔不苟，没有败笔，确实是一幅十分珍贵的墨宝。

多次受到毛泽东的熏陶和诲谕，又经过自己长期的刻意追求，邵华在文学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粉碎“四人帮”以来，她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一些描写、回忆毛泽东及其亲属战斗和生活的作品被多种报纸杂志转载，有的甚至被收为中学语文课阅读的范文，如《我爱韶山红杜鹃》、《滚烫的回忆》等。

风 雨 同 舟

大约在邵华考入北大后不久，开始收到毛岸青从大连的来信。以前，她曾隐隐约约地听母亲和姐姐说起，姐夫毛岸英要替弟弟提她这门亲。但那时她年纪稍小，并不太在意。作为亲戚，她对岸青的坎坷经历极富同情心，对他的病情也非常关心。可是如今，岸青接二连三地来信，委婉地向她表露自己的爱慕，往日的好感和友谊便悄悄地升华到爱情。然而在这多梦的季节里，邵华也有过冷静的思索。如果和岸青结合，而他的病情还稳定不下来，那么她也许终生要作出某种牺牲，如果拒绝他，会不会因此导致他的绝望？一向处事果敢利索的邵华，在这种感情和理性的矛盾交织状态中，也变得犹豫不定了。

毛泽东得知后，非常关心他俩的终身大事。1960年暑期到来，他让刘松林（思齐）带邵华一起去大连看望岸青，并捎去他给岸青的信。信中写道，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你可以同她谈一谈。这次会面，岸青和邵华袒露心扉，互诉衷曲，谈得非常热烈融洽。尤其是出乎邵华意外是，她的到来使岸青的病情大为好转。于是，她最终勇敢地接受了这份爱情。

邵华从大连回京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办了转学手续，来到大连师范学院继续学习，同时照顾岸青治病。又过了一段时间，两人在大连结为伉俪。

1962年春天，毛岸青和邵华一同回到了北京。毛泽东见到他们风趣地说：“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当时毛岸青的组织关系在总参，毛泽东叫他们去向罗瑞卿叔叔请假，一同回湖南探亲。

遵照父亲的嘱托，两人先到板仓祭扫妈妈杨开慧的陵墓，又到韶山看望乡亲们。然后，双双回到长沙，这可乐煞了90岁高龄的外婆。她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出了欣喜的笑容，眼里闪烁着慈祥的亮光。她一手拉着岸青，一手拉着邵华，端详来端详去，总是舍不得松手，眼里渐渐盈满了泪花。杨开智舅舅和李崇德舅妈也向他们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他们也转达了毛泽东对

大家的美好祝愿和问候，全家都沉浸在幸福的欢聚中。

结婚后的邵华，并不想当一名纯粹的家庭主妇，随着岸青身体的不断康复，她越来越思念原来的学校和专业。经征得毛泽东、张文秋的同意，夫妇俩一起回到北京，她仍回北京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但由于拖课时间较长，心里着急，时不时地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压力向她袭来，她，情绪比较低落，病倒了。一天，她忍不住把自己的病情和烦恼告知了毛泽东。为劝慰她，毛泽东很快回了一封短信：

你好！

有信，拿来，想看。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

父亲

六月三日上午七时

这封信虽短，但言词凿凿，寓意深刻。信中提到的《上邪》，是汉朝民间歌谣《铙歌十八曲》之一。全词为：“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指天。邪，通耶，语气词。上邪，就是“天啊”的意思。这是一个女子表示坚决跟她的爱人相爱的誓词。毛泽东在信中写了鼓励的话，并要她多读《上邪》，是希望她坚强一些，不要过于缠绵伤怀，为眼前的困境所难倒，在处理家庭事务上，只要凭着坚贞的爱心，就能获得美满幸福的生活。

邵华读了这封信，深受感动，精神大振，病情似乎好了多半。她决定按照父亲的话去做，积极治病，恢复健康，继续完成学业，力争学有所成，将来业有所创，不辜负父亲对她的殷切期望。同时对丈夫更加体贴，尽量挤时间料理家务。邵华的努力换来了岸青的理解，他反过来尽量减少妻子的负担，使她安下心来学习。1965年，邵华完成了全部学业。

“文革”刚开始，邵华等16人在北大联名写了一张保张承先的大字报。江青得知后，公开点名批了邵华，还趁此机会恶毒攻击她的家庭，从她的老母亲到姐妹，都被诬蔑一通。她们预感到，江青的打击报复就要开始。于是，邵华和正在北大西语系读书的妹妹少林，连夜骑自行车出走。

不巧，正在此时毛岸青病了，住进301医院。江青估计邵华会去医院看他，就派人在医院门口堵截，邵华因此无法去医院。毛岸青见邵华不来看他，病情加重，这又使江青有了告状的口实。她在毛泽东面前挑拨说：“你

看看，岸青病越来越重，邵华连看都不去看他。”

动荡不安的岁月里，邵华只能悄悄地和岸青相聚，提心吊胆地生活。1970年，毛岸青和邵华喜得一子，为他们不幸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快乐。

那时江青大有权倾朝野之势，刘松林、邵华最怕她掌权，要是她真的当上了“女皇”，她们的全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有一次，姐妹俩去见父亲，悄悄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毛泽东明确回答道：“不会的，她不行，她是两面派！”听此话，姐俩心里感到莫大的慰藉。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共和国的灾难结束了，邵华一家也获得了新生。从此以后，她再不用东藏西躲了，全家生活安定，充满了阳光。

不尽的思念

毛泽东逝世后，每逢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邵华全家必去“毛主席纪念堂”，风雪无阻，从不间断。在肃穆的大厅里，他们恭恭敬敬地把精美的花篮摆在老人家的坐像下，深深地鞠躬，静静地默哀。然后，三人搀扶着，一齐来到水晶棺室，瞻仰毛泽东遗容。每当此时，邵华总是想起毛泽东与她谈诗论文时的情景，殷殷教诲不绝于耳，便情不自禁热泪盈眶。

邵华还多次陪毛岸青去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乡，追寻父母早年革命活动的踪迹，缅怀他们为革命献身的光辉一生。

1977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春天，毛岸青和邵华回到了老家湖南。“我们含泪伫立橘子洲头，漫步湘江峭岸；回清水塘，登岳麓山；徘徊板仓小径，依恋韶山故园……万千思绪随山移水转”。这“万千思绪”，有对毛家六烈士不尽的怀念，有对一代先辈革命成功的热情讴歌，也有对毛泽东教育子女的点滴追忆。

1990年是杨开慧烈士牺牲60周年。清明前夕，邵华陪毛岸青专程回湖南长沙板仓扫墓。此行邵华在一篇短文中作了生动记述：3月13日，我们决定去板仓为开慧妈妈扫墓。早晨醒来，听到窗外“哗哗”的雨声。我劝岸青：“今天下雨，我们改日再去吧。”岸青沉默不语。饭后他踱步至门外，望着不停的春雨。他转过身来，默默望着大厅内那盆盛开的杜鹃，沉思着。“我们还是今天去吧。今年回家乡，情牵梦绕地盼望着这一天。”我不由鼻子一酸，人生能有几次这样的心愿呢！

汽车在雨中奔驰，车窗外的浏阳河，在眼前一晃而过。我们好像又看到了妈妈和爸爸拿着雨伞并肩行进的身影，听到了爸爸和妈妈赶路脚步声。在这条路上，妈妈昂着头，在敌人的刺刀下，走向刑场；在这条路上，年仅8岁的岸英、6岁的岸青、4岁的岸龙由地下党组织送往上海。倏忽间，我

看到岸青眼角那晶莹的泪珠，两鬓也已苍白，我哽咽了。

汽车在板仓旧居门前停住，外婆家的草屋，旧居墙上的照片，妈妈那慈祥的面容，妈妈身边的岸英哥哥、杨开明表舅、杨展表姐，这一切对我们来说，离我们已经很远，似乎又很近。还有岸英哥哥去朝鲜临别时的全影，他那飒爽英姿的高大形象叫人怎不怀念呢！岸青在签名簿上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下“杨岸青”，在场的人有些惊讶和不解，我立即理解到，他那颤抖的手是在用力敲开记忆的闸门，是在心底里呼唤着开慧妈妈呀……

冒着绵绵的春雨，我们登上了陵园顶峰，来到开慧妈妈的墓前，“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望着刻在花岗石上的碑文，春雨和泪水从我们的脸上淌下来。3月的雨把妈妈的墓碑洗得那么洁净，那么一尘不染，辉映着妈妈洁白无瑕的一生。人间自有真情在，长歌一曲颂骄杨。

长女李敏

李敏为贺子珍所生，是毛泽东的长女。1936年冬生于陕北保安。曾用名娇娇。

千里迢迢去见妈妈

1937年10月，贺子珍离开毛泽东，从延安经西安去苏联治病和学习。当时她已有身孕，不久产下一子。1939年，这个咿呀学语、天真可爱的男孩因治疗不及时而病死，贺子珍一度陷入孤独和悔恨之中。为了安慰她，经毛泽东同意，1941年，4岁的娇娇从延安赴莫斯科，千里迢迢认妈妈，和妈妈相聚。当年，贺子珍离延安时，她还不到1岁，妈妈长得什么样，记忆里几乎没有留一丝痕迹。

携带娇娇从延安回莫斯科的一位苏联人，下飞机将娇娇送到东方大学中国同志的住处，没作详细交代就离开了。那里的中国人问娇娇，你妈妈是谁？娇娇回答：贺子珍。有人赶紧去告诉。不一会儿，来了一位身材细挑、脸庞清秀的妇女，站在她的面前，亲切地问：

“你是谁呀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娇娇。”

“娇娇干什么来了？”

“找妈妈来了。”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贺子珍。”

“你给妈妈带什么礼物来了？”

“我把娇娇带来了。”

贺子珍一把抱起孩子，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娇娇，我的孩子，我就是妈妈呀！”娇娇心里已经明白，立刻紧紧搂着她，止不住地哭喊着：“妈妈！妈妈！”

幸福的相聚，一扫母女两人往日心中的寂寞。从此，贺子珍脸上经常挂着笑容，而娇娇有母亲可依偎亲昵，还有母亲为她买的裙子和玩具，更是快乐无比。

娇娇被安排进国际儿童院，虽然是寄宿生活，但妈妈在该院东方部工作，几乎天天在一起。当时，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也在国际儿童院，兄妹他乡的意外相见，又是一番惊喜和快乐。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闪电战入侵苏联，苏德战争全面爆发。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给苏联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巨大的消耗。一个时期内，苏联人民的生活条件相当恶劣，物资极度匮乏。冬天，在零下30℃的严寒日子里，没有暖气，没有烧炉子的劈柴，甚至连火柴都很紧张，每天只发几块黑面包，人们在生死线上挣扎着。在如此艰难的岁月里，娇娇和母亲相依为命，顽强地活了下来。当时，毛岸英兄弟俩也过着同样的生活。贺子珍尽力照料他们，待他们像自己的亲生儿子。每逢星期天，他们都来相聚，贺子珍和娇娇便把节省下来的食物分给他们。有时面包不够吃，贺子珍就把头天买好的土豆切碎，烧一锅汤，就着面包，4口人吃得热乎乎的。贺子珍还把每天织袜筒等手工活换来的钱给岸英、岸青买书本和铅笔。一家人亲亲热热，同甘共苦，挨着那难熬的日子。

为了娇娇，妈妈被关进疯人院

残酷的战争正在进行，饥寒交迫的日子还未过去，娇娇就病倒了：感冒、发烧、四肢无力。贺子珍得到这一消息，精神紧张，心悸不止。感冒！她的小儿子就是因为感冒转为肺炎，治疗不及时，才死去的。为这件事，她一直在责备自己。如今，她不敢有半点疏忽。但是如何才能防止悲剧在娇娇的身上重演呢？晚上，她心急如焚，坐卧不安，实在放心不下，决定接回孩子，自己亲自来照料。

夜色茫茫，行路匆匆，贺子珍来到国际儿童院。她心急似火，没有考虑更多，抱起孩子就走，被值班保育员发现。没想到，这个保育员极不通情理，强行夺下孩子，与贺子珍争吵，并以“院规”将她轰走。

第二天，娇娇烧得更高了，被送进医院。贺子珍去探视，又被医院的

“院规”拒绝。

娇娇病情迅速恶化，抽风、昏迷不醒，抢救、输液，均无效，被推到太平间的外室。直到此时，贺子珍才被获准前去看望。

贺子珍苦苦哀求医生，设法救活娇娇，得到的回答是耸肩、摇头。

绝望时刻生勇气。贺子珍用最快的速度，卖掉衣服，买回白糖和牛奶，用小匙一点点撬开娇娇的牙齿，把一杯甜奶喂进娇娇的嘴里。

奇迹出现了。也许是妈妈的呼唤，也许是甜奶的滋润，娇娇终于醒过来了。她吃力地睁开双眼，微弱地叫了一声“妈妈”。贺子珍激动地流着眼泪。经她要求，娇娇又被送回病房治疗。不久，贺子珍把她接到家来自己护理。

娇娇刚能下地，国际儿童院院长就要她回去，叫贺子珍上班。贺子珍不同意，请求让她再在家照料孩子一段时间。不可思议的是，院长竟然这样答复她：“你们不劳动，不干活，难道让我们来养活你们这些懒家伙吗？”

听到这句污辱人格的话，性情刚烈的贺子珍再也忍不住了。她声音颤抖着，同院长吵起来，严厉指责院长搞大国沙文主义，没有一点同情心。她反驳说，她从来不偷懒，没少干事情，她的口粮都是自己用劳动挣来的。

这些言词不可能为蛮横无理的人所接受。这个院长当即污蔑贺子珍“发疯了”，随后残忍地予以报复，派人把她送进了疯人院。这完全是人为的灾难。从此，娇娇和母亲被隔开了，各自过着孤独的生活。

直到 1946 年，娇娇才再见到妈妈。

那天，在莫斯科大街柳克斯旅馆里，她被领到一个中年妇女的跟前。这人被剃了秃头，头上盖了一顶西式小圆帽，下面的双目依然美丽、明亮，只是流动着忧郁的光。娇娇一眼认出了妈妈，哭喊着扑过去。贺子珍抱住孩子，泪水滚落在孩子的脸上，喃喃地说：“娇娇，我的好孩子，妈妈多想你，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这次母女相聚，和娇娇刚来苏联时的情景相比，是多么的不同呵！

1947 年夏，贺子珍携娇娇，随同王稼祥及夫人朱仲丽从莫斯科回到祖国哈尔滨。这时李敏已经 11 岁了，她踏上了一片陌生的故土。

父亲的“洋宝贝”

1949 年春夏之际，贺子珍的胞妹贺怡带着毛泽东的重托来到哈尔滨。她告诉姐姐，毛泽东嘱咐她：此行先把娇娇带回北平，贺子珍留在哈尔滨等候通知。

娇娇这时已过 12 岁了。她天真活泼，聪明伶俐，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由于血缘关系，她继承了母亲的天生丽质，身材苗条，肤色白净，而眉毛、

五官和脸部轮廓又酷似父亲，模样十分可爱。听说姨妈要带她去北平见父亲，心里按捺不住地高兴。可是她还有点不放心，因为离开父亲太久，小时候的印象已经淡忘了。她想出一个主意，立即动手写了一封短信：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娇娇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立刻认出信封上的字迹，是出自贺子珍的手笔。贺子珍在江西、长征路上和延安时期，为他抄过不少手稿，字迹清秀、刚劲有力，自然是很熟悉的。毛泽东拆开信封，发现写在信笺上的全是一行行的俄文，歪歪扭扭，一个字也辨认不出来。请人翻译，弄清了信中的意思后，毛泽东哈哈大笑，马上挥笔写了回信：

娇娇：

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

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应为七年——引者注）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你快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已请贺怡同志专程去东北接你了，爸爸欢迎你来。

毛泽东

信写完还没寄出，毛泽东改变主意，吩咐工作人员将此信改用加急电报发出。

电报送到娇娇手里，她同样看不懂，焦急地请妈妈用俄文逐字逐句地翻给她听。她明白后，高兴地跳起来：“啊！我爸爸来电报了！”“我要到北平见爸爸啦！”

受女儿的安装，贺子珍也高兴起来。她告诉娇娇，到北平见到爸爸，别忘了代她问候。她还叮嘱娇娇：要听爸爸的话，好好学习，要照顾爸爸的身体，不要淘气，不要影响爸爸的工作……

贺怡带着娇娇乘火车到大连，改乘船到天津，再换乘火车到北平，一路风尘上了香山，这是当时中央机关的临时所在地。

毛泽东听说贺怡一行人已来到，连忙从办公室出来迎接。娇娇见到站在自己面前身材魁梧而又慈祥的人，和画报上的毛主席一模一样，知道这就是她日夜思念的亲生父亲，激动地扑上前去，叫了声“爸爸”，就依偎在他的怀里。同时，毛泽东也激动地一下抱起娇娇，亲了又亲，享受着亲骨肉久别重逢的天伦之乐。

见了娇娇，毛泽东喜不胜收，他立即约请了几位中央领导来坐，并乐滋滋地说：“我给你们带来个洋宝贝。”

几位中央领导刚坐定，正猜着是什么东西时，贺怡领着娇娇进来了。毛泽东指着娇娇对他们说：“洋宝贝来了，我有个说外国话的女儿。喏，她就是。”然后把娇娇一一介绍给在座各位。娇娇半懂半不懂地听着他们在高兴地议论着，她回国时间不长，中文只学了一两年，过去的语言习惯一时改不过来，经不住大家问这问那，一着急说了一半俄语。毛泽东拉着娇娇的手不由地大笑起来，说：“英文嘛，我倒会一点，俄文我是一窍不通。恩来在就好了，他会。”

娇娇的到来，给毛泽东精神上莫大的慰藉。每天晚饭后，他总是牵着娇娇的手到香山公园散步，询问娇娇在苏联生活的情况。娇娇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已经能用中文回答爸爸提出的许多问话了，不过还要夹杂一两句俄语，而毛泽东也能听懂大概的意思。父女之间的情感进一步沟通了。毛泽东勉励娇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做一个有作为的人。

姓李不姓毛

娇娇要上中学了。在这之前，她在苏联上5年制小学和回国在东北补习中文期间，一直沿用小时候的乳名“娇娇”，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名。

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叫来娇娇说：“爸爸再给你起个名字。”

“爸爸，我有名字，叫毛娇娇”，她感到不解。

提起“娇娇”这个名字，是有一番来历的。1936年冬，中共中央驻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保安是个小县城，全城不到400人，没有医院，房屋也不多。毛泽东与贺子珍居住的是一个破旧的窑洞，毛泽东在那里办公，而贺子珍已近临产。生孩子的这天凌晨，贺子珍大声叫醒警卫员贺清华，让他赶快另找一间屋子。贺清华风风火火地跑出去，只找到担架班空出的一间窄小的屋子，连门也没有。贺子珍进去不一会儿，一个女婴就呱呱落地了。毛泽东听到婴儿的哭声，走过来风趣地说：“哟，就生了？真快呀，像鸡下

蛋一样，一滑溜就下来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贺子珍也乐了。曾与贺子珍一起长征过来的女红军战友邓颖超、康克清、刘英、钟月林等闻讯都赶来庆贺。毛泽东笑眯眯地招呼她们进去。她们问：“子珍生啦？”毛泽东说：“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她们连忙鱼贯而入，见依偎在贺子珍怀里的孩子正哇哇地哭，便把孩子抱了起来。孩子确比“鸡蛋”大得多，但比起一般的婴儿又显得瘦小多了。邓颖超见此，心中顿生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便亲切地说道：“真是个小娇娇呀！”其他女同志也跟着叫起小娇娇来。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听邓颖超这么一说，因为“娇”和“姣”同音，所以想起了《西京杂记》中“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的话，便取其意，起名叫“姣姣”。但后来，人们（包括毛泽东）都习惯叫“娇娇”。

十几年转瞬即逝，现在毛泽东微笑着说：“娇娇是你在陕北保安刚生下来时取的小名，现在长大了，进中学了，我要给你取一个正式学名，而且这个名字要有深刻意义。”

毛泽东打开《论语》中的《里仁》篇，指着其中的一句话，“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其行’”，对娇娇解释说：“讷，就是语言迟钝的意思。敏，则解释很多。”他讲到这里又打开了《辞源》，指着“敏”字解释道：“敏字有好几种解释，如敏捷、聪慧、勤励。《论语·公冶长》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敏还可作‘灵敏迅速’、‘聪敏通达’、‘聪明多智’等解释。杜甫《不见》诗说：‘敏捷诗千首 飘零酒一杯’。”

娇娇听得入了迷，深深感到爸爸学识渊博，心里暗暗想：在爸爸身边，一定要好好向爸爸学习，做爸爸的好女儿。

“你的名字就叫敏，但不一定叫毛敏，也可以叫李敏”毛泽东继而对娇娇说。

“为什么？大哥叫毛岸英、二哥叫毛岸青，他们都跟爸爸姓毛，我为什么不姓毛？”娇娇睁大眼睛，十分不解地问。

毛泽东爱抚地用手拍拍娇娇的头说：“娇娇，爸爸姓毛，是不错的，但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爸爸曾经用过毛润之、子任、李德胜等十多个名字、爸爸特别喜欢李德胜这个名字。”

“爸爸，您给我讲讲李德胜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娓娓述来：那是1947年3月，蒋介石下令胡宗南调集20万军队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企图达到消灭中共中央和西北红军的目的。党中央考虑到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决定主动放弃延安，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运动中伺机歼敌，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我当时对大家说，暂时放弃延安，是意味着将来解放延安、南京、北平、上海，进而解放

全中国。离开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那时我化名李德胜指挥作战。李德胜是离得胜的谐音。后来，这个预言实现了，党中央撤离延安后，转战陕北，我军在运动中不断寻机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而胡宗南却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老老实实地退出延安……

听了这番话，娇娇明白了爸爸给她取名的真正用意，是勉励她继承父辈的事业，刻苦学习，做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

赴 津 探 母

1949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毛泽东把卫士长阎长林叫到办公室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娇娇想到天津去看她妈妈，我想托你和她去一趟。她还小，来回的路上我不放心。现在家里工作不很忙，人也很多，你向他们交代一下，就去一趟吧。一块去，一块回。暑假的作业，娇娇已经完成了，她想住几天由她定，开学以前回来就行了。天津离这里很近，买普通座位就行了。”

毛泽东征求了阎长林对此行的意见后，又说：“你去了，代问贺子珍同志好，希望她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保重身体。娇娇在我这里很好，我很喜欢她。她住在学校里，每个礼拜六都回来，我们都能见面、说话，还在一起吃饭。请贺子珍同志放心。以后，每年放了暑假，娇娇都可以去看她。你到了天津，如果和贺子珍同志谈起话来，你就说我从陕北直到现在，我的身体很好，多安慰她。这里的其他事情，不必多谈。”

第二天，阎长林带着毛泽东的重托，和李敏一起来到前门火车站，登上普通硬座车厢，开始了他的这次特殊使命。

这天，李敏身穿一件白底蓝点的连衣裙，衬着她那俊秀的脸庞。显得格外动人。又要见到妈妈了，她高兴极了。列车启动后，她兴奋地同阎长林说着话。但由于不能在公开场合谈论家事，谈论妈妈，不一会儿，她抑住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拿出一本俄语小说翻看着。

到了天津，在市委招待所里，母女相聚了，两人都很激动。贺子珍一见李敏，热泪夺眶而出，忙拉住李敏的手，搂在了怀里。她呜咽着诉说：“你可回来了，你知道妈妈是怎么想你吗？你现在还不知道妈妈的心，你将来长大就知道了……”

待到贺子珍平静下来，阎长林向她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并汇报了李敏生活和学习的状况。

在津十几天，李敏时时刻刻都沐浴在母亲的慈爱中。母亲除了给她买心爱的食品，带她参观、游玩外，还和她一起话家常、读俄文书、谈学习和做

人的道理。李敏已经感到，母亲是如何把长期蓄积的爱浓缩到这段时光里，母爱是多么的无私和伟大。

在阎长林面前，贺子珍每次谈话几乎都离不开李敏。她对女儿的事牵肠挂肚，心特别重。初次见面，她对阎长林说：“娇娇愿意跟主席在一起，我也同意。但是，我知道主席的工作很忙，娇娇还小，只能希望你们工作人员看在主席的情面上，对娇娇多多关照。这次回到天津来，娇娇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你也没有来过天津，可以到处看看。”

之后，她曾几次表示：“娇娇也不会住得太久，她说了，她想早点回到主席身边去，好好复习语文。她在国外光学俄文，汉语的基础差，在这方面要好好学习才能跟上呀。娇娇还小，她在主席身边，给你们工作人员增加了不少麻烦，请你转告大家，我也特别感谢你们。”

离津前夕，贺子珍又同阎长林谈了很久。她说：“希望主席保重身体。娇娇还小，希望主席有时间了多关心一下娇娇的学习。”并再一次表示对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谢意。

回到中南海，阎长林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谈到李敏的学习时，毛泽东说：“是呀，星期六晚上和孩子们在一起吃饭，既是欢乐，也是督促检查他们学习的好机会。别的时间我就顾不上了。这些孩子的事情，还要靠你们帮忙呀。”

毛泽东还问：“她没有谈别的事情吗？”

阎长林说：“贺子珍同志还谈到过去因为一些小事，曾经与主席争吵过几句，事后很后悔，感到对不起主席。贺子珍同志还问了许多事情，我不好回答她，我没有说什么。”

毛泽东说：“好吧，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他站起身来，握住阎长林的手说：“谢谢你，孩子们的事情，你就多照顾一下吧。”

父母情感交流的桥梁

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始终未能进京。1949年她从天津返回东北后，组织上先后安排她去沈阳、杭州、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工作不久，她奉命“休息养病”，从此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一直过着孤独幽居的生活。

每当学校放假，毛泽东便安排李敏去看望妈妈，陪伴妈妈一段时间。女儿两地的穿梭来往，自然成为沟通爸爸和妈妈之间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毛泽东从李敏嘴里，知道贺子珍病了，不肯就医服药，就写信去劝说贺子珍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服药。有时，他还为贺子珍在北京寻找治病的良药。说奇怪也不奇怪，心情不好，不听劝的贺子珍，每次收到毛泽东的来信，都会改

变态度，药也肯吃，情绪也好起来了。对于这种微妙的变化，毛泽东曾毫不隐讳地对李敏说：“我知道，你妈妈生病都是因我而起，只有我才能治好她的病。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李讷已经 18 岁了。”言语中透出一种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虽有内疚，但又无可奈何的悲凉。

有一次，毛泽东问李敏：“你妈过去可苗条了，腰细细的，”他用两只手比划着苗条的程度，“现在你妈妈是什么样子了，还那么苗条吗？”

“我妈妈现在可胖了，像个大水桶。”李敏故意逗爸爸。

“不会，你妈妈的身子骨绝不会变成个大胖子，更何况她有病，心事重重呢。”

说着，父女俩的心情都沉重起来。

李敏和妈妈在一起时，贺子珍每次都不厌其详地向她打听毛泽东的身体和饮食起居的情况，但很少同她讲过去与毛泽东一起生活的情形，也不讲对毛泽东的思念，更不流露出对毛泽东的丝毫埋怨。她这样做，是怕李敏的情绪因此受影响，给毛泽东家庭生活的和谐带来阴影。每次李敏返回北京，她总要让李敏带去毛泽东爱吃的南方新鲜蔬菜，有时也捎上给李讷和江青的礼物。她还嘱咐李敏注意和江青搞好关系，不要让爸爸为难和心烦。她早就知道江青为人不善，毛泽东很难和她相处。在江青同毛泽东分居以后，她常常对李敏说：“你的爸爸也是很孤苦，很寂寞的，你要多体贴他。”

搬出中南海

1959 年，李敏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这年暑假快要结束时，即 8 月 29 日，她同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孔令华结婚了。孔令华是她在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两人相识已久，彼此了解，情投意合。

这桩婚事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婚后，李敏和丈夫都住在中南海丰泽园，两人继续上学，每逢周末回家，同父亲相聚。他们的小家给父亲的大家增添了新的欢乐。

一年以后，李敏生了个男孩，取名宁宁。毛泽东空闲时经常抱抱亲亲这个小外孙，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

添人进口，增加了乐趣，也增加了负担。当时孔令华刚参加工作，李敏还在学习，仅靠孔令华一人微薄的工资显然无法持家。毛泽东心疼女儿，从他工资开支，包揽了小宁宁的全部花费，李敏的零花钱也增至每月 30 元，用于补充产后的营养。为了减轻父亲和小家的负担，宁宁 8 个月时，李敏把他送到上海，交母亲贺子珍抚养，至 2 岁半才接回来。

即使如此，李敏的生活仍然比较窘迫。头胎分娩后，她曾大出血，得了

产褥热，月子里没休息好，身体很虚弱。以后又几次做人工流产，原先的体亏不仅未能完全恢复，精神上又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毛泽东不忍心女儿受此折磨，劝她说：“不要再做人工流产了，还是再生一个吧，免得伤了身体。”“我一个都养不起，还能再生孩子？”李敏不敢想象。毛泽东又劝她：“你就再生一个吧，我来替你养。”李敏考虑到自己还在读书，经济不能自立，精力上也不允许，无法对孩子尽母亲的责任，依然忍痛又做了人流。

也许是对贺子珍怀有莫名的嫉恨，或是出于褊狭的自私，自从李敏一家在中南海落户后，江青就很不痛快，平时对这家人表露出轻慢冷淡。在李敏最困难的时候，她不仅不闻不问，还寻衅滋事，诬李敏偷了她的照片。结果两人争吵起来，李敏感到自己人格受了污辱，气愤之极，对江青拍了桌子。这样，家庭内部的矛盾就突然表面化、尖锐化了。

此后，李敏产生了不愿同江青一起住的念头。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毛泽东非常喜爱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都留在自己的身边，并不对谁偏心。听了李敏的话，他当时心情沉重地说：“手心手背都是手上的肉。”他不愿意李敏走，但继续同江青住在一起，孩子显然无法心情愉快。经过商量，最后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让李敏一家搬出丰泽园，在中南海另找一处房子住下。

过了一段时间，李敏和孔令华不想总在父亲羽翼的庇护下生活，于是由孔令华执笔，用李敏的名义写了一份报告。因为怕父亲不同意，报告直接写给中央办公厅。报告说：我已经长大成人，需要独立地进行生活锻炼，才能更快地提高，我希望离开中南海出去锻炼。

对于这个理由，毛泽东表示理解和支持。考虑到李敏学业未竟，他每月拿出 40 元来负担李敏的生活。

1961 年，李敏搬出中南海。1963 年她参加工作后，立即打报告给中央办公厅，主动要求停止父亲补贴给她的生活费，真正开始了完全独立的生活。

隔“墙”隔不住心

李敏搬出中南海后，出入证件被收回了。从此，她想见父亲，进中南海也不易。她必须在门口先联系，通报批准后才能进入。有时，她被挡在门外，久候亦未得批准，只能望着高墙深院，感慨万千。

“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工作，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教。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布后，全国掀起了“造反”浪潮。李敏对此很不赞同。她曾直率地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

也一定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为此，她遭到批斗，被关押达5个月之久。在北航，孔令华也受到运动的打击。造反派把黑手伸进国防科委机关，将在长征途中被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会批斗。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经过一番周折，李敏来到毛泽东住处。她一进门，正巧碰上江青。当时盛气凌人的江青看见她，就大声地挖苦说：“小保皇回来了呀！现在正在搞运动，回来干什么？想摸底呀？”

江青这番挖苦的话，毛泽东听得真切，他从屋里走出，一边拉着李敏进去，一边反驳着江青：“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在详细听取李敏反映的情况后，毛泽东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这番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随着“文革”的不断发展，李敏和孔令华对江青的做法越来越不满。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决定向父亲反映情况。两人写好一封信，因担心落到江青手里，改为口头汇报。汇报内容主要是反映江青以毛泽东的代表、化身自居，到处活动，蒙蔽群众，搞阴谋诡计，破坏党的原则等问题。他们来到中南海。有关部门奉“四人帮”旨意，借口“主席现在领导运动，特别忙，还要接见外宾，年事又高，不让见客”，将他们拦在大门外。李敏气愤地质问：“为什么不让我见爸爸？搞运动就要骨肉分离？我爸爸知道了也决不会赞成你们这样搞。你们这样封锁主席，为的是干见不得人的事情。”李敏回到家后，大哭一场。

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才见了父亲三次面。

一次是1972年。陈毅去世，毛泽东出席追悼会，过后就病倒了。李敏闻讯赶去看望，毛泽东拉住女儿的手，深情地说：“娇娇，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在这种时候，李敏不便向他诉苦，只是含着眼泪点点头。

第二次大约是1975年。李敏在外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急急火火地赶来时，江青只许她看一眼就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走吧！”李敏见父亲还没醒过来，不肯走，说：“这个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你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李敏仍然不肯走，她气愤极了，“我看爸爸还要让你批准吗？”正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和汪东兴，看看两人僵持不下，只得过来动员李敏，让她走了。

李敏第三次见到父亲，那是 1976 年在她看到中央某文件中谈到毛泽东的病情以后。她不顾一切，立刻赶到中南海。正巧江青不在，她进去了，见到了仰卧病床，面容憔悴的父亲。毛泽东见女儿来到跟前，很高兴，用微弱的声音同她拉了一小会儿家常。

这次见面，毛泽东曾对李敏打了一个手势，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说了一句话。李敏没听清，因此没作任何表示。事隔多年，有一次她和朋友琢磨起这个手势，才明白那是父亲用来向她打听母亲情况的表示，因为母亲曾用过“桂圆”的名字。为此，她心情极其难过，感到了一种无可挽回的遗憾。

当时，毛泽东见李敏没明白自己的意思，便不再说话，无力地闭上了眼睛。李敏就退出来了。这是李敏同父亲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几天以后，李敏接到中办的电话，让她去中南海。她以为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想到见到的是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她不由地失声痛哭起来。

在长空垂泪、举国哀悼的日子里，李敏要求为父亲守灵，江青不答应。李敏悲痛欲绝，终日泪水洗面。但她决不是弱者，她一连几天排队，随着首都瞻仰毛泽东遗容的人群，进入父亲的灵堂，默默地和父亲告别。以后，每年一到父亲的生日，她都要去纪念堂瞻仰，向父亲鞠躬致意。

随着时光飞逝，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湖南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伟人，准备集资在韶山建碑塑像。李敏闻知后，捐出 1000 元。同时，为给这举国怀念、举世瞩目的时刻献上一份自己的礼物，她和丈夫孔令华也提早策划编辑出版一部大型画册《怀念》。她将珍藏多年的与父亲合影的照片拿出来，供编辑们挑选。其中，有不少照片是从未发表过的。李敏、孔令华在画册的《编后记》中说：“毛泽东是举世闻名的一代伟人，亦是我們亲切慈祥的父亲。作为伟人，他生前建立了丰功伟绩；作为父亲，他走后留给我们的的是无尽的思念。这种思念，地久天长，与日俱增。他的严厉，他的慈爱，他的爽朗笑声，他的幽默和智慧——常常浮现在我们脑际。”“‘东风洒雨露，全入天地春’。在这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们愿用这一幅幅珍贵的照片，给人们的心田注入几滴春雨。”

女婿孔令华

孔令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孔从洲的次子，陕西省西安市人。 1959 年 8 月 29 日与毛泽东的长女李敏结婚。

少年时代，孔令华在八一学校读书。正巧，李敏也在那里上学，两人相

识了。从那时起，他们之间就建立了友谊，在共同的学习生涯中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充满理想的美好岁月。

中学毕业后，孔令华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李敏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两人虽不是同校生，仍继续来往，相互了解日增，过去的友谊便发展为爱情。这时，孔令华已长成魁梧的身材，长方脸，浓眉之下双目炯炯有神，眉宇间流逸出一股俊气，颇有将门虎子的风度。而李敏亦出落为清秀皎洁、亭亭玉立的姑娘。孔令华爱上李敏，是爱她的气质、人品和思想，喜欢她那天生丽质及其身上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美。自然，对于李敏的家庭出身，尤其是她的父亲毛泽东，孔令华是敬佩不已的，能够成为毛家的一员，亦不能不令人兴奋。因此，当李敏和他一起商量结婚成家时，他心里充满了欢乐，完全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

孔令华和李敏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了各自的父亲，均得到同意。于是，他俩初步商定了婚期。预定的喜日已经来临，不巧毛泽东正在外地开会，无法抽身回京。对于女儿的婚姻大事，毛泽东非常上心，他从外地打了两次电话，又专门写信，告知一定要等他回来主持，婚期只得一再推迟。1959年8月下旬，毛泽东乘火车返京，李敏和孔令华去车站接他。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叫来孔令华和李敏3人一起拟定办婚事准备邀请的客人名单。

8月29日，孔令华和李敏的婚事在中南海丰泽园内的颐年堂举行，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当时，孔从洲在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工作，正来北京开会。毛泽东在这天派秘书把他接来，共同为孩子们庆贺。这天请来的客人，主要有蔡畅、邓颖超等，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和秘书罗光禄等。婚宴简单而又热闹，气氛十分轻松愉快。毛泽东兴致特别好，高兴地喝了喜酒，祝愿孔令华和李敏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生活幸福。宴毕，同参加婚礼的人一起合影，又特地同孔令华、李敏合影留念。

婚后，孔令华和李敏同毛泽东一起住在丰泽园内。毛泽东非常喜爱他们，关怀他们的成长，经常到他们的房间看望，同他们交谈。当时，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了挫折，为了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党内掀起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孔令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也抽了很多时间钻研政治经济学。他学习十分刻苦，每遇难点，就向毛泽东请教，并写下了10多万字的学习笔记，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不幸的是，他们和毛泽东一起度过的欢快生活没多久，就因与江青不和而结束了。他们结婚的时候，江青不在北京。出于不正常的心理，江青以后对他们一直非常冷淡，并常寻衅滋事。为了使毛泽东有一个安宁的工作、生

活环境，他们带着出生不久的男孩搬出了中南海。

孔令华大学毕业后，留在北航任助教。“文革”中他也受到了冲击，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北航红卫兵头头韩爱晶，咒骂他“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叫嚣一定要挖掉。孔令华对江青在“文革”中恶意煽动等许多做法极为不满，多次和李敏一起去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严厉批评了江青的有关言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江青不让他和李敏去守灵，他感到极度压抑和悲愤。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孔令华也感到一扫心头阴霾，终于扬眉吐气了。翌年9月，他和李敏一起陪同贺子珍从上海赴北京，到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目视着躺在水晶棺中的毛泽东，他心中默默地念着：安息吧，老人家，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孔令华现在航天部一家高科技开发公司任总经理。

小女李讷

李讷为江青所生，是毛泽东的小女儿，1940年8月3日生在延安。

在毛泽东的孩子中间，李讷是在父亲身边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无疑聆听教诲的机会较多，同时受到的约束也更严厉。毛泽东逝世后，一些熟人、朋友曾悄悄地向她打听：当年你父亲对你要求那么严格，你觉得幸福吗？甚至还有人问：你恨不恨他？虽然问者并没有恶意，李讷仍觉得有点吃惊：“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爱他还来不及呢！”

“大娃娃”与“小爸爸”

李讷降世时，毛泽东已年近半百了。

毛泽东自从投身革命以来，或戎马军旅，或政坛逐鹿，风里来，雨里去，大部分生涯都处于动荡之中，无暇顾家，所生儿女，或早夭、或丢失，或远在异国他乡。这位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同时也是一位感情丰富的父亲，他何尝不想为自己的子女营造一个安全、温馨的环境，来护卫这些弱小的生命；另一方面，有儿女在身旁，也可相互亲昵，交流情感，使自己饱经沧桑、操劳过度的心得到几许慰藉。大约在1940年左右，一则从远方传来的噩耗，使他那本已不平的心海再次掀起波澜：他还未见过一面、贺子珍到苏联后生下的一个男孩，只活了10个月便夭折了。1941年，毛泽东托人把女儿娇娇（李敏）带到苏联，去和孤苦伶仃的母亲贺子珍相聚。这时，他自己身边的儿女只有李讷一人了。

残酷的战争还在继续进行，依然是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但毛泽东不再忍心让这个女儿离开自己的身边，没有把她送进保育院。于是，李讷有幸在父亲慈爱的阳光下度过无数欢快的时光。毛泽东一有空闲就逗她玩，称她“大娃娃”，而她则活泼伶俐地回敬他为“小爸爸”，并做出种种怪脸，引得父亲忍俊不禁，开怀大笑。毛泽东还经常在饭后带她出去散步，工作之余教她识字，给她讲故事。在家信来往中，也不忘提及小小的她。1946年1月7日，毛泽东在给次子毛岸青的短信中特为李讷带了几笔：“妹妹（李讷）问候你，她现已5岁半。她的剪纸，寄你两张。”

1947年3月，延安的形势骤然紧张。蒋介石从西北战场上调集了25万大军，气势汹汹地对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为了拖住敌人，减轻其他解放区的压力，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军情一天比一天紧急，中央各机关大部疏散完毕，延安上空不断有敌机俯冲轰炸，地面上的炮声也隐约可闻，这时毛泽东还没有走，他还把李讷留在身边。

毛泽东问李讷：“飞机轰炸你怕不怕呀？”

李讷说：“我和阿姨跑到防空洞里就不怕了。”

毛泽东又问：“现在，敌人离延安不远了，正在往延安打炮，你怕不怕？”

李讷说：“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毛泽东脸上绽开了笑容，称赞道：“很好。看看飞机轰炸，听一听炮声，这也是对你的锻炼呀。大人需要锻炼，小孩也需要锻炼。”

3月18日，毛泽东最后一批撤出延安。李讷跟着队伍，开始了昼夜行军。白天坐汽车，虽然一路颠簸，她还能坚持，可夜间行动就比较困难了，尤其是下车爬山的时候，李讷早已睁不开睡眼，毛泽东使劲地喊她：“李讷，爸爸背你吧，快醒醒！”但她仍然困得睁不开眼睛。没有办法，工作人员找了一块布，把她裹着背在身上。

党中央、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和敌人展开“蘑菇战术”。当时我西北野战部队仅1.7万人，与敌人力量对比，处于1:15的绝对劣势。严峻的形势已不允许毛泽东再把李讷留在身边，离别的时刻来临了。穿过腥风血雨，回溯漫漫岁月，毛泽东曾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和亲人的离别成为永诀。这次父女俩能否再聚？

这年3月底，毛泽东从枣林沟北上转移，李讷随中央机关一部东渡黄河到山西，组织上安排李若阿姨照料她的生活。尽管战事频繁，毛泽东仍十分留意李讷的音讯。不久，他在一封给邓颖超、康克清的电报中专门提到，“李若任保姆及管理李讷的办法很好”。这年的10月8日，毛泽东在给已经

回国、正在晋西北参加土改的长子毛岸英的信中特地关照说：“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来”。从这寥寥数笔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当时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不仅自己惦念小女，而且还希望家里的人都来关心她；同时，工作再忙，小女的信和充满稚气的涂鸦，他是必看的。

分别约半年多，毛泽东和女儿在黄河边的南河底村相聚了。当时战争形势已稍有好转。

“娃娃 我的大娃娃 好娃娃！”毛泽东激动地喊着 毫不在意身边有那么多工作人员。他抱起李讷又亲脸蛋又拍后背，拍一下念叨一句：“大娃娃，乖娃娃 爸爸真想你哟！”

李讷则高兴地嚷着：“小爸爸 乖爸爸 我天天想小爸爸。”她刺溜地从父亲的怀里钻出来，给“小爸爸”表演一段江青教她的京剧《打渔杀家》。毛泽东看着女儿充满稚气的表演，眼圈渐渐红了，湿漉漉的。

第二天，毛泽东带着李讷转移到杨家沟，此后，父女俩几乎再也没有分开。

饭桌前的教育

1946年1月，毛泽东住在延安王家坪。

有一天，他住的窑洞窗户坏了，管理科立刻派了一位近50岁的老木工来修理。窗户修理好，吃午饭的时候到了。毛泽东留下老木工一起吃饭。和往常一样，在座的还有他的小女儿李讷，那时她5岁半。

饭也和往常一样，是“金银元宝饭”。这是毛泽东起的名字，因为小米干饭里掺了一点大米，还有几块白薯。菜也和往常一样，很简单，而且断不了有点辣椒。

毛泽东那天很高兴，吃饭中间，一直和老木工交谈。他问老木工是哪里人，参加八路军已经多久。老木工初上饭桌时有点拘束，很快也就谈笑自如起来。

谈着谈着，老木工谈起了自己小时候挨打的事。他说他经常挨父亲的打，有时候打过之后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挨打。他还谈到同村有几个孩子，也经常挨父亲的打，有一个孩子被父亲打坏了一只眼，事后父亲很后悔，竟一病不起。

谈这些事时引起了李讷的注意，她听得入了神，显露出一副同情的神色，连夹菜都忘记了。当老木工谈过之后，稍隔了一会儿，她脸上忽然现出了一丝笑容，一面夹菜一面说：“我爸爸好 我爸爸一下也没有打过我。”大

家看着她那天真的样子，都笑了起来。可是，毛泽东一点没有笑。

他用筷子指着自己碗里的饭，对李讷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爸爸没有这个，也会打你的。”语调中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深深同情。话音刚落，桌面上立刻沉寂了下来。李讷当时眼圈红了，差一点要哭出来。

1947年冬天，毛泽东转战陕北来到杨家沟时，吃粮非常困难，基本上是吃晋绥军区老根据地支援陕北的黑豆。有一次吃饭，李讷见大家的嘴都是黑的，她就笑，还对毛泽东说：“爸爸你看，阿姨、叔叔们的嘴都是黑的。”

毛泽东对她说：“你不要笑，前方解放军叔叔就是靠吃黑豆饭打胜仗的呀。黑豆好吃，吃了黑豆也能长胖长高。你也应该带上碗筷和阿姨一块去吃黑豆饭。听爸爸的话，你将来一定是个好孩子。”

从此以后，年仅7岁的李讷经常和阿姨、叔叔们一块上食堂吃黑豆饭。

“你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非常关心女儿的学业，在她小学、中学、大学的每一阶段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在恶劣的战争环境，李讷到了学龄还未能上学。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前程，毛泽东委托身边工作人员韩桂馨教李讷识字。1948年来到平山县西柏坡，环境允许一些学龄儿童集中起来读书，这时李讷才开始了小学教育。语文、算术、地理、常识等课都由蒋英来教，她既是校长又是教员。进北京以后，孩子们可有了和平安定的环境学习了。毛泽东嘱咐李讷要珍惜大好时光，亲自联系送她到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对这所学校，李讷印象很深。后来她回忆说：“育英学校的老校长韩作黎是位可敬的师长，他不仅善待学生，而且对教育理论很有研究，可谓桃李满天下。”1953年，李讷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读书。在这期间，毛泽东不仅注意女儿的学习，经常考察她的政治、文学、历史、地理等知识，还为她讲解一些生活、做人的道理，这使李讷受益不浅。195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1寿辰，李讷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赶制一件小小的礼物。也许是对这份礼物看得太重，怎么设计都不满意，眼看父亲生日过去，礼物竟未做成。李讷不罢休，又补做一件。这回是用丝线在圆形的硬纸上编织起来的非常精致的小书签，一面画有寿桃，一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于是，毛泽东收到了姗姗来迟的生日礼物和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

你正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

热烈爱着你的女儿

李讷

一九五五、二、八

从小学到中学，李讷的成长道路一直比较顺利。1959年进入大学后，她逐渐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1960年，她大病一场，全身浮肿，不能继续学习，因而情绪低落。1961年不得不在家休学一年。当时为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工作，难得余暇过问她的情况，李讷为此感到精神苦闷。1962年1月，她身体还未完全好转，就恢复了自己的学业。这年元旦，她给父亲寄去了一张贺年片。1月9日，父亲复她一信。信中这样写道：

李讷：

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用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

祝你上进！

父亲

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

读了此信，李讷极为感动，心中的苦闷似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她开始理解，尽管父亲工作繁忙，心中一直在深深地爱着她、想着她；同时，她也开始意识到，这种时候，父亲更需要得到儿女的关心和爱。李讷很快给父亲回了信，向他汇报了近来的思想状况，并尽情地表达了做女儿的对父亲的身

体、心情的关心和问候。之后，李讷随时给父亲去信，诉说自己在大学生活中的欢乐与苦恼。毛泽东经常给她回信，帮助她克服弱点，鼓励她奋发上进。

1963年，国民经济已经得到恢复。随着生活状况开始好转，李讷的身体也逐渐健壮起来。新年伊始，李讷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在给父亲的信中，认真回顾了过去的在校生活，痛陈身上存在的一些缺点，详细汇报自己通过学习思想上的收获。她谈自己读了《庄子·秋水》一文后的感想，认为其中的主人公河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鼠目寸光，自高自大，是不可取的。毛泽东看了这封信，深为女儿的进步感到高兴。同年1月4日，他回信祝贺：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爸
一月四日

父亲来信中的分析、批评，诚恳深刻，一针见血。李讷再次写信，表示决心痛改。1月15日，毛泽东回信，予以鼓励：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爸爸
一月十五日

父亲的爱护、教育和鼓励，使李讷在政治、思想、学习、品德和作风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1965年，李讷在大学毕业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领袖的女儿饿肚子

毛泽东在生活上克己奉公，俭约朴素，始终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平时，他对待自己的子女，也严格约束，遵守制度，一丝不苟。即使是心爱的小女李讷，也毫无例外。

在北大读书时，李讷住校，到周末才回家。她每次乘公共汽车进城，路上要花一个来小时。有时学校有活动，到家就天黑了。有一次，李银桥担心李讷独自走夜路不安全，瞒着毛泽东派车去接她。汽车停在校外僻静之处，李银桥步行进去接她出来，然后悄悄开车回家。这件事被毛泽东觉察了，他严厉批评了李银桥，尽管李银桥从安全的角度作了辩解，毛泽东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由于李讷和普通学生一样，在刚上学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同学并不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毛泽东月薪404元，女儿上大学后，每月生活费只给26元（除去星期日，每天平均1元）其中交学校饭费15元，剩下的是车钱、书本费和零花钱。几十年后，李讷回忆说：“当时家里规定，不许多要1分钱。有时不够跟别人借，下个月再从26元里还。好多同学都以为我是‘大款’，主席的女儿嘛！同学们向我借钱，借上10元我还能勉强地过，再借第二次，我自己都得跟别人借，我还不能告诉父亲，告诉了他也不会相信，其实我自己连饭费都交不上了。最近，有一个当年同学对我说，真想不到，那时我跟你借钱，还以为你多有钱，原来你也是很困难的。”

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李讷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节衣缩食，在校自报口粮27斤。她回家向父亲作汇报时说，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分担国家的困难。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就应该这么做。可是这点定量，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年是远远不够的。有一次，李讷带了一包奶粉去学校，毛泽东知道后很不高兴，说这样做影响不好，以后李讷再也没有往学校带过东西。因此，她和大家一样，经常饿肚子。

1960年冬，毛泽东的卫士尹荆山去学校看望李讷，见她脸色不好，一问才知道是饿的。情况汇报到李银桥那里，他实在于心不忍，带了一包饼干悄悄送给她。当时李讷环顾四周，怕被人看见，拿出几片塞进嘴里，余下的小心翼翼地藏好，准备慢慢“享受”。李银桥见状，心里一阵阵发酸。这件事又被毛泽东知道了，火气上来拍了桌子：“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

干也不许送！”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事隔不久的一个星期六，李讷回家与父母一起吃晚饭。炊事员特地煮了比平时多一倍的米饭，那是红糙米掺芋头，搞来四菜一汤，还有辣子、霉豆腐等四个小碟。全家在饭桌前一落座，李讷不顾饭烫，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去。毛泽东和江青都怔住了，不一会儿便停下了筷子。李讷见他们不吃，并没在意，她并不知道父亲平时吃什么，不知他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马齿菜，以为岁数大的人吃不动，便继续风卷残云，把全部饭菜打扫得一干二净，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之后，她似乎还没吃饱。炊事员又找出两个白面掺玉米面的冷馒头，李讷就着涮盘子的水相继填进肚里。看见这种情景，工作人员都止不住泪水盈眶。毛泽东喉咙里咕噜了两声，默默地走开了。

晚上，卫士们对毛泽东说：“主席，李讷太苦了，你看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泽东明白他们要说什么，“同全国人民比较起来，她还算好一些。”

“可是……”

“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毛泽东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说：“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各守本分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搏击风浪 陶冶品格

毛泽东喜欢游泳，尤其喜欢在江河湖海里畅游，在大风大浪中迎接挑战，征服对手，宣泄情感。从少年到老年，始终不懈。“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等诗句就是他与大风大浪打交道留下的千古绝唱。毛泽东的这一爱好，也影响了他的子女。毛泽东希望他们在游泳中去体会人生的道路，悟出社会的哲理，增强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

建国初期，毛泽东日理万机，去北戴河游泳的愿望迟迟未能实现。倒是李讷先于父亲去了北戴河。1954年中学放暑假，江青带着李敏、李讷又去北戴河，她们套着救生圈在海里飘荡，尽情地玩耍。为了让父亲分享她们的快乐，李敏、李讷写去了热情洋溢的信。7月23日，毛泽东回信写道：

李敏、李讷，我的亲爱的女儿：

你们的信都收到了，很欢喜。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

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

亲你们！

爸爸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三日

毛泽东爱读曹操的诗，尤其是“碣石诗”，即《步出夏门·观沧海》全诗如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毛泽东叫女儿在北戴河读曹操的诗，是要她们在游玩中学点历史文化，陶冶性情。不久，毛泽东也来到北戴河，畅游之余，借古人之幽思，抒今人之情怀，写下了气势恢弘、意境深远的诗词《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有一次，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带领儿女下海游泳。李讷刚套上救生圈，父亲就叫她拿掉，交给旁边的工作人员。这天，从拂晓5点多开始，一直游到中午11点多，在父亲的鼓励下，她尽管游得精疲力尽，仍咬牙坚持下来，最后大家登上一个码头，坐车回到住地。李讷说，父亲经常用这种办法锻炼儿女们的意志。

一定要锻炼意志

在毛泽东的培养教育下，李讷对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也有严格的要求，但她自幼体弱，疾病常来缠绕，致使人生的进取、发展受到影响。为此她很苦恼，有时愁肠百结，郁郁寡欢。

毛泽东了解女儿的体质和心境，一直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她。每当获知她生病而又不在一起的时候，便写信给她，对她进行安慰和开导。毛泽东煞费苦心地寻找几首古诗抄给她，或者告知外面的气候景色，例如，下雪了，以解病中小女的愁闷。但信中说得最多的是，如何依靠意志来战胜疾病。他认为，对待疾病的态度，体现着一个人的世界观。他自己持革命的乐观主义，对身体抵抗力很自信，因此碰到一般的头疼脑热，他既不求医也不吃药。当然，这是针对他自己的身体条件而言，不是光靠意志没有物质基础的唯意志论。对于女儿，他强调意志的含义是：一要乐观豁达，坚决克服悲观，积极配合治疗；二是要不怕吃苦，有时小病挺一挺，挺过去了，免疫力

就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1958年初，李讷得了急性盲肠炎，疼痛难忍，需要住院动手术；同时，因为小时候打针针头不幸断在肉里，一直没有取出，也要动手术，经医生研究，决定两个手术一起做。正巧这时江青不在北京，去广州了，平时李讷看病事都由她安排照料。这次毛泽东亲自联系，由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和该院的外科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一起做手术。割阑尾的手术很顺利，取断针的手术遇到了麻烦。动刀以后，因年头已久，断针移位，花了很长时间找不到。最后院长决定，把李讷抬到 X 光透视室，一边照，一边找，才把针头取出来，断针已经生锈。这个手术是在无菌室外做的，术后伤口感染，引起发烧，38 多。几天来，毛泽东忙于工作，又时时关心李讷的手术，精神非常疲倦。2月3日，他又通宵未寝。中午12点时，他吃了安眠药，准备上床睡觉。临睡前，仍不放心女儿，又写一信，对她讲了一番深刻的道理。信中写道：

李讷：

念你。害病严重时，心族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尝尝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了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九小时，你跑出房门在小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完全正常。妈妈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李讷，再熬几天，就可以完全痊愈，怕什么？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你知道吗？你大概十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养十几天，又陪伴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

爸爸

二月三日上午十二时

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有话叫小员来告我。

信中提到的“诗一首”，是唐朝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之一。毛

泽东凭记忆把它抄录给李讷，是要她从中体会意志的力量，以顽强的毅力来战胜眼前的困难。李讷完全读懂了父亲的一片苦心，说来奇怪，她当时就感到精神清爽，痛苦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戏剧性的政治生涯

李讷的政治生涯，曾随中国六七十年代政局的动荡，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

1965年暑假，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解放军报》当编辑。

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涛掀起。7月下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北大召开万人大会，煽风点火，攻击中央派去的工作组。会上，江青还斥责毛泽东的二儿媳邵华（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及其母亲是“政治骗子”，不承认邵华是“毛主席的儿媳”。随后，江青又大夸李讷“是个好孩子”、“原则性强”等，说北大有“迫害”她，并点了曾负责李讷在校学习和生活、当时已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的郝老师的名。所谓的“迫害”是这样一类事。例如，有一次周末，李讷感冒发烧，仍坚持要乘公共汽车回家。因从北大到中南海路途较远，中间得换车，郝老师出于“对党、对毛主席负责”的精神，怕她在路上出差池，坚持不让她走，但学校又无法与中南海通电话。直到这天晚上，江青不见李讷回家，打电话来问，才知道她病了。再如，李讷有一次和老师、同学赴河北省某县农村搞“四清”，在核查一位“四不清”干部贪污的公社数百斤玉米（其中有黄玉米和白玉米）时，李讷坚持要把玉米粒分成黄白两种，分别计算。而其他人认为不必要，只统称玉米粒即可。李讷认为别人不讲原则，很生气。所有这类小事，李讷回家后对江青讲了不少，心胸狭窄的江青便无端认为有人在“迫害”女儿。

1966年8月初，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之后，“造反”浪潮遍及全国。李讷也在解放军报社领头造反。她化名“萧力”（“小李”的谐音），投入“大批判”。不久，她实际上成了军报“文革”运动的灵魂和首脑，并且“为众所推”，当上了军报的总编。这时，她才26岁。

1967年，李讷担任了毛泽东的联络员，负责了解北京各大学运动的情况。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每天手不释卷，在“文革”那样动荡的岁月里也没有懈怠。1968年年初，毛泽东开了一张书单，内有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叫李讷去借。李讷把书找齐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才送到毛泽东那里。当时她听说越南战争打得很激烈，有的同志去参加援越工作，就向父亲提出上越南锻炼。她说：我这一生真平淡，何时可以马革裹尸啊。

毛泽东不同意她的要求，批评了她的想法，叫她做好平凡的工作，干点当前要紧的事。

这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各自的校园内占领楼房，设置路障，手持矛棍，大搞武斗，互相抓人、斗人。有的造反组织甚至动枪纵火，打死了人，造成市区交通中断。李讷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迅速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下决心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集合工人和军人徒手冲入北大、清华等重点院校，强行制止两派武斗并解散两派组织，这是后来普遍实行的“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的开始。在制止学生武斗这个问题上，李讷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除了她这种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别人是不敢并难以向毛泽东汇报运动中的严重问题的。

1968年夏，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发表后，李讷当时身体不好，仍花了很大精力，广泛收集各方面的反映，包括工人、学校、部队的动向，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退还她，对材料没有发表意见，只提出要她好好养病，书宜少看。

70年代初，李讷去了“五七干校”。几年之后，她又在北京的政治舞台露面。从1974年至1975年，李讷先后担任了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书记之一）。1976年10月以后，她被安排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图书处工作。由于身体原因，她未能坚持上班，从此再也没有在政治舞台上露面。

两次婚姻及今日生活

大约在1970年，毛泽东为了锻炼李讷，让她赴设在江西井冈山下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李讷年届30，仍孑然一身。许多老同志都非常关心她。毛泽民的女婿曹全夫，也就是毛泽东的侄婿，李讷的堂姐夫，当时任中办五七干校的党委书记，给李讷介绍过几个对象，李讷都不满意。她要求找一位农民干部结为伴侣，但也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后来，她同北戴河管理处当服务员的小徐相爱了。小徐的父亲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他的出身没有问题。李讷向组织上提出结婚以后，曹全夫对小徐的情况作了调查，并亲自向中办负责人汪东兴、张耀祠打了报告。很快，毛泽东就作了批复，表示同意，并叫警卫人员带着他的批文和一套马恩全集送到江西“五七干校”。这套马恩全集，是父亲送给李讷的惟一的结婚纪念品，她一直珍藏着。婚礼仪式是曹全夫操办的，他亲自去买了一些苹果，又叫人备了茶水、烟、糖，请大家热闹一下。中午，让食堂做了两桌便饭，请干校的几个领导、李讷的堂姐毛远志，还有连队的几个同志参加。婚后几个月，由于江青从中干扰，再加上许多方面不合，两人便分居了。当时李讷已怀有身孕。又过了一

段时间，两人正式离婚。以后，小徐被“保送”入河北铁道学院当了“工农兵大学生”，李讷生下一子。

1976年，李讷的生活波澜跌宕。9月父亲去世，10月母亲作为“四人帮”的主犯被关押，巨大的悲痛和压力一起向她袭来，她精神上几乎不堪重负，身体也垮了下来。由于她的婚姻早已破裂，这时身边只有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白天，她拖着病体料理家务；夜里，对灯无语，心绪万千。这是李讷人生之路最艰难的时刻。

在困境中，李讷经常想起父亲生前教诲，不断地自我克制，自我调整心态，努力适应急剧变化的生活，增强战胜各种困难的勇气。

离开了中南海的生活环境，李讷被中央办公厅安排住在警卫局宿舍一套四居室内，组织上还从革命老区找来一位保姆，照料她母子生活。由于相互不习惯，生活很难融洽，不久保姆便回老家去了。一个时期，李讷的工资才70多元，日子过得很紧。中办领导得知她的生活状况后，为她申请了一些补助，她的日子才好过一些。

然而，不幸的婚姻仍然给李讷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有一段时间，她一直闷闷不乐，在孤寂悲凉的气氛中生活。70年代末，李银桥夫妇有心帮她，为她物色到一位比较合适的人选，即当时在云南某军分区任参谋长的王景清。经过长时间的接触，两人于1985年正式结婚。婚后生活和睦美满，李讷心情大为改观，身体也逐渐康复。

此后，李讷开始了普通人家的生活。1988年12月25日，是毛泽东95周年诞辰的前一天。清晨，李讷来到纪念堂。按照惯例，她作为毛泽东的亲属，可以从纪念堂西门径直入内，但她却以普通公民的身份，随着前来瞻仰的群众组成的队列，缓缓走进纪念堂。一位曾在中南海工作过的纪念堂值班人员，从人群中认出了李讷，客气地将她从瞻仰队列中请出，以便她能更仔细地端详父亲的遗容。

90年代初，组织上安排她家迁至万寿路5间一套的新居里，中办机要局根据她过去的工作经历，确定她为正局级调研员；丈夫王景清早已办了离休手续，组织关系全部从昆明转到北京，平时在家练习书法，外出参加歌咏；儿子中专毕业后，分到一家大饭店，当服务员兼管理，工作十分出色。

回首往事，李讷对父亲感激不尽，她说：“我觉得父亲给子女留下的最大的财富，就是他对我们的教导，这种精神上的财富是最宝贵的，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当年他那样严格要求我，完全是为我好。假如不是那样严格，后来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恐怕很难过得来。他的严格要求，完全不是过分的，而是很实事求是的，是按照我将来要过什么样的关来要求

的，并不是随便那样做。他那是真正的父爱。他爱我，真的。”

女婿王景清

王景清是毛泽东未曾见过面的女婿，毛泽东逝世以后，他才同李讷相识、结婚。

建国前，王景清是中央警卫部队的战士，曾为毛泽东站过岗，心中怀有对这位伟人的朴素而深厚的感情。可是，他不曾料到，几十年后，风云变幻的历史，一个极其偶然的机遇，使他成为毛泽东的女婿。

1976年，中国政局巨澜迭起，风云突变，致使处于政治斗争漩流中心的“第一家庭”迅速解体。面临这种剧烈的冲击，作为这个家庭成员的李讷，心中百感交集。在70年代后期，李讷曾一度生活在孤寂难堪的氛围中，心境极其悲凉。父亲离世，母亲服刑，自己未卜的政治前景、已经裂变的婚姻，再加上体弱多病，精神上哪堪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带着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一起生活，而且过去生活在条件优越的家庭，现在要自己独立生活，一切得从头学起，其境况之艰辛是可以想象的。

1979年，曾经为毛泽东担任过卫士长的李银桥夫妇从天津调回北京工作，他们常去看望李讷，对她的生活处境十分同情。李银桥是看着李讷长大的，对她的思想、性格、脾气非常了解；李银桥的爱人韩桂馨曾照看过小时候的李讷，她俩的感情很深。李、韩二人常一起谈论李讷的生活问题，认为李讷应该摆脱过去不幸婚姻的阴影，重新建立一个家庭，过正常人的生活。她是毛泽东的女儿，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有权利再嫁，有权利享受夫妻生活的幸福和温暖。他们联想起一段往事，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里，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经常过问周围工作人员的婚姻大事，他俩的结合，就是毛泽东亲自关心促成的。现在他的女儿婚姻有困难，我们应该责无旁贷地帮助解决。

有一次，李银桥夫妇去看望李讷，闲谈中有意把话题引到找对象上，李讷说：“唉！我妈妈是‘四人帮’，谁肯找我啊？”话音里充满了凄楚和惆怅。李银桥夫妇赶紧劝她：“你别这么说，你爸爸还是伟大领袖呢，你是毛泽东的女儿！”

正当这两位热心的“红娘”为找不到合适人选暗暗发愁时，王景清出现了。王景清是李银桥在中央警卫团工作时的老战友，建国后，两人分别在刘少奇和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常有交往。后来，王景清到了昆明军区任某军分区参谋长。这次出差来京，他抽空来李银桥家做客。老战友久别相逢，

无所不谈。当谈到家庭生活时，王景清陷入极度痛苦中。他告诉李银桥，他妻子同他一样也是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平时特别好胜，因分房子和其他一些问题同他争吵，最后导致感情破裂而离婚。李银桥夫妇对老战友家庭的不幸表示理解和同情。在安慰王景清的同时，两人仔细分析了他的条件，感到把他介绍给李讷成功的可能性较大。王景清中等个头，肩宽有力，一副训练有素的标准军人形象；在人品方面，为人老实忠厚；在文化水平方面，虽然原先底子较薄，但经过几十年的工作学习锻炼，已提高较大；在家庭方面，其子女现都已工作，独立生活；在年龄方面，王景清比李讷大 10 多岁，生活经验更丰富些，能体谅、关心人。综合起来，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相称。

接下来，李银桥夫妇穿针引线，分别向王景清和李讷介绍了对方的情况，王景清听后很满意，李讷也觉得条件适中。

两人初次见面是在李讷家，王景清的言谈举止立即赢得了李讷的好感。她一扫以往挂在脸上的愁云，热情地用茶水、糕点、糖果招待王景清，双方相谈得十分融洽。以后，见面次数逐渐增多，感情逐渐升华，爱在人生的秋天里悄悄来临。当时王景清的工作关系还在昆明军区，为了能经常看望李讷，经组织同意，他临时住在北京。而李讷，每次相约都静静地等待王景清的到来，内心虽说没有年轻人的那份激动，但也涌起喜悦欢快的微澜。她的性情发生了变化，无尽的烦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开朗，落落大方，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更加实际。

婚礼在一年后举行，他们没有大事声张，只摆了一桌酒席，邀请了叶子龙、李银桥夫妇以及中央办公厅的七八位领导参加。席间大家不断地为王景清和李讷祝贺，祝贺他们真诚相爱，幸福和睦，白头偕老。王景清和李讷也举杯敬酒，对曾热情关心和帮助他们的领导、同志、长辈们表示由衷地谢意。整个婚礼，办得既简朴又热闹。

对于王景清和李讷的结合，中央一些领导和夫人们都很关心。杨尚昆闻讯后，特地让秘书打电话给李银桥，询问李讷对象的姓名。在他们结婚之日，又特地赠送一床精致的大被套和几斤优质巧克力，还以全家人的名义写来了贺信。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一次见到李银桥夫妇，拉着他们的手连声赞扬：“小李小韩，你们为李讷办了一件大好事。”

婚后，王景清和李讷相处和睦，生活过得很幸福。王景清正式办了离休手续，关系从云南转到北京。他对李讷体贴入微，照顾她静心养病。家里的事他一手操持，精心安排一日三餐，亲手上灶烹调制作品。李讷对他的手艺颇为称赞。有一次，李银桥夫妇去他们的新家串门，李讷留他俩吃饭：“你们

尝尝老王做的凉粉和荞面扒糕吧。’李银桥夫妇都感到很惊讶：“哎呀，老王还会做凉粉和扒糕？”李讷说：“我和老王在一起生活可享福了。他什么都会做，比我强多了。”对于李讷的儿子，王景清也照料得十分细致周到。考虑到孩子正在长身体，王景清经常为他改善伙食，烧鱼炖肉，并且蔬菜水果从不间断。孩子高兴极了，亲热地叫他“爸爸”。

王景清不仅在家里是一位模范丈夫、好父亲，而且在社会上、在周围居民中也是一位热心人。他离休后自愿担任菜场和摊贩点的秩序维护人员，热心协助公安、工商、环卫等单位搞好社会公共事务，受到群众的称赞。他办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一次，他去农贸市场协助税务部门收税，一小摊贩企图逃税，还蛮不讲理，他坚持收税，寸步不让，以至被小贩打伤。周围的群众闻讯激愤，一起把小贩扭送到派出所。

王景清热爱生活，精力充沛，乐观向上。每天清晨起床，坚持户外锻炼。平时得空就练习书法，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摒弃杂念，陶醉于笔走龙蛇之中。每有得意之作，便送给熟人、朋友观赏。他还爱好音乐，参加了北京军区警卫部队合唱团，有时登台演出。

自江青被关押后，李讷被获准每隔一星期探望一次。婚后的李讷，带着王景清和孩子一起去看江青。江青见到王景清，亦不乏热情，询问了他的一些情况，对他和李讷的结合表示满意和祝贺。江青还问及王景清有什么兴趣爱好，王景清说喜欢锻炼和书法。当时，江青也在练习书法，立即提出要看他的作品。再去时，王景清带去了几幅他写的隶书，江青大加赞扬。说写得好，征得同意留下一幅。江青喜怒无常，其间有一次见到王景清时不理他，叫李讷以后别再带他来。下一次探监，王景清真的没来，她又问李讷，王景清为什么不来？王景清对这位服刑的岳母无可奈何，只得淡然一笑，毫不计较她的态度。

王景清真诚地爱着李讷，辛勤地为生活操劳奔波。由于他的努力，一个曾经非常特殊的家庭复归为像多数中国百姓一样普通的家庭，使李讷享受到普通人生活的快乐。毛泽东在九泉之下得知，一定会露出满意的微笑。这也许是王景清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吧！

不幸失落的六个孩子

毛泽东的一生，前后生有 10 个儿女，除后来众所周知的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外，其余 6 人早年都不幸失落或夭折。而这 6 个孩子中，除毛岸龙是杨开慧所生外，其余 5 人均为贺子珍所生。

毛岸龙生于 1927 年，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第三个儿子。当时，毛泽东因与陈独秀在党内意见相左而受到排挤和打击，心情极不舒畅。不久，又因忙于秋收起义，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直至毛岸龙在上海失踪，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儿子一面。

1927 年杨开慧从武汉回长沙后，毛岸龙随母亲一起住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北角门楼，后又一起回到长沙县板仓外婆家。1930 年杨开慧牺牲后，毛岸龙和两个哥哥一起被外婆向振熙、舅妈李崇德送到上海，来到叔叔婶婶毛泽民、钱希钧的身边，住进了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办的大同幼稚园。1931 年春，因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的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岸龙和两个哥哥又一起寄养在当时公开身份为牧师但实际上是地下党员的董健吾家中，后因董健吾去武汉工作，他们三兄弟只好流落在上海街头。

流浪的生活是十分痛苦的。当时岸龙年纪甚小，尚无独立生活的能力，主要靠两位哥哥卖报纸、拾破烂、帮人推人力车维持生活。终日里露宿街头，居无定处，岸龙终于与两个哥哥失散，从此杳无音讯。据调查，毛岸龙确死无疑。侥幸的是还有一张当年大同幼稚园小朋友们的合影存世，透过那张泛黄的照片，小岸龙和哥哥们那一张张充满稚气的脸依稀可见。

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来到井冈山之后，因音讯隔绝，很快与杨开慧失去联系。后来便与贺子珍结了婚。两人相处 10 年，前后生了 6 个孩子，然而最终活下来的，却只有李敏这一个女儿。

1929 年，在红军二打龙岩时，贺子珍第一次分娩，生下一个女孩。

龙岩是福建省的一个中等县城，在龙川江的左岸，是闽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比较富裕，生意人比较多，红军入城后，在这里建立革命政权，组织工农赤卫队。这样，贺子珍就在县城住下休息。她自从跟随队伍离开井冈山以后，连续作战，居无定所，能够在这样好的条件下分娩，这已经是出乎她的意料了。

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孩子，这是他继岸英、岸青、岸龙之后，第一次喜得千金，自然十分高兴。他笑着对贺子珍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一个好地方出生呢。”

当时贺子珍尚不满 20 岁，过早地做母亲并非她之所愿。但孩子生下后，看着那稚嫩的脸庞，天生的母爱之情油然而生。

孩子刚生下，毛泽东就托人为孩子找到一个可以寄托的人家。他对贺子珍说：

“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

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

贺子珍忍着心中的巨大痛苦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她是个刚强的人，不愿意让毛泽东为这些事情多操心。

红军这次打下龙岩，没停留几天，又主动撤出，为的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由于红军很快会打回来，毛泽东没让贺子珍跟着队伍走，把她们母女隐蔽在城外一家老百姓家里，好让贺子珍产后能多休息几天。

但是同孩子分别的一天总是要到来的。这一天，贺子珍用被子把婴儿裹好，自己把她抱到联系好的那户大嫂家里去。她没有什么衣物留给孩子，只把事先准备好的 15 块银元，放到大嫂的手里说：

“麻烦你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们会回来接她的。”

送走孩子以后，她心里有些难过，觉得周围零零落落，极其冷清，但她没有落泪。当时，她还有个乐观的想法，以为红军在这一带活动，见面是不困难的，哪想到，那一次竟是同亲生女儿的永别。

1932 年 4 月，红军两次打下龙岩，贺子珍回到这个县城。她忙着为军队筹粮筹款，也没忘记要去看望自己的女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按照贺子珍的讲述，找到旧日寄养孩子的大嫂，打听孩子的下落。可是得到的答复是：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贺子珍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愣愣地坐在那里。她这个仅仅做了 20 天母亲的人，不禁产生了惆怅之情，她觉得对不起孩子。

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劝慰她说：

“不要太难过，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事实上，贺子珍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儿女之情中，艰苦的环境，复杂的斗争，占去了她全部的精力。她无暇为女儿的事过分伤感，只好尽快地把这种感情丢开了。

1932 年 11 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因为是个男孩，毛泽东把他与杨开慧的孩子并列，取名毛岸红。当时贺子珍正患痢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又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

奶妈是江西人，当地的江西人好把孩子叫毛毛，入乡随俗，毛泽东和贺子珍很快也就跟着奶妈称岸红为小毛毛了。

小毛毛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像他爸爸。毛泽东非常喜欢他，每次来医院，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又是爱抚。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在贺子珍身边，自己则坐在他们母子身旁，静静地凝视着，一看一个多小时。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毛毛已经两岁多了，咿呀学语，正讨人喜欢。他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6个孩子中，惟一个由两人一起带在身边抚养的，因此备受父母的宠爱。

毛泽东每次出门，到了傍晚，小毛毛都要站在门口，倚门而待，等爸爸回来。有时候，他等饿了，爸爸还没有回来，就会学着妈妈的样子说：“我不饿，我要等爸爸回来一道吃。”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夫妇商定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毛泽覃和贺怡。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弟弟，而贺怡则是贺子珍的妹妹，把孩子留给她们夫妇带着，自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剪开来，就着灯光，一针一线地给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

瑞金和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恐怕走漏消息，小毛毛会遭不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以后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小毛毛也从此下落不明。

解放前夕，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也为了满足毛泽东、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贺怡曾回去寻找毛毛。

毛泽东刚进城不久，还住在香山。一天，贺怡跑来对他说，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现在已经找到了，毛泽东当时听了非常高兴，就详细问了一些具体情况。贺怡仔细说了一些特征后，毛泽东认定和他记忆中的时间、地点、岁数和相貌均不相符。

最后，毛泽东说：“他不是岸红。如果是长征路上红军寄放到农民家的孩子，一定是哪一位红军同志的孩子，想办法找到他的父母，要赶快给他家送去。”

后来，贺怡又转赴江西吉安，继续为寻找毛毛奔波，途中不幸车祸遇难。

1953年，幽居上海的贺子珍给当时的江西省长邵式平写了封信，说她在瑞金时生有一个男孩，叫小毛，长征出发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请千万千万帮助查找……

江西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带着组织上的重托，终于打听到朱盛、黄月英夫妇曾在1934年10月领养了红军的一个小男孩，取名朱道来。

那天，当王家珍看到朱道来的照片时，不禁愣住了。“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呀！”她很快向组织报告了此事。

不久，有关朱道来的材料和照片由中组部转到贺子珍处。贺子珍看完材料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从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朱道来很像是我的小

毛。”她恳请组织上让“小毛”和他的养母一道来上海一趟，想亲眼见见他们。

王家珍、黄月英带着朱道来到了上海。贺子珍仔细地端详着朱道来，顷刻间止不住喜泪纵横，声声颤抖地说：“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

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提议带毛毛去检查身体，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一致。这更使贺子珍确信朱道来就是她当年所生的毛毛。

当黄月英把当年收到的一件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双手颤抖着，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想起了当年送毛毛的情景。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中组部打来电报。要朱道来、黄月英同去北京一趟。

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一行3人作为中组部的客人，住进了招待所。

其实，朱道来的照片早就通过周恩来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有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他也传下话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几乎是毫无疑问了：朱道来便是当年毛泽东和贺子珍遗落在江西苏区的“小毛毛”。

然而，就在这时，半路上突然杀出个“程咬金”来。南京来了一个中年女干部，找到中组部，申明说：“朱道来是我的孩子，你们还给我……”

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起来了。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关于这一情况报告后，果断地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当时，帅孟奇和邓颖超等人一样，家里收养了一批烈士的遗孤、革命者的后代。

当黄月英辞行返乡时，中组部代表组织感谢了她，向她表示敬意。朱道来与养母分手时，哭成了泪人。

朱道来到北京不久，即被送往清华大学附中读书，后来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工科，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听说在南京死了。这是后话。

1933年，也就是贺子珍刚生下小毛毛之后不到一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后来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璋大夫亲自接生的。可惜因为是早产，这个孩子没有活下来。

红军长征途中，贺子珍第四次怀孕。一天下午，她所在的红军休养连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当部队准备翻过一座叫做白山的山峰时，贺子珍的肚子突然阵阵疼痛，她预感到就要分娩了。休养连的连长侯政马上让一些

同志停下来，在路边找了一间房子，把贺子珍抬了进去。连里的医生和护士则留下来为贺子珍接生。

休养连的队伍继续前进，后续部队也一支一支地从他们的屋前经过。最后，连殿后的部队也要走过去了，他们留下话来：敌人正从后面追赶过来，你们必须在下午 4 时以前翻过山去，否则就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留下来的连里的领导紧张地守候在“产房”外面，一面为贺子珍能否顺利分娩而担心，一面计算着时间，考虑如何应付眼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产房”是一间用单层砖砌成的破旧房子，里面空无一物，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灶，甚至连门都没有，只剩一个破门框支在那里。可能是因为靠近路边，这里已多次被敌军洗劫，贺子珍只好躺在担架上生产。同志们张罗着想烧点水，可是没有柴禾，水井也不知道在哪里。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从容地寻找。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后，担架员便抬着她匆忙上路了。贺子珍的衣裤上、担架上，都留下了揩抹不掉的斑斑血迹。

前面的路程遥远而又艰苦，对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处置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这是不需要作任何讨论的，也是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的。毛泽民的夫人钱希钧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贺子珍用虚弱的手从身上掏出仅有的 4 块银元，交给钱希钧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

担架员抬着贺子珍走了没多久，钱希钧抱着婴儿又追上来，对贺子珍说：“你赶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或者留下个什么东西，日后好相认。”

贺子珍摇摇头，刚毅地说：“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但是后来，贺子珍惟一留下的女儿李敏到了毛泽东身边，她自己孑然一身度过那漫长的岁月时，还是牵肠挂肚地怀念起被自己扔下的这个女儿来。她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她后悔当时自己没有给孩子留下什么东西，以便日后寻访。

后来她还哀伤地说：“长征路上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有看清楚她长的是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是丢在了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的死活。后来，毛泽东知道我分娩后把孩子送给了人家，点点头，赞同地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为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1937 年，贺子珍第 6 次也是最后一次怀孕，这时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已出现裂痕，便毅然单身前往苏联。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1938年5月，生了一个男孩。一位苏联老太太，热心照顾她坐月子。满月后，她把孩子送到婴儿室，自己则进了培养亚洲地区的革命者专门开办的东方大学。

不幸的是，孩子在10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婴儿室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来得及送医院抢救，就夭折了。

贺子珍感到万分悲痛。她觉得，孩子的死完全因为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那几天，孩子的情况不大好了，她怕影响学习，舍不得请假，仍然把他送到婴儿室去，没想到竟耽误了治疗……她流着擦不干的眼泪，把孩子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公墓，埋葬了。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家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有六位直系亲人献出了生命（其他亲戚更多，如弟媳赵先桂，妹夫陈芬，内侄女杨展……），但人们很少知道毛泽东不幸失落的这6个孩子。毛泽东说：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侄女毛远志

毛远志是毛泽民和王淑兰的女儿，1923年5月5日（阴历3月20日）生于湘潭韶山。1990年7月6日去世。

孩提时代，毛远志像个假小子，活泼淘气，爱和男孩子玩耍、干仗。她尤其喜欢和堂哥毛岸英、堂弟毛岸青游戏（当时毛岸龙还没出生，岸英比远志大半岁，岸青比远志小半岁），经常玩得热火朝天，在田野里四处追跑。每每玩急了，远志就拔出小小的拳头，大声呼喊着重和哥哥弟弟滚打在一起，毫不相让，岸英岸青兄弟俩拿她没办法。远志的伯母杨开慧觉得这个“野妹子”很有趣，曾对王淑兰说，人家的妹子性情都很稳重、害羞，你家妹子正相反。

毛泽民追随兄长毛泽东参加革命后，长期在外，很少回家。王淑兰在乡下，忙于妇女、农会工作，同时独自操劳农活，抚养孩子，生计维艰。尤其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白色恐怖严重，处境十分危险，不得不背井离乡，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毛远志曾跟随母亲一起在外流浪，曾讨饭、打工，历尽种种苦难。

1929年夏天，母亲王淑兰不幸被捕，6岁的远志跟母亲一起被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1930年，红军攻打长沙，她们母女也因此获救。当时，王淑兰孤身一人，不仅要照顾女儿，而且还要照顾在监狱中领养的儿子毛华初。她自己又是一双小脚，不能跟队伍行军打仗。于是只能过起流浪的生活。后

来为了活命，迫不得已，忍痛把女儿远志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1937年，联系中断多年的父亲千里来信，要远志去延安学习和工作。这年年底，远志和一位远房表姐同路，通过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于1938年春来到延安。

等毛远志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延安的时候，父亲毛泽民却因为健康原因取道新疆到苏联治病去了。于是，在到延安的第五天，毛远志去见了伯父毛泽东。她拿出母亲托她带来的两斤云片糕给伯父，毛泽东非常高兴，吃得很香，说好多年没吃到这东西了。

毛泽东一边吃着云片糕，一边端详着侄女，见她瘦小病弱的样子，十分心疼地说：“我们的远志受苦啦！”

一句话没说完，毛远志的泪水已经哗哗地流下来了。过去，她要饭的时候没有哭过，和母亲一起坐牢时没有哭过，现在怎么也忍不住在伯父的面前痛哭一场，这是一种回首过去不堪言说的痛哭，也是展望明天苦尽甜来的痛苦。毛泽东在一旁看着，心里也是酸酸的。是啊，像远志这样小小的年纪，就历尽了人间的种种困难，现在终于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亲人，终于看到了未来生活的曙光，有什么理由不让她痛哭一场呢？

待毛远志稍稍收住抽泣的声息之后，毛泽东又向她问起了家乡的许多情况，然后扳着手指头一算，问道：“我们的远志今年15岁了吧，你上过学没有？”

听了伯父的问话，毛远志小嘴一歪，差点又要哭出声来。别的孩子上学的时候，她正跟母亲一起在监狱受尽折磨，后又是逃荒，又是给人家当童养媳，哪来的机会上学呢？

毛泽东一看又触到了侄女心上的伤处，赶紧安慰她说：“别哭，伯伯送你去上学！我们的远志要把失去的童年补回来！”

就这样，毛远志进了延安保育小学，实现了她过去不敢想象的愿望。

远志离家前，母亲再三叮嘱，伯父干的是大事，少去干扰他，小孩子要靠自己奋斗。因此，远志在延安7年半，去伯父那里的次数很少。

毛泽东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见了远志常常要同她谈谈家里的事。有一次，毛泽东对她说：“你有个大哥，活到7岁了，得了黄疸性肝炎，送到医院治疗，洗了澡后就死了。”这是毛远志第一次听说她还曾有过一个哥哥。

后来，毛远志发现，每次与伯伯见面，毛泽东总是称她为“我们的远志”，表现出一种打心眼儿里的喜爱。也许是由于父亲不在身边吧，也许还有因为她自小吃过太多的苦的原因，毛泽东对她有一种超乎亲生女儿的亲情。

在延安上学的那段日子是令人难忘的。在班上，别的同学年纪都很小，远志却高出他们半个头，可是由于过去没有进过学校，成绩却比许多调皮的小孩子差，这一度使她内心里感到非常难堪。不过她并没有气馁，也没有被学习上的困难吓倒。她把几册小学课本比做大山，把自己比做爬山的人。为了爬过这几座大山，她每日里起早贪黑，花了比别人数倍的时间来刻苦攻读，终于使自己的成绩很快赶上了其他同学。后来，毛泽东了解她的这种学习精神之后，几次当面表扬。

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亲属要求很严。毛远志刚到延安时，不习惯吃北方的小米饭，再加上有胃病，便想法到食堂找来一点米饭的锅巴泡水吃。可是，这样并没有减轻她的胃病，反而常常使胃痛难忍。毛泽东身边一位姓孙的秘书见此情景，给了她一块钱，叫她每天花 5 分钱买碗粥喝。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批评了她，说：“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毛远志听从伯父的意见，开始锻炼着吃小米饭。很快她就适应了。

毛远志的母亲王淑兰在湖南搞地下工作，是一边讨饭，一边组织和发动群众的。为了开展工作和帮助母亲摆脱困境，毛远志曾给毛泽东写过一信，要求给她母亲资助 20 元。对于这样完全合情合理的事情，因为涉及亲属，毛泽东也没有答应，而是要她按组织程序向上级报告。报告送到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手里，他批示同意。陈云对远志说：“你提出的要求太低了！”

毛远志的伯父母、父母、叔婶，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为革命事业不懈地奋斗和忘我地工作，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为他们的后人、追随者的远志，来到延安后，渴望着像他们一样，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可是，毛泽东叫她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远志很不高兴，毛泽东见她那不乐意的表情，便耐心地告诉她，这是党的外围组织，参加民先，也是为党工作，你要好好地宣传抗日嘛！几句话就把她说通了。1938 年 7 月她加入民先时，曾暗下决心，不成为正式的共产党员，不去见伯父。同年 10 月，她入了党，当时只有 15 岁半，是预备党员，1941 年满 18 岁时转为正式党员。毛远志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取得这些进步的。毛泽东获悉后非常高兴，当远志来杨家岭看头疼病顺路看望他时，他留远志住了两个星期，直到把病养好。

1938 年 9 月，毛远志被调到中央军委二局做机要工作。她对自己要求严格，处处吃苦耐劳，一贯克己奉公，工作积极肯干，生活俭约朴素，待人热情诚恳，表现非常突出，先后被评为“模范妇女”、“先进青年”和“优秀党员”。1943 年，她因工作劳累，体力不支，转业到北方局组织部工作。

1945 年，毛远志和曹全夫结婚。曹全夫同远志一样，也是 1938 年参加革命并入党的，他曾在抗大学习过。婚后，两人要求去东北工作，给上级并

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复他们一信，表示同意，鼓励这对革命伴侣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遗憾的是，考虑到工作队有可能在路上遭埋伏，万一信落入敌人之手，会影响大家的安全，他俩把信的内容都毁掉了，只留下抬头和简单的问候，以作纪念。

离开延安之前，毛远志和丈夫一起到毛泽东住处告别。到这时，毛泽东才将久已压在心里的一个秘密告诉他们：毛泽民已于两年前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本来，毛泽东也想早一点儿告诉侄女这个不幸的消息，但考虑到她还太年轻，工作和学习又非常紧张，怕她承受不住。现在，孩子已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了，即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再见面时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将真实情况告诉远志。远志和丈夫听后潸然泪下，毛泽东忍受着心中的痛苦，劝导了他俩一番。最后，毛泽东给他们留下了珍贵的临别赠言：一、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二、无论到哪里，都要团结；三、无论到哪里，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任何特殊。这三句话，成了他们以后的行为准则。

建国后，毛远志服从党的需要，工作多次调动，从无怨言。先后在江西省妇联、中南军区司令部、中组部交通干部处、中央工业交通部干部处等单位工作。“文革”中，她在爱护、保护老同志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71年去江西五七干校，不顾身体病弱，坚持参加生产劳动。1972年调回中组部。

毛远志于1982年12月离休后，为编写父亲毛泽民和母亲王淑兰的传记，曾和丈夫曹全夫自费去湖南、江西搜集资料。因经费困难，活动受到限制。但他们不辞辛苦，仍然走访了不少地方，收获不小。返京后，着手整理、编写，已有部分初稿。不幸的是，此项计划因毛远志的去世，受到影响。毛远志在去世前，已隐约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特地把自己和毛泽东接触的经历作了回忆，口述录音，使这则珍贵的史料得以留世后传。

生前，毛远志从不显露自己和毛泽东的侄伯关系。在工作单位，当大家谈及毛泽东时，她或者说“毛主席”，或者说“老人家”，不称伯父，也不谈论家里的事，有人甚至不知道她是毛泽东的亲侄女。每逢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和忌日，去纪念堂瞻仰遗容时，她总是悄然而来，默默而去，签字簿上从未留下她的大名。

1990年7月6日，毛远志因患癌症，突然去世，享年67岁。中组部对她革命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在悼词中赞誉她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好儿女”。她的骨灰被归葬在韶山，与母亲

王淑兰为伴。

侄子毛华初

毛华初，又名毛远怀，原名王华初，湖南浏阳人。母亲罗醒是共产党员，同毛泽民的结发妻王淑兰是狱中难友。她们俩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互相托付，今后谁牺牲了，活着的人就担当遗孤的母亲。后来，王华初的母亲英勇牺牲了，她的儿子便改姓毛，成了王淑兰的养子。因此，《韶山毛氏族谱》记载他是“泽铭抚子远怀，字式谷，民国十二年癸亥二月初二辰时生”。

王淑兰出狱后，带着亲生的女儿毛远志和养子毛华初继续在白区坚持工作，艰苦度日。由于生活所迫，毛华初从小就讨米要饭，放牛砍柴，受尽了旧社会的苦难。

1938年7月，毛华初和毛泽普、胡觉民等人一起离开韶山，来到延安。当时毛泽东住在凤凰山沟的北山坡腰间。院子整齐清洁，院中间有几棵碗粗般的枣树，靠山是一排四孔石窑洞，左右两旁是平房。毛泽东只住了两孔窑洞。外间是会客室，里间则用一块蓝布帘从中隔开，作寝室和办公室。窑洞简陋得谈不上什么陈设，靠窗户放了一张又长又宽的大桌子，上面堆满了公文和书信。后半间架了一张单人床，铺盖和战士们的一样。

毛华初的族兄毛顺义（毛新梅烈士之子）领他一起去见毛泽东。遵照王淑兰的叮嘱，毛华初见到毛泽东叫了一声大伯，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毛泽东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又端详了一会，说：“你这么小也来了，还是回去吧！”当时，毛华初一听急了，忙抢着说：“妈妈讲这里有书读，还要我问您好。”毛泽东又笑了，说：“这里是有书读，但敌人不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读书。还要打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延安。要躲飞机，要跑路，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和窝窝头，你吃得消吗？”毛华初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给地主放过牛，讨过米，跟妈妈坐过牢，吃得消，不怕苦。”毛泽东高兴而又风趣地说：“哟，原来你吃过苦，那就打收条留下吧。”接着，他又严肃地说：“不过，要记住，你过去吃的是旧社会的苦，地主压迫农民的苦，那是阶级苦。从今天起，你就要为革命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胜。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毛华初初到延安，大伯就给他上了一课。

毛华初在延安搞过机要工作。一有机会，他便出入毛泽东的住所。有一天，当他去看望大伯时，正赶上彭真和王若飞两人在此，毛泽东便对他们介绍说：“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一个孤儿，是我大弟弟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带

的。”

彭真笑着说：“带的也是一样！”

谈起毛华初的父母，毛泽东感慨地说：“在中国革命的战争中，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啊！有多少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留下多少这样的孤儿啊！”最后，他又说：“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一定要打倒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蒋家王朝非推翻不可！”

一席话，说得毛华初热血沸腾。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时，毛华初正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后来党中央决定让在延安学习的干部分赴各地，他便积极报名申请，被批准去东北。

10月的一天下午，毛华初高兴地哼着歌去枣园向大伯告别。毛泽东兴奋地说，“啊，你要去东北。好！我赞成。”当毛华初提出要一匹牲口时，毛泽东温和地说：“枣园的牲口拿不得，都是公家的。”毛华初顿时面红耳赤，羞得不敢再作声了。毛泽东见他十分难堪，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要点钱吗？可以从我的稿费里给你一点钱。”随即叫警卫员取了一些边币给他。临别时，毛泽东伸出那宽大的手，紧握着侄子的手说：“去吧，到人民群众中去，一切都要依靠群众、依靠党。”毛华初心里很感动。这时，毛泽东又叫警卫员将自己正在穿的一件大衣拿给他，像慈父疼爱孩子那样叮嘱道：“天气渐冷，拿去在路上御寒吧。”

这是一件蓝色斜纹布棉大衣。后来到张家口时，一位从延安出发同路的朝鲜同志，因组织调动要立即回国而苦于没有大衣。毛华初便将这件大衣转赠给那位朝鲜同志了。

毛华初到达东北后，在当时的松江省参加接管和土改等工作，先后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以及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等职，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9年8月，湖南已经和平解放，他便随南下工作团来到湘潭县，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后来又相继担任了县委副书记、书记。1955年4月，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

这年8月，毛华初到北京参加全国林业工作会议，顺便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到他非常高兴，询问了他这几年的工作情况，对他的工作成绩表示满意。得知毛华初是来参加全国林业工作会议的，毛泽东高兴地说：“你搞林业很好，林业要发展，还要靠你们多努力。”沉思了一下，他又郑重地说：“你是林业厅长，你告诉林业部，不要变成一个砍伐部，要变成一个管林部。”寥寥数语，表现出了他对林业发展的担忧和关心。

1957年，毛华初以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的身份到北京参加教育部举办的扫盲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派车把他接到中南海见面。毛泽东得知

他这次到北京来是参加研究、部署扫盲工作的会议后，便点点头说：“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回去要把它做好，要扫除文盲，把教育事业办好！”一席话，表明了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特别是扫盲工作的极端重视。

1960年，毛华初任湖南省档案局副局长之职。不久，毛泽东到长沙视察，得知他的工作又有变动后，便对他说：“你还是多搞点调查研究，档案局让那些老头子去搞。”后来，毛泽东便向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建议，由省委成立一个政策研究机构，派几个人去搞调查研究。省委当即照办，并调毛华初任调研组长。省委政策研究室正式成立后，毛华初又担任了副主任，并兼省农林水利办公室副主任。从此，他便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随时向毛泽东反应调查情况，受到毛泽东的好评。

1961年初，毛泽东为了带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了解全国农村的真实情况，以便早日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各带一个调查组到外地去调查，其中胡乔木带领的调查组来到湖南。

一天，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把毛华初叫去，告诉他说：“乔木同志率中央调查组来了，主席指示他们去韶山调查农村情况。省委考虑到你是韶山人，情况熟悉，讲话易懂，决定派你陪乔木同志去调查。”

当时，毛华初也正在为湖南农村的经济情况忧心如焚，听说伯伯亲自派调查组来了解情况，心情十分振奋，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问张平化：“什么时候动身？”

张平化看他着急的样子，也爽快地回答道：“明天就动身。”

就这样，毛华初第二天就赶去与胡乔木的调查组汇合，前往韶山做了大量的调查。调查中，毛华初的重点对象是东茅塘生产队。由于这里是他小时候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群众关系非常熟，乡亲们都愿意向他反映真实情况，因此他很快就了解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他将这些材料加以整理，写成调查报告，通过胡乔木直接报毛泽东审阅。

在报告中，毛华初这样写道：

四月一日，我回到曾在二十多年前居住过的家乡东茅塘访问。乡亲们普遍反映，食堂办得不好，房子又挤又破，锅灶没有了，生活不如前几年了，山林破坏太严重。在访问中，大家着重谈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食堂问题。大家主张目前仍维持全年指标到户，按月发粮，食堂煮饭，自己种菜。到插秧后再散伙。第二，养猪问题。大家认为只要每人有七厘到一分自留地，粮食到户，有细糠碎米，猪苗来得快的话，经过今年和明年，猪就会发展起来。第三，

山林的管理问题。大家认为只要按高级社时的办法去管就能管好。具体做法是，山权属公家，山上树木都是公家的，包给私人培育管理。看来这个办法值得研究采纳。对树木，也可以研究一个包管、包培育、分成奖励的办法。

这时，毛泽东已来到长沙。报告很快送到了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认真的阅读，一方面，他从中知道了侄子毛华初也参加了这次调查，感到十分信任和欣慰；另一方面，他也为报告中反映许多情况忧心如焚。

1961年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将毛华初关于东茅塘的调查报告和胡乔木报送的另外三个调查报告一起批转给张平化，让他在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上印发，予以讨论。并让张平化再印20份送给毛泽东自己，他准备让更多的同志学习和讨论这些材料，以便及时解决其中涉及的各项问题。

看了毛华初的报告，毛泽东还觉得不解渴，又招呼毛华初到他的住处，要亲自听听更详细的汇报。

毛华初一进门，毛泽东就指了指放在桌上的调查报告，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听了平化同志的报告，又看了乔木同志送来的这些材料，知道你也参加了调查组。这很好。现在，你再给我谈些乡里的情况，要具体一点。”

毛华初一看主席伯伯完全沉浸在他们反映的情况里面，也就顾不上寒暄，喝口水润了润嗓子，便滔滔不绝地汇报起来。

“我陪乔木等同志在韶山作了大量调查，并且在韶山公社确定了以桥头湾和卯山冲两个情况不同的生产队作为调查点，掌握具体数据。还到了湘潭县委和湘乡县委听取汇报。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他们的意见。当前，农村水肿病确实很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不断增加。”

听到毛华初说他们还去了湘乡县，毛泽东十分迫切地问起他的外婆家——唐家坵的情况，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毛华初如实地讲到，由于唐家坵一个屋场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队，绝大部分人姓文，都是自家兄弟叔侄，加上他们历来有勤劳致富的传统，因此现在虽然生产和生活情况都很一般，但还算勉强过得去。听到这里，毛泽东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让毛华初继续汇报其他调查情况。

谈话之间，时间飞快地流逝。护士已经几次进来催促毛泽东休息，毛泽东都示意毛华初不要起身，继续他的汇报。偶尔，毛泽东也作一些插话，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道：

“早在今年1月举行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我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党一些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传统已经不太灵了，对下面的情况也都不摸底了，大概

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所以，全国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情况，我是有直接责任的。”

这次汇报，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看得出，他对毛华初的这次调查研究工作是十分满意的。临别前，他对毛华初说：

“你刚才谈了这么多，看来调查工作很认真，很扎实。你是说了真话的。当干部，汇报情况就要讲真话。现在有些人不是这样，向上面汇报，光拣好听的说，报喜不报忧，夸夸其谈，结果是害人不浅啊！”

1962年元月，毛泽东在上海。他派人给毛华初打电话，让毛华初来上海。原来，毛泽东来上海前，收到毛华初寄给他的一个调查材料，是反映农村人民公社的金融管理、自留地和市场等问题的，毛泽东看了之后，便约他来上海谈谈。见面之后，毛华初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对如何搞好农村调查研究工作，作了一些具体指示。

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上海一别后，毛华初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毛华初作为家属曾到北京参加追悼会，向毛泽东遗体告别。

侄子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民和朱丹华之子，1941年2月14日生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1976年被捕，判刑17年，现已刑满释放。

1975年9月，毛泽东身边来了一位特殊人物。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也靠他到毛泽东的病榻前禀报。

此人就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

毛远新的童年时代有过一段悲惨的经历。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不久，毛远新来到了人间。当时国内弥漫着反共气焰，新疆督办盛世才亦撕毁了与中共达成的统战协约，转向反共，从1942年9月开始将在新疆工作的许多共产党人逮捕，投入监狱。在第一批被抓的人员中就有毛泽民、朱丹华及毛远新。毛泽民被关进男牢，朱丹华和毛远新母子关在女牢。由于毛泽民是“重犯”，连探监都不允许。当时毛远新才1岁多，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有一次，朱丹华请人传递衣物，在帽子的衬布里夹了一张纸条。她捉住毛远新的手，写了“爸爸好”三个字，还告诉他，“我们母子在一起”以释丈夫的悬念。1943年，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等人被秘密杀害，年仅3岁的毛远新从此失去了亲生父亲。母亲带着他继续坐牢。直到1946年7月，在党中央的营救下，他才随母亲和其他难友们回到延安，

开始了新的生活。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出于对大弟毛泽民的怀念，和照顾烈士遗属的责任，把毛远新留在身边抚养、读书，待他像亲生儿子一般。

在“文革”以前，毛远新的成长道路非常顺利。1960年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是全国重点大学，是培养军队人才的最高学府。在大学期间，毛远新读书用功，成绩也不错。1965年大学毕业，他曾下连队当兵半年。

平时，毛泽东对他教育很严，常和他谈话，发现他有不正确的思想，当即进行批评。有一次，毛远新陪毛泽东游泳，这一天天气较冷，毛远新上岸后，感到有点冷，就脱口说道：“还是水里舒服些。”毛泽东瞪了他一眼，批评他道：“你就是喜欢舒服，怕艰苦，不肯吃苦。过去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服务的，心中有崇高的理想。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将来你不做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当左派呢？”毛远新满脸通红，尴尬地说：“我还是有点希望吧？”毛泽东转而鼓励他说：“有希望好 超过我们的标准更好。”

本来，有过童年痛苦的磨炼，有烈士父亲的榜样，有革命家庭的熏陶，有伯父毛泽东的严格教育，毛远新的成长该是不成问题的，有远大前程的。不料，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远新竟一步走入误区，且越陷越深，直至不能自拔。这种现象，对他来说，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是特殊的家庭背景、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个人野心膨胀的产物。

1966年，“文革”全面发动。当时，中央有项规定：凡系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获悉后，立即返回哈军工，率先组织起红色造反团，并将斗争的矛头对准院党委。

由于毛远新的特殊背景，所以该校师生争先恐后地参加红色造反团，势力迅速扩张，连校外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前来挂钩联系，在哈尔滨形成了以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为核心的造反派联合组织，取名黑龙江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

这时，东北局所在地辽宁省沈阳市的形势比较混乱。造反派一浪接一浪地掀起炮轰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恶浪。毛远新到北京时向毛泽东汇报了东北的局势，毛泽东嘱他多留意一下辽宁的形势。事后，红卫兵组织将这次谈话整理印刷成传单，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广为流传。从此，毛远新开始为世人所知。

1968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任副主任，接着又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政委。当时辽宁有人吹捧毛远新说：“远新同志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有了这样的接班人，我们党才有希望，我们国家才能兴旺。辽宁省有远新同志，是我们的光荣”

1973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毛远新搞出一桩佳作，即所谓“交白卷”的反潮流事件。有位名叫张铁生的考生考试成绩很差，却在考卷上胡诌一通，事为毛远新闻悉，借此大做“反潮”的文章。他指使《辽宁日报》在7月19日发表张的“考卷”及编者按，标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10日，《人民日报》又以同样的标题在头版全文转载，再加上编者按。从此，张被封为“反潮流英雄”，全国亦因此而笼罩在“反潮流”斗争的风暴中。

张铁生经毛远新召见鼓励后不久，竟然获任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同时，毛远新又着手摘所谓“朝农经验”。“朝农经验”系指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坚持开门办学，与传统的教学方法顶着干的“经验”。毛远新的真实用意，是想在全国搞出一个教育样板来，这样既可以在教育界掀起一股“反潮流”之风，又能借此树立他个人的形象。

1974年年底，毛远新以朝阳农学院为基础，办起八所“朝农式的农业大学”。国务院科教组立即在该院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毛远新还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总结出十条“经验”。中共中央当即要求各省、市仿效“朝农经验”，全面推广。

江青同毛远新的关系非同寻常。众所周知，江青对杨开慧和贺子珍生的毛岸青和李敏非常冷淡，但对毛远新，江青却待他特别好。毛远新公开称呼江青为亲妈，惟其马首是瞻，而江青亦待之如己出，关切备至。1965年，毛远新患病毒感冒，发高烧住医院治疗，江青特地嘱医护人员每天早晚打两次长途电话，向她报告病情，甚至还要问及毛远新的体温多少。

江青对待毛远新的感情，甚至比对她亲生女儿李讷还要好。李讷有什么要求，自己又不敢贸然向江青开口，便叫毛远新出面与江青谈，这一着往往有效，因为江青对毛远新是有求必应的。

毛远新的婚事，也是江青一手操办。毛远新直至1975年仍未成婚，江青屡次催他早日办婚事，他却总是推脱说时间还不迟。这一年，江青硬自作主张在高干女儿中为毛远新物色一个“佳偶”。先前毛远新亦曾有过一个才貌兼具的女友，在军队里做干事。江青偏偏看不上眼，毛远新惟江青之命是从，只能忍痛回绝。

毛泽东对毛远新要求很严，和江青的主张相反，他特嘱毛远新别找高干女儿做对象，要找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工作妻子。江青只得放弃自己的主张。

后来总算万里挑一，物色到一个绝代佳人，此人为上海一家织袜厂的女工，叫全秀凤，长相和身材俱系上乘。毛远新闻讯赴上海相亲，一见钟情，便双双抵京晋见江青。江青见后十分满意，给了 1.5 万元钱，让他们返沪速筹婚事。

江青在上海的死党、上海市委副书记王秀珍为了奉承毛远新，特拨公款 6000 元给全秀凤添置嫁妆，并准她进出友谊商店随意购买用品，单高级织锦缎被面就买了 10 条之多。王秀珍还以便于保卫高干家属为借口，批下宽敞的新宅，全秀凤娘家得以出谷乔迁，这使得毛远新对江青更加感恩戴德。

1975 年，毛泽东病情日重，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便放下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要职，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为“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江青把毛远新调来，充任“联络员”，自认为下了一着“妙棋”。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她把毛远新派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82 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见也很少了。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主要途径。

“我感觉到外面有股风。”毛远新答道。

“有股风？”病中的毛泽东，虽然言语含混，听力下降，思维却依然敏捷。

“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从毛远新的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这股风，比 1972 年借批极左来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凶。”

年迈的毛泽东眉头紧蹙，双目注视毛远新。这是他关注某人说话时常常出现的习惯姿势。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现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些。”毛泽东关切地说道。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

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毛泽东吹风。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毛泽东向来视“文化大革命”为他的一大功绩。他曾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成果”整掉了。岂能容忍！

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

1976年4月爆发“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病倒不起。毛远新向他反映该事件的情况，有意歪曲事实真相，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批准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意见，并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毛远新参加了治丧工作。事后，叶剑英等认为毛远新不宜继续留在北京，华国锋也对江青说：政治局意见，认为毛远新应该早日回辽宁省去。江青大吵大嚷不同意。

10月，“四人帮”被粉碎，毛远新也被拘留审查。1980年11月至12月审判江青反党集团一案时，毛远新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后来，又到江西其母亲朱丹华处监外执行。

1990年7月6日，毛远新的姐姐毛远志因患肝癌在北京去世。在追悼会上，熟悉毛远新的人惊讶地发现，毛远新也来参加追悼会了。那天，他戴了副墨镜，头发显得很稀疏，面目沉郁，不声不语地站立在人群里，向姐姐作最后的告别。

刑满以后，毛远新经有关部门批准，到上海重新分配工作，回到了妻子全秀凤的身边。在他入狱不久出生的女儿，这时已进入风华正茂的年代，其长相和母亲相像，很秀气。可惜的是，她从出生至今还不会说话，原因不得而知。此后，年过半百的毛远新开始了另一种生活，既有与妻儿团聚的天伦之乐，又有照顾聋哑女儿的劳顿和忧郁。

侄子毛楚雄

毛楚雄是毛泽覃和周文楠的儿子，1927年9月8日生于湖南长沙。曾用名周楚雄。1946年8月牺牲。

苦难童年

1927年初夏，毛泽覃从武汉奔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他的妻子周文楠因近临产，回到老家长沙。9月8日（农历8月13日）毛楚雄诞生在小吴门松桂园小巷的一栋古老的小楼里。

1928年春，楚雄出生不到半岁，母亲周文楠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小楚雄每天由年迈的外婆抱到监狱里去吃奶。不久，母亲患了重病，小楚雄突然断奶，也病了。外婆只得每天熬点米汤抚育他。为了安全起见，外婆将楚雄改姓周。1930年春，红军攻下长沙城，周文楠被救出狱，回到家中看望她未满3岁的孩子。几天后，红军退出长沙，周文楠又随部队离去。

红军长征后，毛泽覃留在中央苏区，担任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在瑞金的一次战斗中牺牲。这年，8岁的楚雄在松桂园附近的一个小学上学，已渐渐懂事了。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外婆把小楚雄拉到身边，将他爸爸牺牲的事告诉了他。小楚雄听后，顿时脸色煞白，失声痛哭。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党组织曾派人寻找楚雄的下落。但因到处是白色恐怖，加之楚雄隐居小巷，又改了姓，一直无法联系上。1937年5月，外婆遇见一位韶山妇女，开始和韶山建立了联系。抗战爆发后，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得知后，徐特立马上派人找到松桂园1号探望烈士的遗孤。不久，楚雄一家被安排回韶山居住。

韶山求学

1937年11月底，楚雄来到韶山冲，外婆激动地对他说：“楚雄，从今天起，你是韶山人，不姓周，该姓毛了。”

已经是10岁的楚雄，听后很懂事地点头说：“好！我本来姓毛，我叫毛楚雄！”

毛泽东在延安得知楚雄有了下落，并搬到韶山，很是高兴。他时时关怀着楚雄的生活和成长，多次给楚雄寄生活费。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给堂兄毛宇居的信中写道：“楚雄等已寄微款，尔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

毛楚雄在韶山，起先由舅舅教他读古文，学历史，后来到韶山毛氏宗祠初级小学读书。1940年他考入韶山私立思三小学读高小，1941年毕业。

楚雄生长在一个革命的家庭，外婆、舅舅和韶山的叔伯们经常给他讲述大伯父毛泽东、二伯父毛泽民、父亲毛泽覃、姑姑毛泽建、大伯母杨开慧等前辈的英勇事迹，使他逐步懂得不少革命道理，立下宏伟的志向。他在一篇作文《试述个人的志愿》中写出了自己的抱负和誓言：“我想做一个改革社会的人物，为国效力”；“继父之志，报父之仇”。

在学校里，楚雄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尤其是他写的作文，思想敏锐，文字精炼生动，受到老师的赞赏。他在一篇作文中说：“现在国家已被暴日侵略，危急到了万分，例如刀架在头上，火烧在眉尖一样。我们小朋友也该团结起来。”“我们不能背起枪，到前方去和鬼子血战，可是，也能在后方做救国工作咧。”文章里充满着战斗的激情。在《抗战建国》等作文中还写道：“我国现在抗战是为什么呢？一是因为暴日之侵略，忍无可忍而战。二是因为全人类的公义而战。三是为了要夺回全世界人类的公理而战。”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些地方，将士们：我们不要抱着悲观，应该为国家努力，应该为祖国争光荣，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收复失地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他不仅对抗战必胜充满了信心，而且还颇有见地地谈出一些关于如何抗战的看法。他说，“要抗战才能建国，要建国必须抗战”，“在前方的应该努力作战，在后方的应该努力读书和宣传，建筑新的中华民族”。并很有见地地指出：“前程的路，不是平坦的，崎岖艰难，多鬼多魔，所以要在这青年时代，努力向前猛进，千万不要做事处优，虎头蛇尾，青年想要达到成功的目标，非要吃苦不行！”

他的这些作文经老师和同学们一宣传，闻名全校。有的人不相信，认为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是写不出来的。有一次，县里一个督学来韶山“视察”，听了校长的介绍，看了楚雄的作文，很是惊疑，便把楚雄叫了去。他拿着教科书有意问了几个难题，楚雄在督学面前不慌不忙，对答如流。督学大为惊讶。又叫楚雄作文。楚雄胸有成竹，下笔成文，一挥而就。这时，督学赞叹不已，连连说，“非凡之才！非凡之才！”不仅称赞楚雄，还给学校发了甲等教学奖。

“皖南事变”后，韶山和延安一时联系不上，党组织寄给楚雄和外婆的钱也收不到了。加上灾荒连年，兵荒马乱，生活更加困苦。14岁的楚雄被迫休学，靠种田谋生。在家务农的日子里，他很能吃苦，几乎所有的农活都干过，犁田、耙田、插秧、割禾、种菜等。除此之外，每天还要上山打柴。外婆见他年少，深山远路担子重，加之韶山一带，还经常有老虎出没，便叮

嘱他不要走远了。但他总是劝慰外婆放心，每天和大人一样，从深山里打柴挑回来。他做事不戴斗笠，也不穿鞋，总是一双赤脚。由于经常锻炼，他很有能耐走路，有时去湘乡县城，来回 100 多里山路，他常常一双赤脚，当天去，当天回，走得很快。

奔向延安

1944 年，王震率领三五九旅由陕甘宁边区南下，开辟和扩大南方根据地。临行前，毛泽东特地嘱托王震到湖南后将楚雄带到部队去。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于 1945 年北撤经过湘潭时，其中有支队伍在韶山进行休整，就将这个嘱托转告给韶山的地下党组织。

1945 年 8 月的一天傍晚，韶山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找到毛楚雄，对他说：“你大伯捎信来了，要你随王震旅长到延安去！”毛楚雄一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大喜过望。是啊，多少年来，他不是做梦都想着要去延安去找大伯干革命吗，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很快，楚雄由人护送，来到湘阴白鹤洞，找到了王震率领的部队，当上了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时隔不久，王震率领南下支队北撤。楚雄随军北上。他和战友们一起绕过烟波浩淼的洞庭湖，跨过滚滚滔滔的长江，终于来到了湖北省黄陂县，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合。

部队安定下来以后，很快发现毛楚雄文化水平不错，于是便让他搞宣传工作。但是楚雄心里却想的是要扛枪打仗，当一名战斗英雄。但部队的首长们都知道他是毛泽东的侄儿，革命烈士的遗孤，不让他到最危险的第一线去打仗。没有办法，楚雄只好一心一意去完成首长交给的宣传任务。

不久，毛楚雄随军从黄陂到达湖北宣化店。这里是我军中原区司令部所在地。楚雄一进入根据地，就积极参加筹粮和收税工作，调查了解各乡的经济情况，向地主派粮，筹款，挑谷，押船，什么都干。

1946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鄂东、豫南地区的中原解放军，我军奋起应战。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不等战斗结束便实行分路突围。6 月底，楚雄随部队突围，从湖北宣化店出发，紧急行军打仗 20 多天，7 月中旬到达河南淅川县，碰上了王震，王震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上下打量着他：小伙子英姿勃勃，身材魁梧，穿一身灰布学生便服，眼睛大大的，脸上有颗黑色的平痣。王震高兴地说：“小毛跟我走。”楚雄笑了笑，立即向首长敬了个礼。随后，他就跟着三五九旅，继续西征，奔赴延安。

英 勇 捐 躯

8月7日，毛楚雄跟王震抵达陕西镇安县。盘踞西北的胡宗南部正在陕西集结重兵，对秦岭实行严密的封锁，战事频繁。为了使部队更好地投入战斗，三五九旅旅部决定动员部分人化装分散前进。于是王震便把毛楚雄委托给原新四军供给部部长吴先云带领，他们一行5人，化装成行商，抄小路去延安。

8月中旬，他们担着皮箱，打着阳伞，离开镇安的泗庙继续前进。这天黄昏，到达一个叫做文家庙的山村，便分别在两户农家住下来。谁知当地的一个伪保长，发现他们一行，就起了歹心。第二天早饭后，他们告辞老乡，刚出村不远，伪保长带着一伙保丁和土匪，手执凶器追赶上来，迫使他们前往门家沟，将他们团团围住，开始对他们进行盘问、搜查。伪保长猜想这5人中有我党的重要干部，硬逼着他们承认自己的身份。他们把楚雄拖出来，围住他，恶狠狠地问：“说！你们是不是掉队的共产党？谁是你们的领导？准备到哪里去？不老实说，宰了你！”楚雄沉着说：“你去问当兵的去，我是学生，不知道！”伪保长伎俩使尽，仍无结果，两眼露着凶光。绝望地向刽子手们下命令：“杀，给我杀。”

刽子手举起斧子，凶恶地扑过来，向毛楚雄砍去。接着，又砍死一个中年干部。最后把“老部长”和他的爱人等三个同志活埋于石灰窑内。就这样，毛楚雄与老部长等人一起壮烈地为革命捐躯于门家沟。

毛楚雄的战友突围来到延安时，大家都关切地问楚雄的下落，当得知他牺牲后，都十分悲痛。不久，一支部队路过这个村子时，立即惩处了几个凶手。替毛楚雄讨还了血债。

毛泽东得到楚雄不幸牺牲的消息后，十分悲痛。1953年9月，他在中南海接见曾与毛楚雄一同参加三五九旅的毛世英时，曾经详细地询问了楚雄牺牲的经过。他不胜感慨地说：“楚雄还很年轻啊！如果他还活着，现在也和你一样，进学校学习文化、学习技术知识，那该有多好啊！”

九、儿女亲家

亲家张文秋

张文秋，原名张国兰，号文秋，曾用名张一平等。湖北京山县青树岭张家湾人。生于1903年。1949年10月15日，其长女刘松林与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结婚。毛岸英牺牲后，刘松林改嫁。1960年，其次女邵华与毛泽东次子毛岸青结婚。从而，两次成为毛泽东的亲家。

反抗包办婚姻

张文秋出身于一个封建豪门之家。祖父张玉亭，喜文习武，文武双全。咸丰年间，被皇上御笔钦点为殿试第三名“探花”，先后被委派到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任巡抚。皇亲徐王爷在他中“探花”时，相中他的才华，硬是把女儿许配给他当二房。地方上的官僚亦步亦趋，极力巴结，县太爷连忙在家乡为他营造了豪华的厅堂。春风得意的张玉亭也不断地购置田产庄园，到鼎盛时期，京山县西北地区的1万多亩良田几乎都姓了张。

张文秋的父亲张楠是张玉亭原配夫人所生，自徐氏来后，备受冷落，只给很少田产，让他分居单过。张楠前妻病故后又续弦，这位续弦夫人共生过三胎，第三胎是两千金的双胞胎，张文秋便是其中的一个。

张文秋满月后，被送到外婆家抚养。外婆家是个贫寒秀才户，对外孙女的管教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因而，张文秋从小没有受到多少张家封建官僚大家庭的影响，生活比较自由自在。7岁那年，母亲送她上小学，继而读中学。15岁时，她走出县城，考入设在武汉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当时，陈潭秋在这所学校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董必武教国文和历史。在这两位老师的启发和教育下，张文秋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1919年，她参加了恽代英、李求实、林育南在武汉领导的“五四”运动。

正当新文化、新思想如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冲刷人们心灵的时候，这一年，在张文秋的家乡，却上演了一出封建抢亲闹剧。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还在张文秋刚满月的时候，其父张楠自作主张，

把她许配给当地一家商户的公子徐泽民。徐泽民长大后，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吸鸦片、赌博、寻花问柳，可谓五毒俱全。在外读书的张文秋对此早有所闻，宣布不承认这桩婚姻。这时，张楠已经去世，母亲坚决站在女儿一边，多次与徐家交涉退婚。徐家根本不予理睬，蛮横地说：张文秋生是徐家的人，死是徐家的鬼。退婚，办不到！

1919年8月8日，母亲去世，张文秋回京山老家奔丧。安葬完母亲的第二天，她准备动身回武汉。不料天刚亮，门外人声杂乱。接着，房门被踢开，拥进一群彪形大汉，把她架到堂屋，塞进一顶花轿里。至此，这场包办婚姻的恶果终于发生了！

包办婚姻不知残杀了多少青年女子，然而类似的悲剧却没有出现在张文秋身上。在花轿内，她迅速冷静下来，决定以新女性的姿态，依靠社会进步力量进行抗争。轿子抬到徐家，她奋力以理服众。徐家稍不留神，她跑到了当地区公所求助。在一位有民主思想的区长主持公道下，张文秋终于取得了抗婚斗争的胜利。

初识毛泽东

从学生时代起，张文秋就立志献身革命。她先后参加过学运、工运，1924年入团，1926年1月入党，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这年大革命正开展得轰轰烈烈，党组织派张文秋和几位京山籍的共产党员回乡开展农运。不久，中共京山县委成立，张文秋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委员。在党的领导下，该县农运迅速发展，也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1927年春，毛泽东在武昌中华路13号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讲演。会上，气氛极其热烈，掌声雷动。张文秋和她的未婚夫刘谦初听了这次讲演，为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之深刻，对农民运动的描述之生动，对革命道理阐述之精辟，赞不绝口，非常佩服；同时，更为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用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高度赞扬了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有力地回击了来自各方面的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歪曲，而受到鼓舞，心中大快淋漓。他们很想再单独会见毛泽东，当面请教一些问题。尤其是张文秋正在搞农运，更想得到毛泽东对该县农民运动的评价和指导。

没熟人引荐，他俩拿着介绍信走进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的住地。一见面，毛泽东微笑着招呼：“二位今天来，有些什么赐教啊！”刘谦初虚心地说：“我们是来向毛泽东同志请教的。我们想知道当前的政治形势、农民运动的形势以及形势将会怎样的发展？”

话题明确，毛泽东也很有兴趣。接着，他们就兴致勃勃地谈开了。毛泽

东从苏俄，英美和其他一些中间国家对中国革命的三种不同态度，讲到国内存在三种不同势力，又讲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北洋军阀之间的斗争。

当谈到京山县农民运动时，张文秋说：“农会成立了，给土豪劣绅戴上高帽子，审判斗争了一些恶霸，农民的情绪高涨；不过，骂农民运动‘糟得很’的人也不少。”

毛泽东指点张文秋说，要“抓香摒臭”，站稳立场。农民闹革命，打垮了几千年来封建地主政权，土豪劣绅威风扫地，所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上层人物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是不足为怪的。我们闹革命，就要抓住“好得很”这股香，摒除“糟得很”那股臭。

张文秋全神贯注地听着，把这些话一字不漏地记在心中。

谈话间，杨开慧出来招待客人，她和两个孩子端来了瓜子、糖果和花生。毛泽东趁机逗趣，笑着问：“吃花生还很讲究咧。不知你们二位结婚的时候吃没吃花生？”

毛泽东的话，弄得刘谦初和张文秋很不好意思。刘谦初红着脸说：“我们刚刚确定恋爱关系，还没有结婚。”

毛泽东笑得更欢了，说：“啊呀，你们还是一对恋人呀，我和你嫂子都祝福你们。不过，你们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有花生！乡下老人说，结婚时吃花生，将来生孩子就男孩女孩花着生。”他看了杨开慧一眼，又说：“我和你们嫂子结婚的时候，不用媒妁之言，不行俗人之礼，还没有吃花生。结果，你嫂子一连生的三个孩子，都是男孩。如今，想一个女孩都想不到咧！”

包括杨开慧在内，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

不久，张文秋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又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起她和刘谦初恋爱的进展，她腼腆地告知：“我和谦初昨天已正式结婚了！”

“恭喜，恭喜！”毛泽东热情而风趣地说：“你们不够朋友嘛，连喜酒都不请我们喝一杯，等你们生了孩子，我可要来吃红蛋哟！”

张文秋乐了，大大方方说：“到那时，当然要来请你。”

毛泽东又笑着说：“你不是很喜欢我的儿子么？将来，要是你生了个女儿，我们就对亲家，把你的女儿给我作儿媳妇！”

张文秋不好意思地说：“你真会讲笑话！”

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戏言以后居然成真，两人不仅对上亲家，而且是双重亲家。

别长聚短的革命夫妻

张文秋和刘谦初是在暴风骤雨般的大革命时代相识、相恋、相结合的。

刘谦初，早年在山东齐鲁大学、北京燕京大学读书，后投笔从戎，投奔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任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的社会股股长，在北伐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刘谦初随北伐军到武汉，当时张文秋为京山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购买武器，也来到武汉，两人不期而遇。

这天，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推荐她去听一场政治形势报告会。走进会场，只见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军官在台上滔滔不绝地演讲。他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讲到灾难深重的中国，并把两者参照起来，指出：中国当前的形势，和俄国1917年的形势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要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团结一心，英勇奋斗，打倒封建军阀，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

张文秋被讲演者的话语所深深打动。会后，她走到恽代英的宿舍，碰巧这位演讲者也在那里。经恽代英介绍，她才知道此人叫刘谦初。以后，随着接触增多，互相倾慕，渐渐建立起恋爱关系。

这是一个风云激荡、山雨欲来的时刻。刘谦初和张文秋这对恋人心里都明白：分别在即，再聚不知何日，甚至生死都难以预料。4月26日，他俩决定就在武汉结婚。他们互相祝愿，再聚会有日，革命一定会成功。新婚不过三天，刘谦初就随军开赴前线了。之后，张文秋也返回京山县。

7月底，京山县委才接到省委通知，命令县委掩埋枪支、分散隐蔽。这时，京山县城已被反动县长陈洪泽和“剿共军”头目牛道坚紧紧包围了。他们对袁传鉴、刘素珍、张文秋下了通缉令，捉到其中一个赏大洋1000元。反动军队终于冲进县城，凡是参加过工会、农会的要杀，剪成短发的妇女要枪毙，每天都有被捕的同志被押上街头游行，砍头示众，一时腥风血雨，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幸亏有一位亲戚掩护，张文秋在暗室夹壁里躺了三天两夜，后来还是装死人，躺在棺材里，被抬出城外脱了险。

1927年秋天，省委指示京山县委响应中央“八七会议”的号召，去驻马店发动起义，打土豪，分田地。张文秋担任暴动总指挥部的宣传部长。

1928年春，张文秋调到湖北省委秘书处任机要秘书。年底，由于叛徒出卖，省委机关被破获。省委秘书长刘先源和张文秋得知，迅速将机密文件销毁，分散转移。张文秋只身到了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此后，她便被中央留在上海，改名张国兰，派往锦章和永安两个纱厂做工人工作，担任党总支书记，还兼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

大革命失败后，党派刘谦初到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因在九江受阻，只好撤回武汉，转赴上海。1928年4月，他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29年初又回到上海，同年3月调任山东省委书记。

刘谦初和张文秋自分别后，相互一直都在打听对方的下落，但由于那时革命处于低潮，斗争转入隐蔽，干部调动频繁，行踪很难捕捉。刘谦初两次到上海，都没有碰到张文秋。尤其是第二次来沪，两人近在咫尺，却不知道。幸亏一次偶然的机会，总算得到了音讯。

这年3月，张文秋组织纱厂女工在上海大马路举行示威游行，纪念三八妇女节，正好被刘谦初的好友张采真看见了。两人正待细说，一群军警冲来，游行队伍大乱，瞬间就被冲散了。当张采真晚上告知刘谦初时，中央的调令已经下来，轮船票都定好了，刘谦初第二天一早就要赴山东任职。和妻子相聚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到了山东济南，省委工作刚有头绪，刘谦初即请示中央调张文秋到山东工作。不久，张文秋化名陈孟君，来到济南，担任省委妇女部长兼省委机要秘书。新婚三天离别两年的夫妻终于重逢了。当时刘谦初化名黄伯襄，公开职业是齐鲁大学教授，张文秋则扮成家庭妇女，夫妻俩并肩战斗，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1929年6月26日，为了纪念“七一”党的生日，同时向反动派展示革命力量，刘谦初按照省委的安排，去淄川、博山、潍坊等地，组织发动胶济铁路总同盟罢工。重聚才两个月的夫妻又离别了。这时，张文秋已有身孕。在那个充满流血牺牲的年代，生活往往是极其严酷的。就在他们分开期间，党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

7月的一天，张文秋去省委秘书长刘小甫家取文件。在这之前，刘小甫已被抓走，信号没来得及取下。张文秋一进门就被埋伏的特务抓住。她谎称从乡下来城里不久，不认路，走错门了。但敌人不容她分辩，粗暴地把她押走了。8月初，正在各地巡视工作的刘谦初，到胶济路的明水车站下车时，被两个拿着照片的便衣特务认出，他也被捕了。

张文秋和刘谦初被捕时都用化名，敌人一核对名单，知道他们是夫妻，便把两案并在一起。

8月6日，在济南警备司令部过堂之前，张文秋见到了带脚镣的丈夫刘谦初，她使劲咬住嘴唇，才没有哭出声来。刘谦初显得很沉着，他经过张文秋面前时，向她暗示，说：“我是人家用照片对出来的，你一个乡下女子，目不识丁，什么也不懂，跟着我受累啊！”张文秋心里明白，丈夫在用这种办法保护她。刹那间，泪水再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在狱中，刘谦初受到严刑拷打，遍体鳞伤；张文秋被几次加刑，坐“老虎凳”，昏迷不醒，但他们始终不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刘谦初虽然被人认出真实身份（在警备司令部里有两名特警，曾是北伐军第十一军中刘谦初的

山东老乡），但他只承认过去是共产党员，后来失去了组织联系。张文秋则继续咬定自己是一个乡下来的家庭妇女，没有文化，什么也不知道。

党组织想方设法营救他们，刘谦初的父亲刘禄老先生是一位社会名人，他也出面活动，请来山东著名大律师李华南为儿子辩护，敌人一直没有抓到确凿证据，但硬是判了刘谦初和刘小甫有期徒刑 8 年，“陈孟君”半年。

半年期满，张文秋在出狱前想见丈夫一面。经她一再要求，典狱长才答应。

走近男牢，张文秋一眼看到丈夫从铁栅栏伸出那被拷住的双手，便扑了上去，紧紧抓住这双手，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狱警在一旁紧盯着，他俩只能用敌人听不懂的语言商量今后的去向。刘谦初说：“先到律师李华南家住几天，再设法回家找妈妈去。”“妈妈”就是党。张文秋点头同意。

“谦初 你给未出世的孩子取个名字吧！”

“就叫‘思齐’吧，不管是男是女。”刘谦初的苍白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山东自古是齐鲁之地，今后不管你们流落到哪里，要思念齐鲁，思念故土。”刘谦初对故乡一向是一往情深的。

张文秋走出监狱的当天，党组织就把她送出山东。1930 年 3 月 2 日，她在上海生下女儿刘思齐。1931 年春节期间，党中央批准一个月的假，派她去山东，和省委接头，设法营救刘谦初。

时隔一年，这对夫妻又在铁栅栏前见面了。泪水滚动着微笑，两人互诉别后的思念。张文秋决心，一定要救出丈夫。在山东的日日夜夜里，她和省委研究了很多方案，采取种种办法，都不见收效。最后，准备劫狱。她把方案通知了丈夫。考虑到会有人员牺牲和影响省委机关的安全，刘谦初坚决不同意，并要张文秋作出保证，向省委转达他的意见。张文秋深为这种保护革命火种，牺牲自己的英雄气概所震撼，费力地点头答应了。

回到上海，张文秋向中央汇报了刘谦初在狱中的情况。这时，中央已另辟途径，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使营救工作有了明显进展。张文秋得到这个消息，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她一面拼命地工作，一面期待丈夫早日归来。

不料，国民党军阀出尔反尔，丧心病狂地举起了屠刀。

1931 年 4 月 8 日，张文秋翻开上海《申报》，有一条刺目的消息：

山东枪决红匪

【本报 4 月 7 日济南专电】4 月 4 日下午 2 时，山东临时军法会审判委员会开会，当场议决，将前已捕获的红匪 22 人处以死刑。4

月5日上午6时，将刘谦初、朱占一、纪子瑞、刘一梦（刘小甫）……等多犯验明正身，用汽车三辆，载往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执行枪决……

霎时，眼前天旋地转，她再也无法自持，倒地昏死过去。

一个恩爱美满的家庭被刽子手们残忍地毁灭了。

不久，地下组织转来刘谦初给张文秋的遗书，上面写着：

“我在临死之际，向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告别，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希望你不要为我悲伤。你要紧紧记住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孝敬母亲，爱护母亲，听母亲的话！你要保重身体，好好抚育孩子，重建幸福家庭。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刘谦初去了，他悲壮就义之时，年仅34岁，连亲生女儿思齐都没能看上一眼。

又见毛泽东

1937年，初到延安，张文秋在边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不久，延安成立抗日军人家属学校。校长是危拱之，张文秋调来担任总务主任兼文化教员。1938年春，全体学员转入“抗大”，编为第八大队（女生大队）。在举行成立典礼那天，毛泽东、贺龙、徐特立、谢觉哉等领导人出席了大会，毛泽东作了讲话。

武昌一别，已有十载。这是金戈铁马、生死搏斗的10年，是激越悲壮、血染山河的10年，也是生离死别、撕心裂肺的10年！10年中，有多少英雄人物去了，有多少革命家庭破碎了！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英勇赴难，我的丈夫刘谦初壮烈就义，这就是革命的代价！此时此刻，张文秋再次见到毛泽东，心情激动不已。散会之后，她随着人群挤到了毛泽东身边。很快，毛泽东便认出了她，高兴地说：“张国兰同志，你好啊！什么时候到延安的？”张文秋高声回答：“快一年了，我现在叫张一平。”

“噢，改了个名字，就不来看我这个老相识了？你不够朋友啊！”毛泽东依然是那么幽默风趣。

“主席，我一定去看望您。”张文秋一口答应。

不久，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上演一出话剧《弃儿》，这是党校教工和学

员自编自演的。毛泽东看完演出，见到了后面座位上的张文秋和陈振亚，当他知道他俩已是夫妻时，笑着说：“好啊，文秋同志！上次我还说你不去看我，哪晓得你们还打了个大埋伏。振亚，你们结婚，连井冈山的老朋友都瞒着，太不够朋友嘛！”

陈振亚憨厚地笑着：“个人问题，哪敢去惊动主席啊！”

张文秋也告诉毛泽东，怀着孩子的时候，她和谦初一起在山东坐牢。孩子的名字，是她父亲取的，叫思齐，就是不要忘记山东故土，不要忘记齐鲁大地。可惜的是，孩子才1岁多一点，她爸爸就牺牲了……

毛泽东的笑容即刻消失了。往事如烟，岁月沧桑。当年他和刘谦初相识在武汉，曾经有过开怀的畅谈。现在，故人已不在！他沉重地说：“谦初同志很有才华，很坚强，可惜牺牲了！”毛泽东叹息了一声，又说，“思齐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好好培养她！”

“文秋同志，好像我们还有过一个君子协定……”毛泽东变了一个话题，气氛顿时轻松下来。

张文秋一点印象都没有了，问：“什么君子协定？”

毛泽东狡黠地笑着说：“你和谦初结婚的时候，记得我们相约，你如果生了个女儿，就给我——”

张文秋立即想起毛泽东“结亲家”的戏言，忍不住哈哈大笑。毛泽东也许觉得思齐还太小，当着孩子的面开这样的玩笑不太相宜，就改口说：“思齐，你给我作干女儿吧。今后，我就是你的干爸爸，好不好呀？”

透过风趣的谈笑，张文秋看到毛泽东对烈士的女儿充满了爱心，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慰藉。

以后，张文秋践约去杨家岭看望毛泽东。她一迈门槛，就看见一位面颊瘦削、鼻梁高高、头发灰白的人正和毛泽东交谈，她想退出来，毛泽东却向她招手说：“进来谈谈。”她只好进去。毛泽东站起来介绍说：“这是刘少奇同志，认识一下吧。”刘少奇也站起来，热情地跟她握手。毛泽东说：“这是张一平同志，前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的爱人。谦初同志在济南不幸牺牲了，她现在‘抗大’学习。”刘少奇说：“哦，刘谦初同志，我听说过。他是个很坚强的同志，牺牲时很英勇。他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更应当加倍奋斗。”

第二次结婚

张文秋和陈振亚是在来延安的路上才相识的。

自刘谦初牺牲后，张文秋留在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达6年，一直孑然

一身，没有成家。生活的清苦，女儿的厮缠，长夜的孤独，她默默地忍受着。有时深夜醒来，望望身边的女儿思齐，她伤心地哭了。女儿被惊醒，也哭起来。母女俩紧紧搂抱在一起，任泪水流淌……

“再建立个家庭吧。”领导同志劝她。

“别再难为自己了，孩子需要一个爸爸呀。”女同志们也在劝她。

可是残酷的岁月，紧张的工作，使她无暇顾及。她先后在共产国际远东四局、南方情报局等机关工作，以各种身份、职业进行活动，挣钱糊口。她当过资本家姨太太的家庭教师、平民教养院的国文教师、女子公寓的会计等等。在危险恶劣的环境下，她忘我地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分配的各项任务。

1937年9月，经党组织安排，张文秋带着女儿思齐奔赴延安。路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经林伯渠介绍，认识了拄着拐杖的老红军陈振亚，她的生活由此发生了转折。在西安等车的几天里，两人拉起家常，闲谈往事。陈振亚想了解白区斗争的情况，而张文秋更想知道根据地和红军的战斗生活。结果，不意之中，互相增进了了解，各自都为对方不平凡的经历所打动。

陈振亚北伐时期参军，不久入了党。1928年7月参加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后随部队上了井冈山。曾任红五军第三师的大队长。参加过一、二两次反“围剿”。1930年在战斗中负伤，失去了左腿。红军长征时，因行动不便，掉队被俘。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他一口咬定是国民党张辉瓒部掉队士兵。敌人把他押回原籍石门县确认，在他的哥哥和当地群众的掩护下保释出来。此后，他在湖北、湖南一带活动，开展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党组调他去延安时，他已经是37岁的人了，左腿残疾，还没有成家。

在奔赴延安的路上，张文秋带着思齐，和陈振亚同乘一辆卡车，他们互相照顾，感情逐渐加深。到了延安不久，张文秋和陈振亚就结婚了。彭德怀很关心老部下，特地批给60块钱，为他们筹备婚后生活费用。彭德怀操着家乡话对陈振亚说：“你这个‘老光棍’，总算是有个家了，也了却我一桩心事。祝你们白头偕老，革命到底！”

抗大毕业，张文秋分配到陈振亚所在的单位工作。陈振亚是八路军115师后方留守处的政治处主任，张文秋在政治处主办的《生活星期刊》任主编。

1938年秋天，张文秋又生下一个女儿，随母姓，取名张少华，后来又叫邵华。

1939年夏，中央军委通知，陈振亚和另外四位残废军人到苏联去安装假腿。陈振亚一家兴高采烈地出发了。不料，他们路经迪化（今乌鲁木齐），

被新疆督办盛世才扣留。

当时，盛世才同中共达成了统战协定，但他不是真心与共产党合作的。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的反共浪潮在全国各地到处涌起，盛世才也露出真相，加紧迫害、打击留在新疆的共产党干部。这年5月，陈振亚在外出过河时不慎落水，受伤发烧，被送进迪化南关医院治疗。在伤势渐愈准备出院的前天晚上，外科主任（是个白俄）说要作最后一次检查，叫护士给陈振亚吃了两包药面。陈振亚吃药不久，呕吐不止，胆汁都吐出来了，折腾到天亮。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负责人陈潭秋和张文秋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赶到医院，陈振亚一把抓住陈潭秋，掉着泪说：“我中毒了，恐怕没指望了。你们要警惕盛世才这个两面派……我死后，请党照顾我们的两个孩子。”陈潭秋立即派人找一位内科医生来抢救，白俄医生却坚决不让插手，又给陈振亚注射了一针。他说这是“抢救”，其实无疑是催命。陈振亚手脚抽搐，口鼻流血，就这样被残忍地害死了。

生活，对张文秋未免太残酷了。她扑倒在死去的丈夫身上昏厥过去。当她被人唤醒过来，思齐已哭成泪人，少华哭喊着要爸爸……

陈振亚死后，张文秋生下第三个女儿少林。从此，她没有再结婚。这位革命的母亲，拉扯着三个女儿，熬过了在新疆那段暗无天日的时光，于1946年回到延安。之后，她一边工作，一边照料孩子，领着她们穿过了战争的风云，走进了新中国。

从事盲人福利工作

50年代中期，中央组织部分配张文秋去上海负责接管旧的盲民协会，重新成立一个“中国盲人福利会”。开始，她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不愿从事盲人工作。心里虽不愿意，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有一次，她向毛泽东流露出这种想法，毛泽东劝导她说：“盲人是最痛苦的人。你既然是为被压迫的人谋解放才出来革命的，为什么对最痛苦的人不去解放他们呢？”张文秋觉得此话有道理，便愉快地和同志们一道去开展盲人福利工作。他们改组了全国各地的盲人分会，在北京建起了盲人工厂，整顿了盲童小学，开办盲人印刷厂，出版盲人书籍，成立了盲人训练班。

后来，盲人福利会决定出版一种盲人刊物。正在考虑刊物名称时，张文秋碰到了毛泽东。她把盲人福利会的发展情况向毛泽东作了简略的汇报，并送上一本盲文刊物给他看，请他为创刊号命名。毛泽东说：“就叫《盲人月刊》好了。这是很适当的名字，不必另取其他名字了。”他看到盲文凸点字，很感兴趣，闭上眼睛，用双手触摸着。他说：“我是第一次见到盲文字，一

个字我也不认识。”张文秋向他简单介绍了六个凸点的变化特点，他听后高兴地说：“中国汉字很复杂，用六个凸点就包括了汉字，这个凸点真是变化无穷啊！黄乃同志能把这种凸点字运用到中国来，这真是为盲人带来了福音。你们这些做盲人工作的，都应当向他学习盲文。”张文秋把这些话转告了谢觉哉。谢老当时任内务部长兼盲人福利会主任委员。他按照毛泽东的命名，当即挥毫题写了“盲人月刊”四个清秀遒劲的大字，为盲人福利会创办的这个刊物增添了光彩。《盲人月刊》很快出版，发行全国各地，送到了盲人手中。

“文革”中，张文秋遭受“四人帮”的迫害，身体受到摧残，双腿落下了毛病，行动不便。值得庆幸的是，她的记忆力依然强健。在耄耋之年，为了给世人留下一部革命者的奋斗史，她不顾年迈体衰，坚持伏案多年，至90岁高龄，终于写完30万字的回忆录《踏遍青山》。张文秋，这位忠诚的革命老战士、伟大的女性，人生的强者，她的精神风范，永远为世人敬佩和赞颂。

亲家孔从洲

孔从洲，又名孔丛周，字郁文。1906年10月2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镇上桥梓口村。1959年其子孔令华与毛泽东之女李敏结婚，成为毛泽东的亲家。1990年去世。

国乱家贫

孔从洲祖籍江苏句容县，从他曾祖父那一代起，搬迁到西安的上桥梓口村定居，历经四世，代代务农。孔从洲小时候原名祥瀛，秀才出身、满腹经纶的外祖父后来根据孔夫子的一句话，“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将他的名字改为从周，字郁文，是希望孔家出一位读书人，将来可成为文官才子，彻底改换土里刨食的祖袭。

孔从洲的父亲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种庄稼的能手，平日勤耕苦干，省吃俭用，一心想把家境搞好。母亲管家有方，为人贤惠、善良、开明、坚忍，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感情都倾注到料理家务，教育子女上。她虽不识字，却能分辨是非，通情达理，每当邻人缺吃少穿，或是遭天灾人祸，便解囊相助，尽力周济。在父母的操持下，孔从洲幼时家境曾有起色，达到中农水平，有地30亩，1辆大车，2头牛。

7岁那年，父母送他进本村国民小学读书。学校是新派人士办的，讲授

新知识，但学费稍贵。孔从洲自发蒙以来，学习勤奋，成绩优异。读二年级时，县教育局在中心小学举办过一次学习成绩竞赛，由邻近学校派学生参加。孔从洲被派去参赛。语文要求写一篇记述家乡或家庭情况的作文，他挥笔写去：“家住灞河边，水来则成河，水去则成滩，偶尔一泛滥，庄稼全被淹，生活成问题，经济也困难。我找妈妈要糖吃，妈妈两眼泪汪汪。”算术题全部答对。考官还当场提问一些生活常识问题，例如什么时候下雨对麦子有好处？他回答：八、十、三。即农历八月一场雨种麦子，十月一场雨冬麦扎根，三月一场雨麦子返青。这次竞赛，他得了奖，奖品有黑石板、练习本、铅笔、毛笔等。

在新学堂仅学两年，孔从洲被转到外祖父在蓝田县水磨村坐馆任教的私塾里学习。从新学转到旧学，完全是家长的意志，他虽然无奈，但仍然刻苦学习，并从中体会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掌握了許多立身、处事，治军、从政的有益知识。1919年，他考入长安第一高级小学。1922年从高小毕业，又考上县立中学。

正当孔从洲学业顺利、踌躇满志时，家境却衰落下来。缘由是多方面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场耗时甚久的官司。这场官司终于打赢了，然而胜方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几乎倾家荡产，孔从洲的父亲如同害了一场大病，身体被拖垮了。从这场官司，孔从洲看到了旧官府的种种罪恶和黑暗，在少年的心灵里留下了愤怒和深深的创痕。

民国以来，军阀混战不息，天下大乱，孔从洲的家庭和千千万万黎民百姓一样，深受其害。在西北地区，内战一起，西安必争，近在咫尺的上桥梓口村，是军阀队伍的必经之地。尤其是皖系军阀豢养的刘镇华镇嵩军，几次蹂躏陕西，残暴如同土匪，陕西老百姓对他无不恨之入骨。

1921年，恰逢天灾，一连下了六七天暴雨，灞河洪水泛滥。孔从洲家就在灞河边上，一发水，这一年的庄稼就全完了，一家老少陷于饥寒交迫之中，加上又死了牲口，生计格外困难。为了让孔从洲继续上学，母亲只得把她的陪嫁衣服和珍藏多年的首饰，让孔从洲拿到当铺里去当。当铺的柜台特高，孔从洲艰难地将包裹放在上面，那个戴眼镜的账房先生打开包裹看了看里面的东西，问要当多少钱？孔从洲说要50串钱，他只给10串。孔从洲坚持讨价要50串钱，他“叭”地一声，从高柜台上把那包衣物摔下来，同时轻蔑地说：“10串钱，不当就拉倒，谁稀罕这些烂货！”突然受到这样的侮辱，孔从洲心里难过极了，想把东西拿回家不当了。可又一想，空手回到家里，困难没法解决，只得忍着性子，再讲价还价，最后15串钱把东西当了。事后，每当想起当铺高柜台后边露出的那副难看的面孔，狡诈、傲慢、蛮横

的神气，故意给人难堪难受的情景，孔从洲都怒火中烧，感叹世态炎凉。经过这次典当，他对旧社会的黑暗又多一层了解，对它的憎恨也加深了一层。

孔从洲的家庭经过这些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至此已彻底破产了。

戎马生涯

1924年，孔从洲高小毕业考取中学后，只读了一个月，因家庭生活困难，无法供养，不得不中途辍学。这年他已18岁了。回家务农期间，孔从洲的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反复思考家庭的变故和遭遇，不禁在思想上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为什么官府这样贿赂公行？为什么军阀队伍如此横行霸道，坑害百姓？为什么地主老财那样仗势欺人？事后他曾描写过自己那时的苦恼，他说：“我对这些黑暗现象十分憎恨，想把社会上一切不公平的事情翻转过来。对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罪恶，虽然有了一些朦胧的认识，也呼喊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但对上边提出的那些问题，自己却还找不出明确的答案。书是再也不能读下去了，在家里种地也难安下心来。可是，我应该到哪里去？何处是出路呢？”

好男儿当自强，救国之路千万条。孔从洲最终没有被眼前的困境所压倒。1924年初，他听人说，杨虎城部安边军事教导队正在招收学兵。这是一支有过反袁历史业绩的国民革命军，孔从洲决心前去投考。4月初他踏上了去安边的路途。

从西安到三原，要经过渭河与泾河。一路上靠给人帮工，换点食物维持，且经常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吃尽了苦头。过泾河时，一时找不到渡口，他心急跳进河中想蹚过河去，不料河深流急，泥沙又多，一个浪头把他打倒，直冲出去十几里远，肚子喝得胀鼓鼓的，幸被一位农民救上岸。到了安边，他已是衣衫褴褛，瘦骨嶙峋，还生了一身疥疮。由于路途耽误，考试的时间已错过，但主考官听了他的经历，破例让他补考并录取了他。此后，孔从洲开始了他一生的军旅生涯。

经过8个月教导队的紧张训练后，孔从洲被正式编入杨虎城指挥的国民革命军教导营任班长。由于他爱动脑筋，作战灵活骁勇，不断受到提拔。1926年参加北伐时任连长。1932年任团长。1936年他任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因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不满，参与了上司杨虎城和张学良策划的捉蒋行动。

抗日战争时期，孔从洲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少将旅长、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第五十五师师长。

1946年，孔从洲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八军中将军长。解放战争初期，

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糜烂，内部互相倾轧，坚决反对蒋介石蓄意挑起内战、破坏和平的行径，于这年5月15日和副军长刘盛诚、参谋长王汝昭率第五十五师在河南巩县起义，率部杀出血路，投奔共产党。这是解放战争期间百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中较早出来的一支，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充实、壮大人民解放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年，孔从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13日，第五十五、十七师、一一七师合编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孔从洲任军长。1947年，该军8万人马归入二野陈赓、谢富治兵团建制，于8月南渡黄河作战。1948年至1949年，孔从洲先后任豫西军区副司令员、郑州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建国后，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第二炮兵学校校长、西南军区军械部部长、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孔从洲一生两次被授予中将军衔，一次是国民党的中将军衔，一次是共产党的中将军衔，这种偶然的巧合，折射出历史的巨大变迁，体现了人民对功臣的充分肯定，同时，也使他的戎马生涯染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参加儿子婚礼

50年代末，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相爱成亲，得到了双方家长的赞同。几十年过去后，世人根据将门虎子娶上统帅千金，门户不当的观念，胡乱揣度当年孔从洲的心态，说他不同意孔令华和李敏的婚事，有些人又添油加醋，写成文章在报上发表，以至谬种流传。文章说：李敏把她和孔令华的事情告诉毛泽东，“毛主席听了李敏的介绍，不时地点头微笑。他主张对儿女的婚事，大人们不要干涉，只要孩子们自己认为满意就行……但是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对这门婚事颇有顾虑。毛主席得知后，对孔从洲同志说，儿女们的婚姻大事，由他们自己作主。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干涉人家的自由嘛！……他从毛主席的话语中悟出主席是赞同这门婚事的，原先的顾虑就烟消云散了。”

孔从洲说，这纯属子虚乌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他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是在儿子结婚的那天，在此以前从没有单独见过毛泽东。

1959年8月29日孔令华和李敏结婚的那天，孔从洲当时还在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工作，正在北京开会。早上，毛泽东派秘书把他接到中南海丰泽园内的颐年堂。一见面，毛泽东紧紧地握住孔从洲的手，和蔼亲切地说：“今天两个孩子结婚，请你来坐一坐，叙一叙。”并向在座的客人介绍说：“这是李敏的公公，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同志。”毛泽东平易近人，谈笑风生，

把他初次和毛泽东见面时的拘谨驱散了。

在颐年堂喝完喜酒，毛泽东留下孔从洲和王季范，到他书房里谈话。毛泽东问孔从洲，现在哪里工作？孔从洲说，在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担任校长。毛泽东对王季范说，高级炮兵学校是炮兵的最高学府（那时没有炮兵学院，炮兵工程学院也没有成立）。又转向孔从洲问道，你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没有？孔从洲说，没有什么困难，就是文化水平低，这个任务重。王季范说，炮兵要用数学的吧？孔从洲说，是的，我数学很差。毛泽东说，你先人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我幼年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他老人家提出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六门学科就有数学，你应当学好数学的。孔从洲说，过去学习基础不好。

席间谈到孔从洲在杨虎城部队的情况。毛泽东问，你什么时候到那个部队的？孔从洲说，1924年就去了，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建立的靖国军，他是慕名而去的。毛泽东又向王季范介绍说，孔从洲参加过西安事变，当时是警备二旅兼城防司令。王季范笑着说，噢，官还不小啊！毛泽东说，他（指杨虎城）对你很信任啊！抓蒋介石前一天晚上，别人不知道，就跟你说了，保密噢！假使走漏消息了不得，你做得很好嘛！杨主任（指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对你很赏识吧！孔从洲说，他是我的老上级，他把我一手培养大，看着我长大的……

以后又谈起家常。毛泽东问，你父母还在不在？孔从洲说，父母亲都已经去世。又问，你十几岁出去？孔从洲说，18岁，我上不起学，高小毕业后考取中学，读了一个月，生活感到困难。我家在灞河边上，往往大水一冲，生活就成问题。民国十三年（1924年）是最苦的、困难最大的一年，没办法，上不起学。毛泽东说，噢！是这样。你工作还有什么要求？孔从洲说，没有什么要求，因为我是干炮兵的，对炮兵最有感情。王季范说，噢！这个人是老实人。毛泽东接着说，他是个老实人。他教育子女很严的哟！孔令华很好嘛！今后两个孩子婚后一定会处好的。

孔从洲的这番回忆发表后，社会上的有关传言便烟消云散了。

亲家会见，纵论兵器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我军的炮兵装备极其落后，科研水平提高缓慢。为了尽快发展炮兵尖端技术，培养国防现代化所需的有关工程技术人才，1959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决定：组建炮兵工程学院。

1960年2月下旬，孔从洲接到中央军委命令，负责筹备组建工作。同

年6月下旬，他被正式任命为炮兵工程学院院长。从20年代起，他在杨虎城将军的部下就任过炮兵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早就和炮兵结下不解之缘。现在，接到这项任务，憧憬学院的建立将会对炮兵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他的心情格外兴奋，同时又感到压力很大，困难重重。学院院址临时设在武昌，同时寻找新院址，采取“边筹建、边教学”的方针。1962年2月，军委决定该院迁至南京市。

当时，孔从洲正在为学院搬迁、教学改革等事四处奔波。2月初，他从南京去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办事，返回时路过北京，忽然接到通知，2月5日上午毛泽东要见他。

这天早晨7点15分，孔从洲驱车来到中南海。8点整，毛泽东在南海岸边游泳池旁和他会见。孔从洲当时身躯笔挺，举手行礼，心情十分激动。毛泽东则笑容可掬，亲切地拉住他的手说：“上次见面已经很久了，早想见你，一直没有时间，今天随便谈谈。”孔从洲说：“我很想见主席，但你很忙，我不便占你的时间。”毛泽东说：“今天不就有时间了吗？”两人落座后，从家庭、子女谈到教育，以及有关炮兵建设的各种问题。事后孔从洲回忆说：“毛主席的知识十分渊博，学贯古今中外，无论涉及什么问题，都能发表精辟的论断，而且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引人入胜，使我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和蔼的态度、风趣的语言，使我来时的紧张心情，一下子轻松下来了。”

毛泽东以提问的方式详细了解了炮兵工程学院的情况。他说：“炮兵工程学院办校宗旨应当是什么呢？我看应当是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的炮兵科技人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后来又有人制成了抛石机，依靠机械的力量，可以把十几斤重的石头抛出50步以外，成为古代攻打城池和野战的重要武器。这些都是冷兵器，只有在火药发明以后，才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说到这里，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我们的祖宗发明了火药，可是后来落后了。在南宋时有一个叫陈规的，他把火药装在一个竹管内，装上弹丸，点着火药，喷出火焰烧伤敌人。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因为竹子容易被火药烧毁，后来有人改用金属制作，就是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火枪。13世纪，火药传到阿拉伯国家，14世纪又传到欧洲。15世纪，欧洲人制成了

滑膛炮，笨得很呐，要 35 匹马才能拉得动它。”毛泽东用手比划着说，非常形象。“到了 17 世纪，牛顿和欧勒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制成了线膛炮。18 世纪，德国开始使用后装火炮。从此，线膛炮正式代替了滑膛炮。1907 年，法国制成世界上第一门 155 毫米半自动式炮门的加农炮。从那时起，火炮就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了。现在出现了核导弹，将来还会有更新的武器。解放战争中，我们靠缴获国民党的火炮装备自己。由于国民党的火炮大都是买的外国的，所以我们那时装备的火炮品种繁杂，规格不一，有德国的、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全国解放后，我们靠买苏联的。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靠买别国的武器是不行的，要自己研制。你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孔从洲回答说：“现在是仿制。”总仿制吗？”毛泽东又问。孔从洲立即回答说：“不！我们已开始根据作战对象和我国地形、交通、气候等条件，在研制我们自己的火炮了。”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说：“这就对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必须强调自力更生。外国好的东西，要实行‘拿来主义’，但不是‘拿来’就算了，而是要在他们的基础上，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继续说：“研制自己的火炮，就要有自己的专家、教授。你们的学院学制几年？有多少学生？分几个部？”孔从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又问：“师资力量怎样？办学校第一是选教员，有了好教员，才能教好学生。过去有句话叫‘师高弟子强’。没有教员能以己之昏昏得使学生昭昭的。”孔从洲说：“学院的师资力量基本上能满足教学的要求，教员中一部分是老军工、老教授，他们都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教员。”毛泽东听后关切地说：“要重视知识分子。我过去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一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建国初期，我们就采取了兴办工农速成中学、业余大学，还派遣干部进高等学府或出国深造等各种措施，加速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说到这里，他停顿下来，若有所思，然后又讲：“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那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怎样呢？老知识分子年龄大了，又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要特别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尊重他们的意见，做他们的知心朋友；住的环境要舒适一点，生活待遇要比较好一点，给他们创造研究学问的条件。他们中有些人要求入党，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了吗？”毛泽东的询问，使孔从洲深为感动。他说：“知识分子问题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的。他们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惜牺牲一切。我们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毛泽东听了点头又问：“教员的工作、学习时间有保证吗？资料和器材能满足要求吗？有无图

书馆？教书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不要随便占用，要让他们有看资料、搞研究的时间。想迎头赶上先进国家，就要多看先进资料。”孔从洲说：“教员的时间是有保证的。有一个图书馆，藏书尚能满足使用。”毛泽东说：“这很好。”接着他又问：“教员讲课用什么方法？”孔从洲说：“注入式的教学法不多见了。”毛泽东说：“教学法很重要，有了教员，教学法不当，还是学不好。我给学生讲课，从来就反对一个人讲大家听。我让学生提问题，有时干脆就让学生回答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这样，就使课堂成为讨论学术的园地，学生理解得深，记得牢。教员是树人的，要抓好对学生的教育，早出人才。”毛泽东还询问了许多情况，诸如现在的学生从哪里来？工农子弟多吗？有复习时间吗？灯光好不好？近视眼多吗？身体健康状况怎样？实验室够用吗？毛泽东又强调说：“学生要有个实习的地方和实习的时间，到部队和工厂去实习，这就叫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的考试不宜过多，如果使学生的脑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学习质量就不会高。”毛泽东又问：“学生毕业后工作的情况怎样？”孔从洲说：“基本上能满足工作要求，但在校期间学理论多，接触实际少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毛泽东说：“要多实习。学校要和部队使用结合起来，才能制订好教学大纲。教材是老本还是新编的？”在孔从洲回答了教材情况后，毛泽东说：“开始可以用老的，在使用过程中加以充实，逐渐写出自己的。学院要搞科研，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要运用科研成果充实教材，丰富授课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学院要把教学、科研和使用联系起来。当院长的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毛泽东问孔从洲：“你过去不是办过学校吗？”孔从洲说：“是的。上次见面时我在高级炮校，那是一所指挥院校。”毛泽东关心地告诫他：“光会指挥不懂火炮原理，不能算一个完全的指挥员。现在有了炮兵工程学院，你要注意学习，要学点自然科学。”孔从洲说：“上次见面我就说过，我的水平低，数学基础不行，怕担负不了院长这个重任。”毛泽东风趣地说：“不会可以学嘛！你的先人孔夫子不是早就定下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吗？要学孔夫子不耻下问，向老教授学习，拜他们为师。不学习和他们就没有共同语言。多学多问不会影响威信，相反，内行话多了，就不致闹笑话。”孔从洲表示：“过去有畏难情绪，没学好，回去后一定加倍努力，使自己尽快变成内行，决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又询问了其他一些问题，当他听孔从洲汇报雷达、指挥仪的情况时，表现特别关心。他说：“人无眼不行，火炮没有镜子也不行。望远镜、瞄准镜受地形地物的限制看不远。”孔从洲插话说：“雷达可以补救，它是全天候的。”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能把雷达说成万能的，有矛就有盾，比如人家干扰怎么办？前几年我就告诉中央广播电台，要防干扰，不知道他们办

了没有？对雷达的干扰必须找出对付的办法。”孔从洲听了这番话，立即表示说：“主席这个任务我一定完成。”

毛泽东又问到指挥仪的情况，当他得知老 85 高炮还使用“三不变”的指挥仪时，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桌子，表情严肃地说：“这种落后的东西怎么还能在部队使用？敌人的飞机能停在那里不动等你打吗？要加强研制，尽快把它淘汰掉。”接着强调说：“你看，哪件事不需要人才啊！”孔从洲说：“我们现在已研制出新的指挥仪，精度比较高。”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很好，要抓紧生产。”

会见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始终围绕炮兵建设问题，滔滔不绝，从兵器史上的冷兵器谈到热核武器，从炮兵学的科研谈到教学及办校方针，其思想丰富而有见地，使孔从洲受益不浅，对他以后开展工作影响至深。孔从洲曾说：那天他在回来的路上，一直在琢磨毛泽东讲话的精神。

排除干扰，越级上书

1964 年 6 月 27 日，孔从洲从炮兵工程学院调任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主管我军炮兵武器装备科研工作。多年以来，他在这个岗位上，除领导、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研制和生产新型火炮装备部队外，还结合实战，注意研究我军炮兵部队对付雷达干扰的问题。

1965 年 8 月，根据越南政府的要求，我军部分高射炮兵部队赴越参加援越抗美的防空作战。起初，美空、海军飞机低空入侵攻击轰炸为多，当时我军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干部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使用大量装备的 14.5 毫米口径的高射机枪和双管 37 毫米口径的小高炮，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和猛烈的火力，不断击落美国飞机。不久，吃了亏的美军总结了教训，变化战术，改为中空入侵攻击轰炸。我高射炮兵部队又增调了 57 毫米、85 毫米和 100 毫米口径的高炮，继续重创美机。美军又凭其先进的技术装备改变战术，经常利用夜暗和有云雾的复杂天候条件，偷袭我军高炮阵地和掩护目标，在遭到我军雷达、指挥仪控制的中口径高炮的有力打击后，美机大大加强了对我军雷达的干扰，并开始用机载的“百舌鸟”反雷达导弹袭击，还采用“山羊跳”等机动攻击投弹的战术逃避跟踪。这使我军掩护目标多次遭到美机袭击，高炮阵地也遭到损失。1967 年 6 月 20 日，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了“入越作战高炮部队代表会议”。会上代表们介绍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总结交流了作战经验，并着重研究探讨了武器装备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改进的方向和意见。孔从洲出席了这次会议。7 月 7 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了全体代

表，并合影留念。会后，粟裕传达了毛泽东在接见会议代表之前，对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现在的装备很落后。因此，我交代，一要把雷达、指挥仪、光学仪器，狠狠抓一下，我们的雷达，一要减轻重量。二要提高质量。不要那些落后不行的，要能抗干扰的。三要增加高射武器的数量。

听到这一指示，孔从洲又想起毛泽东 3 年前对他说的话：“对雷达的干扰必须找出对付的办法。”他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67 年和 1973 年，爆发了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孔从洲收集和研究了这两次现代化战争中双方的得失和经验，特别想从空袭和反空袭的成败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用他山之石，攻我防空武器发展之玉。他以为从中有两条最值得注意：一是地对空导弹的大量使用和传统高炮相结合，成为现代防空有效手段，可以挫败对方的空中优势；二是防空武器系统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其对电子装备依赖程度与日俱增。用电子对抗手段破坏对方防空武器中的电子设备，将导致整个防空武器系统的失控。这几乎已为世所公认。

孔从洲由此进一步研究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军事资料，发现电子战已经渗透到海、陆、空各类战争形式中，而且从战略、战役直到战术作战，电子战都可发挥重要作用，被称为第四维作战形式并非无稽之谈。世界各先进国家，在发展电子战方面已走了很远的路程，形成了可观的实力。而我国还未曾起步，甚至在认识上尚待启蒙，一旦发生突发性的战争，将会十分被动，甚至造成难以招架的局面。电子战技术的研制已是刻不容缓了。

然而，孔从洲没有料到，同火炮雷达受到干扰一样，政治生活中也有干扰，同样需要反干扰。

1973 年，长期主管军事电信和电子工业、当时任军委总参副总长、四机部部长的王诤，就我军电子装备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加强电子战能力的措施，向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周恩来、李先念作了批示，并请他牵头，召集使用、科研、生产方面的领导一起研究，提出解决办法。王诤于 1974 年 4 月主持召开了一个专题座谈会，孔从洲应邀参加。会上，同志们发言很热烈，大家分析了国外电子战技术的发展状况，研究了几次局部战争中电子战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并针对我国国情提出了加强雷达、电子对抗工作的建议。最后起草了一份报告，以总参谋部名义上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报告呈上去后，很久没有听到回音。孔从洲感到很奇怪，向王诤打听，王诤颇有感慨地说，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会议曾研究过这件事。会议上先由他汇报了情况，他刚说完，别人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张春桥马上插上来，很不满意地说：“你说这一切，无非是要人，要钱！”这样一来，其他领导同志无法再发

言，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了。

知道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决策层中有人反对，孔从洲内心十分苦恼。经过慎重思考，他最后下决心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就工作问题直接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这在孔从洲平生是惟一的一次。他请秘书和业务部门的同志帮助起草，又仔细作了修改，于 1975 年 6 月 21 日将信送出。

主席：

近几年来，电子对抗技术发展很快。苏联、美国的电子侦察，已经对我军的作战通信、导弹制导和各类雷达等电子装备，造成严重干扰和威胁。如不及早采取措施，战争一来，将使我指挥失灵，兵器失控，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电子对抗，也称电子战。包括电子侦察、干扰、伪装和反侦察、反干扰等。其目的是使对方的电子装备遭到破坏或失灵，是现代战争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最初出现于二次大战，随后不断发展，在实战中广泛使用。美帝在侵越战争中，使用几十种电子干扰，使萨姆—2 型地空导弹的实际命中率降到 3%。苏联入侵捷克，大规模施放干扰，迷盲了北约组织的雷达监视系统，掩护大批飞机突然空降着陆。1973 年 10 月中东战争，埃、叙使用苏联萨姆—2 型和 3 型地空导弹，受到以色列的强烈干扰，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而首次使用的萨姆—6 型地空导弹，因反干扰措施较多，美、以尚未掌握该导弹的频段，致使以机损失惨重。随着苏、美的加剧争夺，电子对抗的斗争也日益激烈。美在国防部，苏联在总参谋部都设有电子战领导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发展电子对抗技术。现在，又对可见光、红外和光电制导武器的对抗技术，开展了研究。电子对抗的应用范围，已从陆、海、空三军的电子设备，扩展到洲际弹道导弹和军用卫星等宇宙空间。这种情况，很值得重视。

从我军防空作战的战例来看，也深感电子对抗技术在现代战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地空导弹部队从 1958 年组建以后，在防空作战的 9 次胜利中，有 4 次因及时采取反侦察、反干扰措施，击落了敌机。而在七次作战失利中，有 5 次是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反干扰措施未能歼敌。我高炮部队援越作战中，用仿苏联的松 9—A 炮瞄雷达，受到美帝强烈干扰，使雷达的发现距离从 50 公里降到 10 多公里，并遭到百舌鸟反雷达导弹的攻击达 84 次之多。我参战部队所以能用三四十年代的武器，抗击 60 年代装备的美帝

空中强盗，挫败敌人吹嘘的“空中优势”，取得辉煌的战绩，主要是广大指战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作战的结果。

蒋帮平均两个月进行一次干扰和反干扰演习，每次演习都使我福建沿海雷达受到严重干扰，基本上看不到目标。1972年12月，美帝对越南北方大规模轰炸时，我广西雷达部队除一种测高雷达外，全部受到干扰，使80%以上的雷达无法观察目标。苏联在我三北边境地区经常搞干扰演习，平均每月达七八次之多，使我雷达全部受到干扰。随着苏联、美帝不断对我进行电子侦察，已使我军雷达波段完全暴露。我轰炸机没有干扰敌人雷达的措施，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将难于空防。海防导弹，美帝是几个雷达波段引导一种导弹，一个波段受到干扰，立即改用别的波段；而我军是一个雷达波段制导5种导弹，如该波段受到干扰，则5种导弹将同时失效。我军电子对抗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尽快改变这种落后被动的状态，实属当务之急。

电子对抗的特点是针对性强，变化快，一种抗干扰设备，往往因对方改变干扰手段，用一两次即失去作用。一代兵器需要有几代抗干扰设备的储备，才能有较长的生存力。因此，电子对抗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任务。它不仅是技术装备的试制、生产和使用问题，而且是与情报的收集分析、作战方案的制定，对抗技术的选用等有关的作战指挥问题。经过建国20多年来的努力，我国的电子对抗工作从无到有，目前，科研、生产和使用队伍已初具规模，关键是要将这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加强领导。因此，建议组建电子对抗领导小组和专门机构，统筹负责我军进行电子对抗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手段，拟订发展规划和组织协调，收集研究外军情报并确定对策等。我们必须争取时间，解决我军现装备的抗干扰问题，同时积极发展对敌实施侦察和干扰的手段。惟此，才能使敌不能制我，而我可以制敌。

以上情况，事关我军安危。我再三考虑，决定向主席报告。当否，请指示。

孔从洲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信送走仅两天，6月23日毛泽东就作了批示：

送小平、剑英、成武同志阅。

请剑英同志找二炮孔从洲等同志商议几次，为盼。

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军委主要领导异常欣喜。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先请陈锡联、杨成武、王诤等人和孔从洲谈谈，然后他再亲自参加研究。他们几位先后四次找孔从洲交换意见。12月初，叶剑英把孔从洲和王诤找到他在西山的家里，专门研究这件事。叶剑英先询问了情况，又很仔细地听了孔从洲和王诤的意见。接着，就发展电子战技术的战略目标、组织领导、部队建设、人才培养等问题系统地谈了他的看法。最后经叶剑英归纳形成了几条意见，以总参谋部名义再次呈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12月18日，叶剑英又以他的名义向毛泽东写了《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毛泽东于12月20日批示：“很好，退叶剑英同志。”

经过毛泽东和叶剑英的亲自关心和支持，总算克服了阻力，把道路打通了。不幸的是，接着就进入了多事的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党和国家陷入了极度异常状态，这项工作暂时被搁下。

1977年，叶剑英再次关心电子对抗力量的建设问题，报经中共中央批准，首先成立了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下，统一归口管理电子对抗和雷达方面的工作。1977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有各部门领导参加的电子对抗和雷达工作会议上，初步确定了第五个五年计划后三年和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电子对抗装备的主要任务。会议还要求电子工业部调整、加强科研和生产力量，加速电子对抗和雷达技术的发展；要求有关院校加紧培养电子对抗方面的技术人才；规定各军、兵种和大军区建立和健全相应的管理机构。7月，在孔从洲的建议下，炮兵党委常委召开专门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雷达和电子对抗会议精神，并作出决定：加强雷达、电子对抗的发展方向研究；组建炮兵直属的电子对抗部队，逐步建设成为执行电子对抗作战任务的“拳头”力量，并承担新型电子对抗装备定型的试验和试用任务。

从此，电子对抗装备和雷达技术走上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健康发展的新阶段，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电子对抗专业部队。可以说，孔从洲是我国电子对抗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历史上功不可没。

十、后世传人

孙子毛新宇

毛泽东一生共有过 6 个儿子，其中四个早年即夭折或遗失了。长到成年的只有毛岸英和毛岸青。毛岸英新婚一年就牺牲在朝鲜战场，没有后代，只有毛岸青有一子传世。他，就是毛新宇。

毛新宇生于 1970 年 1 月 17 日。毛泽东得知他有了一个孙子，非常高兴，给他起名“新宇”。这个名字，寄托着毛泽东对孙子的美好期望。

“庞然大物”

1982 年秋天，一个新学期开始了。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园里，时常会见到三三两两的男女学生，对一位男生指指点点：“瞧，那就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是嘛，块头好大呀！”真有点与众不同呢！”同学们惊奇地议论着。

1988 年，毛新宇被人民大学历史系录取。消息一传开，在他的宿舍里，经常有同学鱼贯而入，或推门探头，为的是一睹这位毛泽东后代的尊容。然后，也发出了“将门之相”、“伟人遗风”之类的议论。

这也难怪，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孙子，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吗。

毛新宇长有方正的脸盘，宽阔的额头和眉宇，与祖父毛泽东很有几分相像，而细长的眼睛，则酷似他的伯父毛岸英。平时，他笑起来，眼睛细眯，面部表情舒坦柔和，真和毛泽东的笑容有几分神似。可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体型。

中学时代，毛新宇已长成 1.7 米的个头，体重将近百公斤，在全校学生的队列中，极为突出，可算是一号“庞然大物”。到了大学，体重增至 106 公斤，脸庞、肩膀、腰身滚圆，穿上特大号的军服，衣扣仍个个紧绷，一双没有鞋带的运动鞋套在脚上，可省去弯腰费力。

其实，小时候的毛新宇并不胖。6 岁前，他厌食，营养不足，很瘦。那时“文革”还未结束，母亲邵华经常出没于北京火车站和北京中山公园等

地，以躲避江青等人的迫害，未能精心照料他。6岁那年，母亲见他瘦得厉害，便给他服用一种叫“肥儿丸”的中药。这一来，他胃口大开，很快就胖起来了。

然而，胖乎乎的毛新宇，忠实厚道，性格开朗随和，待人处事单纯、天真，总是笑眯眯的，又确实是个可爱的“小家伙”。某些矮他一头，身宽和体重甚至不及他一半的女同学，在他面前常常情不自禁地以“大姐姐”自居，主动关心他，同学们也全都喜欢他，爱护和照顾他。开饭时如果他来晚了，同桌的同学总会给他留下饭菜，而且常常把自己的匀给他一些。谁都知道他饭量大，饿得快，食物对于他似乎更重要。

有一次，一位女同学像个大姐姐似的勉励他好好学习，要对得起毛泽东，还说将来要找一个好媳妇，说得小新宇脸都红了。最后，他忍不住向这位老练的“大姐姐”提了一个埋在心底很久的问题：“你说，过多少年以后，人们会不会把我爷爷的功绩都忘掉？”不会。”那同学很肯定地说：“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是抹不掉的。”

热心社会活动

从中学时代起，毛新宇就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

1986年8月，毛新宇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一员，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友好访问。当时他16岁，在代表团八个分团中年龄最小，大家提议，给他安上一个总团长助理的头衔，让他有机会锻炼锻炼，为大家跑跑腿。他非常乐意接受这一“任务”。尽管在生活中他更需要别人照顾，常常为穿衣穿鞋之类的事急得手忙脚乱，生怕赶不上团里的活动，但他还是为大家跑前跑后，张罗忙乎，差事干得很不错。经常出头露面，使他逐渐克服腼腆羞怯，老练起来。金日成主席接见代表团那天，他开始很紧张，很激动，差点把临行前妈妈教他的话忘了。可当金日成慈爱地握住他的手时，他心情已经稳定下来，庄重而微笑地说：“金主席，您好！我代表我们全家，祝您身体健康！”金日成望着他，点头致谢：“能在朝鲜见到你，我很高兴。”

1986年9月1日，毛新宇和黄继光、邱少云烈士的侄女，罗盛教烈士的侄子等代表团成员一起，来到桧仓郡的志愿军烈士陵园扫墓。当毛新宇来到毛岸英烈士墓前的时候，一位朝鲜阿妈妮上前一把搂住他，热泪纵横。当年，就是这位阿妈妮为毛岸英的坟墓添上了第一把土。毛新宇心情沉重起来，他肃立在墓前，用悲壮的声调念诵自己献给伯父的诗。周围的代表团成员深受感染，泪水夺眶而出。

上高中时，他曾多次领头和同学到工厂和农村搞社会调查。其中，曾两

次去北京昌平区农村。有一次，他们来到昌平区万寿山附近一个村子，他对村干部说自己是毛泽东的孙子，并说明来意，村干部们便热情接待了这群中学生。在调查中，毛新宇和同学们了解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同时也发现了许多问题。例如，有些地方还未脱贫，农民生活很苦，甚至有的家庭全部家当加起来还不够买一只皮鞋；有些地方重商轻农，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淡化了，一心一意种田的人少了。不少老农对此忧虑重重，担心这样下去，总有一天城里人没有粮食吃。农民还反映，真正靠勤劳致富、科学致富的不多。然而，最令农民气愤的是那些营私舞弊的所谓“村党”、“乡党”，他们破坏了党的政策，毁坏了党的形象。回到学校，他和同学经常在一起议论，并表示长大了一定要为人民做好事，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多作贡献。

中学生的毛新宇，还参加过一个美国组织，叫“李振翩基金会”，这是促进中美友谊的一个民间团体。李振翩是已故美籍华裔科学家，和毛泽东是同乡。毛新宇平时曾在同学中宣传过这个基金会。1986年12月30日，毛新宇向学校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可是，因为团组织不了解这个美国组织的性质，10个多月过去了，他的申请还未批下来。一天，团委一位干部向他了解该组织的情况，他才恍然大悟，立即作了解释。母亲邵华又把有关李振翩的材料拿给校团委看。这样，他总算在递交入团申请书后整整一年，即1987年12月30日这天，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酷爱历史

也许是爷爷毛泽东博览群书，精通历史，平时言谈行文，古今中外，纵横捭阖，那种气势，那份洒脱的影响；也许是与普通家庭比较，前辈留下的历史遗产过重，功过是非太多，需要继承和深研；也许是几千年来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变迁，成与败，得与失，荣与枯，伟大与渺小，忠与奸，真与伪，扑朔迷离，太令人兴奋，令人深思，令人感慨，令人追究；也许……总之，他和历史这门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

小新宇4岁那年，在爷爷身边生活了将近半年时间，对爷爷很有感情。从小他就喜欢看有关爷爷的书籍，从中了解爷爷的革命经历。中学时，在所有课程中他对历史兴趣最大，成绩也最好。他还特别喜欢看古典小说、历史剧和古典诗词。他在作文里自编过朱元璋的故事《晨昏钟》，也写过《论荆轲》。朗诵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是他在联欢会上多次演出的保留节目。在大学，他还利用课余或晚上休息时间写作朱元璋的传记《乞丐皇帝》。

1985年元旦，毛新宇去拜望王震爷爷，在那里找到了知音。一老一少

从上午 9 时到中午 12 时，讨论了整整 3 个小时的《三国演义》。起初，王老大概想考问一下毛新宇的历史知识，但一提话头，发言的机会就大半被小辈占去了。他讲关羽性格对后世的影响，讲孔明治军的诀窍，又从曹操屯田讲到南泥湾大生产和当前军队与社会改革……王老看着新宇认真的神色，像面对一位学者那样同他讨论着。

1992 年秋，毛新宇大学毕业，考取中央党校研究生，继续深造，并研究他感兴趣的历史课题。

从大学开始，毛新宇一边学习，一边注意积累材料，选择有关论题进行研究。明朝皇帝朱元璋是他最感兴趣的历史人物之一。如今，他已有不少历史学术研究成果。1992 年他在《求是》杂志发表《不学历史我们永远幼稚》一文，引起强烈反响。1994 年他参加了“鸦片战争 150 周年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1995 年 8 月，他又参加了在安徽凤阳市召开的“国际明史研讨会”，并发表《论朱元璋废相》的论文，受到与会学者和国内外专家的重视，1995 年出版了 20 余万字的《朱元璋研究》论著。1996 年与母亲共同主编了《永远的怀念——毛泽东诞辰百周年辑录》一书，共 50 万字。1997 年，他参加了国际战略研究会，并就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即席发言，与会者都给予赞许和肯定。

崇拜祖父的功绩和人格

敬仰爷爷毛泽东，是毛新宇风雨不变的信念。毛新宇曾说：“我无限地崇拜爷爷，爷爷是我的上帝。”这是就爷爷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而言的。

小时候，爷爷留给他依稀可辨的印象，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其余都是朦朦胧胧的。他真正了解爷爷，知道爷爷的伟大所在，是在他能读书看报以后。告别童年，步入思考的年华，毛新宇认认真真阅读了毛泽东的许多著作集。其中他尤其喜欢《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当别人问及收获时，他说：“我爷爷的文章写得有文采，诙谐，生动，有气势，深奥的道理总是浅显地写出来。读他的文章，我的思想得到改变。”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李银桥等写的书和回忆文章，是毛新宇了解爷爷工作和生活情况的一个重要途径。他认为，这些回忆录是真实的，爸爸、妈妈看后也告诉他，写得很真实。毛新宇说：“爷爷就是那样生活和工作的，爷爷的人格就是那么伟大！”慷慨之后他又叹了口气：“唉，说起来，我对爷爷的感性认识也差不多是从这些书里得来的。”说完，满脸凝聚着遗憾。

毛新宇还读过许多外国人评说或说到毛泽东的书，例如特里尔的《毛泽

东传》，施拉姆的《毛泽东》，费正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有日本和其他外国人写的书。

他与别人谈论时，对上述充满智慧和善意的评论表示理解和某种程度的肯定。“但是，我不喜欢某些美国人写我爷爷的书！”

问他为什么。

“偏见哪！里面充满了偏见！”他缓缓地却愤愤地，“比如，他们往往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老人家’（他也时常这样称呼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常常夸大‘大跃进’的消极作用，夸大‘老人家’应负的责任，还有‘反右’，也是把我爷爷描写成一个阴谋家，是敌视知识分子的人……高岗事件，也说是我爷爷的手段……我是学历史科学的，科学必须客观，偏见不是科学。”

“还有别的原因吗？”

“当然有，像里面史实方面的毛病就不敢去挑了，学过历史的人大眼一瞄就是一大堆。”

对境内或对国外散布毛泽东流言蜚语的报刊、书籍，毛新宇义愤填膺：“这纯属诬蔑、造谣！”他极其蔑视，说：“那些东西纯系一堆垃圾！”

他平时喜欢和同学们在一起谈论爷爷的功过是非，对于爷爷晚年的错误、缺点及其影响，同学们常有尖刻的议论，只要说得有道理，他并不生气。“我爷爷的‘思想’要发展，他是人，不是神，有错误缺点。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列主义的发展。”他对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同学们并没有什么两样。

从某种角度来看，他的想法还是比较明智的。他说：“刚入大学时，我很担心当时的自由化气氛发展下去，爷爷的历史地位会被抹杀，爷爷会被人淡忘。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爷爷的伟大业绩和伟大人格，将会与中国历史同在，‘毛泽东热’正表明了人民铭记他的伟大业绩，敬佩他终生为人民无私奋斗的伟大人格，因为现在的书刊影视中的‘毛泽东热’着重再现他的革命活动和业绩，表现他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人格。即使是港台、海外严肃报刊上的以‘老人家’为题材的文章，其主流也莫非如此。”他承认，“毛泽东热”之所以越来越“热”，有“名人效应”，也有人民群众对党风政纪的现状不甚满意、有些人缅怀过去时代的因素。他还说：“理智告诉我，爷爷也是一个人，会有错误的，实际上也有错误，正像中央决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的，‘老人家’在大跃进、‘文革’期间是有错误的，我更愿意这样看：‘老人家’初衷是好的，事情都是办坏事的人办坏的，比如江青，就是一个办坏事的人。关于这个问题，我总跟自己斗，一会儿理

智占上风，一会儿感情占上风，所以我不打算自己写研究‘老人家’的书，怕写出来难以客观，但我要继续研究我爷爷，研究他的著作，他的活动。”

毛新宇很喜欢欣赏和演唱“红太阳”系列歌曲，因为这些歌曲反映中国人一个时代的情结，令人难以忘怀；同时其旋律优美，语言朴实，气势磅礴，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一个偶然的機會，毛新宇和妈妈到广州新时代音像公司参观，公司老总一时兴起叫新宇到录音棚演唱《东方红》，他用陕北民歌的风格演唱了一遍，得到公司方面的赞赏，建议由中唱公司和新时代公司为他灌一盒演唱《红太阳》的磁带。毛新宇和中唱公司共同选定了十二首旋律优美、脍炙人口的歌曲，由毛新宇作词的《挥锄》和《爷爷曾在这里走过》两首歌，也一并收入。

演唱歌曲、录制盒带对毛新宇来说是一件新鲜事，更是一次挑战。他像全身心做学问一样，投入演唱制作，终于在 1997 年 11 月初，完成了由他自己演唱的这一歌颂毛泽东的录音专辑，作为向爷爷 104 周年诞辰的献礼。

附 录

附 一

韶 山 记

韶山，楚南一名山也。祖西华，面南岳，《盘古舆图》按：轸宿在玉衡。天文昭耀，其辰在巳，星在荧惑，五行在丙，天市在西垣，次舍在鹑尾，细度在轸十六度也。介三湘而远七泽，发岳麓而控东台。潏回地涌，水飞雪浪之花，岌岌天开，山横玉枕之案。绵亘百余里，蜿蜒来八面之龙。山苍莽，际无隆，狩幸致南巡之大舜。凤仪亭，丹凤衔书；胭脂井，紫龙吐沫。上麓天马凌空，岱上灵鱼不老，褒忠贞女来朝，相随鹏山白鹤，崩护石人抱子，引将东鹜凤凰。乌台石龙，草衣崖畔，湘西狮子，石羊入山。左湘潭，右湘乡，风云际会；前金紫，后龙王，雨露同沾。登望而咫尺星沙，转盼而昭山罗列，青草湾，金鸡观，秀丽花园；铁陂塘，枫梓山，恢宏乌石。平地斑竹，竹山青葱四季，南岸创石，石峒雄壮长天。黄田、白田，月城山之保障；黑泥，花桥，桃树山之前朝。钓水洞，鲤鱼寨，鱼龙变化；青山寨，文林寨，虎豹风生。太乙观，中放燃藜；白莲庵，四时玉藕；韶峰庵，仙女庵，列三女仙之金像；团山寺，清溪寺，绘诸菩萨之仪容。九天韶乐，时来迭奏，罗音三邑叟童，日每瞻依圣境。果然特地乾坤，信道斩新日月。不仙不道，眉山盘谷风规；产乐产花，桃洞天台景象。浩月是长明公不老，白云乃不速客频来。绘动风常清，山麓松垂露，轻洗妖氛。

宁与尔达翁毛子家相对而望，隔山峰，性相同，而恒乐山水，琐琐烟亚，淡淡邑邻。因思祖而念宗。同年修谱，缘上仑而下岭，信口记情。余与达翁，为龙为蛇，既已谢阳秋之太史，呼牛呼马，一任彼月旦于时人。以文章为游戏，将希刘勰逃禅，看齿发之衰颓，自信鲍昭守道。今睹峰峦窈窕，一拳便是名山；花竹扶苏，半亩何如金谷。孔孟以经常济世，不欲炫奇怪以骇时；佛老以妙道度人，每借神通悚众。惟阅此山，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石出，四时之景恒周，一道同风永远。乃述题数

语，聊缀七言：

绕岫岚光凝欲滴，长风轻袅云烟侧。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拥千山万山碧。
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

山右布衣周定宁谨识

（见《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族谱》卷二，

清光绪辛巳即 1881 年编印）

附 二

韶山毛氏族谱《序》

一修族谱《序》

士之奇者，不在耳目之中；境之奇者，亦出乎耳目之外。湘之西有韶山，山峻以复，泉洁以长，茂林修竹，云气往来，中可烟火百家，田畴沃壤。循流而下至铁陂，两山相峙若门，然毛氏聚族于此，传十数世，风俗醇厚，储蓄殷饶，古传桃源莫过焉！若使在中原贵游之地，其不人道子之画、柳州之记乎？此境之奇者，出乎耳目之外也。六国时有毛先生遂者，值赵平原君好客重士而卒略先生想其交游淡泊，容貌质朴，无以动人者，及其数言定纵，使赵重于九鼎，然后服。毛先生之奇绝，非门下数千人所及。此岂士之奇者不在耳目之中乎？余常谓：惟奇人雅爱奇境，惟奇境实产奇人。毛先生自归赵后，不知复游楚而衍子孙于楚否？何韶山一区有似乎脱颖者为之卜筑也。夫山水秀绝，必生奇才，韶山虽不在中州往来之地，赋客骚人所不到，必将有秉山川之秀，追踪古先生其人者，为国之华，为邦之望，使人与地俱传。则虽不在耳目之中，而已非常见所及矣！余先君避乱韶山，为外祖瑞芝公之婿，瑞芝公乏嗣，止诞余母，与外祖母俞夫人教以妇职，慈严交尽，余兄弟读书粗就，实有赖焉。余不及见瑞芝公，余母毛夫人，常为炯道瑞芝公及旦卿公之贤，皆有一言九鼎之风，惜其丁乱世而以山林老。毛氏自二公外，不乏魁梧奇杰之士，而家乘阙然无所徵考。今舅氏修葺家谱，属余为序，余去韶山百里，又以宦游走京师，未暇登山临水，细领其趣，而谱牒所载，亦未能亲序，其事独望有人焉。览古慨然，家修廷献，思有裨于国家，垂名于青史，则韶山虽幽，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非独毛氏之光，

推原所自抑亦予之光也已。

举人愚甥戴炯拜撰
(见毛氏二修族谱卷首)

二修族谱《序》

我族始祖太华公，元至正时人也，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迁云南之澜沧卫，娶王氏，生子八。明洪武十三年庚申，以军功官人楚省，惟长子清一、四子清四与之偕行，解组时居湘乡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后清一、清四两公卜居湘潭三十九都，今之七都七甲韶山家焉。时同宗人命传公之子全山，亦以军功拨楚，卜于七都五甲石 玚焉。乾隆二年丁巳，族尔达彝生诸公创修宗谱。

(见毛氏二修族谱卷首)

附 三

韶山毛氏家族《源流记》

源之远者流之长，根之深者叶之茂。仰托其流之长叶之茂者，溯其源之远而愈溯其源之远而益远，究其根之深而愈究其根之深而弥深。斯繁徵博引，任意搜罗，凡可为光扬谱牒者，不计远之远深之深而滥采焉。不知世远年湮，宗分派别不失诸浪，即失诸诬，其不敢浪者，实不敢诬也。吾姓系出周姬文王子毛伯郑之后，世为周卿，因国为氏。自毛亨、毛萇注诗训诂，西河遗派，固深且远矣。汉晋唐宋迄明，莫不代有伟人，光炳青史，考其源根，历历可据，承其年代，派衍如珠之串，如蝉之联，不惟震惊一时，实足赫耀千古矣。乾隆二年，尔达、彝生诸公创修族谱，奉太华公为始祖，盖法夫子删书，断自唐虞，虽前有典坟不录之意，惟于例言开始载吾族，接西江，自宋工部尚书让，世居三衢，生子休公，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监祭酒兼殿中侍御史，出守吉州，迎尚书让公就养，占籍吉之吉水龙城家焉。二十一世传至伯温公，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考据西江宗人执谱相访，实属西河的派。而始祖太华公位下书载：元至正年间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迁云南之澜沧卫，娶育子八。明洪武十三年庚申，携长子清一、四子清四官楚，居湘乡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后，清一、清四复卜居湘潭三十九都，今之七都七甲韶山，开种铁陂等处，编为民籍。此外别无他见。尔达公并无自序。惟特英公自记序中有载：太华公称隐君子，其从滇来楚俱同。则吾族远

祖让公，始祖太华来从江右，籍落湘南，可谓源远流深，存实昭信矣。乃自乾隆二年丁巳，初修后，遥遥百余年，未获续修。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族老万庆、六和，绳祖倡族二修，刊发凡例，定期会集亲供，无如旷典有待遂尔中止。咸丰二年，父老传集阖族人祠，定立续订派系，公立合同，族谱有难，遽续房谱，听各为谋，第不许更乱派系，以免异同。自是震公房房谱，得修于咸丰五年乙卯，有源流序存真说，深公房房谱，得修于咸丰七年丁巳，源流虽本老谱，浑略不详。瑞公房房谱得修于同治七年戊辰，亦有源流考。鉴公房房谱，亦修于同治七年，亦有源流考。备考指讹会核，合稽祖始祖，祖宋工部尚书让公，同一致其载：休公生子七，秩爵迁潭，不相符合，殊难足信。至石祥房，全山公一支，本自命传，同籍吉水，同迁云南，同来楚省，其同宗或亦不诬。考据尔达公会宗说载：有其时同族人命传公，乾隆丁巳春族谱，戊午夏册至谱已告成，因编次谱，后俟续修，刻入正谱。据石祥房嗣孙廷佐、廷德自志毛家湾坟山记：吾祖命传公之子三，长子全山，原籍江右仙茶乡，后徙云南，因开辟黔省，全山顶朴，洪武垛籍奉调贵州平坝卫，以军功拨入楚省，标立湘潭三十九都石祥段等处，给田四百八十亩。因传为毛家湾则始迁石祥者，全山公确也，宗同谱同，由是五大房之名旧矣。兹续修何敢议焉？第据一派衡之，则我太华祖几与全山公等平书，不惟形强附其于众，论何展转思维，而必使珠联璧合，天衣无缝也。酌遵宗谱始祖太华一派起，连书至四派开其先，旋从全山起一派，亦连书至四派，安其次从五派起，一体连书，惟分列震、瑞、鉴、深、石祥五房，以提其经，则既不失太华公为我阖族四房之始祖；全山公亦不失为石祥一支之始祖，而体裁亦觉近宜也。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创修者，当为后之续修者计，续修者，可不为后之三修者计乎？夫黄渥岂真忘前苦，于只知七世老泉，何容略远碓乎？信在迂眉，后之贤能辈出，按诸三十年一修之例，而及时为裘之集貂之续，即此鸦之涂少释狐，之疑大为虎之蔚而谅，窥豹之斑，以补其鸠拙之不及，则拜祝多矣！

光绪七年辛巳岁仲冬月

下浣之吉阖族公识

（见毛氏二修族谱卷首）

附 四

韶山毛氏宗祠记

《礼》云：君子将营宫室，必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五龕，以奉先代神主旁亲之。无从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朔旦则参，则食则薦是祭之，重于祠也昭昭矣。吾族自前明由豫章来楚，卜居湘水，落旦韶山，相吉于韶峰之左，枕山而立祠焉。其制精，其法备，前为牌坊，规模壮丽，正中大书“毛氏宗祠”，遥望厘然。左右平列“韶灵”“毓秀”四大字，光耀照目。祠门上建匾额，亭门前立两石鼓，高数尺，大围许，崇圣学也。门内，高建戏楼，中台可容数十人演庆，匾题“鉴古观今”。楼柱咸有题联，其书入风出雅者，左右两马门也。台之左右两楼，小窗多明，为优人装饰披挂之所。楼之下，即为下晋，宽达敞然，輿马辚集无虞隘。左一厢为庖厨地，右一厢为酒饭舍，东西两回廊夹丹墀，墀中设阶级，历阶五级而跻之升大厅。厅纵横堪布数十席，气象堂皇，整齐严肃。为阖族办公、讲约、祭祀饮福设也。厅视下晋高逾三尺余。厅后中树塞屏，匾题“聪听彝训”，屏高仰望，不无落帽。承庐四砥柱，大拱抱，制有镂金联，联语可当座铭，祠公碑文鳞接，安厅壁，炳炳烺烺，可摹可诵，从屏际左右角门入，洞达天井，别有清气，东廊悬钟，西廊树鼓。践东阶，步西阶，载上之为寢室地。较中厅高有四尺奇，履其阶，眼界豁然，神明肃然，怵惕之心油然而生矣。中建享堂，庄严一座，历代祖考之神主列焉。颜曰“敦本堂”，有上接云衢，俯临无地之胜。堂左为主祭齐宿所，堂右为经理钱谷室，祭器分藏其间。主座下阖之为全壁，辟之为重门，进为内享堂，灿然一龕香火，历代祖妣之神主居焉。座面山立天井，数武围墙，不卑不亢，竹影摇窗，松风入户，四时花鸟不尽，清幽有与天地相永者矣。左入则为助祭分献齐室，右入则为与祭嘉宾坐次，登斯堂也，有低徊不忍去云，噫制何精也，法何备也，遥遥数百年完璧依然，土木何巩固也！前人垂裕谋深虑远也，然其心苦矣。溯其祠之建，在乾隆二十八年，主其祠之成则次琦、育万、体仁、彝生、诸公也。敬为志诸。

礼载 敦伦
诸嗣孙 有庆 玉羲 同识

（见毛氏三修族谱卷二《词堂记》）

附 五

韶山毛氏家戒十则

游 荡

人有耳目能听能睹，人有手足能蹈能舞，具此官体，不农不贾，饱食暖衣，逍遥过午，弃尔诗书，荒尔田圃，家计萧条，基业易主，自此嬉游，有玷尔祖。

赌 博

人惟懒惰，遂交赌友，赌尽家资，一无所有，三五成群，将为盗藪，且引匪徒，钻墙窥牖，非盗即奸，中构亦丑，博棋好饮，不顾父母，不此之戒，祖岂尔佑！

争 讼

争长竞短，都是客气。讼到公庭，大爹小的。出与人言，扬扬得意，不知当官，催天抢地。倘或理亏，受刑系累。幸而胜焉，也要破费。莫逞雄心，免贻后悔！

攘 窃

冥窃暗偷，谓莫予见。一朝败露，捕拿到县。招认受刑，皮穿肉颤。差役起赃，辱及女眷。饱捕亡家，东逃西窜。死不入祠，生有何面。凡我子孙，莫拈钱断。

符 法

法打包身，磨拳擦掌。打降行凶，强牵强抢。犯法遭刑，捷如影响。为首为从，那个漏网，大则抵伤，小则笞杖。不思肌肤，父母生养。忘身及亲，你去想想！

酗 酒

世上是非，多起于酒。加以贪杯，愈丧所守。乱语糊言，得非亲友。甚至醉时，胆大如斗。酗酒放风，裂肤碎首。醒后问之，十忘八九。何如节饮，免致献丑！

为 胥 隶

人在乡村，闲言存养。一入衙门，便如魍魉。一票一签，几斤几两。只讲盘子，不思冤枉。少不得意，一索三掌。怒气冲天，报施不爽。快活赚钱，休作此想！

为 僧 道

邪说异端，莫如僧道。高者谈元，卑者应教。昔圣昔贤，辟佛辟妙。倘非虚无，何故抹倒。人有五伦，僧归一扫。尽如此辈，人类绝了。邪正两途，各宜分晓！

谋 风 水

既有天文，必有地理。得之有缘，非可妄取。近听术人，动谋风水。他人祖塋，恃强破毁。或牵或骑，连讼不已。死既不安，生何利矣。戒之戒之，牛眠在迤！

占 产 业

凡人产业，各有抵址。窥其唇联，奸谋顿起。得寸思尺，造契造纸。曾不数年，弃如敝屣。向所越占，几能到底。拱手让人，落魄而已。何如守分，免受嗤诋！

右家规家训家戒，不惜苦心苦口，撰书成言，厚望同宗循其规，听其训，守其戒，共为一族之孝子慈孙焉。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知其道不远矣。

敦本堂公识

（见毛氏二修族谱卷二）

附 六

韶山毛氏家劝十则

培植心田 一生吃着不尽，只是半点心田。摸摸此处实无愆，到处有人称羨。不看欺瞒等辈，将来坠海沉渊，吃斋念佛也徒然，心好便膺帝眷。

品行端正 从来人有三品，持身端正为良。弄文侮法有何长？但见天良尽丧。居心无少邪曲，行事没些乖张。光明俊伟子孙昌，莫作蛇神伎俩。

孝养父母 终身报答不尽，惟尔父母之恩。亲意欣欣子色温，便见一家孝顺。鸟尚知报本，人子应念逮存，若还忤逆悖天伦，只恐将本雷震。

友爱弟兄 兄弟分形连气，天生羽翼是他。只因娶妇便参差，弄出许多古怪。酒饭交结异姓，无端骨肉喧哗。莫为些小竞分家，百忍千秋佳话。

和睦乡邻 风俗何以近古，总在和族睦邻。三家五户要相亲，缓急大家帮衬。是非与他拆散，结好不啻朱陈。莫恃豪富莫欺贫，有事常相问讯。

教训子孙 子孙何为贤知，父兄教训有方。朴归陇亩秀归庠，不许闲游

放荡。雕琢方成美器，姑息未为慈祥。教子须如窦十郎，舐犊养成无状。

矜怜孤寡 天下穷民有四：孤、寡最宜周全。儿难母苦最堪怜，况复加之贫贱。寒则予以旧絮，饥则授之余粮，积些阴德福无边，劝你行些方便。

婚姻随宜 儿女前生之债也，宜随分还他。一时逞兴务繁华，曾见繁华品谢。韩侯方歌《百两》，齐姜始咏六珈。大家从俭莫从奢，彼此永称姻娅。

奋志芸窗 坐我明窗讲习，几曾挥汗荷锄。驱蚊呵冻志无休，诵读不分昼夜。任他数伏数九，我只索典披图。桂花不上懒人头，刻苦便居人右。

勤劳本业 天下有本有末，还须务本为高，百般做作尽糠糟。纵有便宜休讨，有田且勤尔业，一艺亦足自豪。栉风沐雨莫乱劳，安用许多机巧。

（见毛氏二修族谱卷二）

附 七

韶山毛氏家训八条

孝悌乃百行之原。凡子逆父、弟犯兄，必有先见之端，亲房自能觉察。如有此种子弟，亲房会同房长，登门晓谕。倘仍不化，传祠惩治其分居。卑幼忤漫尊长者，亦一体究治。

夫各有妇，妇各有夫。如有贩卖异姓生妻，从中渔利及掠为己有者，传祠惩治。族内若有夫故，妻顾守节者，兄弟不许逼嫁，亦不许转房。其或从戎多载未有确实凶信，毋得擅行改嫁。

女婴不许溺送，幼媳不许磨凌。如有悍妇丧心，轻视女婴幼媳，责在家长，处治不贷。

士农工商各居一业。如有毫无执业，游惰好闲，衣食不给，势必流为盗贼，甚或放飘诱众，酿成巨祸。此种子弟无迹者，房长带祠惩治；有迹者，捆解，父兄毋得袒护。

近来教匪、会匪邻县邻族往往多有。族中无知者，倘入教匪会匪，察知其实，重行惩治。

宰牛相会、聚赌抽头、吃食洋烟等事，不独有违宪禁，实为败坏风俗、废弛执业之由，招惹歹人之藪，族中有此，一经发觉，分别究治。

遇事聚众行凶坐拼，强牵强掘，碎毁什物，甚至投塘溺水放火焚巢等事，无论与同姓异姓相争，传祠究治，以翦横蛮。

房族之内，无论何事肇衅，致启争端，由房族首拨人排解论理不服，舍理论情不服，再论亲亲之谊，毋得越族成讼，恃刁者，公同稟究。

（见毛氏三修族谱卷六）

附 八

韶山毛氏家族《百字铭训》

孝悌家庭顺，清忠国祚昌。
礼恭交四海，仁义振三纲。
富贵由勤俭，贫穷守本良。
言行防错过，恩德应酬偿。
正大传耕读，公平作贾商。
烟花休入局，赌博莫从场。
族党当亲睦，冤仇要解忘。
奸谋身后报，苛刻眼前光。
王法警心畏，阴功用力攘。
一生惟谨慎，百世有馨香。

（见毛氏二修族谱卷六）

附 九

《韶山毛氏族谱·世系表》(竹溪支)

民国三十年四修本

| | | | | |
|----|------|---|----|--|
| 一派 | 始祖 | | 太华 | 元至正年间，避乱由江西吉州迁云南之澜沧卫。 |
| | | 妣 | 王氏 | 生子八。明洪武十三年庚申，以军功拨入楚省，惟长子清一、四子清四与之偕。解组，侨居湘乡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没葬五里牌道士山后。清一、清四二公卜居湘潭三十九都，今之七都七甲韶山家焉。开种韶山铁陂、乌塘、东塘等处，共田四百余亩。编为一甲民籍。 |
| 二派 | 华公子二 | 长 | 清一 | 生，没。葬向。(按：原谱空而未填，今照录，以下如是。) |
| | | 配 | 昌氏 | 生，没。葬向。子二：有恭、有信。 |
| 三派 | 清一子二 | 长 | 有恭 | 吏材，载邑乘。生，没。葬向。 |
| | | 配 | 金氏 | 生，没。葬向。子三：震、铎、瓚。 |
| 四派 | 有恭子三 | 长 | 震 | 生，没。葬本邑七都七甲韶山木梓山墮内，倒地木星午山子向。有碑、墓图、传。 |
| | | 配 | 彭氏 | 生，没。葬湘乡县北门外顿皮暇罗风桥边卯山西向。子三：从文、从武、从昌。 |
| 五派 | 震公子三 | 长 | 从文 | 生，没。葬本邑七都七甲韶山震公房祠后梓山墮内，倒地木星丁山癸向。有墓。 |
| | | 配 | 张氏 | 生，没。葬韶山羊楼坪，今名羊楼暇，屋对门山金盆架上右边，庚山甲向。有碑。子一：珊。 |
| 六派 | 从文子一 | | 珊 | 生，没。葬本邑韶山流江冲口马鞍冲住屋后元武山墮中岷，壬山丙向。 |
| | | 配 | 匡氏 | 生，没。葬本邑七都七甲韶山羊楼坪对门金盆架上衬姑冢，庚山甲向。有墓图。丈界载禁约契据。子五：立尧、立舜、立继、立雍、立熙。 |
| 七派 | 珊公子五 | 长 | 立尧 | 字竹溪。生，没。葬本邑七都七甲韶山冲塘侧，癸山丁向。 |
| | | 配 | 何氏 | 生，没。葬本邑七都七甲韶山马鞍冲屋后墮右岷，乾山巽向。丈禁有契碑。子一：显昉(抚弟立舜次子为嗣)。 |

续表

| | | | | |
|-----|------|---|----|--|
| 八派 | 立尧子一 | | 显昉 | 字栗山。明嘉靖二十七成戊申五月二十九午时生，没葬宗祠后木梓山，未山丑向。 |
| | | 配 | 李氏 | 生，没。葬木梓山堕，震祖坟下，子山午向。子四：荣楚、荣汉、荣项、荣理。 |
| 九派 | 显昉子四 | 三 | 荣项 | 字湘泉，生，没。葬韶山焦山冲上窑堕山勒马山下，辛山乙向。 |
| | | 配 | 彭氏 | 生，没。葬韶山焦家冲上窑堕山勒马山。子二：朝岳、朝巍。 |
| 十派 | 荣项子二 | 次 | 朝巍 | 字汉字。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十一月二十九亥时生，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五月二十六辰时没。 |
| | | 配 | 郑氏 | 明万历四十七己未七月初一卯时生，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三月初九午时没。葬房祠对门何家园，辛山乙向。有碑。子七：士翔、士翊、士翰、士翱、士翅、士翻、植保殇。 |
| 十一派 | 朝巍子六 | 四 | 士翱 | 字客卿。顺治四年丁亥四月初五未时生，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八月十六丑时没。 |
| | | 配 | 谢氏 | 顺治六年己丑四月初五卯时生，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九月初五未时没。葬何家园拊姑冢。子一：文邦；女二：长适张，次适周。 |
| 十二派 | 士翱子一 | | 文邦 | 字伟才。康熙二十年辛酉十月初二辰时生，乾隆十七年壬申六月初六亥时没。 |
| | | 配 | 廖氏 | 康熙三十年辛未十月初七巳时生，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六月初五未时没。葬何家园拊姑谢氏冢左，辛山乙向。有碑。子五：方淳、方潜、方沛、方洙、方溪；女三：长适周、次适赵、三适周。 |
| 十三派 | 文邦子五 | 长 | 方淳 | 字子朴。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十二月初一丑时生，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四月初六申时没。 |
| | | 配 | 贺氏 |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七月十五日巳时生，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二月十四巳时没。葬李伯冲冬茅塘老屋后，西山卯向。有碑。禁界上齐埂，下抵勘，左抵伟才丈界外山，右抵壕。子三：运遂、运选、运速（出抚弟方溪承桃）；女一：适周。 |
| 十四派 | 方淳子三 | 次 | 运选 | 字世儒，原名如。乾隆十二年丁卯十一月丑时生，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八月三十午时没。 |
| | | 配 | 庞氏 | 乾隆十三年戊辰六月十二未时生，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四月初九辰时没。葬震公祠对门茅堕仑，今名禁山仓，辛山乙向。有碑墓。子二：际耀、际彩；女二：长适杨，次适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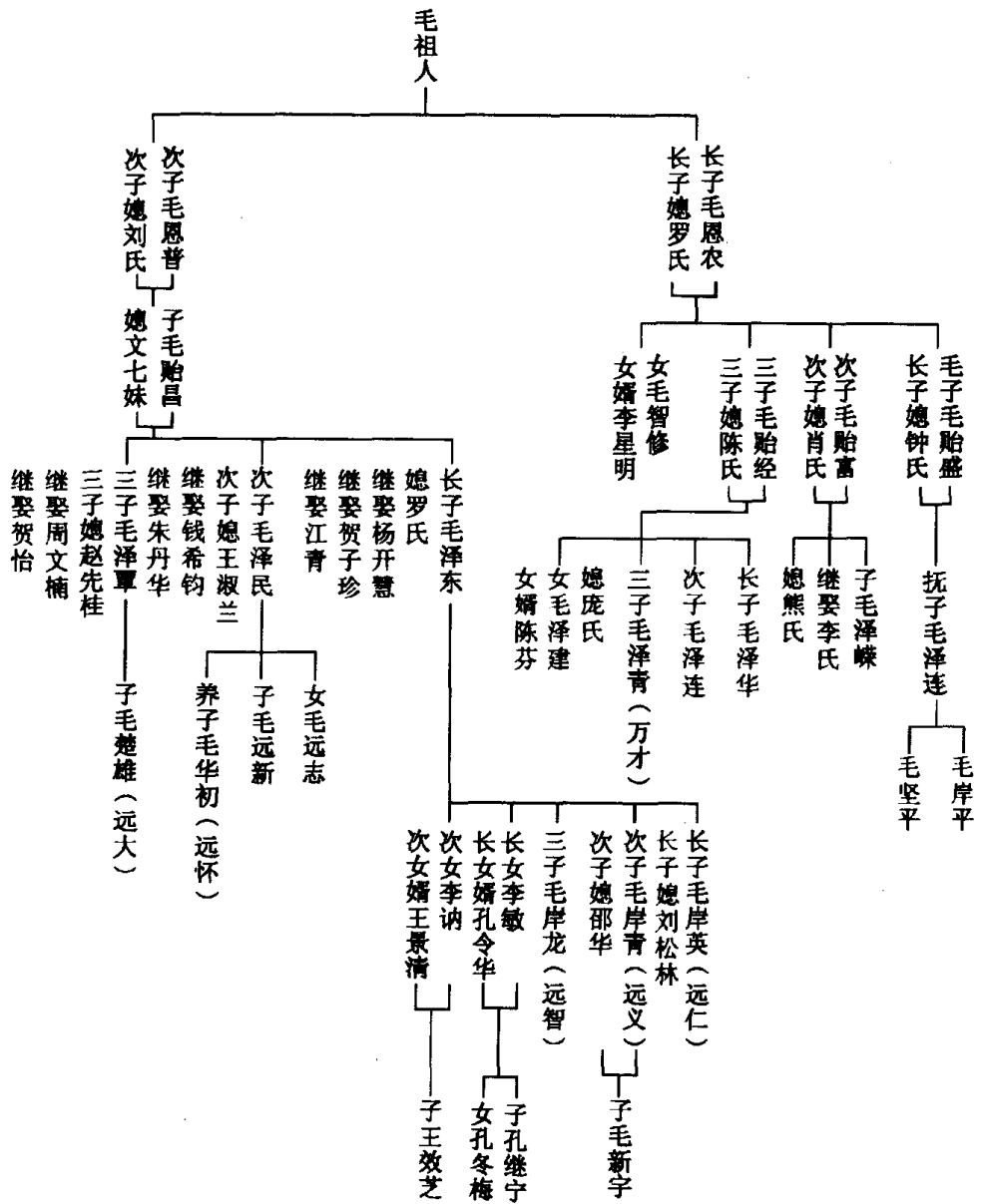
续表

| | | | | |
|-----|------|----|----|---|
| 十五派 | 运选子二 | 长 | 际耀 | 字光前，行一。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二月二十九酉时生，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三月十七戌时没。 |
| | | 配 | 庞氏 |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十二月初七午时生，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五月初九戌时没。子四：祥焕、祥麟、祥彦、祥珣；女二：长适何，次适周。 |
| 十六派 | 际耀子四 | 长 | 祥焕 | 字其有，行一。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十月初九卯时生，道光十九年己亥三月二十四日戌时没。 |
| | | 配 | 张氏 | 嘉庆七年壬戌十月二十二子时生，道光十二年壬辰七月初九巳时没。葬合夫冢右，同向。子一：祖人；女二：长适文，次适赵。 |
| 十七派 | 祥焕子一 | | 祖人 | 字四端。清道光三年癸未九月三十申时生，光绪十九年癸巳十月初三辰时没。 |
| | | 配 | 周氏 | 清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十月十二日卯时生，光绪二年丙子五月初十辰时没。葬韶山滴水冲铁子山穿坳，丁癸兼丑未向。有碑、墓志。子二：恩农、恩普；女一：适沈。 |
| 十八派 | 祖人子二 | 次 | 恩普 | 字寅宾，号翼臣。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四月二十七辰时生，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二十七寅时没。葬韶山滴水冲大石鼓，辛山乙向。 |
| | | 配 | 刘氏 | 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八月初二未时生，光绪十年甲申四月二十六戌时没。葬韶山东茅塘回阴堕尖峰下瑞房坟侧，丑山未向。有碑墓。子一：贻昌；女二：长适张，次适贺。 |
| 十九派 | 恩普子一 | | 贻昌 | 字顺生，号良弼，行一。清同治九年庚午九月二十一辰时生，民国八年己未十二月初三辰时没。葬韶山南岸楠竹墮，卯山西向。 |
| | | 配 | 文氏 | 清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初八辰时生，民国八年己未八月十二辰时没。葬合夫冢，同向。子五：长次殇，三泽东、四泽铭、五泽覃；女二：殇。 |
| 廿派 | 贻昌子三 | 长 | 泽东 | 閤中肆外，国而志家。字咏芝，行三。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辰时生。 |
| | | 元配 | 罗氏 | 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丑时生，宣统二年庚戌正月初二寅时没。葬韶山南岸土地冲楠竹墮，酉山卯向。子一：远智（承夫继配杨氏子为嗣）。 |
| | | 继配 | 杨氏 | 随夫在外，生没候归录。子四：长远仁、次远义、三远智（与夫原配为嗣）、四远怀（出抚弟泽铭为承桃）。 |
| | | 继娶 | 贺氏 | 随夫在外，生年候归录。 |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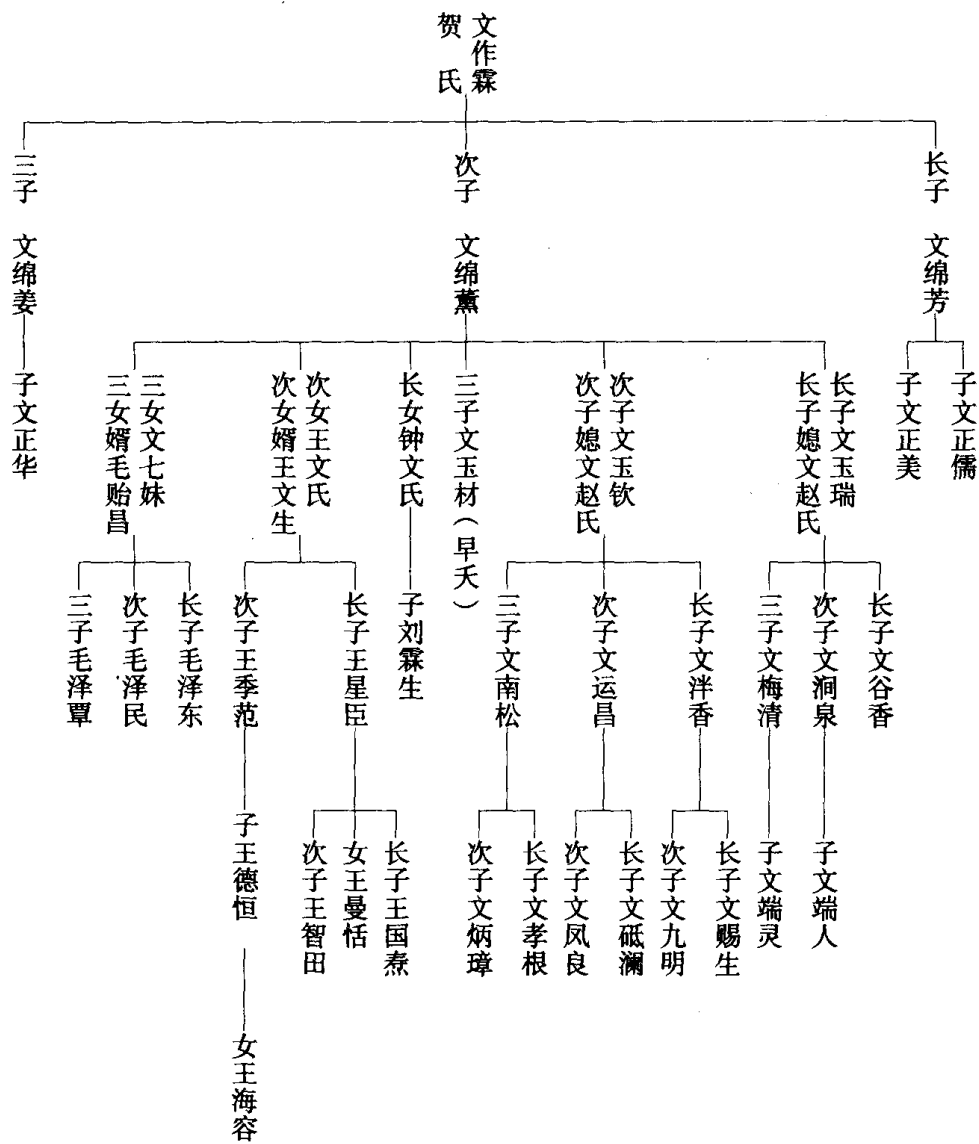
| | | | | |
|-----|------|-----|----------------|--|
| | | 次 | 泽铭 | 琳玠齐名。字咏莲，行四。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二月二十一未时生。 |
| | | 娶 | 王氏 | 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二月二十二未时生。子四：长、次、三殇，四远怀（承抚兄泽东四子为嗣）；女三：长、次殇，三适王。 |
| | | 三 | 泽覃 | 中学毕业。字咏菊，行六。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八月二十七戌时生，民国二十四年乙亥阵亡于江西瑞金。 |
| | | 娶 | 周氏 | 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十月十一辰时生。子一：远大。 |
| 廿一派 | 泽东子三 | 长次三 | 远仁 远义 远智 | 字岸英，随父在外，生年候归录。 字岸青，随父在外，生年候归录。 字岸龙，随父在外，生年候归录。 |
| | 泽铭抚子 | | 远怀 | 字式谷，民国十二年癸亥二月初二辰时生。 |
| | 泽覃之一 | | 远大 | 字楚雄，民国十六年丁卯八月十三未时生。 |
| | | | | |

毛祖人（毛泽东曾祖父）后裔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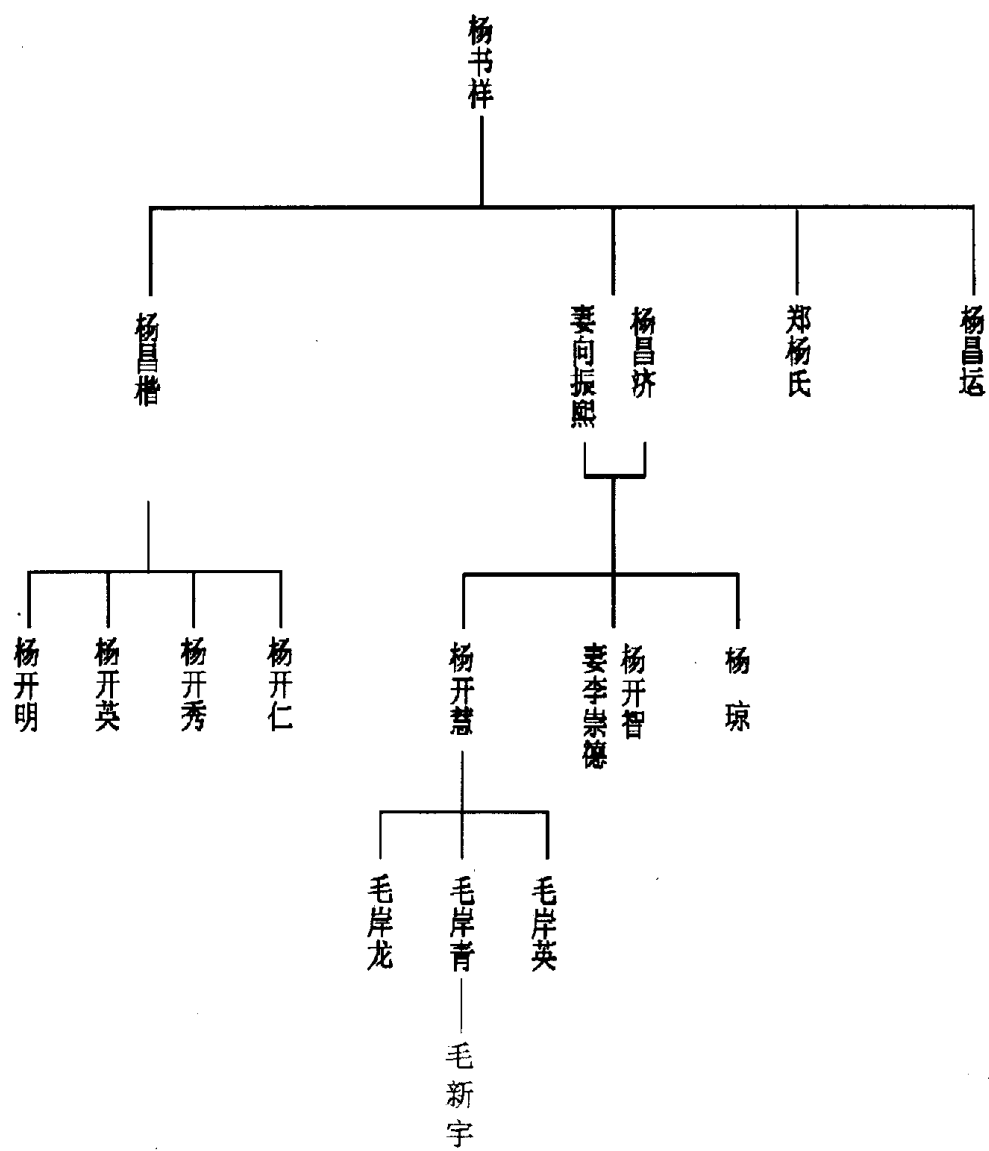
附 十 一

文作霖（毛泽东的外曾祖父）后裔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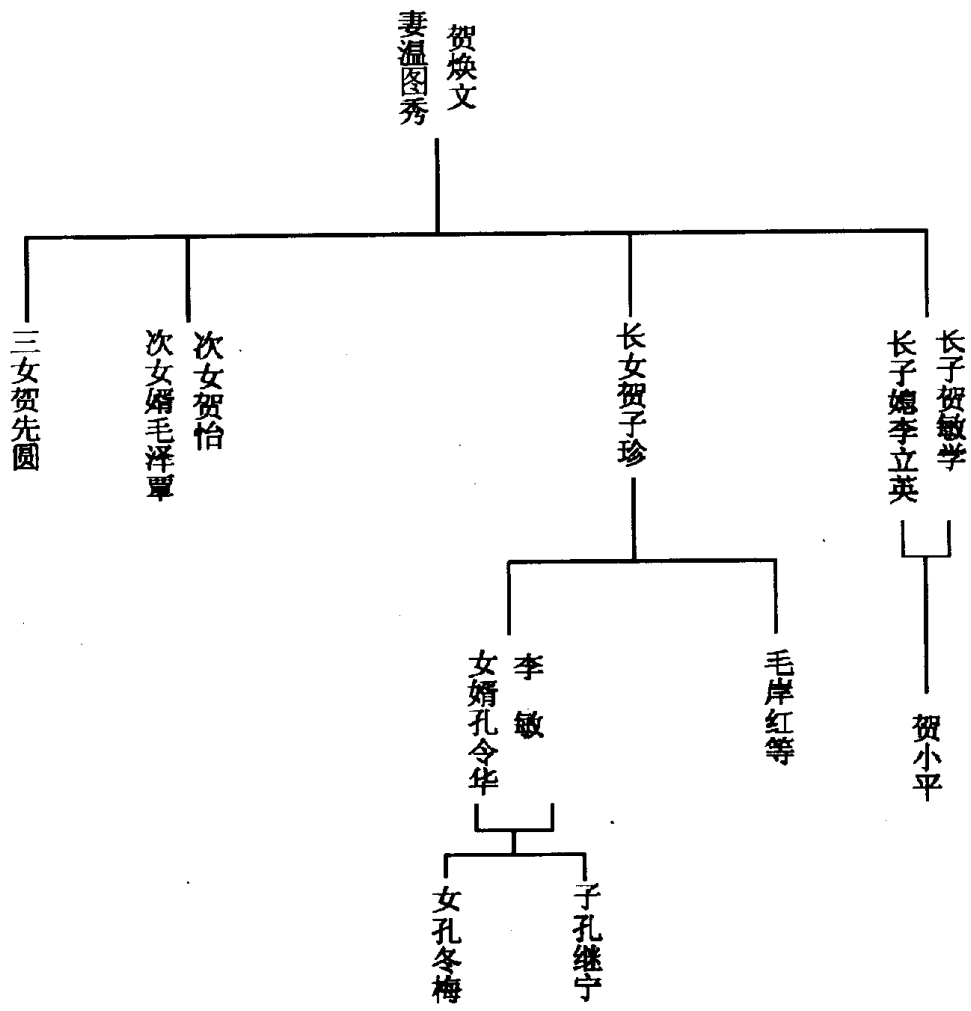
附 十 二

杨书祥（杨开慧祖父）后裔简表



附 十 三

贺焕文（贺子珍父亲）后裔简表



附 十 四

毛泽东亲属人名录

毛 家

毛祖人，字四端，毛泽东的曾祖父。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人。务农。生二子一女。葬韶山滴水冲。

毛恩普（1846.5.22—1904.11.23），字寅宾，号翼臣，毛祖人次子，毛泽东的祖父。生一子二女。葬韶山滴水冲。

刘氏（1846.9.21—1884.5.20），毛恩普妻，毛泽东的祖母。葬韶山东茅塘。

毛貽昌（1870.10.5—1920.1.23），字顺生，号良弼，毛恩普之子，行一，毛泽东的父亲。务农，兼做贩运谷米、生猪生意。生五子，长、次子夭亡，三子毛泽东，四子毛泽民，五子毛泽覃；生二女，均早殇。葬韶山南岸。

文七妹（1867.2.12—1919.10.5），毛貽昌妻，毛泽东的母亲。湖南湘乡县四都唐家坵文芝仪之女，行七。务农。葬韶山南岸，与夫同坟。

张毛氏，毛恩普长女，毛泽东的大姑。

贺毛氏，毛恩普次女，毛泽东的二姑。

罗氏（1889.10.20—1910.2.11），毛泽东的结发妻。

杨开慧（1901.11.6—1930.11.14），字云锦，乳名霞姑，湖南长沙县东乡板仓杨昌济之女。1920年冬同毛泽东结婚。生三子，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三子毛岸龙。（据四修韶山《毛氏族谱》载，杨开慧还生了第四个儿子，名毛远怀，出抚毛泽民承祧，但以后所有的回忆文章中均无此说。一说此人即毛华初。）1930年11月14日被杀于长沙浏阳门外，葬长沙东板仓乡棉花坡。

贺子珍（1909.9—1984.4），又名桂圆，江西永新县人。1928年同毛泽东在井冈山结婚。生三子三女，长大成人的仅女儿李敏。1984年4月26日逝世，骨灰置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江青（1914—1991.5），又名李淑蒙、李云鹤、蓝萍、李进，山东诸城人。1938年同毛泽东在延安结婚。生一女李讷。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死刑，缓期执行。1981年改判无期徒刑。1991年5

月 14 日凌晨，在保外就医时自杀身亡。

毛泽民（1896.4.3—1943.9.27），又名泽铭，字咏莲、润莲，行四，毛泽东的大弟。生四子三女。长、次、三子均早殇，四子毛远新，养子毛华初，长女毛远志。1943 年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

王淑兰（1896.2.5—1965），湖南省湘乡人。毛泽民结发妻，毛泽东的弟媳。生三子二女，仅毛远志长大成人。

钱希钧（1905—1992），浙江诸暨县牌头镇人。1925 年入党。1926 年同毛泽民结婚，毛泽东的弟媳。1939 年同毛泽民离婚，1943 年改嫁周小鼎。

朱丹华，又名朱旦华，1940 年同毛泽民结婚，毛泽东的弟媳。生子毛远新。1946 年改嫁方志纯。

毛泽覃（1905.9.25—1935.4.26），字咏菊，润菊，行五，毛泽东的小弟。生子毛楚雄。1935 年在江西瑞金牺牲。

赵先桂（1905.9.5—1932.夏），湖南湘乡县凤音乡赵蕊香之女。毛泽覃结发妻，毛泽东的弟媳。后改嫁中共山东省宣传部长裴光。1923 年入党。1932 年在山东济南牺牲。

周文楠（1910.11.7— ），又名润芳，字菊生，湖南长沙人，1926 年同毛泽覃结婚，毛泽东的弟媳。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庭庭长。生子毛远大（楚雄）。现已离休。

周陈轩（1883.7.26—1968.8.10），周文楠的母亲，毛泽覃的岳母。1950 年 5 月 12 日，毛泽东写信请湖南有关部门照顾烈士亲属，发给旅费，让周文楠接周陈轩赴沈阳定居。死后葬韶山。

周自娱，又名周祖余，毛泽东弟媳周文楠的哥哥，毛楚雄的舅舅。

贺怡，30 年代同毛泽覃结婚，毛泽东的弟媳。1949 年 11 月 22 日在江西因车祸遇难。

毛泽建（1905.10—1928.8.20），字达湘，乳名菊妹子，毛泽东的堂妹，毛贻经之女。6 岁时过继给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1928 年被反动派枪杀于衡山县南门外，葬衡山县城南湘江岸畔的西溪桥头，半年后移葬衡山金紫峰麓的雷打石山上。

陈芬，毛泽建丈夫，毛泽东的堂妹夫。曾任中共衡山县委书记。1928 年夏在耒阳县敖山庙牺牲。

毛岸英（1922.10.24—1950.11.25），又名毛远仁，毛泽东长子，为杨开慧所生。1949 年 10 月 15 日同刘松林结婚。1950 年 11 月 25 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葬朝鲜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刘松林（1930.3.2— ），毛岸英妻子，毛泽东的儿媳。又名刘思齐，

刘谦初与张文秋之女。曾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已离休。

毛岸青（1923.11.23— ），又名毛远义，毛泽东次子，为杨开慧所生。1960年同邵华结婚。曾在中宣部马列主义著作编辑所工作。已离休。

邵华（1938— ），又名张少华，毛岸青妻子，毛泽东的儿媳，陈振亚与张文秋之女。生子毛新宇。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现为全国政协委员。

毛岸龙（1927.4.4—30年代中期），又名毛远智，毛泽东三子，为杨开慧所生。在上海失踪。

李敏（1936— ），乳名娇娇，毛泽东之女，为贺子珍所生。曾在国防科委办公室工作，现工作属总政系统。生子孔继宁、女孔冬梅。

孔令华，李敏丈夫，毛泽东的女婿。曾在国防科委工作，已去世。

李讷（1940.8.3— ），毛泽东之女，为江青所生。现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生子李效芝，后改名王效芝。

王景清，李讷的丈夫，毛泽东的女婿。曾任昆明军区某军分区参谋长（副师级干部），已离休。

毛新宇（1970.1.17— ），毛泽东长孙，毛岸青与邵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入中央党校攻读硕士研究生。

毛远志（1923.5.5—1990），毛泽民和王淑兰之女，毛泽东的侄女。曾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生三子一女。1990年病逝后，葬于韶山母亲王淑兰墓边。

曹全夫，毛志远丈夫，毛泽东的侄女婿。1938年参加革命并入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副局长。已离休。

毛远新（1941.2— ），毛泽民和朱丹华之子，毛泽东的侄子。曾任辽宁省委书记。因“四人帮”一案，被判有期徒刑17年，刑满后在上海工作。生一女。

全秀凤，毛远新妻，毛泽东的侄媳。上海织袜厂女工。

毛华初（1923.2— ），原名王华初，生母牺牲后为王淑兰养子，毛泽东的侄子。曾任湘潭县委书记，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已离休。生二子二女。

韩瑾行，毛华初妻，毛泽东的侄媳。曾任湖南省农业厅处长。已离休。

毛楚雄（1927.9.8—1946.8），毛泽覃和周文楠之子，毛泽东侄子。被反动派杀害。

曹志卫，毛远志长子，毛泽东的外侄孙。

曹宏，毛远志次子，毛泽东的外侄孙。

曹耘山，毛远志三子，毛泽东的外侄孙。

曹立亚，毛远志之女，毛泽东的外侄孙女。

毛莉莉，毛远新之女，毛泽东的侄孙女。

毛宁利，毛华初长女，毛泽东的侄孙女。

毛宁科，毛华初长子，毛泽东的侄孙。

毛宁娜，毛华初次女，毛泽东的侄孙女。

毛宁亚，毛华初次子，毛泽东的侄孙。

毛恩农（1841.12.31—1907.10.7），字嘉宾，号德臣，毛祖人长子，毛泽东的伯祖父。务农。生三子三女。葬韶山滴水冲。

罗氏（1842.2.9—1866.1.13），毛恩农妻，毛泽东的伯祖母。生二女。葬韶山滴水冲。

庞氏（1842.5.3—1916.6.2），毛恩农第二个妻子，毛泽东的伯祖母。生三子一女，长子毛貽盛、次子毛貽富、三子毛貽经。葬韶山滴水冲。

毛裕初（亦作亦初），派名毛恩普（与毛泽东祖父同名），号鼎言，行五。他属韶山毛氏震房，与毛泽东是韶山南岸私塾的同学，论字辈是毛泽东的房族祠。

毛恩翌，字锡臣，毛泽东的远房叔祖父，幼时与毛泽东是同学。

毛貽盛（1872.10.26—1916.8.10），字菊生，号良辅，又名毛爱棠。行二。毛恩农长子，毛泽东的二堂叔。抚子毛泽连。

钟氏（1870.11.16—1932.8.17），毛貽盛妻子，毛泽东的二堂婶。葬韶山东茅塘。

毛貽富（1877.1.17—1916.5.19），字梅生，号良材。行四。毛恩农次子，毛泽东的四堂叔。生子毛泽嵘。

肖氏（1873.2.18—1908.12.21），毛貽富妻，毛泽东的四堂婶。

毛槐林，毛泽东的房叔，曾和毛顺生合伙做生意。

毛貽全，毛泽东房叔。1925年和1927年毛泽东回乡开展农民运动时，曾得到他的资助和帮助。

毛貽悼，毛泽东的族叔父，毛新梅四兄弟的父亲。

毛貽经（1882.11.1—1919.12.8），字蔚生，号良英。行六。毛恩农三子，毛泽东的六堂叔（嫡亲）。生三子一女，长子毛泽珩、次子毛泽连（过继给毛貽盛）、三子毛泽青，女毛泽建。

陈氏，生于1887年1月26日，毛貽经妻，毛泽东的六堂婶。

毛智修，毛恩农女，毛泽东的堂姑母。长毛泽东14岁。姑侄关系十分密切。嫁李星明。

毛恩苞，毛氏鉴房，毛泽东的房叔祖与邻居。

毛贻胜，字爱堂，1927 年牺牲。毛恩苞的长子。

毛贻腾，字继先，又名毛爱松，毛恩苞次子。

毛贻业，又名毛爱桂，毛泽东的族叔。毛恩苞的三子。

毛春秀，毛贻业姐姐，毛泽东族姑，毛恩苞之女。

李远明，又名李树村，毛春秀丈夫，毛泽东的族姑父。

毛恩陶（1844.10.22—1910.11.6），字少伯，号策臣，毛泽东祖父的堂兄，毛祖南长子。葬韶山锯木墚。

彭氏（1844.9.29—1913.2.10），毛泽东祖父的堂嫂，毛恩陶妻子。与夫合坟。

毛贻裕（1886.2.7—1937.11.16），字岳生，号群超，毛恩陶抚子，毛泽东父亲的堂兄，毛泽东的堂伯父。兼嗣弟毛贻禧之子毛泽敷。葬韶山。

毛简臣，毛泽东的堂叔祖父，1909 年秋毛泽东曾到他门下读私塾。

毛贻禧（1890.12.28—1936.6.1），学名毛宪，字岱钟，号亚超，毛泽东父亲的堂弟，毛泽东的堂叔父。国民党执政时期曾任监察院调查专员。生子毛泽敷。葬韶山分水坳。

毛贻谋（1863.12.8—1933.4.6），字福生，毛宇居之父，毛泽东的堂伯父。

毛贻谟，字喜生，毛纯珠、毛泽全兄弟的父亲，毛泽东的堂叔父。1933 年去世。其妻邹氏，毛泽东的堂婶，是毛泽东好友邹普勋的亲姐姐。

毛贻读，字寿生，毛泽东的堂叔父，毛宇居的叔父。

毛恩翌（1879.2.24—1961.10），又名毛锡臣，毛泽东的远房叔祖父。

毛贻柏，又名毛逸民，毛泽东的远房叔父。

毛贻明（1879.3.26—1957.1），字月秋，号湘圃，毛泽东的远房叔父。1925 年入党，曾任韶山党支部书记。建国后，在毛泽东旧居做接待工作，曾任湘潭县人民代表。生三子二女。

毛继生，派名毛贻弟，生于 1922 年，论辈分是毛泽东的族叔父。解放前，参加地下党。

毛麓钟，派名毛贻训，毛泽东的远房伯父和私塾老师。是韶山毛氏家族中惟一的秀才，曾在云南蔡锷部下任职。1921 年病逝于韶山东茅塘。

毛泽连，生于 1913 年 9 月 26 日，字润发，毛贻盛抚子，毛泽东的堂弟。妻子张玉莲。

毛泽堂，又名毛纯珠，毛泽东的堂弟。

毛泽全，字鼎甲，号荣珠，后改名王勋。毛泽东的堂弟，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工作，已离休。

徐寄萍，毛泽东的堂弟媳，毛泽全妻。

毛泽满，毛纯珠（泽堂）和毛泽全的亲弟弟，毛泽东的堂弟。

毛泽嵘，生于 1897 年 5 月 26 日，字冬青，小名送五，毛貽富之子，毛泽东的堂弟。1986 年病逝。

熊氏，生于 1897 年 1 月 3 日，毛泽嵘的妻子，毛泽东的堂弟媳。

李氏，生于 1909 年 11 月 26 日，毛泽嵘续弦，毛泽东的堂弟媳。

毛泽华，生于 1908 年 9 月 7 日，字咏珩，毛貽经长子，毛泽东堂弟。大革命时期参加农会。1931 年护送王淑兰母女去上海找党组织。后参加红军，在长征中牺牲。

毛泽青，生于 1916 年 6 月 22 日，字咏才，毛貽经三子，毛泽东的堂弟。亦名毛万才，1937 年去延安。

庞氏，生于 1923 年 9 月 28 日，毛泽青妻子，毛泽东的堂弟媳。

贺晓秋，毛泽东姑姑贺毛氏之子，毛泽东的表兄弟。

贺晓明，毛泽东姑姑贺毛氏之子，毛泽东的表兄弟。

贺林生，贺晓秋之子，毛泽东的表侄。

贺凤生，贺晓秋之子，毛泽东的表侄。

毛泽裕，又叫毛岳乔，毛槐林之子，毛泽东族弟与故交。

毛岳生，毛岳乔弟弟，应毛泽东之招，于 1938 年去延安参加革命。1949 年牺牲。

毛宇居（1881—1964），又名毛泽启，毛蕊珠、禹珠、禹居。毛泽东的堂兄和私塾老师。

毛泽先，又名智珠，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的大弟。

毛碧珠，又名毛泽田，毛泽东的堂弟。毛宇居的二弟。

毛泽敷，字振球，毛貽禧之子，毛貽裕兼嗣，毛泽东的族弟。

毛泽益，毛貽全之子，毛泽东的族弟。

毛泽癸，毛泽东的六代堂弟。大革命时参加农会，后外出失踪。

肖氏，毛泽敷妻子，毛泽东的族弟媳。

毛泽普，毛麓钟之子，又名戈楷，毛泽东的堂弟。曾任湖南省科委副主任、韶山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

毛德超，毛恩翌之子，毛泽东的远房叔父。

毛泽光，毛月秋长子，毛泽东的族弟。

毛泽前，毛月秋三子（二子早殇），毛泽东的族弟。

刘毛氏，毛月秋长女，毛泽东的族妹。

刘毛氏，毛月秋次女，毛泽东的族妹。

毛学梅，又名旭梅、泽济，毛泽东的族兄弟。

毛新梅，又名新枚、泽澍，毛泽东的族兄弟。韶山支部党员、烈士。

毛望梅，毛新梅弟弟，毛泽东的族兄弟。

毛仙梅，派名泽治，毛泽东的族兄弟。

李祝华，又名李轲，毛泽东的堂表弟。毛泽东的曾祖父是李轲的曾外祖父。毛泽东的堂姑母毛智修是李的母亲。

毛岸平，毛泽东长子，毛泽东的堂侄。

毛坚平，毛泽东次子，毛泽东的堂侄。

毛远足，毛泽东之子，毛泽东的堂侄。

毛照秋，毛学梅之子，毛泽东的堂侄。

毛慎仪，毛新梅之子，毛泽东的堂侄。

毛远慧，毛泽东之女，毛泽东堂侄女。

毛远玲，毛泽东之女，毛泽东堂侄女。

毛远平，毛泽东之女，毛泽东堂侄女。

毛远绵，字持夫，字德伍，毛新梅之子，毛泽东的族侄。 1930年由毛泽东介绍入党。曾任湘潭县县长。 1982年5月1日逝世。

毛远耀（1912.10.18— ），字卓夫，号振国，毛泽东的堂侄。很早就毛泽东影响下参加革命。 1937年去延安。

胡觉民，毛远耀妻，毛泽东的堂侄媳。

毛远翔（1924.6— ），字玄夫，毛远耀之弟，毛泽东的堂侄。

毛远悌（1924.8— ），字乙夫，毛泽东的堂侄。1946年入党，曾任湖南省医药局副局长。

毛远忠，毛泽东的族侄。

毛臻（1928.7— ），又名毛世美，毛远耀长子，毛泽东的侄孙。1944年9月入党。

毛世奇，毛远耀次子，毛泽东的侄孙。

文 家

文作霖，文七妹祖父，毛泽东的外曾祖父。湖南湘乡县唐家坵人。务农。生三子，长子文绵芳、次子文绵薰、三子文绵姜。 27岁去世。

贺氏，文七妹祖母，毛泽东的曾外祖母。务农。夫亡后勤俭持家，抚育幼子，买房置地，20世纪初文家已有地140多亩。

文绵芳，文作霖长子，毛泽东的伯外祖父。生子文正儒、文正美和四女。

文绵薰（1821—1888），又名文芝仪，文作霖次子，毛泽东的外祖父。务农。生三子三女，长子文玉瑞、次子文玉钦、三子文玉材，长女适钟、次女适王、三女适毛。

贺氏（1826—1909），文七妹母亲，毛泽东的外祖母。

文绵姜，文作霖三子，毛泽东的叔外祖父。生子文正华。

文正儒（1844—1919），号玉里。文绵芳之子，行五，毛泽东的五舅父。

文玉瑞（1853—1920），名正义、字勃生。文绵薰长子，行七，毛泽东的七舅父和干爹。生三子，长子文谷香、次子文润泉、三子文梅清。

文赵氏（1854—1924），文玉瑞妻子，毛泽东的七舅母和干妈。

文玉钦（1859.12.11—1929.5.21），名正莹，文绵薰次子，行八。生三子，长子文泮香、次子文运昌、三子文南松。

文赵氏（1855.3.27—1937.4.2），文玉钦妻子，毛泽东的八舅母。

文玉材，文绵薰三子，行九，毛泽东的九舅父。早夭。

文玉森（1864—1930），名正华，文绵姜之子，行十，毛泽东的十舅父。

钟文氏，文绵薰长女，行五，毛泽东的大姨妈。

王文氏，文绵薰次女，行六，毛泽东的二姨妈。生二子，长子王星臣、次子王季范。

王文生，王文氏丈夫，文绵薰二女婿，毛泽东的二姨父。

文谷香，文玉瑞长子，毛泽东的表兄。

文泮香（1880—1949），文玉钦长子，行十，毛泽东的表兄。

文润泉（1881—1967），又名文鉴泉，文玉瑞次子，行十一，毛泽东的表兄和干哥。

文运昌（1884—1961），又名润昌、咏昌，文玉钦次子，毛泽东的表兄。解放后曾任湘乡县第一届人大代表、湖南文史馆馆员。

文梅清（1887—1961），又名文枚清，文玉瑞三子，行十七，毛泽东的表兄。

文南松（1890—1952），文玉钦三子，毛泽东的表兄。

文东仙，毛泽东的表弟。

文凯（1883.6.13—1955），又名文涛生，毛泽东的远房表兄。日本东京警官大学毕业，回国后曾任湖南沙城县警察局局长等职。

王星臣，王文生长子，毛泽东的姨表兄。生二子一女。

王季范，王文生次子，毛泽东的姨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的老师、学监。解放后曾任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文史馆馆员。生一子。

刘霖生（1865—1949），派名新澍，毛泽东的姨表兄。清代长沙府学员。

后任湘乡县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湘乡县临时参议会议长。

赵浦珠，毛泽东七舅母的侄子，毛泽覃结发妻赵先桂的堂兄。辛亥革命后曾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新军辎重营当兵。

赵储琳，毛泽东七舅母的侄子，毛泽覃结发妻赵先桂之兄。

文端人，文润泉之子，毛泽东的表侄。

文端灵，文梅清之子，毛泽东的表侄。

文赐生，文泮香长子，毛泽东的表侄。

刘媛英，文赐生的妻子，毛泽东的表侄媳妇。

文泽湘，文赐生的儿子，毛泽东的表侄孙子。

文九明，文泮香次子，毛泽东的表侄。

文砥澜，文运昌长子，毛泽东的表侄。

文凤良，文运昌次子，毛泽东的表侄。

毛凤翔，文凤良妻，毛泽东的表侄媳妇。

文孝根，文南松长子，毛泽东的表侄。

毛枚秀，文孝根妻，与毛泽东同宗。

文炳璋，文南松次子，毛泽东的表侄。

王国焘，王星臣长子，毛泽东的姨表侄。

王曼恬，王星臣之女，毛泽东的姨表侄女。“文革”中任天津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主任。粉碎“四人帮”后自杀。

王智田，王星臣次子，毛泽东的姨表侄。

王德恒，王季范之子，毛泽东的姨表侄。烈士。

王海容，王德恒之女，王季范孙女，毛泽东的姨表侄孙女。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副部长，现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

杨 家

杨书祥（？—1884），字书樵，杨开慧的祖父。生三子一女，长子杨昌运、次子杨昌济、三子杨昌恺。

杨向氏（？—1879），杨书祥妻子，杨开慧的祖母。

杨昌济（1871.6.8—1920.1.17），字华生，留日时改名杨怀中。行二。杨开慧之父，毛泽东的岳父。湖南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人。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北京大学教授。生一子二女。

向振熙（1870—1962），杨昌济妻，毛泽东的岳母。

杨琼，杨昌济长女，早夭。

杨开智，生于1894年10月10日，杨昌济之子，毛泽东的妻兄。生女

杨展。解放后，曾任湖南省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省政协副主席。已逝。

李一纯，杨开智前妻。

李崇德，杨开智妻子，毛泽东的妻嫂。

杨展，杨开智之女，毛泽东妻杨开慧的侄女。 1941 年秋牺牲。

郑杨氏，杨书祥之女，杨开慧的姑妈。

杨昌恺，字瑞生，杨书祥之子，杨开慧的叔父，过继给杨书祥之弟杨小

五

杨开仁，杨昌恺之女，杨开慧的堂妹。

杨开秀，杨开慧的堂妹。

杨开英（1915—1973），杨开慧堂妹。

杨开明（1904—1930），杨昌恺之子，杨开慧的堂弟。即杨克敏，烈士。

杨秀生，杨开慧的族兄。杨开慧牺牲后，受杨开智夫妇的委托，为她收敛入棺。

向理卿，杨开慧的舅舅。

叶素珍，向理卿妻子，杨开慧的舅妈。

向明卿，杨开慧的舅舅。

严嘉，向明卿妻子，杨开慧的舅妈。

向钧，向明卿之子，杨开慧的外甥。 1927 年牺牲。

向锡淳，向理卿之女，杨开慧的外甥女。

向复，向理卿之子，杨开慧的外甥。

向三立，向理卿之子，杨开慧的外甥。

贺 家

贺焕文，贺子珍父亲，毛泽东的岳父。江西永新县人。在子女的影响下参加革命。1938 年 1 月在江西赣州河西的岗边排病逝，并葬在那里。生三子三女，长子贺敏学、三子贺敏萱，长女贺子珍、次女贺怡、三女贺先圆。

温图秀，贺子珍母亲，毛泽东的岳母。广东梅县人。贺焕文去世后赴延安，在那里病逝。

贺敏学，贺焕文长子，毛泽东的妻兄。 1926 年入党。建国后曾任福建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逝世后骨灰置放在井冈山。

李立英，贺敏学妻子，毛泽东的妻嫂。

贺先圆，贺焕文三女，毛泽东的妻妹。 10 岁时被敌人杀害。

贺敏萱，贺焕文三子，贺子珍的同父异母弟弟，在“文革”中受迫害

致死。

李 家

李德文，江青父亲，山东诸城县人。曾在县城开过旅店和木匠铺，娶过两个妻子，江青为庶出。

李氏，江青母亲，佣人出身。

李云霞，江青姐姐。曾照料过小时候的江青和李讷。 1988 年 5 月 25 日病故。

王克铭，李云霞丈夫，江青的姐夫。曾是奉系军阀部队的一个下级军官。

李干卿，江青哥哥。曾在铁路上工作。

王博文，王克铭和李云霞之子，江青的外甥。曾在清华大学工作。

后 记

关于毛泽东的家庭情况，包括他的身世、他的亲属及他和亲属的关系等，长期以来鲜为人知。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向毛泽东提交了五六组问题的采访单，其中有一组是“一大串有关他个人问题”的。从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奋斗、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职业革命家、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可以说，每个人的身世和经历都是一部传奇的故事。然而，他们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业，讲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史、军史、革命史，可以滔滔不绝，却很少甚至无暇谈及个人问题。毛泽东更是这样。在接受斯诺采访的过程中，他曾用十几个晚上只谈中国革命而不言其他。毛泽东这样做，实际上是不想谈有关他个人的问题。但斯诺以他职业的韧劲和机智，坚持认为读者“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理由很中肯也很有道理。既然个人问题涉及外界对中国革命的了解，非同小可，毛泽东最终接受了斯诺的建议。于是，在保安（今志丹县）那座石头窑洞里，在幽暗的烛光下，毛泽东又连续谈了几个晚上，介绍他早年家庭生活和成长经历。然而，谈着谈着，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了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结果，斯诺采访到的只是毛泽东“个人问题”的一小部分，但这已是非常可贵的了。1937年，斯诺将他在陕北的采访写成书，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首先在英国出版。之后，于1938年又在美国出版。此书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其中，毛泽东谈“个人问题”的内容为一章，题为“一个共产党人的由来”，是全书最受人关注的部分之一。1937年，国内从英国版翻译了这一部分，以《毛泽东自传》为题，在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的《文摘》月刊连载，并由该刊总经销黎明书局发往北平、南京、开封、安庆、成都等15个分发行所和全国各大书局代售，以飨中国广大读者。这是国人第一次了解毛泽东的家庭情况。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其“个人问题”的意义和影响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斯诺当年把毛泽东的这部分谈话标题为“一个共产党人的由来”，有很独到的见地。的确，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的起点是怎样的，很值得人们研究。然而，毛泽东的家庭生活远不止这一个方面。他是怎样处理家庭、亲属关系的？怎样教育子女的？他的家庭观、亲属观、道德观，他的家风，以及一个革命者的人生百味等等，都应该包括在内。毛泽东的家庭生活，充满了革命气息和文化含量，值得人们学习和研究。

从1936年至1976年的整整40年中，除了斯诺的采访外，人们几乎没有看到有关毛泽东家庭生活新的材料。在这段时间里，只有寥寥几种有关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书。例如，萧三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先后由新华书店1949年印行和人民出版社1951年出版；李锐著《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初期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但这些著作均侧重于记述毛泽东走出家乡后的学生生活和成长为革命者的经历。

毛泽东逝世后，中央专门成立有关机构，承担编辑毛泽东著作、研究毛泽东生平的工作。我们有幸参加这项工作。在工作中我们发现，有关毛泽东家庭生活的材料非常丰富，尤其是收集到的四修《韶山毛氏族谱》，揭开了毛泽东身世渊源。1983年，我参加编辑《毛泽东书信选集》，查阅到很多毛泽东给亲属的书信，走访了湖南十几个县市，以后又参加编辑《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并采访了毛泽东的一些亲属，接触到大量第一手材料。与此同时，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社会上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书籍，如《新湘评论》编辑部编写的《毛主席一家六烈士》和《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邵凡著《求索——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修订版）、萧三著《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和《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两个版本均为修订版）、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等，以及报刊上发表的一些回忆、记述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毛泽东的成长经历和家庭生活。这些，使我们萌生了系统收集、研究毛泽东家庭生活资料的想法。

1989年，我和蒋建农，唐洲雁、高风、蔡钊珍等几位同志合作编著了《毛泽东家世》一书，由我和蒋建农牵头。虽然该书粗疏之处不少，但毕竟是专门记述毛泽东家庭生活的第一部书，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也算了却了我们的一桩心愿。该书由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出版后很快告罄，但因这时出版分工有了明确规定而不能再加印。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人民出版社根据读者需要，希望由该社出修订版。由于原编著人员工作

情况有变动，当时由我和蒋建农、唐洲雁执笔完成。1996年，也是因为工作情况的变动，由我和唐洲雁完成增订第二版的工作。2001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8周年，《伟人毛泽东》丛书编辑部编辑的丛书要收入这一类书，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由我来重新编写。

毛泽东家庭生活的记述，是研究毛泽东生平中的一项内容，也是一个重大课题，我虽然多年涉足这一领域，仍有不知深浅之感，且时间紧迫，水平有限，编写中错漏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感谢曾经为本书提供材料的毛泽东亲属和有关当事人，感谢曾经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合作者和出版社各位编辑，感谢广大读者的支持。

张 民
2001年9月